译林外国文学史系列

YILIN HISTORY OF LITERATURES

石琴娥 著

北欧文学史

History of Northern European Literature

BY SHI QIN'E





《北欧文学史》以翔实的资料，系统地叙述了中世纪至20世纪北欧五国文学发展的概况，精辟地论述了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五国文学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勾画出北欧文学发展的脉络，着重介绍了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北欧文学史的专著，填补了外国文学出版的空白。

ISBN 7-80657-904-4



ISBN 7-80657-904-4
I · 649 定价：24.50元

I530.09
1

123814

石琴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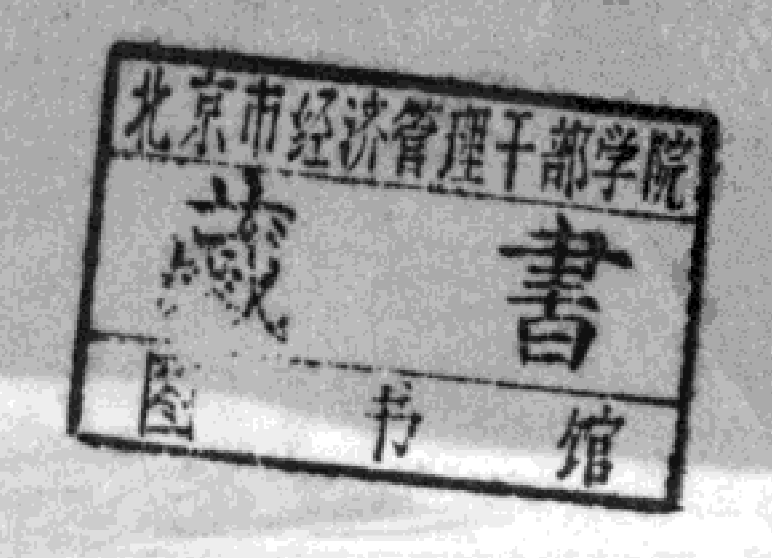
北欧文学史

BY SHI QIN'E

N EUROPEAN
URE

RE
EUROPEAN
URE

译林出版社



SLI64/028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欧文学史/ 石琴娥著.-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译林外国文学史系列)
ISBN 7-80657-904-4

Ⅰ.北... Ⅱ.石... Ⅲ.文学史-北欧 Ⅳ.I53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859 号

书　　名 **北欧文学史**
作　　者 石琴娥
责任编辑 赵燮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插　　页 2
字　　数 333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904-4/I·649
定　　价 24.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石琴娥

拙著《北欧文学史》终于付梓问世,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因为几年来世界各地区文学史和欧洲国别文学史或简史相继在国内出版,有不少质量上乘,足足可以与“国际接轨”,然而至今尚未见到过一部北欧地区的文学史。据笔者孤陋寡闻所及，李长江教授曾在 1944 年出版过一本《北欧文学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那本书系由德语原著编译改写的,不过已是我国仅有的惟一版本。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才有新版本问世,抚掌称快之余亦不禁感慨丛生 对北欧诸国文学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大弱项,问津者寡,而完整又系统的北欧诸国文学史则是空白,拙著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填补空白”,然而也只能供作“敲门之砖”,或者“引玉之砖”。一本篇幅有限的文学史要写五个国家，况且要从古代神话一直写到当代各个流派的演变过程，其时间跨度大，因而不得不予以浓缩精练，只能粗线条地勾画轮廓，对文学作品的介绍也只能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过，即使是文学大师级的作家也只能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不过话又说回来,按西方谚语的说法“:双鸟在林不如一石在握”,

有了这么一本哪怕十分简略的文学史毕竟比没有或者只有六十年前出的更简略的德语转译本参考价值要大一些。至于更翔实充足的史料铺叙和观点评说恐怕要留待日后撰写北欧国别文学史之时再说了，但求有生之年能得以实现这一奢望吧。

这本书的书名是《北欧文学史》,其实应该是北欧地区的各国文学史。在北欧人看来,“北欧”无非是一个代表欧洲北部的空泛的地域名词而已,事实上,北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为各国所认可的恐怕只有两个部分,即北欧神话和北欧传说,前者包含在《埃达》之中,后者体现在《萨迦》之内。这两部堪称世界瑰宝的文学作品确实是原汁原味的北欧日耳曼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的精华，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北欧海盗的粗犷豪迈而又凶狠剽悍的血性汉子的形象,他们崇尚武力,一味厮杀喋血,因而基督教开始传入北欧时,他们不屑一顾地声称，基督大概是最没有本事的、最不中用的神道，因为他既没有战斧也没有利剑，只会手捧十字架唱唱歌而已。然而恰恰是这些貌似软弱的基督徒制服了桀骜不驯的北欧海盗，并且还迫使他们的子孙后代俯首帖耳地手捧十字架唱圣歌至今。

北欧诸国的基督教化大抵发生在 11 世纪前后。皈依基督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变化，而且彻底改革了世俗社会和文化。有一种说法称：基督教化把打打杀杀的北欧海盗改造成为斯文优雅的绅士。此言决非谬然。基督教文化的推行在几个世纪里大张挞伐,扼杀摧毁北欧地区原有的丰富多彩的多神教文化,因而整个中世纪出现了类似文化荒漠的凄凉景象,即便有文学可言,也只是一些启示录、福音诗、圣歌等训谕之类的布道之作,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直到 15 和 16 世纪,基督教为了加强对思想的严密控制,推行《圣经》当地语言化,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大概是百密一疏的缘故,基督教文化竟不曾防范到民族文学会借尸还魂,托庇于圣歌来宣泄世俗的七情六欲。17 世纪丹麦的托马斯·金果是北欧最著名的圣歌作家,他的诗哀婉动人,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修辞手法,因而

他被誉为‘丹麦的荷马’。圣歌这一文学狂澜既冲破了基督教文化的压制,促使北欧诸国民族文学的振兴,也赶上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出现的文学潮流。霍尔堡是丹麦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他所创作的现实主义喜剧对丹麦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丹麦文学成为欧洲文学中为人熟悉的一部分。 18 世纪后期“日耳曼文艺复兴运动”在丹麦兴起。随着丹麦浪漫主义诗人欧伦施莱厄踌躇满志地宣称“:天才尤其是诗才乃是文化之桂冠”,这一文学潮流在北欧诸国达到了新的高度。

19 世纪是北欧各国文学运动高潮迭起的大好时代，在北欧各国文坛上各种流派纷呈,不少名家崭露头角,熠熠生辉,在群英荟萃之际出现了几位旷世文豪 易卜生、安徒生、斯特林堡、基维……易卜生以‘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开创了欧洲乃至世界戏剧的新局面 安徒生作为童话大师其作品受到了世界各国读者的欢迎 斯特林堡则成为欧洲表现主义的先驱人物。 19 世纪确实是值得北欧各国文坛引以为自豪的时代,一批文学巨匠的出现,使得北欧诸国的文学不仅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欧洲大国的文学潮流，而且也可以独自屹立于世界文坛之上，并且对欧洲大国的文学产生影响。

进入 20 世纪这种情况有增无已，北欧文学已广为人知和为人称道。但是 20 世纪里出现了一个被打入另册的挪威作家哈姆生。哈姆生是继斯特林堡之后才华最为横溢的作家，可惜他最后走上了投敌叛国的道路。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应该如何对待，长期以来北欧尤其是挪威本国的研究家们激烈争论不休，这场论战至今还在延续着。

综上所述,北欧各国文学既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发展过程、潮流和特色,也有巨大的不同,由于纵向上要写从古至今数百年的文学演进史，横向上还要同时兼顾五个不同国家文学上各自的成就和特点,编写这部文学史便有了相当难度,弄得不好便容易产生叙述上的漫漶和重叠,或者是顾此失彼写成了国别史,以致前后无法一

气呵成。笔者采用了按时代分段，平行论述五国文学的成果、发展、状况和潮流的体例，并且通过每一章的概述交待清楚该时段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把北欧始终置于整个欧洲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大框架之中，这样既能体现北欧文学的整体性，展现地区五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又能较深入地评介各国文学在每一个时段上的独特成就和著名作家的作品，因此本书在体例上基本上做到了轮廓分明，线条清晰。此外在运用史料上，笔者力求资料翔实可靠，出处确凿。对各国文学状况的评介力求客观、全面，并且尽可能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流派。本书对挪威的乡土文学、冰岛的浪漫主义诗歌、芬兰民族语言文学，以及"现代突破运动"、"晨星派"、"哥特同盟"、"参与文学"等文学流派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同时对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和现实主义以及工人运动文学等都力求客观地予以介绍，并不以意识形态的框框来划界贬褒，以免立论失之偏颇。

北欧诸国的文学作品从 20 世纪初开始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来，对我国的新文学运动具有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尤其在戏剧和童话方面。然而北欧文学作品对我国的纲常伦理和道德传统所带来的冲击以及润物无声的社会影响则是远远超越了我们平常所能意识到的范围。

从时间上看，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在我国得到介绍是相当早的。1914 年由欧阳予倩主持的春柳社将挪威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翻译改写成为文明戏，即新剧《家庭恩仇记》，在上海谋得利剧场公演，并且成为春柳剧场的社会问题剧保留剧目，长期公演至 1915 年剧场歇业为止。1918 年 1 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丹麦安徒生的童话故事，1918 年 6 月北京《新青年》刊出易卜生专号，自此之后，北欧诸国文学作品便继而不辍地译介到中国来。

从译介的北欧国家的作家来看，起初集中了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的 19 世纪的作家，后来芬兰和冰岛的重要作家也逐渐得到译介 。20 世纪 80 年代前囿于意识形态的制约，近当代作家译介得不多,除了丹麦勃朗兑斯的《19 世纪文学主流》外,主要译介的是丹麦马丁 ·尼克索和冰岛拉克斯内斯的作品。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这种封闭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代表不同流派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译介，而且译介的面正在愈来愈趋于广泛。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制约,至今仍有‘ 北欧只有两个半 ’之说,也就是说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北欧作家仍只有易卜生和安徒生。拉格洛夫在近一二十年来被国人所接受和喜爱,人气正在迅速飙升,但仅限于她的《骑鹅历险记》。其他的作品并没有引起多少兴趣,因而只能算半个。至于才气超群的斯特林堡其作品被译介过来后似乎总是有点水土不服,这大概和他的狂躁和偏执有很大关系,因为国人的平和脾胃似乎不太习惯于这种笔调。至于对中国文学和社会影响最深的北欧作家恐怕当首推挪威易卜生了。易卜生的剧作对中国当年的社会解放运动和新兴的话剧运动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话剧在中国是一种移植进来的外来戏剧样式，在 20 世纪初才逐渐为国人所认同和接受,而话剧在中国的开场中除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热血》之外就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国第一代话剧运动的倡导人莫不受到易卜生的影响：欧阳予倩早在五四运动前就演出他的戏剧；洪深是抱着“ 做一个易卜生 ”的决心于 1922 年春从美国回来从事话剧实验活动的；曹禺在 1925 年加入南开新剧团期间就曾演出过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并从中得到启发，致力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因而他的早期现实主义剧作诸如《雷雨》、《日出》都带有明显的易卜生主义的痕迹。

1935 年 6 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首演易卜生的《娜拉》(即《玩偶之家》)。这场公演不仅是中国话剧运动载入史册的大事,也触发了一场中国妇女的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大辩论,问题的核心集中在 娜拉出走之后该到哪儿去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

文中的回答是："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场论战证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有新的角度来猛推一下，而易卜生的作品以及北欧其他的文学作品提供了这样的新思路。

那么在21世纪我们还要不要吸收和引进北欧文学作品并从中吸取养分呢？现代和当代北欧文学中有没有可资借鉴之处呢？回答也是肯定的。事实上，北欧各国近年来也确实涌现出不少艺术造诣深厚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相信在今后我们对北欧文学的现状和动向将会给予愈来愈密切的关注。

目　　录



第一章　中世纪时期北欧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在欧洲文学史上，中世纪时期通常指的是从公元 5 世纪到 15 世纪之间的一千多年，也就是从公元 450 年左右罗马帝国衰亡到文艺复兴。时间上有先有后，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从 14 世纪已开始,15 世纪达到鼎盛。北欧各国则要晚得多，一般认为北欧中世纪指的是从 8 世纪到 16 世纪之间，而且时间要比欧洲大陆上短一些,芬兰则更迟更短。

1．在中世纪的几百年里，北欧地区的日耳曼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从分散的氏族社会逐渐跨入封建社会，并且为建立地域上统一的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其一大变动是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聚居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方蛮族”势力勃然崛起和迅速扩展，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反复南下东进，扩张到不列颠岛、法兰西甚至意大利一带。部落的迁移和扩展造成战祸连绵，兵燹不断,欧洲大片地区城镇湮灭,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生产倒退。这一段时期史称‘北欧海盗时期”。

北欧海盗时期始于 793 年丹麦海盗入侵英格兰。此后丹麦海盗便不断对英格兰，挪威海盗主要对爱尔兰进行劫掠骚扰，并且发展到大举入侵攻城占地。878 年丹麦海盗已占有英格兰的一半，成立了“丹麦区”，迁徙丹麦移民来定居。后来丹麦移民经过长期

交往和通婚逐渐被同化而融入盎格鲁撒克逊人之中。丹麦移民后裔在英国有很大的影响和相当权力，这也是英国中世纪文学中往往有不少丹麦痕迹的缘故。845 年北欧海盗洗劫了巴黎，并在塞纳河入海口建立了诺曼底公国。1066 年，诺曼底大公威廉远征英格兰，攻占伦敦后自立为英格兰国王，史称“ 征服者威廉 ”。1028 年丹麦克努特大帝建立了疆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 北欧大帝国 ”。瑞典海盗主要朝东扩张至第聂伯河、涅瓦河和伏尔加河一带，并建立了诺夫哥罗德公国。然而北欧海盗时期由崛起到鼎盛之后就迅速衰落，北海大帝国于 1035 年土崩瓦解,征服者威廉也于 1087 年兵败身亡。北欧海盗时期是欧洲继 4 世纪日耳曼人民族大迁徙以来最大的变动，彻底改变了北欧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结构。这样影响重大而历时漫长的社会变动必然会在文学上反映出来。

第二个大变动是基督教传入北欧。尽管中世纪北欧各国有许多急剧的变化，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以多神解释宇宙、世界以及人的哲理方式起了根本的变化，基督教的传播和强制推行以对单一的外来神祇的顶礼膜拜来取代北欧固有的对众多神祇的信仰。北欧多神教亦被基督教称为北欧异教，信奉多神，崇拜太阳和生殖，是古代拜阳教的衍变异种。这一宗教没有神学，也不设专门的祭司，但是有许多自成体系的神话故事，教义和教规、训谕和戒律都是通过神话故事来表达的。

北欧多神教同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罗马和克尔特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有不少雷同之处。北欧的神庙都是用巨大的岩石砌成，气势宏伟。神庙不仅是祭祀场所，也是那个地区的活动中心，献祭的牺牲往往是男性战俘，后来逐渐改用牛作祭品。基督教从 9 世纪初传入北欧地区，起初是丹麦和挪威海盗在本土以外皈依基督教。823 年传教士安斯嘉到丹麦传教，经过十年努力在海德比城建立第一座教堂。960 年丹麦在全国推行基督教。996 年挪威实行基

督教化。1000 年瑞典和冰岛相继皈依基督教。1155 年起瑞典组织十字军东征迫使芬兰人改教。到 12 世纪,基督教已在北欧地区广为传播，旧有的多神教被扫荡殆尽，其间除了在芬兰进行了两年多殖民战争外，许多地方虽也发生反对改教的流血冲突，不过大多是以武力相胁迫从而达到妥协解决。基督教虽然渗透到北欧社会各个层次,干预了认知、审美、道德,乃至以清规戒律制约束缚了日常生活，促使北欧氏族部落分化瓦解，但是由于改教的不彻底性，北欧多神教的许多习俗、神话故事和传统才得以保存，而这些传统和神话故事恰恰是北欧地区居民在漫长年代中运用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口头文学珍品。基督教会竭力摧残北欧异教文化，但也不可否认，教会凭借所掌握的权力、学问和知识，对保存北欧早期文学作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基督教的传播亦带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通过精神信仰与思想控制来操纵世俗统治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把欧洲大陆上演化而成的封建领主制度推行到北欧。丹麦、挪威、瑞典相继按地域出现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世俗政权，其中数丹麦最为强大，并置瑞典和挪威在其统治之下，它们时离时合，争斗不已。由于基督教在北欧传播的不彻底性，北欧地区固有的日耳曼氏族社会的原始共和和民主政体得以全部（如在冰岛）或部分地保存下来。王权和制衡世俗政权的神权虽然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它们的势力和影响却和南欧(如意大利、西班牙等)难以同日而语。

中世纪北欧地区经历的第三个大变动是各国先后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书面语言。北欧的古文字是聚居在罗马帝国毗邻地区的日耳曼部落在公元之初创造的。这种文字受到拉丁语的排挤，流传并不广泛，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得以保存，被称为富塔克字母或鲁纳文字。“鲁纳”的原意是“神秘”或“魔法”,这种文字发明于 3 世纪左右，为楔形字母,9 世纪演变为 16 个字母。在日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墓碑和器皿上都可以见到这种文字，其中

尤以 1634 年在丹麦出土的约为 400 年时的刻有鲁纳铭文的一对金号角尤为著称。但是这种文字过于简单，难于书写成长篇的文字。985 年由青齿王哈拉尔德在日德兰中部建立的耶林厄石碑标志着基督教文化在北欧的决定性胜利，也标志着丹麦文字的开端。瑞典稍后也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挪威则由于口头语言的杂乱拖宕了书面语言的统一。冰岛语保存了较多的古诺斯语，它的书面语言基本上还是古诺斯语的风貌。芬兰直到 16 世纪才缓慢地出现了芬兰语书面语言。基督教会在北欧传教伊始一直使用拉丁语文字,直到 1529 年才出版了丹麦文的《新约全书》,稍后瑞典文译本也问世了,芬兰文的译本在 1548 年才出版。《圣经》的翻译出版有助于北欧各国书面语言的规范化。

2. 中世纪也可以说是北欧的英雄史诗时代。中世纪哥特文化崇尚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鼓吹忠诚、骁勇和建功立业。这类英雄史诗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蛮族各部落在氏族社会末期的写照，也就是在没有受到基督教影响和封建化之前的异族氏族社会的生活,这类史诗的代表作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日耳曼人的《希尔特布兰德之歌》、冰岛的《埃达》和北欧神话。这类史诗同荷马史诗一样是氏族社会末期的产物，它们以神话传说为依据，歌颂部落英雄，并且叙述神祇的不可靠和对人的命运横加干预。这种类型的英雄史诗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北欧氏族社会生活，尤其是部落之间的血仇关系、象征权力的黄金给部落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并且突出了英雄的悲剧性格。英雄通常要经受艰辛的考验，甚至要与魔怪和法术斗争，而结果往往是悲壮或者是惨烈的。

另一类英雄史诗是以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作为基础的，如冰岛的《萨迦》、日耳曼的《尼伯龙人之歌》等。这类史诗作品是在氏族社会解体走向封建化并且在基督教控制之下产生的，因而多神教的神话因素大为减少甚至绝迹,英雄的形象不仅是剽悍骁勇,也应该是忠诚和反对异教的。

成篇于 700 年前后的《贝奥武甫》是第一类英雄史诗中最早的作品，它虽然是一部英格兰叙事诗，主人公贝奥武甫却是一个北欧海盗英雄形象，全诗讲述的故事也发生在丹麦、瑞典：耶特国勇士贝奥武甫渡海赴丹麦帮助丹麦国王除妖驱魔，随后又参与了对瑞典的征战。贝奥武甫被国王立为哥特国王，再过五十年，他以老迈之年奋战火龙并将其杀死，而他自己也伤重死去。鉴于北欧海盗当时在英国占有诺森伯兰和麦西亚一带，这首长诗又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创作的，其内容尤其是后半部描写的都是以北欧的传说为基础的人与事，因而很有可能是北欧人创作的。

《尼伯龙人之歌》产生于 13 世纪初，是德国中世纪最宝贵的文学遗产,素来被推崇为德国的《伊利亚特》,它所用的诗体后来称为尼伯龙人诗体。该诗上部《西格弗里德之死》写的是毕德兰王子西格弗里德迎娶了勃艮第国公主格里姆希尔德为妻，并用计制服冰岛女王布伦希尔特，并帮助大舅东哥特国王贡纳尔骗娶了她。十年后隐情败露，女王派勇士哈根杀死西格弗里德。下部《格里姆希尔德复仇》写的是勃艮第公主格里姆希尔德为夫报仇，不惜下嫁匈奴王埃采尔，酿成兄妹残杀的惨剧，贡纳尔和哈根丧命匈奴王宫，而格里姆希尔德也为贡纳尔的扈从希尔特布兰德所杀。该诗的情节中除了家族婚变而残杀的血仇恩怨之外，还有另一条主线，即各方为争夺西格弗里德屠龙得宝而留下的莱茵黄金。

不难看出,该诗以氏族大迁徙后期为历史背景,描述了匈奴大举入侵，在占稳了多瑙河下游地区之后，又向日耳曼人聚居地区的纵深发展,剪灭了勃艮第、东哥特、尼德兰等日耳曼人的王国,并且为争夺莱茵河畔的富庶地区而进行战争。这一题材是日耳曼人的中世纪民间史诗所常见的，叙事常有很大出入，但情节大体雷同。《尼伯龙人之歌》同冰岛《埃达》的下半部如出一辙。一般认为它是从冰岛《埃达》演变衍生而来的,正如 12 世纪初产生的德国长篇史诗《谷德伦》以及 9 世纪初留下的德语古文残诗《希尔特布兰德之

歌》也可能由冰岛《埃达》脱胎衍生。《谷伦德》写的是丹麦国王的女儿谷伦德受到西兰、爱尔兰等国王子求婚，却被诺曼底国王子掠走，最后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束。这首长诗是以诺曼人骚扰法国沿海、不列颠岛和地中海为历史背景的。残诗《希尔特布兰德之歌》写的是东哥特国王的扈从希尔特布兰德随主投奔匈奴。三十年后匈奴败落，他不得不返回家园，却遭他的亲生儿子哈多尔布兰德所拒，于是父子两人兵刃相见展开恶战。实际上，《尼伯龙人之歌》从冰岛《埃达》脱胎衍生的说法似乎稍嫌失之偏颇,但是两者之间却有深厚的渊源，都是日耳曼人一脉相承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现在见到的都是经过后人整理加工、增删修改而成的。冰岛《埃达》成文在先,因而其他日耳曼史诗引用借鉴也不是不可能的，再加时间推移、地区差别和语言的变迁，两者便形成了面目不尽相同的异化变种。姑且勿论脱胎衍生或者是引用借鉴，它们的内容和风格、人物和情节，甚至不少细节都大同小异，因为它们的原始材料都来源于日耳曼各部族聚居地区世代相传的日耳曼人的口头文学。

第二节《埃达》

《埃达》通常也被称为冰岛《埃达》,是堪与希腊神话、罗马史诗相媲美的中世纪文学奇葩,被后世誉为同希腊赫西俄德的《神谱》、罗马奥维德的《变形记》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等相比肩之作,对中世纪英国和德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埃达”一词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中为‘神的启示’或‘运用智慧’,后来引申为‘诗作’或‘写作’。《埃达》是公元 9 世纪从挪威迁徙到冰岛来定居的移民将在北欧地区流传已久的日耳曼人的口头文学作品，包括北欧神话和英雄传奇，带到了刚刚拓殖的处女地，并且在此进一步繁荣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保持了日

耳曼部落的传统，又有北欧的地域风貌和语言特征。冰岛《埃达》可分为《旧埃达》和《新埃达》：

《旧埃达》即《诗体埃达》，也称《塞蒙恩德埃达》，系指公元 8 世纪后到 12 世纪前由挪威定居者带到冰岛来的北欧民间诗歌，大部分是 9 世纪和 10 世纪前后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大多已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之久，到了冰岛之后又在 13 世纪之前由佚名的行吟诗人写定成篇。它们之所以称为《塞蒙恩德埃达》，是因为诗体埃达是由他收集整理而得以保存的。

《新埃达》是冰岛历史学家、诗人斯诺里·斯图鲁松在 13 世纪写成的无韵体散文神话故事和英雄传奇。《新埃达》也被称为《散文体埃达》或《斯诺里埃达》。

据冰岛中古时期历史学家斯图拉·索尔达的《拓土记》记载，公元 870 年挪威贵族英戈尔夫·阿尔纳松兄弟因遭权贵倾轧而率领家属部众来到冰岛拓土定居。到了公元 930 年岛上已经住满了定居者。挪威移民迁徙定居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社会结构、法律、宗教风俗和文化都原封不动地输入冰岛，如氏族社会的军事民主制、原始的共和政体、雏形的法律和多神教文化等。冰岛远离欧洲大陆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虽然荒凉却很安定，没有遭受战祸动乱的浩劫蹂躏，因而日耳曼各部族和北欧地区几百年里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在冰岛得以完好保存。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吟唱形式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由于兵燹战火而几乎荡然无存，而在冰岛却一枝独秀繁荣起来。这类可供吟唱的口头文学作品就是诗体埃达。经过在北欧地区辗转相传几百年后，其内容和形式都逐渐趋于丰富成熟，在 11—13 世纪之间由行吟诗人笔录成篇。冰岛《埃达》就是北欧中世纪时期的英雄史诗，也是北欧海盗时代口头文学作品的笔录和集成。《埃达》以艺术和哲理的方式反映出北欧海盗时期氏族社会生活最本质的面貌，塑造出当时社会为之赞美讴歌的北欧神灵和海盗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冰岛《埃达》乃是整

个北欧的共同财富,尽管《埃达》与芬兰不大相干,对瑞典也涉及不算太多。

冰岛诗体《埃达》共收集了三十八首诗篇,不过最后三首是原来手抄稿里所没有的，显然是基督教传入之后才硬塞进去的。《太阳之歌》等三首诗，不仅说教味道浓郁，而且在诗品风格上也同前三十五首迥异，斧凿痕迹比比皆是，在造诣上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原来的三十五首大概都是 11 世纪前的作品,可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神话诗,共十四首(其中叙事诗十三首,教谕诗一首)第二部分为英雄史诗，共二十一首（其中叙事诗十八首，教谕诗三首）。

神话诗的代表作是被誉为圣诗的《女占卜者的预言》(瓦洛斯帕）。这首诗从混沌初开神人出现的世界创造说起，演绎到神族的太平盛世和部落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直到神族毁灭。旧秩序被彻底消灭后，新的世界又再生复兴，而毁灭的预兆是黑暗扼杀了光明，在新的世界里光明又重新到来。这首诗虽然叙述神的故事，却描绘出氏族社会后期的社会矛盾。恩格斯曾对这首诗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 这首诗写成于海盗时代，但是氏族社会已趋瓦解，所以它写的是诸神的没落和世界的毁灭，大灾难来到以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沦丧①。诗篇的气势雄伟，哲理性很强，虽然写的是世界末日毁灭，结尾却向往光明和理想主义,作为悲剧性叙事诗,它风格壮烈,但基调并不消沉。

神话诗中其他名篇哲理性也很强,如:《里格的赞歌》讲的是众神的守护神海姆达尔化名里格到人间漫游，在奴隶、自由农和军事贵族家庭小住并分别在三个家庭都生下一群子女。他的子女出生伊始命运就已注定：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自由农的后代分化变迁动荡不定；军事贵族后代不再是武士而成为国王。《洛基的吵骂》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 134—136 页。

颇有阿里斯托芬的风格,诙谐而活泼并稍带轻佻,戏剧性极强可供演出。该诗说的是火神洛基对主神奥丁大加嘲骂，口无遮拦地把诸神祇的淫乱污秽揭露无遗,而奥丁却一筹莫展、狼狈尴尬。洛基的揭发表明了氏族社会的信仰随着氏族社会的衰落而逐渐消亡，族长的权威也随之丧失殆尽,反映出氏族社会内部矛盾重重,争夺权势和攫取利益使得成员们丧心病狂。《埃达》的神话部分里也有爱情故事,《斯基尼尔之歌》就是这类日耳曼地区并不罕见的爱情故事诗,写的是丰饶神弗雷为了求爱而不惜交出魔剑,以致末日来临时没有兵器去抵御。

《埃达》的第二部分是英雄史诗,可惜多半只是残篇,有些残稿篇幅很短，有的甚至只有标题而无正文。主要内容是伏尔松家族、海尔吉家族和伏尔隆德家族的传奇故事,前者篇幅较完整,后两者残缺不全。伏尔松家族的传说不仅有韵文诗体，也有被写成了散文体的《伏尔松萨迦》。传说大体是:伏尔松家族勇士西古尔德屠龙得宝、火阵救美,并与匈奴公主布隆希尔德立下婚誓,但得到窖藏莱茵黄金后便变心娶了勃艮第公主古德隆恩为妻。布隆希尔德为复仇嫁给了古德隆恩的哥哥,勃艮第国王贡纳尔为妻,并唆使他杀死西古尔德。贡纳尔逼迫古德隆恩再醮嫁给了匈奴王艾特礼。艾特礼为夺取莱茵黄金杀掉了贡纳尔，古德隆恩替兄报仇设计杀死艾特礼,并投海自尽,却被法兰西国王伊昂纳尔救起,并娶其为妻，从而又卷入了另一场血亲仇杀。伏尔松故事等诗篇中保存较多的北欧氏族社会的特征,如图腾崇拜、还原献祭(即以活人的心肝或鲜血兑蜜酒为牺牲)、杀生殉葬和血亲仇杀等等;又如日耳曼口头文学中所常见的黄金象征权力,权力总有恶龙守卫,得宝者厄运难逃,命运是早已注定的,并且在遭受劫难之前总有预言、梦兆等警报。伏尔松故事悲剧气氛浓郁:西古尔德英名盖世,能手刃恶龙却被觊觎宝藏的亲戚轻易剪除，表明氏族社会末期为了争夺财富而不惜勾心斗角、背信弃义。血缘关系已不再羁縻住人心。古

德隆恩更是悲剧人物，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希腊悲剧中的美狄亚的影子。这一诗篇明显受到希腊悲剧的影响，诗中突出了悲剧性格、悲剧冲突和悲剧效果，并且将个人的遭遇归因于命运的摆布。

《埃达》中教谕诗的代表作是《高人的箴言》(哈瓦玛尔)。该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各种格言，后半部分是主神奥丁吹嘘他如何盗得智慧的语言—— 鲁纳古文字。该诗实际上是北欧海盗待人处世的伦理准则，所提出的许多教谕是海盗生活经验的总结，因而并不着重于道德约束，而是着眼于现实功利，如：处处需小心谨防暗算、不可骄恣蛮横、不可空着肚皮出门或忘带随身兵器、喝酒须适量、买卖要获利等等。再有就是当海盗的诫规忌讳，如：做出允诺必须履行、破坏契约会招惹杀身之祸、前去做客赴宴必须先查看对方是否埋伏杀手、谨防被堵在屋里无法自卫防御、弄到黄金务必与人分享等等，诗中洋溢着北欧海盗粗犷强悍、豪放直率的气息。

冰岛诗体《埃达》是一部布局广阔、气势宏大的作品。它的一个独特的表现手法是解答和猜谜，并且往往预兆着命运的不幸，是日耳曼口头文学作品中惯用的。《埃达》还运用了大量的类比、暗示、寓意和比喻等修辞手法，这就更增加了史诗语言的生动性、象征性和多变性。诗体《埃达》中比喻几乎随处可见，既有明喻也有暗喻、隐喻、换喻等，如 把大海称为‘ 鲸鱼之路 ”,把船只称为‘ 大海的骏马 ”,把利剑称为‘ 血蛇 ”,把武士称为‘ 持兵刃的槭树 ’等等。有些隐喻十分诙谐，如把胡须称为“ 脸颊上的森林 ”，把骏马称为“ 嚼草的舟船 ’等等。黄金被称为‘ 毒龙的火焰 ”,而‘ 仇恨金子的人 ’则是慷慨者,因为他肯仗义疏财,砸开黄金分给别人。诗体《埃达》的语言风格活泼而质朴，广泛采用叠句和副歌。由于是供吟唱诗体,它韵律十分严格,八句为一节,四行一停顿,不押尾韵,只押头韵，并且长短行对称押韵，这样吟唱起来有特殊的音韵节奏效果。英国中世纪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以及后来 13 世纪的德国《尼

伯龙人之歌》均采用这种韵律格式,这种韵律格式被称为‘尼伯龙人诗体”。

冰岛诗体《埃达》的手抄本是丹麦主教布吕恩约弗·斯汶森于17世纪初在冰岛发现。他将这部手抄本起名为《雷吉乌斯经典》(王者之书)。该手稿成篇于1270年左右,是冰岛古手抄本中最重要的一部,其中汇集了《埃达》诗篇的主体部分。1643年这部手稿被斯汶森主教呈献给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1588—1648)。1971年丹麦政府将《雷吉乌斯经典》连同《弗莱特岛记》手稿一起奉还冰岛。《弗莱特岛记》系在冰岛西海岸弗莱特岛上发现的、成篇于13世纪末期的手稿,内容包括挪威国王萨迦、编年史、年代记等 。

《新埃达》是冰岛历史学家、诗人斯诺里·斯图鲁松在1220年前后写成的散文体著作,因而也称为《斯诺里埃达》或者《散文体埃达》。它其实是一部史学,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旧埃达》的诠注,将《旧埃达》中提到的北欧神祇和英雄的根底和传说做出较详细的介绍,以便当时吟唱诗人在作诗时查阅,因而其中的故事和传说记载得比《旧埃达》更为完整丰满,表达得也更生动。第二部分《诗人的艺术语言》,论述了《旧埃达》诗篇的吟唱艺术和语言运用。第三部分《韵律的列举》,列举了吟唱诗体中102种不同的韵律运用。《新埃达》是被保存在《乌普萨拉书》的手稿本里的,在被发现后才另成篇的。

斯诺里·斯图鲁松(1179—1241)是中世纪冰岛乃至整个北欧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名门,1215年被选为法律宣讲人并且宣布冰岛脱离挪威而独立,晚年遭政敌谋杀。他的另一巨著是《挪威列王传》,即《挪威国王萨迦》(《海姆斯克林格拉》),其内容为从史前时期记载到1177年挪威各个国王的传记和王室历史,选材严谨,史料真实,是中世纪北欧最重要的历史文学作品之一。

第三节　北欧神话

冰岛诗体《埃达》里的神话诗记载和叙述了长期流传在北欧地区的日耳曼部落所信奉的北欧多神教神话。这一宗教信奉多神、崇拜太阳和生殖，是古代拜日教的蜕变异种。它没有神学，但是有自成体系的神话故事，它的教义和哲理都通过神话故事来表达。北欧神话描述了开天辟地、神的产生、神族谱系、诸神故事和人类起源等,内容是：

远古洪荒，一片混沌。南北两极由火焰巨人苏尔特和冰霜巨人尼弗尔所分别盘踞，而中间是一条宽大、深无底的金侬加裂缝。冷热相遇，烈焰和冰块相撞，便壅堵形成了巨人伊米尔。伊米尔喝冰霜里出现的母牛的奶赖以活命，并生下后裔。母牛把埋在冰块里的伊米尔的儿孙救活。其孙子布尔娶女巨人贝史特拉为妻，生下三个儿子：奥丁、维利和威，他们是最初的神祇。这三兄弟联手杀死了巨人伊米尔，用他的躯体形成了世界：他的血成了江湖海洋,他的肉成了土地,骨头成了山,牙齿成了岩石,脑髓变成云朵,头盖骨成了天空。他们还在金侬加裂缝中心建造一座城寨，名叫阿斯加尔德,亦称“天界乐园”,并建造宫殿用以抵御冰霜巨人的侵袭和安顿居住。随后众神祇又创造了白昼黑夜和日月星辰。主神奥丁还用榆树树干造出了一女一男两个人，并且还在宇宙之中建造了一座给人类居住的城寨,名叫米德加尔德,即“中界乐园”。宇宙中共有九个世界，最低下的是死神海尔的冥府地狱尼弗尔海姆。宇宙中央有一棵沟通上中下三界的大秦树，名叫伊格德拉西尔，即生命之树。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命运女神不断地向这根擎天之柱洒智慧泉水使得它枝繁叶茂。众神祇在阿斯加尔德乐园中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都相信黄金时代会像长生不老的金苹果一样永葆青春。即便光明神遭黑暗神暗害，命运已向他们发出旧秩序即将

崩溃的警示，他们依然放纵享乐、荒淫乱伦，以致出现最后末日来到之前的一段腐败堕落的混乱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血缘亲情化为乌有，兄弟阋墙，骨肉残杀，神祇之间的部落战争打得两败俱伤。众神祇还毫无警觉厄运却早已成为定数，末日的毁灭要将旧世界终结，大毁灭名为“ 拉格纳洛克 ”。火焰巨人偷袭过来将众神祇的营寨宫殿全都烧毁，猛兽怪物也一齐出动，阿斯加尔德乐园遭到毁灭沉人大海。旧世界彻底消失，众神祇皆罹难成殇。后来另一个新的世界又从大海里升起。光明神重又返回世间，神族虽已灭亡，但主神奥丁的子孙也就是人类却在这个新世界里生活下去。

北欧神话中神祇众多，仅主要神祇就有十二个之多。众神之神的主神奥丁居住在瓦尔哈拉宫，即英灵殿。他银须长髯，圆睁着独眼，端坐在黄金宝座上统治着世界。他金盔金甲，手持长矛和金环,肩上栖着‘ 思想 ’和‘ 记忆 ’两只神鸦,脚前蹲着‘ 贪婪 ’和‘ 欲念 ”两只恶狼，神鸦为他窥察动静，恶狼发现异动就猛扑过去。奥丁身边环绕着他的武装侍女，名叫瓦尔基里氏仙女，她们奔赴各个战场并把阵亡武士的英灵领来见奥丁。仙女们在天上疾驰时盔甲发出的光芒便形成了北极光。瓦尔基里氏仙女手下率领许多女兵，即天鹅仙女，日耳曼口头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少女被蛊惑变成天鹅即源出于此。主神奥丁夜夜与英灵们飨宴，而阵亡后能上天和奥丁饮宴是武士的最高荣誉。

雷神托尔是奥丁与大地女神费奥琴所生的长子，他亦是守土有责的战神，天天乘坐两头公羊拉的战车，手持魔锤在乐园四周到处巡逻。丰饶之神弗雷又是情爱和生殖之神，长得风流俊美，被女神们爱恋追逐。他的孪生妹妹弗蕾娅更为美貌，却淫荡无度，既与主神奥丁偷情，又招蜂引蝶。此外，还有到处闯祸滋事的火神洛基、监督契约订立的独臂战神提尔、众神祇的保护神海姆达尔、光明神巴德尔和黑暗神霍德尔、保管永葆青春的金苹果的长寿女神伊敦恩和她的丈夫诗神布拉吉等等。

北欧神话中对神族谱系记载得十分清晰：在最北部的冰天雪地的冻土荒原里的是巨人族，他们既同神族有亲戚关系，又是神族最大的威胁，神族为了求得生存空间必须殊死拼搏将他们赶得越远越好。神族本身分成四个神系：阿西尔和瓦尼尔都是真正的神族，但却是两个不同的部落。阿西尔部落是神族的正统，而瓦尼尔部落迁徙过来较晚，但新兴部落的实力不断增强并且与巨人族有姻亲关系。于是这两个部落不免争斗起来，部落战争频仍，双方虽曾讲和休战，并互派人质，但最后瓦尼尔部落终于攻破了阿西尔部落的营寨。小精灵和侏儒是日耳曼口头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特殊的矮神，是本族祖先的灵魂凝聚而成前来造福于子孙的，他们平日深居地下采矿冶炼。在末日劫祸来临时，他们义不容辞地同神祇一起赴难。

不难看出,北欧神话实际上是北欧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观念习俗乃至日常生活的写照。神族中的阿西尔部落可能指的是哥特人，而瓦尼尔部落则是后迁徙来的其他撒克逊人，精灵和侏儒则可能是战俘、奴隶等一类矿工和工匠，因而矮人一等必须终身服苦役。至于世界末日“拉格纳洛克”则可能指的是火山爆发。北欧神话中神祇的名字一直保留至今，如星期二为战神提尔之日、星期三为主神奥丁之日、星期四为雷神托尔之日、星期五为丰饶神弗雷之日。

北欧神话如同冰岛《埃达》一样已成为国际上的专门学问,欧美的各国学者们对北欧神话进行了大量整理和研究工作，而且也做了大量考据工作，有些考据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例如阿西尔部落是否代表原北欧居民（即哥特人），而瓦尼尔部落则代表后来迁徙来的非北欧居民(即爱尔兰人、苏格兰人或其他撒克逊人),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习俗观念的异同、阿西尔部落同南方(即罗马帝国)的关系等等。他们还考证了主神奥丁是不是罗马人祖先埃涅阿斯，或者埃涅阿斯和奥丁干脆几乎是同一个人，因为据说奥丁亦曾

到过特洛伊，并且在特洛伊毁灭之后在南方漂泊多时。又如考证了奥丁的武装女侍从瓦尔基里氏仙女是否就是希腊的亚马孙女战士等等。

第四节《萨迦》

“萨迦”原意是“说”和“讲”,引申成为“故事”和“传说”。13 世纪前后，挪威人和冰岛人用散文体把过去叙述祖先英雄业绩的口头文学记载下来,加工整理就成了《萨迦》。瑞典也有《萨迦》,不过数量很少，丹麦则保存很少，大概因为基督教传入丹麦较早，从 9 世纪起就对异教色彩的文学铲除得力的缘故。北欧流传至今的《萨迦》约有一百五十多种，记载了北欧氏族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功勋业绩和传记家谱，从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北欧萨迦具有独特的风格，它所描述的事件一般发生在 10 世纪或 11 世纪,但是直到 13 世纪才记载成文，因而叙述之优劣、首尾之连贯、情节之铺垫全仗讲故事者整理加工的才能。萨迦不同于埃达，它要求真实性，可以肯定地说萨迦记载的大体上都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人的，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不过为了惊险或是吸引人起见添枝加叶和拔高夸大英雄人物则是萨迦中所常用的表现手法。萨迦一般都以叙事体散文写成，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萨迦的写作手法大致是在叙事之中穿插人物对白，而情节描述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是以对白展开的。它的语言一般都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因而叙事简洁明快、遒劲有力,但是也带有一定的程式化倾向，如对三或三的倍数的神秘意义，情节的发展往往要经过三次反复。这是日耳曼口头文学中所常见的叙事手法。

《萨迦》共分三大类:“王室萨迦”、“家族萨迦”和“虚构萨迦”。

1.“王室萨迦”又名“历史萨迦”。最早的是挪威写于 1150 年

前的《圣·奥拉夫萨迦》。1185—1188 年,冰岛学者卡尔·荣松奉命编写了《斯凡勒国王萨迦》[1]。“王室萨迦”的代表作是冰岛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松于 13 世纪编写的《挪威列王传》。该书亦称《挪威国王萨迦》(《海姆斯克林格拉》),记叙了从史前时期到 1177 年挪威历代国王的业绩、王室生活和社会情况，该书选材严谨、史料较为真实，是一部杰出的纪传体史书和文学作品，也是中世纪北欧的重要著作之一。《挪威列王传》的另一贡献是追溯了在 900 年金发王哈拉尔德在位之前的挪威和瑞典的王室谱系和渊源。斯诺里参照了《贝奥武甫》和阿里·托尔吉尔松的《冰岛人书》等史料,考证出从史前到公元 900 年之间的英林嘉家族的历代君主，并且写成《英林嘉传记》(亦称《英林嘉萨迦》)作为《挪威国王传记》的序篇，从而澄清了这一段晦暗不明的历史。斯诺里还考证出英林嘉家族是丰饶神弗雷在瑞典乌普萨拉留情所生的后裔。不难想像，这一考证结果在当时为挪威和瑞典王室增添了何等光辉。虽然瑞典只祭祀弗雷而不信奉奥丁，然而由此断定挪威和瑞典王室是弗雷的后代显然过于牵强。北欧学者已证实，《英林嘉传记》中列举的有名有姓的二十三个国王，除了最后两个确有其人外，其他的都只是日耳曼口头文学作品中相传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

《王鉴》即《国王的镜子》也是一部几乎与《挪威国王传记》齐名的挪威文学著作,成篇于 1250 年，作者已无法查清。这部作品是在受到欧洲大陆的影响下写成的一部以资国王或者即将要当国王的统治者借鉴的教材，内容涉及君主的行为举止、言语谈吐和驾驭臣属随从、商人农民的洞察力和计谋等，书中举出不少具体实例来阐明宫廷礼仪和王室规矩，因而趣味盎然，并且把历代君主的私事逸闻展露无遗。该书文笔优美流畅，不失为一部稗官野史性质的文学作品。

①斯凡勒(1184—1202 年在位),挪威国王。

2.“家族萨迦”亦称“人物萨迦”,一般都是以历史上确有其人的人物为主人公，而且都是描述在冰岛的人物和家族的遭遇和祸福，发生事件的地点主要在冰岛，时间都是在迁徙到冰岛来定居之后,因此,这类萨迦有一个共同名称,即《冰岛人萨迦》。《冰岛人萨迦》共有三十多篇，分长篇和短篇。长篇中最著名的有《埃吉尔萨迦》、《鲑鱼河谷萨迦》、《尼亚尔萨迦》、《吉斯列·索尔松萨迦》和《强者格雷蒂尔萨迦》等,短篇则以《蛇舌贡恩劳格萨迦》最为著称。这类萨迦一般都是先讲英雄人物的家谱，然后是遭遇的厄运，最后往往是视死如归、保全体面或赢得荣誉。这类萨迦写的是冰岛和北欧人的日常生活，而在事件中仇杀、诉讼和家族纠纷往往占了主要地位,而且时间上往往拖宕很久,甚至几代人,因而情节芜乱繁杂，头绪纷繁。其英雄人物往往都是家族首领，勇敢机智而意志坚强。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是由他们的语言、行动和表情来体现的。作者无论对事件和人物都只是纯客观地描述，而不能宣泄自己的观点立场或是喜厌好恶。

《埃吉尔萨迦》据信是斯诺里·斯图鲁松于 1200 年所著,描述的是冰岛最著名的行吟诗人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910—990)的生平传说，其内容讲述埃吉尔一家三代在 9 世纪和 10 世纪反抗挪威王权和两代君主歼灭异己的“暴政”。这一故事题材当时非常流行。这部作品紧握住这一主题，把当时海盗社会的政局变迁昭示于世，因而是“萨迦”里政治性最显著的。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历史真实性和人物塑造生动，主人公埃吉尔是活生生的北欧海盗英雄形象。《冰岛人萨迦》发展到此写作技巧已趋于成熟，因而《埃吉尔萨迦》是“萨迦”从兴起向鼎盛的转折中最重要的杰作。

《鲑鱼河谷萨迦》(即《拉克斯达尔萨迦》)成篇于 1225 年,叙述柯蒂尔七代人的兴衰荣枯、恩怨情仇直至没落凋零，前后历时一百五十年。它的艺术成就在于结构紧凑、高潮起伏、条理分明、情节曲折。这部作品改变了北欧英雄传说的程序化面貌，可以看出欧

洲大陆的浪漫传奇和正在兴起的骑士文学的影响与痕迹。这部作品的下半部分是以女主人公古德隆恩为中心的，性格写得生动鲜明，刻画出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北欧海盗女性的形象。这部作品是“人物萨迦”达到鼎盛的标志。

《尼亚尔萨迦》成篇于 1280 年,著者佚名,它是《冰岛人萨迦》里的扛鼎之作，篇幅也最长。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两个好朋友的恩怨故事：海盗贡纳尔和精通法律的尼亚尔原本是生死之交，受家人离间挑拨乃至失和反目。贡纳尔惨遭仇家杀戮，尼亚尔坐视不救。两家仇杀不断，械斗连绵。尼亚尔为了消除宿怨，毅然举家自尽被烧死在家里。最后两家在基督的感召下，放弃仇杀，朝圣悔悟后尽释前嫌赢得了和平。这桩纵火案是轰动全冰岛的真人真事，而“火烧尼亚尔”案从约 950 年到 1016 年前后历时六十余年，是冰岛最大规模的家族之间的仇杀械斗。这部作品主题十分鲜明，即要求法治和和平，不容许海盗时代的无法无天状态维持下去。这部作品与以前的“人物萨迦”不同之处在于作品的思想性强烈，自始至终贯穿着基督教精神和教义，宣扬宽容博爱，倡导以自我牺牲求得和平。这部作品精彩地描述了冰岛当时的法律诉讼程序和审判过程。

《贡恩劳格萨迦》是 13 世纪末的短篇爱情萨迦的著名作品，此外《诗人库尔玛克萨迦》、《诗人哈尔弗雷德萨迦》等作品也很有名。这类作品大抵写的是诗人为了夺爱不惜与情敌决斗，终致剑下殉情的故事。它们情节紧凑，语言生动，明显地受到欧洲大陆骑士文学的影响，跳出了记实叙史的束缚，虚构的部分大为增加，已逐渐向短篇小说转化了。

3.“虚构萨迦”亦称为“昔日萨迦”和“古代日耳曼英雄萨迦”，内容包括神话、志怪故事等不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浪漫神奇故事，主要作品有《伏尔松萨迦》(埃达中有同名的长篇叙事诗)、《奇数箭萨迦》、《弗里蒂萨迦》等。

《萨迦》所形成的独特写作风格对北欧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瑞典诗人泰格奈尔将这类神话传说改写成长诗《弗里蒂奥夫传》。不少近代和当代的北欧作家都从中吸取营养,并且保持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第五节　宗教文学

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的宗教文学也随之在北欧地区兴起，应该说可以归入宗教文学范畴的作品不比世俗文学数量少，而且种类繁多。《圣经》作为神授圣书的惟一经典由基督教传入北欧地区后，随着宗教改革先后出现了各国的本国民族书面语言的译本。在北欧地区一般都是先有《新约全书》的译本。除了《圣经》之外，早期的北欧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们也都把致力于发展本地区的神学学院和经院哲学视为己任，并且由托钵僧或者圣方济各会修道士通过布道而传播出去。

1. 中世纪北欧宗教文学主要有三个方面:《圣经》的翻译、圣徒传、圣诗以及数量庞杂的赞美歌等。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基督教在北欧地区传播时必须克服语言障碍，尤其对新皈依的信徒和妇女。经文来源混杂,以致有希伯来语、希腊语、罗马语,甚至阿拉伯语等等。因而基督教的教士们起先和欧洲大陆其余地区一样采用拉丁文的经卷译本，并逐渐转向翻译成为本民族的文字译本。陆续在各地兴建的修道院不仅致力于神秘主义的经院哲学，也从事大量的经文翻译工作。以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为中心的圣徒传记,如:《圣母玛利亚传奇》、《吾主的诞生》、《耶稣的童年》、《保罗显圣》、《圣·约翰和新郎的传奇》、《圣母玛利亚升天》等等。僧侣教士们在民间布道时常常把这些教徒传记作为圣迹显灵的典型来宣讲，并且穿插情节生动的故事，甚至还添加一些道德说教。这类宣讲必然催生基督教的经文、圣经故事和圣徒传记等的语言本地化。

在 15 世纪末期,丹麦已经有人着手编纂拉丁文丹麦文词典。

2. 为了适应由马丁·路德主持的宗教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1534 年路德全译本问世,《圣经》德语全译本对德国语言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在马丁·路德新教推行的初期,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把《圣经》翻译成本国的文字。在北欧地区本国语言《圣经》的出现是相当滞后的,几乎与宗教改革同时进行,而且都是先从《新约全书》着手的。1529 年丹麦翻译了《圣经·新约全书》,到了 16 世纪中叶,丹麦和瑞典相继出版了本国语言的《圣经》全译本。 1545 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为了争取独立需要而下令将《圣经》全集翻译成瑞典语。1550 年丹麦出版了克里斯蒂安三世钦定的丹麦语《圣经》。《圣经》翻译成本国语言大大地促进丹麦、瑞典书面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推动了丹麦和瑞典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但是在挪威却并非如此,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挪威早已沦为丹麦的一个省,只准使用丹麦语为通行语言,连《圣经》也只准使用丹麦语。挪威书面语言原本杂乱,这就更增添了不统一,给日后挪威的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发展造成新的障碍。

3. 在北欧宗教文学作品中,瑞典女圣徒比尔吉塔(1303—1373)是中世纪北欧文学史上几乎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比尔吉塔自称她受上帝托身附体代圣立言,在梦幻中得到圣母、圣子的启示,因而她的一切思想全是上帝的精神,她把所有的精神灵迹用瑞典语口述出来,再由牧师译成拉丁文后陆续出版,命名为《来自天上的启示》或《比尔吉塔启示录》。这部圣书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纯粹的祈祷文和圣诗;对教皇和瑞典王室就欧洲政局和教会事务做出预言;论述上帝在精神和心灵方面的启示,如劝人改恶从善,否则将罚入地狱万劫不复。概括地说,上帝给她的启示是:其一,她已被上帝选为新娘,并且授命由她向这个动乱和充满邪恶的世界宣布上帝的旨意;其二,命她说服教皇应从"巴比伦幽禁"脱身出来返回圣城重振神圣的事业,亦即摆脱法国国王对教廷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控制，从法国的羁留地阿维尼翁迁回梵蒂冈来重振教会势力；其三，授命她创立新的教会支派和实施由她起草的新教规。1370 年教皇乌尔班五世批准了她的新教规并在瑞典兴建比尔吉塔修道院。不久各国都出现了此类修道院，它们从事创作宗教性精神读物和保存手抄本书籍,而且进行了大量翻译和誊抄工作,成为当时的精神培养中心。

比尔吉塔在去世二十年后被教皇谥为女圣徒，从而成为第一个享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人。圣比尔吉塔实际上是一个僭越谵妄的宗教狂热者，她的大量论述和预言都是梦呓或是幻觉的虚构形象,她的宗教概念产生于特殊的非理性的心理状态,是神秘主义的哲理和高度艺术创造性的结果，从而对日后的神秘主义哲学和文学作品产生了不少的影响。瑞典诗人阿姆奎斯特、以斯威登堡主义闻名世界的哲学文学家斯威登堡和作家斯特林堡都同她不同程度上有渊源关系。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晚年亦受到她的影响。比尔吉塔是个有高度想像力的诗人。她所虚构的形象丰满逼真，音容笑貌宛若在眼前，她善于将空幻的精神世界变化成现实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因而她的预言往往令人信服。她在《启示录》这部作品中采用了大量的中世纪日耳曼口头文学惯用的隐喻和象征手法,因而语言生动活泼,如愁海里变化多姿的水—— 这是世界的恩惠,布满森林的高山之巅—— 这是灵魂和上帝相通的地方；建有教堂的平原—— 这是基督广袤的国土。

比尔吉塔的另一贡献在于使瑞典语言进一步脱离古代北方语言而趋于独立，自成系统。比尔吉塔身后留下的各类“上帝的启示”共计七百余条，1492 年在德国卢卑克以 8 卷本全集出版,并由瓦德斯坦纳修道院译成瑞典语。由于翻译中实行了统一的词尾变化和拼写方法,形成了规范而正规的瑞典书面语,被称为“比尔吉塔瑞典语”,这对消除书面语的分散杂乱现象起了很大作用,为全国统一的瑞典书面语铺平了道路。

第六节　韵文编年史

大约从 13 世纪起,北欧各国引领思想潮流的教士阶层致力于两件重要的文化大事，借以主宰精神世俗，铲除肃清异教文化残余,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巩固神权和王权的统治:修编年史和制定法律，前者以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为主，后者则由世俗贵族主持,但因为政教合一的缘故,两者往往相互混淆连通。

1. 编纂编年史的主要目的在于王室直笔修史记传留名,炫耀君主的煌煌武功,扬威于天下,因而 1216 年出现了萨克索的《丹麦人的业绩》和据信写于 1332 年的瑞典《埃里克编年史》,以及其他的同类型编年史。这类编年史都是用韵文长短句写成，因而亦称韵文体编年史，其特点在于按时间先后次序罗列史实而并不拘泥于其中的渊源和因果关系,与一般的历史不同,往往以某个英雄人物和王室家族为中心,并不需要顾及事件的连贯性。因而,编年史体裁中可以包罗万象,把英雄史诗、人物传记、谣曲诗歌全都容纳进去，而且不必在表现手法上求得一致；叙述中也可穿插人物对话，甚至只有当事人在场的密室商议也可以由著史者笔录复述。编年史往往卷帙浩繁,篇幅冗长,由于是历史著作,只能敷陈义理和编排贯串,但不能随意添枝加叶或杜撰虚构,因而编年史的好坏优劣全在于著者的文学水平,其艺术质量往往有巨大差异,其中有些如《丹麦人的业绩》和《埃里克编年史》等堪称文学巨著,而多半往往枯燥无味。

2. 从 1202 年至 1240 年瓦德玛尔二世统治期间，丹麦对外扩张已经到了鼎盛期,秉政的阿希隆德大主教便命令历史学家、教士萨克索着手修编年史。萨克索·格拉玛蒂乌斯(1150—1220)于 1180—1216 年编写出了丹麦第一部文学巨著《丹麦人的业绩》。萨克索用零散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作为素材进行创作，把这些故事

和传说串成一部从史前时期一直至 1185 年为止的历史,即从丹麦形成到全国统一的整个过程。萨克索奉命修史后，在丹麦树立鲁纳古文字石碑的风俗由此停止。

萨克索的《丹麦人的业绩》用拉丁文写成,全书共十六卷,其中前九卷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亦即从史前时期的丹麦国王到公元 950 年戈姆三世。这是因为丹麦虽然强盛并且是北欧霸主，但是王室的家族谱系却晦暗不明。《英林嘉传说》和《斯诺里萨迦》把瑞典和挪威王室的家族谱系记述清楚：瑞典王室最早的祖先原来是神族瓦尼尔部落首领海神尼奥德及其子丰饶神弗雷；而挪威王室则可溯源到巨人族和大地女神费奥琴，因而雄心勃勃的丹麦君主必须探明自己的高贵祖先才能使得他们开创的光辉历史不受玷污,而《丹麦人的业绩》确实不负使命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借以维系帝祚国本传统的迫切任务。萨克索批判了长期流传的拜占庭和诺曼历史学者的谬说,即丹麦王室的家族并非土生土长,而是民族大迁徙中跟随东哥特国王狄德里克逃难而来的异乡人，丹氏家族的祖先来源是希腊英雄史诗中在特洛伊城下惨遭大败而四处溃逃的丹那阿人。萨克索正本清源,证明丹氏家族与希腊毫无瓜葛,亦从未当过神圣罗马帝国的卫队,并且记述清晰 丹麦第一个国王丹来自日耳曼英雄史诗上确有记载的血统高贵的肖尔德孔恩家族（即盾牌人家族）[①],而公元 8 世纪的英国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中的英雄贝奥武甫亦是这个家族中人。非但如此，萨克索还考证出丹麦第一位国王丹的祖父是战功赫赫的盾牌神肖尔德，而肖尔德又是北欧神话中阿西尔神族部落的主神。肖尔德孔恩家族到了丹这一辈分上分成了两支 :一支是丹 ,另一支是盎格尔 ,丹留在日德兰半岛 ,丹麦即由他而得名(意为丹的土地) 盎格尔则留在英格兰。丹

① 《埃达》第二十五首诗《格罗蒂之歌》按语称 主神奥丁有个儿子叫肖尔德,自他之后便有了肖尔德孔恩王室家族 …这个国家如今叫丹麦,当时则叫做哥特兰。

的后裔分成了三支 海尔吉家族(神圣者家族)、哈夫丹家族(半个丹人家族)和鲁尔夫 ·克拉格家族。由此奠定了丹麦王室乃是正宗的神的后裔,有显赫的祖先和高贵的血统,从而使得丹麦王室扬眉吐气。但是他写了六十多个丹麦国王的传记，其中鲁尔夫·克拉格确实是 5 世纪的历史人物，其余的则大多是根据口头传说写成的。但萨克索声称：民间传说既是历史的见证，故而绝非杜撰。从公元 985 年青齿王哈拉尔德在日德兰中部建立耶林石碑纪念亡父戈姆三世起的二十多个丹麦国王的史料较为真实，业绩也有相当的可靠性。

萨克索的这部巨著的文学价值还在于以拉丁文的叙事诗体将丹麦的异教口头文学作品保存下来，从神话、英雄传奇到民间谣曲、猜谜比喻等几乎无所不包，因而五十多首有名的英雄传奇叙事诗保存了下来,如冰岛《比亚尔基萨迦》的前身,古诺斯语的《比亚尔基之歌》等。叙事诗《阿姆莱特之歌》即其中一首,这首流传很久的有名长诗经由诺曼人传入英格兰，莎士比亚将它改编成了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情节虽有改动,但基本上保持了原貌,不少对白亦采用了原来的诗句。在《丹麦人的业绩》的后七卷里还有三首相当著名的英雄史诗叙事诗,如《波特盖玛之歌》、《哈格白特和西格纳》和《英雄兹克瓦德之歌》。

萨克索的《丹麦人的业绩》和斯诺里的《挪威诸王传记》颇有相同之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押韵的 24 音步拉丁文叙事诗体写成，后者则是无韵的冰岛语散文体；前者对白也都用韵文，并且不像冰岛《萨迦》那样客观叙事,而是夹叙夹议,搀杂了相当多的作者的评论和说教。

3 《埃里克编年史》是瑞典中世纪最著名的韵文编年史,用瑞典四音步对偶诗句写成。这部著作从 1249 年瑞典十字军讨伐芬兰一直写到 1319 年埃里克公爵的三岁儿子马格努斯被选为国王的整个福尔孔家族王朝的历史。这部编年史着重记述了贵族秉政

以及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宫廷政变，详细地描绘了骑士生活，而描写的主要人物却是秉政的贵族埃里克公爵。这部编年史亦是中世纪瑞典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它严格按照当时流行的德国韵文编年史体，一丝不苟地照搬了日耳曼传统的叙事清晰、措辞严谨、头绪连贯的特征，但在史实方面却不太可靠，甚至以佚名作者的好恶而取舍扭曲，据说这是因为作者是埃里克公爵的亲信部属的缘故。编年史中有不少为埃里克公爵歌功颂德和描写贵族骑士的“优雅”生活和风度的诗歌是全书中精彩部分，足以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破晓歌》一类骑士文学作品相媲美。

除了这两部堪称中世纪北欧文学巨著的作品之外，丹麦的斯汶·埃格逊撰写的《丹麦历史》、瑞典的《卡尔编年史》等都有一定文学价值，但均枯燥而无诗意。据信写成于 12 世纪初的《挪威国王传》(即《阿格里普》)虽然有不少佳作诗篇,却只是残稿。

第七节　翻译文学和民歌谣曲

1. 中世纪晚期，北欧地区大致可划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东部为丹麦和瑞典，西部为挪威、冰岛和法吕尔群岛。瑞、丹两国文学相对发达，丹麦更是得风气之先，充当这个地区执牛耳的角色，因为欧洲大陆的文学作品大多是通过丹麦传入北欧的。挪威相对滞后,从中世纪后期到 18 世纪沉寂了将近两百年，除了政治上丧失独立、战祸连连和黑死病横行之外，语言混乱亦是一大障碍。其实，缺乏统一的、规范化的民族书面语言是长期困扰北欧各国文化发展的绊脚石。即令当时文化最发达的丹麦，知识界口头讲德语和法语，书面文字采用拉丁语，而一般民众讲丹麦语，直到三十年战争结束(1618—1648),这种局面才逐渐改变。《圣经》的翻译催生了翻译文学的兴起，不仅宗教作品也包括世俗文学作品，起先都是翻译成拉丁文书面语言，后来逐渐转向使用民族文字，印刷术的

传入也加快了这一过程。

2. 翻译文学的兴起将法国普罗旺斯的情诗和贵族骑士抒情诗传入北欧。普罗旺斯诗人运用民间歌体描写骑士和贵妇的幽会爱情，这类情歌抒发了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而结局大抵是骑士赢得贵妇欢心，幽会缱绻之后，在破晓时分难舍难离，所以亦称为破晓歌。另一类是骑士抒情诗，风格雄壮，歌颂英雄，亦被称为武功歌,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 12 世纪法国长诗《罗兰之歌》和西班牙英雄史诗《熙德之歌》。除此之外,英国、法国、德国的骑士传奇名篇也陆续译介到北欧,如《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伊传奇》、《埃涅阿斯传奇》等写古希腊罗马的作品,还有《亚瑟王之死》以及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的不列颠系列等。北欧诸国王室宫廷、贵族骑士都把骑士作品作为消遣文学，而且北欧各国骑士阶层并不拥有产生这类作品的条件，因此都崇尚翻译作品。从 14 世纪起,许多骑士作品被译成或改写成北欧语言的传奇，出现了翻译外国作品的旺盛局面,其中最有名的是《埃厄费米亚之歌》。14 世纪初,出生于德国的挪威王后埃厄费米亚下令翻译法德的骑士抒情诗，共三卷,用以取悦她的女婿,瑞典埃里克公爵,其中的长篇如《狮骑士伊凡》、《狄特里克国王和侏儒王洛林》等都很有名。骑士文学的译介有助于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北欧地区的传播。

在北欧宫廷和贵族圈子里流行骑士抒情诗并且以骑士文学作品为时尚之际，北欧各国的民间却仍以古代就流传下来的日耳曼人的民歌和谣曲为主。在中世纪，北欧各国几乎所有的成文东西都是依靠吟唱来口口相传的，不仅是传教，甚至法典和法律都是由法律宣讲人凭着记忆每年在公众集会上宣布三分之一。中世纪时期，北欧各国民间的娱乐活动仍是围着篝火或挂有花环的木柱跳集体舞，既有圆圈舞，也有链舞。舞蹈时，有领唱者吟唱篇幅很长的叙事歌曲，众人跟随歌曲而变化队形或舞姿，在每段歌词末尾众人齐唱副歌，因而这种载歌载舞的民间舞蹈往往带有戏剧性，从头

至尾叙述某个事件的过程或英雄生平。这种舞蹈叙事曲便是北欧的民歌谣曲。

北欧谣曲简单易记,用词通俗粗俚,叙事直截了当,押韵音律都不复杂，但是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因而也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民间一直流传下去。

中世纪北欧民歌谣曲数量很大,而且多半得以流传和保存,在16世纪以后陆续结集出版，瑞典经过收集、整理加工的民歌谣曲有三百余首，丹麦亦有数百首。歌谣的种类繁多，就内容而言，其中相当部分是写爱情的，尤其是情侣的悲剧性命运，如丹麦最有名的谣曲《埃勃·斯卡默尔森杀妻记》,说的是埃勃的弟弟谎称哥哥已客死异乡，从而骗娶了哥哥的未婚妻。埃勃赶回家来杀死了弟弟和不贞的阿泽卢丝。此外还有《骄傲的玛格丽特》和《帕勒博格复仇记》等。谣曲中也有气势雄壮的武士歌曲，如：瑞典的《古斯塔夫·瓦萨和达拉那好汉们》、《恩格尔·布雷克特之歌》和丹麦的《丹麦好汉霍尔格和布尔曼之歌》以及挪威的《维德里克·维兰德逊和巨人伯恩》等。

民歌谣曲在风格上与冰岛的埃达诗有相似之处，但是叙事往往只有人物的对白和动作；对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发生的环境缺少描述，而且对景色和人物的描写，甚至表述和对白都流于程式化，如：描写景物必定是玫瑰园、夜鹰和柳树；美女必定是金色鬈发、星眸湛蓝、双颊绯红 骑士身披猩红大氅,骑着骏马 贵妇穿着貂皮，亭亭玉立等等。俗套连篇，陈词滥调充斥，以致造成北欧民歌谣曲的格调越来越低下，乃至在中世纪后期就逐渐走下坡路了。

第八节　芬兰神话与卡勒瓦拉体民歌

中世纪时期,芬兰仍然地广人稀,仅有渔猎为生的游牧民族居住。公元1150年芬兰归属瑞典，封闭的局面逐渐被打开。芬兰人

口主要由两个民族组成：芬族和塔瓦斯特族，据说芬兰人与匈奴西迁有一定渊源关系，因而在生活起居、风俗习惯、宗教语言等方面都有接近或相似之处。芬兰语和卡累利亚语都是北欧地区少有的非印欧语系的语言，同匈牙利语归属同一语种，即乌拉尔语系的乌戈尔语种。芬兰人信奉由巫医跳神作法捉鬼的极地萨满教。因而芬兰的神话和民歌谣曲都自成体系，与日耳曼语系迥然不同，不过也逐渐融入了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对芬兰所施加的文化影响。

芬兰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中以卡勒瓦拉体的民歌为主。按照有萨满教传统的芬兰神话，世界是由鸟蛋所生：洪荒时代，巨鹰在大海上空翱翔，寻找筑巢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海岛便飞下来生蛋。不料大风陡然将鹰蛋吹入海中撞得粉碎。于是，鹰蛋的上半个蛋壳化为天空，下半个蛋壳化为大地；蛋黄化为太阳，蛋白化为月亮，其余的飞沫化为星辰。这样的创世学说显然原始而牵强，但是和北亚、中亚和东欧地区流传的古代神话颇为相同，或许是处于同一个欧亚神话体系的不同分支。

芬兰神话里也有类似北欧神话中的维系生命的大橡树，而大橡树长到遮天蔽日的时候，有个小人从海浪里蹦出来将大橡树砍倒，这个小人就是半神半人的英雄史诗时代里的英雄。

芬兰从古代流传到中世纪的英雄人物主要有两个 万奈摩宁和伊尔玛利宁。万奈摩宁是万能的造物主,而到了世上则以萨满教的巫医面目出现。他无所不知,长生不死,是个开疆拓土的先知和创业者,他的身份地位、历险奇遇都和北欧多神教的主神奥丁相类似。而伊尔玛利宁则和北欧多神教的雷神几乎相同,也是铁匠。伊尔玛利宁还是一个工匠，能制造五弦琴和宝磨。他制造的宝磨能源源不断地磨出粮食、盐和财宝来,并且以宝磨作交换娶得了北国女巫波赫尤拉的年轻美貌的女儿为妻。万奈摩宁羡妒不已,立意夺取宝磨,于是便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反复较量的斗争,最后宝磨被砸得粉碎,沉入海底。

芬兰的神话故事和英雄史诗同冰岛《埃达》和《萨迦》一样,虽

然也充满了神秘色彩和超自然的魔幻因素，但是芬兰的神话故事和英雄史诗里血腥残杀要比《埃达》和《萨迦》中少得多,而且虽然争夺财宝并不至于以命相搏，这是因为芬兰神话和英雄史诗虽然反映了氏族制度的瓦解和氏族家族部落之间的斗争，但是从 12 世纪初到中期连续遭到瑞典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武力镇压，芬兰氏族社会内部斗争尚未充分展开就已经覆没消亡了。芬兰神话和英雄史诗同北欧其他国家的神话和英雄史诗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宝磨和夺宝这类情节在《埃达》和《萨迦》中都可以见到,《埃达》中第 35 首《格罗蒂之歌》讲的就是石磨磨出金银财宝的故事。而英雄万奈摩宁也同主神奥丁一样贪杯好色，生性风流。不过芬兰神话和英雄诗中也有许多独特之处，如万奈摩宁作为萨满教的巫医会作法，也会念许多萨满教的咒语；伊尔玛利宁不得不经受巨大的考验才从鱼肚里救出火种，这表明芬兰当时取火之困难。

芬兰的民间歌谣统称为卡勒瓦拉体民歌。最初在卡累利亚地区兴起，一般是在祭祀、庆典或熊肉宴上吟唱。芬兰民歌大抵只押尾韵，音节和格律但求明快并不求对偶工仗。一般有领唱或对口唱的叙事主歌和众相呼应的副歌。芬兰民歌数量浩繁，种类纷杂，但就内容上来看，气势磅礴讲述金戈铁马的征伐和仇杀并不算太多。芬兰民歌中脍炙人口的精彩部分是情歌。北欧民歌谣曲中一般都没有描述男女爱情的细节，而骑士文学作品中也只表白对贵妇的倾心和爱慕，既没有卿卿我我、两情相悦的缱绻缠绵，也没有哀怨悱恻的柏拉图式的精神理念，即便是描写偷情淫乱的“破晓歌”一类的谣曲也都以写景物为主，而对情歌场面往往语焉不详，粗线条式一笔带过。这是因为北欧海盗社会的习俗所致；写情诗或者对女子的美貌作细腻逼真的描写都被看成伤风败俗和对当事女子的亵渎轻慢，遭受侮辱的家族会由于荣誉而不惜仇杀械斗，因而北欧其余国家中很少见到真正意义上的情诗或是诉说情爱的俚曲。芬兰由于发展较晚，没有氏族仇杀的传统，再则宗教习俗相

异,因而束缚较少,敢于直言无忌地宣泄人生,儿女情长不被蔑视为品格低下。芬兰的情歌亦受到了欧洲大陆的赞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广为传播。曾被德国大诗人歌德翻译成德文的情歌《当我的情人来了》是这样来诉说怀春少女对异性的情意：

当我的情人来了，
我要冲出院子去迎接。
尽管前面有毒蛇挡路，
我仍要紧抱他在怀里。
尽管豺狼在张牙舞爪，
我仍要和他甜蜜亲吻。
尽管面对着闪光的利剑，
我仍要和他上床共眠。

另一首情歌《求婚》则更为露骨俚俗：

一手牵着骏马缰绳，
一手揪住少女胸襟。
一脚踏着雪橇滑板，
一脚踩住少女大腿。

芬兰民歌中巅峰作品是中世纪末期的《埃琳娜之死》，全诗共分五个部分三百行，情节丰满而富有戏剧性。

第二章 17世纪北欧文学

第一节 概述

从16世纪初期开始，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在欧洲兴起，席卷了整个西欧和北欧地区。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是欧洲阶级矛盾的反映和总爆发。当时天主教罗马教廷已经腐败堕落不堪，神学和烦琐的经院哲学已经堕落成为迷信和愚昧；教会由鼓吹赎罪演变为贩卖免罪符来牟取暴利；同时教会为了维护神权至上，而同王权，即王室和世俗贵族，由暗争变为明斗，已经逐渐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在德国、法国、英国教会和王室之间的火并都是一触即发的局面。教廷的宗教裁判所残酷无比，动辄指责反对神权至上学说者为异端邪说，并加以迫害或判处火刑。在教会统治的黑暗时期中，自然科学遭到扼杀，经济凋零，民不聊生，黑死病的肆虐更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于是当路德宣称教会没有教皇也可以存在，并且指责教皇是一切灾难的最终根源时，一场全民族的革命运动便首先在德国风起云涌，不仅市民阶级和中小贵族响应和支持，甚至连国王和秉政的诸侯也加以附和。宗教改革运动扫荡了教会的积秽，也使得基督教分裂成两个阵营，即以路德教派为代表的新教，或称清教徒；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旧教，或称天主教。基督教的分裂有助于王权的集中和巩固，也有利于人文主义的传播。德国的宗教改革运

动也催生出了由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和市民武装起义，要以暴力推翻阶级压迫。这场起义虽然在 1525 年被镇压下去,但留下的影响深远，甚至波及北欧地区。

宗教改革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传入德国,产生了德国人文主义者乌·胡腾(1488—1523)和约翰·罗希林(1454—1536)。从 15 世纪末起，产生了西班牙的塞万提斯 ĺ547—1616)和他的名著《堂吉诃德》(1602—1615)、法国的拉伯雷(1494—1553)和他的以人为本、反对禁欲主义的五部巨著《巨人传》(1532—1564),而莎士比亚(1564—1616)的十四行诗和他的三十多部戏剧,尤其是四大悲剧，更把人文主义推向顶峰，影响了世界数百年之久。

从但丁的《神曲》开始,人文主义一直致力于肯定人的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教会神权的绝对支配和人生来就有罪恶必须以苦行赎罪的说教；反对禁欲主义，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提倡理性和求知欲，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正因为如此，教会对人文主义极端仇视，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迫害。应该说人文主义是欧洲 14—16 世纪所发生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也为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也是欧洲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武器和新的文学的主要潮流。

人文主义从性质上来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场个性大解放，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对中世纪的神学和经院哲学以及封建主义发动的一场进攻和革命。人文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要求破除封建主义和神学的精神桎梏，解放生产力，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新型生产关系。人文主义者提出的个性解放和反对禁欲主义等人道和人权口号实质上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提倡利己主义、谋取自由竞争和夺取政权的呼声。人文主义思潮从兴起到流行的数百年里对新的思想意识的传播和欧洲的文学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在新教盛行的国家里。这是因为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往

往并行不悖，甚至不谋而合。人文主义者有不少就是改信或同情新教的教士。如果说中世纪后期的文学主要服务于神学和经院哲学，人文主义思潮则致力于文学的世俗化，创建了世俗文学，向蒙昧主义、禁欲主义、来世观点等天主教神学思想猛烈冲击，从侧面配合了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

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两股虽不一致但颇为默契的力量冲击下，罗马教廷大为恐慌，先是对近在咫尺的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进行迫害,由宗教裁判所审判了布鲁诺、伽利略、哥白尼等人，有的还被处以火刑；宣布了大批禁书名单，并且旋即发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16 世纪末人文主义和新文学已无法在意大利容身，只能逐步向其他国家转移。在德国，以德国皇帝为首的旧教诸侯们于 1609 年组成‘ 天主教联盟 ”,并且在 1618 年镇压了捷克人民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从而引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战争，亦被称为‘ 欧洲大战 ”;整个欧洲分成了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丹麦和瑞典都是参战国家，但结果大不相同。这场延续三十年之久的大战于 1648 年结束,战争的浩劫使德国元气大伤,陷入四分五裂的瘫痪状态，整个德国分裂成近三百个小诸侯国。法国的状况亦很惨烈。1572 年“ 巴多罗买之夜 ”大屠杀仅在巴黎就杀了二万五千个，在法国全国共杀了四万多个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胡格诺派新教徒。这场由法国王室和教会联手镇压新教的“ 胡格诺战争 ”一直延绵了近一个世纪，直到 17 世纪末才止息。法国的王权趋于巩固，它的重商主义促成了新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因而法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走在欧洲大陆的最前面。英国则是资本主义大步向前发展的时期，由清教徒带头发动的清教革命虽然带有新教和旧教之争的强烈宗教色彩，但实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基本群众是中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 1649 年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示众。克伦威尔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体制。 1660 年虽然

有王权复辟,但 1688 年的‘光荣革命’粉碎了国王恢复旧教统治的企图并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为英国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扫清了道路。

17世纪欧洲各国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法国文学在 17 世纪达到全欧的最高水平，产生了古典主义潮流和巴罗克文风。这是因为王权虽有所削弱却仍很强大，资产阶级对王权妥协让步，所以政局相对平稳，王室又以优厚的待遇供奉了一批知名文人，并且于1635年建立了法兰西学院。于是，古典主义在法国很快流行起来，成为法国的文学主流，而盛行一时的巴罗克文学则逐渐融入了古典主义之中。法国古典主义是 17 世纪欧洲文学的最高成就,被奉为法国文学的正宗，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以戏剧成就最为突出，产生了三个卓越的大师：悲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和拉辛（1639—1699)、喜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古典主义对欧洲各国的文学影响很大，在欧洲流行了二百多年，尤其对戏剧影响最大。

英国 17世纪文学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清教革命和政局动荡；其二是政治和宗教斗争需要。因而在 17 世纪英国政论性作品很多。弥尔顿(1608—1674)又是英国 17 世纪文学的代表人物，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弥尔顿的三部史诗《失乐园》(1667)、《复乐园》(1671)和《力士参孙》(1671)都是欧洲文学中影响巨大的精品,尤其是《失乐园》流传更为广泛。

英、法两国在 17 世纪取得的文学成果流传和扩散到了北欧，丹麦和瑞典步其后尘，进入了各自的古典主义文学时期，产生了霍尔堡这样的堪与莫里哀比肩的喜剧大师。

第二节　丹麦—— 只有赞美诗的年代

17世纪是丹麦由盛而衰，走向衰弱的一百年。从 1397 年卡

尔玛联盟组成起,丹麦一直雄踞北欧,成为波罗的海的霸主,瑞典和挪威都是它的属地。16 世纪中叶后瑞典获得独立并迅速强大起来。此后,丹麦同瑞典之间战争连绵不断,如 1563—1570 年的七年战争、1611—1613 年的卡尔玛之战。在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中，丹麦同瑞典又进行了多次反复较量，在这些战争中除了偶尔打成平手之外，丹麦总是屈居输家，连战连败，1657 年严冬，瑞典军队甚至在坚冰上进军奇袭，占领过整个丹麦。1658—1660 年的第二次丹瑞战争中，瑞典又几乎攻下哥本哈根。到了 1660 年后，除了挪威之外，丹麦已经没有多少海外领地了。丹麦从辉煌走向没落的转折点是三十年战争，然而丹麦的宗教改革运动进展顺利，几乎是不流血的。1524 年《圣经》丹麦文译本问世之后，宗教改革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丹麦旧教势力迅速瓦解。1536 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下令逮捕旧教的主教们，并由丹麦议会做出决议禁止旧教所有的宗教活动,查抄教会一切财产,改奉路德派新教为国教。

丹麦的宗教改革运动帮助王权推翻了神权至上的旧教统治，从而结束了神权与世俗君权的长期斗争的局面。国王成了最大的获利者，没收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使得王室的财产增加了三倍。1660 年又签署了君权专制敕令，规定国王只要在遵守法律和上帝旨意的前提下就能行使独裁统治,原来处于半独立状态、由贵族控制的地方政府改为州郡,官员均由国王委任和支付俸禄,亦即建立较为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丹麦资产阶级已形成,贸易经营有了相当规模,成立了对冰岛贸易公司和东印度公司。丹麦的工业也在崛起。丹麦国王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依靠城市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力量来钳制大地主贵族阶层。但是丹麦却并没有能步英国的后尘迅速发展工农业。由于连年战争失利，割地赔款,经济停滞,百业凋零,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而大地主大贵族的势力更为膨胀，土地兼并和农业人口的人身依附愈来愈

严重。在生产力低下、战争和黑死病连绵不断的影响下，丹麦受到饥馑的威胁,商人囤积居奇,粮价在 16 世纪初短短两三年内暴涨了五倍。这就引起了新兴贵族、大地主和王室之间的矛盾， 1533 年爆发了“ 伯爵之战 ”, 1536 年经过一年围攻，丹麦王室终于重新光复了被贵族和农民军占据而又饱受饥荒之苦的哥本哈根。 1660 年王室又在商业资产阶级协助下发动取消贵族特权的成功政变，从而巩固了王室的中央集权制度。直到 1849 年丹麦虽然不断衰弱解体，但政局却还相对趋于稳定。

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在丹麦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更没有带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好处，不过在文化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涌现出蒂科·布拉赫(1546—1601)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布拉赫作为天文学家建造了丹麦和欧洲首座现代意义的天文观测台，从而使宇宙星象图得以改观，成为世界科学史上少有的几个丹麦人之一。布拉赫的科学成就和丹麦王室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王室赐给他汶岛的土地并且资助他建立起两座天文台。

丹麦王室虽然在 16 和 17 世纪处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但毕竟还是根深蒂固的老大帝国，虽受到一次次的创伤却仍旧保持霸权和风光。在摧毁了旧教神权至上统治之后，丹麦王室得到重新伸张王权的喘息机会，于是靡费奢华之风盛行，王室大兴土木，弗雷德里克二世和克里斯蒂安四世相继建造了克罗纳堡宫(1574—1585)、腓德烈堡宫（1601—1625）和玫瑰堡宫（1608—1617)，其中腓德烈堡宫是北欧最奢华靡费的王宫。这些王宫都是文艺复兴后期的巴罗克风格，丹麦重金聘用荷兰建筑师来建造的。丹麦宫廷里歌舞升平,荒淫无度,克里斯蒂安四世(1588—1648)在 1634 年举行的婚礼豪华宏大至极，以致令当时欧洲为之咋舌。在这样的背景下，靡费绮丽的巴罗克诗歌大行其道，迎合这股奢靡之风。

布道说教、狂欢宴饮都需要歌唱,于是大批淫秽靡丽、巴罗克

文风的诗歌应运而生。这类淫词艳曲往往以宗教和古代神话为内容,讲述的却是人的七情六欲和当时王室宫廷的糜烂生活,其中力士参孙抗拒不住大流氏的肉欲诱惑而为情所丧则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个题材。宫廷诗人、主教安德斯·阿莱勃(1587—1637)便是写巴罗克诗歌的高手。1627 年他翻译出版了《大卫王赞歌》,这是第一部用丹麦语出版的诗歌集。阿莱勃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在于他改进了呆板陈旧的丹麦诗歌韵律格调,将欧洲大陆,尤其是意大利和荷兰的巴罗克诗歌的韵律多变、格调动听的特点输入丹麦诗歌之中,加以融会贯通,创造出六韵步诗体、双重六韵步诗体,后来又提倡运用十二音节抑扬格诗体，使亚历山大格式诗体成为丹麦诗歌的主要形式，后来的丹麦圣歌作者金果和瑞典诗歌之父希恩海尔姆(1598—1672)的著名长诗《赫拉克勒斯》(1658)都深受他的影响。1639 年丹麦最著名的文物“黄金号角”在日德兰半岛南部出土,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奥勒·瓦尔姆(1588—1654)奉克里斯蒂安四世之命编写了诗体的《丹麦的古迹遗址》,这部著作记载了丹麦的墓葬风俗和 144 处有鲁纳古文字铭刻的墓碑，不仅开创了丹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先河，而且翻译成拉丁文后成了为欧洲所知的第一部丹麦文献著作。

托马斯·金果(1634—1703)是 17 世纪丹麦和整个北欧最著名的圣歌作家，也是最杰出的巴罗克诗人。金果的祖父是苏格兰的挂毯编织匠人，他的父母迁徙至西兰岛斯朗厄鲁普定居。金果从事神学,当过教堂执事、副主祭、奥胡斯主教。1671 年丹麦王储克里斯蒂安五世加冕为王，成为王位世袭制的先例并且建立君主专制政体,金果呈献了巴罗克体长诗《霍西安娜》以志祝贺,这首长诗将新国王同号称‘太阳王’的法国路易十四相媲美,极尽夸张之能事,因而开创了‘诗人能够将阿谀奉承变为艺术’的夸张诗体。这首诗深得克里斯蒂安的喜爱,金果的名声也由此大振,并且奠定了他的诗坛领袖的地位。

金果的巴罗克诗歌既有为王室权贵歌功颂德的叙事诗，也有触景生情的田园诗和直诉胸怀的抒情诗,诗句优雅绮丽,又善于博古引申,浮想联翩,因而有不少确可称为精品。但是他的上乘佳作却是赞美诗和圣歌。金果写的圣歌和赞美诗很少说教的味道，感情充沛真挚,流露得十分自然,仿佛在寂静的深夜里独自一人面对上帝娓娓倾诉自己的衷肠和宣泄自己的感情，真实而虔诚得声泪俱下。在金果的赞美诗里可以听得到基督教徒对上帝的无限信仰:甘苦与共、祸福相依、悲喜分享、安危相随、永生不渝。金果的代表作有三部《精神的合唱》两卷本(1673—1681)、《在冬季里》(1689)、《规范圣歌》(1699),统称为金果圣歌。在17和18世纪的赞美诗全集中的大半即85首是金果圣歌，有不少至今还在丹麦和北欧流传,瑞典、挪威和冰岛等国当代所用的赞美诗诗集里都有金果圣歌。《精神的合唱》第一卷是供个人在家祈祷用的,包括一周中每天的主歌。第二卷《告别世界》是供领圣餐、出行和航海时作祈祷之用。金果圣歌不仅是赞美诗，也是哲理诗，如第二卷中的《别了,世界,再见》就把天国的幸福同空虚作对比,从而达到虚无缥缈的精神状态,诗中写道：

别了，世界，再见！
奴隶的生活我早已厌倦。
我逃避长期压在肩头的重担。
我要摆脱它们，
走上自由之路。
我深感厌倦，我蔑视以对
那空虚的一切！
那空虚的一切！①

①见《丹麦文学简介》,第9—10页,郭德华编译,1989年,北京。

不过金果的赞美诗中也有轻快优美得如同小步舞曲一样的作品,如：

最可爱的玫瑰刺儿最尖，
最美丽的花朵最容易凋谢。
红润的脸颊下心儿在憔悴，
全都是命运女神心血来潮。
我们国家在惊涛中疾驶，
只仰仗着上帝国祚天赐！

金果赞美诗的感染力十分强烈，一方面依靠韵律节奏的变化莫测，因为金果把亚历山大诗体的格调掌握得出神人化；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他同孀居的师娘克吕西里斯相恋了数十年，但是有碍于金果的教士身份而不能公开。金果只能在抒情诗和赞美诗中宣泄胸中的幽怨和对爱人的思恋，因而他的诗歌哀婉动人，甚至缠绵悱恻，十分容易为人所接受，无论哪个阶层都能引起共鸣。金果终于在他的恋人去世前一年同她结了婚，于是这段刻骨铭心而又漫长得几近绝望的爱情成了丹麦历史上的美谈。由于金果圣歌的独特风格和修辞手段,金果被誉为“丹麦的荷马”。

另一宗不幸的婚姻亦使得金果的名声更增添光辉。克里斯蒂安四世之女莱奥诺拉·克里斯蒂娜(1621—1690)嫁给了位高权重的乌尔菲尔德伯爵。他们双双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和王室恩怨的旋涡之中，各自亡命海外又被抓回丹麦，丈夫被处死，而莱奥诺拉因系公主而被幽禁在哥本哈根城堡之中长达二十二年。她在1685年被赦,她所著的《痛苦的回忆》以金果圣歌的诗体记载了悲惨逆境中深受的耻辱和渴望自由的心情。这位在丹麦历史上有名的传奇女性成了金果圣歌所颂扬的道德的绝妙化身，也是矢志不

渝的忠贞爱情的生动典型。

第三节　瑞典——　强盛时代做强国梦

瑞典自从 1523 年古斯塔夫·瓦萨登上王位逐渐摆脱丹麦的统治赢得了独立以来,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国力强盛起来,1611 年卡尔玛战争(1611—1613)已可与北欧的霸主丹麦对阵交锋，虽未能获胜仍受挫失利，但随后却一举击败丹麦的盟国沙俄，并且兵临莫斯科,逼得俄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因而 1611—1718 年这段时期史称瑞典的强盛时代。

在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瑞典是自始至终的参战国，它与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清教诸侯国结盟，先后同信奉旧教的德国皇帝与诸侯国和丹麦频频交战，而且屡战屡胜，横扫了近半个欧洲,攻征了布拉格、不来梅等城市,并且也占领了日德兰半岛。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瑞典成为获利最多的战胜国之一，其疆域版图包括：芬兰全部、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的大部和德国的一小部分。到了 1658 年又通过对丹麦的战争收复了南部富饶的斯康耐地区，占有了挪威的两条入海通道。至此，瑞典已取代了丹麦成为波罗的海的霸主。

瑞典从古斯塔夫·瓦萨王朝伊始就建立了王权集中制度。宗教改革运动中，由于瑞典王室信奉新教，因而王权得到大大加强。但是王权的巩固必须依赖于贵族阶层的支持，尤其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对外用兵征战需要加重赋税和徭役，征集兵员，这就不能不触犯到大贵族阶层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如增收谷物和黄油税等。到了 17 世纪下半叶，在克里斯蒂娜女王当政(1644—1654)之后，瑞典王室政府的财政更加见绌，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因而对大贵族阶层不得不作退让，权力落入由大贵族操纵控制的御前枢密会议的掌握之中。后来的几个国王力图纠合中小贵族通过四级

会议夺回丧失的权力和限制大贵族的兼并特权，但收效甚微，贵族阶级竭力向王室争权之势非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甚嚣尘上。

瑞典强盛时代的特点是在 17 世纪中叶之后才在文化教育领域反映出来，一方面是三十年战争的影响开始波及文化教育，外国的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的造诣和成就传入瑞典成为一股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节节胜利，瑞典的民族自尊心突然高涨，由长期处于屈辱地位而一跃进入欧洲大国行列，不免使瑞典整个民族扬眉吐气，甚至趾高气扬，这必然会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瑞典强盛时代，尤其是克里斯蒂娜女王时期，教育得到大力提倡，人文主义精神在教育方面广泛贯彻和传播，并且建立了许多所大学。贵族和富家子弟以赴欧洲大陆留学为时尚，他们接触到外国在物质领域里的富足，也感受到精神的沸腾潮流。文艺复兴、巴罗克艺术和其他华丽的世俗艺术被介绍到瑞典来。在 17 世纪中叶的几十年时间里，斯德哥尔摩建造了不少华丽而宏伟的巴罗克风格的高楼大厦。上层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处于萌芽状态的瑞典文学提供了发展条件，于是以过于修饰、烦琐堆砌而又文体华丽的巴罗克文学蓬勃兴起。在诗歌方面，赞美诗仍然在数量和质量上占了主要地位，但是已经出现了纯属世俗的艺术作品，这是瑞典诗人学习了古典派或文艺复兴文学后以瑞典语按照六音步诗体的形式和范例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所受到的外国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已经不再是宗教改革时期单纯的德国影响了，其风格也摆脱了冗长死板的说教，而转向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靡丽奢华。进入强盛时代的克里斯蒂娜女王的宫廷是当时瑞典文学的活动中心，而最有影响的是被誉为‘瑞典诗歌之父’的耶奥尔格·希恩海尔姆。

耶奥尔格·希恩海尔姆(1598—1672)出生于达拉那郡的矿主家庭，曾在荷兰、德国留学并游历了欧洲大陆。他曾在大学任教并用瑞典语写诗。1644 年他呈献长诗《被俘虏的爱神丘比特》,在克里斯蒂娜女王加冕典礼上歌功颂德，因而成为克里斯蒂娜女王最

得宠的宫廷诗人。他在这首长诗中将年轻的女王比拟为瑞典文坛的保护神，说是掌管文艺、音乐的缪斯女神遭到战神的禁锢而长期销声匿迹，如今在女王的眷顾之下返回到她的宫廷。其奉承之意溢于言表，然而却也是实情，在克里斯蒂娜女王执政时期，宫廷里笙歌达旦，无论是巴罗克风格的戏剧还是芭蕾舞都大量创作演出，格调上也趋于精美高雅。《被俘虏的丘比特》就是一部边跳边唱的押韵诗。古典的希腊文或者拉丁文的诗韵都是建立在长段音节有规律的变化上，希恩海尔姆则作了创造性的突破，这首长诗的诗韵建立在瑞典语的重读和非重读音节上。他所创造的这个规律以后被瑞典语的诗歌所沿用。

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瑞典出自维护独立的需要,考证出英林嘉家族乃是神族瓦尼尔部落的丰饶神弗雷的后裔，从而证明了王室祖先的血统高贵，也表明了瑞典具有光辉的古代历史。在突然进入欧洲大国行列之际，瑞典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极度高涨，以至于不能满足于祖先的高贵，还要求有能与其赫赫武功相称的文化。于是瑞典文学史上第一部六音步长诗《赫拉克勒斯》便应运而生。1658 年希恩海尔姆出版了这部著名的作品，这是一部典型的文体冗长华丽的巴罗克风格的英雄叙事诗，也是瑞典文学领域直到 17 世纪所产生的最伟大的诗作。《赫拉克勒斯》并没有照本宣科地描写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的英武神勇和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的故事。长诗中叙述了赫拉克勒斯周旋于狄格德夫人以及洛斯塔斯夫人和她的三个美貌的女儿之间，不知道他要选择哪条人生道路，是崇尚道德禁欲苦行，还是人生苦短对酒当歌。狄格德和洛斯塔斯两人都是寓意形象，前者是美德，后者是享乐。赫拉克勒斯蹉跎彷徨终于醒悟：既不必禁欲苦行，也不能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他终于结束了放荡生活而做出了抉择。不难看出，希恩海尔姆笔下的赫拉克勒斯写的是瑞典的年轻贵族，而宣扬的则是为国效力奔赴战场才是正确的抉择，应该说，这种抉择对当时的贵族和富家子弟

是很有吸引力的,也正是当权者所竭力鼓吹的"强国精神"。因而这首长诗风靡一时，成为瑞典对外征战的精神动力。

希恩海尔姆的另一部作品是诗集《女诗神现在才教会我们用瑞典语写诗和吟唱》,收集了他的长短诗篇,这也是瑞典直到17世纪出版的第一部艺术创作的诗集。

除了"瑞典诗歌之父"希恩海尔姆之外,与他同时代的还有塞弥尔·哥伦勃斯(1642—1679),他以创作赞美诗擅长,并且将《赫拉克勒斯》改编成边唱边演的芭蕾舞剧,在卡尔十一世的加冕典礼上演出。拉斯·卢西多尔(1638—1674)以写情歌和酒歌出名,身后留下诗集《赫利孔山①的鲜花》。抒情诗人拉斯·维瓦利乌斯(1605—1669)是一个在当时颇受注目的人。他曾在乌普萨拉大学读过书，二十岁时离开瑞典到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国漂泊。他常常借钱不还,有时冒充天主教难民,有时则用假名在旅馆、酒店赊账，他不断被揭穿却不断行骗。最后一次他以埃里克·尤伦谢纳的假名在瑞典南部骗到了一位贵族妇女，并同她结了婚。事情败露后他立即逃跑,最后在斯德哥尔摩被抓住,越狱后又被关到四周没有窗户的卡亚内城堡里。他在那里被关了足足五年， 1641 年才获释。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他写出了《啊,自由,最高尚之物》以及抒发对大自然情感的抒情诗《怨春寒》等著名诗篇,并且把瑞典民歌升华到优雅的诗歌。

以奢侈靡费著称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在位只不过十年时间，1654年随着她的逊位，和平和缪斯女神时代也由此结束。此后的六十多年,即从1654—1718年,史称"卡罗林时代",君主崇尚简朴清苦风气和剑与火的强国精神，遏制住了大权旁落和贵族阶层势力膨胀,建立起君主专制政体和一支能吃苦耐劳、灵活机动的卡罗林新式军队,并且更加穷兵黩武对外扩张。1700 年卡尔十二世在

①赫利孔山系希腊神话中缪斯女神居住的地方，通常用来比喻诗的灵感源泉。

纳尔瓦战役中以少胜多，率领卡罗林新军击溃彼得大帝的沙俄大军，赢得了卡罗林新军是常胜军的威名，也使得瑞典的强盛世道走向巅峰。不难想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充满民族自豪感、大做强国梦的文学作品来，并且会受到当权者的欣然支持。

与希恩海尔姆鼓吹强国精神的杰作《赫拉克勒斯》遥相呼应的是鲁德贝克的《大西洋国》。奥洛夫·鲁德贝克(1630—1702)是乌普萨拉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后来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即考古学。他潜心研究和考证，发现古典作家论述中有很大一部分讲的是瑞典，而这些论述在冰岛的埃达和萨迦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证实。他的最大发现是：几乎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的文化都是源出于瑞典。根据他的考证结果，希腊先哲柏拉图著作中所说的大西洋国是个岛国，位于赫拉克勒斯擎天柱旁边，即直布罗陀海峡里。那里物阜民丰、政治民主、风气敦厚、耕作发达，因而是一个人民过着幸福生活的理想之国。然而在公元前九千多年，这个理想之国遭到天灾而突然消失了。鲁德贝克花了三十年时间写出了《大西洋国还是曼海姆[①]》(简称《大西洋国》，1679—1702)。这部巨著共四卷，每隔十年出一卷，但是第四卷在印刷时毁于 1702 年的乌普萨拉大火之中。《大西洋国》第一卷开宗明义地叙述了由于人类的邪恶，通天塔崩塌，罪恶之河泛滥，上帝赐福拯救义人挪亚，令他率领亲属人等乘方舟逃出洪水。挪亚第二个儿子雅弗这一支向北迁徙[②]，自雅弗的儿子玛各开始的后裔来到了曼海姆地区定居，建立了大西洋国，而乌普萨拉成为人类智慧的源泉。后来由于阿提拉[③]的骚扰袭击，雅弗人从曼海姆往南迁徙，并在多瑙河和地

①曼海姆一词系瑞典语，本意是“人们的家”，通常来指瑞典。

②故事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十章。

③阿提拉（433—453)匈奴王，在匈奴西迁后曾率骑兵大军横扫几乎整个欧洲，迫使哥特人、伦巴第人迁徙。

中海沿岸定居，建立起新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从人种、语言到风俗习惯无一不是从瑞典搬过去的，所以瑞典才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据鲁德贝克在这部著作中的考证：凡是希腊名著中所叙述的乌托邦，诸如金苹果园、极寒岛、天堂三地等等指的都是瑞典。

1679 年《大西洋国》第一卷问世后，就被瑞典的有识之士和文物界斥之为无稽之谈和异端邪说。但是瑞典王室却给予极大的青睐与恩宠，拨出巨款支持鲁德贝克的研究和出版，并且将其奉为瑞典文化的正统，称之为"鲁德贝克主义"，因为这与当权者所推崇的哥特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一时间，鲁德贝克主义风靡瑞典，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整个文艺与思想领域都是如此，其中城堡建筑专家埃里克·达尔堡陆军元帅（1625—1703）所著的《瑞典的古代与今日》更是堪与《大西洋国》相提并论的充满谵狂奇妙幻想的瑞典建筑史。这两部著作构成了瑞典强盛时代的极端民族自豪感和强国梦的宏伟华丽的纪念碑。虽然瑞典在 1700 年纳尔瓦战役中大胜俄国之后就颓势毕露，但是鲁德贝克主义却仍然充满活力，一直活跃到 18 世纪中叶才逐渐消失。

第四节　沉静的挪威文坛

17 世纪挪威的文坛上几乎乏善可陈，既没有出现什么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文化上的重大作为。正当丹麦和瑞典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向欧洲大陆靠拢，竞相引进流行的巴罗克文学艺术风格，以跟上欧洲的时尚时，挪威却依然故我，游离于欧洲的边缘，迟滞不前地保持着中世纪的风貌。阻碍挪威发展的仍然是这几个因素 战争、瘟疫和外来统治，但是影响力各不一样。挪威自 1450 年与丹麦签订了同盟条约之后，直到 1814 年丹挪联盟解散为止，都是处在丹麦的统治之下，而经济贸易则几乎全被德国汉萨同盟所控制。在 1537 年挪威贵族参与反克里斯

蒂安的叛逆被镇压后,挪威丧失了尚存的有限自主权利,成为丹麦的附庸国,挪威的官吏必须由丹麦国王委任派遣,而主要官员只能由丹麦人出任。在教会方面亦是如此，大主教或主教都是丹麦人。挪威贵族子弟要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去哥本哈根上大学。 1660 年弗雷德里克三世在丹麦行使君主独裁制，对挪威的高压更加变本加厉，挪威沦为毫无权力的海外省。丹麦王室出于聚敛军费和战败赔款的需要,在政治文化上实施高压政策的同时,在经济上却十分宽容，鼓励和支持生产和经济发展。挪威在 1644—1645 年及 1716—1718 年曾受丹麦短暂牵连之外，直到 1807 年欧洲大战之前，战争一直不曾在挪威本土进行，所以兵燹战火的蹂躏相当有限。曾施虐长久的黑死病虽尚未消除,但蔓延减弱,已呈颓势,人口虽仍稀少,但已不再急剧下降,甚至在 17 世纪后还呈现回升。由于有了这一段几乎不间断的和平时期，挪威在经济和人口上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喘息机会。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支持旧教的汉萨同盟分崩离析,无力再控制操纵北欧的贸易,挪威的对外贸易便逐渐蓬勃发展起来。由于挪威长期被禁止使用本民族文字，以致文化教育受到莫大摧残,甚至连布道用的也是丹麦语《圣经》。在丹麦和瑞典,《圣经》从拉丁语翻译成本民族文字曾成为推动本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巨大的助力,而挪威却连将《圣经》翻译成挪威文都遭到禁止。人文主义的传播则更是被丹麦当局所查禁和严加防范。宗教改革运动也在挪威进行，不过只是跟随着丹麦由旧教转变为新教,由用拉丁语布道改为用丹麦语而已,既没有出现像丹麦的摧毁旧教教堂、没收教会财产那样波澜壮阔的场面,也没有发生像瑞典那样焕发出民族精神的强国之举。挪威基督教势力本来就并不巩固,再加新旧教派交迭之际所造成的信仰真空,于是巫术魔法聚众蛊惑，弄得人心惶惶，局面不可收拾。巫术盛行是挪威在 17 世纪所不容忽视的文化倒退现象。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狂热迷信中，因行使巫术而遭审判的近千人，其中数百人被处以死刑，

受到连累的更不计其数。行使巫术的有不少人是大主教和大贵族的门第中人,如大主教阿勃萨隆·彼德森·贝亦尔的夫人,安娜·彼德斯多蒂尔因是巫婆而被判烧死。卑尔根城的全体基督教神职人员都出面倾力相救却未能保全她的性命。1908 年剧作家威尔斯·延森根据这一事件写出了剧本《巫婆安娜·彼德斯多蒂尔》,上演后引起轰动,并于 1943 年改编成电影《巫术之日》。即便在当时的宗教剧中，也不难看出巫术盛行时期，人们迷信鬼魂的狂热，例如教士约翰·布隆斯曼(1637—1707)所写的宗教剧《克厄的圣母访问节》就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人们对鬼魂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心理状态。

在整个 17 世纪的漫长年代里，在沉寂的挪威文坛上出头露面的主要有两个丹麦出生的诗人和一个土生土长的挪威诗人。丹麦著名诗人安德斯·阿勒勃(1587—1637)在出任挪威特隆汉姆郡主教期间从事不少文学创作活动，如用丹麦语翻译了德国的马丁·奥波茨(1597—1639)的《德国诗论》(1624),把法国胡格诺派诗人的《第一周》用丹麦文改写成《创世的六天》(1630)。阿勒勃以他所擅长的亚历山大诗体，用纯正的路德派教义精神解释了上帝造物的仁爱，把挪威北部的旖旎风光和峡谷河流描绘得淋漓尽致。

另一个是女诗人多萝西娅·恩格尔布莱特斯多蒂尔(1634—1716),她擅长用巴罗克诗体写圣歌和赞美诗，代表作是《奉献灵魂之歌》(1678)。她出身于教士之家,又嫁给教士为妻,因而她的赞美诗中常以父亲和女儿、新郎和新娘来比喻世人对上帝之爱，用父女、夫妻的情结来解释路德派的教义，即：灵魂获得拯救的惟一途径是真挚虔诚的自我忏悔，惟有自救才能救世。丹麦圣歌作家托马斯·金果对她推崇备至,丹麦戏剧家霍尔堡更是称她为“北欧诸王国迄今最伟大的女诗人”。

彼德·达斯(1647—1707)是 17 世纪挪威绝无仅有的土生土长的挪威诗人。他出生于挪威北部诺兰郡。他在哥本哈根学习神学

后返回家乡，苦熬了二十多年的贫困生活之后方始谋得教区牧师的低级职务。他也以巴罗克诗体写圣歌和赞美诗。在他的笔下挪威北部风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收集成册后命名为《挪威峡谷之歌》(1674)。在此基础上,他又撰写了《北方之地的号角》(1739),这部传世之作受到极大赞赏，被誉为可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约55—约 135)的《日耳曼志》相媲美的地舆志。

达斯的圣歌和赞美诗以生动活泼和亲切平易见长，成就远超过恩格尔布莱特斯多蒂尔，至今仍在流传。他的《教义问答歌集》写成于 1698 年,虽然多半是教谕诗,却并不枯燥,它以聊家常的方式就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向农民提出忠告，如不要抽打马匹、安息日应该让辛劳的双手休息、做交易不能短斤缺两等等，与其说是在解释教义，倒不如说是教人怎样务农和过日子，其风格清新自然、平易简洁，有如古希腊赫希俄德在公元前 8 世纪写成的教谕诗《农作与时日》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 70—前 19)的《农事诗》。由于达斯并不以丹麦文而是以挪威北部的方言创作，因而他的作品只能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有些作品是在他身后才发现的，如《北方之地的号角》。因而他的作品虽然对挪威的民族觉醒和后世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他在挪威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在他去世后一个半世纪才由挪威著名诗人韦尔哈文的推崇而确立起来的。

第五节　芬兰民族文学起步艰难

芬兰在 1809 年脱离瑞典之前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民族文学,这是因为自 1323 年瑞典与俄国签订《诺特堡协定》(即《榛子岛协定》)以来,确立了瑞典对芬兰全境的统治,实际上从 1155 年起瑞典曾先后组织四次十字军东征对芬兰用兵，并且占领了芬兰大部分土地。从占领初期开始，瑞典就向芬兰大量移民，控制了芬兰的经济命脉和贸易，严令禁止使用芬兰民族语言文字，并且规定除

拉丁语之外只准以瑞典语为通用语言，因而芬兰直到今天仍是一个芬兰语和瑞典语并列的双语国家，芬兰文学亦是芬兰民族文学和芬兰瑞典文学两者并存。瑞典在芬兰长达六百多年的统治对芬兰的影响巨大深远，不仅阻碍滞后了芬兰的经济文化发展，而且由于瑞典在强盛时期不断向东扩张，频频对俄罗斯用兵，而战场大多是在芬兰土地上，使得芬兰横遭蹂躏。由于芬兰当地的贵族阶层的兴起，以及瑞典为了羁縻住芬兰，不得不于 1581 年宣布芬兰为大公国，这对于芬兰民族文化发展是有利的。芬兰贵族阶层便将波兰引为奥援来壮大自身势力，对瑞典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瑞典便于 1596—1597 年发动"棍棒战争"，消灭了大部分芬兰的贵族势力，迫使芬兰一蹶不振，对瑞典依附得更深，这就更拖累了芬兰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因而经过连年的对外扩张战争，芬兰大公国的领土向东延伸不少，生产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得益的却是瑞典和在芬兰的瑞典统治阶层，而战争不仅加重了芬兰人民的负担，也加剧了瑞典对芬兰民族文化的防范和高压。在长达六百多年的瑞典占领时期里，虽然一些芬兰文字的印刷品也出版过，但不仅数量微小，且 80% 以上是宗教文学作品，体裁也局限于赞美诗和散文。宗教改革运动在芬兰进行得无声无息，仅由瑞典人所把持操纵，但宗教改革运动毕竟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从 17 世纪起，拉丁文不再通行，瑞典语文学勃然兴起，主要是诗歌，而芬兰文字的使用也借机在民间悄然流行起来。

芬兰第一个宗教文学家是约恩斯·布德（1437—1491）。他是芬兰北部一个修道院的修士，曾将《圣经·新约全书》部分翻译成瑞典文。他的代表作是用瑞典文写成的《约恩斯·布德文集》，内容除了解释教义之外，还有一些神话和传奇。

宗教改革时期随着拉丁文被瑞典文取而代之作为布道语言的同时，芬兰文也借机逐渐走俏，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圣经》的芬兰文翻译工作才得以着手进行，芬兰文的宗教文学作品才有机会问世。

米歇尔·阿格里科拉(约 1510—1557)是将芬兰文字规范化的先驱者和倡导者，也是芬兰民族文学的倡始者。他是芬兰出生长大的本土宗教改革家，早年曾跟随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大学学习神学，从而成为路德派的坚定的追随者。回国后曾任土尔库学院院长，1554 年起任土尔库教区大主教。他在 1542 年编制出一套较为规范的芬兰语字母,并出版了普及读物《识字 ABC》,这是芬兰历史上第一本芬兰语的教科书。他还用芬兰文字编写了《宗教入门》(1544),翻译了《圣经·新约全书》(1548),并且创作了不少芬兰语赞美诗。

阿格里科拉的继承者主要有三个，他们都是用芬兰文创作赞美诗的高手。亚科·苏奥玛拉宁(1540—1588)。苏奥玛拉宁又名芬诺，系土尔库教会长老。他曾用拉丁文编写了著名诗集《敬神歌集》(1582),这部诗集前半部分是圣歌和圣母颂,以及描述耶稣从出生到受难的圣经故事；后半部分既有哀叹人生艰难的感慨，也有欢庆快乐的酒歌，而大部分是芬兰中世纪的历史故事。苏奥玛拉宁亦出版了芬兰文的《芬诺赞美诗集》(1605),全书共一百四十一首赞美诗，但他自己创作的仅有十首，其他的都是翻译成芬兰文的外国作品。亨里克·玛斯库拉宁(1550—1619)系玛斯库教区教长，他曾将《敬神歌集》翻译成芬兰语，并且创作出版了第一部芬兰文版的《赞美诗集》(1605)。全书二百四十首赞美诗都是芬兰文的创作作品。土尔库主教艾利克·索洛拉宁(约 1545—1625)一生经历了‘棍棒战争’和芬兰内战的动乱,并曾长期坐过牢,在晚年编写了《布斯蒂拉布道文集》(1621—1625),该书共两卷,长达两千三百页，这部巨著以巴罗克风格的散文体论述了宇宙形成和自然现象、多神教、天主教和宗教改革,以及国家、民俗和社会等各类问题,是一部知识性很强的读物，对芬兰的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

17 世纪期间，芬兰文学上的一件大事是土尔库学院于 1640 年成立。这是芬兰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成立初期这所学院全由瑞

典人所主持操纵，培养的学生也全都是瑞典人。1642 年该学院又建立了印刷厂，于是瑞典语的诗歌便得以迅速出版。在土尔库学院流派中最著名的瑞典语诗人有雅可布 ·弗里斯(1691—1729) 和西里德 ·弗尔西乌斯(1550—1624)等人。他们亦都是以写圣经歌和赞美诗为主。土尔库学院创建初期带动了 10 世纪的瑞典语诗歌蓬勃发展,也为 18 世纪具有民族特色的芬兰语诗歌破土而出创造了条件，芬兰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在这所学院里得到过培养,这对于发展芬兰民族文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总起来看,17世纪是芬兰民族文学的起步阶段，阿格里科拉开拓了道路，他的继承者前进了一步确立了芬兰语诗歌的地盘。然而直到 17 世纪下半叶,芬兰民族文学主要是诗歌,创作还远不成熟,只是处在摸索阶段,即所谓‘ 实验诗歌时期 ”。在这一阶段，较有名声的芬兰语诗人还有约翰 ·卡亚努斯(1655—1681) ,他的长诗《世界在消亡中》模仿瑞典诗人卢西多尔的笔调,忧郁而缠绵,成为芬兰文诗歌独具一格的巴罗克风格的诗篇。玛特亚斯 · 萨拉姆尼乌斯(？—1691) 是芬兰第一位以民族语言写诗歌颂耶稣的诗人,他的长诗《耶稣颂》(1690)共二十九首歌长达二千多行,描写了耶稣从出生到受难的整个圣迹历程，用纪实的手法而不大事夸张地塑造出耶稣的形象。诗歌的语言也朴实无华却音韵优美。这首长诗流传了二百年之久,成为 18 和 19 世纪芬兰人民最喜爱的宗教诗。

第三章　18 世纪北欧文学

第一节　概述

18 世纪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史学家通常以 1640 年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这是因为 15 和 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市场日益扩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技术革命和机器工业生产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要求资产阶级冲破和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居于统治地位，于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障碍的资产阶级革命便首先在英国发生了。1642—1646 年，代表英国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克伦威尔大败英王军队,于 1648 年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并将国王查理一世处死。1688 年又进行了所谓“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建立起代表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政权。这次革命虽然以妥协告终并且没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但是却开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居于统治地位，也为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业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前提。

18 世纪欧洲各主要国家发展状况大不相同。英国在资本主义形成的道路上遥遥领先。在 1688 年‘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建成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统治的政权后，资产阶级在国外大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国内工商业和手工业大工场有了显著发展，为

18 世纪的产业革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尽管在 18 世纪初期英国资产阶级还有反封建残余的任务，但斗争并不太严峻，同劳动人民的矛盾虽日趋尖锐，但对立抗衡的阵势也尚未形成，因而英国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阶段总的趋势是节节上升的。自 1588 年英国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之后，又于 1652—1674 年间三次向荷兰开战，沉重打击了荷兰的海上力量，确立了在世界贸易和争夺殖民地斗争中的绝对优势，成为欧洲和世界最先进的国家。1763 年《巴黎和约》确保了英国在战争中获得的北美、印度和非洲的大片殖民地，英国逐渐成为“日不落”的海上霸主。

法国由于封建主义和保守势力的强大，资产阶级革命远没有英国顺利。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攻克巴士底狱起，直到 1815 年拿破仑·波拿巴所建立的第一帝国在滑铁卢被第七次反法联军击溃为止，前后历时十六年，不仅有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流血斗争，而且引起了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参战的以拿破仑为一方，以英、俄、普、奥、瑞典等国为另一方，从 1793 年支持法国王党叛乱起到 1815 年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止，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七次反法同盟战争。这场欧洲大战使得整个欧洲都沦入兵燹战火之中，所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但是也成为孕育资本主义兴起的温床。这是因为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欧洲资产阶级最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也标志着欧洲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确立，推动了欧洲各国反封建的斗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也是一场争取自由和人权的人文和文化革命，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欧洲的其他国家，包括北欧国家在内，在整个 18 世纪工商业虽然也有一定发展，但都很缓慢。德国一直处于分裂瘫痪的状态。三百多个诸侯小国割据，而又彼此倾轧，手工业工场虽在兴起，但

仍是封建小农经济占优势，其中普鲁士的官僚机关和军事组织获得巩固，发展成为具有军国主义传统、容克地主阶级统治的专制集权国家。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又打败了奥地利，成为欧洲大陆的新兴强国。意大利教会势力猖獗；俄国更是比西欧国家落后，彼得一世时期才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仍是农奴制度国家；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遇到很大阻力。总的来看，18 世纪欧洲是由封建主义转型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英国取得妥协性成功，而法国大革命虽然波澜壮阔，却一再复辟倒退,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北欧在内,则远远落在后面。

如同政治和社会变革一样,18 世纪欧洲在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上也进入了由古典主义走向启蒙运动的过渡时期。在这段时期中，遥遥领先的仍是英国，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取得了惊世骇俗的致命突破。然而，伟大的启蒙运动却诞生在法国，并从法国传播到整个欧洲,而且贯穿于这一世纪的始终,因此 18 世纪又被称为‘ 启蒙时代 ”。启蒙运动之所以首先发生在法国，是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但是这一时期，古典主义仍然统治着欧洲的文学和戏剧，各国情况虽差异很大，但即使英国和法国也不例外。启蒙运动的巨大而深远的思想影响要到 19 世纪才在欧洲其他国家显露出来,而在北欧则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

18 世纪以妥协平和为特征的英国社会是相对稳定的，这就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妥协政治的理论倡导者是哲学家洛克(1632—1704）,整个 18 世纪英国政治可以说是洛克学说的实践。洛克主张私有财产是人类的天赋权利，而君主立宪确保了人民通过议会行使保护私有制的权力。他的经验主义学说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指引了方向和探索了道路。英国的资产阶级科学家在数学、化学、天文和动植物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牛顿（1642—1727）的成就更开拓了科学的新纪元。到 18 世纪中叶,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使

用，工业革命使英国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生产力得到了大发展。由于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也带来了新的矛盾。这些都在英国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继莎士比亚之后，弥尔顿（1608—1674）的影响一直是笼罩在 17 和 18 世纪英国文学上的光环,他的长诗《失乐园》（1667)和《复乐园》（1671)中所表达的思想信仰和风琴式的语言更是左右着 18 世纪英国文坛。在这种背景下，18 世纪英国文学是以古典主义和经验主义并存为特征的。古典主义用怀旧的理想主义观点来检验和分析当时的社会，代表人物为诗人蒲柏(1688—1744)和斯威夫特(1667—1745）,斯威夫特负有盛名的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一直流传至今。而遵循经验主义哲学并以现代商品经济发展为创作题材的文学家如笛福、理查逊(1689—1761）、菲尔丁等人也涌现出来,他们的作品描写了平常人的生活，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观念意识。笛福（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是 18 世纪以来流传最广的流行小说之一。菲尔丁(1707—1754)擅长于把喜剧基调和幽默讽刺结合起来，将拜金主义、道德败坏等社会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结构严谨却又情节曲折,这在《汤姆·琼斯》（1749）中尤其突出。北欧不少作家受到他的影响而摆脱了传统萨迦故事的纯自然叙事的缺陷。

18 世纪法国国内危机重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信仰危机促使人们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进行反思，并且重新审视以神权和王权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启蒙运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启蒙运动揭露和批判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打碎‘ 君权神授 ’的枷锁,呼出了‘ 天赋人权 ’的进步口号，从而把人性从神权和王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文学和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以往对王室和教会的依附，有了独立的呼声和语言。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起，法国文学与思想、哲学和科学开始结合在一起，而宗教神学气味越来越淡薄。在以理性审视现存秩序的启蒙

思想家和文学家中，孟德斯鸠和卢梭均被认为是奠基者。孟德斯鸠（1689—1755)的《论法的精神》（1748)提出了政体分类和三权鼎立学说，对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卢梭(1712—1778)既著有大量政论文章,又有文学作品,如《新爱洛绮丝》（1759)、《爱弥儿》（1762)和《忏悔录》（1770)。他是当时最具有民主思想的文学家,也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先驱，对后来欧洲包括北欧各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明显的。另一个影响巨大的文学家是狄德罗（1713—1784）,他负责编纂的《百科全书》（1751—1772)成为欧洲各国的典范,也是传播科学和反神权、反封建、争取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但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文学家毕竟还刚刚脱颖而出，且遭受神权和王权的围攻和迫害，而且旷日持久的“古今之争”在17世纪末发展成公开的剧烈冲突,到了18世纪仍然愈演愈炽，而且涉及到文艺的各个领域，崇古派对卢梭等启蒙作家大张鞭挞。因而当时法国仍然是古典主义盛行，而在古典主义外壳中注入了新思想的伏尔泰(1694—1778)便成了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他的哲理小说如《老实人》（1759)、《小大人》（1752)等以及戏剧《俄狄浦斯王》（1718)等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指导了整整一个时代，所以启蒙时代也被称为“伏尔泰时代”，而崇古派则把伏尔泰称之为“伪古典主义”。

在整个18世纪，法国各个文艺领域的论争几乎从未间断过。这是分娩的阵痛，论争的结果不仅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人权天赋”思想大解放，而且也催生了现代美学的诞生。以表现人生、满足人的感官精神需求为特色的洛可可艺术便为新生的现代美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依据。随着王权的衰落和市民阶级的兴起，长期为世人所诟病的巴罗克风格亦趋于消亡，以纤巧玲珑、浮华俚俗而又烦琐矫饰为特色的洛可可艺术风靡一时，并且流行了近一个世纪。洛可可风格确实有迎合新兴资产阶级的俗气和低级趣味的缺陷，但是不可否认它把艺术从宫廷和教堂中解放出来，这种活

泼清新的艺术风格更加贴近平民生活,成为‘生活的艺术”。洛可可风格非但主宰了建筑、绘画、音乐,还影响到了文学。洛可可文学形成于 1730 年前后,细腻地描写了新兴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勒萨日(1668—1747)和马里沃(1688—1763)的喜剧,尤其是博马舍(1732—1799)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都非常适合资产阶级和中下层市民的口味。这类‘平民戏剧”具有鲜明的洛可可文学的独特风格,掩藏在轻松的外表之下,刻意描写与现存观念相悖的革新观念，从而从宏观上来说，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都属于洛可可文学和现代美学的范畴之中。洛可可风格对北欧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在瑞典和丹麦，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听到洛可可文体的回声。

从 1648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以来，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国的德国一直处在政治上的瘫痪状态，经济上停滞不前。随着以手工业工场的开办而缓慢兴起的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统一、反对封建割据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传入德国,引起了德国文坛上的一场大辩论。当时德国文坛由于封建割据而处在分裂状态，戏剧界混乱庞杂，并且文人大多依靠各诸侯国的宫廷服务谋生。在 18 世纪前期，高特舍特(1700—1766)大力推崇法国古典主义，主张德国戏剧应亦步亦趋地走法国悲剧的道路，以高乃依和拉辛为师，从而使戏剧界得到整肃，合乎理性。而以克洛卜施托克(1724—1803)为代表的启蒙文学派则主张应以英国的弥尔顿为榜样,改革德国戏剧必须要使其具有民族的特性和气质,因为建立德国民族文学已势在必行了,而莱辛(1729—1781)通过理论和实践使得这一目标得到实现。莱辛以名著《拉奥孔》(1766)和《汉堡剧评》(1767—1769)而成为德国启蒙文学的领袖人物。然而,对北欧文学影响最大的却是克洛卜施托克和后来的狂飙突进运动。克洛卜施托克的传世之作,长篇史诗《救世主》(1748—1773)足足写了 25 年，他的这部作品虽然是模仿弥尔顿的，而且在革命性上亦稍

逊《失乐园》一筹,但是在德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甚至对北欧亦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影响。1751 年他应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1746—1766 在位)的邀请来到哥本哈根。丹麦国王赠给他终身年金,以便让他完成《救世主》。他在哥本哈根居住了二十年之久,1770 年离开丹麦移居汉堡,次年即出版了他在丹麦撰写的几部颂歌集,如《苏黎世湖》(1751)、《春天的庆典》(1759)、《早年的坟墓》(1764)、《夏天的夜晚》(1766)等。从 18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发生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突破了理性的束缚,以感性体验为主,因而不但继承、发展了启蒙运动,推进了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而且对欧洲尤其是北欧 19 世纪文学的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年青时代的歌德以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和《浮士德》初稿,席勒以他的戏剧《强盗》(1781)、《阴谋与爱情》(1784)、《唐·卡洛斯》(1785),对 19 世纪北欧的文学运动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 18 世纪中叶以后,北欧国家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文学交流活动较以前明显增多,活动门类也逐渐有所增加,不再只是北欧国家的王公贵族子弟到法国或者德国去留学和神职人员的宗教布道往来,除了克洛卜施托克得到丹麦国王资助在丹麦游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德国启蒙文学家,不来梅杂志的史雷格尔(1719—1749)来丹麦考察丹麦的戏剧,并且写出了论著《对丹麦剧院改革的一些看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弥尔顿的作品经过德国在北欧各国广泛传播开来。以名作长诗《春天颂》(1742)和《墓园挽歌》(1751)而为 19 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开辟道路的英国墓园派诗人托马斯·格雷(1716—1771)翻译介绍了冰岛埃达史诗,如《命运女神姐妹》(1761)和《奥丁的降世》(1761)等,开创了英国浪漫派对北欧文学感兴趣的风气,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菲尔逊(1736—1796)用现代英语仿作凯尔特人民歌的《莪相集》(1762—1765)就是仿效中世纪北欧史诗的浓郁浪漫色彩的作品,这类仿古

诗歌对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兴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 1654 年逊位后侨居罗马，在她的沙龙中聚拢了一群诗人，1690 年成立了阿卡迪亚诗社。阿卡迪亚诗派声势壮大起来，在 18 世纪上半叶分支遍布全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文化界精英都参加进来。这一诗派以唯理性主义的诗风，尽力根除巴罗克的恶俗趣味，并且产生了阿卡迪亚诗派中最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剧作家梅塔斯塔齐奥(1698—1782)，虽然这个诗社对意大利诗歌和欧洲歌剧有很大影响，但是并未流传到北欧来。

第二节“北欧莫里哀”——霍尔堡

一

从 17 世纪后期到 18 世纪初期，丹麦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海上强国、北欧霸主和欧洲大国走向衰落，丧失了大片领地,除本土之外,只有冰岛、石勒苏格益郡、霍尔斯坦恩郡、格陵兰和法罗群岛等海外省，沦为一个没有资格参与欧洲大国角逐争斗、不断遭受欺侮凌辱的小国。从 1658 年瑞典越过冰封的贝尔特海峡进军占领过丹麦以来，丹麦仍然像三十年战争一样连战连败，不断割地赔款。1675—1679 年对瑞典的‘斯康耐之战’未能收复失地斯康耐郡，不过所幸的是当时丹麦海军实力尚强大，在克厄湾海战中打了个不大的胜仗，终于没有再割让土地。在 1700—1721 年的“北方大战”中，丹麦同俄国、波兰、德国结盟对付瑞典，并于 1700 年、1709—1721 年多次直接参战，但却未能将失地索要回来。此后,1756—1763 年欧洲国家七年战争、1776—1783 年英法争夺美洲的战争,以及 1793—1807 年针对拿破仑的前四次反法同盟，丹麦都置身事外,奉行‘武装中立’,即便在 1801 年英国海军闯入哥本哈根水域，逼迫丹麦参与反拿破仑的海上封锁，丹麦也不改变

初衷。1807 年丹麦在法国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放弃中立，英国舰队乘机猛烈炮轰哥本哈根并登陆入城。丹麦只得交出全部舰队，由英国炸毁。丹麦自此之后丧失了欧洲大国和海上强国的地位，这一场炮轰哥本哈根是丹麦所蒙受的最大耻辱，深深地伤害了民族自尊心，从而极大地动摇了王权的独裁专制和大贵族地主的统治。

经济窘迫一直是困扰丹麦的主要问题，在 18 世纪丹麦仍是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工商业并不发达，对外贸易控制在德国的汉萨同盟手里。连年战争、频频失利使得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王室的奢侈无度和兴建宫殿更使得原本已经入不敷出的经济更加拮据。从 1650 年起，农业连年歉收，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农村里剧烈的兼并造成绝大部分土地落入大贵族地主阶级的手中，在 18 世纪初丹麦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已不足一千户，人身依附也更趋严重。这种状况到 18 世纪末才逐渐有所改观。

18 世纪丹麦仍然是北欧最强大的国家，文化也最发达。但是丹麦的情况和英国、德国都不相同，有点近似波旁王朝的法国，但不及波旁王室那样骄奢淫逸，而广大农民的困苦和对大贵族地主的人身依附则不在法国之下。当时农村里绝大多数人是文盲，他们的文化活动主要是做礼拜和唱圣歌，而城里有文化的知识阶层也是少数。城里的文化活动，包括宫廷在内主要是演戏和音乐。能够有修养和闲情逸致来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就更少了，因而当时的文学多半是上层阶级攀附风雅的沙龙小圈子里的活动，与广大人民既没有关系也不涉及他们。印刷术的推广和报纸的出现虽然有助于文学的普及，但是整个 18 世纪,文人主要仍是为宫廷和教会服务。由于王权专制，在思想领域里严密控制与监视，因而连像英国和德国有些诸侯国的有限的思想和创作自由也不存在，单纯依靠写作为生的文人作家，那是到 19 世纪中期才出现的。作为文学和文化上的一大损失是，哥本哈根 1728 年一场大火把大学图

书馆烧毁，以致收藏的大量冰岛古籍手稿和丹麦、挪威、瑞典的不少珍贵书籍付之一炬。

总之，18 世纪丹麦民间的文化活动主要仍是唱唱金果的圣歌和赞美诗、民歌谣曲，讲述民间故事和传说。圣歌和赞美诗由教会印刷成单页小册子由商贩沿街叫卖。在宫廷、上流社会甚至富裕起来的市民阶层里，戏剧是除了音乐舞蹈之外的主要活动，上剧院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时尚消遣。不过丹麦和德国在崇尚的口味上大不相同，德国流行演“历史大戏”，而丹麦则以喜剧为主，更贴近生活和富有日常情趣。

二

18 世纪丹麦文学的主要流派是戏剧，而戏剧又几乎被喜剧所独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世纪末，而且演的都是外国喜剧，以法国为主，德国的也不少，而且都是法、德、意剧团来用原文演出。在 18 世纪中叶，哥本哈根出版了八套戏剧剧本集，全都是法国喜剧，而且都是法语原文，直到 19 世纪初丹麦仍在用法语和德语出版戏剧剧本，极少有翻译成丹麦文的。这是因为丹麦宫廷和贵族、上流社会的沙龙社交都只讲法语或德语，丹麦语则被视为俚俗的下等粗人讲的乡土话，这类粗俗的乡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登台演戏那更是匪夷所思。1722 年霍尔堡的喜剧《政治白铁工匠》在哥本哈根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才一举冲破法、德、意剧团垄断丹麦剧坛的局面，使得丹麦的民族戏剧终于有了扬眉吐气、出头露面的机会。但是当时用丹麦语写出民族文学作品的第一人并不是霍尔堡。著有随笔集《学识的乐园》的讽刺作家克里斯蒂安·法尔斯特（1690—1752）、著有圣歌集《信仰的珍奇之宝》、《天鹅之歌》的圣歌诗人汉斯·布鲁松（1694—1764）和尤阿其姆·鲍利（1691—1759）都是才华横溢、名重一时的诗人和剧作家。他们为霍尔堡的成功开拓了道路，但是他们的作品不如霍尔堡那样通俗易懂，因而成就上

亦逊色于霍尔堡。尽管霍尔堡一举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他的喜剧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但是影响毕竟微小。他的喜剧只能在观众主要是中下层市民的丹麦剧院演出。因而有相当长时间,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不屑于霍尔堡,他们仍然只看法、德、意剧团的外国戏，而霍尔堡的喜剧只能在丹麦剧院为中下层民众演出,而丹麦剧院则被宫廷、贵族、教会视为眼中钉,一再受到攻击,甚至最后被勒令封闭，而霍尔堡也曾遭到不公正的诉讼。这种状况直到 18 世纪 40 年代才逐渐有所改观，霍尔堡的喜剧被上流社会所接纳,并且被誉为“北欧的莫里哀”。

三

路德维格·霍尔堡(1684—1754)在丹麦和挪威文学史上都有记载，并且各自都把他称之为本国的文学家。这并不奇怪，因为霍尔堡出生于挪威贝尔根的一个丹麦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自由农的后裔，因军功而擢升为军官。霍尔堡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幸亏得到亲友资助完成学业，并于 1702 年赴哥本哈根上大学,然后去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留学。由于经济拮据,曾充任家庭教师和教音乐，甚至到市场上去吹箫卖艺来筹措学费和维持生计。霍尔堡返回丹麦后担任了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作为历史学家,霍尔堡的主要著作有《欧洲国家历史概论》、《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导论》(1716)和《丹麦王国史》等。这些历史著作虽然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但并没有多少独到的见解，真正使他成为不朽的反而是他“不务正业”的“消遣爱好”,亦即戏剧和文学创作。

1719—1720 年,霍尔堡以汉斯·米凯尔森的笔名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长篇讽刺叙事诗《彼德·鲍尔斯》。长诗的主人公彼德·鲍尔斯是日德兰半岛奥胡斯附近的一个磨坊主，他乘船前往西兰岛的凯隆堡去探望他的心上人多萝西娅，不料半路上遇上暴风雨，船只触礁失事，鲍尔斯被狂浪冲到安荷尔特岛。他在岛上历经苦难

受尽惊吓，幸亏当地少女蒂陀全力相助才逃出虎口。原来岛上的总督和教士都以抢劫过往商船和搜刮民脂民膏为能事，监狱遍布全岛，许多岛民都横死于绞刑架下。这部作品的惊世骇俗之处在于不但用挖苦嘲讽的手法揭露和抨击了贵族和教会的罪恶统治，而且也无情地讽刺了丹麦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陋习以及各色人等的弱点缺陷，甚至主人公彼德·鲍尔斯也做了亏心事:那个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当地少女蒂陀对他倾心相恋，而他却因为她贫贱而遗弃了她。这篇讽刺作品激怒了贵族和教会人士，给霍尔堡惹来了一场险些身陷囹圄的官司，因为当地的总督和教会以诽谤罪名起诉霍尔堡,并得到不少民众支持。霍尔堡接受了这一教训,以后他的喜剧虽然照样嘲讽挖苦丹麦的种种社会现象，但是剧情都发生在外国的某个偏僻地区。在这篇作品中霍尔堡采用了史诗体裁，用反话正说的手法把分明是讽刺小品的构思以气势恢弘的笔调写成一篇壮观的英雄史诗，其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部作品通篇都仿效维吉尔的名诗《埃涅阿斯记》(约公元前 19 年)。维吉尔(前 70—前 19 年)是荷马以后最重要的史诗诗人,也是公认的最重要的罗马诗人，在中古时代一直享有特殊的尊荣地位。但丁的《神曲》就是仿效他的史诗,文艺复兴以来,塔索、卡蒙斯、弥尔顿等欧洲著名诗人都以维吉尔的史诗作为他们的范本。根据罗马神话传说，罗马人最早的祖先就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埃涅阿斯。在伊利昂城被攻陷后，埃涅阿斯在天神护送下逃了出来，历经劫难逃到迦太基。后来在天神启示罗马未来命运的指引下，埃涅阿斯来到罗马建国，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而霍尔堡却以同样笔调写了一个并非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小人物彼德·鲍尔斯,在失事遇险后处处苟且但求活命。这就使得这部作品更富有讽刺意味。

霍尔堡是个多产的剧作家,一生中写出三十六部喜剧,其中只有很少几部是翻译或改写他人的作品，这在当时是并不多见的。

1722 年哥本哈根建立了第一座丹麦剧院，这对于崇尚法语和德语的丹麦来说是破天荒之举，亦是丹麦文化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划时代的转折,剧院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法、德、意剧团垄断丹麦剧坛的局面。因而霍尔堡从一开始就热情支持丹麦剧院的创建工作，并先后为剧院写了二十多个剧本。剧院开幕当天演出了莫里哀的《吝啬鬼》,第二天就演了霍尔堡的丹麦语新编喜剧《政治白铁工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轰动和成功,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一天的莫里哀的喜剧。《政治白铁工匠》讲的是汉堡有个名叫赫尔曼·冯·布来曼的白铁匠。他自以为百事通晓，尤其有独到的政治见解,爱絮叨谈论政治。有些人决定要教训他一下,便佯称他已被任命为汉堡市长。布来曼喜出望外,得意忘形,然而刚当上官不久便出了许多洋相,接踵而至的困难使得他无法对付,而且一辈子只当白铁工匠。然而在哄堂大笑之中，观众们发现原来最该受到嘲笑的并不是那个可怜的白铁工匠,而是那些大腹便便、高高在上的官吏、贵族，他们安富尊荣却只顾聚敛作威而不替民众做任何事 情 。

《让·德·法朗士》(1722)是另一部类似的讽刺喜剧。富家子汉斯·弗兰森到法国去留学,游逛数月后返回丹麦,只学会了巴黎的流行舞步和几句骂人的法语，然而盲目崇拜法国的心态却害得他满口法语,俨然以法国人自居。女侍潘妮拉巧施计谋,使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出喜剧显然是表达了对那些崇洋媚外、匍匐拜倒在外国文化面前的上流社会的憎恶和蔑视。他的最受欢迎的喜剧《埃拉斯穆斯·孟塔努斯》(1731)也是采用了类似的情节 年轻的拉斯莫斯·贝格从哥本哈根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但是他已满嘴拉丁语,无法同乡亲们交谈。他当上了教区执事,却又鼓吹无法为当地民众接受的书本知识，如地球是圆的等等，以至于无法在教区容身。在他被迫投笔从戎之前,他不得不当众放弃地圆学说,承认世界是扁平的,扁平得像一张薄煎饼,他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谅宥,因

为他终于幡然悔悟，放弃了浅薄而渎神的邪说，他才保住了神职并且得到梦寐以求的爱情。这类先进思想向愚昧无知求饶的情节固然荒唐可笑，然而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在霍尔堡的喜剧中,《山上的耶比》(1722)是写得最为成功的一部，因而成为他的喜剧的代表作。这部喜剧情节生动紧凑，语言妙趣横生，而且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既令人捧腹不止，又勾起一阵阵苦涩的回味。《山上的耶比》写的是山区佃农耶比在进城时醉倒在路旁。男爵地主出于恶作剧让耶比从醉梦中醒来时发现他竟然成了男爵大人。耶比虽然当了男爵，其言行做事却依然是个佃农，一天过去之后耶比以冒充贵族之罪被判刑。他从牢房中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依然故我仍是一个农民。《山上的耶比》也是部精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山民耶比虽然有些市井无赖的习气，但是他却是个老实勤劳而受尽凌辱的农民，除了做牛做马一般辛苦种地之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然而却贫困清苦，被人鄙视欺压，甚至连妻子都被教堂执事所勾引。剧中通过大量插科打诨刻画出贵族地主作威作福、法官刑吏鱼肉乡里、豪门恶奴狐假虎威、教士伪善虚假的丑恶嘴脸，揭露了他们所犯下的种种罪恶勾当。综观全剧，这部作品有很深的思想性，但是由于运用了巧妙的喜剧手段，竟然避过了检查官员的耳目得以公演,并且历演不衰大受欢迎;“山上的耶比”也成了一个特有的性格名词。

《贫穷和傲慢》(1723)恰好与《山上的耶比》成为反照而相互辉映。剧本写的是西班牙没落贵族堂腊努多夫妇已经贫困到了一日三餐无着落的地步，但仍然要硬撑门面呼婢喝奴，并且沉醉在血统、门第、家谱、头衔等虚荣之中,对暴发而又身份低下的资产阶级则抱着傲慢偏执的态度，拒绝了富有却并不是名门出生的求婚者对女儿的爱情，以至于被仆人讽刺说：“这位贵族老爷从祖上继承了两大箱子财产,一个箱子里装满了傲慢,另一个装满了贫穷。”由于这个剧本尖刻而辛辣地嘲讽抨击了贵族阶层，因而一直被明令

禁演,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地改头换面地演出,直到 1748 年才开禁,而“堂腊努多”这个名词不胫而走,成为没落贵族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霍尔堡写了一系列以仆佣为主人公的喜剧,男仆一成不变地名为亨里克,女佣则是潘妮拉,如《亨里克和潘妮拉》(1727)、《被典当了的农家小伙子》(1731)、《潘妮拉短暂的小姐生活》(1731)等。在这些喜剧里,他们都被描写得聪明机警、才智过人。这在当时等级森严、讲究门第血统的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霍尔堡的其他喜剧,如《雅可布·封蒂波》(1725)、《大惊小怪的人》(1726)、《假面舞会》(1724)、《6 月 11 日》(1723)和《风信鸡》(1723)等都很有名,并且都已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而在欧洲国家上演得更多。1906 年,丹麦文学史的创始者维尔海姆·安德森和丹麦最伟大的作曲家卡尔·尼尔森联手将《假面舞会》改编成为歌剧上演,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歌剧成为丹麦和北欧一些国家歌剧院的保留节目,并且在许多国家演出过。霍尔堡后期还写了讽刺伦理小说《尼尔斯·克里姆地下之行》(1741)、随笔集《道德思想》(1744)和《书信五百封》(1748—1754)等。《尼尔斯·克里姆地下之行》讲述了克里姆在挪威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一道罅隙直通地心,克里姆在地底漫游了许多国家,几乎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7—1535)笔下的欧洲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乌托邦》中所描绘的理想国如出一辙,其中有一个国家全由妇女掌权,克里姆反对女人执政而被驱逐到人猿之国去。待到克里姆再从罅隙中返回挪威,他已无法适应自己同胞的思想和生活。由于这部著作辛辣地抨击了当时的政体,出版商便将霍尔堡的拉丁文原稿偷运到莱比锡,在那里用德语出版,以逃避丹麦检查官员的严密监视。这部著作立即引起轰动,又被译成荷兰文、法文,并且在 1742 年译成丹麦文。这部作品是霍尔堡借鉴了英国的斯威夫特(1667—1745)的作品,故而亦称为“丹麦的格列佛游记”。

霍尔堡是丹麦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他所创作的现实主义

喜剧对丹麦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把丹麦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使丹麦文学成为欧洲文学中为人熟悉的一部分。霍尔堡不仅有‘丹麦和北欧的莫里哀’之称,而且也被誉为‘世界上二十位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他在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上都借鉴了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和莫里哀的表现手法,而受到莫里哀的影响最深。但是他和莫里哀有个明显的区别。莫里哀作为宫廷作家，作品主人公往往以上流社会为主，所受的约束和顾忌较多，因而主人公大抵是贵族人物，对于上流社会虽有讽刺但并不辛辣挖苦，往往是以善有善报、改恶从善的皆大欢喜作为结局。而霍尔堡则着力于写下层人物和新兴市民阶层的普通人，表现了他们的纯朴和智慧，给于他们以无限同情。霍尔堡还在作品中对庸俗无聊而又狂妄自大的贵族、惟利是图而又虚荣悭吝的商人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并且对盲目崇洋媚外、轻视祖国文化和愚昧无知等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笑。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暴露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抒发了普通平民的爱憎之情，因而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推崇他是“一位为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伟大战士”。

霍尔堡在喜剧上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一反传统的诗体喜剧，改而采用散文的形式，因为诗体无法充分表现人物性格和语言特色，也不能自然而真实地贴近日常生活。这一主张大大地推动了现实主义喜剧的发展。霍尔堡的喜剧深受欧洲古典主义影响，严格地遵守“三一律”，并通过情节的展开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他十分善于运用渲染的手法，用适度的夸张来突出人物的特征。因此，霍尔堡的喜剧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于：来自现实生活的艺术形象，符合人物社会地位和性格的个性化语言，恰到好处的渲染夸张。

霍尔堡是个自然神论者,他对于宗教问题十分谨慎,几乎到了缄口不提的程度，因而他是当时欧洲少有的几个未被教会扣上‘亵渎神灵”之类大不敬罪名的作家。他既倾向中下层平民，有民主进

步的一面，却又嫌他们愚昧无知，有明显保守的时代局限性。在晚年，他经济上十分富有并且用积累的财富创建了索勒学院，因此获得男爵称号，跻身于贵族之列，这时他保守的一面变得更为明显。他幻想有个开明的统治者来励精图治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因而并不彻底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幻想在《尼尔斯·克里姆地下之行》、《道德思想》、《自传》（1727—1745）中都有反映。但是毕竟瑕不掩瑜，他在丹麦和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显要位置，正如恩格斯在1848年写的《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一文中指出"：丹麦人民无论在贸易、工业、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赖德国的地位……丹麦从各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正如获得物质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①]这是对霍尔堡的文学创作的高度评价。从1934年起丹麦政府设置了霍尔堡喜剧奖。

四

在霍尔堡带动之下,丹麦的民族戏剧开始有了生气,一些优秀的剧目登上了舞台，打破了法、德、意剧团垄断丹麦剧坛的局面。到了18世纪70年代,这种状况有了进一步的转折,丹麦语演出的民族戏剧已经站住脚跟，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固然一直是丹麦戏剧的忠实观众，甚至连贵族和宫廷也逐渐摒弃丹麦戏剧俚俗低级的偏见。丹麦戏剧本身也有了质的转变，不再是一味插科打诨的滑稽戏,而是以情节的风趣、语言的幽默来逗人发噱,逐渐向日后的正剧发展。传统的法国式古典悲剧影响不断缩小，不再受到欢迎。霍尔堡的喜剧依然是活跃在丹麦舞台上的主力，而新剧作家也在脱颖而出。约翰·布鲁恩(1745—1816）也是挪威人,但是居住在丹麦,他以悲剧《查里纳》而蜚声文坛。约翰·维塞尔(1742—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64页。

1785)是 18 世纪 70 年代最富盛名的丹麦剧作家，他也是一个挪威人。他的代表作是喜剧《没有袜子的爱情》(1772)。该剧讲述一对年轻男女历经爱情波折终于要成亲结婚。新娘梦见她只能在指定的那一天才可以出嫁，而婚礼当天新郎却偏偏找不到非穿不可的白色长袜子而几乎结不成婚。这出喜剧仍然是滑稽剧，由于剧情的荒唐而令人大笑不止，亦可以看出是与莫里哀风格一脉相承的。

18 世纪末丹麦文坛逐渐复苏，一方面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克里斯蒂安五世王室对文化界的高压控制和监视有所松动。从 18 世纪中期起，丹麦陆续出版了杂志刊物，既有戏剧丛刊,也有文学杂志,如仿效英国《观察家》的《新时代》，亦称为《丹麦观察家》,但是丹麦的刊物不如瑞典的《百眼神》那样有声有色，对丹麦文学虽有些推动作用，不过影响并不很大。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气氛才产生出了丹麦的日耳曼文艺复兴运动。

日耳曼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瑞典进行了，不过并没有用什么冠冕堂皇的名词而已。瑞典出于维护独立和鼓吹爱国的需要，对冰岛埃达史诗备加关注，并且致力于考证,到了 17 世纪为宣扬强国思想，更是把这种努力推向荒谬不经，不顾事实的地步，然而由于卡尔十二世的兵败，强国梦的破灭，这股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狂热也逐渐烟消云散了。正当这股潮流在瑞典归于沉寂之际，丹麦却又兴起了研究古代北欧文学和冰岛埃达史诗的热潮。但是这两者无论从出发点和归结都是大不相同的。丹麦的这场‘日耳曼文艺复兴运动’是由以彼得·苏姆(1728—1798)等一批文人所酝酿和发动的，彼得·苏姆本人是哥本哈根大学历史学家和教授,著有《丹麦史》(1782),他们对于丹麦当时全盘接受模仿德意志文化非常不满，决心打破这种亦步亦趋跟随德国的局面，并且要发扬光大丹麦自己的民族文化，然而丹麦本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 13 世纪萨克索的《丹麦人的业绩》，而这显然是无法同德意志匹敌的。于是彼得·苏姆转而抬出冰岛

文学，声称冰岛的埃达史诗和萨迦传记都是根据确凿可信的丹麦历史。在这样的信念推动下，他们着手将冰岛的历史文学著作，包括《埃达》、《拓土记》、《定居记》、斯诺里的《新埃达》和《挪威列王传说》以及冰岛的许多萨迦传记都先后翻译成丹麦文出版。由于这场运动是自发性的而不是王室支持资助的，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这场运动的声势、规模和影响力都受到制约。然而政治动机和功利色彩也就搀杂得很少。这场运动的正面效果在于声张了丹麦民族自尊心，激励了丹麦人的爱国热忱，有助于摒弃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因而对它的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日耳曼文艺复兴运动表面上似乎是颂扬历史文化，而其实质是颂扬爱国主义，成为丹麦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耳曼文艺复兴运动中十分活跃的约翰内斯·埃瓦尔德（1743—1781）是 18 世纪后期丹麦最杰出和最富有才华的诗人。他深受侨居在丹麦的德国诗人克洛卜施托克的影响，克洛卜施托克不仅对他耳提面命，而且还帮助他出版作品和演出他的戏剧，使他得以在丹麦和德国成名。埃瓦尔德起先因袭了克洛卜施托克的老路子，以人类犯下原罪被贬出伊甸园，堕落入尘寰的故事为主题创作了新古典主义悲剧《亚当与夏娃》（1769）。该剧虽然诗体优美，但是主题陈旧且德国味道太重，因而并不受到欢迎。埃瓦尔德便改弦更张,用古代北欧神话为主题,写了几个戏剧,散文剧《鲁尔夫·克拉格》（1770）采用了莎士比亚的表现手法烘托出剧情，使得该剧在丹麦和德国引起轰动。此后，埃瓦尔德还以日耳曼古代半神半人的英雄阿尔米尼乌斯[①]抗击罗马入侵者的故事以及日耳曼神话中的人物来作为创作戏剧的题材，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光明神巴德尔之死》（1774）一剧已成了日耳曼文艺复兴运动的里程碑，

① 阿尔米尼乌斯(约前 16—21) 日耳曼部落首领,曾于公元 9 年大败一支罗马军团,并使其全军覆没。

成了至今历演不辍的北欧神话剧的经典剧目。他的独幕剧《渔夫》(1779)中的诗歌《克里斯蒂安国王站在高高的桅杆旁》被选为丹麦的国歌。埃瓦尔德在丹麦文坛上影响很大，以诗人欧伦施莱厄为首的丹麦浪漫派诗歌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兴起的。

第三节　瑞典的贝尔曼之歌

一

瑞典文学史通常将 18 世纪标榜为“自由时期”,而其特征是启蒙思想和法国古典主义形式的结合。笼统地说，18 世纪瑞典处于一个各个阶层各行其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时期，似乎也是符合实际的，然而这只是在付出了高昂惨痛的代价之后所换回来的一段权力几乎完全瘫痪的分崩离析的局面，有如德国分裂成三百六十五个诸侯国，各个小国都在自行其事一样，而其过程则是和丹麦一样，即由一个穷兵黩武的强权国家衰败没落到一个毫无权势的欧洲小国，所不同的只是瑞典对外扩张凶猛至极，而衰落亦极度迅速，不像丹麦前后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于说 18 世纪瑞典文学将启蒙思想和法国古典主义结合起来，则并不尽然。启蒙运动虽然在欧洲大陆反响巨大，然而在瑞典却几乎无声无息。再者，启蒙运动在瑞典的传播亦并不是得力于法国古典主义。作为法国古典主义中最高雅的文学形式——悲剧和英雄史诗在瑞典并没有形成较为繁荣的局面。

从 1700 年至 1721 年发生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北方大战。这场战争在 1699 年酝酿准备,丹麦、波兰和俄国结成联盟,旨在打破瑞典在波罗的海的独尊霸权，战事由丹麦首先发动进攻瑞典对其承担保障独立责任的霍尔斯坦恩公国。俄国也旋即出兵从东面进攻拉脱维亚。瑞典新君初立，创建赫赫武功的卡尔十一世于 1697

年去世，继之而来的是被伏尔泰称之为“半个堂吉诃德，半个亚历山大”的卡尔十二世。卡尔十二世接位时年方十五岁。就在这样遭受两面夹攻的危急关头，卡尔十二世表现出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而瑞典卡罗林新式军队骁悍善战，既在西线击退丹麦攻势，又在东线以少胜多解了纳尔瓦之围。1700 年冬纳尔瓦战役卡尔十二世仅以不足万人的孤军击败了十倍于众的彼得一世的俄国大军，造就了这位年仅十八岁的统帅是个旷古未闻的军事奇才的常胜神话，而在以后的几年中瑞典军队在波兰战场上几乎是所向披靡，俄国军队也节节败退。1707 年瑞典军队在俄国战场上打了个大胜仗之后便挥师直指莫斯科。然而卡尔十二世犯下了同后来法国的拿破仑和 20 世纪的德国希特勒同样致命的错误，即对俄罗斯的秋季泥泞和冬季严寒缺乏应有的起码估计，以至于 1708 年底到 1709 年初虽已兵临莫斯科城下，但因断粮和寒冷而未能攻城。1709 年瑞典军队不得不撤退。1709 年夏，在波尔塔瓦战役中，瑞典卡罗林新军的精锐之师被歼，剩余部分全部投降。波尔塔瓦战役后关押在俄罗斯从事各种苦役的瑞典战俘竟有三万人之众，而后来生还者还不到五千人。当时瑞典全国人口还不到二百五十万，青壮年仅半数左右，因而战俘的人数之多是骇人听闻的。卡尔十二世带领小股军队羁留在土耳其达五年之久，为了挽回面子于 1716 年进攻挪威，但于 1718 年战死在战场。在此期间，丹麦、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等一齐进攻瑞典，俄罗斯还攻入瑞典东海岸。1721 年瑞典与交战各国媾和，丧失了几乎所有的占领土地和芬兰的大部分，但总算保住了本土未被战胜国所瓜分。

北方大战是瑞典所遭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失败，它的经历可以说和丹麦在 17 至 18 世纪的衰败是大体相似的，即由一个称霸称雄的强国由极盛而没落。其不同之处在于丹麦长期是北欧霸主的老大帝国，无论从财力或是人力都相当殷富雄厚，而衰落过程绵延了上百年之久。瑞典是个新兴爆发的霸权国家，骤然暴富

和急剧衰落都使得瑞典无所适从，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除了割地赔款等惨痛经历之外，瑞典还有其独特的处境。首先是卡尔十二世即位伊始就长期征伐在国外，直到1718年身亡都不曾治理过国家，或者说王权几乎式微，留守的政府仅仅为了征收军费和供给，并不具备多少行动功能，因而整个国家长期处于权力真空的“自由状态”。其次，从1718年到1772年虽然有了国王，但王室已不再有威信和权力。而昔日有财有势的大贵族由于跟随卡尔十二世征伐而几乎全部倾覆殆尽，而中小贵族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力量薄弱难以掌权，虽然组织了礼帽党和便帽党在40年代执政，但无所事事。这样半瘫痪局面一直延续到1772年古斯塔夫三世发动政变重新恢复君主专制。其间瑞典曾于1741—1743年和1788—1790年对俄国发动两次战争，旨在夺回波罗的海沿岸的失地和芬兰，但均以失败告终，从而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古斯塔夫三世(1746—1792)虽然通过政变使瑞典摆脱了瘫痪状态，然而却激化了矛盾，政局更加动荡，终于导致在1792年遭到谋杀的下场。但是瑞典困境的症结所在是千疮百孔的经济。由于连年战争，靡费无度，大批青壮年或战死或被俘，大贵族庄园陡然消亡崩溃，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瑞典的农业急剧下降。强国鼎盛时期瑞典曾是肉类、粮食和多种农产品的出口国，然而从18世纪下半叶起却遭受粮食危机之苦。在这样兵荒马乱、饥馑笼罩之下，百业都萧条衰微，遑论文学的发展了。况且，当时瑞典王室虽然穷兵黩武不重视文学，但是一直仍奉行宫廷文人的旧制不变。而文学之士必须依赖于保护者的供养方能维持生计，其作品亦必须由保护者许可并向社会推荐才为人所知。这和当时瑞典的音乐家和艺术家有所不同，他们“艺随身转”，在艰难时期到英、法、德等国谋生，在国外闯出名声并得到丰厚报酬再回瑞典来求取名利，有些瑞典大音乐家、作曲家和绘画雕塑家都是靠走这条道路而成名的，但是文学家们则无此福分，大贵族阶层跟随卡尔十二世长期辗转国外并且战败

获罪陡然没落衰亡，使得大批文人丧失了生计，因而造成瑞典文学的中落。

幸好这段时间并不算太久，在 1772 年到 1792 年古斯塔夫三世在位时期，他既使瑞典逐渐摆脱饥馑，也给瑞典文学带来了生机。古斯塔夫三世在巩固王权的同时也扶植农业生产，并且鼓励支持文学，尤其是戏剧，在他身体力行的倡导下，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虽然在英国和德国早已几乎绝迹，然而在瑞典却大行其道。

二

随着短暂的强国时期的结束，国力强盛陡然从现实变成了回忆，再也没有大量掠夺来的财富源源流入可供上层阶级挥霍，而贫困和饥馑则随处呈现，下层民众的不安和骚动更令上层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触目惊心，于是他们关注国计民生和可以为实际生活带来好处的科学项目，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其他科学发现更促进了瑞典对自然科学、医学等方面的研究。自由时期，瑞典在自然科学上并没有出现瘫痪，反而表现出讲究功利、面对现实的态度，从而使得瑞典能够较快地从艰难中恢复过来，跟上欧洲的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而一直以老大自居的丹麦在每况愈下的衰败中仍然踌躇满志。瑞典的自大和狂妄在 18 世纪变为自卑和谦顺,可以说波尔塔瓦战役以及后来卡尔十二世战死在挪威是瑞典强国梦之墓的墓碑,而巨著《阿特兰提斯》(《大西洋国》)和《古代与今日瑞典》中所做的短暂的强国美梦则永远埋葬在墓碑背后的坟茔中，而正是这种切肤之痛的耻辱感和自卑感驱使瑞典人跨过了瑞典史学研究上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是瑞典谵妄的强国梦时期，此后是清醒的客观研究时期。在这一清醒的研究时期之中，瑞典人吸收了大量外来影响，从孟德斯鸠、卢梭到牛顿，从文史哲到自然科学一应兼收并蓄。在当时众多的瑞典自然科学家中，有两个即使从文学观点上来看也是举足轻重的：

斯维登堡主义的创始人埃曼纽尔 ·斯维登堡(1688—1772)出身于主教之家,他的父亲约瑟夫 ·斯维登堡是瑞典 17 到 18 世纪最著名的赞美诗作家，也是协助卡尔十二世运筹帷幄和支持卡罗林新军的重要教士。斯维登堡受过良好而全面的教育，并赴英国深造。当时牛顿仍然在世并进行科学研究活动，斯维登堡曾跟随他进行了涉及许多不同项目的自然科学研究，因而他接受了启蒙思想，在哲学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笛卡儿主义，在科学上则是个牛顿主义者，他信奉机械唯物主义，主张新柏拉图主义，同时又反对经验主义和实验主义，曾写出了不少功利主义十足而又将不同的实验上升归纳成为理论的拉丁文论文，因而他是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科学家，并且被任命为瑞典科学院的第一批院士。但是 1736 年他去荷兰讲学之后出现了突然的剧变，由机械唯物主义者转向泛灵论者，由科学家和思想家变为理论诡辩家。他曾突然昏迷不醒，待到恢复知觉后，说他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光所制服，而这种强光正是神的干预，使得他顿悟了万物有灵论的道理，于是他就成了上帝所指定的先知。他创立了以神秘主义为特色的整套理论，即后世称之为“ 斯维登堡主义 ”的学说。斯维登堡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一门以宗教为基础，用文学、哲学的五花八门和无所不包的道理和论述堆砌得天衣无缝，深奥玄妙，其实是用宗教的经义糅合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念而形成的貌似正确而深不可测、通畅连贯而浑成一体的玄学。它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论，亦即物质仅是精神的象征，物质世界的各种现象在精神世界里都可找得到它的灵魂。斯维登堡以“ 科学 ”的观点，通过对自然和宇宙的种种超自然的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结论，肯定精神世界的存在，而天堂之乐和地狱之苦正如但丁在《神曲》中所描述勾画的。人在死后或升入天堂或堕入地狱，并不是由上帝所安排，而是取决于人生在世时的行为和思想的为善或是作恶，亦即由灵魂所决定。因此灵与肉、魂与躯之间必须沟通，而且可以交流，招魂术和灵魂观察也就

成了斯维登堡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到了 1772 年他在英国去世之前，已被推崇为半神半人的传奇人物，而不再是先验论哲学家或者笛卡儿式的思想家，并且被奉为精神世界的领袖和教主。他的追随者自称为‘斯维登堡主义者’，并于 1810 年成立了斯维登堡协会，除了北欧之外，会众达两万余人，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和南非，他们甚至还组成名为‘新耶路撒冷’的教会。从 1787 年起斯维登堡的拉丁文原著相继用瑞典文和英文出版，书名为《关于天堂和它的美妙事物以及地狱论文集》。1978 年斯堪的纳维亚斯维登堡协会成立，在这几个国家里翻译出版斯维登堡著作。

斯维登堡主义对欧洲和美洲大陆不少作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受其影响最深的莫过于瑞典作家斯特林堡，从 1890 年起斯特林堡用七年时间潜心研究斯维登堡主义，这就使他原本已近谵狂的心理状态更陷入了神秘主义之中而无法自拔。他晚年的戏剧创作由自然主义转变为蒙上神秘主义色彩，用大量幻想和谵妄的方式来表达悲愤、伤感和绝望，如长篇小说《一个狂人的辩白》(1888)、剧本《到大马士革去》(三部曲，1894—1904)、《死魂之舞》(1901)、《鬼魂奏鸣曲》(1907)等。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晚年也由于悲观而转向神秘主义和斯维登堡主义，创作出《罗斯默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加布勒》(1890)等充满神秘的象征主义色彩的剧本。此外，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瑞典唯理性作家阿尔姆克维斯特，以及瑞典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都曾笃信过斯维登堡的学说，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流露。

随着先验论的流行和后来新柏拉图主义、浪漫主义的兴起，斯维登堡主义的影响也传播到了欧洲大陆和美洲。德国大文学家歌德、法国的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英国以长诗《弥尔顿》(1808)和《耶路撒冷》(1820)而闻名于世的浪漫主义先驱，诗人布莱克都受到过斯维登堡主义的相当影响。美国废奴运动中为庆祝黑奴解放宣言颁布而写下不朽诗篇《波士顿颂》的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爱默生

和以他为首的超验主义运动（包括一批当时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如霍桑、惠特曼等）都接受并笃信这一门学说。后来发展起来的新柏拉图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五花八门的现代主义固然有不少思想、哲学观念来源，而斯维登堡的神秘主义则是它们的源头之一，尤其在谵妄、梦幻和狂想方面。

卡尔·冯·林奈（1707—1778）是个出色的自然科学家，本来同“纯文学”没有什么渊源和相干，但是他被当时的《百眼神》杂志和主编达林称为“自由时期最伟大的瑞典散文作家”，因而也就在瑞典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林奈致力于研究生态学和植物学，并且对自然系统中的植物雌雄属性做出了划时代的分类方法，并被命名为林奈自然系统分类法。他由于到处收集植物标本和观察自然而写出了五本游记：《厄兰岛和哥特兰岛之行》（1745）、《西约特郡之行》（1747）和《斯康耐之行》（1751）。这些日记体的游记写得朴实无华，毫不加文学修饰，对大自然的季节变化、各地的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记载无遗。林奈的游记应该说是了解瑞典中部和东南部的资料齐全的读物，但是从文学角度来看，文笔并不十分优美流畅。至于他身后出版的《拉普兰之行》和《达拉那之行》（1888—1889）则不像前三本那样枯燥乏味。他的游记即便在当时也很难说是上乘之作，甚至比不上当时的礼帽党领袖政客梯辛（1696—1770）的作品，因为林奈的才华在于自然科学方面，但是由于他已名满欧洲，声誉和地位使得他的游记也因而沾光而受到世人关注。

三

瑞典自由时期有两件盛事标志着启蒙运动的高潮。其一是1739年成立了瑞典科学院，致力推广对农业和工业有益的科研成果。1753年露伊莎·乌尔里卡女王还成立了一个文学院，但是在那时讲究功利主义，而文学院的成立几乎是无声无息不被人知的。其二是1776年瑞典颁布了第一部出版自由法，这是继英国之后欧

洲颁布的第二部，应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出版自由法的颁布取消或极大放宽了官方对文字印刷出版的控制和检查，古斯塔夫三世政变之后,虽然力图恢复,但却无能为力。1778 年《斯德哥尔摩邮报》创刊,这是北欧地区的第一份报纸,既具有新闻和文学价值，也对后来的文学起了推动作用。

18 世纪瑞典的文学格式主要是诗歌，在英国已经相当流行的散文小说在瑞典几乎还不曾见到过。当时瑞典的诗歌中巴洛克风格已逐渐消亡，而被形式更新颖的洛可可诗体所取代，风格上更趋明快，不再烦琐冗长堆砌华丽的词藻，而以轻松愉快为特点。形式活泼的牧歌便成为受人喜爱的体裁，不仅有古典主义的阿卡迪亚牧歌，而且有牧歌主题的田园诗和抒情诗，在诗中谈情说爱或者讨论哲学和宗教问题，正如歌德的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动物诗《列那狐》一样，当时瑞典诗坛上相当活跃的是牧歌爱情诗和动物寓言诗。这一时期的爱情诗和以往不同的是，牧歌中的男女虽然也以风流潇洒的贵族方式谈情说爱，但是这些人物却都已不再只是贵族，而多半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牧歌体抒情诗也为 19 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制造了声势。自从 17 世纪末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寓言诗》和法国诗人沙尔·佩罗的《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相继出版后，瑞典亦相继仿效，兴起了一股写童话诗、动物小故事的潮流，此外还有一种把以往的教谕诗旧有的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以新的形式和表现手法表现出来的诗，通常称之为哲理抒情诗。哲理抒情诗介乎抒情和叙事之间，往往把抽象的概念和道德观念用高雅的词藻和洛可可风格表达出来。哲理诗体裁也转化为讽刺诗和感伤诗，以惊世骇俗的警句简短而尖锐地讽刺抨击人类缺点和时代弊端，或是悲歌悼念流逝的美好时日，或是怀古伤今哀叹昔日风光之不再，可以说是瑞典在这个世纪开始就陡然丧失强国地位的现实的情感上的流露。

总起来看,启蒙运动在瑞典没有造成什么声势,即使在处于急

剧上升状态的资产阶级里也没引起多大的反响，因为在 18 世纪资产阶级仍然以虔信主义的热忱参与宗教活动，虽然这种虔信主义已极力追求更富有个人色彩的人生目标。直到 18 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他们才逐渐以较为隐蔽的方式把虔信主义培育的感情和卢梭那种现代和自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当时涌现出不少阿卡迪亚式的诗社，他们模仿古代阿卡迪亚牧羊人的生活，追求世外桃源的牧歌式享乐纵欢，其实这些诗社就是资产阶级模仿昔日大贵族上流社会习以为常的文艺沙龙的变种。男女诗人们都自称" 牧羊人 "或" 牧羊女 ",聚集在一起狂欢,创作出阿卡迪亚式的牧歌。其中大多数是攀附风雅、风花雪月甚至享乐纵欢,因而瑞典 18 世纪的牧歌具有鲜明的洛可可风格的轻松浮华的特点，而其作品比以前的同类诗歌更加脱离现实生活，也更加脱离禁欲主义和伦理道德的禁锢，有些甚至鼓吹肉欲色情，但是并没有涌现出什么出色的诗人和作品。尚可值得提及的恐怕只有用启蒙思想来进行创作的 " 思想建设社 " 和该社的三个诗人。

这个以法国古典主义艺术为标准和崇尚洛可可风格的文学团体中最年长的成员是诺登弗里克特夫人（1718—1763）,她也是该社的核心。她系出身威尔姆兰郡的牧师家庭，自幼深受法国文化的熏陶，崇尚唯美纯情，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第一个丈夫在结婚前夕病死，第二个丈夫在婚后半年暴卒，两人都是她的法国籍的家庭教师，而且婚姻都是由她父亲所包办。这两次丧偶使她精神受到莫大创伤，她的性格由本来多愁善感变得愁思百结、哀绪萦怀，甚至把自己的住所亦称为 " 愁宫 " 。为了排解愁闷，她用笔墨来倾诉衷肠,抒发情怀,创作了诗歌集《忧伤的斑鸠》,其中共收集了九首抒情诗,都是描写丧偶的忧伤和向往永恒的宁谧,如:《我的生活乐趣已被扼杀》、《我在穷乡僻壤孤独向隅》等。她的文笔还算优美，而表现技巧却并非无瑕可谪，但是她的诗却倾吐了自己的忧怀哀思，开创了在抒情诗里直截了当地表达诗人自己的思绪和感情

的先河，这在瑞典诗歌艺术中是第一部自我抒情诗，形式上的弱点和表达上的拙劣之处都被她在诗中吐露的真挚感情所弥补，因而在当时的洛可可诗体风格中显得更有生气、更能感人。诺登弗里克特夫人的代表作是她在晚年创作的《风信子花之歌》，诗里充满了丰富的内在情感，描写了一个弃妇的受屈忍辱的心情。她的另一首著名的诗是教谕诗《为妇女辩护》，用以反驳卢梭的轻视妇女艺术创作才能的错误观点。她并不是 18 世纪所涌现出来的第一个妇女诗人，因为在她之前还有苏菲娅 ·布兰妮尔(1659—1730)，一个擅长写动物寓言诗的女诗人，但是布兰妮尔水平较为一般，所以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可称得上是 18 世纪瑞典女诗人的仍要数诺登弗里克特夫人。18 世纪 50 年代诺登弗里克特夫人和她的文学界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思想建设社”,以宣传启蒙思想为宗旨，既信仰伏尔泰,也崇拜卢梭。“思想建设社”自 1753 年起每年出版一本文学年鉴《我们的尝试》,并且出版了两套文学作品集,露骨地宣扬自由思想，如果说启蒙运动在瑞典尚有一点点声势的话，那么这两套文集的发行就标志着瑞典进入了启蒙时期。

“思想建设社”另外两个重要的诗人是古斯塔夫 ·尤伦堡格(1731—1808)和古斯塔夫 ·克留茨(1737—1785)。“思想建设社”成立之初目的性并不大明确，只是一个阿卡迪亚式的诗社，而且要同露伊莎 ·乌尔里卡女王创建的文学院一争高低，因而才华横溢的牧歌田园诗人克留茨便大显身手，他的《夏之歌》是瑞典第一首细致的写景诗，笔法上来源于英国文学，如蒲柏的作品，诗中赞颂了瑞典中部的旖旎风光，但由于运用了不少人物化的比喻，如“水的儿子的鱼”“山峰点着长满胡须的头”等,以致风格是抽象晦涩,似乎是非现实主义的，而他的代表作田园诗《阿提斯和卡米拉》(1762)则离开社会现实更远。这首诗以阿卡迪亚的田园风光为背景，阿提斯和卡米拉这对离经叛道的恋人不顾一切地要结合在一起。由于爱情的纯洁力量，他们俩终于冲破层层障碍得到了爱的

权利，宣泄了人类的本能。他的诗篇深入而富有艺术性地分析了这对恋人的心灵骚动和情绪起伏，显然是受到了法国悲剧诗人拉辛分析人物心理的影响。他的作品往往流露出享乐主义的观点，宣扬生存的最高目的在于享受人生，而且有些情节色情味道十分浓厚。

“思想建设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尤伦堡格正好同克留茨的享乐纵欲观念完全相反，以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来形成他的极端。他的长诗《冬天之歌》(1759)赞颂了古代北欧人与冰天雪地作斗争的气概和勇气,体现了孟德斯鸠关于艰苦的条件给人以活力,而过分舒适的自然条件只能令人懒惰和萎蔫。他的代表作讽刺诗《鄙视世界的人》、教谕诗《人类的灾难》(1762)都是阴暗低沉,充满悲观主义的情调，可以说是步伏尔泰的悲观主义和卢梭对市民文化的责难的后尘,而他的后期作品,如《灵魂力量的颂歌》,更是为禁欲主义讴歌卫道了。

“思想建设社”的三个主要成员如此貌合神离,思想上如此南辕北辙，正好反映了当时瑞典文坛的混乱情况。他们都标榜启蒙思想,并且也反对蒙昧和专制,但是他们却向往世外桃源的田园牧歌,而不肯向正在新兴的资产阶级靠拢,因为他们都是出身名门的贵族。但是他们毕竟接受和传播了欧洲大陆流传过来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他们和同时代的竞争对手奥洛夫·冯·达林一样，虽然自身的文学成就并不很大，但却是瑞典启蒙运动的先行者和传播者,为启蒙思想摇旗呐喊。

四

奥洛夫·冯·达林(1708—1763)是18世纪瑞典启蒙运动的中心人物和启蒙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并且被称誉为“北欧的伏尔泰”。他和伏尔泰一样也是一个诗人，擅长写讽刺诗，如讥嘲人类的妒忌、吹嘘、做作等缺点,也讽刺只会享乐的公子哥儿和不学无术的

学究文人，但是对宗教和政治一类问题却十分谨慎，不去涉足，因而经常都得以顺利通过检查。他的代表作是《马的故事》(1740)，这是一篇仿照伏尔泰的作品写成的寓言体裁的叙事长诗，诗中叙述了骏马格劳勒和它的主人的恩恩怨怨，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但是这个寓言却表现了从古斯塔夫·瓦萨到弗雷德里克一世的瑞典历史。骏马格劳勒就是瑞典人民的化身，他们服役于各个主人，即瑞典国王，有的融洽，有的别扭，而主人有的爱马如命，有的则冷漠无情。《马的故事》是达林作品中最生动、语言最真实的一篇。除此之外，《斯维亚王国史》是达林的力作，《斯维亚王国史》(四卷本)在他临终时才完成，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用较为简单易懂的语言以相当实事求是的观点纵观瑞典从远古到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的历史，他既反映了瑞典 17 世纪强国梦破灭之后面对现实的态度，也是对不可一世的吕德贝克主义做出的有力批判。达林在戏剧上也很有成就，他的著名喜剧《妒忌者》(1738)颇有莫里哀和霍尔堡之风，但是以古北欧家族故事《伏尔松萨迦》改写的悲剧《布隆希尔德》却未能摆脱前人的巢穴而缺乏特色。

达林一生之中最大的成就在于 1732 年创办了瑞典的第一份周刊《百眼神》。这本八页的杂志是继英国《观察者》之后的欧洲第二本期刊，当时丹麦也在创办文艺杂志，但未取得成功。达林的《百眼神》遵循了英国《观察者》的格调"以幽默的小品和讽刺诗来提出严肃的伦理"，用各种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诸如诗歌、漫谈、信札、日记摘抄和对话等来表达启蒙时期的新思想和介绍欧洲启蒙作家的伦理思想，从而成为瑞典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中坚骨干，也成为瑞典自由年代的标志。《百眼神》受到了瑞典各界的欢迎，取得了莫大成功，在出版两年之后又出版了不少分类结集的单行本，在 18 世纪 50 年代全部《百眼神》周刊又重印。《百眼神》在创刊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从撰稿到编辑到发行全部由达林一人包办。

《百眼神》周刊的成功也给达林本人带来了荣誉和地位。应该说,《百眼神》是瑞典 18 世纪出现的文化新事物，也是最受人喜爱的媒介和文艺读物，读者通过它接触到了当时的新思想，从而推动了瑞典文化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在这方面，达林功不可没。他本来是出身于外省僻壤的一个牧师家庭，他曾长期在贵族门下当家庭教师，后来又当了多年政府机关的报纸职员。但是《百眼神》周刊的成功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成为瑞典最优秀的诗人，得到了露伊莎·乌尔里卡女王的青睐,成为她的宫廷诗人,被册封为贵族,出任当时新成立的瑞典文学院秘书长、宫廷大臣，并且荣任了王储（即古斯塔夫三世）的教师。达林由此步入政坛，成为掌权秉政的礼帽党领袖，但他并不是咄咄逼人的主战派，是少数反对同俄国作战的温和派。1756 年露伊莎·乌尔里卡女王和她的丈夫阿道尔夫·弗雷德里夫发动政变失败而遭到废黜，达林也随之受到牵连几乎被处死,直到他 1763 年去世前不久才得到平反并重新出任高官。出于对女王的感恩戴德，达林为女王写了数目繁多的即兴诗供她消遣,并且在女王去世时创作了长诗《瑞典的自由》,这首长诗被喻为"露伊莎·乌尔里卡女王的挽歌"和达林本人的"马的故事"。达林是个多产的即兴诗人和民歌谣曲作家，他身后留下六卷本诗歌集,其中有不少至今流传的珍品,如牧歌《塞拉东的欢呼》、《辛克莱之歌》等,纯属抒情民歌的《平静生活的乐趣》、《默默无闻的生活的幸福》,以及民间特色强烈的《别干高贵的事业》和《喜鹊站在钟楼上》等。这些民歌都清新活泼，并且描述了瑞典的农村生活和大自然景象，因而后来成为贝尔曼仿效学习的导师之一。

在瑞典文学史上,达林的地位是十分别致的,他被称为"瑞典最神秘的诗人"，但是这并不是由于他的作品像斯维登堡那样充满宗教神秘主义色彩，而他恰恰是个典型的自然科学崇尚者和唯理性主义者，如同他的先哲伏尔泰一样。他之所以被人觉得神秘不可测,是因为他默默地经营《百眼神》周刊,两年之后才被人所知,

并且立即一跃成为瑞典最重要、最杰出的诗人。达林通过《百眼神》周刊传播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新思想，也是瑞典文学的新标准和新语言规范的先行者，因为他的诗作都简洁明快，是典型的洛可可诗体。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神秘莫测和具有创造性的诗人，但是通过自己独特的贡献在瑞典的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五

古斯塔夫时代是指古斯塔夫三世在 1772 年政变成功到 1792 年遭暗杀身亡的这段短暂时期。古斯塔夫三世时代往往被称为瑞典文化上绚丽多姿的创新时代，这一评价未免是过于溢美的歌功颂德，但是如果同古斯塔夫三世的前后相比较，那不能不说这段时期瑞典文坛相当轻松活泼，是自由时期和瑞典 18 世纪文学的高潮，不过也是跌入低谷的终结。

古斯塔夫时期，瑞典文学的成就主要在戏剧方面，1782 年，瑞典歌剧院成立，古斯塔夫三世亲自撰写了几部歌剧（实际上都是由国王提供剧情，而由他的枪手谢尔格伦等人捉刀代笔），其中最引起轰动的是《古斯塔夫·瓦萨》（1786），这部歌剧气势雄壮，精美华丽，可称为精品。古斯塔夫三世亦致力于提倡上演瑞典本国的话剧，他亲自写了不少历史剧，如《西里·布拉赫和约翰·耶伦谢纳》、《色提斯和彼勒乌斯》和莱奥波尔德执笔的悲剧《奥丁神》，又名《北欧神祇的迁徙》。这些剧作的情节往往借用法国戏剧，并且总是以大团圆作为结尾，具有法国古典主义特色，严格遵循‘三一律”，采用亚历山大诗体格律，人物刻画虽不深刻，但风格华丽，语言流畅优美，因而舞台效果较强烈，也引起巨大的轰动。

古斯塔夫三世对瑞典文学戏剧来说有着比瑞典任何统治者更为重要的意义。他鼓励和保护文学家，而直到那个时期瑞典的作家们都需要依靠保护者的支持，从 17 世纪中、后期以来这种保护出现了中落断绝，以致文学家们连生活都难以为继。而古斯塔夫

三世的保护和资助不啻雪中送炭，同时也促进了文学家地位的提高。当时所有著名的作家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关注，连国王本人都是文学家，因而文学家们的社会声誉提高了。这在穷兵黩武、炫耀武力而又招致失败之后的瑞典是文化上的一个进步。为了促进瑞典文学的发展，古斯塔夫三世于 1786 年建立了“瑞典学院”。这个学院是仿效已有 150 年历史的法兰西学院来创办的。学院院士名额为十八人，这个学院一直存在至今，并积极展开活动。

古斯塔夫三世之所以能对瑞典文学做出较显著的贡献是由于他从小就受到他母亲露伊莎·乌尔里卡女王和他的导师达林的熏陶教育，对法国文化崇尚备至，尤其是伏尔泰。因而，他不仅不反对和限制启蒙思想的传播，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这样就使得瑞典文坛上出现了一段相对宽容大度和不压制言论自由的时日。18 世纪 90 年代初乌普萨拉大学已建立各种社团来探讨欧洲大陆上涌现的有关政治哲学问题的新思想，尤其是德国哲学都得到介绍，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思潮也汹涌冲击着瑞典的知识阶层。古斯塔夫三世在接位之后就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结束了礼帽党和便帽党喋喋不休而又毫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争吵，把大权独揽到自己手里，因而他才得以拨出巨款建剧场，支持戏剧家耗费高昂的演出，并且执行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即便到了启蒙运动在欧洲大陆上由思想传播变为暴力革命时，他仍不改初衷。于是贵族上层便先下手将他暗杀。

古斯塔夫三世对瑞典文学所作的贡献亦必须归功于聚集在他身边的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们都是得到重用且报酬优厚的宫廷文人，为古斯塔夫三世捉刀代笔，但又是启蒙思想和欧洲大陆新潮流的积极传播者。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有如下几位：

约翰·奥克塞恩谢纳（1750—1818）系贵族名门出身，长期的外交生涯使他对欧洲大陆上的新思维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因而古斯塔夫三世委任他为御前枢密会议主席，出任首辅要职，但他也是

一个典型的宫廷文人。代表诗作有《夜晚》(1769)和《清晨》(1771)以及后来的续篇《黄昏》、《傍晚》(1785),此外还有长诗《收获》(1772)和《白天的时刻》(1785)等。

卡尔·古斯塔夫·莱奥波尔德(1756—1829)是古斯塔夫最信赖的宠臣和捉笔者，被册封为贵族，出任国王的秘书和枢密大臣，并且致力于创建瑞典学院。他深受伏尔泰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影响。早期作品《情欲的颂歌》(1785)露骨宣扬了性爱和情欲,以致遭到包括谢尔格伦在内的瑞典文坛主流派的猛烈抨击。他的作品格调明快，形式华丽，并且时有惊世骇俗的妙语警句，令人扼腕叫绝,因而后世的泰格纳赞美说:"莱奥波尔德首先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天才。"

约翰·谢尔格伦(1751—1795)是古斯塔夫时期的关键人物和最出色的诗人，可以说正是他才撑起了古斯塔夫派作家的天地。他出身于牧师之家，曾担任《斯德哥尔摩邮报》的记者和文艺评论员，后来成为该报的所有者。他担任古斯塔夫三世的秘书达十年之久，也是古斯塔夫三世身边最坚决的启蒙思想家和出谋划策者。但是在古斯塔夫三世后期终于由于政见不同而离开王室。他在当时瑞典文学家的领先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身体虚弱，因患肺病，仅活了四十七岁就去世了。由他执笔写成的歌剧《古斯塔夫·瓦萨》和其他五部戏剧作品，虽然在当时都冠以国王撰写的名义，但是确实是18世纪瑞典戏剧的精粹所在。除此之外，他的讽刺诗《我的嘲笑》和教谕诗《我们的幻想》都以伏尔泰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笔法批评了压制人性本能的禁欲主义，宣扬了激进的法国启蒙派观点。谢尔格伦的讽刺诗《不能因为他疯了，就把他看成是天才》(1787)严峻地批判了当时风行的斯维登堡神秘主义，如炼丹、术士行法和圆梦等。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当时宗教神秘主义猖獗,共济会、虔信派、教友兄弟会等五花八门的黑暗势力林立，不仅王公贵族，甚至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也倾向于神秘主义，而不少

启蒙人物也迷信于此道。谢尔格伦最后一部启蒙诗歌《光明之敌》(1792)抨击了当时对法国革命的恐惧。他的其他作品如《愚人的生活》(1791)、《新创世记》(1789)、《致乐里斯蒂娜》等诗篇也都体现了色彩浓郁的启蒙主义思想。《新创世记》更是被后世公认为“瑞典浪漫主义的启明星”。

和这三个男性作家大不相同的是安娜·伦格伦夫人(1754—1817),她出身于大学教授之家,既没有当过高官也没有接受过古斯塔夫三世的赏物和补偿。她在《斯德哥尔摩邮报》上发表了不少讽刺诗,如《夫贵妻荣》、《朱丽亚娜小姐》等,讽刺了贵族特权阶级的趾高气扬和谄媚阿谀的炎凉世态,并且描写了瑞典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温馨愉快。她的《女伯爵的访问》(1800)、《欢乐的节日》、《宫殿与草棚》、《男孩子》等诗篇读来同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和英国的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她的笔调更热情、更亲切,她的牧歌式家庭诗篇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进入文学领域,这种现象在欧洲大陆早已司空见惯,在瑞典和北欧也终于姗姗来迟。

六

在众多的古斯塔夫派作家之中,有一个独特奇异的人,那就是18世纪后半期最受欢迎的诗人卡尔·贝尔曼。其实,他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因为他并没有创作出什么当时盛行的亚历山大诗体的长篇叙事诗,他写的只是短小而且往往支离破碎的祝酒歌和即兴吟唱。但他却是18世纪瑞典洛可可诗体的代表人物,他是瑞典最著名的谣曲和酒歌作者,他的歌谣至今还在吟唱,每年7月26日是瑞典的贝尔曼节,人们抬着他的塑像游行狂欢和纵饮。直到今日,瑞典还有自编自演的“贝尔曼派歌手”,如埃弗特·陶勃(1890—1976)更是享有国际盛誉的文学家、作曲家和歌手。

卡尔·贝尔曼(1740—1795)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官僚家庭,他在

十七岁时已显示出非凡的诗歌和音乐天赋，也写出了不少优美的抒情诗。但是他没有能抗拒命运的戏弄，起先是身为大官僚的父亲通过各种关系将他安插到工作轻松而待遇优厚的官僚机构和海关银行中任个闲职，后来古斯塔夫三世又任命他为国家彩票局秘书，他不必去上班视事而领取高薪。但是贝尔曼习惯于奢侈浮华，过的是放浪形骸的生活，因而总是东挪西借，债台高筑。他一生只出过一次国，那是到挪威去躲债。在晚年他贫病交加，又受到催账逼债的折磨，并且因为欠款无法还清而被关进了监牢，以致老死在狱中。如果用“醇酒妇人、纸醉金迷”来概括贝尔曼的享乐人生似乎并不算过分，从纨绔子弟发展成酗酒纵欲，他的一生都是在追求享乐、纵欲尽欢中度过的。但是他并不是颓废的醉鬼，他在传记里对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却相当清醒地评价说：“我是一个不成器的男人，我连太阳是否升起或地球是否转动都不闻不问。我所关心的是希望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都安然无恙。我无限热爱人类，我怀着永不熄灭的感情热爱女人……”应该说他的醉生梦死般的生活是当时瑞典经济崩溃所产生的普遍的道德沦丧和追求享乐的反映。这种纵欲享乐的人生观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赤裸裸，不用任何借口来掩饰。

贝尔曼所作的歌谣往往散落在各处,有些是即兴吟唱,有不少被采用在轻歌剧和滑稽戏之中，因而虽然数目浩繁，但是最后收集成篇的却并非全部，收集编纂工作费力耗时拖宕很久。他的主要作品收集在《弗里德曼诗体书信》（1790）和《弗里德曼之歌》（1791）两书中。弗里德曼是贝尔曼所杜撰的钟表匠人，其实就是贝尔曼自己。《弗里德曼诗体书信》共收集了八十二首歌谣，描述了斯德哥尔摩一家小酒馆里的老顾客的形象，如妓女乌拉和温布莱德、假发匠人莫维兹、酒馆乐师贝格神父和下士莫尔贝格等。他们在酒馆里纵情畅饮，议论着街头巷尾的是非风波、秽事丑闻，而弗里德曼这类身居社会底层的市井小人的那个粗俗下流的世界被贝尔曼

用他的天赋才能加以升华，描述得如同诗一般的美妙，于是不道德的行为便摆脱了卫道士说教的羁绊，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豪爽风流之举，例如在《弗里德曼之歌》的第三十八首《一个乡巴佬的妻子》中有歌词这样唱道：

一个乡巴佬的妻子楚楚动人，
约瑟夫爱上了便去勾引。
抓住了他的大氅叹息说道：
喔唷唷，快坐下快坐下。
于是床单下长出最美的玫瑰，
等待着约瑟夫伸手去捋摘，
可是他却像个流氓逃之夭夭，
他们都这么说，都这么说。
唉，倘若我真的身临其境，
唉,如果我同约瑟夫换个位置，
我知道我早就会成其好事！

当然，这两本集子中收集的也并不全是粗俚俗气之作。有些歌谣如《向古斯塔夫敬杯酒》歌词优雅之至，也是古斯塔夫三世最喜爱并且不断要人吟唱的祝酒歌。在《弗里德曼之歌》里的另一首《致爱神和酒神》，显示出贝尔曼以流畅的语言写出欢快的诗歌的风格：

爱神和酒神
　　我且为他们干杯！
这两位神灵
　　男女老少人人都喜欢。
一个让我神魂颠倒，

另一个使我身体轻飘飘。
他们两人不可分离
那是因为
巴赫[1]把阿斯特里德[2]
　　打扮得更美丽俊俏。
十五岁的妙龄姑娘
　　和满杯的美酒
是人世间的恩物
令我快乐逍遥。
哦,我平生无大志
只想当上
爱神的护花使者
酒神的贴身侍从。

正因为贝尔曼诗歌的歌词动人,曲调优美,所以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欢迎，一直吟唱至今。在瑞典不但有贝尔曼的雕像和每年一度的贝尔曼节狂欢游行和演唱会，而且在 1920 年设立了‘贝尔曼奖”，向有成就的瑞典诗人、作曲者和歌手发放奖金。由于贝尔曼诗歌的深远影响，古斯塔夫时期亦被称为贝尔曼时期。

第四节　挪威启蒙时期

一

启蒙时期一词顾名思义是传播新思想，打破愚昧和迷信的束

① 酒神之名。
② 爱神之名。

缚，就欧洲国家而言大抵如此，都是旨在打破以往两个世纪的宗教黑暗时代和君权神授的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愚昧无知，为资产阶级兴起传播新思想。只是时间上有早有迟，程度上有深有浅，范围上有广有狭。而在挪威情况则出入颇大，从 1715 年那个自称‘朕即国家”的法国皇帝太阳王路易十四之死到 1815 年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上去的一百年里，挪威几乎是无声无息、毫无动静地充当欧洲大陆上汹涌澎湃的启蒙运动的旁观者。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受到的冲击亦是巨大的，主要是在丹麦和瑞典，对挪威所造成的影响甚微，虽说有些思想传播，然而只能说是些涟漪而已。这不仅是由于挪威僻远一隅的地缘关系，更主要的是从 17 世纪末起挪威终于摆脱了三个世纪以来困扰危害不已的黑热病的流行和长期的饥馑。从北方大战结束以来，挪威除了 1717—1718 年遭受瑞典卡尔十二世的短暂进犯之外，挪威享有了几乎近百年的和平，从而使得挪威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人口不再急剧下降，而是迅速增长，从 1660 年到 1800 年的一百多年里人口翻了一番，由不足 40 万增长到了 88 万，已经接近丹麦本土的人口。人口迅速增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黑死病流行结束后，从德国、英国、爱尔兰涌入了大量的移民。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这就使得原本萧条的城乡全都活跃起来，经济得到了恢复并且有了较明显的增长，尤其是渔业、海运和林业更是日益繁荣，挪威有了第一支自己的商船队，加快了海上贸易和运输。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使挪威摆脱了饥馑，粮食、肉类和鱼类都自给有余，并且接济了处于粮荒之中的丹麦。如果同遭受战乱之苦的丹麦、瑞典相比，挪威的经济状况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挪威的农庄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却欣欣向荣。挪威人民生活较前殷实，抱怨也大为减少，民心较为稳定。由于经济的好转、农庄的富足，挪威在丹挪联盟中的地位也较前强硬，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不少行政事务实行自治，对宗主国丹麦也不再低声下气了。在文化上挪威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挪威于

1765 年建立起了卑尔根交响乐团,1760 年建立了特隆海姆王家科学院。但是挪威毕竟还是相当闭塞落后的，和丹麦、瑞典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挪威直到 1643 年才有书籍印刷,整个 18 世纪并没有办起什么刊物和报纸。全国各地仍盛行巫术，1560 年至 1700 年之间有 850 宗被控告为巫术的重案。暴力犯罪亦很普遍，未婚母亲杀婴溺婴更是时有发生。由于文化的不发达，欧洲启蒙思想虽然传入挪威,但只在奥斯陆(当时的克里斯钦尼亚)、卑尔根和特隆海姆这些城市的行政管理阶层和商人中的极少数家庭中产生一些影响，而这部分大抵是丹麦人、德国人和人数不多的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他们由于有语言文字的障碍而对挪威当地社会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况且挪威当时文盲十分普遍，直到 1742 学校法实施之后，穷苦人家的孩子才有了更多机会上学。因而在整个 18 世纪,挪威的思想界、文化界几乎是波澜不兴的。

二

正如平静的海面底下会汹涌激流，沉寂的峡谷会发出震耳的回响一样，挪威的沉静之中正在酝酿着激情和巨响，那就是挪威的民族主义感情。挪威由于是丹麦的‘海外省”,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都处于屈辱的地位，在文学上也处境十分尴尬。大多数挪威作品都是用丹麦文写成的。18 世纪最主要的喜剧大师出生在挪威而居住和写作却在丹麦，并且通常被公认为是丹麦作家，连霍尔堡本人也如是说，尽管挪威把他看成是挪威作家,而挪威文学史 18 世纪除了霍尔堡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正因为如此，民族感情受到伤害的挪威人不愿看霍尔堡的喜剧，并且认为他有意歪曲挪威同胞的形象来给丹麦人作为笑料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挪威首都仅有的几个剧场甚至抵制霍尔堡的喜剧，而宁可上演英国理查逊、法国伏尔泰和德国莱辛的情感剧以及挪威的剧作家写的情感剧，因而挪威当地和霍尔堡本人都处境颇有尴尬

之处。当时挪威民族主义最为激昂的作品是杰哈德·舍宁(1722—1780)所著的《挪威史》(三卷本,1771—1773)。在这部《挪威史》里，日耳曼民族被说成是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而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初又起源于挪威，因而挪威人不言而喻就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人的祖先。杰哈德·舍宁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另一个高论是：自由的摇篮在挪威，正是挪威人把自由这个概念送给了欧洲人。他的第一个论点显而易见是牵强附会的，当时瑞典的文学家达林在《斯维亚王国史》里甚至言之凿凿地证实北欧诸国是在基督降生后不久才出现的，起初只是大海中的群岛。至于舍宁的第二个高论固然失之偏颇，却也不无道理，因为当时挪威的农民确实享有充分的自由。挪威没有大贵族大地主，因而也就没有多少人身依附（除了少量蓄奴之外），不像丹麦的农民在大贵族地主兼并下失去了土地牲畜，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必须作为大庄园的佃农或雇工。当时挪威大多数农民是自由农，农庄虽然都规模很小，但却是农民自己拥有并自主经营的，这同丹麦的农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挪威人当时常说"我们虽然丧失了国家,但是仍保全了自由。"舍宁还满怀着深厚的民族主义热情编纂了斯诺里·斯图鲁松的《挪威列王传》即《海姆斯克林格》(1777—1780)来激发民族意识。因而，舍宁的论点虽然偏执甚至荒谬，但是毕竟不同于瑞典的鲁德贝格主义。在舍宁的带动下，挪威的诗人们亦纷纷仿效，创作出不少歌颂自由、赞扬挪威农民并贬损丹麦的诗歌。成立于 1771 年的"优美和实用科学促进社"、成立于 1759 年的"雅社"等团体更是设置重奖来予以推动。获奖诗人汉斯·布尔(1739—1783)在《幸福的农民》一诗中写道：

每个地方都在劲头十足地干活
这里在新犁过的土地上播种，
那里在锯出可供应用的木板，

山上的土特产也都收获下来。
而没有骨气的奴隶逆来顺受，
忍受着毫无吸引力的生活，
自由的挪威农民浑身充满力量，
活计干得越欢腾劲头更增加。
他为拥有农庄的一切而自豪，
他的权利不受任何约束限制。
正因为如此他的苦也变成甜，
正因为如此他的担子就减轻。

不难看出，诗人在歌唱挪威农民的幸福的同时也对逆来顺受的丹麦农民寄予莫大同情，而这恰恰是挪威举国上下所喜闻乐见的对宗主国的揶揄和鞭挞。

三

挪威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虽然缓慢而微小，但也不是一点没有。在欧洲国家中，挪威受到英国的影响最多，尤其是英国的散文作家，如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等。产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和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英国感伤主义在丹麦没有什么市场，在瑞典响应者也很寥落，但是在挪威却引起了共鸣。感伤主义用感情和仁爱代替理性作为批判工具，歌颂善良和忘我，但也往往故作多情，流于造作。感伤主义作家们笔下的人物迂腐可笑，但又天真可爱。欧洲的不少作家都深受其影响，如法国的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德国的海涅、施莱格尔等，伏尔泰还将斯特恩赞誉为“英国的拉伯雷第二”。感伤主义也是宣泄愤懑慷慨的民族主义的最佳载体，因而在挪威大行其道。1763 年挪威出现了第一家报纸《音讯报》，1783 年挪威又出版了《智慧女神》月刊，这是一份类似英国《观察者》的刊物。这份月刊上既刊登丹麦启蒙作

家的散文诗歌，包括霍尔堡的诗体书信，也大量登载挪威的感伤主义作品。

在整个启蒙时期挪威除了感伤主义流行之外，还汹涌着一股强烈的潜流：禁欲主义色彩浓郁的虔信主义。虔信主义源于德国新教徒用以反对路德教派的正统观念和教会日趋官僚化，在 18 世纪 20 年代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在挪威战死前后传入挪威。丹麦的虔信派诗人埃瓦尔德以及与霍尔堡同时代的汉斯·布鲁森（1694—1764）都在挪威受到很大欢迎。布鲁森的作品几乎都成为挪威人的最爱,他的最后一首圣歌《天鹅之歌》（1765）由挪威作曲家格里格配上了挪威民歌曲调，成为一首在挪威家喻户晓、人人会唱的歌谣，也成了美国的挪威移民的思乡曲。

克里斯钦·图林（1728—1765）是挪威最有名的虔信派和感伤主义作家。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曾一度担任过克里斯钦尼亚市长之职,他的两首长诗都获得了‘雅社’的重奖,其中《航运,它的起源与功效》（1760）以优美的亚历山大诗体描写了大航海的黄金时代，以及人类的贪婪和暴力招致了它的毁灭。图林的长诗《五朔节》文笔之优美可与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的名诗《春天颂》（1742）、《墓园挽歌》（1750）相媲美。和霍尔堡处处仿效法国文学不同的是，图林是跟随英国诗人写诗的，因而他的笔调颇有英国派，如他的第二部获得“雅社”重奖的长诗《创世的美德》几乎同蒲柏的《人论》（1773—1774）如出一辙。他的感伤抒情诗也明显地模仿爱德华·扬格轰动欧洲的名诗《夜思》（1742—1745）。可惜图林英年早逝，只活到三十六岁就去世了，以致他的才华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图林之后较为有名的虔信派作家是彼得·斯坦纳松（1723—1776），但是他并不追随英国派诗人，而是受到当时侨居丹麦的德国诗人克洛卜施托克的影响。

四

1772 年春“挪威社”在哥本哈根建立是挪威民族意识和独立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也标志着挪威知识界的爱国主义情绪更趋高涨并进入了一个更成熟的阶段。

“挪威社”的成立虽说酝酿很久,但却是由于一桩偶然事件所催生促成的。当时在哥本哈根的挪威留学生人数众多，他们深感低人一等和丧国之痛的屈辱，他们的领袖是曾经出任过挪威特隆海姆市长的尼尔斯·布雷达尔(1732—1778)。他写出过第一部丹麦文的歌剧《格朗姆和西格内》(1754)并因而被聘用为哥本哈根王家剧院经理。但是他的第二部歌剧《赛伊达的王位继承者》(1771)却受到了丹麦戏剧杂志的粗暴抨击和否定。布雷达尔写了一个闹剧来讽刺此事，但是在公演时却被哥本哈根的大学生们嘘得停演了。布雷达尔只得辞去剧院经理的职务。这场风波闹得很大，以致埃瓦尔德在 1772 年以此为题材写了一出悲喜剧《残酷的喝倒彩者》。在丹麦的挪威留学生的民族感情受到了极大伤害，终于在 1772 年 4 月底成立了以振兴挪威、争取挪威独立为宗旨的“挪威社”。“挪威社”成立初期有社员二百多人,其中二十多人是挪威青年作家和诗人，曾出版过三部文集(1775、1783、1793)为争取挪威的独立和鼓吹丹挪联盟解体而呐喊呼号。

“挪威社”初期的领袖人物是诺达尔·布鲁恩(1745—1816),他最著名的祝酒歌《为巨人之家挪威干杯!》(1772)被认为是“挪威的马赛曲”,歌词慷慨激昂,歌中唱道:“有朝一日我们会再觉醒过来，打碎我们身上的桎梏和锁链。”这首歌遭到丹麦当局饬令查禁，但是“挪威社”私下印刷并传播，因而一直流传至今。布鲁恩还创作出挪威第一部民族戏剧《埃纳尔·托姆斯基弗》(1772),该剧描述了这位十一世纪挪威北部的体育竞技者和民族英雄的生平。布鲁恩领导“挪威社”的时间不长,后来他返回挪威出任卑尔根主教。

在他之后，“挪威社”的核心人物是被誉为“挪威的贝尔曼”的赫尔曼·维塞尔(1746—1785)。其实，维塞尔与贝尔曼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他的作品严谨保守而纯洁，从不涉及类似醇酒妇人放浪形骸的题材，他不懂音乐更不会作曲，因而他的歌曲都是由另一个严肃的作曲家配谱的；他得到的声誉是由于他的诗作格调优美，受欢迎的程度不在瑞典的贝尔曼之下。他是“挪威社”中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当时丹麦文坛上最擅长于亚历山大诗体的著名诗人，他的名声仅稍逊于霍尔堡，但是挪威人仍把他看成是挪威作家，而把霍尔堡只看成是丹麦作家。维塞尔的代表作五幕悲剧《没有袜子的爱情》(1772)已经成了挪威和丹麦戏剧中的经典之作，讲的是在婚礼当天主人公找不到颜色合适的紧身长袜，但是婚约佳期又不能更改，因此只得去偷窃情敌的那双，以致引出一连串的误会，造成悲剧的结局，男女主人公、情敌和男仆都喋血丧生。维塞尔的作品乍看起来往往离经叛道、荒谬可笑，但细细一想却又在情理之中。另一篇名作，韵文滑稽故事《铁匠和面包匠》(1784)，讲的是丹麦法庭审案：铁匠犯了谋杀案，法庭却把毫无过失的面包匠判刑处决，其因是村里有两个面包匠而铁匠却仅此一人。高度的缺乏真实和艺术风格的完美融合在一起便产生出荒诞不经的可笑效果，这便是维塞尔作品的特色。他在艺术风格上几乎做到了极其完美的地步，严格地遵循法国古典主义的经典理论和法国诗人尼·布洛瓦(1636—1711)在《诗艺》中所阐明的各种规律，包括“三一律”，因而成为挪威剧作家和诗人的典范，直到 19 和 20 世纪还有不少人仿效他。

“挪威社”的第三任领导人物克劳斯·法斯丁(1746—1791)在才华和名声上远不如布鲁恩和维塞尔，他是个著名的记者，擅长写游记和自然风光。在他的带动下涌现出一批描写挪威自然风光的诗人如托马斯·斯托克弗莱(1748—1808)、彼得和克劳斯·弗里曼两兄弟等。斯托克弗莱用当地方言写成了长诗《回家》(1771)，从

而开拓了用新挪威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

“挪威社”后期的代表人物是《智慧女神》月刊主编克里斯钦·普朗姆(1756—1821）和激进诗人尼古莱·韦格朗(1780—1848)。普朗姆也是18世纪挪威惟一的短篇小说家。尼古莱·韦格朗则在卢梭的《爱弥儿》的影响下写出了不少激励的诗篇，呼吁解散丹挪联盟和挪威重新独立。由于他的“反丹麦”立场十分鲜明，他成了众矢之的，在丹麦当局的迫害下终于无法在丹麦存身而返回挪威去担任牧师。“挪威社”的后期致力于为建立挪威自己的大学而奔走呼号，1811年这个梦想终于变为现实，这也是沉寂无声却又潜流汹涌的挪威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实际结果。

第五节　芬兰民族文化初露朝霞

一

从1155年瑞典对芬兰发动十字军东征起，开始了瑞典对芬兰的扩张和占领。在长达六百多年的瑞典统治时期里芬兰人民经受了巨大的磨难，芬兰不仅经济发展迟缓，民族文化遭受严密压制和摧残，而且还由于瑞典把芬兰作为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波兰和俄罗斯扩张的桥头堡和跳板，因而战祸连年，不少战争的战场都是在芬兰，而战争更加重了芬兰人民的负担。16世纪芬兰经济文化有了缓慢的增长和发展，瑞典于1581年宣布芬兰为大公国，这一转折使得芬兰本地的贵族阶层拥有一定的自治自主权力。但是瑞典旋即在1596—1597年发动了“棍棒战争”,消灭了与波兰勾结起来叛离宗主国的芬兰大部分贵族。这就使得芬兰的民族力量大伤元气，而瑞典的统治进入了鼎盛时期，建立起完整而巩固的、直接听命于瑞典王室的官僚机构。17世纪瑞典的强国时代是以向东扩张为主要标志的，芬兰大公国的地域也随之往东延伸。而当时经

济落后、实力远逊的俄国不得不步步退缩以避其锋芒。直到 1700 年纳尔瓦战役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仍能以少胜多打败了俄国彼得一世的人数众多却没有战斗力的庞大军队。然而自此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国力有限的瑞典毕竟无法支撑住长期的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1709 年卡尔十二世兵临莫斯科城下，却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全军覆没，一万六千精锐之师成了俄国俘虏，卡尔十二世本人率领残兵败将驻在土耳其达五年之久，1715 年返回瑞典后又出征挪威并于 1718年在挪威战场上阵亡。卡尔十二世为瑞典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经济千疮百孔到了崩溃的地步、政局混乱、阴谋争斗不休。整个 18 世纪瑞典自顾不暇，而在芬兰实行统治的瑞典贵族也由于国内的动荡混乱而丧失了早先的气势，大多是惶然不知所措，色厉内荏地苟延敷衍。这就给芬兰的民族振兴和争取独立造成了机会，人们通常把这段时间称之为"自由"。自由芬兰于 1809 年摆脱了瑞典的统治，但是同挪威脱离了丹麦却又被迫同瑞典结成盟邦一样，芬兰也沦为俄国的一个公国，处境不比早先好，甚至还要严峻。但是在 18 世纪的几十年里，芬兰确实享受到了无人管束的自由。在这段时期里，芬兰的经济得到恢复，民族语言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芬兰文坛历来由用瑞典文创作的瑞典或芬兰作家所垄断，由于芬兰文字出现较晚，因而只有少数用芬兰文创作的诗人能突破语言文字上的障碍而写出具有一定格式和韵律的诗篇，然而这些作品的水准一般不高，优秀的精品真是凤毛麟角，而且仅仅是宗教诗歌。从 17 世纪末期起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用芬兰文仿照芬兰民间诗歌格律而创作的新的世俗题材的诗歌开始大量出现。

1640 年土尔库学院① 的建立对芬兰文化起了催化作用，从 16 到 18 世纪几乎所有用芬兰文写作的诗人都来自这个学院，外国文

①土尔库学院在瑞典语中被称为奥堡大学，1827 年迁至赫尔辛基后改名为赫尔辛基大学。

学的传播也主要依靠它。1770 年在土尔库学院建立了第一个芬兰文学组织“朝霞社”。“朝霞社”也是启蒙思想在芬兰的播种地，它不仅集结了一批崇尚启蒙思想和法国浪漫派文学的芬兰文人，而且在 18 世纪末还涌现出一批推崇康德哲学的学者。但是这段时期并不是姹紫嫣红的云蒸霞蔚，而只是晨光熹微中的朝霞初露，不久又进入了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民族文化充当芬兰启蒙的开路先锋

在瑞典的鲁德贝克主义的濡染下，芬兰的文人学者们也刻意寻根追祖颂扬古代来标榜自己。但是芬兰的文人学者在推行鲁德贝克主义时却力不从心几乎无古可颂。这是因为芬兰地广人稀，本来开化就很晚，历史很短而且难以追溯。芬族的起源是模糊不清众说不一。有的说是公元前 3000 到前 1000 年期间,从俄罗斯乌拉尔山以东的萨米族迁徙至此，也有的说是渔猎时代波罗的海以北地区高塞地带的民族南下等等不一而足，然而他们都忌讳提到他们的祖辈与西迁而来的匈奴有任何血缘关系，虽然匈奴王阿提拉是令人闻而丧胆的勇士并且有“上帝之鞭”的称号。

达尼尔·尤斯莱尼乌斯(1676—1752)却另起炉灶独辟蹊径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在 1700 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土尔库之今昔》中，赞扬芬兰的民间诗歌艺术达到世界水平，其原因不仅由于芬兰民族是一个勤劳而能歌善舞的民族，也不仅由于芬兰风光美丽土地肥沃，更主要的是由于芬兰语是一种历史极其悠久的语言，同希伯来语有很深的渊源。他从芬兰的语言着手，论证出芬兰族是人类新始祖挪亚的孙子即雅弗的儿子玛各的后裔。在挪亚带了他的三个儿子和儿媳乘方舟逃出洪水之后，玛各这一支往北迁徙来到了芬兰居住。他的这一论点大长了芬兰人的志气，因为他们的祖先毕竟不是异教徒而是在《圣经》上有记载的，与匈奴则毫无瓜葛。

他的这一论点连瑞典都无法驳斥只能接受，因为瑞典也有人说玛各这一支迁徙到了瑞典。三年后尤斯莱尼乌斯发表了第二篇论文《捍卫芬兰人》(1703)。他的这篇论文除了歌颂芬兰之外，更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点：芬兰的诗歌是有学问的人和农民共同创造的。这一论点似乎荒谬，但却包含深厚哲理，因为民间歌谣俚曲本来就是由目不识丁的农民所创作的。这一论点也得到了芬兰人的广泛支持，因为“用瑞典文写芬兰诗”的瑞典诗人们历来自觉高人一等而把芬兰人讥嘲为只会干活的农民。尤斯莱尼乌斯的第三篇论文是关于芬兰语和希伯来语的异同之处。到了晚年，尤斯莱尼乌斯还编写了《芬兰语、拉丁语、瑞典语字典》(1745),这是他长期研究的结晶，也是第一部芬兰语字典，对民族的启蒙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波萨时期

纵观芬兰历史,从 12 世纪到 18 世纪被瑞典入侵、征服乃至占领这六百多年时间里，芬兰一直生活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之下，它和挪威僻处一隅可以偏安的地理环境不一样，不论是瑞典向东扩张或是俄罗斯朝西拓展都绕不开横亘其间的芬兰，于是芬兰只能成为它们侵略蹂躏的对象，而当它们火并开战时芬兰便备受战争的荼毒。因而芬兰所遭受的民族苦难比起当时处境大致相同的挪威来要深重得多。这也是芬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这也使得芬兰的民族文学作品往往蒙上了一层悲伤而壮烈的情调。芬兰经受的战火兵燹和直接战争损失最多的还是在 18 世纪和 18、19 世纪交迭之时。1710—1721 年卡尔十二世兵败波尔塔瓦以后的大溃退,史称‘大天罚时期’;在 1714—1743 年瑞典发动‘复仇战争’又遭致失败,史称‘小天罚时期’。1788—1789年瑞典古斯塔夫三世虽然发动对俄战争，由于芬兰的瑞典贵

族军官组成‘安雅拉同盟”,进行分裂哗变来争取脱离宗主国,结果这场战争很快夭折造成损失不算太大。1808—1809 年芬兰战争，俄国军队不仅横扫芬兰全境，还攻占了瑞典本土的北方重镇尤米奥。由于战争失败瑞典不得不将芬兰全部领土（包括奥兰在内）都割让给俄国。

亨里克·波萨（1739—1804）是芬兰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民族文学的主帅，因而后世把他生前的时期称为“波萨时期”。波萨出生于芬兰北部的牧师家庭，后来又在瑞典人聚居的厄斯特布登上学，因而对芬兰文和瑞典文都十分精通。他 1760 年毕业于土尔库学院，一直在学院里工作，从图书馆员升任至教授。

波萨与其说是个文学家倒不如说是个杰出的人文科学家更为确切。他用瑞典文和拉丁文创作的诗歌颂扬了芬兰的自然风光和英雄人物，其语言流畅，音乐感强。但是波萨之所以会成为一代宗师并非由于他的诗作，而是他做了几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

首先,波萨在芬兰语言文字研究上经过多年辛勤工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被后世证明是惟一正确的。他在多篇论文中以大量的历史材料论证了芬兰语归属于芬兰一乌戈尔语系。他还精通匈牙利语，因而确定了芬兰语和匈牙利语的近亲关系。他的这一论点大胆地推翻了芬兰学术界以前盛行的芬兰语是归属于古希腊语系的定论，从而也否定了芬兰启蒙文学的创始者，他的长辈与恩师尤斯莱尼乌斯关于芬兰语和希伯来语的渊源关系的论证。这样的力排众议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但是波萨以实事求是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真理，修正谬误，树立了芬兰民族文化中的典范。波萨在晚年编写了芬兰语词典，可惜未能完成。他的弟子克里斯弗里德·加南德(1741—1790)也编纂完成了《新芬兰语字典》（1787）,但直到 1937—1940 年才得以印刷出版。

波萨从事的另一项重大事情是他的历史著作,他撰写的《芬兰主教编年史》（1784—1800），是一部立论严谨的中世纪历史教科

书，不仅反映了芬兰中世纪的全貌，而且还批判了前人对芬兰古代史研究中的不讲科学、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否定了前人对芬兰民族起源的一些不实之词，包括尤斯莱尼乌斯关于芬兰人是挪亚的孙子、雅弗的小儿子玛各的后裔的后裔，并且不避讳芬兰族与匈奴族的血源关系。正因为他以这样严谨的科学态度在历史学上拨乱反正，奠定了芬兰历史学的坚实基础，批判了鲁德贝克主义的随心所欲的唯心史观，所以被后人誉为“芬兰历史之父”。

波萨在芬兰民族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的文学理论著作《论芬兰诗歌》（1776—1778），这是他长期从事搜集和研究芬兰民间诗歌的重大成果，也是芬兰的第一本文学理论专著，堪以与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法国布洛瓦的《诗艺》相媲美。书中论述了芬兰民间诗歌的形式、内容和艺术特色，指明了研究芬兰民间诗歌的正确道路,后来诗人埃·伦洛特就是遵循了他的理论编成了不朽的芬兰民族史诗巨著《卡勒瓦拉》。

波萨是芬兰启蒙运动的旗帜，他赞成德国哲学家弗·沃尔夫的观点，即荷马史诗不可能是荷马一人写成而是群策群力所创作，最后由荷马编纂而成。他也接受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反对天赋观念说，但是对于明确对旧世界做出批判的理性唯物主义的康德哲学就难以接受。对于具有鲜明民主主义和鼓吹人性人道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德（1744—1803）的民歌文艺理论,波萨也只是部分地吸收，因而他要比赫尔德更为保守。波萨作为芬兰启蒙运动兴起的旗帜是由于他主持成立了芬兰第一个文学组织“朝霞社”（1770—1780），创办了芬兰第一份瑞典文报纸（1771—1778）和第一份芬兰文报纸（1775—1776）。这两份报纸都是仿效英国的《观察者》周刊,宣传启蒙思想和观点的。“朝霞社”坚持十年之久，不仅促进了芬兰民族文学的发展，并且造就出一批很有名气的诗人和作家，这在当时的北欧国家中是较为罕见的。

四
浪漫主义开拓者弗朗兹

弗朗士·弗朗兹(1772—1847)是芬兰浪漫主义的开拓者。他出生于商人家庭，从土尔库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那里工作并晋升为教授。1811 年被迫离开芬兰侨居瑞典郁悒而终。

弗朗兹一生都用瑞典文写诗，但是采用芬兰民歌格律和形式，因而仍能体现芬兰的民族特色。他的诗作格调清新，感情浓郁，常常把对自然风光和内心怀古的描写相互呼应，来烘托出气氛。弗朗兹反对一味模仿古希腊罗马的史诗程式，并主张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走出一条芬兰诗歌自己的道路。

弗朗兹的代表作有《老兵》(1793)、《新伊甸园》(1794)、《芬兰的沃野》(1800)和《拉毕之夜》(1802)等。但是正当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期之际，他却在俄国和亲俄的芬兰统治上层的胁迫之下，不得不逃离芬兰。他在侨居瑞典的年代里虽然也创作了一些诗歌和剧本，但大多是历史题材，而且也缺乏在芬兰时的灵感和生气。在波萨去世,弗朗兹避居瑞典之后“朝霞社”中用瑞典文写作的文学家便凋零星散,芬兰文学中的‘瑞典年代’便从此中断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俄国的控制和影响。

第四章　19 世纪初期北欧文学

第一节　概述

19 世纪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且向上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文学空前繁荣的时期。各文学史对这一时期开始的年代以及划分时间的方法，在说法上各有不同，但一般都从 18 世纪 80 年代算起。北欧各国也可以从那时，即瑞典的后古斯塔夫三世时期算起，虽然各国差异巨大而明显，尤其是芬兰和冰岛。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继成为当时的主要文学潮流，从 19 世纪初在欧洲大陆迅速发展，并且在许多国家文坛上占据主流地位。在时间段落的划分上，各文学史也不尽相同，大体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划分方法。其一是两时段法，即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到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上半期，1848 年起至 1889 年第二国际成立为下半期。这种方法显而易见是从政治形势发展着眼，以意识形态的兴衰来划界。另一种划分方法是：1789 年左右至 1830 年为 19 世纪文学的初期，即法国对古典主义文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从 1830 年至 1870 年为 19 世纪文学的中期，在这一阶段里，最初兴起的英国浪漫主义已接近其尾声，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和北欧地区浪漫主义仍是文学潮流的主流，但现实主义已崛起并初露锋芒。1870 年至 1900 年前后是 19 世纪文学的末期。这段时期里法国的现实主义显露出后劲乏力的窘迫，而北欧各国却

步入其文学上的辉煌时期，形成了一个高峰，在这些黄金年代里涌现出来的文学巨匠和大师至今似乎尚无北欧作家能够超越。这一划分方法显然是较为符合适应当时文学潮流的趋势，也是本书所采用的。

整个 19 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上取得胜利并向上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先是推翻封建王朝从王室贵族阶级手中夺取统治权，后来又与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无产阶级斗争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矛盾逐渐退居到次要位置，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反复斗争成为主导今后漫长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

19 世纪的主要特点是阶级矛盾和斗争极其错综复杂，资产阶级在与封建阶级斗争中所面对的是一股远比自己强大的势力，非但不能摧枯拉朽般轻而易举地取胜，而且往往被封建阶级所击败摧溃,19 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组成十次反法联盟终于打败拿破仑并且扶植了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便是最好的例证。而在 19 世纪后半期所面对的是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无产阶级。虽然当时无产阶级还很弱小，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巴黎公社革命已足资证明它是完全能胜任地担当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角色。因此在 19世纪革命风云迭起，战争连绵不断，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而其程度之激烈和规模之广阔均远远超过了以往十几个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激烈的革命和起义、严酷的镇压和复辟，以及急剧变化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地位等各种因素决定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特点，使它不论在思潮流派、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等各方面都比以前几个世纪更为丰富多彩，构成了欧洲文学的一个高峰，产生了不少至今还尚未超越的巨匠大师，既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兴盛期。如果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界定的话，可以说 19 世纪文学不仅为后来的 20 世纪文学开拓和铺平了道路，并且其成就亦决不小于 20 世纪,在整个

欧洲是如此,在北欧地区更是如此,因而 19 世纪的文学发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产业革命首先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发生,从棉纺织业开始逐步发展到采掘、冶金、机器制造、运输等行业。80 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采用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强大而廉价的动力来源，促成了工业的进一步迅速发展，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末产业革命在英国已基本完成，而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在此时才先后走上产业革命的道路，北欧地区则在 19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这一进程。产业革命既是生产力的巨大革命，又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将整个社会推进到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遥遥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不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而且在哲学思想、文学创作等上层建筑方面也是如此。然而正是由于英国过于领先超前，其他欧洲国家难于望其项背，因而它对于欧洲大陆的文学影响反而较为淡薄。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新时代，这场革命以暴力手段摧毁了封建统治，为法国资产阶级从封建阶级手里夺得了统治权，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在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欧洲其他国家的反封建进程也得以加速。

1794 年法国大革命从最高潮跌入了低潮，以恐怖手段来打破封建专制、夺取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雅各宾专政被推翻。大革命虽然结束,但不仅旧的矛盾没有解决,保王党气焰大增,而且新的矛盾更趋尖锐,民众生活困苦不堪,连续举行起义,新的革命危机正在酝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下,法国大资产阶级要求建立强有力的军事独裁政权，而掌握兵权的拿破仑·波拿巴便成了理想的人选。1799 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建立起独裁政权。1804 年起称帝是为拿破仑一世。拿破仑帝国

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阶段。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其内政外交政策的目的和实质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拿破仑不断对外用兵，到了 1811 年,除了俄国之外,几乎整个欧洲都屈服于他的君权之下。拿破仑的频繁对外战争，不仅是单纯为了对外扩张，而且也是同敌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君主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敌对矛盾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是 1789 年大革命后的法国开辟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它证明了可以用革命手段摧毁掉封建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并且通过与落后和封建的欧洲国家的战争，到处去破坏种种旧的封建形式和秩序，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大陆上生根发芽创造出合适的环境。不过拿破仑虽然把资产阶级的统治带到了被征服的国家，但是他的掠夺也激起了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并且欧洲大陆上封建势力毕竟余威犹存，因而他未能站住脚根。1812 年拿破仑远征俄国招致惨败。1814 年英、俄、普鲁士、瑞典、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攻入巴黎囚禁了拿破仑，波旁王朝在联军保护下得以复辟。 1815 年拿破仑从囚禁地厄尔巴岛逃回巴黎,发动“百日政变”。欧洲各国又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1815 年 6 月 18 日与拿破仑决战于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战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并死在岛上。此后,欧洲大陆便沦于俄、奥、英、普等君主国“神圣同盟”的统治之下。

正如曾经跟随拿破仑大军转战欧洲的法国大作家斯丹达尔(1783—1842)所说,拿破仑的进军“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开辟一个重要的时代”。1789 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资产阶级军事帝国造成法国和欧洲大陆上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后来兴起的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成为推动现代历史的动力。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欧洲许多国家民族意识高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局面。在这段时间里，各种思潮和学说也应运而生，相互之间冲突激烈、矛盾尖锐，乃是这种

历史时期错综复杂而又剧烈迅速变化着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反映。当时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也存在着与三大阶级的矛盾斗争密切关联的三大思潮，即表现封建阶级复辟愿望的宗教神秘主义和教权主义思潮；继承 18 世纪启蒙思想,以《人权宣言》为依据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思潮；反映无产阶级愿望的不成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三大思潮的起伏既与当时阶级斗争历史相一致,又密切影响着 19 世纪文学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哲学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下,19 世纪构成了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即封建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和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在 19 世纪初期欧洲大陆上主要盛行德国的康德、弗希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哲学虽然包含着辩证法，但是却夸大主观作用，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这对于强调主观主义精神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而后来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建立公正和正义的王国，这不仅对后期浪漫主义而且对现实主义的兴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浪漫主义运动是 19 世纪对整个欧洲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运动,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时期的产物。浪漫主义这个词来自拉丁文，原意大抵是幻想虚构而又荒诞怪异的,往往带有贬意｡到了 18 世纪‘ 罗曼蒂克 ’这个词被引申为爱情上风流成性和冒险寻觅大自然瑰丽景色等等具有正面含义的行为。因而浪漫主义成为文学上的重要表现手段,尤其在诗歌方面。

浪漫主义是对 18 世纪理性主义的全面反对，坚决反对理性主义和对人类本性的抑制束缚，而社会结构森严壁垒的城市和扭曲扼杀人类灵魂的宗教都是理性至上的罪恶渊薮，因而浪漫主义往往主张逃离城市､回归自然､背弃现实､宣泄自我,到大自然中去寻求解脱，并赞美创造这种奇迹的造物主。

浪漫主义强调怀古和想像。浪漫主义的想像不仅有形成虚构

和提倡愉悦的思维功能，而且成为认识、理解和交流真理的方法或途径。浪漫主义沿袭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传统来探寻更完美超脱的精神境界，因而宗教神秘主义、教权主义便作为对抗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论和启蒙思想的对立面被抬了出来，并且加以诗意的美化，从哲学上把人类认识归于神的启示，并以唯心主义的观念程式把社会历史变化解释为神的意志决定王权专制和等级制度的秩序的永恒。

浪漫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只是一股潮流,因而无法以政治态度或思想表现来分野或代替艺术成就，不能人为地划分出积极和消极的类别，或者是贵族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两个范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浪漫主义运动的确包括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表现，从革命的到反革命甚至镇压革命的，从不满宗教、反宗教的到鼓吹宗教的都包括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之中，而且它们各自有自己造诣很高、遐迩闻名的代表人物，有一批艺术价值很高的文学作品，这是在 19 世纪之前所不曾见到过的。应该说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伊始旨在冲破旧传统和体制的束缚，因而浪漫主义的产生几乎与法国大革命同步，这场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浪漫主义理想的政治实践，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理性社会的情景在革命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同时也冲垮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因而文学在最初的激情慷慨之后便经历失落和重新探索的痛苦过程,难以自拔地‘ 寻求 ’虚幻妄诞的国土,或是谎言与诗歌的“ 世界 ”,抒发失望苦闷、消沉阴暗以及悲观颓唐的情绪,如果说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初还继承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和《忏悔录》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奔放热情和不羁个性，那么到了法国复辟时期前后就多半失落在缅怀过去、哀叹命运乖蹇的感慨，或是沉溺于对玄妙而神秘的彼岸世界的探索向往之中。

浪漫主义文学是以反对从 17 世纪以来统治欧洲文坛的古典主义而起家的。从 17 世纪以来古典主义曾起过进步作用，但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却已沦为束缚作家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教条戒律。但是不少浪漫主义作家也借鉴撷取了古典主义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事实上，在 18 世纪的感伤主义文学、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和英国的前浪漫主义文学中已表现出不少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更是被浪漫主义作家们奉为经典。此外，18 世纪后半叶欧洲许多作家所搜集的民间文学和当时流行的以古堡闹鬼为主要题材的哥特式小说也对浪漫主义文学施加了影响。

虽然浪漫主义文学之间差异很大，但是其艺术表现手法还是有不少共同特征。一个重要特征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大多描写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特别着重描写作家个人的主观世界和对事物的内心感受和反应。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着力于描写大自然景色，抒发作家对大自然的感受，并且往往要把大自然的美同现实的“丑”加以对比，大自然被看做他们精神上的寄托，甚至蒙上厌世的神秘宗教色彩，因而他们从大自然里去寻求神的启迪。

在资本主义和产业革命最发达的先进国家英国，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已经矛盾重重、弊端纷繁，尤其是贩卖奴隶、工人穷困和贫富悬殊暴露出资本主义的痼疾。1775—1783 年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更激起了英国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加深了英国同苏格兰、爱尔兰的民族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洛克的经验哲学和理性主义失去了控制，浪漫主义便在对工业化的恐惧和憎恶中应运而生。布莱克在他的著名长诗《弥尔顿》（1804—1808）中曾写道：烟囱林立、被漆黑工厂包围着的城市分明是恶魔撒旦的作品，何以能成为耶路撒冷？而诗人心目中理想的耶路撒冷则是他在另一部著名长诗《耶路撒冷》（1820）中所说的“基石是怜悯、砖头是温情，油漆是爱和仁慈”。诗人还把自然神论和经验论都称之为真正的撒旦。只有温和、善良的救世主才能改造恶魔和暴君。这就是诗人作为预言家要传播的耶稣福音，也就是超越自我、扩展视野与相

互谅解的法理。但是英国资产阶级直到 1830 年才真正赢得统治权，对浪漫主义开始是宽容和支持的，因此出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繁荣局面。继罗伯特·彭斯(1759—1796)之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大致分为第一、二两代。英国第一代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威廉·布莱克(1757—1827)、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和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和济慈(1795—1821)。英国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在年轻时正好赶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他们作为热血青年，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为革命热情所鼓舞而放声讴歌支持革命风暴。华兹华斯在《序曲》一诗中写道"法国站在黄金时代的顶峰上,人性似乎获得了再生。"然而接踵而来的革命暴力专政和拿破仑上台粉碎了他们的梦幻，于是他们转而反对革命手段。他们的理想火花在年轻时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得到过短暂的迸发，随后就经历了失落和重新求索的痛苦过程。布莱克转向接受瑞典斯维登堡（1688—1772)的神秘论和通神论，从中寻求思想寄托，而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都转向保守，成为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更被册立为英国的"桂冠诗人"。而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成长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年代，他们的理想从一开始就遭到严酷现实的压制，保守力量因害怕再次出现革命而严厉压制自由思想。这种高压更激发了诗人们的反抗意识，尤其是拜伦和雪莱，他们继承了启蒙思想和民主主义传统，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以自由、博爱、平等的口号来追求社会进步和个性解放,支持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北欧的文学产生了相当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布莱克和拜伦。必须看到的是英国浪漫主义对北欧浪漫主义的兴起所施加的并不仅仅是流派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而且是整整一套思维方式的影响。诗人们寻求人生真谛和精神完美，亦即放纵情感和推崇想像。济慈曾说过，他只相信两样东西是神

圣的，其一是人心产生的情感，其二是想像告诉人们的真理。其实推崇想像就是推崇诗人，因为诗人最富有想像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诗中探寻人生真谛和宣扬精神自由。正如布莱克所说：“我不见外在的造物,对我来说它是障碍,而非动态 它如我脚上的尘土,并非属于我本人。我怀疑自己肉体或被动的眼睛，正像我怀疑一个面向景色的窗子,我看穿它,而非用它观看。’正是这种推崇想像力的思维促成了北欧作家们对一个面向景色的窗子产生怀疑，看穿它，而非用它观看。

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另外两个大国，德国和俄国依旧处于死水一潭的局面，政治经济都处于落后保守和闭关自守的状态。法国大革命如同飞石击浪一般在德国和俄国引起了反响，但仅仅是死水微澜而已,因为德俄两国直到 19 世纪初还没有像英法那样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出现。

1806 年拿破仑击败奥俄联军,灭亡了神圣罗马帝国,组成‘莱茵联盟”，实施一系列有利于扫除封建势力和扶植资产阶级的改革，而入侵造成的掠夺和奴役却激起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激发了民族意识高涨。1815 年后德国在经历了反拿破仑战争胜利之后，国家并未统一，政治经济的落后并未改观，惟一的变化是在奥地利的控制之下组成了“德意志联邦”，由原来近三百个小国合并为三十四个国家和四个自由市。

德国历来是产生哲学家的地方。当时德国的哲学家同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如康德不仅以“纯理性批判”建立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而且他关于天才、自由、艺术即游戏的观念构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基础；而他把艺术和审美活动认为是自然界和精神界之间的桥梁的这一观点为古典主义的席勒所采纳。黑格尔则发扬了德国哲学中的辩证思想，从而在文艺理论中确立了历史发展的观念。在德国从莱辛(1729—1781)开辟了德国民族文学的道路以来,狂飚突进运动进一步解放了德国作家的思想，歌德和席勒这两个伟

大的作家合作十年，创造出大量的不朽作品，这标志着德国民族文学的最后形成。德国古典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虽然明显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推崇人道主义，并把人道主义作为寻求的最高理想，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让他们直抒胸臆地倾吐，他们只能抱着美好的愿望把目光转向过去，从以往的辉煌中寻求理想国，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正是这样人物的写照。所不同之处在于德国古典主义派大多以古希腊、罗马作为典范，而德国的浪漫主义派则推崇中世纪。德国浪漫主义从 18 世纪末兴起,延续到 19 世纪 30 年代，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并未能把古典主义取而代之，却和古典主义呈交叉状态并存，这是因为古典主义的歌德和席勒无论在名声和艺术造诣上都是浪漫主义作家所无法媲美而只能瞠乎其后，虽然浪漫主义拥有大量的作家。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可分为耶拿派和海德堡派。前者以从事浪漫派的探讨和确立为主，代表人物为施莱格尔和哲学家费希特和谢林。后者致力于创作，尤其为在童话、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民歌等方面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代表人物为格林兄弟（雅科布 · 格林 1785—1863 威廉 · 格林 1786—1859)等人。

19 世纪初俄国仍是个农奴制度盛行的落后的封建国家，虽然从普加齐夫起义(1773—1775 ）以后农奴制瓦解的征兆已十分显著，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成长发育，而法国大革命和 1812 年拿破仑举兵入侵俄国都在俄国造成了一定的震撼。 1816 年起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青年军官先后结成许多秘密团体，并且在 1825 年 12 月发动反专制反农奴制的起义，史称十二月党人运动。起义失败后，十二月党人或被处死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组成‘ 文学爱好者协会 ’、‘ 绿灯社 ’等文学团体并出版刊物。十二月党人的文学主张和其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纲领是相一致的，认为文学应反映时代精神，表现爱国和革命的思想感情，应关心人民的命运和疾苦，并且主张民族的独创性文学，认为民间文学

是诗歌的最好源泉，并反对单纯模仿外国。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活动促成了俄国当时文学繁荣，从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如普希金(1799—1837)和格里鲍耶陀夫(1794—1892)、雷列耶夫(1795—1826)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创造出了不少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为19世纪以后的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被称为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从文学潮流来看，这一时期的特点亦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并存，相互交错和撞击，并且在后来逐渐形成现实主义。

德俄两国的文学发展对北欧地区产生着各自不同的影响。歌德和席勒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是无可比拟的。俄国的影响主要在芬兰，对瑞典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19世纪的法国文学色彩缤纷、流派纷呈，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在法国文坛上毕露无遗，它们的代表人物各领风骚几年到几十年，并且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传世杰作,盛况是以前18世纪所不曾见到过的，达到了一个至今尚未超越的巅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几乎相当于一部欧洲文学史。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法国作为当时欧洲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大国积聚了雄厚的文化和文学基础。法兰西民族的性格活泼开朗、热情奔放，易于接受感性认识，既不像英国那样过于理性化，也不像德国那样哲学学究气或者像俄国那样忧抑郁闷。而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拿破仑横扫大陆等震撼欧洲、推动世界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把这种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的是19世纪法国文学的蓬勃发展也绝非仅是法国“一己之能”。这个时期外国文学的大量译介对法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法国文学界思想开放是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学的结果。其实浪漫主义文学在英德两国先于法国出现,到19世纪初已经很成气候,而当时法国文坛却仍然为高乃依的伪古典主义所把持。理查逊的小说、扬格

的轰动欧洲的感伤长诗《夜思》、刘易斯的《僧人》和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哥特式小说、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莪相诗集和莱辛的戏剧等先后翻译介绍到法国，成为法国文学和思想多极化的重要因素。

从 18 世纪最后十年到 19 世纪头二十年是法国文学上的一个过渡期，古典主义依然存在，但是其基础却瓦解消蚀，浪漫主义开始流行，二者并存，相互影响。当时法国浪漫主义可分为两种：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德·斯达尔夫人(1766—1817)；贵族浪漫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拉马丁(1790—1869)和维尼(1797—1863)。这两个浪漫主义派别都以使当代人受到强烈感染的艺术形式诗化本阶级的愿望、心境、思想情感和精神状态，他们代表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却又有共有的文学特性，如对思想的追求、对奇特事物的爱好、感情的泛滥、形象和语言的夸张等等，并且成为几十年间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其原因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不仅吓得贵族胆战心惊，也使得资产阶级不知所措。这两个阶级对革命和民众都怀有程度不同的敌对、仇视和轻蔑，都逃亡国外，并对丧失统治、特权和财富抱着失落感，诅咒痛苦的人生，呼唤上帝来解脱改变这一切。由于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政权剥夺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迫使他们流亡国外过着流浪生活，从而许多优秀作品具有共有的特性，丹麦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朗兑斯(1842—1927)在其巨著《19 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中统归入流亡者文学范畴之中。

在这两个阶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之中，斯塔尔夫人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和原则，而夏多布里昂则提供了灵感。斯塔尔夫人著作并不多，除了两部小说《黛尔芬》(1802)和《高丽娜》(1807)之外，主要是两部论著：《德意志论》(1813)和《论文学》(1800)，这两部著作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之作。《论文学》着重探讨古代与现代文学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条件，

并指出古典主义必然为浪漫主义所替代。《德意志论》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了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的区别，北方文学即以英德两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而南方文学则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学，分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性、宗教性和民族性，并且指出浪漫主义具有的几个重要特征，从而推动了浪漫主义的兴起。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评论开启了法国历史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而且也成为格奥尔格·勃朗兑斯日后的文学评论的重要源泉,他的《19世纪文学主流》基本上是沿袭着斯达尔夫人的南北方文学差异论的思路，但是克服了她的一些简单片面的瑕疵。

夏多布里昂为整个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他的两篇很短的中篇小说《阿达拉》(1801)和《勒内》(1802)开创了浪漫主义的世纪。《基督教的诗意》(1802)是夏多布里昂的代表作，书中提出了贵族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即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基督教，因而要求文学和艺术必须与基督教结为一体。忧郁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基督教发扬了忧郁的倾向，因为忧郁是对天国的仰慕向往的表现。所以，他在文学中力求表现“朦胧的激情”。可以说夏多布里昂创造了文学上的忧郁和朦胧派，他通过对废墟、落日、荒原等死亡的意象来表达内心的冲突、感觉的矛盾以及思想与现实的反差。他对忧郁、冥想及朦胧的激情的阐发宣泄了灵魂的不安和混乱。《墓中回忆录》六卷本则是夏多布里昂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宣泄了忧郁孤独的情怀，抒发了怀旧的幽思遐想。夏多布里昂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北欧浪漫主义的文学大师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丹麦的安徒生和瑞典的拉格洛夫固然是深受其影响，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倾向，就连写实主义的作家如易卜生、比昂松和斯特林堡也受其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能找出不少夏多布里昂的痕迹。拉马丁（1790—1869）的《沉思集》(1820)步夏多布里昂的后尘,不仅结束了古典主义统治诗坛的沉寂局面，开创了以充满卢梭意味的简朴而亲切的诗歌表现出

心灵的激荡与宗教感情的虔诚的世纪。不过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过于卷入政治，而且是波旁王朝复辟的极端反动分子，因而在所难免地为世人所诟病，也就限制了他们对欧洲文学包括北欧文学的影响力。

在 19 世纪初,北欧诸国无一不是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到 90% 左右,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才出现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 1870 年哥本哈根拥有近二十万人口，而到了世纪末更猛增到四十万。此外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也具有一定规模。同最先进的英国相比，北欧诸国的工业化大体上要几乎相差近一个世纪。 19 世纪 30 年代起瑞典开始起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首先是在锯木、水磨等行业，到了 50 年代以后采用了蒸汽动力，工业化有了较快发展，并且扩展到炼铁和制造等行业。挪威也从 19 世纪 60 年代后发展起锯木和制造业。丹麦虽然也形成了一些加工工业，但是主要还是农业和商业，依赖其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和急剧增长的转口贸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都是如此。 19 世纪北欧诸国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从 1840—1914 年挪威共输出移民 75 万人,仅次于爱尔兰,居第二位。从 1875 年到 1900 年瑞典共输出移民 85 万人。大量移民输出是由于人口剧增(1900 年挪威人口近 230 万,瑞典人口超过 500 万),农业滞后,饥馑为患。19 世纪初期，瑞典和丹麦出现意想不到的位置颠倒：瑞典原本与俄罗斯宿仇积怨深久，在 1809 年芬兰战争中又被俄国战败而割让全部芬兰，但是却参加了以俄国为核心的反拿破仑同盟。丹麦历来反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一直保持武装中立，却又在最后被迫站在拿破仑一边，结果遭到英国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丧失了全部舰艇和商船队。这一颠倒造成了瑞典在 19 世纪迅速崛起而丹麦一蹶不振，非但再也不是继英荷之后的世界第三海上强国，而且处处都要仰承大国的鼻息行事。从文学上来看,北欧诸国直到 1830 年还是古典主义占主宰地位，然而在英德两国的北方文学的强烈影响下，从 19 世纪初浪漫

主义运动便已经在丹麦后来在瑞典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涌现出欧伦施莱厄、泰格奈尔等诗歌巨匠和安徒生这样的童话大师。瑞典和挪威的浪漫主义运动和丹麦颇为不同，运动内部分成新旧两派并且展开了剧烈的辩论。芬兰的浪漫主义运动则以收集编纂和用民族语言出版古代英雄史诗为主，从而使得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得以问世。

第二节　丹麦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欧伦施莱厄

一

丹麦曾经是欧洲列强之一，又是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的霸主，本来是北欧国家中实力最强大、经济最富足的国家，然而 17 世纪在同瑞典的反复争斗和较量中地位一落千丈。从 14 世纪中叶丹麦成为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联盟的共主以来，与瑞典的矛盾一直不曾间断过，在 16 世纪之前主要是丹麦的残暴殖民统治激起瑞典民变反抗，丹麦进行血腥镇压，而瑞典展开了全国性武装斗争摆脱了丹麦的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丹麦不甘心失败而想夺回失去的殖民地，因而从 16 世纪中期北方七年战争(1563—1570 年)起，双方交战十余次，互有胜负，呈现出拉锯状态。起先丹麦并不把瑞典放在眼里，以为凭借着强大的海军足以抑制住瑞典，而丹麦在海战方面也确实每战必胜，占有上风。因而北方七年战争和卡尔玛战争(1611—1613)中丹麦尚能同瑞典打个平手，不曾失去多少利益，丹麦举国上下仍然保持住老大帝国的尊严和傲慢。但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丹麦被迅速强大起来的瑞典打得焦头烂额，尤其是在托尔斯坦逊战争(1643—1645)中，丹麦更是丢盔卸甲，不得不把仍然占领着的包括钳制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哥特兰岛在内的五个郡交还给瑞典。1657 年丹麦向瑞典发动雪耻战争，

却被瑞典从结有坚冰的海峡上越海奔袭，成功地进行了史称“贝尔特海峡大进军”，一举占领了丹麦全境。这次大失败不仅迫使丹麦交还给瑞典尚还占领的最富庶的斯康耐地区诸郡，而且丧失掉波罗的海制海权和霸主地位。丹麦被昔日的殖民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甚至还军事占领了本土全境，这真是被打翻在地还踩上一只脚，把脸面丢失殆尽了。然而丹麦不得不承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咽下这份恶气，因为此时已无招架之功，更不消说有力气还手了。1675 年又爆发了“斯康耐战争”，丹麦虽然在克厄湾海战中小胜，但终究没有能夺回斯康耐诸郡。甚至在 1700—1721 年的北方大战中，丹麦与俄国和波兰结盟，乘瑞典卡尔十二世在俄国惨败之际举兵攻入瑞典的布胡斯郡，然而在 1720 年丹麦同瑞典缔结和约时却并没得到多少实际利益，更不用说瓜分到瑞典的领土了。然后丹麦刻意与瑞典、俄国修好，并且同俄国缔结了和解条约，以求缓解来自北方的威胁。丹麦由于自顾不暇，悄悄地退出欧洲大国争斗的政治舞台避免卷入战争。1756—1763 年普鲁士七年战争、1776—1783 年由美国独立战争引起的英法战争以及 1792—1807 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丹麦都相当克制，采取了低姿态，一再宣布执行坚定的武装中立政策，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保外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丹麦不惜低声下气与昔日强敌俄国结盟，并且主动创议建立中立国同盟，1800 年这个中立国的武装同盟建立，旨在保护中立国家的自由海上运输，并且呼出了“自由船只运输自由货物”的口号。然而这一切努力并不能挽救丹麦的厄运，因为丹麦从欧洲强国的以老大自居而不思进取、故步自封的保守状态中惊醒过来，已经为时太晚了。四周强邻早已虎视眈眈，当丹麦被瑞典一再打败并且攻占本土而穷形尽相时，列强见有机可乘，便老实不客气动起手来，其中要数英国最为凶狠，这是因为当时丹麦是继英国、荷兰之后的第三海上强国，海军吨位几乎与荷兰不相上下，但舰只数量和作战实力却已超过荷兰。对于这样一个潜在对

手,英国自然不肯轻易放过,非要置于死地而后快。1801 年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率领舰队突入哥本哈根市郊的开放锚地，对丹麦海军进行猛烈的炮火袭击，强迫丹麦退出中立国联盟。丹麦还曾指望当时已成为盟国的瑞典和俄国会起来加以援手。但是近在咫尺的瑞典海军“由于恰好处在下风的卡尔斯克鲁纳港而无法起碇”,而俄国海军则冰冻在彼得堡军港内无法动弹,丹麦在独立无援的困境之中只得忍辱含垢退出中立国同盟。但是拿破仑的法国却不答应,要求丹麦必须参加大陆对英国的海上封锁,否则将挥师讨伐，因而丹麦迫于无奈只得与拿破仑法国结盟。这一下又给予英国以口实,1807 年纳尔逊上将率领英国舰队又突然袭击了哥本哈根,英军以猛烈的炮火一连四昼夜轰击王宫四周,造成市中心极大的破坏,并且还登陆,军事占领了哥本哈根。在英军的炮火逼迫下丹麦不得不再次屈服,接受英国的条件,拱手交出了上次遭受袭击所残存下的全部海军舰只以及 335 艘的全部商船队。丹麦还由于 1807—1814 年间曾是拿破仑法国的盟国而在缔结和约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被迫割让出挪威全部领土。后来丹麦又失去了最后一个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到 1814 年丹麦除了本土之外,仅有冰岛、格陵兰和法罗群岛三个海外属地。但是以前曾一直紧跟拿破仑法国的瑞典却与俄国结盟,加入了反法大同盟,在 1813 年趁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失败之际举兵南下,攻入丹麦,因而在 1814 年获得了挪威作为它丧失芬兰的补偿。丹麦所遭受的第二次屈辱不啻是割股剜肉,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是刻骨铭心的，丹麦虽曾遭瑞典攻占，然而瑞典毕竟还手下留情不曾进军丹麦首都。这次英国却毫不留情以炮火轰击丹麦王宫，哥本哈根市民都出城到周围小山头上来含泪看着这一幕国耻惨象。后来又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商船战舰被英军拖出船坞放火焚烧,这场大火“把丹麦人的心烧成了灰烬”。而就在这样悲愤交加的日子里,瑞典还背信弃义从背后捅刀子。这样一次次的蒙耻受辱对丹麦人的心理震

撼极其巨大,他们不但在心理上蒙上阴影,甚至可说是被打得麻木不仁了。当时有不少能体现出这种心理的自嘲自谑的说法，如："世上有哪个国家能经受得住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十几次吃败仗？惟独我们丹麦。"又如:"有哪个海上强国既没有战舰队也没有商船队？就是我们丹麦。"

当时有不少文学作品和艺术品描绘了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六世[①]全副武装骑马穿行于炮火满天的残垣断壁之间，鼓励守城军民的士气并亲手为他们裹伤，气氛十分悲壮慷慨。然而悲壮慷慨并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中世纪以来的北欧老大帝国,丹麦已经穷途末路了。这首先表现在经济的衰退和农业的萎缩上。由于连年对瑞典用兵失利和割地赔款,丹麦农业出现了大倒退,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而大贵族庄园又故意压低粮价来实行兼并，在1650—1750 年之间丹麦自耕农纷纷破产，到 1700 年还剩下不足一千户小农场,而到了 1750 年则几乎只有人身依附于大庄园的佃农和雇农了。这种局面直到 18 世纪中叶才有起色,但自耕农仅恢复到占全国的近 50%。1788 年随着行会垄断法的取消,粮食贸易实行自由开放。然而 1807 年的战争失败使农业生产出现了大倒退。丹麦的资本主义贸易起步并不算晚,仅次于英国,到 18 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几内亚公司等一批大型海上贸易公司相继成立，在哥本哈根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缝制成衣和丝绸的工厂，海上贸易的兴旺发达给丹麦带来了可观的丰厚利润。然而1807 年交出全部商船队使得海上贸易丧失殆尽，甚至连丹麦的国内贸易也逐渐被德国所控制操纵。农业和海上贸易这两大经济支柱塌陷造成丹麦经济大混乱、大衰退,1813 年出现了丹麦的经济全面崩溃,因而 1814—1830 年是丹麦历史上最贫困的年代。当时伦敦、巴黎等大城市已经十分气派,就连迅速暴发起来的斯德哥尔

①弗雷德里克六世，丹麦国王，1808—1839 年在位。

摩也具备了相当规模和气派。但是哥本哈根虽然拥有了十万多人口，但仍是人畜共居，几乎有一半居民喂养牛羊。街巷狭窄，街道两旁的阳台几乎毗连，以致可供人跨越。街边都是明沟听凭污水横溢。危楼随处可见，市中心的房屋旁边就是菜园和鸡鸭棚，总之没有多少现代城市气息，仍然是中世纪的落后贫困的景象。

按理说，这样的环境背景和心理状态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必然是悲壮、愤怒、感伤、痛苦甚至呐喊革命。然而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丹麦文学中却不大见到这类带着浑身伤痕和血渍在哭泣呼号的作品，而见到的作品中充满爱国主义情绪和缅怀历史上的光辉年月的高昂激情，以及追忆昔日英雄前辈的显赫业绩的怀旧思潮。这是因为在德国耶拿派和歌德、席勒的共同影响之下浪漫主义传入丹麦，浪漫主义的非理性和反启蒙思想和内在直觉的创作手法占有了支配文坛的地位，因而这一段走投无路、一落千丈的最穷困时期居然被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丹麦的“黄金时代”，然而却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个时期是以被冠以“斯堪的纳维亚诗歌之王”桂冠的欧伦施莱厄的长诗《黄金号角》（1802)为开端的。1802年，一对珍藏在王家艺术品收藏馆内的一对黄金号角被盗并被熔化掉。这两件大约在公元 400 年左右制作的精美文物一直被视为国宝，其中有一件还镂刻着一句押有头韵的古文诗。这一骇人听闻的重大损失激发了欧伦施莱厄的爱国激情，写出了《黄金号角》这一光辉诗篇来颂扬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创造文明的英武远祖。这样的爱国情绪在当时的气氛中无疑博得了举国上下的响应，激发出更响亮的共鸣，于是形成一般来势汹汹的尚古怀旧的潮流，再说丹麦这时还没有到后来那样山穷水尽、满目凋零的地步，科学和艺术尚还繁荣,亮点纷呈 物理学家奥斯忒（1777—1851)对电流与磁力效应的学说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的电磁转化定律至今仍被全世界科学界奉为圭臬。雕刻家托尔瓦尔德森（1768—1844)为罗马大教堂雕刻的精美绝伦的圣像享誉全世界，并成为丹

麦全民族的骄傲。况且当时愈来愈严密的文字检查和高压迫使文学家们对现实时政避之犹恐不及,生怕惹祸烧身,因而颂扬古代追忆往昔辉煌便成了文学家们最安全的逃避摆脱现实的手段。这股由欧伦施莱厄创始的'黄金年代'怀旧潮流不仅流行丹麦而且迅速扩展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形成一股以'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为名的潮流，其他国家的文学家们也纷纷参加进来。1829 年在瑞典的隆德大教堂举行了欧伦施莱厄加冕典礼，瑞典诗人泰格奈尔代表北欧诗人们把'斯堪的纳维亚诗歌之王'的王冠戴到欧伦施莱厄头上时,标志着'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文学达到了它的顶峰。不过无论是'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也好,还是'黄金年代'也好,这股浪漫主义潮流与 17 世纪 70 年代瑞典'鲁德贝格主义'是大不相同的,虽然它们都是抱着共同的基督教伦理和柏拉图的观念，都确信存在着一个更高的世界,即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并且孜孜追求要将它表现出来。然而鲁德贝格的巨著《大西洋国》和达尔堡的幻想作品《古代与今日瑞典》都显然是为了满足民族虚荣心,既为当前的强国行径寻求辉煌的历史依据和诠释，又为以后的进取留下伏笔预备口实，因而带有明确的扩张性。而欧伦施莱厄开端的浪漫主义作品则是为了摆脱和避开现实，用颂古筑起一垛隔离的高墙以求得慰藉，犹如饱受太多人生苦难辛酸之后寻求追忆童年的温馨。两者虽然都高度动用想像,因为想像有助于超脱现实,然而这种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各种能力中的最高形式所给予他们的却大相径庭。欧伦施莱厄动用想像重新创作了“天方夜谭”式的民间故事，戏剧诗《阿拉丁》(1805)写的是在日趋没落的危难中竟然奇迹般地发现了大量财富；而鲁德贝格则动用考古知识和想像来考证出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是来自于柏拉图笔下的大西洋国，而这个理想之国就是瑞典，而瑞典人则是希腊神话中神祇埃涅阿斯的后裔。因此,在欧洲文学史中,也把前者称之为新浪漫主义文学,而把 17 世纪之前的统称为旧浪漫主义文学。

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想是由居住在德国的文学家亨里克·斯坦芬斯(1773—1845)和萨克·斯坦菲尔德(1769—1826)介绍到丹麦的。1798 年斯坦芬斯在德国耶拿派的耳提面命之下接受了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和伦理观点，并且于 1802 年返回丹麦举办了一系列浪漫主义哲学思想的讲座，而听众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欧伦施莱厄、格隆德维克和布利高等人。斯坦芬斯本人作品的文学价值不大，但是由于他把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介绍到丹麦的功绩，使他与后来的勃朗兑斯齐名。由于丹麦和北欧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德国耶拿派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而带有明显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特点，即非常强调自我和人类意志在外部世界的独立性;非常突出地崇拜道德和荣誉;艺术是人类灵魂活动的最高形式,而艺术家(即诗人)才有能力最清楚地看到存在最深的奥秘和本质等等。

二

阿达姆·欧伦施莱厄和尼·弗·格隆德维克是丹麦浪漫主义运动中两位最杰出的代表。

阿达姆·欧伦施莱厄(1779—1850)是诗人、剧作家,是丹麦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生于哥本哈根附近弗莱德里克贝里城堡，他的父亲是城堡里的管家，生活比较拮据，正如欧伦施莱厄自己后来所说的：“在我年青时代的道路上没有玫瑰。我是穿着王室廉价出售的破烂衣裳长大的。”

欧伦施莱厄曾在哥本哈根一个学校学习，十六岁离开学校到皇家剧院当演员，两年后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攻读法律、北欧历史和神话学。1808 年出任哥本哈根大学美学教授。

1802 年他同哲学家亨里克·斯坦芬斯(1773—1845)进行一次彻夜长谈之后，立即动手把自己业已完成的长篇诗稿，除了八首之外全部重新改写,并于次年以《诗》(1803)为题发表。这部作品共

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歌颂北欧古代辉煌的史诗 第二部分是描写大自然景色的抒情诗 第三部分是诗剧《仲夏夜之剧》,是《诗》的高潮部分。他是仿效莎士比亚的《一个仲夏夜之梦》写成的。这是一部歌德式的叙事诗作,艺术上的价值不算太高。

1803 年,欧伦施莱厄发表长诗《黄金号角》,这部作品由简短而不规则的诗节组成，通过丹麦古代的黄金号角得而复失的故事来象征过去和现代的一致性。诗中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着力展现出宇宙精神,其中题为《大自然气质》一首尤为明显。这首长诗的发表,打破了 18 世纪丹麦文学的古典主义传统，标志着浪漫主义从德国进入丹麦。它被誉为丹麦浪漫主义诗歌的经典作品，确立了欧伦施莱厄作为丹麦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的地位。在 1805 年他发表的抒情叙事诗《诗作》中包括一篇诗剧《阿拉丁,神灯》。丹麦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称他是 19 世纪上半叶丹麦文学的奠基石。此外，欧伦施莱厄还创作了大量取材于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和神话的诗作,如《圣·约翰的夜晚》（1803）、《小牧童》（1818）、《赫尔格》（1814）和《北欧诸神》（1819）等。《赫尔格》是一部在丹麦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由两组诗歌构成的长诗,诗中写两个兄弟,一个是海盗赫尔格，另一个是热爱和平的丹麦国家组织者克罗阿尔。赫尔格由于不断玩弄阴谋、搞暗杀,最终遭到惩罚而自杀。

1805 年夏天,欧伦施莱厄从丹麦政府领到一笔奖学金,并开始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旅行,接受了歌德和施莱格尔的影响,创作了一系列以北欧古代历史、传统和异教神话为题材的历史剧和神话剧。他在德国创作以北欧历史为题材的悲剧《哈康·雅尔》（1807）,在法国旅行时写了历史剧《帕尔那托克》（1807）和《阿克赛尔和瓦尔堡》（1808），在瑞士他写了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画家的生平为题材的悲剧《克雷吉奥》（1809）。这几部作品主要反映新与旧、民权与王权、人道主义与社会压迫之间的斗争。正当霍尔堡的喜剧在丹麦衰落时，欧伦施莱厄的这些剧本给丹麦戏剧

带来了生机。这一类剧作还有表现北欧民族特有的剽悍性格的爱情剧《哈格巴尔特和悉格内》(1815),以及描写一个名叫斯特科德尔的人在年轻时由于受到教士唆使杀死奥拉夫国王而感到忏悔的悲剧《斯特科德尔》(1811)等。30年代以后,他创作了历史剧《玛格雷特女王》(1833)、《圣奥拉夫》(1836)和《克努特大帝》(1838)等剧本，流露出把王权理想化的倾向。此外还著有取材于民间关于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传说的悲剧《阿姆莱特》(1846)以及其他剧作,如《瓦里亚格在君士坦丁堡》(1827)、《查理大帝》(1829)等。

晚年的欧伦施莱厄创作精力仍然十分旺盛，在七十岁高龄时还发表了悲剧《卡尔坦和古德隆》(1848)和诗歌《诗的艺术》(1848)。他最后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拉格纳 ·洛德勃鲁克》(1849)。

欧伦施莱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不但创作了大量的剧本、数量浩繁的诗作,还著有小说、自传、回忆录和美学论著等。他作品的核心思想是精神自由，创作的素材和主题大都借鉴北欧历史和神话。

斯泰恩 ·斯泰恩森 ·布利高(1782—1848)是当时丹麦文坛上颇为与众不同的作家，他是一个杰出的乡土作家，作品题材大多取自他的故乡日德兰半岛。作品中不仅描写了日德兰半岛的风光和人民生活，而且把那里的方言第一次引入丹麦的文学作品之中。他写作态度严谨而细致，哪怕很小的生活细节都能反映出日德兰半岛的乡间生活。他的这种写法与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华丽笔法大相径庭。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一些穷苦的农民和中下层人士，他们无力抵御飞来横祸而被环境所压倒，最终不得不发出令人为之唏嘘的悲鸣，因而作品往往具有一种悲观主义情调。他的主要写作手法是采用日记体或者用第一人称叙述，着重描绘人物活动和四周环境，很少有心理描写。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贼窝》(1827)、《迟来的觉醒》(1828)、《一个教区执事的日记片

断》(1829)、《内衣经销商的一家》(1829)等。此外布利高出版了以日德兰半岛为背景的许多短篇小说，数量之多和质量之上乘足以使他跻身于从薄伽丘到莫泊桑的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之列。

欧伦施莱厄的创作受外来影响,尤其是德国的影响较大,而尼古拉·弗列德立克·格隆德维克(1783—1872)则主张提倡民族精神,摆脱外来影响,他被誉为"北欧国家的倡导者"。格隆德维克出生在乌德毕市，曾在一个庄园里当过家庭教师。他热衷于研究神学，精通历史，崇拜斯堪的纳维亚古代文学，认为北欧人民可以从这种古代文学中看到自己民族的精神和传统。他还是一位诗人、演说家和教育家。他以其毕生精力在丹麦处于十分贫困的时期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大声疾呼。他认为在政治和社会处于困难阶段时，文学是最好的庇护所，丹麦历史上的光辉年月是对青年一代最好的安慰和教诲。为了从历史的往事中去挖掘财富，他到英国去收集丹麦民族祖先的文学遗迹，经过调查挖掘，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研究后发表了《北欧的神话》(1808)。由于这部作品,他在北欧诸国享有盛誉。

格隆德维克的座右铭是"忠诚和自由",因此他主张学校应该成为传授新教育思想的阵地，唤起基督教英雄主义精神的场所，通过对本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学校应该使学生们胸怀爱国主义情操。他不但积极宣传，而且身体力行，发表了旨在唤起民族自尊的诗集,从古老神话、传说和《埃达》中吸收营养,创作诗剧《命运女神和神之间的斗争》(1808)、《北欧英雄时代衰落的戏剧性场面》(1809—1811)以及《世界编年史概略》(1812)、《教会史概略》(1833)。1848 年至 1851 年他负责主编《丹麦人》周刊。这本杂志经常发表他的文章以及有关历史、宗教和社会方面的作品。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丹麦教士萨克索·格拉马蒂可斯和冰岛作家斯诺里·斯图鲁松的作品。

本哈德·英厄曼(1789—1862)是一位在路德教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他的父亲是丹麦南部一个路德教派的牧师,在家庭影响下,英厄曼于1806年到哥本哈根大学先攻读语言学,后又学习哲学。1818年获奖学金到意大利旅游考察两年。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对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发生兴趣，显露出诗人的天赋，发表了处女作《诗》(1811)。他的哲学观点同歌德和谢林不一样,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是恶魔势力和基督教，即撒旦和上帝之间斗争的继续。他的这种观点在他1811年至1816年所发表的诗作中有较为显著的表露，如寓言诗《黑色骑士》(1814)和童话诗《神童雷纳尔德》(1816)等。他的《晨曲和晚歌》(1839)是丹麦儿童都会背诵的诗歌。

英厄曼还发表了不少以13和14世纪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如《瓦尔德玛胜利王》(1826)、《埃里克·门维兹的童年》(1828)、《埃里克国王和歹徒》(1833)和《丹麦王子奥托》(1835)等。这些作品以颂扬丹麦古代的伟大和光辉来唤起丹麦人的自豪和民族精神，深受丹麦读者的欢迎,被誉为丹麦的“沃尔特·司各特”。他还著有一些剧本，但均不十分成功。

约翰内斯·卡斯顿·豪克(1790—1872)也是一位受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丹麦作家。父母都是丹麦人，但是父亲在挪威任州长，因此豪克出生在挪威，并在那里度过美好的童年时代，后随父亲返回丹麦，定居在哥本哈根。1816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对比：两首戏剧性的诗》，揭示了他自己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举棋不定的矛盾心理。这部作品发表后，他对自己能否彻底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感到犹豫，因此中止写作而全心全意投入到学习自然科学上。1821年获动物学博士学位。后来由于长期生病而截掉一只脚，他又走上了创作道路。1827年豪克担任索勒学院自然科学教师。1846年出任德国基尔大学斯堪的纳维亚文学教授。1857年起任哥本哈根大学美学教授，并从事文学史和欧伦施莱厄、莎士比亚以及冰岛《萨迦》的研究。

豪克曾任皇家剧院经理和戏剧顾问，在希腊和莎士比亚戏剧影响下创作了剧本《巴雅扎特》（1828）、《第比利乌斯》（1828）和《堂·君》（1829）等。这几部作品都是悲剧，人物描写对比性强，对白有力而引人入胜。

豪克同英厄曼一样极力推崇司各特的作品，仿效他的作品创作了不少历史小说，如《威廉·扎伯恩》（1834）、《炼金术士》（1836）和描写为争取自由、反抗俄国的波兰英雄的《一个波兰家庭》（1839），以及《莱茵河上的城堡》（1848）、《罗伯特·福尔坦》（1853）等。他的这些历史小说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豪克最后一部小说《查理·勃西莱》（1860）描写法国革命期间主人公为营救断头台上的犯人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此外，他还著有《抒情诗》（1842）、《抒情诗与浪漫史》（1861）和《新诗集》（1869）等。

第三节　浪漫主义时期的瑞典文学

一

瑞典从 18 世纪中叶起，相对来说较为平稳发展了将近一百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仍旧战争不断并且丧失了一些土地，如 1803 年被拿破仑法国攻入并占去波美拉尼亚（即如今的波兰），1809 年丧失了芬兰等，但是没有出现像 18 世纪初期强国时代那样的大动荡和卡尔十二世时那样的大起大落。虽然贫困严重，经济十分拮据，但相比丹麦几乎山穷水尽的窘境，瑞典的日子要好过得多。总起来看，这段时间内大致有三件大事是足以震撼社会引起剧变的，也是瑞典历史上没有过的。然而这三件事却一件也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动乱。第一件是 1792 年古斯塔夫三世①在假

①古斯塔夫三世，瑞典国王，1771—1792 年在位。

面舞会上被人谋杀。国王遭到行刺而丧生者在古斯塔三世之前早已有之，甚至连卡尔十二世也据说是在战场上被背后射来的暗箭所杀。但是国王在王宫舞会上遇刺却是第一次，显然是经过周密安排的，而且大贵族阶层脱不了干系。然而这样一桩天大的案子，却不了了之，王室对此讳莫如深，仅匆忙地另立新君，并不急于破案，连凶手都抓不到，成为瑞典最大的历史悬案，以致后来斯特林堡在他的历史名剧《古斯塔夫三世》(1902)中也没有交代清楚案情的来龙去脉。其实,古斯塔夫三世从 1772 年发动政变，从议会攫取了大部分权力，一心要成为乾纲独断的开明君主，接位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在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取消了不少大贵族与教士的特权，依仗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来遏制大贵族的势力；对外奉行仇俄政策,发动了 1742—1743 年、1788—1790 年两次均以失败告终的对俄战争。他虽然摧毁了芬兰的瑞典贵族势力，即主张亲俄独立的安雅拉集团的叛乱，但是陷入了内外交困，与大贵族和教会势力结怨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以致成了政治阴谋牺牲品的悲剧人物。第二件大事是丧失芬兰。从公元 1155 年瑞典发动十字军东征入侵芬兰开始,到 1809 年瑞典与俄国缔结和约将芬兰永远割让给俄国为止，瑞典统治芬兰长达 600 年之久。芬兰对瑞典的经济和向东扩张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期间俄国实力日益强大，不断觊觎蚕食芬兰，并且因此与瑞典进行了不止一次的战争，而且每次都以瑞典失败结束。 1808 年瑞典不顾拿破仑法国的大陆禁运政策与英国签约恢复海上运输与贸易。俄国趁此机会，便不宣而战偷袭芬兰,1808—1809 年芬兰战争中瑞典全军覆没，瑞俄签订和平条约，规定瑞典无条件地将包括整个芬兰在内的东部领土割让给俄国，此后芬兰便成了俄国的一个大公国。战败失利、割地媾和在瑞典历史上并非第一次，然而芬兰战争中却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贵族阶层集体投敌，变节叛国，芬兰最大的军事要塞斯维亚堡不战而降便是最触目惊心的例证。第三件大事是 1810 年遴

选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①]为瑞典王储。整个过程扑朔迷离,几乎不可信，然而确实发生了。1810 年来自丹麦的瑞典王储卡尔 · 奥古斯都在检阅军队时坠马暴卒(死因一说是中风,一说是中毒)。本来再从丹麦王室中遴选是顺乎情理的事。但是有个名为卡尔 · 奥托 · 蒙纳尔的瑞典军官却径直秘密来到巴黎,与因长期政见不合而遭拿破仑闲置的贝尔纳多特元帅会晤，并向他私下相授瑞典王位。贝纳多尔特在征得拿破仑批准后便允诺这一要求。 1810 年夏瑞典议会通过这一遴选后，贝尔纳多特便更名为卡尔 · 约翰来到瑞典当上了王储。至于瑞典议会究竟为何要遴选一名失宠了的法国元帅，则成了瑞典历史上最大的谜团，因为当时几乎都不知情，甚至首相和外交大臣都懵 懵懂懂地说既然拿破仑要派人来当，若不接受便意味着战争。一般认为，这是瑞典行会资本家和中小贵族的权术谋略，他们利用拿破仑的声势，抬出一个法国元帅来，用以防止大贵族和教会势力卷土重来。卡尔 · 约翰十四世在 1818 年接位后继续奉行 1812 年的中立政策和对俄友善，从而确保了瑞典几十年的和平，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在文化上实行了极其严密的监视检查和高压措施。正是这三件大事为瑞典的新浪漫主义文学准备了土壤，也为后来的 “ 斯堪的纳维亚主义 ” 提供了催生剂。

如果同瑞典整个局势相对平静比较的话，那么从 1810 年‘ 晨星派 ’成立到 1912 年斯特林堡去世的一百年间，瑞典文坛上可说是硝烟弥漫,矢石横飞,战祸连年,前后一共有三场大论战,而且一次比一次程度激烈，规模扩大和时间拖长，第一场战争爆发在 1820 年前后:“ 晨星派 ”与 1811 年成立的‘ 哥特同盟 ’之间的论

贝尔纳多特(1763—1844) ,法国元帅 ,出生于律师家族以军功擢升至将军、陆军部长并授元帅衔。曾任汉诺威总督等职。 1810 年被瑞典议会选为王储，更名为卡尔 · 约翰 , 1818 年继承瑞典和挪威王位 ,称卡尔 · 约翰十四世 , 1818—1844 年在位。

战,亦称为‘新派’与‘旧派’之争。第二场战争发生在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间,由丹麦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所发动的,他在巨著《19 世纪文学主流》(六卷本,1871)中批评了欧洲大陆上浪漫主义文学脱离现实走人死胡同的现状,指出文学必须写社会与人生。第三场战争则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0 世纪头十年。以海顿斯坦为首的浪漫主义派发动了抨击写实主义的逆反潮流,斯特林堡与之展开了大论战。这三场战争实际上代表了浪漫主义在瑞典的兴起到衰退的整个过程。第一场战争是浪漫主义的兴起和传播阶段,以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观念为基础的浪漫主义世界观抨击启蒙思潮中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法国古典主义的狭隘审美观和对文学的影响。这场论战从 1810 年《晨星》月刊诞生之前半年起直到 1821 年大型喜剧性叙事诗《马尔卡尔一家的不眠之夜》(两卷本,1810—1821)出版,前后经历了十几年,被称为文学辩论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新旧流派之争’,虽然实际上还不及后来海顿斯坦与斯特林堡之间的论战。通过这场论战,肃清了以亚历山大诗体写诗和按法国古典主义写剧本的残余,并且涌现出以泰格奈尔为首的五大著名诗人,从而瑞典文坛几乎成了浪漫主义的一统天下。1871 年第二场战争是瑞典的浪漫主义跌下顶峰,新兴的写实主义蓬勃兴起。而第三场战争则是浪漫主义的反扑和走向衰落,现实主义逐渐崭露头角。

二

从 1792 年古斯塔夫三世遇刺,标志着瑞典文坛上相当宽松和开明、以崇尚法国古典主义为特征的‘古斯塔夫年代’已经宣告结束。从他遇刺到 19 世纪头十年里,瑞典文坛一片沉寂。当时著名的作家中谢尔格伦和李德奈尔已相继去世。托里尔德被逐,流放德国,穷死他乡。女作家伦格伦夫人则早已搁笔。出现这样的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也并不奇怪,因为当时文学家们不可能依靠创

作来糊口养家，更不用说过上优裕的中上层生活。古斯塔夫三世在 1786 年设立的瑞典学院，保障了院士们的优厚待遇和名声，并且提供各类奖金。古斯塔夫年代结束后，瑞典学院虽然还在，但是各项奖金大为减少，对文字的检查和控制也加强了，因而瑞典文坛出现萎缩是必然的。

在后古斯塔夫年代的文坛沉寂期间，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即浪漫主义思潮在酝酿传播。在 18 世纪 80 年代之前，瑞典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前浪漫主义作家，他们是托里尔德和李德奈尔。两人都反对法国的古典主义和启蒙思潮，而且两人还有着类似的经历，但是托里尔德更着重于思想和哲学方面，而李德奈尔则是一位重要的诗人。托马斯·托里尔德(1759—1808)出生于瑞典西海岸，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上中学，后进入瑞典南部的隆德大学攻读哲学，长期在国外居住，先是在英国，后去了德国。他推崇卢梭的《我相集》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旧浪漫主义作品。为了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他于 1780 年初来到斯德哥尔摩，后来以自己的诗《激情》去参加了一个文学社团的诗歌竞赛，他在诗中阐述了自己的美学和哲学观点，称这首诗是一首“教诲颂”。由于这首诗形式难理解，诗意不浓，又不压韵，没有遵守当时流行的创作原则，因此没有获得奖项，他很不满意，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每一个天才都是原则的创造者，是自己的题材的自我创造者。天才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原则，而是要创造。”他主张写不拘泥于已有格式和原则的无韵诗。他的这首《激情》到 1785 年才正式发表。

托里尔德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哲学学说，认为从深处观察，世上的一切都是个和谐的有机体，而上帝就是力量、生命和灵魂。自然界处处有上帝存在，因而他的任务就在于解释整个自然界和改造整个自然界。托里尔德反对古典主义，鼓吹出版自由，他的最优秀的作品是《对批评家的批评》(1791)。他同情和支持法国革命，他的‘世界改造论’被指控为危险的煽动言论，因而他于 1793 年被流

放国外。1795 年任波美拉尼亚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图书馆员和教授。1808 年在该地去世。

本特·李德奈尔(1757—1793)同托马斯·托里尔德一样出生于瑞典西部，在哥德堡上中学后到隆德大学和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即发表了优美的诗歌，充分表现出他作诗的天赋。1780 年他获古斯塔夫旅行奖,先赴德国,后又去了法国,受到卢梭、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影响。在巴黎期间，由于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旨意，他得到了当时瑞典驻巴黎公使、著名诗人克雷茨的照顾，当了他的秘书，同时研究莎士比亚著作。这对李德奈尔的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李德奈尔在悲剧《埃里克十四世》(1782)和歌剧《美狄亚》(1784)中摒弃了法国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而以浪漫主义思想来创作，宣扬的是人类的不幸超过了他们的罪恶。他的叙事诗《女伯爵斯帕斯塔拉之死》(1783)更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斯帕斯塔拉因为要拯救自己的孩子而甘冒危险以致丧生，这样富有自我牺牲的母爱在他的诗篇中表现为人类最高尚的精神状态，正如后来泰格奈尔所说“:他在月桂树里哭得多伤心,他同情别人的痛苦,但是也能听得出他自己有多么痛苦。”整个诗篇随着斯帕斯塔拉的不幸命运和诗人自己的感情变化，韵律和风格也不断在变化，所以泰格奈尔赞美说：“过去没有一位瑞典诗人能用这样的方法把语言和充沛的感情糅合在一起。”

法朗斯·米凯尔·弗朗森(1772—1847)出生在芬兰,父母都是讲瑞典语的。他在奥堡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在那里当教授。1809 年瑞典把芬兰割让给俄国后，他离开芬兰搬到瑞典居住，在瑞典北部小城当牧师。弗朗森在 1793 年发表了长诗《人类的面孔》,因而成名。这首哲理诗与当时流行的哲理诗迥然不同，大力宣扬唯心主义世界观，确信有永生的存在，并且声称人类是由神祇变来的，这一点不仅依靠抽象分析，而且可以通过灵魂的美丑来证明，例如

智者、英雄和美女的脸部特征各有不同。诗的开端出现了带有强烈而鲜明色彩的天堂幻景，开创了瑞典诗歌中浪漫主义的幻想境界的先河。弗朗森的爱情抒情诗《塞尔玛组歌》在 1810 年编纂成《诗集》出版，具有强烈的芬兰民歌情调和浪漫主义色彩。

托里尔德、李德奈尔和弗朗森这三位作家虽然比瑞典学院第一代院士谢尔格伦那批人更接近浪漫主义，但通常仍被称为“后古斯塔夫作家”或“前浪漫主义作家”，直到“晨星派”出现才形成了对古典主义的强有力的冲刺和扫荡。

瑞典的浪漫主义派是从学习德国康德哲学发端的。在 18、19 世纪交替的最初几年里，乌普萨拉大学讲授了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从而培养出了瑞典浪漫主义的先锋战士：耶伊尔、哈马舍尔德、阿特博姆和帕尔姆布拉德。他们在乌普萨拉大学成立了文学团体“曙光同盟”，发行文学月刊《晨星》（1810—1813），由此这一流派便以“晨星派”而闻名。1808 年他们在纲领中明确提出：“要以希腊人和德国人为楷模，培养造就瑞典自己的力量来抵制有害的审美观点，在瑞典文学的天空中用一道曙光为太阳的普照开辟道路。”《晨星》月刊发行仅三年便被迫停刊，帕尔姆布拉德经过努力又发行了《瑞典文学报》周刊，长达十几年之久，此外还每年出版《诗歌年鉴》用以发表晨星派的诗歌。《晨星》月刊以及哈马舍尔德创办发行的《幽默》周刊（1809—1811）和《瑞典文学报》周刊在十几年里对瑞典文坛上的保守派大张挞伐，肃清了启蒙思潮中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法国古典主义的狭隘审美观点。于是双方营垒清楚，阵线分明地开起仗来，进攻的一方浪漫主义派以《晨星》月刊为中心，而防御的一方保守派则以由瑞典学院为后台的《文学和戏剧报》为中心。双方互有攻守，形成了拉锯状态。直到 1820—1821 年哈马舍尔德、达尔格伦等几位晨星派作家出版了大型喜剧性叙事诗《马尔卡尔一家的不眠之夜》两卷本，这才对保守主义诗歌中死板说教的宫廷格调和生搬硬套、盲目效仿法国样式的种种

弊端作了一次最全面的彻底清算，从而结束了这一场瑞典文学争论中历时最久、程度最激烈并不乏人身攻击的“新旧派之争”。站在保守主义最前沿的是利奥波尔德、瓦林和彼尔·瓦尔马克(1777—1858)等几位当时最有名声和地位最显赫的文学家,其中尤以利奥波尔德的华丽笔调和精辟论点成为保守派的主力。

约翰·奥洛夫·瓦林(1779—1839)出生于达拉那省,长期担任斯德哥尔摩首席牧师。1837 年当上了大主教。瓦林的主要成就在圣歌。19 世纪的瑞典教堂仍在吟唱 1695 年出版的圣歌。人们普遍认为这本圣歌集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曾在 18 世纪 60 和 90 年代两次成立过委员会提出圣歌修订方案，但是都没有获得通过。1811 年瑞典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修订这本圣歌集，瓦林是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一本新的《瑞典圣歌集》终于在 1819 年出版。瓦林是为这本新圣歌集付出最多心血的人。这本集子一共有五百首圣歌，瓦林从瑞典语和德语圣歌中翻译和改编了大约二百首,自己又新创作了约一百三十首,可以说 1819 年的圣歌集主要都是出于瓦林之手，这些圣歌充分表现出教徒对宗教的感情和虔诚,如圣诞节唱的赞美诗《欢迎美丽的早晨》、升天圣歌《重新回到幸福的天国》以及《我四处寻找的朋友在哪里》、《让我们赞颂上帝》、《您背着十字架,仁慈的主》等都极为出色。

瓦林也发表过不少非宗教诗,如歌颂古斯塔夫三世的《赞歌》(1808)以及《思家》(1821)、《死亡的天使》(1834)等。瑞典著名诗人泰格奈尔说过,瓦林是“几个屈指可数的诗人之一,也是绝无仅有的讲道者”。他的《死亡的天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中有优美的抒情部分,也有严谨的布道,这首诗充分显示了他诗人的天才和讲道的才能。

另一方面“晨星派”的力量却更强大,他们当时都是一批初生而不畏虎的牛犊，雄心勃勃，敢于向享有盛名的瑞典学院首批院士、古斯塔夫宫廷诗人利奥波尔德和圣歌大师瓦林等一批显赫人

物挑战和进行较量。他们当中有年纪稍长而又接受过法国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熏陶的泰格奈尔和耶伊尔，不过这两个诗人在事业有成、名气如日中天之时便退出了“晨星派”，另行创建了“哥特同盟”(即旧派)，成为“晨星派”的强大而难于招架的对手，遭到晨星派的极大怨恨和抨击讽刺。

晨星派的主力作家主要有阿特博姆、劳伦苏·哈马舍尔德(1785—1827)、斯塔格奈利乌斯和维尔海姆·弗莱德里克·帕尔姆布拉德(1788—1852)。帕尔姆布拉德是当时为数不多以撰写小说和故事为主的作家。

彼尔·达尼尔·阿玛德乌斯·阿特博姆(1790—1855)是瑞典浪漫主义文学中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出生于东约特兰省的一个牧师家庭。十五岁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此后，除了 1817 年至 1819年出国和每年夏天回家乡度假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乌普萨拉大学。二十岁时带头组织文学社团，并为其喉舌《晨星》杂志撰写发刊词。这是一篇新浪漫主义的实验诗作，详细叙述了他们的哲学观点和美学纲领。但是在这篇发刊词中，他对新浪漫主义的思想表达得不十分清楚。在以后的作品中，阿特博姆对浪漫派诗歌的复杂形式和思想有了较为精辟的阐述。 1812 年至 1838 年，他在《诗历》杂志上陆续发表了题为《花》的诗篇，共有四十篇，每篇写一种花，后收入《诗集》中。他的这些《花》诗受到谢林关于万物有灵和自然现象是内心生活表现的理论影响，是感怀抒情之作。前期的《花》诗高雅而具有深刻的哲理思想，后期的《花》诗形式简洁明朗，类似民歌。这些《花》诗描写极为生动形象，语言技巧运用娴熟，受到广泛欢迎。

阿特博姆的代表作是分上、下两部分的童话剧《极乐岛》，分别发表于 1824 年和 1827 年。这个剧本是根据他童年时普遍流传在瑞典农村的民间故事编写而成的。它描述北方国的阿斯道尔夫国王从自己寒冷、阴郁的北方国跑到南方的极乐岛，并同岛上的女王

费丽西娅过了三百年幸福的生活。三百年后阿斯道尔夫为脱离自己的王国、自己的人民而受到良心责备，说服女王后，乘一匹飞马返回到自己的王国，返回到现实中，返回到他自己该尽义务的王国里。剧本的结尾是阿斯道尔夫国王无法重新统治本国，在重返极乐岛途中死去，费丽西娅女王也重新变成星星的女儿回到天上，极乐岛沉入海底。这部故事剧是具有深刻哲理的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极富诗意 特人将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融合在一起,因而成为瑞典诗坛上一位重要诗人。

阿特博姆的其他作品还有剧本《蓝鸟》(1813) 以及花了二十年撰写的瑞典文学史《瑞典的先知和诗人》(1—6 卷)等。

埃里克·约翰·斯塔格奈利乌斯(1793—1823)虽然同阿特博姆没有任何个人交往，但是无论在气质上还是世界观上，两人极为相似。他同当时瑞典社会上的文学团体"晨星派"或"哥特学会"都没有联系。他的创作主要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他出身于瑞典南部厄兰岛的牧师家庭，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和中学。十七岁前靠大量阅读父亲的藏书自修学业。1810 年到隆德上大学，1812 年至 1814 年在乌普萨拉上大学。毕业后在斯德哥尔摩一个皇家公署任职。由于他体弱多病，经常病休在家，而且他的性情孤僻古怪，很少同人交往。逝世之前酗酒，抽鸦片，生活堕落，二十九岁就离开了人世。生前出版的作品不多，有史诗《伟大的符拉迪米尔》(1817),诗集《萨隆平原上的百合花》三卷(1821),剧本《殉教者》(1821)和悲剧《酒神的女祭司》(1822)。他去世后，由新浪漫派杂志主编劳伦苏·哈马舍尔德整理出版了他的《文集》(1824—1826)。但是直到 20 世纪初他的文集再次由弗来德里克·博克在 1911 年至 1918 年出版时,斯塔格奈利乌斯的作品越来越受到重视，自此之后，他一直被视为是瑞典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心人物。

斯塔格奈利乌斯的作品有抒情诗、叙事诗和剧本。由于多病和爱情的挫折，他经常沉湎于梦幻之中，他的抒情诗以描绘理想和显示的对立为主，如《恩底弥翁》和《内根》。有的诗描写他渴望摆脱人世间的苦难，奔向天国，奔向"更高超的生活"，如《候鸟》一诗通过对候鸟从北方飞到南方的描写来象征人在死后从忧郁的显示世界飞向想像中的幸福和美好的天堂。《萨隆平原上的百合花》是哲理性的抒情诗，充满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理论。除了诗作外，他还著有不少剧本。悲剧《阿尔勃特和尤利娅》、《骑士之塔》和《罗马的妓女》等都是生前最后几年创作的。他最重要的剧本是生前出版的《殉教者》和《酒神的女祭司》。前者描写女主人公坚持信仰基督教、宁死不改变其立场的牺牲精神，后者是写主人公积极宣传新教，被酒神的女祭司分尸而亡。

斯塔格奈利乌斯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他的创作风格。作品充满激情，形式准确，技巧娴熟，辞藻华丽，音乐感强。同时代的诗人无不对他推崇备至，称他为早熟的天才诗人。

瑞典的浪漫主义文学到斯塔格奈利乌斯那里达到了鼎盛期，此后的作家或模仿他们的风格和技巧，或转向新兴的现实主义文学。

三

1811 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还出现了另一个浪漫主义流派"哥特同盟"，或被称为"旧派"。这个同盟是该大学中来自维姆兰郡的同乡同学所建立起来的。同盟最初的目的不在于文学或学术研究，而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1801 年英国舰队在哥本哈根附近的碇泊地向丹麦海军发动突然袭击，丹麦海军虽然处于劣势并且孤立无援，却仍坚持自卫，甚至还奋勇还击，因而尽管损失惨重，但毕竟保全了国家的脸面。丹麦人把这场海战称为"光荣海战"，丹麦诗人欧伦施莱厄并为此作诗讴歌颂扬。但是 1808—1809 年的芬

兰战争对瑞典却是莫大的民族耻辱，因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而瑞典略占上风的战争，但是由于指挥失措、军队疲劳以及上层贵族变节投敌，结果造成全军覆没，从而丧失了六百多年的基业。芬兰战争的耻辱和痛苦回忆使得有抱负的瑞典青年深深感受到强国时代早已过去，必须重新振作起来，否则将被人宰割，他们把瑞典的古代祖先，英勇无畏的哥特人作为追求的理想，把他们的组织起名为“哥特同盟”。他们要恢复古代哥特人的自由精神、大丈夫气概和坚毅不拔的性格，主张发扬古代哥特人的刚毅坚强的特征，恢复北欧历史的早期传统，用以重振瑞典的民族精神。他们以斯堪的纳维亚古代神话中的一个神祇命名自己这一派的会刊《伊杜那》杂志。他们怀旧崇古的爱好也表现在他们盟员之间，他们都起了北欧古代神话中的名字，并以兄弟相称，彼此以古老的方式问候。他们在聚会时全都仿效古代习俗，甚至不用酒杯，而用牛角来传觞痛饮，同盟的盟歌中就唱道：“昔日里哥特人高举牛角来痛饮。”哥特同盟的组织十分松散，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文学研究方面的宗旨和目的。有种说法将“哥特同盟”称做文学的一个流派或是一个文学团体，或者将它称为“哥特学派”，结果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哥特同盟”存在的二十来年里确实曾出版过一些古代民歌集、诗集，但都是盟员个人的作品。“哥特同盟”对瑞典文学并没有做出过多少有价值的贡献，它之所以名气很大并且能和“晨星派”（即新派）分庭抗礼，主要还是因为它拥有以长诗《弗里蒂奥夫萨迦》(1820)而使瑞典文学第一次享誉世界的泰格奈尔和“北欧的哥德”耶伊尔这样声名显赫的盟员。

埃里克·古斯塔夫·耶伊尔(1783—1847)是位诗人和历史学家，是“哥特同盟”的重要成员。他和阿特博姆同在乌普萨拉大学工作，是同事，早年两人趣味相投，意向相同，成为至好。但是阿特博姆生性柔弱，自悲自怜，自我专注，而耶伊尔则健壮、乐观、充满活力，由于两人性格截然不同，慢慢地两人的关系变得不十分亲

密了。

耶伊尔出生在韦姆兰省东部的林区乡间，父亲是铸铁厂厂主，家境富裕。虽然他的家远离文化、文学和艺术氛围浓厚的城市，但是他从小爱好音乐，这对他的性格培养、诗歌创作和流露情感的方式都有重大影响。耶伊尔在 30 年代出版的《回忆》一书中对家乡旖旎的自然风光、工场劳动生活、温馨的家庭和愉快的童年时代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和描述。他十六岁离开家乡，考入乌普萨拉大学，七年后获哲学学士学位。1809 年至 1810 年到英国旅行,在英国的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促使他对社会关系和外界现实发生兴趣。回国后，他的诗才像洪水决堤似的喷涌奔流，他发表了不少卓越的诗篇，并获得了瑞典学院文学奖。他自己把这一阶段称为 “ 歌德时期 ”,瑞典的有些评论家也把他称为‘ 瑞典的歌德 ”。

1811 年耶伊尔发表了两篇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来描写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篇《自耕农》和《北欧海盗》,这是瑞典抒情诗宝库中两颗光芒四射的珍珠。《自耕农》描写刚健而具有独立性格、脚踏实地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北欧海盗》则带有浪漫色彩，描绘富有冒险精神和热爱自由的维京人，即海盗时代的北欧人。他在这首诗中对海洋和航海生活的描写生动而逼真，活泼而清新，读后使人感到似乎是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曼海姆》是耶伊尔在《伊杜那》杂志上发表的一首‘ 哥特同盟 ’纲领式的诗,用浪漫主义诗歌常用的格律写成。《最后一名战士》(1811)和《最后一位诗人》(1811)也是他重要的叙事诗作。

1815 年耶伊尔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历史讲师，两年后任斯堪的纳维亚历史教授，出版了几部历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封建主义和共和国》(1818—1819)、《斯维亚王国的编年史》和《瑞典人的历史》。除了诗歌和历史作品外，他还在音乐领域孜孜不倦地耕耘,为很多歌词谱曲,有些歌曲至今仍广泛流传。

埃沙伊阿斯 · 泰格奈尔(1782—1864)同耶伊尔一样也出生在

韦姆兰省，但是他和耶伊尔不同，家境十分拮据，父亲是一个乡村牧师，小泰格奈尔九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无力抚养孩子，更无能力提供他们上学。幸亏有人赏识泰格奈尔的天分，资助他上中学、大学。他于二十一岁取得大学学位，二十九岁任母校隆德大学希腊语教授，1824 年任斯莫兰省韦克舍区主教。

泰格奈尔早年曾发表过一些诗歌，虽然也送到瑞典学院参加竞赛,但并未引起瑞典学院和读者的注意。1808 年瑞典在芬俄战争中丧失芬兰，泰格奈尔对俄国极为愤恨，发表的《斯考耐国民警卫队战歌》(1808) ,引起轰动，1811 年他又发表了诗歌《斯维亚》。这是两首热爱祖国、仇恨沙俄的诗篇，诗中号召瑞典人民采取行动反对俄国。在《斯维亚》一诗中，泰格奈尔甚至号召瑞典人民对东方的敌人展开一场复仇战争。《斯维亚》一诗使泰格奈尔获得了瑞典学院文学奖。

泰格奈尔和耶伊尔一样都是属于老一代诗人，受到法国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影响。 1812 年至 1813 年间泰格奈尔的创作向浪漫主义方向发展,但是他的‘ 哥特主义 ’生要是在美学方面,和他的新古典主义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往往形式是古典主义的,内容则是浪漫主义的,如《树》和《太阳之歌》等。泰格奈尔虽与新派有共同之处,也曾为《杜伊那》杂志撰稿,有的文章也受到新派的欢迎,但是‘ 晨星派 ’和泰格奈尔之间很快出现分歧。“ 晨星派 ” 批评泰格奈尔写诗的风格，并责备他缺乏热情和深度。泰格奈尔从康德的‘ 批判主义 ’哲学出发,始终保持怀疑的立场,反对‘ 晨星派 ’的形而上学思想。他对‘ 晨星派 ’的新浪漫主义和 18 世纪古斯塔夫时代的文学都持不赞同态度。 1817 年,他在隆德大学庆祝 “ 宗教改革 ” 三百周年庆典会上的演讲中发表了自己的原则宣言。他表示 19 世纪初德国文学沉溺于玄妙以及神秘世界的探索，与 18 世纪的经验主义同样都是不可取的。泰格奈尔在这里首先批判了谢林等人的新形而上学及一切神秘主义，接着批驳了 “ 晨星

派”把信仰和知识混为一谈的观点，认为他们创作的诗歌软弱无力、含混不清和不合情理。

1820 年至 1822 年泰格奈尔在“哥特学会”会刊《伊杜那》上发表史诗《弗里蒂奥夫萨迦》。这部史诗标志着泰格奈尔从早期的抽象抒情诗人进入叙事诗人阶段。《进圣餐的孩子们》(1820)和《阿克赛尔》(1822)也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弗里蒂奥夫萨迦》是泰格奈尔从丹麦作家欧伦施莱厄的浪漫曲《赫尔格》中得到启发,以浪漫曲形式来描写古代北欧题材的作品。这部诗作不但使他享誉北欧，也使他作为瑞典诗人第一次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地位。全诗共有二十四个篇章,内容大致是:弗里蒂奥夫是挪威富裕农民的儿子，同国王的女儿英格堡一起学习；国王答应将英格堡嫁给他，但是国王死后,王位继承人——英格堡的兄弟不遵守国王的诺言，而且还焚烧了弗里蒂奥夫的财产。弗里蒂奥夫为了复仇烧掉了巴尔德神殿，后隐姓埋名逃到林恩国王的宫殿。最后他回到自己家园,同英格堡结为伉俪。《弗里蒂奥夫萨迦》原本是一部冰岛《萨迦》,经过泰格奈尔加工、改动和整理,故事情节更为生动和现代化。这部史诗把抒情与宏论融为一体，成为瑞典诗歌一部不朽杰作。主人公弗里蒂奥夫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不取得最后胜利决不善罢甘休的英雄。其实他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代表了具有远大志向、高尚情操和不屈不挠精神的斯堪的纳维亚民族。

《阿克赛尔》(1822)是泰格奈尔的另一篇佳作，内容是歌颂国王英勇的侍从阿克赛尔。国王派他去送书信，中途要穿越俄国漫漫无际的大沙漠,他毫不畏惧,只身启程,被敌人发现并受了重伤。沙漠之女玛利营救了他，两人产生了爱情。可是阿克赛尔为了完成任务毅然离开了心爱的人。当他执行完任务返回时，玛利已身受重伤,奄奄一息。她以微弱的声音说道:“看呀,阿克赛尔,月亮下有一朵云彩正在飘流，这朵云彩飘走的时候也是我要死去的时候,我的魂魄将会安息在彼岸,我将在那里为你祝福。”玛利死后，

阿克赛尔整天围绕在玛利的坟墓周围哭泣。最后他在海岸边死去，可他已经失明的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他心上人的坟墓。这首诗内容缠绵悱恻,感情真挚,写景写物自然真切,语言优美动人,是瑞典最优美的诗歌之一。

除了诗歌外，泰格奈尔当教员时的讲稿和当主教时的布道词以及书信等，在修辞学上和教育学上都对瑞典的语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玛拉·西尔弗斯托普(1782—1861)是浪漫主义文学时代乌普萨拉著名的文化人士，她数十年来一直坚持写日记，详尽地记录了当时文化界的活动和事件。自1820年起,她经常在自己家中举办文化沙龙,那时著名的浪漫派作家,如阿特博姆、耶伊尔、帕尔姆布拉德，后来还有阿尔姆克维斯特等人都是她沙龙中的常客。他们在聚会时除了朗读自己的作品外，还把作品谱成曲一起歌唱，或编成剧一起演出。常到她沙龙里做客的还有一位爱好文学的德国女士阿玛利阿·冯·海维格(1776—1831),这位海维格同德国的大作家歌德和席勒是朋友，她虽同一位瑞典军官结婚，但他们在德国服役，居住在德国。文化沙龙里的文人们也到德国去拜访她，这样她自然就成了德国和瑞典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牵线人。西尔弗斯托普的文化沙龙对瑞典浪漫派文学是有一定贡献的。她的《回忆录》(四卷,1908—1911)是在她去世后发表的。这部作品不但有对自己童年、并不十分美满的婚姻和乡村庄园生活的回忆，而且还有对常来她乌普萨拉家里做客的作家们的文化活动的记述，这部回忆录成了了解19世纪上半叶瑞典上层社会的一部重要文献。

四

1810年到1830年这段时期被称为“瑞典文学的黄金年代”，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时期瑞典文坛上出现了五个伟大的诗人,其中瓦林、泰格奈尔和耶伊尔都出生在1780年前后,并且接

受过古典主义的影响。阿特博姆和斯塔格奈利乌斯则是后起的一代纯粹的浪漫主义者。“晨星派”和“哥特派”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是浪漫主义派，在扫荡古典主义保守势力时他们是一致的，只是后来在对待崇古怀旧方面发生了“新旧之争”，平心而论，“晨星派”是对付保守势力的主力军，而“哥特同盟”崇尚古代对维护历史传统和珍惜民族遗产具有深远意义。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泰格奈尔这样值得瑞典人引以为自豪的诗人，他足以与丹麦的欧伦施莱厄并驾齐驱，而他的长诗《弗里蒂奥夫萨迦》使瑞典文学第一次在世界文学领域中占有显著位置，也是第一次把萨迦题材现代化，用浪漫主义的诗歌集来描写古代北欧英雄。除了瓦林之外，以泰格奈尔等四位诗人为代表人物的 19 世纪初期瑞典的浪漫主义文学，无论新派或旧派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1. 消除了法国文学的影响，而让位给德国。这是因为浪漫主义文学首先由德国耶拿派传入瑞典的，而在传播过程中耶拿派的奥·施莱格尔①和弗·施莱格尔②兄弟俩还有蒂克③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奥·施莱格尔久居瑞典，1804—1813 年并出任瑞典王储的机要秘书。因此，瑞典浪漫主义派便处处仿效德国耶拿派，这也就

① 奥·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文学批评家，他对欧洲 19 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发展影响很大，他的《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讲稿》和《论戏剧艺术和文学》（1809—1811）两部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早期浪漫主义的世界观和美学观。他对歌德有深入周密的研究，但是他的著作中往往美化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

② 弗·施莱格尔（1772—1829），系奥·施莱格尔的弟弟，德国文学理论家和作家。1798 年他同其兄及蒂克一起出版早期浪漫派刊物《雅典娜神殿》传播费希特和耶拿派浪漫主义的观点。他的著作《论现代史》（1811）和《古代与现代文学史》（二卷本，1815）内容大多是宣传宗教和复旧思想。他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民族对自己的过去的自我意识，而文学则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体现。

③ 蒂克（1773—1853），德国作家，他以浪漫主义理论进行创作。主要作品有喜剧《奥克塔维安皇帝》（1804）、童话剧《穿皮靴的雄猫》和《民间童话集》（三卷本）等。蒂克的作品要算童话和小说最为见佳，往往把抒情、叙事和戏剧等各种体裁混淆、搀和在一起。在内容上则美化封建骑士制度，赞扬天主教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

是为什么诗作上大有歌德风格的泰格奈尔避口不谈歌德，而自认是蒂克的弟子,虽然蒂克远不如歌德那样深刻,甚至相当肤浅。

2. 浪漫主义也意味着从理智转向感情和内心世界。古典主义的教诲和寓教于乐的诗歌,如教谕诗、讽刺诗、寓言诗、诗体书信、田园牧歌等统统被一种要求富有感情和想像的抒情诗所取代，其中既有描写大自然和爱情的抒情诗，也有抒情的赞美诗、谣曲、民歌,以及即兴抒情诗,如酒歌。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在意大利兴起,而在 17 世纪才传入瑞典的" 商籁体 "十四行诗受到了浪漫派诗人的极大重视,并重新采用这一形式。

3. 浪漫派诗人在诗的格律上也掀起了一场变革,长期以来古典主义的亚历山大诗体和四音步抑扬格诗遭到浪漫派批判并弃之不用，而被六音步对偶律诗或不押韵的六音步抑扬诗所取代。后来莎士比亚式的五音步抑扬格诗以及八行诗、十四行诗体以及德国的四音步对偶韵律诗和不押韵的谣曲民歌也广泛使用。出于怀旧崇古之情，浪漫派诗人重新采用了音强体节奏式的押头韵诗。这种质朴的节奏式诗律原本是古代北欧日耳曼史诗中所特有的，用押头韵来增强节奏感,也就是冰岛的《埃达》所采用的节奏简单而明快的节奏格律。中世纪之后这种节奏式已在瑞典诗歌中消失，但是浪漫派诗人又使得这一格律得到恢复并且使这种节奏式流传下来,后来在现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戏剧方面,浪漫主义的戏剧由运用莎士比亚的不押韵五音步抑扬格诗体的" 哥特式 "历史剧占主导地位。

4. 瑞典浪漫主义在文学上影响深远而巨大,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活动,无论新派或旧派,其影响主要是依靠五个伟大诗人的作品来赢得的。" 晨星派 "的中心在乌普萨拉大学,耶伊尔、阿特博姆和帕尔姆布拉德曾先后在那里开展活动,而" 哥特同盟 "的大本营是在泰格奈尔当教授的隆德大学，浪漫主义派的活动主要在大学知识分子阶层之中,它的声势甚至比不上 17、18 世纪启蒙思潮

运动，因为启蒙思潮毕竟在首都拥有自己的精神中心，其活动遍及全国各大城市，虽然启蒙思想家所影响的社会阶层也并不很广。

5. 除了保守主义的瓦林本身一直是牧师后来还当上了瑞典大主教之外，瑞典浪漫主义派中不少人都逐渐转向接受神职。泰格奈尔当上了维克舍主教；弗朗森当上了赫纳舍德主教，还有许多浪漫派诗人当上了牧师。由于浪漫派诗人在教会里供职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的诗歌中具有着强烈的宗教和《圣经》内容的特点。这也表明了浪漫主义和文化界的宗教复兴已融为一体。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从路德教的理性哲理转向更具有《圣经》特点理念，更确信存在着一个更高的世界，即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因而他们认定并主张：诗人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借助观察的理性推论来反映感觉世界的事物，而是借助理智观念和想像力超越现实，升华到永存的理念之中。例如泰格奈尔就宣称自己是借助了想像方能仰望完美的思想王国，看到自己的幸福。阿特博姆则认为感觉世界是理念世界的表象，是描述神的美好和良心，并且再现理念。斯塔格奈利乌斯则把灵魂对升天的怀念解释为理念世界永恒的完美和感觉世界的表面现象之间的对比。浪漫主义派诗歌在斯塔格奈利乌斯的创作中达到鼎盛时期，而其影响一直沿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海顿斯坦、弗勒丁和卡尔费尔德都可说是程度不同地属于这一流派。

第四节　挪威文学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蓬勃发展

一

在北方大战（1700—1721）期间，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于1716—1718 年进攻挪威并以阵亡告终。自此之后挪威经历了长时期不间歇的和平,直到 1814 年这种和平才被瑞典王储卡尔·约

翰十四世对挪威用兵进军所打破。在长达九十年的和平时期中，挪威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无论是繁荣局面还是人民所享受的自由都已经显著地超过了宗主国丹麦。挪威的农民中基本上都是自耕农，人身依附现象很少，这也是挪威引以为豪的超过丹麦的优势之一。挪威的蓬勃状况和当时丹麦的没落窘境亦不可同日而语，渔业、海运业、林业和采矿业都十分兴旺发达。挪威在 17 世纪中叶以后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规模虽小，但曾参与了 1644—1645 年的汉尼巴战役与瑞典军队对垒，1716 年瑞典卡尔十二世进攻挪威亦不曾占到便宜。虽然挪威的经济、军事和国力有了相当可观的提高，在许多方面已经和宗主国丹麦不相上下，甚至略有超过，但是它依然处于附属国的屈辱地位：挪威没有自己的议会；大小官吏均需由丹麦任命，而且绝大多数人是丹麦籍；挪威的行政根本不容挪威人染指；丹麦语是挪威的官方语言和书面文字。丹麦慑于挪威的国力大增，不得不采取一些怀柔政策，如挪威不必事事听命于丹麦议会而直接归丹麦国王亲自管辖。但同时更加强了文化控制，用高压对付挪威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独立倾向。

这种状况到了 1807 年陡然急转直下，长期享有和平的挪威遭受到了拿破仑战争的荼毒。丹麦被迫放弃武装中立站到拿破仑一边，参加了大陆封锁集团，对英国实行海上禁运。这一政策的转变固然使丹麦海运遭受莫大的损失，但是深受其祸、受害最深的却是挪威。因为挪威历来依赖于丹麦供应粮食和农产品。丹麦与挪威之间海上运输断绝之后，挪威便出现全国性大饥馑，这场持续了十多年之久的饥荒,再加上 1814 年瑞典对挪威用兵，使得挪威经济一落千丈，呈现百业凋零的局面。直到 1842 年货币改革将挪威钱币大量贬值之后，这一局面才逐渐有了转机。挪威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汉姆生所写的长篇小说《饥饿》(1890)就是以那段时期的艰难为背景的，也正因为如此挪威人对丹麦积下了更深重的怨气，更加快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步伐。同时由于大陆封锁政策

和英国舰队对丹麦船只实施炮击报复，在这段时间里挪威与丹麦的联系几乎中断,丹麦对挪威的统治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挪威的政权落入摄政的丹麦王储克里斯蒂安 ·弗雷德里克手中,组成了一套独立自治的行政机构。但是 1814 年基尔和约签订使挪威大失所望:在俄国的力主之下,挪威与瑞典组成两国共主的联盟,由瑞典国王统治。消息传来,挪威举国上下为之哗然。1814 年复活节挪威各地民众代表 112 人在埃德兹伏尔农庄举行会议长达五个星期,并于 5 月 17 日宣布挪威全国议会通过了挪威根本大法《埃德兹伏尔宪法》,并拥戴摄政王丹麦王子克里斯蒂安 · 弗雷德里克为挪威国王。瑞典王储卡尔 ·约翰旋即率重兵来讨伐，经过短暂交战,挪威失利,不得不和瑞典签订停战协定,放弃独立并承认瑞典国王为挪威的共主。瑞典亦做出让步，即允许挪威除了外交和国防等重大事务之外实行有限度的自治，并且承认《埃德兹伏尔宪法》为挪威的根本大法。此后,在整个 19 世纪直到 1905 年,挪威都面临着三大问题,并且围绕着三大问题而进行斗争:一是在瑞挪联盟中尽力向瑞典争取更大程度的独立；二是尽力摆脱丹麦所遗留的巨大文化影响;三是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减少贫困和人口迅速增长的巨大压力。挪威的人口急剧增长,从 1800 年的八十八万人增长到 1900 年的二百二十四万人，即在一百年里几乎增加了三倍,而粮食却根本无法自给或得到满足,因而一直处于饥馑和贫困的阴影笼罩之下。由于求生的困难，挪威人便大量移民至美洲。从 1840 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挪威总共向美洲移民七十五万人，是继爱尔兰之后欧洲第二个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家。

二

1700 年挪威科学院在特隆海姆成立，标志着挪威的自然与人文科学提高到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挪威的文学是和挪威争取民

族独立的进程同步前进的，因而挪威文学中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激情始终是最明显触目的基调。在挪威历史学家和作家彼得·苏姆(1728—1798)和杰拉德·普宁(1722—1780)的历史著作中,尤其是在普宁的《挪威史》(三卷本,1771—1773)中都言之凿凿地宣称挪威乃是日耳曼初民们最早聚居的地方，而不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任何别的地方，而这些古代部落居民把挪威的自由概念带到了欧洲大陆上，因而欧洲大陆上的民主自由思想发源于挪威。1759年“挪威美学和实用科学促进会”成立。1759年‘挪威风雅社’成立。1763年挪威第一家报纸《挪威音信报》出版。这些社团的成立和报纸的出现无疑大大推进了挪威文学的发展。克里斯钦·图林(1728—1765)是当时用丹麦语创作的诗人中的佼佼者,被誉为继霍尔堡之后最杰出的诗人。布鲁恩（1745—1816）写出了《为巨人之家挪威干杯》（1772）,这首酒歌被誉为‘挪威的马赛曲”而流传至今。1772年由挪威在丹麦的留学生发起组织的“挪威社”在哥本哈根成立。“挪威社”积极从事争取独立的爱国主义文学创作活动。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剧作家，较有名的有约翰·布鲁恩(1745—1816)、约翰·维勃(1748—1782)、约翰·威塞尔(1746—1785)、克劳斯·法斯丁(1746—1791)以及因长诗《回乡》而饮誉文坛的托马斯·斯托克弗莱(1748—1808)。后来又有克里斯蒂·布拉姆(1756—1821)、尼古莱·韦格朗等人。他们的主要功绩在于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因而他们的作品虽然都是在哥本哈根用丹麦语创作的，但是在挪威国内广泛传播，并且得到农民和知识阶层的喜爱。其中，亨里克·安格尔·培累加德(1792—1842)所写的诗歌《挪威的儿子们》（1820）,后来成为挪威国歌。但是“挪威社”的诗人们无论在创作思想和技巧上都还停留在丹麦“黄金时代”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大体上都是启蒙思潮的新古典主义。“挪威社’诗人写诗是用丹麦语,以亚历山大诗体来创作的,韵律上几乎都采用六音步抑扬格，因而丹麦作家彼·安·海贝亚挖苦

说“与其自称‘挪威社’,不如改名‘丹麦社’更为确切。”不管怎样,“挪威社”在推进挪威民族文学甚至挪威的独立运动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不容嘲讽的。况且丹麦“黄金时代”文学的形成,伟大诗人欧伦施莱厄的成长都有挪威的贡献。这是因为把浪漫主义新思潮介绍到丹麦和挪威来的正是挪威哲学家、文学家亨·斯坦芬斯(1773—1845),他在哥本哈根大学讲授康德哲学,把费希特和谢林的观点都传播到丹挪王国来,从而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丹麦和挪威的传播和“黄金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出现。

三

随着挪威民族情绪高涨和独立运动的深入展开,挪威1814年提出的《埃德兹伏尔宪法》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瑞典本来拒不承认《埃德兹伏尔宪法》的合法性,但是迫于挪威人民维护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声势,只得在做出修改后接受了这部宪法作为挪威的根本大法。《埃德兹伏尔宪法》是当时欧洲所有国家中最民主的一部,任何其他国家的宪法都无法与之相比。它保障了民众代表享有必要的权利,重大国家事务必须由民意机构讨论决定,当时只有美国才享有这一民主自由。瑞挪联盟中瑞典国王固然有权行使权力和委任国务臣僚,但是立法和征税等事务却由议会来决定,议会提出立法动议后国王有否决权将其“悬而不决”,但是议会通过三次之后便可自行立法。瑞典国王卡尔·约翰十四世(1818—1844年在位)在1821年曾要求“绝对否决权”,但是挪威议会成功地抵制住这一要求,并且自行三读通过取消贵族等级的法律。瑞典国王老羞成怒,陈兵边界扬言要武力解决,即使面对这样的威胁,挪威议会也照样自行其事,不作让步。正是《埃德兹伏尔宪法》和挪威议会捍卫立法的决心才一再挫败瑞典国王要将瑞挪两国融为一体的阴谋。作为民族的象征,从19世纪20年代起,挪威全国庆祝5月17日埃德兹伏尔宪法日,瑞典国王试图阻止这种民族情绪大示

威,千方百计地设法破坏,并酿成 1829 年的“广场大惨案”。结果瑞典国王不得不让步，承认挪威可以有自己的国庆节和国歌。

从 1800—1830 年之间这段时间,在丹麦和瑞典都是以黄金年代著称的浪漫主义文学的高潮时期，然而在挪威却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诗篇。当时的诗人如西蒙·乌劳斯·伏尔夫(1796—1859)、康拉德·尼古拉·赛瓦赫(1793—1860)和汉斯·汉森(1777—1837)都虽然小有名气，却没有什么惊人的佳作。汉斯·汉森的诗篇《阿斯特里,我的阿斯特里》(1816)第一次采用挪威乡土语言来写诗，因而受到极大的欢迎。挪威国歌《挪威的儿子们》作者培累加德在 1824 年亦采用了挪威乡土语言来创作了民歌音乐剧《山中历险》。这几位诗人被称之为“埃德兹伏尔的一代”或“五月宪法派诗人”，至于为什么在近三十年的漫长时间中没有杰出的诗篇出现，挪威人辩解说：那是因为他们都忙于《埃德兹伏尔宪法》了。这句话虽是笑话，但也包含了一定的实情，因为挪威文学界确实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争取国家自由和宪法诞生的斗争中去了，不少人参加了埃德兹伏尔会议和宪法酝酿起草。“挪威社”领袖，当时最著名的诗人韦格朗就是《埃德兹伏尔宪法》的执笔者之一。

19 世纪初期驰骋挪威文坛的除了被奉为挪威诗歌先驱的韦格朗之外，还有诗人韦尔哈文。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以这两个人为首爆发了“两韦新旧之争”,这场文学争论一直持续了几年之久。以韦格朗为首的“挪威社”政治上属自由派，他们主张挪威应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彻底摆脱异国统治，争取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完全独立，同丹麦彻底决裂；在文学上他们是典型的浪漫派。韦格朗的诗作主要描写挪威的旖旎风光和人民生活，歌颂优美的民间音乐。他是第一个提出改革挪威语言的作家，主张提高工人、农民的教育水平，创办杂志，为增强下层群众的民族意识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发表了支持西班牙和俄国被压迫阶级、美国黑人，尤其是居住在挪威的犹太人的诗歌。他对在丹麦享有盛誉的欧伦施莱厄极为

蔑视,认为后者没有反抗政治和社会压迫。同‘挪威社’对立的、以韦尔哈文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维护传统，属于保守派，代表挪威文职人员阶层。他们认为19世纪初期的挪威诗歌过于浅薄，要想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外国文学的启迪下从事文学创作，因此这一派主张几百年来将挪威和丹麦联结在一起的关系不应该破坏，文化上存在的丹麦因素不能忽视。

亨里克·韦格朗(1808—1845)出生在克里斯蒂安桑市,父亲尼古拉是个牧师，曾在哥本哈根学习神学，在政治上积极主张摆脱异族统治，推崇法国革命，发表过小册子《丹麦在挪威犯下的政治罪行》(1816)。韦格朗深受父亲影响,他跟随着父亲的足迹,积极主张挪威独立。

韦格朗曾在奥斯陆大学攻读神学,1829年获神学学位。韦格朗从小爱好文学，十三岁时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十九岁时用笔名发表第一部剧本。第一部诗集《诗,第一组》发表于1829年。他的另一部诗集《创造力、人和救世主》(1830)发表后一个月便遭到韦尔哈文等人的抨击。挪威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坛辩论由此开始，韦格朗和韦尔哈文成为首次论战中的两位核心人物。

韦格朗对政府歧视犹太人极为不满，发表了《犹太人》(1842)和《犹太女人》(1844)，这两首诗直至今日还被挪威人民广泛传诵。它们在挪威政府给犹太人同其他外国人同等权利上起了很大作用。由于他的功绩，侨居在挪威的犹太人在韦格朗墓前为他树起了纪念碑。他的其他诗作还有《扬·冯·赫松姆的花卉画》(1840)、《一个古老的挪威庄园》(1835)以及在病榻上创作的《致我们的紫罗兰花》(1845)等。

韦格朗一生发表过大量剧本、讽刺小品和诗歌。他通过这些作品在人民群众中播下自由和正义的种子，揭露社会问题。他还积极从事启蒙教育活动,开办图书馆,创办杂志,散发小册子等等。

他为摆脱瑞典控制和丹麦影响，争取民主和民族自由而呼唤奔走，受到富人们的非难，但却赢得了广大下层群众和小人物的推崇。在他的号召下，挪威人民把 1814 年制定宪法的日子——5 月 17 日选为挪威国庆日。韦格朗虽然只活了三十七年，但是他在这短暂的生命中为挪威的政治独立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韦格朗的思想及创作对 19 世纪后期的作家如易卜生、比昂松等人产生了影响。

约翰·赛巴斯梯恩·韦尔哈文(1807—1873)出生于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父亲是医院牧师,母亲思想敏捷,善于言词,是丹麦作家约·卢·海贝亚[①]的亲属。这一背景对他影响很大。他在文学上从当时丹麦著名作家中汲取营养，在政治上愿意同丹麦继续保持固有的关系，这使他成为保守派中的重要一员。他于 1836 年到过法国和德国,1840 年被国王任命担任克里斯蒂安尼亚（即今奥斯陆)大学哲学讲师,1858 年赴意大利学习考古学。

韦尔哈文被挪威西部雄伟壮丽的景色以及高山冰川和峡谷之间的和谐美深深吸引，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描绘自然景色的，诗句优美生动，充满柔情。

1830 年 3 月韦尔哈文在《晨报》发表诗作,攻击以韦格朗为首的‘挪威社’派。1832 年他又发表《论亨里克·韦格朗的诗作》,全面抨击韦格朗的作品。

韦尔哈文主张诗歌不应该是直接感受的抒发，而应该是感情的回忆。他的第一部诗集《诗》(1839)回忆了同韦格朗的论战、在法国的旅游，描写多姿多彩的挪威自然风光，如《卑尔根一览》和《城市墓地》等。《新诗》集(1845)中有怀念已故妻子的诗歌《倒放的酒杯》、哲理诗《诗的灵感》以及民谣《天空中的骑士》。《五十首

① 约翰·卢兹维·海贝亚(Johan Ludvig Heivig，1791—1860)是丹麦有影响的作家，安徒生等作家都受到过他的赞赏和支持。

诗》(1848)大部分描写自然景色和叙述民间传说,也有怀念亡妻的《神圣的人》等。这部诗集被誉为挪威文学上最美丽的回忆诗篇。1851 年和 1860 年,他还发表过两部诗作,但都逊色于他 30、40 年代创作的诗歌。

四

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挪威自由主义力量有了进一步壮大,1848 年马尔柯斯·斯雷内领导成立了第一个挪威工会，挪威青年诗人和画家也在 1849 年春在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成立了挪威艺术家协会，并提出了一个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行动纲领：要以各种形式展示挪威农村的自然和文化的美，包括乡土风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艺术和民间语言。这一行动纲领无疑是同韦格朗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的，但也有明显不同，那就是它已不再仅仅是呐喊，而是以实际行动来推动挪威文化的发展。

彼得·安德雷斯·蒙克(1810—1863)于 1845 年至 1850 年编纂出版了《挪威古代法律》三卷本,1851 年至 1863 年又编纂出版了《挪威人民历史》六卷本,填补了挪威文化的空白。

彼得·克里斯滕·阿斯比恩森(1812—1885)在挪威民间文学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同主教、诗人尤根·莫(1813—1882)一起致力于收集挪威民间文学。他们先后整理出版了《挪威民间故事》(1841)、三卷本的《挪威民间故事》(1842—1844)和两卷本的《挪威民间传说》(1845—1848)。他们所收集整理的挪威民间文学在语言艺术上有独到之处，他们率先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直接使用挪威农民和下层人物的日常用语，因而这些作品没有丹麦挪威语的华丽辞藻。在韵律上，以前挪威诗歌往往带有浓厚的丹麦和德国腔调，如今却散发出朴实无华的乡土气息；这种粗犷朴实的语言被上层人物嗤之以鼻，甚至韦格朗的妹妹卡米拉·科莱特也撰文攻击其

粗野鄙俗，说它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乡里坊间的俚语秽言，然而这种语言却受到了挪威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欢迎和传诵。

挪威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使用历来是个大问题。上层阶级用国语，即丹麦挪威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了在生活、情趣等方面同中下层民众相去甚远外，即便语言上也和后者的日常用语迥然不同，因而挪威语言改革家克努德·克努德森(1812—1895)对韦格朗等人的诗作所使用的丹麦挪威语进行了抨击，提出应创造一种"纯正"的挪威民族语言，以丹麦挪威语为主体并吸收消融本国乡土语,将当时并存的两种语言从拼音、语法、韵律上合二为一,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挪威民族语言，然而他的努力未获成功。

伊凡·奥森(1813—1896)周游了挪威全国的乡村，收集了大量方言材料,于 1848 年出版了《挪威人民的语言》,这是挪威民族语言的第一部成文的语法书。1850 年他出版了第二部《挪威乡村语言词典》,将民族语言的词汇规范化。1853 年他又出版了《挪威乡村语言范例》，除收集日常对话外，还首次用这种乡土语言翻译了莎士比亚、席勒等名家的作品。奥森本人也用这种语言创作了剧本《傍晚》(1855)等，深受中下层民众的欢迎。1864 年和 1873 年他相继出版了《挪威语语法》和《挪威语词典》。至此"纯正"的挪威民族语言已形成并为社会所接受。奥森将以往的丹麦挪威语称为"老挪威语",而把这种新的语言称为"新挪威语"以示区别。在此期间诗人阿斯蒙德·维内(1818—1870)等人又将"新挪威语"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并用它写出了不少优美作品。

卡米拉·科莱特(1813—1895)是 19 世纪中期最令人瞩目的挪威文学家。她是挪威第一个女作家，发表了挪威第一部长篇小说。科莱特是著名诗人韦格朗的妹妹，由于同父兄的宿敌韦尔哈文相恋并且支持保守的文学观点而同家庭龃龉不和，后来长期定居在丹麦。1854 年至 1855 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省长的女儿们》上下两卷本。这部小说写的是某省长夫妇有四个女儿，一个女儿因

婚姻不幸而早殇,一个女儿爱上了一贫如洗的教区牧师,聪明美貌的小女儿苏菲爱上了相貌英俊的家庭教师科尔德。她鼓足勇气向科尔德表白了爱恋之情,科尔德虽也爱上了苏菲,但却向好友吹嘘自己受到苏菲苦苦追求,并拒绝了她的爱情。这使苏菲受到极大刺激,便接受了一个富有的鳏夫的求婚。在结婚那天,她与科尔德相遇,知道了科尔德对她仍痴心相爱,但苏菲拒绝了他。

这是挪威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较简单,也有许多是取材于她与韦尔哈文的长期热恋而遭父兄反对的痛苦心理,在写作手法上沿袭了德国和丹麦的一些作家的表现方法,采用了大量的日记、信件和第三人称叙述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语言上她仍使用了上流社会的丹麦挪威语。这部小说也是挪威第一部女性文学作品,触及妇女受歧视和压制、不能独立、包括婚姻在内的大事都要受父母家庭摆布的屈辱地位等问题。

科莱特还著有短篇小说集《漫漫长夜》(1862)、《逆流而上》(1879)、《最后的文章》(1868)等许多作品。但是她对挪威文学产生影响的还是小说《省长的女儿们》。易卜生的《爱的喜剧》(1862)和约纳斯·李的《吉尔伊一人家》(1883)都吸收了她的不少创作意境和写作技巧。

阿斯蒙德·维内(1818—1870)是用新挪威语创作的诗人,是浪漫主义和早期现实主义文学过渡时期的作家。他出身于佃农家庭,虽出生清苦,但他雄心勃勃,三十八岁时获得法律学位,1858年至1870年创办并亲自主编一份周刊《来自山谷的人》,他在周刊中发表了不少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故事。他最著名的作品《1860年夏天的旅行报道》(1861)充满冷嘲热讽、令人感兴趣的言论和意见,还引用了他自己作的诗歌,包括他最出名的一首诗《返回隆达内家乡》。

1862年至1863年他从英国访问回来后发表了《一个挪威人对英国人和英国的看法》(1863),批评英国的物质主义和阶级区

别。他的有些诗歌,如《受了伤的心》和《大潮》由挪威著名作曲家格里格谱曲,在人民中广泛传唱。

维内是运用新挪威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先驱人物，他为新挪威语文学登上挪威文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 19 世纪 60 年代就提倡运用新挪威语,并身体力行,他用一个新挪威语的词表达外来词的时候，往往把这个外来词加在括号里放在他创造的新挪威语词之后，使人读时能更好理解。他努力简化句法，使其尽量简短，接近日常口语。新挪威语课本直到 1885 年才进入小学，到了 1892 年各市政当局才有权自由决定在自己管辖地区的学校里用国语还是用新挪威语进行教育。在此之前，新挪威语同挪威国语是不平等的,新挪威语的报纸也只有一份周报,也没有什么具有国际声誉的作家。

第五节　冰岛民族开始觉醒，文学进入启蒙时期

冰岛位于大西洋北部，紧靠北极圈。874 年一位名叫英戈尔夫·阿尔纳松的挪威部落首领因被挪威国王驱逐，率领部族到冰岛定居，此后，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不断有来自挪威，间或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来定居。这种移民时期一直到 10 世纪前期才结束。930 年在雷克亚未克①召开了名为“阿耳庭”②的全体居民大会,古代冰岛共和国形成。1262 年冰岛成为挪威附属国。1380 年,丹麦国王兼任挪威国王，冰岛也就成为丹麦的附属国。1534 年挪威被丹麦兼并,冰岛也成为丹麦属地。从 16 世纪 30 年代后期起,冰岛人民开始发动反对丹麦统治的斗争。从 19 世纪中叶起,冰岛民族主义运动逐渐高涨,直到 1944 年 6 月，冰岛才正式宣布脱离丹冰联盟，

①雷克亚未克现为冰岛首都，意为“冒烟的海湾”。

② 冰岛文为 Allting,即现在的议会。

成立独立的冰岛共和国。

冰岛的语言同瑞典、丹麦和挪威一样属于日耳曼语系。中世纪时,这四个国家的语言十分接近,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丹麦、挪威和瑞典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而冰岛的语言同古代中世纪语言区别不大。

挪威人移居冰岛时将流传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的文学《埃达》和《萨迦》[①]也带到了冰岛。这种文学是北欧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但是丹麦和挪威这类作品保存无几，而瑞典则几乎一点没有保留下来,流传至今的北欧《埃达》和《萨迦》主要是冰岛的作品。冰岛人不但将这些作品流传下来，而且还产生了自己的《埃达》和《萨迦》作家。这些古代作品在当今的冰岛仍然不断再版,跟当代作家的作品一样被广泛地阅读和研究。冰岛自 1262 年成为挪威附属国后，在文学上《萨迦》和《埃达》创作艺术逐渐衰退。1534 年冰岛随着挪威被丹麦兼并也沦为丹麦属地，文学创作处于萧条时期。

从 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初期,即 1750 年至 1830 年,是冰岛的启蒙运动时期，也是冰岛民族开始觉醒、国家开始进步的重要时期。

冰岛几世纪来由于异族统治压迫、饥荒以及恶劣的气候和物质条件，人民一直处于贫困和绝望的深渊。18 世纪后半叶起,随着英国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以及法国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作品的传入，人民要求发展科学、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启蒙运动开始在冰岛兴起。启蒙运动者致力于普及教育，他们认为只要把真理和真知传给每一个人，一个幸福的世界就可以建立起来，因此教育和启蒙成为当时最为时髦的口号。冰岛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有诗人和自然科学家埃盖尔特·奥拉夫松、农学家

①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四节。

比尔恩·哈尔多尔松、社会经济学家荣·埃里克松、主教哈内斯·芬恩松、主编马格努斯·凯梯尔松、民族主义者和法院院长马格努斯·斯坦芬森等。他们成立了各种文学社团,如“无形社”(1760)、“冰岛博学艺术社”(1779—1796)和“启蒙社”(1794—1827)等,并且出版了各种刊物和书籍,如《皇家之镜》(1768)和《冰岛月刊》(1773—1776)等。1773 年一个印刷非宗教文学的出版社成立,打破了教会长期以来对印刷书籍和纸张的垄断。在众多的社团中有两个较为重要,一个是由丹麦语言学家拉斯莫斯于 1816 年分别在雷克亚未克和哥本哈根成立的“冰岛文学社”,其宗旨是维护冰岛语言,出版古今冰岛文学;这个文学社为冰岛人民的文化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另一个是 1825 年成立于哥本哈根的“北欧皇家古籍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不少古代冰岛作品和王室萨迦等。这些作品引起冰岛人民对古代萨迦文学的兴趣,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冰岛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冰岛的启蒙运动者为了打破两百年来“上帝的话”主宰冰岛的局面,首先出版各种知识性的书籍和小册子,教育人民怎样种田,怎样捕鱼,通过发展生产,提高生活。他们还用生动的寓言、故事和短剧以及简洁易懂的对话、文章和箴言来叙述自然科学、地理和历史,如哈内斯·斯坦芬森(1762—1833)的《快乐朋友》(1791)就是用这种深入浅出的形式写成的。

冰岛的启蒙运动者不但自己发表作品,而且还把英国的弥尔顿和蒲柏、挪威的图林、丹麦的埃瓦尔德和德国的克洛卜施托克等人的作品译成冰岛文,这些翻译作品对推动冰岛启蒙文学的发展和诗歌的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埃盖尔特·奥拉夫松(1726—1768)是启蒙运动初期的重要诗人和研究冰岛地理和自然史的学者。他出身于西部斯纳费尔斯内斯的农民家庭。1748 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发表了两篇关于冰岛自然史的论文,引起丹麦科学院的重视,推荐他对冰岛

的地理、地貌、自然资源和人民的生活习俗进行考察研究。1752年至 1757 年,他和比约尔尼·鲍尔松一起在冰岛各地旅行调查，写成《周游冰岛》一书(共二卷),于 1772 年首先用丹麦文发表，后被译成德、法、英等多种文字在各国发表。这是冰岛历史上第一部对这个国家和人民进行详尽而有权威性描述的巨著。

埃盖尔特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发表过大量诗篇。他是第一个在诗中把冰岛比喻为‘ 高山妇人 ’的诗人,直至今日,冰岛诗歌和绘画艺术仍不断借鉴这一比喻。他还是第一个用诗来描写冰岛自然风光的诗人。他的诗作洋溢着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深深的爱和对本国历史和古代文学的崇敬。《农民阶层》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这是由一系列诗歌组成的诗集，描述生活在美丽的自然风光中的冰岛农民节俭、活跃而富有幻想的生活。埃盖尔特于 1768 年 5 月在返回家乡途中溺海而亡，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他对冰岛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18 世纪后期最主要的诗人是荣 ·索尔劳克松(1744—1819)。他出身于牧师家庭，长期在物质贫乏、气候严酷的冰岛北方担任乡村牧师。他虽然也写诗，但是他对冰岛文学的贡献主要是翻译了弥尔顿的《失乐园》、克洛卜施托克的《救世主》以及蒲柏的诗,这对冰岛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古德尔·彼得松(1759—1827) 是冰岛第一个剧作家,写了两部莫里哀一霍尔堡式的喜剧《克劳尔福尔》和《纳尔费》。《克劳尔福尔》是讽刺爱讲闲话和爱传流言蜚语的人;《纳尔费》揭露和挖苦那些热衷于模仿丹麦商人的愚蠢的势利小人。但是这两个剧本的文学价值并不太高。荣 ·斯坦恩格里姆松(1728—1791)发表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文字简洁朴实，不但生动真实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且也是他同时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深受读者欢迎。此外还有贝尼迪克 ·格伦达尔(1762—1825)等也较为有名。

第六节　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问世

一

1809 年俄国从瑞典手中夺得了芬兰，从而结束了瑞典在芬兰长达六百年的统治，芬兰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大公国。俄国在芬兰基本上采用意在笼络的怀柔政策，一直到 19 世纪后半期都没有重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当时俄国虽然由于瑞典贵族阶层里应外合轻易地占有了芬兰，但是俄国的军力不强，在芬兰又没有多少历史渊源，因而必须尽力讨好芬兰的贵族知识阶层（他们的大多数人都是瑞典籍的）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这一层显而易见的考虑之外，还是因为俄国面临拿破仑法国这一令它寝食不安的强敌。1807年俄国刚刚新败于法国，不得不与法国缔结“提尔西特和约”,1809 年俄国与奥地利、瑞典、英国组成第五次反法同盟,1812 年法国进攻俄国，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城下，直到 1813 年第六次反法同盟才出现了转机，俄英奥盟军在莱比锡战役大败法军，拿破仑不得不退位。正是在这样的战略形势下，俄国对芬兰必须笼络住这一大块刚刚纳入其版图的领土，否则便会后院失火不可收拾，况且瑞典还会乘机而入重新夺回芬兰。因而，1809 年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芬兰波尔沃召开议会，宣布除了芬兰总督必须由俄国官员出任之外，芬兰其他大小官职均可由芬兰人担任，但必须由沙皇加以委任。芬兰原有的行政权力机构和官员特权以及一切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全都予以保留。沙皇还信誓旦旦地明确承诺除了外交和军事之外,芬兰应享有‘国家的尊严”,沙皇一般不干预芬兰的内政自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以自由派的开明君主而著称，他的怀柔政策迅速而果断地稳住了芬兰，事实证明，这项政策具有深远的效应作用，确实笼络住了芬兰，以至于拿破仑

进军莫斯科，沙皇政权岌岌可危之际，芬兰这片新领土上不仅没有发生叛敌动荡或者与瑞典重叙旧缘，反而与沙俄同仇敌忾，而且几乎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甚至到了后来的波兰战争（1830—1867）和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5)期间,芬兰亦经受住考验,保障了沙俄北翼不受威胁，减轻了沙俄蒙受的巨大压力。由于芬兰一直保持稳定并且对沙皇惟命是从，因而被誉为俄国这个动乱不已的大家族中的“一个听话的孩子”。芬兰之所以如此俯首臣服于俄国，乃是因为与以往瑞典的高压政策相比，俄国确实给了芬兰不少实际的好处,芬兰在整个 19 世纪期间一直拥有自己的政权，恢复了被俄国占领百年之久的维堡省，修建起铁路，成立了中央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也就是说芬兰除了军事、外交之外,在社会制度、法律、经济、文化、语言和宗教各方面都享受自治权,这也正是芬兰贵族上层阶级所梦寐以求的。这种稳定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推行“神圣同盟”的黑暗统治的亚历山大二世接位为沙皇止，俄国这时才逐渐强化对芬兰的统治，而且与瑞典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有种说法是“亚历山大如不早死，他的亲善政策如继续推行，芬兰便不会从俄国独立出去”。

俄国占领时期，芬兰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得到恢复增长，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迅速起步，首先是在锯木业和木材加工业方面，产品销往欧洲和俄国市场，带回了丰厚的利润，这又刺激经济更快增长。1812 年芬兰首都从土尔库迁到赫尔辛基，1870 年赫尔辛基与俄国彼得堡之间已有铁路通车。 1812 年芬兰首都由土尔库搬迁到赫尔辛基，随后土尔库学院也迁到新首都并改名为赫尔辛基大学。在俄芬的蜜月期间，新的宗主国不同于瑞典，不是想方设法扼制芬兰的民族语和文化，而是鼓励芬兰语用以取代长期作为官方语言的瑞典语。

语言问题始终是芬兰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便芬兰后来要向俄国争取独立之际，矛盾的爆发也是首先从语言范畴引起的。语言

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个政治问题。除了三十万定居在芬兰的瑞典移民全都讲瑞典语之外,芬兰的‘上等人’才有资格讲瑞典语,他们从小接受瑞典教育，后来还要到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或是隆德大学去深造，只有受过瑞典高等教育，精通瑞典语的芬兰人才能谋求一官半职，而出任神职还必须精通拉丁语。芬兰语只是“下等人”使用的土语,因而直到 1858 年芬兰才成立了第一所用芬兰语教学的中学。这就必然阻碍了芬兰民族文学的发展。芬兰民族文学是由 16 世纪末阿格里科拉开始创建的，17 世纪芬兰语文学主要是由诗歌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到了 18 世纪‘波萨时期’芬兰文学才有了相当巨大的发展，启蒙思潮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成为一股推动文学蓬勃发展的力量，而民族文学的发展又对芬兰维护民族特征，争取民族独立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芬兰的语言文化具有凝聚民族感情、保持民族特征的首要地位还表现在 19 世纪初期芬兰的文学家几乎都是从政的，当时的芬兰议会召集人斯奈尔曼(1806—1881)就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的迅速增长，1809 年俄国占领时期开始时芬兰人口近九十万,到 1908 年已大大超过两百万,而到 1918 年芬兰独立时则增加到将近三百万。不仅人口迅速增长，而且朝城市集中。

二

土尔库浪漫主义时期

在 1804 年波萨去世之后,芬兰文学曾有过一段几乎是沉寂的宁静时期，芬兰浪漫主义开拓者诗人弗朗士·弗朗兹(1772—1847)虽然仍在用瑞典语写诗,他的名著《老兵》(1793)以一个守卫萨依玛岛的老年士兵刻画出了芬兰民族刚毅的性格和坚强的斗志；长诗《芬兰的沃野》既描写了芬兰的旖旎风光,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憧憬着芬兰将摆脱异族统治而成为像英国那样繁荣富强的发达国家。然而弗朗兹终于无法忍受 1809 年芬兰朝野上下亲俄仇瑞的一边倒气氛，于 1811 年去瑞典定居。波萨去世和弗朗兹的出走标志着芬兰瑞典语文学时代的结束，因而芬兰文学上留下了一段难以弥补的空白。当时芬兰的文人作家大多由以往奉承瑞典而摇身一变为俄国歌功颂德。最典型的是诗人彼得·瓦纳宁（1764—1846）他以前作为议员曾在瑞典议会赋诗颂扬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四世，而今又在波尔沃议会上赋诗颂扬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当时有不少芬兰文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政治立场，即仰望东方以俄为荣，有些人干脆迁到彼得堡去，如民俗学和语言学家斯约格伦（1794—1855）后来成为彼得堡很有影响的著名人物。正因为芬兰大多数文人和知识阶层对俄国抱有幻想而阿谀颂扬，因而他们对芬兰被俄国兼并的行径讳莫如深，往往只字不提，甚至在作品中把俄国比拟为帮助芬兰人赶跑了可恶的瑞典人，摆脱了他们的压迫的“解放者”。由于芬兰文人的作品大多是这类感恩戴德的诗歌，因而俄国对芬兰文学未曾过分戒备，以为芬兰会就此俯首帖耳，一直充当“听话的孩子”的角色。然而年轻而激进的浪漫派诗人阿尔维德逊（1791—1858）却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瑞典人我们不能当，
俄国人我们不肯当，
让我们就当芬兰人！

这一铿锵有力的诗句是芬兰人民族自豪感的结晶，如今已载入芬兰史册，成为激励芬兰人民的名句。这一诗句不胫而走，在当时被芬兰人竞相传诵，引起了俄国当局的警觉和震惊，因为他们从诗句中觉察到芬兰人在顺从驯服的表面底下竟还蕴藏着反抗的意志和力量。俄国当局对以土尔库学院为中心的芬兰文人严加控制

管束，逐步强化监视和迫害，以致阿尔维德逊在土尔库无法容身，不得不逃到瑞典去定居，后来担任了瑞典王室图书馆长达十五年之久。

事实证明，俄国当局的警觉和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庸人自扰。芬兰在 19 世纪初期已出现了一股爱国主义的潜流，也就是被称之为“土尔库浪漫主义”的文学活动。土尔库学院是 1640 年由瑞典人创建的,由于土尔库在瑞典语中被称为‘奥堡’,因而土尔库学院的瑞典语称呼亦成了“奥堡大学”。在土尔库大火之后于 1828 年迁移到赫尔辛基，并更名为赫尔辛基大学。土尔库学院是当时芬兰精英荟萃、群贤毕至的惟一高等学府，也是芬兰思想最活跃的场所。在俄国统治初期土尔库学院曾因为芬兰获得自治和特权而欢欣鼓舞，成为亲俄势力的据点。波萨时期组织起来的“朝霞协会”早已销声匿迹，但是它的领导骨干却成了亲俄势力的中坚骨干，其中最有名的是雅可布·滕斯特罗姆(1755—1832),滕斯特罗姆对芬兰民族文化和文学曾做出过贡献，他是土尔库学院的哲学教授，又是《奥堡周报》的主编，并被遴选为瑞典文史哲学院院士。他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和赫德尔的文艺理论系统地介绍到芬兰，从而培养出了斯内尔曼为代表的芬兰 19 世纪初期和中期一代人,主要著作有《关于芬兰文学和语言发展的几个问题》。他的政治态度非常明确，即仰望东方与俄国亲善。他在波尔沃议会和亚历山大一世宣布给予芬兰内部自治特权等重大问题上都和俄国步调一致，积极配合。由于极端亲俄，滕斯特罗姆还落下了“卖国贼”的恶名。甚至他的曾孙后来也这样评价他：

愚昧的大无畏气概，
造成英雄将是非颠倒
如此聪明的救国之道
岂能得到宽宥饶恕。

在俄国以为施舍恩惠怀柔笼络住了芬兰精英荟萃的土尔库学院之际，有滕斯特罗姆等一大批芬兰著名的学者文人的阿谀奉承，竭力颂扬新主子，这使得俄国更加有恃无恐。而土尔库学院的思想活跃的年轻大学生们对芬兰的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仍在执着地进行探讨，他们遵循了波萨和弗朗兹所指引的方向，为发展芬兰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和唤起芬兰民族觉醒而忘我地继续奋斗。他们创办了社团，出版刊物，宣传对社会和传统文学的叛逆精神。这个社团和涌现出来的一批新人后来以“土尔库浪漫主义派”而闻名于世。土尔库浪漫主义时期虽然还没有涌现出不朽的传世名著，但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在芬兰得到传播并且和芬兰爱国主义民族情绪结合起来，这就为后来的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奠定了基础，为芬兰民族文学中享有‘国宝’之称的英雄史诗《卡勒瓦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芬兰 19 世纪著名诗人鲁内贝格、伦洛特和语言文学家斯内尔曼都是由土尔库浪漫主义时期所培养出来的。

土尔库浪漫主义时期最著名的是诗人阿尔维德逊、尤太尼和科伦德，以及农民诗人科尔赫宁等人。

以《土尔库报》和‘土尔库文学社’为中心的土尔库浪漫主义派主要诗人有：阿·伊·阿尔维德逊（1791—1858）、尤·加·林深（1785—1848）、阿勃拉海姆·帕皮乌斯（1793—1866）、亚科·尤太尼（1781—1855）和卡尔·科伦德（1796—1872）。

阿尔维德逊从少年时代就跟随着芬兰的瑞典贵族南征北战，是在和俄国军队作战的军旅生活中长大的，并且亲身经历了 1808—1809 年对俄国的战争。后来他进入土尔库学院担任历史学讲师。他接受德国浪漫主义的文艺理论，并且力求以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他的爱国热忱。正如他在抒情诗《在铁匠的熔炉里》中所呼喊的：

在永恒的长河里
地火奔腾翻滚，
烈焰燃烧熔化着
恒久而古老的惰性
所冻结成的冰块。

他所创作的描写英雄万奈摩宁打造出竖琴一诗可说是鲁内贝格的长诗《英雄在烈火中永生》的姊妹篇，已并列地成为芬兰文学的经典之作。这首诗以民歌传诵的史诗英雄万奈摩宁的历险为题材，歌颂了芬兰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虽然身处绝境而毫无畏惧的英勇气概,诗中写道：

古代英雄万奈摩宁当仁不让，
自告奋勇担起了铁匠的重活。
他用狗鱼的骨头造出一把竖琴，
尖硬的鱼刺变成了康坦拉。

这首诗里的‘ 打铁 ’和‘ 鱼刺打成琴 ’显然都是有所指的,而不可一世的沙皇竟然被比喻成了一条凶残成性却没有头脑的狗鱼，这就不能不叫俄国当局气愤不已。阿尔维德逊还明确声称：“ 新的时代已来到，新生的力量必须得到成长，因而芬兰的青年知识阶层必须全副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任务之中去。”而他的名句“: 瑞典人我们不能当,俄国人我们不肯当,让我们就当芬兰人 ”,在芬兰各地到处传诵，更是令俄国当局暴跳如雷，生怕煽起民变。阿尔维德逊被土尔库学院终身开除，为了躲避迫害，他只能逃到瑞典去容身。在瑞典阿尔维德逊虽然得到了生活保障和优厚待遇，但是他对芬兰的深情却丝毫未减，也正因如此他竟然再也写不出精彩的诗篇来了。阿尔维德逊的仓皇出逃既表明了俄国当局对芬兰知识阶层加

剧迫害监视，也表明土尔库浪漫主义时期的突然夭折。在此之后，林深继阿尔维德逊之后领导土尔库浪漫主义派的文学活动，并且于 1833—1841 年担任芬兰文学社的主席。芬兰文学社是后来才在赫尔辛基成立的，当时土尔库浪漫主义派文人有了阿尔维德逊的前车之鉴，不得不采取更谨慎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往往以文化和语言问题为题材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忱。林深所写的专著《关于开拓芬兰民族语言的重要意义》和《论芬兰人的民族特性》等都是具有深刻内涵和含意的，却又叫俄国当局难以抓到把柄贸然下手迫害。林深在他写的八行体诗《芬兰人的祖国》里这样写道：芬兰人感谢瑞典照顾了童年的芬兰；也感谢俄国，因为它必将给予青年的芬兰以同样的关怀，但是芬兰的价值必须由芬兰人自己来认识。林深还在他的论著里写道：芬兰语如同梦境一般纯洁，因为芬兰民族从未扮演过政治角色，它一直过着一种未曾片刻中断过的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因而它的语言亦是既有诗一般的丰富内容，又有歌一般的动听韵律。

亚科·尤太尼（1781—1855）反对异国语言在芬兰占统治地位，坚决主张让本民族语言芬兰语成为正式官方语言。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为提高芬兰语的地位，为发展芬兰文学事业努力奋斗着。他身体力行，一生一直用芬兰语创作。尤太尼出生贫苦，当过放牛娃，但是他天赋聪颖，才华横溢，早在土尔库学院学习期间就发表了诗集《诗选》（1810），学业完成后在维堡市政单位谋到一个职位，直至退休。

尤太尼的作品有诗歌、论著、小说和戏剧。他发表过道德教育诗《箴言》、歌颂民族解放者的《波赫亚战歌》和反映人民生活的《新谚语》等诗歌。为了表明芬兰语不仅能用在日常交谈中，而且完全适合创作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他写了剧本《家庭》（1871）和《恶毒中伤的笑话》（1817）以及小说《命名日》（1824）。他于 1833 年创办芬兰文化报《来自维堡的使者》，以增加芬兰语的读者范围，扩大影

响。为了纯洁芬兰语言,使其不受外来语言的影响,去掉口语中的古怪成分，尤太尼还编纂了一本用瑞典语撰写的芬兰语语法书。他在该书的前言中以生动的语言赞颂了芬兰语的和谐美，称它自成一格，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超过它。19 世纪后期著名诗人阿·奥克萨宁(1826—1889)对尤太尼的创作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他的目标不在于审美情趣，而在于仁慈和善良。他很少让自己的幻想超越日常生活的范围。这个评价是既实在又十分妥帖的。

卡尔·科伦德(1796—1872)虽然出身在瑞典语区的一个牧师家庭,但是同尤太尼一样,他不屈不挠地为普及芬兰语,提高芬兰语地位，繁荣芬兰语文学，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坚持不懈地努力。1817 年他在《瑞典文学报》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芬兰民族诗歌中完全有像《尼伯龙人之歌》这样的英雄史诗,这为《卡勒瓦拉》的诞生作了有力的舆论准备。他从民间口语中收集芬兰语诗歌，并于 1818 年整理成集出版。1819 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同一个外国留学生冯·舍罗德一起把三十四首芬兰语诗歌翻译成德文出版。这本集子于 1834 年又由冯·舍罗德的兄弟再版发行，它为后来的德国浪漫派作家对芬兰民间诗歌产生兴趣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巨著《芬兰趣谈》(三卷本,1828—1832)一部分是由他自己撰写的,一部分是由他搜集整理的。这是一本集芬兰考古学、历史、民间传说、语言以及科伦德自己创作的诗歌为一炉的论文集锦。这是一部为想了解芬兰的文化人士所准备的书籍。

1839 年科伦德从瑞典回到芬兰，在赫尔辛基任芬兰语教师，出版了不少有关芬兰语言的专著,如:《芬兰词源学》(1853)、《系谱学》(1862)和《萨沃和卡累利阿地区人名地名研究》(1872)等,空余时间他还把瑞典诗人贝尔曼的诗歌译成芬兰文。

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

每年 2 月 5 日是芬兰的诗人节,那一天芬兰人民载歌载舞,朗诵吟哦，欢庆这一节日，这一天是芬兰的诗歌先驱和代表人物鲁内贝格的诞辰日，芬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而将他的诞辰定为‘ 芬兰诗人节 ”。除了鲁内贝格之外,在 19 世纪初期的芬兰文学领域里的中坚力量还有斯内尔曼和伦洛特，他们三个人不仅是芬兰 19 世纪文学的中流砥柱，也是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派的领袖人物,并且为 20 世纪芬兰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这个时期里由伦洛特收集编纂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是芬兰人民广泛诵读的杰作，也是芬兰人民至今引以为豪的民族文化瑰宝，并且早已成为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最享有盛誉的芬兰文学名著。

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派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土尔库浪漫主义的延伸和继续，只不过作一些明显的改头换面，采取了更隐晦的方式来从事带有爱国主义色彩和宣扬民族情感的文学活动。这是因为 19 世纪初期以青年诗人阿尔维德逊为首的土尔库浪漫主义派发动的第一次民族觉醒运动政治色彩十分明显而触目，反对俄国、怀念瑞典的情绪也溢于言表，因而很快就遭到俄国当局的迫害和镇压，鲁内贝格、斯内尔曼等人吸取了这一教训，便以纯粹的语言和文学的面貌出现，他们中间除了伦洛特是用芬兰语写作之外，鲁内贝格和斯内尔曼都是用瑞典语写作的，这就更容易招惹忌恨，他们的处境困难还在于俄国占领的初期，芬兰政界和知识界对芬兰语和芬兰文学的发展持有偏见，瑞典语仍像以前那样被他们奉为正统，而且由于欧洲尤其法国革命形势高涨，他们更要讨好俄国为虎作伥,因为他们害怕芬兰的‘ 刁民 ”‘ 群氓 ’也被煽动起来作乱。芬兰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越来越受到严厉限制。 1829 年颁布实施的《出版检查法令》使得芬兰语版的报刊和书籍除了圣书之外中断

了好几年。如果没有鲁内贝格、斯内尔曼为首的和以伦洛特等人为代表的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派的积极奋斗，芬兰文学的发展必将被拖延推迟好多年。

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派是在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根据康德哲学和费希特、谢林的文艺观点从事创作活动的，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们的集会也采取了家族沙龙的形式，鲁内贝格的家成为他们的活动场所，被称为“周六晚聚会”。“周六晚聚会”存在了将近十年之久,对促进芬兰民族文学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政治压力和经济困难的双重逼迫下终于停止了活动，而鲁内贝格虽然非常谨慎，甚至还抨击了瑞典的一些文学家，他也因此遭到瑞典文学界的谩骂围攻，被斥之为“芬兰的文痞”。然而鲁内贝格终于未能躲开当局的迫害，1837 年不得不离开赫尔辛基,移居到波尔沃城,在那里任中学校长。

约翰·柳德维格·鲁内贝格(1804—1877)是雅可布城中一个船长的儿子,他十多岁时,父亲突然中风瘫痪,不能工作,家庭经济一落千丈,在土尔库上大学期间,鲁内贝格不得不到乡村去当家庭教师,以挣膳宿。但是乡间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朴素的民风都给年轻的鲁内贝格留下深刻印象，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他创新了芬兰的抒情诗歌，是当时惟一能与欧洲浪漫派大诗人，如席勒、普希金等人有同等世界声誉的芬兰作家。他以三部《抒情诗选》(1830、1834、1843)而名噪一时。他的这些诗作讴歌了芬兰旖旎的自然风光和芬兰人民的朴实诚挚。诗中创造了一个名叫帕沃的芬兰农民形象，他的田地不断遭到冰霜袭击，没有收成，面包里加上一半树皮充饥,但他毫不灰心,继续耕耘不止,在他经过努力,战胜自然,获得丰收的时候,他仍对妻子说:你在面包里加上一半树皮,因为冰霜覆盖着我们邻居家的田地。长篇叙事诗《麋鹿猎者》(1832)、《哈娜》(1836)、《圣诞夜》(1841),尤其是《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第一卷 1848,第二卷 1860)奠定了他在芬兰诗坛

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诞辰被定为芬兰的"诗人节"。《麋鹿猎者》描述猎人和一个庄园主的女仆之间的爱情故事。《哈娜》通过对农村美好自然风光的描写烘托出哈娜和她恋人的纯真感情。《圣诞夜》描写伤残老兵在圣诞夜获悉儿子在前线阵亡消息后所表现出的坚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两卷本《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是鲁内贝格的代表作,第一卷发表于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动荡年，第二卷发表于 1860 年,内容描写了 1808 年至 1809 年瑞俄战争期间芬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所做出的贡献，讴歌了芬兰人民团结一致的坚强信念和勇敢精神。这部作品一开头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国家》,在 1848 年学生节时被谱成曲歌唱，一百多年来一直激励着芬兰人民。1917 年芬兰独立后，它被正式定为芬兰国歌。这部史诗受到芬兰人民的喜爱，一直流传至今。

约翰·维尔海姆·斯内尔曼(1806—1881)同鲁内贝格一样出身于船长家庭，同时期在奥堡学习，后来又是鲁内贝格家中"周六晚聚会"的参加者，但不同的是斯内尔曼主要不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政治家。他一生致力于唤醒民众，提高人民觉悟，为振兴国家而努力奋斗。他对文学感兴趣是因为他认为文学是民族精神生活中的中枢。

斯内尔曼出生在瑞典,1813 年跟随父母移居到芬兰,1822 年进入土尔库学院哲学系,1835 年任学院哲学系教员。由于同学院当局和执政者意见相左，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到瑞典、丹麦和德国等地旅行考察。1840 年他从瑞典斯德哥尔摩给他的挚友，也是"周六晚聚会"参加者弗莱德里克·斯格内乌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以沉痛的语气写道：芬兰的主要问题是讲芬兰语的芬兰人受到排挤，他们的文化要求和发展被忽视了，并且指出"芬兰民族其实是被埋在坟墓之中"。在庆祝赫尔辛基大学二百周年时他又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说："你们的欢庆像是在葬礼上跳舞。国家对此明白

吗？”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是人民自己觉悟起来。因此，斯内尔曼热衷于办报刊，以此来唤起民众。他办过不少报刊，如 1844 年的《农民之友》和《萨依玛》，1847 年的《大众文艺报》，1855年的《文艺报》等等，报刊名字不断变换，但他办报的宗旨始终没有变，那就是芬兰语应该成为全民族的语言。由于当局的干涉、查禁，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报刊改名。他还倡导发展芬兰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下了以下定义：一、建立在本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文学；二、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三、促进民族觉悟的文学；四、以自己的榜样来影响民族发展的文学；五、维护和保持业已存在的、同时又使全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民族精神的文学。

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芬兰采取较为宽松政策时，斯内尔曼有了较大活动余地。他于 1856 年升为教授，1863 年当选国会议员。在他直接努力之下，芬兰国会于 1863 年通过《国家语言法》，规定芬兰语同瑞典语一样是芬兰国家正式语言。他多年来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芬兰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文学艺术从此蓬勃发展起来，对此，斯内尔曼是功不可没的。

作为哲学家，斯内尔曼的成绩也是卓著的，他的专著《论理学》、《法律学》和《国家学》都是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他也发表过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但影响都不太大。

四

伦洛特和《卡勒瓦拉》

正如英国学者史密斯在他的名著《论民族特性》一书中所说：“芬兰从上到下形成了既区别于瑞典文化精英，又不同于后来的俄国政治主人的一个从属性种族群落社会，这就为伦洛特、鲁内贝格、斯奈尔曼等一批致力于民族复兴教育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现成

的种族学基础，他们把昔日往事和古代英雄用来重振民族精神，并且取得了惊人显著的成果。”1809 年芬兰成为俄国的大公国之后，俄国又在 1812 年将过去占领的拉多加湖以西和西南的大片领土交还给芬兰，于是芬兰更成了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精神得到弘扬，孕育催生出《卡勒瓦拉》这样的民族史诗，而史诗的收集编纂者伦洛特则被誉为‘芬兰的荷马’，成为继阿格里科拉之后对芬兰文学贡献最大的民族语言文学家。

埃利阿斯·伦洛特(1802—1884)是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和“周六晚聚会”中惟一用芬兰语从事创作的文学家。他出身于乌西玛省萨玛地区的一个贫穷的乡村裁缝家庭。在年轻时曾在药店里当过学徒，并且曾跟随萨满教的巫医学过跳神、占卜和医术。这些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知识对于他后来收集整理和创作民歌和谣曲都有很大好处。1822 年进入土尔库学院，1832 年取得药物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卡亚尼地区医务总监。但是伦洛特并没有放弃他的文学生涯，他曾师从诗人尤太尼，并且潜心研究赫尔辛基浪漫主义的少壮派诗人领袖托佩利乌斯的文风，在青年时代就创作出了《古勒沃》组诗等颇有影响的作品。这首组诗是由民间谣曲《卡勒瓦之子》脱胎而来，写的是农民卡勒瓦的儿子驱使一只大熊来替他报了杀父之仇的故事。这首谣曲在芬兰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在芬兰的口头文学中只有这一首在题材上同 12、13 世纪的冰岛《萨迦》最为接近，纯粹是以家族仇杀为题材的，伦洛特的组诗因而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响。 1827 年他用拉丁文撰写了以芬兰神话英雄为题材的硕士论文《万奈摩宁》。

伦洛特把一生都贡献给芬兰民间诗歌的搜集和整理，从 1828 年起就开始收集民间诗歌，1833 年他编成了《万奈摩宁歌集》，共有长篇叙事诗十六首。此后他便专心研究民间诗歌，全力以赴地搜集和加以整理，因为他得到当时芬兰文学和知识界的大力支持，要把前人遗留下来的这一精神财富继承下来留传给后代。 1831

年成立的芬兰文学社为了弘扬芬兰民族传统文化筹款资助伦洛特去卡累利亚等地区收集民间口头文学作品。1835 年《卡勒瓦拉》(二卷本)由芬兰文学社资助出版,共编入了长篇叙事诗三十二首。出版后褒贬不一，斯内尔曼等文化名流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伦洛特便再次去卡累利亚和因特里等地区收集诗歌，并于 1849 年出版了《卡勒瓦拉》(新版本),共编入长篇叙事诗五十首,计 22795 行，在篇幅上要比第一版的 12000 行多出将近一倍。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出版使得芬兰文学终于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也是伦洛特一生对芬兰文学最大的贡献。1840 年伦洛特又编选了抒情诗集《康特莱塔尔》[①]，共收集了乡土气息浓郁的抒情歌六百五十首。1842 年后伦洛特出版了《芬兰民间谚语》、《芬兰民间谜语》､《芬兰民间咒语》和《芬兰瑞典语词典》。

如同《尼伯龙人之歌》出版后文学史上通常把这类日耳曼诗体称之为‘尼伯龙人诗体”,《埃达》出版后,又把那类诗体称之为‘冰岛埃达’诗体一样,《卡勒瓦拉》出版之后,文坛上把这类芬兰诗体称之为“卡勒瓦拉”诗体。民间口头文学大概在公元前 2000 到公元前 500 年产生,分布在北起俄罗斯,南至奥努斯､拉多加湖和芬兰湾因克里的卡累利亚地区，这一地区当时还基本上停留在原始渔猎阶段，只有南部刚有刀耕火种的农业和萌芽状态的畜牧业，由于地广人稀，气候严酷，这一带地方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因而卡勒瓦拉体的古民歌和谣曲得以保存其原貌。卡勒瓦拉体的古民歌和谣曲是西波罗的海沿岸西卡累利阿族、芬兰族、爱沙尼亚族、拉脱维亚族、立陶宛族所口头创作的，但是在东卡累利阿族和拉普族中间却不曾流行。这类古民歌和谣曲大抵采用八音节、音步扬抑格，诗节有长短，但不分间隔。诗句押头韵，并且以主歌和

①康特莱为一种五弦琴,《康特莱塔尔》的中文译名为《五弦琴女演奏者》,或《特莱女歌手》。

副歌对应重复以增强效果。这类诗歌和谣曲均用来吟唱，因而曲调明快，节奏感强，往往以一种名为康特莱的五弦琴弹拨乐器作为伴奏。值得注意的是在芬兰族和卡累利阿族这类以乌戈尔语支为语言主体的民歌的谣曲中往往带有大量的萨满教内容和风俗习惯，而以乌拉尔语系为主的其他民族中却找不到此类萨满教的残留影响。这大概是由于芬兰一乌戈尔语支本来就是匈奴人的语言。在民族大迁移时期匈奴北上西进，把他们的语言和宗教带到了芬兰。而伦洛特所收集整理的卡勒瓦拉古体诗主要就是含有萨满教特色的那一部分，这类被称为萨满诗的作品是萨满教至今保存完整的少量宝贵文字资料。萨满诗通常以善于跳神作法的神汉巫师为英雄，跳神时萨满神汉可以将灵魂变成动物到处漫游，也可以叫鬼魂来附身，因而萨满神汉法力无边，既可上天入地，也能念咒作法。主要的萨满英雄有万奈摩宁和勒明盖宁。叙事长诗《万奈摩宁地狱之行》叙述了萨满英雄万奈摩宁施展巫术，越过幽明相隔的冥河，来到阴曹地府，大闹一通后又化为一条大蛇钻过网眼返回人间。叙事长诗《勒明盖宁之歌》描述了勒明盖宁念动咒语，把冰湖搬到岸上，而自己变成一只野鸭钻入冰层底下。在 11 世纪至 14 世纪芬兰皈依基督教的漫长年月中，教会和一些文人为了传教的需要，也用万奈摩宁和勒明盖宁作为主人公，写了一些叙事长诗,如《勒明盖宁之死》、《万奈摩宁泛舟抚琴记》、《万奈摩宁的判决》等等,这类作品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说教倾向,文学价值不大。

卡勒瓦拉诗体的古民歌和谣曲的一个重要类别便是情歌和情诗，这些情歌、情诗与西波罗的海地带的古代民歌有不少相似之处，也并不见得比它们更出色，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则远逊于冰岛的埃达诗歌。但是芬兰卡勒瓦拉体的古代情歌、情诗有其显著的特色。其一是粗犷而豪爽，带有一股原始的野性，对情爱往往是直诉衷肠不绕弯子,因而大量运用“我的心肝小宝贝”、“我的小鸟”之类肉麻的称谓来表达自己的恋情；其二是对性爱并不避讳，有不

少直率而赤裸裸的性爱描写；其三是在萨满教的影响下，乱伦并不被看成是罪过，因而有不少乱伦或群婚的内容。卡勒瓦拉体的古情歌和情诗往往被斥之为“野蛮”、“粗鄙”、“淫秽”，因而不登大雅之堂。但是这类情歌在欧洲文坛上却很受欢迎，也是最早进入欧洲各国的芬兰诗歌。在 18 世纪初，德国的大诗人歌德亦曾将情歌《我的情郎来啦》翻译成德文。在这首脍炙人口的芬兰情歌中，那个痴情的姑娘不仅是唱出，而且几乎是喊出了自己心里的情愫，率真而大胆，纯朴而粗野，这种浓烈而直截了当的恋情是渔猎时代以后所少见的。姑娘唱道：

啊，我的情郎来啦！
我便狂奔出去迎接他，
哪怕路上有毒蛇挡道，
我也要扑进他的怀抱。
哪怕豺狼张着血盆大口，
我也要同情郎亲几个嘴。
哪怕面对寒光闪闪的利剑
我也要同情郎一夜销魂。

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意思是“卡累利阿人的土地”，也有《英雄国》的译名。据伦洛特在 1849 年新版序言中所阐述的，这些民间口头文学诞生的时间大致是在公元前 1000 年至 12 世纪芬兰全国皈依基督教为止，流传的地域东起白海西南岸，经奥涅加湖的拉多加湖，西至芬兰湾。全诗共 22795 行，共有叙事长诗五十首。在这五十首长诗中，可分为十二个情节，每个情节之中又有若干不同的插曲。史诗的整个故事环绕着万奈摩宁、伊尔玛利宁和勒明盖宁这三个萨满英雄而展开，万奈摩宁则是贯通全诗的中心人物。史诗的故事并不太复杂：卡勒瓦部落首领万奈摩宁欲迎娶波赫尤

拉部落的北方农庄女庄主之女为妻。女庄主娄黑索要能源源不断地磨出粮食、盐和金钱的磨盘作为彩礼。万奈摩宁遂命工匠伊尔玛利宁造出了磨盘，并起名为“三宝磨盘”。女庄主收下了磨盘却又将女儿许配给了伊尔玛利宁为妻。这时勒明盖宁也来争夺这门婚事。万奈摩宁知道上当后便和伊尔玛利宁重新言归于好，并且用他制造的康特莱五弦琴将波赫尤拉部落的人全都催眠入睡。万奈摩宁和伊尔玛利宁盗回有魔力的磨盘，乘船返回卡勒瓦部落。女巫娄黑追赶上来，作法掀翻船只，磨盘和康特莱琴均遭损坏。但是万奈摩宁依靠磨盘和五弦琴残骸的魔力，将卡勒瓦部落建设得欣欣向荣。女巫娄黑率领波赫尤拉部落前来复仇，先是散布疾病，又派来了巨熊伤人，最后干脆把太阳和月亮抛入深岩，使卡勒瓦部落陷入黑暗之中。但是万奈摩宁率众克服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蛮横的波赫尤拉部落，卡勒瓦部落从此过上幸福和平的生活。1849年新版《卡勒瓦拉》又改写了结尾,增加了这样的内容 处女玛丽吞下蔓越橘便不婚而孕，立即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圣婴被卡勒瓦部落拥戴为王。万奈摩宁一气之下离开了卡勒瓦，不知所终，但是却留下了康特莱五弦琴和伟大的歌。

1835 年初版《卡勒瓦拉》出版之后褒贬不一。尤其是斯内尔曼、滕斯特罗姆等大力倡导芬兰文学的文化名人更是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诟病主要集中在：一是不够芬兰化，与波罗的海西岸的英雄史诗雷同；二是初版结尾写了在万奈摩宁统治下，卡勒瓦部落从此永享太平自由，这并不符合芬兰后来长期处于异族奴役之下的现实。伦洛特接受了这些批评，再次去卡累利亚等地区搜集资料，对初版进行了重大的改写，终于写成了这部史诗。正如伦洛特自己所说：《卡勒瓦拉》不求与荷马史诗争个高低,但求与冰岛《埃达》并驾齐驱。应该说，伦洛特做到了这一点。《卡勒瓦拉》全诗充满了浓郁的芬兰乡土气息，颂扬了芬兰冰封雪积的旖旎风光。由于当时芬兰的处境以及当局对出版物的严格检查控制，结尾部分改

成处女玛丽产子被欢呼为王，万奈摩宁愤而出走，但是他的歌声和琴声却永远留在卡勒瓦人民的心中，以此来隐喻芬兰被外族占领和基督教化。新版《卡勒瓦拉》同其他民族史诗相比，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其一，这部史诗是经过伦洛特整理加工的，因而史诗故事十分完整,前后呼应,结构还算紧凑,不像《埃达》那样由几部手稿拼凑而成，各自独立并不连贯。其二，这部史诗反映的社会是氏族社会尚未解体、封建制度尚未形成的阶段，是处于以铁制兵器和农具作为新生事物刚刚兴起的蒙昧与文明之间的状态。民族成员人人平等,既没有贵族平民之分,也没有等级观念。而《埃达》中所描写的社会情况有不少是封建制的骑士制度范畴之内的。其三，正因如此，这部史诗是以氏族社会的普通人和劳动者为主人公的，如万奈摩宁是一个平日耕地务农，兼而跳神作法的精通巫术的农民。而伊尔玛利宁则是一个善于打铁的工匠。在《埃达》中这两个人都是社会地位卑贱的侏儒和役夫，不可能当做英雄来颂扬，因为《埃达》中只有挺矛舞剑的骑士才能成为史诗中的英雄。因而史诗中有不少描写他们耕种、打铁和打猎的劳动场面。据伦洛特自己所说：《卡勒瓦拉》一书除了序言和结束语是他所写之外,其他所有内容都是原汁原味的芬兰古民歌，他仅仅将口头文学笔录下来而已。伦洛特的门徒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又作了解释：伦洛特是从大量笔记下来的诗歌中撷取符合故事情节的句子，有时一首诗中仅用一句,有时又将不同的诗句拼接在一起。因此,《卡勒瓦拉》和冰岛的《埃达》是有显著区别的。《埃达》是根据古人写的小羊皮上的原作整理出版，一字不改，所有的作品都有手稿可以追溯查阅。而《卡勒瓦拉》则由伦洛特拟出故事情节，再按图索骥寻找并填入相符合的诗句，因而这部史诗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有完整的线索和故事情节,有些表现手法是 19 世纪的，并不是古代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卡勒瓦拉》确实包容了伦洛特的创作，而并非纯粹的古代口头文学笔录。

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诞生使得芬兰人民为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而自豪，也唤起了他们的精神力量，鼓舞他们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一百多年来，《卡勒瓦拉》还成为芬兰画家、音乐家和文学家撷取素材和汲取养分的源泉。芬兰音乐家西佩留斯（1865—1957）从《卡勒瓦拉》中得到了作曲的灵感。小说家基维（1834—1872）以《卡勒瓦拉》的英雄们作为其作品的主人公。诗人雷诺（1878—1926）仿效卡勒瓦拉诗体来创作诗歌。美国诗人朗费罗（1807—1882）也以这部史诗中的题材来丰富自己的诗作。

第五章 19 世纪中期北欧文学

第一节 概述

19 世纪初期欧洲是以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继续斗争，反复较量，并且终于夺得统治权为主要历史内容。其中英国走在最前面；资产阶级已夺得政权，通过宪章运动，各种社会力量进一步交锋和摩擦调整,到了 19 世纪产生相对平衡，出现了“ 维多利亚女王型 ”的太平盛世，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社会迅速转型和飞快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朝向帝国主义发展。法国则革命与复辟交迭不已,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但是 19 世纪中期以后封建势力已无力再猖狂复辟，而金融资本家实际上夺得了统治权。德国依然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但是经济力量迅速壮大，并且窃取了柏林三月起义的成果得到了部分政权。英、法、德上升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斗争虽未结束,但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了金融资产阶级政权；1832 年英国议会改革选举制度使工业资产阶级得以参加政权，这两个事件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的胜利。

然而更重要的是新兴的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逐步升到首要地位。 1831 年和 1834 年法国里昂织工两度起义，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法国无产阶级高举红旗,呼出了“ 建立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 ”的政治口号。1838 年至 1848 年

英国爆发了长达十年、有三次高潮的宪章运动，这场以工人为主体的运动不仅时间长，而且声势浩大，签名者曾达三百三十万之众。德国不仅在 1844 年爆发了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还于 1848 年爆发了柏林三月起义。从 1848 年至 1849 年欧洲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如维也纳人民起义、意大利米兰起义、布拉格起义、匈牙利起义等，这些革命运动摧毁了竭力维护封建秩序的黑暗的“神圣同盟”统治。

但是最重要的事件还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48 年 2 月马克思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圣米歇尔广场的天鹅咖啡馆写出了《共产党宣言》，发出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的呐喊，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时代。在此以前，1844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德法年鉴》出版，刊登了马克思的《〈黑格尔的哲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随后又在 1847 年在伦敦创立了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革命组织以《共产党宣言》为纲领，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和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个革命组织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培养了骨干，团结教育了各国革命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雏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革命的新时代。

19 世纪中期欧洲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各国所走的道路也各不相同，但是都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和经济发展的快慢密切有关。发达国家经济力量飞速发展，尤其是英国成为“世界工场’和‘世界银行”。英国从 1830 年开通铁路之后，不出十年到处铺设铁道。英国的庞大船队驶向世界各地。英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过程也是大规模资本输出和对外殖民的过程。英国不仅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还在1840年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凭借武力迫使清朝打开大门,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蒙受羞辱的近代史。19世纪中期以后,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和现代文明的中心。法国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也大致与英国相仿,也是大规模的经济垄断、资本输出和对外殖民,但是因为国内政局动荡而发展得较为迟滞，在各方面都居于世界第二位,并且和英国有较大差距。德国则通过“普鲁士道路”从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政府颁布法律，用改良方式保存封建残余和加强容克地主的统治，使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1862年保皇主义者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由普鲁士以强权和武力统一德意志并进行统治。在被奥地利占领的意大利，通过和贵族地主妥协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它们都保存了君主制度。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但是在19世纪初期工商业也在持续发展。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的失败将封建制的沙俄的衰朽暴露无遗。沙皇政府被迫于1861年宣布自下而上的农奴制改革。在19世纪50至60年代俄国产生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潮高涨。在革命民主思想鼓舞下，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主张废奴的斗争更加高涨。1866年波兰也爆发了反对俄国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此期间,各国之间的竞争和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等切身利益的斗争日益加剧。1870—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与法国为了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和德意志统一问题长期交恶。开战后,法军接连败北,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普法战争的失败引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这场战争改变了欧洲列强的力量对比，使英国不得不面对铁血首相俾斯麦统治下武力愈来愈强大的这个真正对手的挑战,从而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19世纪中期，欧洲工人运动尚未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的影响。最明显的是英国宪章运动，1838 年第一次高潮签名者为一百二十八万人；1840 年第二次高潮签名者三百三十万人；1848 年第三次高潮签名者仍有一百九十七万人。尽管这场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由于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在统治阶级残酷镇压之下，运动终于失败。在工人运动中，阶级调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和学说十分盛行，如英国的工联主义、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以及曾有很大影响的巴枯宁主义等。 1857 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整个欧洲，在 60 年代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1864 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第一国际，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了统一而又正确的策略。1871 年诞生了巴黎公社，第一次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谱写出辉煌的新篇章。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自由思潮广泛传播，可以说在欧洲大陆上达到了高潮。19 世纪初，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而其核心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1789 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了人道主义的重要原则，如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权分立；自由（包括言论、信仰、著述和出版等）、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等。19 世纪初期乃至以后很长时期，思想家、哲学家、作家都是在《人权宣言》的旗帜和人道主义原则下从事意识形态的创作活动。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制度的巩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宣言》已不再敷足。于是思想家们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出发，进一步创作出更适合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自由竞争需要的学说和主张。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之后，企图通过改良主义缓和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了许多自由主义政策。宽松的社会环境也助长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流行与传播。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精神的发扬也使得人们对自然界和自然过程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飞跃，细胞的发现、对能

量转化的认识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使得思想的各个学科，包括文学在内，受到了科学精神的熏陶，能比较务实求真地认识和分析社会生活和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新成就和实验科学流行的背景下，哲学和历史学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在康德的以理性王国为最高智能的唯心主义哲学之后，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论，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和基佐的历史观都在思想界和文学界有莫大的影响，其中孔德实证主义对文学的影响不容低估。它不仅影响了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也成为 19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自然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总起来看，19 世纪中期以后,哲学界的分野愈来愈鲜明,一方面是以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后来的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出现和流行，而孔德、叔本华、尼采这类披着科学外衣的反理性唯心主义哲学恰恰又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兴起的时代里“用以对抗共产主义狂澜泛滥的思想屏障”(孔德语)。

19 世纪中期，浪漫主义虽然仍在欧洲文坛上占有重要位置，以雨果为首的第一代浪漫主义作家虽然仍活跃在文坛上，如雨果在 1851 年发表了《悲惨世界》,但在社会的动荡和思想的变迁之中开始把目光转向现实生活的题材，因为浪漫主义的想像和夸大既脱离现实又令人感觉虚假失望，“安慰人心”的理想图画已不再能引起激情和冲动。在浪漫主义风光不再、颓势纷呈的状态之中，现实主义却从浪漫主义的母体中悄然脱胎而出。经济利益即金钱已成为支配社会运作或个人生活的最紧要的实际问题，而利益的重新分配则基本上取决于竞争的结果。在这样的资本主义法则指导之下的社会氛围之中，思想文化层面也必然由内省转为务实，由关注精神世界转为观察分析外界对物质利益的争夺的成败。在这一时期，实验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科取得重大成果。达尔文的生物进

化论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孔德的实证主义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反对臆测、想像和理性，而是提倡在感性和知性基础上研究求证对客观世界的经验。科学精神和实证哲学逐步代替了崇尚宗教和神秘的浪漫主义。显而易见，欧洲大陆上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是和实证主义思潮、科学精神的出现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现实主义崇尚实证精神和科学精神，其直接思想渊源来自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和人文精神的批判意识，并以此来观察政治经济和剖析社会弊病。从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逐渐得到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浪漫主义文学也逐渐改变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追求空洞理想、崇尚神话般英雄和蔑视民众的痼疾，因而也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尽管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现实的基本方法不同于浪漫主义文学，但是借鉴了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经验，如表现历史题材时注重风俗画面的描绘和心理描写的技巧等。

19 世纪中期前后出现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在 30 年代、40 年代里出现了巴尔扎克、斯丹达尔、梅里美等人，英国出现了狄更斯、萨克雷和勃朗特三姊妹等人。前期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小说刚从浪漫主义文学脱胎出来，因而往往带有较明显的浪漫主义痕迹，如包含强烈的激情，情节故事有较强的戏剧性等。到了 50 年代、60 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中自然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在法国则以福楼拜、乔治·桑、波德莱尔等人为代表作家。在德国则主要是诗人海涅。俄国在以普希金为代表的‘ 黄金世纪 ’繁荣时期之后,在 30、40 年代出现了莱蒙托夫、剧作家果戈理、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人，在 4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又先后出现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因而 19 世纪中下叶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俄国文学也由此对世界文坛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对北欧文学。现实主义作家们的主要倾向在于站在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疾苦，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金钱统治的现实。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封建制度消灭、资产阶级上升和走向衰落过程的艺术文献。 19 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深受启蒙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仍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因而他们几乎都具有不可克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现实主义作家们在揭发社会罪恶时，往往通过伦理道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即使提出一些社会改革方案，也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和阶级调和主义，并且往往为社会改良的局限和博爱、平等、自由不能得到实现而彷徨悲观。

在欧洲率先踏人工业化、民主化之门的英国从 1832 年起经历了长达七十年的“ 维多利亚文学时期 ”的繁荣期。这时由法国开始再次掀起巨大的革命风暴，欧洲大陆重又陷入兵燹战火之中，而英国却是‘ 转型期 ’的太平盛世 ,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出现了飞快的跃进。维多利亚文学时期同 19 世纪初期相比,前者是旺盛的诗歌时代，而后者则是伟大的散文时代。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的散文体小说风靡英国，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大约总数高达四至五万部 ,除了‘ 三卷本 ’传统形式之外 ,还有报刊连载或小分册等多种形式，这对于推动包括北欧国家在内的欧洲散文体小说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维多利亚小说以写实主义为其特点，也就是以当时处于上升地位的中产阶级为对象。狄更斯（ 1812—1870）是维多利亚小说的最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其中《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等多部作品已被反复搬上银幕 ,成为欧美电影的经典之作。《匹克威克外传》、《大卫 · 科波菲尔》则是对欧洲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萨克雷（ 1811—1863）的《名利场》则是被看做是维多利亚文学初期最佳的英国小说。勃朗特三姊妹中 ,夏洛特的《简 · 爱》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小说,艾米丽的《呼啸山庄》因想像力奇特而引人入胜。三姊妹和后来的女作家乔治 · 艾略特(1819—1880)开创了妇女问题小说的先河 ,并且在

小说中糅入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对欧洲和北欧女作家的成长起了很大的示范助长作用。

然而真正引导 19 世纪中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并且对包括北欧国家在内的欧洲文学施展最大影响的仍然是法国文学。继夏多布里昂、雨果之后出现了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斯丹达尔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是世界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将阶级关系和社会现实认识和批判得如此深刻的经典杰作，《红与黑》是资产阶级文学中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把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推到了它本身所能具有的最高度。《红与黑》固然有其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它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其思想内涵的深广和表现手法的成熟使得这部小说成为最早具有现代小说特征的巅峰之作。

但是 19 世纪中期，领导潮流的现实主义大作家却非巴尔扎克莫属，他也是在莎士比亚之后举世公认的划时代的文学巨匠。在他之前,法国和欧洲的小说一直未能摆脱讲故事的格局,以致内容和表现力都有相当的局限，而巴尔扎克的出现令人感到文坛上季节更替的脚步,巴尔扎克小说准确再现和细腻分析了社会现实,宣告了一种新的，即现实主义的文学观、美学观和创作方法的诞生。巴尔扎克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极大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巴尔扎克革新了小说艺术,把戏剧、史诗、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融合成一体,把叙事、描写、抒情、对话相互交织起来,使之成为表现力极强的综合性艺术形式。他以《人间喜剧》为总标题,将 90 余部小说联为一体,构成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把握住了‘不再信仰上帝,而只崇拜金犊’的资产阶级以拜金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本质,几乎用编年史的方式刻画出 19 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从而使小说具有文献价值。他的高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划时代的首创性，也正是北欧各国作家们在后来努力师承和仿效的。在巴尔扎克去世之后，福楼拜（1821—

1880)成为 19 世纪中叶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1856)也是北欧各国现实主义作家们所学习的。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法国气数已尽，走向衰落，由戈蒂耶所提倡的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开始在诗歌界兴起。波德莱尔(1821—1867)便是欧洲文学史上的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人，他既继承了浪漫主义，又开创了象征主义的先河。波德莱尔的代表作诗集《恶之花》(1857)的影响遍及欧洲现代诗歌的各个流派，波德莱尔作为法国象征主义派诗歌的先驱和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他和马拉梅和魏尔兰等象征主义诗歌大师们都遵循‘为艺术而艺术’的戈蒂耶诗学原则，并且把唯美尤其是造型美作为诗歌的至高无上的惟一追求，他们形成的帕尔纳斯派对 19 世纪下半叶直到当代的欧洲和北欧诗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然，19 世纪中期的德国文学对北欧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如 40 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海涅的诗热情澎湃而又深刻犀利，他的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夫的童话》(1844)在北欧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外，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东欧的民族解放文学，如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1823—1849)也受到北欧文坛的密切注视，但是总起来看，这一时期北欧文学仍得益于欧洲尤其是法国文学，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北欧文学繁荣时期。

第二节　伟大的童话大师安徒生

一

19 世纪以来丹麦可说是每战必败，每况愈下，日子很不好过。1807—1814 年丹麦作为拿破仑的盟国也成了战败国，受到了严厉而屈辱的惩罚。海军舰队被消灭，商船队被拖走，以致本来兴旺的

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顿时萎缩下来，赔款割地使得原本就已捉襟见肘的经济更陷入困境而无力自拔。这场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后果对丹麦来说是灾难性的打击，因为作为经济支柱的海上贸易丧失之后,丹麦再也没有别的资源可以依靠,因而出现了 1813 年的国家银行破产倒闭，累及全国成千家大小商行跟着破产。在此以后丹麦的商业活动全被汉堡所控制主宰。 1818—1828 年整整十年农业歉收，使得丹麦经济的支柱也面临垮台的危机。在商业农业这两大支柱同时倾倒之际，丹麦几乎陷入绝境之中。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丹麦转而向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寻求援手,丹麦资产阶级人士和大学生中间兴起了“ 斯堪的纳维亚主义 ”运动,力图鼓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的联合。瑞典和挪威出于不同的动机都给予这一思潮以积极响应并且适度支持。

但是远水难救近火，丹麦在强邻环视之下终究难以逃脱再被宰割的厄运。1848 年 2 月法国爆发巴黎革命,3 月柏林人民起义，丹麦王国辖下的两个大公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起来要求独立而从丹麦分裂出去。丹麦为了镇压分裂活动而从 1848—1850 年进行了三年战争，瑞典和挪威也都派出大批志愿兵参战支援丹麦，然而却未能镇压得住背后有普鲁士一手支持的叛乱。1864 年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军向丹麦发起进攻,1866 年丹麦战败,被迫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割让，这次战败丹麦丧失了五分之二的富饶国土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当丹麦受到普奥联军猛攻时,瑞典和挪威坐视不救,“ 斯堪的纳维亚主义 ”运动也从此寿终正寝。

这次战败使得 13 世纪瓦德玛大帝以来丹麦的辉煌丧失殆尽，不仅连北欧老大帝国和海上强国的地位已经丢掉，甚至连自保有余的欧洲中等国家的地位也保不住，从而降为任人摆布宰割的欧洲最弱小的国家之一。这次战败不仅使丹麦再一次蒙受民族耻辱,而且伤筋动骨连本土也遭到了肢解,丹麦国内民族主义梦想破灭，并且触发了国内一场有关理想与现实、信仰与认识的大辩论

以埃斯特鲁普领导的、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并受到王室支持的右翼掌政,这场政治较量不乏暴力和骚乱事件,直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右翼政府被推翻，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政党上台,实行议会政治,丹麦的政局才平稳下来。

在文学方面,盛极一时的浪漫主义开始衰退,素有‘斯堪的纳维亚诗歌之王”之称的欧伦施莱厄也失去了号召力，因为丹麦民众已经难于从浪漫主义作品中求得安慰，他们丧失自信，愤懑悲壮的心情需要刺激和宣泄，因而批评社会和揭露黑暗与不公的文学作品逐渐出现。19 世纪中期其实是一段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浪漫主义逐渐衰落，现实主义逐渐兴起，但两者相互并存交织混杂，为 19 世纪末出现的北欧文学繁荣准备了土壤和条件。在这一段过渡时期里，丹麦涌现出两个很难将他们简单地归类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范畴之内，也不同于当时丹麦文学界的任何派别的“另类”作家，那就是举世闻名的童话大师安徒生和存在主义创始人、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正是这两个异军突起的作家使得处于国蹙民穷的丹麦在世界文坛上大放光彩，其作品传诵至今。

二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1805 年 4 月 2 日出生在丹麦奥登塞的一个穷苦鞋匠的家里。 1875 年 8 月 4 日病逝于首都哥本哈根。

19 世纪初奥登塞是丹麦第二大城市，全城约有一千二百户人家居住，其中十分之一是贵族，还有官吏军官，他们构成了社会的上流阶层；一百来户行业不同的商贾和二十多户酒店客栈经营者，一百二十户军人兵士，他们是社会的中下层；剩下还有近一百户靠打零工挣钱糊口，一百五十多户乞求社会救济度日的贫民。安徒生的父亲正是个靠每天干活挣钱糊口的鞋匠，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由于生计所迫，安徒生的母亲只得当洗衣妇挣钱补贴家用。

这样一个贫困至极的家庭居然哺育出了日后丹麦全国为之骄傲至今的文学巨擘，他的名声和作品流传到整个世界，这真是不可思议，比我们常说的‘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还要匪夷所思，拿安徒生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安徒生出生之时丹麦正在走下坡路，昔日北欧霸主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疆域辽阔的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凋蔽衰落。从安徒生尚未出生直到他晚年，战争阴影不断笼罩在丹麦上空：打了一场场的战争却遭受了一次次的失败，从19世纪初屡战屡败到1864年，丹麦先败给了瑞典，接着是英国，然后又是普鲁士，以至于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两个富饶的公国被割让给普鲁士；不仅对外用兵连吃败仗弄得割地赔款国土日蔽，国内也是经济衰退、百业萧条，贵族豪门与新兴的资产者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冲突，直到1848年国王签署了丹麦全国议会通过的新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政局才逐渐摆脱动荡。

在这样的时代安徒生一家过日子是大不容易的，更其雪上加霜的是在1814年对瑞典战争结束后不久，从军当兵的父亲回到家来就病死了。母亲只得改嫁给另一个鞋匠，依然当洗衣妇挣钱糊口，却又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在艰辛困苦的童年里，安徒生当过学徒，学过裁缝，也曾在济贫学校上过学，谈不上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仅能粗粗地识点字而已。

不过安徒生还是幸运的，他没有去当个裁缝，而是一心想到首都哥本哈根去学戏剧当个演员。他还真的去成了，而且经过不懈的努力，遭受了一连串的碰壁之后，居然登上了舞台扮演一名不起眼的小角色。然而由于嗓音变化和自身条件限制，他不得不放弃舞台生涯。他又通过各种关系，在皇家剧院副院长科林的扶掖下获得了一笔国王奖学金。安徒生转而专注于写作，他写诗歌、散文和戏剧，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5)，随后又发表了小说《奥·梯》(1836)和小说《仅是一个乐师》(1837)。《即兴诗人》

等三部小说使得他蜚声丹麦文坛。他的剧本《黑白混血儿》(1840)也终于在哥本哈根的皇家剧院上演并且取得了成功。然而平心而论,安徒生在长篇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的‘严肃’文学方面的成就都较为平平，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反倒是他的挚友，丹麦物理学家奥斯忒看出了他的才华应该朝什么方向发挥。他对安徒生说：如果长篇小说能使他出名，那么他的童话将使他不朽。奥斯忒的预言得到了应验，安徒生的童话果真传遍了全世界，而且至今还在流传。

从 1835 年起,安徒生就发表了他的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在这以后三十七年里，安徒生一共发表了一百七十多篇童话故事。正是童话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奠定了他在丹麦和世界文坛上的突出地位，使得他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随之而来的是 名声、地位、尊敬、荣誉……丹麦国王对他礼遇优渥,欧洲王室以结交他为荣，所有的王室的华贵大门都为他敞开。他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显赫头衔、一枚又一枚的勋章。人们为他举行火炬游行，朝他热烈欢呼……甚至在他病笃之时，丹麦王储破例亲自来到他的寓所慰问，这真是无上的殊荣。丑小鸭变成的这只白天鹅振翅翱翔在蓝天白云之间,飞呀、飞呀,飞得那么高,飞的姿态那么优雅,人们都昂首仰望,连声赞叹。

然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以后，安徒生本人的故事并没有完结，生活也不曾因此而停顿下来。安徒生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是双重性的，并不只是快乐的陶醉，而是忧郁的沉闷，甚至可以说基调是颇为痛苦的彷徨。这种灰色情调在已经出版的、他的卷帙浩繁的日记和数以千计的书信里都明显地反映出来。这位世界童话大师正是在荣耀欢乐和沉郁孤寂之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正如安徒生在《我一生的童话》里所说“:我的一生是一篇美丽的童话,既那么丰富多彩,又那么幸福快乐。”他确实感到幸福,他享受到快乐，因为人生赋予他的竟是那么丰富，甚至远远超过了他

年轻时的幻想和企盼。一个穷鞋匠和洗衣妇的儿子，差点就要去当裁缝，当时最大的美梦无非就是当个演员登台演出。然而凭借了自己的顽强意志和执着奋斗,不仅成名成家,而且登上了世界的文学殿堂，成为一代文豪。这样童话般的故事是连具有丰富幻想力的童话大师安徒生自己都不曾想到过，然而在他的一生中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所以他不能不感到幸福快乐。他把自己生活里的阿拉丁神灯般的遭遇看成是上帝的仁慈怜爱和慷慨恩赐，因而他直言不讳地宣扬他所得到的一切荣耀都应该完全归于上帝，并且在他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颂扬上帝的伟大和仁慈，要世人虔诚地信仰敬畏上帝。这不仅是出于宗教的虔诚，更是殷切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出于这种心情和感恩戴德，安徒生童话中充斥了浓郁的宗教色彩和说教，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更是有如在唱赞美诗一般。于是不禁令人惋惜 安徒生若是不这样笃信虔诚 ,那么他的童话必将更其出色。

然而光灿灿的勋章毕竟还有黑沉沉的背面，安徒生的生活之中也是如此 ,这就使得他苦恼和惆怅,甚至向往死亡的解脱。

安徒生打了一辈子光棍，倒不是他不想娶妻而是结不成婚。恋爱上的挫折对他的摧残甚至超过贫困的影响。他至少有三次坠入情网 ,起初是个名叫里堡 ·伏格特的名门少女 ,她虽动了心 ,但几经权衡之后对他声称自己早就另有所适，安徒生只好自惭形秽抽身而退了。那时候安徒生刚刚才在丹麦文坛上崭露头角，所以这段无疾而终的恋情还没有闹得满城风雨。 1843 年安徒生同来丹麦向王室献艺演出的瑞典当红女歌唱家燕妮 ·琳德相恋。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夭折之前延续了三年 ,他们曾谈婚论嫁 ,却终于在地位名气的牵累下未能结成连理。安徒生也还曾向他庇护人的女儿路易丝 ·科林求爱 ,尽管路易丝对他一往情深 ,并且等着他求婚 ,但是门第的鸿沟却是不可逾越的。她的哥哥司法部次官爱德华在同安徒生的经年交往里 ,从来不肯屈尊迁就用昵称‘ 你 ’来平等相待

安徒生,更不消说让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 上流社会闯入者 "来当妹夫了。这三次恋爱失败，尤其是后两次对安徒生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巨大。在森严壁垒的门第界线之前，在根深蒂固的世俗偏见的包围之中,他不得不止步。《单身汉的睡帽》里那个可怜巴巴的老光棍正是他自己逆来顺受的写照。他发出过幽怨的悲鸣，呼出过愤懑的哀号,在以" 瑞典的夜莺 "燕妮·琳德为蓝本的《夜莺》里,在小美人鱼对王子的爱情至死不渝的《小美人鱼》里,我们都能听到安徒生从流淌着鲜血的心灵里发出的无助的哀怨悲啼。

安徒生把自己的成功都说成是上帝的偏爱、垂怜,然而尽管这样自谦自卑，门第尊卑、出身贵贱的世俗偏见并没有就此放他一马。安徒生成名之后，王公贵族竞相同他来往，这些人附庸风雅,结交名士无非是为了装饰点缀,抬高身价,因而他们表面上礼贤下士,骨子里却是轻蔑侮慢,多半把安徒生视为帮闲门客,并不视为平等相待的" 圈里人 "。应该说,安徒生当时确实得到了其他著名的北欧作家可望而不可即的种种殊荣，他起初很长时间也甘之若饴,陶醉在成功的虚荣之中,不曾觉察到世态之险恶,他只有发自内心的喜悦:" 在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有这么多的幸福。"而他触目所见只是迎面而来的美好事物——那些大天鹅拥簇着他游水，用嘴喙替他梳理洁白的羽毛。然而现实毕竟是严峻的,并不能让他一厢情愿地像《金宝贝》里的那个宝贝疙瘩那样生活在充满浪漫的幻想和诗意之中。他的平民意识、民主主义精神同庇佑接纳他的贵族上层是格格不入的。他并没有像比他年轻的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1842—1927) 那样鼓吹激进民主主义思潮,振臂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摇旗呐喊,然而他倾向支持这样的变革,他写出了《她真是一个窝囊废》、《在柳树下》、《伊勃和小克里斯蒂妮》等描写劳动者和穷人清苦生活的作品，他用自己童年的不幸表现了丹麦的社会矛盾。尽管不如挪威的易卜生那样深刻,不及瑞典的斯特林堡那样尖锐,安徒生也在自

己的童话故事里辛辣地讥讽贵族阶层和抨击门第界限，还对世人的贪婪愚蠢给予无情的嘲弄，这就不能不使得上流社会对他侧目，抱有戒心，所以尽管安徒生享有了名声、地位和头衔，但是在开门接纳他的老爷太太们的眼里他依然是个非我族类的鞋匠的儿子。在安徒生的日记里有不少这类的记载：在酬酢社交场合上他是如何被人苦苦追问昔日贫贱生活的细节，或者猎奇地审视他，仿佛他身上还在散发出鞋匠或洗衣妇的臭味。他们还刻薄地给安徒生起了种种恶意侮辱的外号，如‘势利鬼’、‘厌贫爱富者’、‘社会的向上爬者’等等。安徒生不如易卜生和斯特林堡那样骨气刚烈、清高狷傲，他忍气吞声地承受下来了。不过这也使得他终于明白了一个浅近的道理：原来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仍要靠孩子们抛面包和麦粒来养活。这就使得他失望不已，甚至颓废到想寻求死亡的解脱，在《坟墓里的孩子》等故事里都可以看到安徒生这种忧伤绝望的心情。安徒生十分喜欢旅行，一生之中跑遍了丹麦各地，此外，还作了二十九次国外长途旅行。他在这些旅行中为自己的写作收集材料、宽拓思路，并且结交了狄更斯、雨果、海涅、格林兄弟和易卜生等大文豪，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何尝不是在逃避和躲闪呢？因为只有到了国外他才能稍有片刻的清静，摆脱狭隘的世俗偏见的包围。

还有令安徒生黯然神伤、失望不已的是，他的童话从问世起除了受到欢迎之外也一直处在猛烈的抨击下。上流社会的文人学者对这些作品嗤之以鼻，把它们说成是‘保育室里的瞎说’、‘哄孩子的小玩意儿’，还有人甚至说安徒生根据外国和民间故事改写的那十几篇有出处可查的作品可算是真正的故事。而他后来自己创作的只不过是剽窃之作或是模仿之作，也有人指责他母语都没有掌握好就胡乱写作等等。另一方面，激进民主主义的文人，如哲学家克尔恺郭尔（1813—1855）、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等人，也一直不曾停止过对他的幻想浪漫主义的中肯批评。安徒生被这些抨击和批

评弄得心力交瘁，他的大量书信中有不少是为自己的作品做解释或自我辩白的，但是却没有博得上流社会的宽容、怜悯，也没有得到激进民主主义派的朋友们的谅解。正因为在得意疾行于顺利的人生坦途背后，还必须忍受着难言之隐以及无法宣泄的苦闷，安徒生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中后期的作品中，便往往流露出一股深沉的忧戚和哀伤，令人读来感同身受，甚至掩卷遐思，扼腕叹息，仿佛是咀嚼了一枚青橄榄似的，在舌尖颐间留下一股虽甘凛却又苦涩的、久久不会散去的余味。这股耐人寻味无穷的苦涩余韵恰恰正是安徒生的童话的独到之处。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家任溶溶先生曾说过，安徒生的童话真可以从小读到老，其奥妙恐怕也在于此吧。

童话这种文学体裁顾名思义是适合儿童欣赏的故事，大多具备了丰富的想像、神奇的幻想、有趣的夸张等特点。“童话”这个字眼恐怕只是汉语中才有，即便安徒生本人也只是用“EVENTYR”和“HISTORIER”，来形容他的作品，前者的本意是“冒险或志怪故事”，后者则是“历史传说”。一般认为童话大概在16世纪末已在欧洲流传开来。法国诗人沙·佩罗的《鹅妈妈的故事》(1697)和德国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1812—1815)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至今还在广泛流传。《灰姑娘》、《小红帽》、《小拇指》、《蓝胡子》、《勇敢的小裁缝》、《不来梅的乐师》已成为世界童话的经典之作，后来不少国家的许多童话，包括安徒生的一些作品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童话并非始于安徒生，然而童话却由于安徒生发扬光大，走向巅峰，应该说安徒生是功不可没的。19世纪30、40年代欧洲文坛上浪漫主义盛行，促使不少作家对民间文学产生了兴趣，他们要从民间文学里挖掘创作的题材，并由此从事起童话的创作来，安徒生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后来还有英国卡罗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意大利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等作品。1835年安徒生的第一部《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出版，其中收集了《大克劳斯和小克劳

斯》、《火绒盒》、《豌豆上的公主》和《小伊达的花》等篇。安徒生起初并不曾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因为他自己也把童话看成是“小玩意儿”，却不料大受欢迎，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于是安徒生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童话创作，而这正是他的才华所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童话“就像种子那样藏在我的心中，只消轻轻的触动，一个阳光之吻，一滴雨水，它便开花了”。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穷苦贫民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全都用来浇灌童话这朵小花，创作出崭新形式的童话故事来，于是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多年来我已试着走过童话圆周里的每一条半径，因此如果遇到一个会把我带回到已经尝试过的形式的题材时，我常常不是放弃，而是试图赋予它另一种形式。”也正因为这样，安徒生的童话不仅继承发扬了以往的民间和神仙故事的格调，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朴素清新而又浪漫变幻的风格，于是开创了今天的儿童文学的先河。

国际上研究安徒生的学者们通常把他的童话分成七个系列，即：有魔幻成分的故事，如《影子》、《钟声》等；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如《丑小鸭》、《跳高能手》等；以树木花草为主角的故事，如《小伊达的花》等；以无生命物体拟人化作主角的故事，如《坚定的锡兵》、《织补针》等；在奇异世界里的现实故事，如《夜莺》等；在可辨认的世界里的现实故事，如《园丁和主人》；以作者为主角的故事，如《看门人的儿子》、《在柳树下》等。

安徒生的童话取材虽然相当广泛，不过主题却比较集中单纯，那就是表现真善美，抱着浪漫主义的幻想去追求人类的理想境界，如仁慈、同情、宽容、博爱等，宣扬“真善美终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信念。他把上帝视为真善美的化身，最彻底的真善美是统一在上帝的意志之中的，只有上帝才能引导人类走向“幸福”和“极乐”。因而他虽然把满腔同情倾注在穷苦人身上，希望他们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却又无法为他们找到摆脱不幸的出路，于是只好把幻想

寄予发一笔阿拉丁神灯式的飞来横财，或者碰到意外奇遇而平步青云。他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当时社会的丑恶，嘲笑讽刺上流社会的昏庸愚蠢和残暴贪婪，却又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于是只好以伤感的眼光看待周围这一切，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因而他的童话里往往既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又有像唱赞美诗那样虔诚的道德说教。对于这些瑕不掩瑜的疵点，我们只能惋惜地说，那是时代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的烙印和痕迹吧。

安徒生的童话立意新颖,表现手法奇特,富有独到的创造性和求新意识。在他之前的童话从内容到故事情节和表现手法都存在不少雷同之处，而且不注重性格描写，故事里的人物有时连名字都没有；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善良人物而他们的对手几乎清一色是邪恶的化身。童话的主人公往往要通过艰难的历程，经受巨大的考验才能得到圆满的结局，而在濒临险境时注定会得到仙女、精灵或小动物的搭救相助。童话的结局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善有善报、邪恶受惩。安徒生打破了这种程式化的模式，把民间故事、神仙故事、神话、寓言、萨迦传说、诗歌甚至短篇小说都融合到童话中来，从而把童话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高度，赋予童话以全新的面貌、更宽的取材范围和前所未有的深刻内涵。不妨举几个例子：

《皇帝的新衣》原本是一个西班牙王子①写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得很久,早已为人熟知,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也曾在他的戏剧中运用过这个故事作为素材。它的内容是说有个国王自吹从来不会听信谎言，却还是上当受骗了，故事的结局是那个国王光着身子在朝臣和全城百姓面前走过，大家都噤若寒蝉，不吭一声。安徒生改写这个故事时在结尾处让一个孩子喊出了“他没有穿衣服”这句真话。这个改动确实是神来之笔，把整个故事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富有更深刻的哲理含义。正是由于那个孩子

① 系指堂·胡安·曼努埃王子(1277—1347)。

的一声呼叫，欧洲乃至全世界便有了一个时常被引用的“典故”：“皇帝的新衣”。

《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圣诞故事是安徒生在出国旅途上仓促成篇的，起初他只是按照年刊编辑寄来的画片上的要求，写了小女孩在火柴的微光中见到了烤鹅和她的祖母等情节。完稿之后安徒生总觉得仿佛缺少了什么，思索了很久之后才添上了小女孩在大雪中死去的结局。这个结局充满了他的极大的同情却又爱莫能助的怜悯，把整个故事从平淡化为神奇，令人读来心酸，甚至为那个小女孩洒下一掬同情的眼泪。然而这个结局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教会的卫道士们指责说：在除夕之夜可怜无助的小女孩得不到人间的温暖竟至冻馁街头，这是对宗教的大不敬，也是对教会慈善事业的恶意中伤和丑化。还有许多人也非难说结局过于凄惨，会毒害幼小的心灵，因而不许儿童阅读。更有甚者，美国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为安徒生改写了故事结局：原来小女孩的祖母不曾到真正的天堂去,而是移民到大洋彼岸的‘人间天堂’美国去了,当上了“美籍丹麦人”,于是腰缠万贯的美国奶奶便回国探亲,把小女孩接到美国去过有温暖的壁炉、肥美的烤鹅，还有圣诞树的美国式的幸福生活。

《小美人鱼》的故事是从《灰姑娘》脱胎而来的。然而和美丽的灰姑娘不同的是：她并没有得到仙女的帮助，最后也没有喜结良缘的幸运。小美人鱼出于对爱情的忠贞，不忍心举起女巫给的尖刀杀死王子以求得自己活命。在王子迎亲之夜，她宁可纵身跳人大海，让自己的身躯一点一点地化为泡沫而无怨无悔。这就打破了王子美女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神仙故事和民间传说约定俗成的传统模式。小美人鱼终于未能得到心 爱的王子,却变成了世代相传的不朽的艺术形象：坐落在哥本哈根朗格宁海滨的小美人鱼塑像已经成了丹麦在国际上的化身和象征。

《她真是一个窝囊废》写的是安徒生自己的童年,那个洗衣妇

其实就是他母亲的缩影。故事的核心是洗衣妇酗酒成癖，因而受到周围人的挖苦讽刺，直到死去还被人说成是“不中用的废物”。然而安徒生记起了他母亲曾对他说过的话：喝酒固然不对，但是洗衣妇干活那么辛苦，经常整天站在冰凉的河水里，还不能天天吃上一顿热饭，她要喝点暖暖身子，但是除了烧酒没有更好的东西。于是安徒生把故事的基调变成宽容和谅解。这一来不仅使洗衣妇这个受人卑视的角色博得了同情，也使得整个故事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和对社会的揭露。

在写作手法上，安徒生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独到之处。他并不一味刻意去写要让孩子看得懂的儿童故事。他的童话有不少含义深奥，只有大人才能够理解，但是他相信：孩子光是看故事也会喜欢的，故事情节本身就足以把孩子们吸引住。而童话里的深刻含义，尽管他们当时未必能够领会，但是等到他们长大起来，自会回味无穷的。因而，在他的童话里，有《幸运的套鞋》这样暴露人们内心秘密的魔幻故事，也有《影子》那样描写影子最后成了自己主人的主人的荒诞故事。这些作品实际上是现代派的先声，同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卡夫卡在思潮上息息相通；有些写作手法同意识流小说有明显的一脉相承之处。

在语言风格上，安徒生童话里大量运用了丹麦下层人民的日常口语，因而语言生动流畅，朴实自然，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正是由于安徒生在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上的独特，才创造出了丑小鸭、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小美人鱼、坚定的锡兵、拇指姑娘等一批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已成为欧洲语言中的典故，并且选人了欧洲国家的词典和学校教材之中。

安徒生细眉、长目、单眼皮，所以他小时候常被人说成有中国人的长相，不过他同中国结缘却很晚，直到他去世四十多年之后他的作品才被介绍到中国来。

在我国，安徒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名作家之一，也

是除了易卜生之外被介绍得最多的北欧作家，因而安徒生童话在中国几乎是尽人皆知的，起码在城市里是如此。

早在 1918 年初上海中华书局就在《小说月刊》上登载了《火绒匣》等六篇作品,还出版了《十之九》单行本。1919 年 1 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积极作用。此后安徒生童话的译本、安徒生的传记和对作品的评论或研究专著陆续出版。译者有郑振铎、茅盾、胡适、赵景琛、顾均正、叶君健、任溶溶等许多知名学者和作家。我国的报刊杂志上时常刊登有关安徒生的文章或他的作品,尤其在 1955 年纪念安徒生诞生 150 周年和纪念世界四大名人之际,杨宪益、冯至、陈伯吹、金近等著名文人更是纷纷撰文抒发对他的敬意。1979 年安徒生生平及作品展览在郑州举行，在经历了十年沉寂之后安徒生和他的童话再次在神州大地上公开亮相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仅新的译本频频问世，还出版了蒙古文、哈萨克文等少数民族语言译本。《卖火柴的小女孩》、《野天鹅》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戏剧、电影、芭蕾、戏曲、木偶戏等等。

安徒生童话的早期中译本都是从英语、日语或其他国家文字转译的,20 世纪 50 年代才由叶君健从丹麦语原文翻译过来。 90 年代以来的新译本大多印刷考究、装帧精美或附有彩色胶版的插图，不过除了叶君健、任溶溶两位先生的经典译作之外，各种译本良莠不齐，即令有些装帧华贵的本子亦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三

索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集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他的丹麦文文笔之优美流畅是至今没有人能超越的。

克尔恺郭尔出身于一个笃信宗教的富商之家，从小接受神学教育并在后来投身于宗教事业。他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哲学与辩论法,主要著作有《非此即彼》(1843)、《人生道路各个

阶段》(1845)、《对于哲学片断的非科学的附言之结论》(1846);二、心理学,如《忧虑的概念》(1844)、《爱的作品》(1847)、《对死的厌倦》(1849)等;三、神学和基督教教义,如《以精神的精神启发布道》(1847)、《基督教的讲道》(1848)、《基督教徒的品行修养》(1850)等。

克尔恺郭尔在他的哲学名著《忧虑的概念》中提出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从而奠定了宗教存在主义的思想体系。克尔恺郭尔主张宗教仅仅是一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理念，人们可以不必顾及上帝的存在与否,而只消面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即耶稣或罪过,信仰或毁灭。非此即彼的选择就是自在之物，存在于极度快活的突发时刻和对上帝、家庭及义务负责的人的一生之间，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对生活中的美学或者伦理做出选择，采取非此即彼的二者选其一的态度。这一信念后来成为一切存在主义的思想基础。克尔恺郭尔否定理性至上的乐观精神，剖析人的忧虑和绝望的情感，并且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就是一切的口号。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宣扬了超验的神秘宗教学说，并且提出同所有情理相反的反论，即上帝只是一个凡人，但能纵身跃入七万码的深水之中，上帝的选择假定了一种信仰，于是人们全都作为绝对的选择，而基督教徒尤其是牧师,他们的生活并不符合《新约全书》中所规定的各种教义。由于宗教存在主义和克尔恺郭尔对丹麦的教会和格伦特维克的赞美圣歌的猛烈抨击，丹麦教会将其视为异端进行了围攻，欧洲和国际教会也同他进行了大辩论，指责他亵渎神灵，犯下了反宗教的罪行。

克尔恺郭尔作为存在主义创始人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因而也被称为“19世纪的苏格拉底”。1925年法国剧作家马塞尔把克尔恺郭尔所创建的存在主义运用到戏剧中去，在法国创立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着重描写灵魂和肉体的矛盾冲突，灵魂的再现和上帝的干预，充满了超验的神秘的宗教色彩。

1938 年法国作家萨特又将存在主义哲学应用到小说《恶心》中去，创立了无神论存在主义文学流派。萨特的存在主义也宣扬了“存在先于本质”,描绘了世界和人生现实的荒诞性,否定理性至上的乐观精神。

四

19 世纪中期丹麦的文坛还有其他几个活跃而著名的作家，如海贝格、帕卢丹－缪勒和戈尔施米特。

约翰·鲁德维格·海贝格(1791—1860)的父亲彼特·安德雷阿斯·海贝格(1758—1841)是 18 世纪末期丹麦著名作家，母亲也是作家,他从小受贵族教育,对音乐、文学、外交、科学等都有广泛兴趣。1817 年获博士学位。1819 年至 1822 年趁去巴黎看望父亲之机研究法国轻喜剧，这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有很大的帮助。他剧作中的尖锐对白和对剧情发展的精确安排都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包括挪威的易卜生在内的剧作家们学习的榜样。 1822 年至 1825 年海贝格在德国基尔大学任丹麦语教师。自 1828 年起他被聘为哥本哈根皇家剧院戏剧顾问和翻译。1831 年他同 19 世纪丹麦最著名的女演员结婚，此后丹麦文学和文化界的精英们经常聚集在他们的家里,整个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里海贝格是丹麦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海贝格的第一部轻喜剧是《所罗门国王和鞋匠约恩》(1825)，接着他又发表了《四月愚人们》(1826)、《批评家和动物》(1826)、《精灵山》(1828)等。这几部轻喜剧是戏剧、歌剧和舞剧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品，成为皇家剧院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神话故事剧《淘气的小鬼》(1835)和《七个睡眠日》(1840)是两部散文诗剧。他还写过一些评论文章,如《关于轻歌舞剧》(1827),创办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哥本哈根飞邮报》,在报上撰文阐述自己的美学和文艺观点。他认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的这些观点也

是建筑在黑格尔学说基础之上的。

他是一位在丹麦乃至在北欧都很有影响的作家，安徒生和帕卢丹－缪勒等作家都得到过他的支持和赞赏。

弗雷德里克·帕卢丹－缪勒(1809—1876)是19世纪丹麦唯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当时丹麦文坛上流行的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美学价值的决定要素加以调和，以求得外在的和谐一致；他主张美就是一切，美是文人所顶礼膜拜的对象。在他带动下出现了一批唯美主义的诗人和作家。缪勒的诗作受拜伦的影响很大，主要作品有叙事长诗《芭蕾舞女演员》(1833)，这部作品几乎是拜伦的《唐璜》的翻版。缪勒还写有长诗《爱和心灵》(1834)、三卷叙事长诗《亚当·何莫》(1841—1848)、《克兰诺斯》(1854)和《诺西亚的贝纳狄克特》(1861)等。他的诗篇讲究写作技巧和音律韵味，但是离开生活较远，并且往往发掘一些偏僻冷门的题材，如《克兰诺斯》描写的是印度苦行僧在禁欲主义教规约束下灵与肉的冲突与烦恼。

梅尔·阿隆·戈尔施米特(1819—1887)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早年投身于反对保皇党的政治运动，参加了反保皇党社团并出版讽刺周刊《海盗报》，后来社团被取缔，周刊被查禁，他被捕坐牢，并流亡到国外。他著有长篇小说《一个犹太人》(1845)、《无家可归》(1853—1857)以及《故事集》(1846)。此外，他还写了以《渡鸦》(1867)为代表作的许多短篇小说。

第三节　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瑞典文学

19世纪中叶在瑞典历史上被称之为“改革的年代”，这是因为瑞典虽然是反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并且在1814年和约中得到了

极大的利益，尤其是得到了挪威。但是战争和丢失芬兰亦使得瑞典在 19 世纪最初的三十年经济滞缓、民生艰难，通货膨胀和粮食短缺一直是困扰瑞典的两大问题。1834 年币制改革将瑞典货币大幅度贬值才稳住了局面。但是瑞典拥有丰富的木材、铁矿和水力资源，因而经济仍能缓慢而稳步地发展。到了 19 世纪中叶锯木业已成为瑞典出口最大的产业，1850—1870 年之间木材出口量增加了五倍，因而有“世界木材供应商”之誉。从 1854 年起国家筹资兴建铁路干线，地方兴建支线，因而 19 世纪下半叶铁路成为瑞典举国上下最为关心的重要经济命脉。1846 年改革了中世纪以来行会垄断的陋规，推行经济生活和国内贸易自由化。1857 年税制改革，取消了限制性关税，促进了贸易自由流通。在这一基础上，从 1866 年起工业化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开展，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瑞典从 1809 年按照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制订了宪法以来，王室和贵族的权力日趋式微，资产阶级的势力不断增长，到了 19 世纪中叶以后基本上确立了代议制的议会政治体制，政权相当部分落入受到资产阶级所左右的国务会议的手中，但是国王仍然有一定权力，尤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在这段时期里，瑞典对外关系主要有两大特征：其一是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瑞典在 1848—1850 年石勒苏益格战争之后曾积极参与调停丹麦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间的争斗，但是到了普鲁士出兵干预并且进攻丹麦的紧要关头，瑞典却抽身退却，宣告了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破产；其二是从 1812 年奥斯卡一世起一直奉行亲俄政策，到了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时却背弃了这一传统，转而采取亲西方政策，为英法联军的舰队开放港口。从 1870 年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瑞典一直奉行亲德国的中立政策。

19 世纪中叶从 1844—1866 年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时期”，因为瑞典从 19 世纪初期起进一步加强了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与高

压，1812 年宣布可以不经司法程序立即封闭报纸。但是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不断抗议下，瑞典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有限度地逐步放松了对舆论的高压， 1930 年允许自由主义的喉舌《晚报》出版即是这一改变的标志。

但是在瑞典文坛上，从 1810—1830 年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出现了将近五十年的沉寂，既没有重要的作家也没有重要的作品涌现出来。以泰格奈尔、耶伊尔、斯塔格奈利乌斯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已经由巅峰走向衰落，而仍在写作的诗人虽然仍标榜“泰格奈尔主义”，但是往往更靠近现实而减少了浪漫色彩。因而，自由主义的进取时代对文学的作用是消极的，大多数作家忙于办报或在报上发表散文体小说而不去致力于诗歌创作。散文体小说在当时十分吃香，人们更关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乐于阅读比诗歌更接近现实的小说，因而也可以说 19 世纪中期是浪漫主义诗歌占文坛主导地位的状态逐渐被散文体小说所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

在这段时期里，可以提到的是 阿尔姆克维斯特、布雷默尔、斯诺伊尔斯基、里德贝里等人。

卡尔·约纳斯·洛凡·阿尔姆克维斯特(1793—1866)是过渡时期较为典型的作家。他出身于斯德哥尔摩显赫的官僚家庭，1815 年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学位后，曾当过政府机关职员、实验学校校长和《晚报》记者。他以纯粹浪漫派风格的作品走上文坛，如抒情诗《梦境》和《玛利娅的惊奇》(均写于 20 年代，1849 年发表)等，以及 1822 年完成、直到 1839 年才正式出版的小说《阿莫丽娜》。《阿莫丽娜》情节离奇，人物个性奇特，故事描写女主人公同亲兄弟相爱，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阿尔姆克维斯特在创作浪漫主义作品的同时，也开始注意现实社会，发表了描写社会现实问题、提供探讨的作品，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婚姻问题。他在二十三岁时写过一篇题为《爱情是什么 》(1816) 的论文，认为制造伪钞是犯罪，然而让毫无爱情和思想基础的男女组成家庭，其恶果和罪孽并不轻于百万

伪钞的制造者。1839 年他又发表了小说《这样也可以》,叙述聪明、能干、思想开放的女主人公萨拉·维德贝克在一次乘船旅途中和善良而思想保守的军士阿尔勃特邂逅,两人逐渐熟悉,最后萨拉提出条件:不要结婚仪式,不要共同住宅和财产,只要有一方对一起生活感到不满意就可以解除婚约,两人终于建立起婚姻关系。作品的中心意思是提出妇女不要为了物质生活而嫁给男人,她们应该像男人一样去工作,只有靠自己养活自己才能为爱情而结婚;只有和这样的妇女结合在一起的男人才有可能欢呼:“我被人爱了。”阿尔姆克维斯特这种婚姻观在当时笃信路德新教的瑞典激起轩然大波,他被指责为反基督徒、有伤风化的败类,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作品,因此他难以靠写作为生,最后不得不靠借高利贷混日子。

阿尔姆克维斯特还著有一部多卷本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野蔷薇花集》(1822—1851),内容涉及音乐、宗教、哲学,包括论文、故事、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类。整个集子的中心人物是讲故事人理查德·福鲁姆,他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经营着一座小庄园,过着简朴但称心如意的生活。以古斯塔夫三世国王被谋杀前后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皇后的宝石首饰》(1834)也是阿尔姆克维斯特的一部重要作品。此外他还著有论文《瑞典贫困之意义》(年代不详)等。

1851 年 6 月,阿尔姆克维斯特被指控犯有谋杀高利贷者罪而受到被捕的威胁,因而逃往美国,隐姓埋名生活了十四年。1865 年他回到欧洲,一年后在德国的不来梅市孤独地死去。直到 19 世纪最后十年,文学史家才把他列入 19 世纪中期重要作家的行列。

当阿尔姆克维斯特于 1851 年夏逃往纽约的时候,瑞典女作家弗雷德里卡·布雷默尔(1801—1865)在美国各地旅游考察两年后正准备离开纽约返回瑞典。她在两年的时间里,深入美国社会各个阶层,了解他们的日常起居、家庭生活、妇女地位,从“内部”考察

美国社会,并用书信形式,以《新世界之家》(1853—1854)为题在她返回瑞典后不久分三卷出版。

布雷默尔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斯德哥尔摩南郊的庄园里长大。父亲十分严厉，家中礼节繁琐，使少女时代的布雷默尔生活极不愉快。二十多岁时，她在庄园里为穷人办起了慈善事业以摆脱寂寞和无所事事的生活。为了给慈善事业筹款，她开始写作。1828年出版《日常生活杂记》,接着又发表了两部描写日常生活琐事的长篇小说《邻居》(1837)和《家》(1839)。《邻居》既有日常生活的叙述，也有奇特浪漫情节的描写，是一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兼而有之的作品。布雷默尔的游记除《新世界之家》外还著有《英国旅行随笔》(1853)。1856 年至 1861 年她在瑞士、意大利和中东游历后也发表过《旧世界的生活》(1860—1862),共六卷。

布雷默尔的创作对瑞典社会有两方面的贡献。在文学上，她以细腻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在浪漫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瑞典文坛中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并有力地推动了它的发展。在政治上，她通过自己的作品呼吁解放妇女，给妇女以选举权。在自传体小说《赫尔莎》(1856)中,她提出妇女应该有权接受科学教育,从事医生、护士、教员等各种职业，作品还为未婚妇女也有权获得公民权而进行论争，所有这些都使布雷默尔成为瑞典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卡尔·斯诺伊尔斯基(1841—1903)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他从少年时期起就开始写作，十八岁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参加文学社团“未名社”,是该社团中最积极和最富有诗才的成员。在 1863 年波兰反对俄国压迫的民族大起义和 1864 年丹麦遭到普鲁士进攻期间，他都发表了不少支持波兰和丹麦的热情洋溢的诗歌。1864 年他到南欧旅行,在罗马认识了易卜生,从此两人成为终身挚友。《意大利风貌》(1865)是他青年时期的重要作品,诗中着重歌颂靠“自己的五官”所感觉到的意大利现实世界,作品充满欢乐感，节奏活泼。

斯诺伊尔斯基在二十五岁时进入外交界，由于不幸的婚姻和礼仪繁琐的社交活动,他的创作不多,作品的基调也一改青年时期的热情奔放而变得含蓄、忧伤，有时用象征手法来表现他要求自由、完美和不愿受束缚的心情。在外交部工作了十三年后,他离开外交界,侨居国外。此后他的创作进入旺盛时期,发表了一系列以瑞典历史题材为背景的诗作，后来都收集在诗集《瑞典风貌》(1886)中。他的朋友，丹麦文艺评论家勃朗兑斯对他写作以历史题材为主的作品不甚满意，认为他应该跟上瑞典当代生活的步伐，而不是去回忆历史。斯诺伊尔斯基还受到挚友易卜生的《群鬼》(1881)和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红房间》(1879)的影响,也开始创作反映当代社会问题的诗歌。《用人兄弟》呼吁上层阶级理解他们的用人;《阿芙洛狄忒与磨刀工》忠告那些漠视人的价值的人应减轻奴隶负担,否则有一天奴隶们会起来摧毁主人的;《瓷厂》表达了他想成为‘ 大众诗人 ’的愿望。以上几首诗均收集在《诗,第三个集子》(1883)中。

1809 年斯诺伊尔斯基返回瑞典，担任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馆长,直至去世。

维克托·里德贝里(1828—1895)出身贫寒,童年靠社会救济生活,中学和大学都因贫穷而两度辍学,直到 1855 年,当他为《哥德堡商业和海运报》撰写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文章以及发表连载小说时,他的生活才开始有了保障。1876 年他辞去记者工作，在哥德堡担任文化史讲师。1884 年在刚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文化史教授。他一生获得过多种荣誉 议会议员、瑞典学院院士、乌普萨拉大学荣誉博士等。

里德贝里是瑞典后期浪漫派作家,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和学术论著。19 世纪 50 年代他出版了几部连载小说,其中以《波罗的海上的海盗》(1857)较为著名,这是一部取材于 17 世纪的小说，情节惊险生动。《森古雅拉》(1857)以瑞典中世纪为背景,描写骑

士爱兰德和吉卜赛姑娘森古雅拉悲欢离合的动人传奇故事，是一部现实与梦境、真实与幻想结合的作品。《最后一个雅典人》(1859)和《武器制造者》(1891)也都是历史小说,前者写4世纪基督教与异教斗争时期的希腊，后者写16世纪路德新教时期的瑞典。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象征性的，代表了他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最后一个雅典人》中的克利桑托斯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化身,教士狄奥多罗斯是基督教的倡导者,作品着重描写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武器制造者》则是写基督教中两种教义的矛盾和斗争。

里德贝里的学术论著有:《论基督的圣经学说》(1862)、《中世纪的巫术》(1864)、《日耳曼神话研究》(Ⅰ—Ⅱ,1886—1889)和《讲给年轻人听的祖先神话故事》(1887)等。他的《论基督的圣经学说》主要攻击三位一体论,遭到瑞典教会方面的激烈抨击。里德贝里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作清新有力,很少注重修辞,往往先勾勒出一个情节,叙述一个故事。188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中最有名的诗篇有《普罗米修斯和阿哈斯维鲁斯》、《圣诞老人》和《飞翔的荷兰人》等。第二部《诗集》发表于1891年,其中最重要的一首是他借鉴北欧古埃达诗中的踏车[①]而作的《新踏车之歌》,他把资本主义比喻为新踏车,劳动群众是踩踏车的囚犯,在资本主义这辆新踏车中,男女老少都成了贪婪、利润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1895年里德贝里去世，瑞典的浪漫派文学随着他的去世也就逐渐消失,代表新思想和新倾向的现实主义文学兴起。

第四节　挪威乡土语言文学登上文坛

1848年欧洲大陆上是革命的年代,先是《共产党宣言》出版，

①北欧古时惩罚囚犯时让他们踩踏的一种车。

紧接着是法国二月革命,随后又是柏林起义和巴黎六月起义,这些革命活动在遭受民族压迫的欧洲小国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要求民族复兴的意识剧烈高涨，民族解放运动也随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意大利、波兰、捷克、匈牙利当年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其中匈牙利起义规模空前，而且还坚持了一年多。罗马尼亚也于 1848 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保加利亚在 1855 年发动了武装起义。所有这些斗争都打击了异族统治的气焰，壮大了民族复兴的声势。在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浪潮鼓舞之下，具有同样遭遇的挪威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不断掀起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而且一浪接着一浪,一直持续到 1905 年取得独立,瑞挪联盟解体才告结束。

挪威随着经济的缓慢复苏和发展,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力量不断壮大。资产阶级自由派以议会为主要斗争场所，高举 1814 年《埃德兹伏尔宪法》向瑞典统治者展开了毫不退缩的合法斗争。在 1921 年否决瑞典国王“绝对否决权”的要求和取消挪威贵族阶层斗争赢得胜利之后,又为保卫庆祝 5 月 17 日《埃德兹伏尔宪法》通过日的权利而斗争,1829 年酿成了“广场大惨案”。在这些斗争的最后关头瑞典国王都曾以出兵镇压作为武力威胁，但是挪威各阶层不为所动,仍聚集在议会周围坚持了斗争,因而民族复兴运动声势越来越大，瑞典想要将两个国家融为一体的计谋无法得逞。从 50 年代初起，以斯维特鲁普为领袖的左翼党赢得农民和工人的广泛支持,声势更为壮大,开展了反对设置总督的斗争,迫使瑞典王储不得不做出允诺在他接位后即行取消。奥斯卡二世（1872—1905 年在位）起初还指望依赖右翼党派来遏制中产阶级和工农的力量增长，但是不久便失去控制，而被迫任命斯维特鲁普为首相，组成左翼党内阁，这是北欧各个国家里第一个左翼政党掌权的政府，挪威议会成为北欧国家中第一个议会主宰国家大事的国家。

在自由主义和民族复兴精神的鼓舞之下,1849 年挪威艺术家

协会成立,提出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行动纲领,即 要以各种形式展示挪威农村的自然和文化的美，包括乡土风光、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间语言。这一行动纲领同韦格朗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得到以斯维特鲁普为首的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支持。但是他们和韦格朗有所不同，他们是以实际行动而不是以呐喊来推动挪威文化的发展，他们还率先将挪威乡土语言使用到民间文学作品中去。诗人彼得 · 克里斯滕 · 阿斯比恩逊(1812—1885)和诗人尤根 · 莫主教(1813—1882)一起致力于收集挪威民间文学,整理出版了《挪威民间故事集》(1841)、《挪威民间故事》(三卷本 1842—1882)、《挪威民间传说》(两卷本 1845—1848) 他们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在于第一次将乡土语言用于文学作品之中，因为乡土语言虽然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并且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的语言，但是却被上层阶级斥之为乡音俚语而不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用在文学作品之中。

挪威文学中的语言使用历来是个大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上层阶级使用挪威国语,即丹麦挪威语,而普通平民百姓则用的是乡土语,即挪威西部海岸一带的土语。两者无论在发音、语法、变格变位和词汇方面都相去甚远,因而 19 世纪中叶之前的挪威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大抵与丹麦语十分相近，尤其诗歌的韵律和押韵全都套用丹麦语，往往带有浓厚的丹麦语甚至还有德语的腔调。这种状况既不受平民百姓所欢迎，也阻碍了挪威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挪威民族文学起步很晚发展迟缓，不能不说和语言使用的混乱有极大的关系。挪威的民族主义者都对丹麦挪威语提出抨击，并且要致力于创造出一种纯正的挪威民族语言。挪威民族语言改革家、诗人克努德 · 克努德森(1812—1895)力图将挪威国语和乡土语合二为一,从拼音、语法、韵律上全都以丹麦挪威语为主体,并吸收和消融挪威乡土语，他的尝试因不切实际而未获成功。诗人伊凡 · 奥森(1813—1896) 周游了挪威全国的乡村，收集了大量的方言

材料,于 1848 年出版了《挪威人民的语言》,这是挪威民族语言的第一部成文的语法书。1850 年他出版了第二部《挪威乡土语言词典》,将民族语言的词汇规范化。1853 年他又出版了《挪威乡土语言范例》,除收集日常对话之外,还首次用乡土语言翻译了莎士比亚、席勒等人的名著。1855 年奥森用乡土语言创作出剧本《傍晚》。1864 年和 1873 年,他相继出版了《挪威语语法》和《挪威语词典》。至此,纯正的挪威语言已形成并为社会和民众所接受。为了区别起见,奥森将以往的丹麦挪威语称为"老挪威语",而把这种由乡土语言发展而来的语言称为"新挪威语"。在此期间诗人奥斯蒙德·维内(1818—1870)用新挪威语创作出不少优美的诗歌。

卡米拉·科莱特(1813—1895)是 19 世纪中期最令人瞩目的挪威文学家。她是挪威第一个女作家，发表了挪威第一部小说。科莱特是著名诗人韦格朗的妹妹，由于同父兄的宿敌韦尔哈文相恋并且支持保守的文学观点而同家庭龃龉不和，后来长期定居在丹麦。1854 年至 1855 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省长的女儿们》上下两卷本。这部小说写的是某省长夫妇有四个女儿，一个女儿因婚姻不幸而早殇,一个女儿爱上了一贫如洗的教区牧师,聪明美貌的小女儿苏菲爱上了相貌英俊的家庭教师科尔德。她鼓足勇气向科尔德表白了爱恋之情,科尔德虽也爱上了苏菲,但却向好友吹嘘自己受到苏菲苦苦追求，并拒绝了她的爱情。这使苏菲受到极大刺激,便接受了一个富有的鳏夫的求婚。在结婚那天,她与科尔德相遇,知道了科尔德对她仍痴心相爱,但苏菲拒绝了他。

这是挪威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较简单,也有许多是取材于她与韦尔哈文的长期热恋而遭父兄反对的痛苦心理，在写作手法上沿袭了德国和丹麦的一些作家的表现方法，采用了大量的日记、信件和第三人称叙述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语言上她仍使用了上流社会的丹麦挪威语。这部小说也是挪威第一部女性文学作品,触及妇女受歧视和压制、不能独立、包括婚姻在内的大事

都要受父母家庭摆布等问题。

科莱特还著有短篇小说集《漫漫长夜》(1862)、《逆流而上》(1879)、《最后的文章》(1868)等许多作品。但是她对挪威文学产生影响的还是小说《省长的女儿们》。易卜生的《爱的喜剧》(1862)和约纳斯·李的《吉尔伊一人家》(1883)都吸收了她的不少创作意境和写作技巧。

阿斯蒙德·维内(1818—1870)是用新挪威语创作的诗人,是浪漫主义和早期现实主义文学过渡时期的作家。他出身于佃农家庭,虽出生清苦,但他雄心勃勃,三十八岁时获得法律学位,1858年至1870年创办并亲自主编一份周刊《来自山谷的人》,他在周刊中发表了不少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故事。他最著名的作品《1860年夏天的旅行报道》(1861)充满冷嘲反话、令人感兴趣的言论和意见,以及他自己作的诗歌,包括他最出名的一首诗《返回隆达内家乡》。

1862年至1863年他从英国访问回来后发表了《一个挪威人对英国人和英国的看法》(1863),批评英国的物质主义和阶级区别。他的有些诗歌,如《受了伤的心》和《大潮》由挪威著名作曲家格里格谱曲,在人民中广泛传唱。

维内是运用新挪威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先驱人物,他为新挪威语文学登上挪威文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19世纪60年代就提倡运用新挪威语,并身体力行,他用一个新挪威语的词表达外来词的时候,往往把这个外来词加在括号里放在他创造的新挪威语词之后,使人读时能更好理解。他努力简化句法,使其尽量简短,接近日常口语。新挪威语课本直到1885年才进入小学,到了1892年各市政当局才有权自由决定在自己管辖地区的学校里用国语还是用新挪威语进行教育。在此之前,新挪威语同挪威国语是不平等的,新挪威语的报纸也只有一份周报,也没有什么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

第五节　继承埃达传统的冰岛浪漫主义诗歌

19世纪中期，冰岛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在文学方面，冰岛经过几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开始复苏,出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复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古代的冰岛文学重新发生兴趣,另一方面是外国文学传入冰岛并受到广泛欢迎。冰岛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19世纪初期在丹麦、瑞典流行的浪漫主义到了中期传到了冰岛，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诗人。冰岛的浪漫主义除了具有其他国家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外，还有两个自己的特色。第一，冰岛浪漫派作家在创作诗歌时往往继承或采用冰岛古埃达诗的传统和方式。第二，冰岛浪漫派文学同争取国家政治上独立的斗争紧密相连,作品在唤醒民族觉悟、要求摆脱异国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比尔尼·索拉伦森(1786—1841)是第一个把浪漫主义文学介绍到冰岛的诗人。他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期间对丹麦浪漫主义文学的旗手欧伦施莱厄推崇备至。受其影响，索拉伦森也发表了不少具有浪漫主义风格而又继承冰岛古埃达诗特点的诗作。他的作品特别注重内容,思想深邃,充满幻想。他的作品有爱国主义诗篇和爱情诗篇，但是他最有名的作品还是应景诗，简洁而充满活力。

尤纳斯·哈尔格里姆松(1807—1845)是冰岛浪漫派文学运动中的重要诗人。他出身于冰岛北部埃亚菲峡湾省厄赫斯纳各赫伦的一个诗人家庭，青年时代从事古典文学和古冰岛语的研究。1832年赴哥本哈根攻读自然科学和文学。1835年至1846年创办《菲约尼尔》杂志,发表民族主义诗歌,旨在唤醒同胞,提高人民的文学水平,纯洁冰岛语言,使其免受外来影响。1837年起,哈尔格里姆松在冰岛各地勘察,跑遍了全国,收集地理资料。在这位自然科学家的眼中,冰岛的山山水水都充满了纯粹的美,一草一木都散

发出诱人的青春气息。他把自己对自然界的洞察、美的感受和对祖国的热爱都倾诉在诗作中。他的诗古朴简洁，流畅优美，极富有感染力。他写有描写景色的《山谷诗》(年代不详)、描写动物的《白鹌鹑》和《灰麻雀》、歌颂本国诗人埃盖尔特·奥拉夫松的《咏仙人》以及《旅途的终点》、《致冰岛人的诗》、《冬天过去了》和《筵席上的赞歌》等。此外，他还发表过不少安徒生和歌德式的童话故事。哈尔格里姆松尽管不到不惑之年就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对以后的冰岛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作品也深受冰岛人民的热爱，直至今日他仍然是冰岛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

荣·托罗德森(1818—1868)是冰岛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家，他以浪漫主义手法进行创作，同时也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他是冰岛文学中第一个发表长篇小说的作家，深受司各特和狄更斯的影响。他的爱情故事属“感伤小说”类型。

《少男和少女》(1850)是托罗德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采取冰岛古代家族萨迦体裁，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的农村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冰岛18和19世纪的农村风貌。

托罗德森出生于冰岛西北部巴尔扎滨海省的雷克霍拉尔。1840年曾在埃亚菲峡湾任家庭教师，一年后赴哥本哈根学习法律，学业结束后回乡工作。他还著有长篇小说《丈夫和妻子》(1871)，同第一部一样，这也是描写冰岛18和19世纪农村生活的作品。这两部作品至今仍然受到冰岛人民的欢迎。此外，他还写有不少诗歌。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是西古尔德·勃雷德弗尔德(1798—1846)。他是传统的韵诗诗人，也写警句格言。他的作品感情深沉，简洁明了，感人肺腑。索尔富西尔德·霍尔姆(1845—1918)是一位富有才干的叙事体作品女作家。她是冰岛第一位写历史小说的人，她从宗教史中吸取素材，作品悲怆哀婉。谢尔玛尔·荣松

(1796—1875)在文坛上以布鲁－谢尔玛尔著称,他是一个农民,一生在贫困中挣扎,但他的诗作粗犷有力,注重修辞。

第六节　振兴中的芬兰语文学

芬兰成为俄国的一个大公国之后，俄国对它采取了怀柔政策，不但将占领近百年的维堡省归还给芬兰，并且允许芬兰除了军事和外交之外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保持已有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使用本国的语言和发展民族文化教育，成立中央银行，有权发行自己的货币，兴建铁路并且由芬兰自行管理。因而在俄国统治之初的半个世纪双方“相安无事”，而且比瑞典统治时期有更多的自由和自治权利，因而社会相对来说较为平静，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蓬勃发展并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如锯木业和木材加工业，产品销往俄国和欧洲。经济繁荣有助于人口增长，并且促使城市人口的集中。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政治改革和文化教育。在政治领域里，从60年代起芬兰议会里出现了党派划分，起先是以语言不同为划分的基础，如第一次出现的芬兰人民党和瑞典人民党。第二次划分则是以政治观点为基础，如标榜自由主义的中间党派自由民主党，以及从芬兰人民党内分裂出来的革新派青年芬兰人民党等。1863年俄国沙皇颁布芬兰语言法敕令，明文规定芬兰语在二十年的期限内获得与瑞典语相同的地位，成为在行政司法机构中再度使用的官方语言。1866年又颁布了芬兰教育法。因而在19世纪中期，芬兰民族语言学、文学乃至教育都出现了迅速的崛起。

在土尔库和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芬兰的文学作品大多仍是用瑞典语撰写的。鲁内贝格、托佩利乌斯一生都只用瑞典语写作，斯内尔曼虽然不遗余力地鼓吹芬兰语的重要性，但是他本人却只会用瑞典语写文章。因此,直到19世纪中期瑞典语仍是芬兰社

会生活和文学艺术领域里不可或缺的主要语言。在 1863 年语言法令颁布之后，芬兰语才在社会生活、教育和文学中迅速崛起。然而在芬兰推广应用芬兰语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经过整个社会关于语言和文化教育的长期激烈论战之后，芬兰语才得以登堂入室到推广。芬兰语的报刊陆续出现，芬兰语的剧院也开始筹建。芬兰语的小说和诗歌大量涌现，而且在质量上并不次于瑞典语的作品,因而从 1860—1880 年这二十年被称之为芬兰民族文学的崛起年代或后浪漫主义时期。在芬兰文学这一段转折期里，活跃在新文学运动前列的有奥克萨宁、克伦和基维等人。

阿·奥克萨宁(1826—1889)原名奥古斯特·阿尔奎斯特,是芬兰语诗人。他一生致力研究芬兰语言和文学，在担任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和校长期间，曾通过不同途径提倡芬兰语言并取得一定成功。他创作了不少诗歌，多半饱含爱国激情，颇有感染力，主要诗作有《芬兰颂》、《战争进行曲》和《萨沃人之歌》等。

尤里乌斯·克伦(1835—1888)笔名苏尼奥,是位抒情诗人、教授、民间诗歌研究者和文学史家。他的父母是居住在圣彼得堡的德国人，克伦是在上学的时候来到芬兰的，一下子就被芬兰文化所吸引，他决定选择芬兰语为自己的主要语言并且开始用芬兰语撰写作品。

克伦的诗歌收集在《诗》里,于 1865 年出版,以后几年里不断补充再版，最全的一版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他的诗作以当时最流行的爱国诗篇为主，也有爱情诗和描写大自然的诗，这些诗感情充沛，手法比较新颖，而且很大的特点是富有幽默感。他具有民歌风格的诗作是最受欢迎的。他也写过散文，发表过故事集《月亮的故事》,这部作品是受了安徒生的《没有图画的图画书》的影响,故事中有地理和历史知识，可以供学校使用。

克伦一家人在芬兰文化领域里有显著的地位，为芬兰语言文化做出重要贡献。他的大儿子卡尔·克伦(1863—1933)是赫尔辛

基大学第一个民俗学教授，二儿子伊尔玛里(1867—1960)是作曲家和音乐研究家，三个女儿都成了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他的不少孙辈们也是芬兰文化界中的著名人物。

阿列克西斯·基维(1834—1872)原名阿·斯坦瓦尔,出身于农村裁缝家庭，是芬兰语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积极参与芬兰爱国知识分子为争取使用民族语言的斗争。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出版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采用了《卡勒瓦拉》中的故事,用芬兰语编写了话剧《库勒沃》(1864)。这部作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成为芬兰第一部出色的悲剧。喜剧《荒原上的鞋匠》(1864)是芬兰的第一部喜剧，描写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和他们的情趣,作品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讽刺喜剧《订婚》(1866)、悲剧《逃亡者》(1867)、《康齐奥》(1868),以及《黑夜和白天》(1866)、《玛卡列达》(1870)都是受人欢迎的剧本。

基维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七兄弟》(1870)。这是芬兰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一户农家的七个兄弟的生活、劳动和悲欢离合。在豪绅压榨之下，七兄弟背井离乡，企图找一个自由的生活，历经十年艰辛，他们终于重返家园。这部作品已成为芬兰文学中重要的经典之作，并被陆续译成多国文字。

第六章　19 世纪后期北欧文学

第一节　概述

19 世纪后期欧洲仍然处于三个方面的迅速发展之中。其一是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巨大发展；其二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逐渐由认识到主宰自然；其三是社会的急剧深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强有力地冲击着资本主义文明。

在欧洲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遥遥领先的英国从 18 世纪中叶起就将改进了的蒸汽机用于工业，解决了动力问题，到了 19 世纪工业革命大体成熟或完成，收割机、印刷机、纺织机大规模应用，制造业发达，产量几倍或几十倍地增长，主宰了全世界的市场。1830 年用蒸汽机为动力的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火车开通，不出十年英国本土都已铺设铁路，陆上交通的现代化问题得以解决。英国的军舰和商船横行于世界各处的海面上，从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地区掠夺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英国社会变化之巨大超过了以往千年的总和。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就已经成为老大的帝国主义国家。 1870 年以后英国成为“日不落”的世界惟一强国，直到普法战争结束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使得德国强大起来，英国才有了竞争对手。在这一时期里，由于发展和变革的剧烈迅速，各种矛盾丛生，新旧并存而脱节，但总能勉强度过，

因为发展造就出了无穷的机遇，也激发了旺盛的创造力，去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陈旧的伦理道德，而社会在活跃而痛苦的求索中挣扎向前发展，可以说是强盛掩盖了一切。然而 1873—1874 年的欧洲经济危机风暴不仅席卷了整个大陆，也猛烈地冲击了英国，使得英国在“强盛”的表象下所掩盖的丑恶与不公、痼疾与脆弱一览无遗。而正是这些内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和民族运动的高涨，使得英国从巅峰逐渐衰落下去。而法国、德国、俄国工业生产日益集中，资本主义也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些国家也都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争夺国际市场和殖民地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从而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法国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太平盛世’相反,从 18 世纪的欧洲霸主沦为 19 世纪战争与革命最为频仍的欧洲大国。1870 年普法战争以法国惨败而告终，同时也埋葬了拿破仑三世统治近二十年的第二帝国。1871 年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胜利,5 月巴黎公社诞生。巴黎公社革命是 19 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但是公社最后失败了，在“五月流血周”里有三万社员被杀，四万人被判苦役或流放。巴黎公社的失败标志着群众起义和街垒战形式的 19 世纪法国革命史诗的终结。此后资产阶级共和派逐步取得胜利，到了 1879 年已控制住局面，法国成为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第二帝国崩溃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的经济和生产得到了巨大发展,1895 年第一辆汽车开始行驶，1899 年雷诺汽车厂建成，20 世纪初法国的钢铁、电力、汽车和飞机生产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变革使得法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的帝国主义国家。

19 世纪 50 年代德国虽然分裂依旧，但资本主义却急剧发展，铁路兴建，工业迅速增长，德国由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工业国。1870 年普法战争，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联邦打败了欧洲第二强国法国，至此德国的统一终于由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所完成。德国统一

后,钢铁、化学、电气等工业发展迅速,到 19 世纪末工业进入垄断阶段，德国也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且向老大帝国主义英国不断挑战，争夺资源和殖民地。

俄国从 60 年代农奴制改革到 80 年代经历了由农奴制逐步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整个过程。资本主义发展主要在铁路建设和银行业方面，工业生产虽然也在发展，但远比不上英国、法国以及后来新兴的德国，从而俄国帝国主义从开始就带着先天不足的毛病，是个像列宁所说的“跛足巨人”。1881 年俄国民粹党人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俄国政局动荡，重新进入政治黑暗时期。俄国同德国一样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但是由于沙皇政府无能，因而从 1853 年俄土克里米亚战争到 1877 年的俄土战争，俄国虽然从土耳其手中夺得了高加索和黑海沿岸，此外还用各种手段从满清政府手中巧取豪夺了几乎与欧洲差不多大小的大片领土，但是俄国在实力上不仅远落后于英法，甚至也无法与采取铁血政策的德国相比，因而成为另一个新兴的工业国日本的觊觎对象，并且在 1904 年日俄战争中被日本打败。

19 世纪后期，也是一个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无产阶级中得到进一步传播，第一国际于 1864 年成立之后，相继召开了多次代表大会，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陆续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如 1883 年普列汉诺夫成立的“劳动解放社”,1895 年列宁在彼得堡建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以伯恩施坦(1850—1932)和考茨基(1854—1938)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政党,如 1875 年至 1890 年由倍倍尔领导成立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等。

面对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思潮也纷纷出笼,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和文化都出来混淆视听，宣扬自己的一套，因而欧洲的哲学和思想界的普遍状况是繁荣和纷杂的。从 19 世纪末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反理性、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这对当时和以后的作家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世纪末对欧洲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叔本华（1788—1860）。叔本华否定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否认历史上任何进步现象，宣称世界是由盲目的、非理性的、荒唐的意志所统治。他的“唯意志论”哲学宣扬悲观主义，助长了消极厌世观念，成为“世纪末”①文学艺术的理论依据。叔本华的弟子，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也是对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在《在善与恶的彼岸》和《达到权力的意志》、《道德的系谱学》中鼓吹“自我肯定”，强调进化就是以权力实现其自身的意志，宣扬“超人”哲学。尼采的哲学对欧洲不少著名作家，如托马斯·曼和劳伦斯以及萧伯纳，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北欧作家，如挪威的易卜生、哈姆生和瑞典的斯特林堡，在晚期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尼采哲学后来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成为法西斯思想所推崇的哲学，挪威作家哈姆生也因此而同德国法西斯同流合污，为挪奸卖国张目。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虽然已被认为过时而逐渐被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所取代，但仍还有相当的影响。对这一时期欧洲思想界产生影响的是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包括对人的总体认识的科学体系。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创立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阐明了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的理论，这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伟大变革，成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②。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对19世纪中后期欧洲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法国文学评论家泰纳（1828—1893）把

① 世纪末（fin de-siecle）系指具有19世纪末期特征的文学艺术等，最初起源于法国。

②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细胞学说。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进化论人类学观点运用到文学理论上来，而他的包括种族性之说在内的三个决定文学的条件就具体演绎了达尔文生物遗传学，对文学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19 世纪 90 年代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创立了直觉主义哲学，反对泰纳的三个条件决定论，强调人的主观认识作用。柏格森的直觉认识论，特别是“心理时间说”和对外界直觉认识的强调，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对欧洲这一时期思想界产生影响的另一种科学学说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他从多年医学实践和对大量精神病例的研究中总结出一整套有关人类下意识行为的理论，其中包括对性本能、压抑和梦境等现象的解释。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认为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性本能乃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精神分析学说亦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后来被许多作家采用来描写人的下意识心态，形成了一个文学上的心理分析派别。弗洛伊德对北欧各国文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直沿续至今，在许多北欧作家的作品中都能感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存在，可以说弗洛伊德学说对北欧文学的影响决不亚于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斯维登堡的感应论和通灵论学说，甚至还超过斯维登堡的学说。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大规模的欧洲经济危机便在 1866 年出现了,而且几乎每隔不到十年便重复来临,1873 年、1883 年、1890 年的经济危机给欧洲发达国家以沉重打击，也在思想界造成了危机与恐慌。反实证主义思想开始兴起，对以科学解释整个世界的理性主义乐观精神提出质疑。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主的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泛滥传播，成为对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思想倾向上的反动。

与思想界的纷繁杂乱局面相呼应，19 世纪后期欧洲文学艺术

方面的变化也是十分显著的，出现了带有现代工业社会和“科学主义”特征的自然主义流派，也出现了带有显著非理性主义特征的印象主义流派。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在法国兴起以龚古尔兄弟和左拉、莫泊桑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流派，自然主义文学是现实主义沿着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发展的结果，从反映现实生活和揭露社会黑暗来说，两者并没有区别，因而自然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仍是现实主义。但是自然主义更强调科学地反映生活，以自然科学的定理去观察生活、理解生活，并且用所描写的事实来证明科学定理之准确。自然主义在写实方面反对任何带有理想主义的升华，要求描写毫无艺术点缀和修饰，因而有不少赤裸裸地暴露现实的丑恶阴暗、变态反常等，由于避免了人为的布局和排除了作者的刻意安排和主观色彩，任何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都得以进入文学，给人以一种生活实录和照相的印象。因而，自然主义文学在反映时代社会的真实风貌，尤其对腐朽丑恶的事物的暴露上已超过了 19 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作品。自然主义在 19 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学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既构成了时代的一面镜子，也为后代留下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这是以往的文学所不能达到的成就和贡献。自然主义也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了社会下层的悲惨生活，描绘了工人形象和生活劳动状况，这是自然主义远远超过 19 世纪初期现实主义的地方。

自然主义文学首先产生于法国。 1865 年龚古尔兄弟出版的《杰米尼·拉赛特》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然而自然主义的经典大师却是左拉。左拉所创作的《鲁贡-玛卡尔家族》共有二十部小说，这些小说既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共出现了一千二百个人物。故事以鲁贡-玛卡尔家族的五代人的人生轨迹为线索，描述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法国政治上的黑暗、上层社会的奢侈腐败和种种社会弊端。左拉的

其他小说如《小酒店》(1877)、《娜娜》(1880)、《萌芽》(1885)等也都在法国和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长篇小说《小酒店》是第一部关于工人的小说。《萌芽》则更是直接以煤矿矿区为背景描写了法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小说中写到的高潮是大规模罢工和军警的血腥镇压。《萌芽》也是在欧洲和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成功地在长篇小说中塑造了革命无产者的形象。继左拉之后，莫泊桑又把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自然主义对欧洲文坛影响很深，北欧国家的许多著名作家，如挪威的易卜生、瑞典的斯特林堡、丹麦的赫尔曼·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自然主义倾向。

象征主义诗歌也是19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的重要文学流派之一，也成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象征主义流派最初出现于1886年，由诗人马拉梅提出一套象征主义的文学理论。但是在此之前，波德莱尔在长诗《恶之花》中已具有象征主义的艺术倾向，因而波德莱尔成为象征主义的先驱。象征主义否定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反对如实地描写客观世界，而提倡以不可知论①的哲学观点来发掘诗人内心世界的奥秘，并以超现实的隐晦得如同谜语般的诗歌表达出来，也就是通过象征来予以暗示。象征主义流派是从19世纪中期的帕尔纳斯派唯美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比帕尔纳斯派有更显著的颓废色彩，由波德莱尔、魏尔仑(1844—1896)、马拉梅(1842—1898)、兰波(1854—1891)等法国诗人在继承帕尔纳斯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三个象征主义支派，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的出现。象征主义又作为文学艺术潮流波及欧洲许多国家，象征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主

① 不可知论哲学，系由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引申直觉主义某些观点所创建的庸俗进化论哲学，宣扬人类的知识仅是相对的，人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体系》(十卷本)、《教育论》、《社会学原理》(另一译名为《群学肄言》)等。

张也为英国诗人王尔德所代表的唯美主义流派所接受认同。

19 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文学仍在欧洲流行，但是情况参差不齐，有不少作家已经或逐渐朝自然主义转化。70、80 年代现实主义在北欧各国中获得巨大的发展，其繁荣状况在欧洲除了俄国之外是非常罕见的。挪威的易卜生创作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揭发资产阶级的伪善与守旧，不仅对当时欧洲的戏剧改革做出贡献，也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传世经典之作。瑞典的斯特林堡则成为表现主义的先驱。

以托马斯·哈代(1840—1928)为代表的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现实主义小说仍受到欢迎。哈代的《威塞克斯故事集》(1888)、《德伯家的苔丝》(1891)等名著虽然打破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清规戒律，如禁欲主义和守旧顽固的道德观念，但是乐观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也被怀疑、悲观甚至颓废厌世所取代。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提出“理性只能认识相对的事物”，而“绝对的事物则不能被认识”的不可知哲学，成为在青年一代中广为流行的思潮。

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末在俄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白痴》之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群魔》(1871)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列夫·托尔斯泰也在写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两部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探索俄国社会出路问题的代表作之后，又在1889—1899年花了十年心血才写成长篇力作《复活》。这部作品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使得托尔斯泰成为19世纪杰出的作家之一，并且对西欧和北欧的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起来看，欧洲的文学家，尤其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已不仅仅满足于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奸诈，或是谴责上层社会的奢侈糜烂和道德堕落，他们以文学家所特有的敏感性觉察到资产阶级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的与生俱来并且无法医治的致命恶疾，对社会日趋没落和危机深重而忧虑，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势力的日

益猖獗而极为不满，但是他们却又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因而彷徨苦闷，甚至悲观哀愁，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反映或者流露出这类怀疑不安、消极颓废的情绪。在欧洲文坛上，无论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或是印象主义和唯美派，形成主流并且对其他国家，包括北欧国家在内的文学起较大影响的仍然是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对欧洲大陆文坛的影响则远为不如。在这段时间里，颇为令人侧目的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德国自然主义文学在时间上要比法国兴起得晚，但是声势却超过了法国，可惜寿命很短，而且也没有创作出什么鸿篇巨制。但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却与北欧很有渊源关系，也是直接在北欧文学影响下所催生的。1885 年在慕尼黑出版了自然主义杂志《社会——关于文学、艺术、公众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周刊》。这个刊物不仅介绍了左拉，也大力推荐了易卜生，并且发表了易卜生的剧作，因而慕尼黑从一开始就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中心。德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豪普特曼（1862—1946）最初的作品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得以发表的。1886 年柏林成为第二个自然主义文学的中心，1889 年 9 月柏林自由剧场开幕，易卜生的《群鬼》为首次公演的节目，演出引起轰动，大为成功。随后又演出了豪普特曼的《日出之前》也取得了成功。1895 年后德国自然主义文学就逐渐衰弱，豪普特曼的创作也受到北欧文学的影响由自然主义逐渐转向梦幻和象征。德国自然主义文学对于北欧文学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直接受北欧文学的影响，而北欧文学从安徒生、易卜生开始逐步地登上了世界文坛。

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迟至 19 世纪中期才影响到北欧，先是瑞典、挪威和芬兰的锯木工业、造船业等，后来丹麦的农业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哥本哈根等大城市迅速膨胀，农村人口朝城市流入，并且有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漂洋过海到北美去谋生。在新的条件下，社会思潮、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也都在起变化，并且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康德和黑

格尔的哲学以及后来的叔本华和尼采哲学在北欧都有很大的市场,广为流行。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北欧国家的思想界,尤其是丹麦、挪威、瑞典的文学家们不断在沉思求索,寻找挑战宗教正统观念的途径,浪漫主义固然仍在流行,但已经呈现萎缩,文学家们已不再满足于描写英雄史诗般的往昔，而是向往变革。丹麦的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中在 1871 年《19 世纪文学主流》的演说中喊出了“写社会写人生”的口号。他的鼓动在丹麦固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遇到强烈的反对，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勃朗兑斯的号召在挪威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比昂松最先站出来投身于“问题文学”的写作。他们写出了许多抨击社会弊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虚伪欺诈的写实主义作品,如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社会支柱》、《群鬼》,比昂松的剧本《破产》等。随后瑞典的斯特林堡也写出了剧本《奥洛夫老师》、小说《红房间》等作品。这一时期大约持续了十余年,涌现出多个文学巨匠,他们写出了不少流传广泛的经典名著。因而,这一段时期被称为北欧文学的“突破时期”,北欧国家的文学从此在世界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

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北欧文坛变化迭起,出现了一股对勃朗兑斯的主张和写实主义的逆反潮流。1889 年瑞典诗人海顿斯坦发表了论文《论文艺复兴》,提出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固然有助于使文学复兴和充满活力,然而现实是单调丑恶的,因而现实主义也无优美可言，他主张文学应及时回归到唯美和想像的道路上去。海顿斯坦同斯特林堡就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了持久的论战，这场论战持续多年，一直到斯特林堡去世才不了了之。1892 年瑞典诗人弗勒丁也发表论文《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声称照相般的写实主义是无法同伟大的艺术瑰宝相比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呐喊，新浪漫主义便脱颖而出,并且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家,如瑞典的诗人海顿斯坦、弗勒丁、卡尔费尔德和女作家拉格洛夫 丹麦诗人克

劳森、约恩森和印象主义小说家赫尔曼·邦 挪威的哈姆生等。

第二节 勃朗兑斯振臂高呼，北欧作家纷纷卷入现实主义洪流

一

19 世纪后期丹麦处于政治经济上的变革时期，以农业、外贸和转口贸易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确立起来，并且取得明显的效益。丹麦的农业由单一生产粮食、土豆为主的粗放型改变为精耕细作、多种经营，以生产奶品、肉类和禽蛋为主，而且主要出口给当时市场需求最大也最稳定的英国，因而 19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价格大跌不仅没有损害到丹麦，反而促使丹麦农业得到更高利润而有了更大的发展，从 1875—1914 年的短短四十年间，丹麦农产品出口值增长了八倍，这在当时欧洲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农产品转型和出口倍增，丹麦农业亦由一家一户的小农庄转向农业合作社，合作社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大多数农业人口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且被组织起来。到了 19 世纪末，出现了股份制的大型奶制品厂和屠宰厂。由于 1844 年格隆德维克所推行的人民高中教育使得丹麦农民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农村中不再有文盲，农业先进技术得以迅速推广，因而丹麦成为当时欧洲黄油、鸡蛋和肉类的主要供应商，丹麦农业也一跃而居于欧洲领先地位。从 1859 年取消了行会垄断之后，丹麦的贸易得到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 19 世纪最后三十年翻了一番有余，哥本哈根发展成为有四十万人口的都会，使得丹麦全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1894 年哥本哈根建成自由港，更促进了转口贸易的增长。丹麦对外贸易在这段时间里摆脱了德国的制约而转向英国，英国取代德国成为丹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对丹麦来说是得益

匪浅的，因为丹麦从英国获得当时的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大大地带动和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在政治方面，由于农业的地位举足轻重和资本主义农业迅速发展，以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大贵族的残余力量所组成的右翼政府在王室支持下仍然把持政权，但很难维持住局面，1885—1894 年以农民和城市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左翼党力量进一步得势。右翼政府出动军警使用暴力，并且宣布紧急状态，但仍弹压不住。左翼党终于于 1901 年组织政府，由此丹麦也进入了完全代议制，政权全归议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运动也兴起。1871 年丹麦社会民主党成立。 1872—1874 年间在丹麦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之下，各地纷纷成立工会组织。1899 年工会得到承认作为劳资纠纷谈判的劳工方面代表， 1900 年成立永久性劳资纠纷仲裁法院。

这一时期丹麦思想界也十分活跃，达尔文的进化论、柏洛森的直觉主义，以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创造都在不断激发丹麦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思索与探求。欧伦斯莱厄的浪漫主义怀古诗歌和安徒生的远离现实的童话故事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在科学开始昌盛的年代里，文学家们更感受到了宗教的桎梏和制约。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和法国从流亡时期到1848年二月革命所涌现出来的文学巨匠们，以及德国的“青年德意志”派文学家们所树立的榜样都蜂拥而来，对丹麦思想界产生巨大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丹麦在北欧诸国中得风气之先，领头冲破了当时仍然弥漫在北欧文学中的宗教道德说教和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脱离现实的孤芳自赏，丹麦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振臂高呼，发出了突破性的号召，促成了北欧各国出现了一个文学繁荣的黄金时期。在这方面，勃朗兑斯功不可没，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来说，他确实影响和带动了一批作家，开创了“现代突破时代”，亦被称为“勃朗兑斯主义”或“勃朗兑斯时代”，但是作为一代宗师或文坛领袖来说，他又存在明显的不足。他的哲学观点颇为杂乱，而且往往自相矛盾，克尔恺郭尔对他

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在他晚年大力吹捧和信奉尼采哲学更是一大败笔,以致由激进民主主义退化为英雄崇拜的贵族激进主义。

二

格奥尔格·勃朗兑斯(1842—1927)是 19 世纪丹麦和北欧具有最重大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观不仅扭转了丹麦和北欧浪漫主义脱离实际、一味标榜唯美的倾向，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北欧和欧洲大陆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勃朗兑斯出身于哥本哈根的一个犹太富商之家。由于犹太人的血统，他一直不曾深入地接触过基督教的教义和学说。他青年时代梦想成为一个诗人，继古代伟大诗人之后，也期望能成为像欧伦斯莱厄那样的诗人。然而当他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法律时深受克尔恺郭尔的影响，被克尔恺郭尔对基督教所作的严谨解释深深地吸引住了，并且陷入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信仰危机。但是最后他终于以顽强意志打消了想要改变信仰并改学神学的念头。但是他终究做出了改变，即改为学习哲学和美学，并且在 1863 年明确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勃朗兑斯 1868 年发表了论著《美学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1870 年他发表了两部专著:《丹麦的诗人》和《当代法兰西美学》。

勃朗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文学观点明显地受到欧洲大陆当时流行的思潮的影响，但是勃朗兑斯并没有满足于模仿追随或是一味照搬，而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提萃取精、兼收并蓄，形成了新型的学说，而且在自成一家之后反过来对欧洲大陆的哲学和文学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对德、法、俄。这正是勃朗兑斯的过人之处。1870—1871 年勃朗兑斯赴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地游学。这次旅行使勃朗兑斯得益匪浅，不仅受到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文艺古迹和风貌的熏陶，更主要的是使他打破思想禁锢和闭塞，大开了眼界，思想起了剧烈的转变。在英国，他亲身体验了英国维

多利亚时期以来的科学进步、经济发达、文明昌盛的状况，他的自鸣得意、故步自封的民族主义情绪被一扫而空，呼出了震撼性的口号：丹麦要比英国落后起码四十年，因此不能再沉睡下去，或者满足于唱唱圣歌。他从法国文学评论家圣伯夫(1804—1869)和泰纳(1828—1893)的作品中学习到了文学评论的精髓所在和激进民主主义历史观点。1870—1871年正值普法战争失败，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泰纳在多卷本《法国的起源》中把法国遭受浩劫的原因归咎于政治上接连不断的动荡不安，其过失在于人民革命运动的彼伏此起。勃朗兑斯颇以为然，认为丹麦两次遭英国入侵受到惨重的损失和民族耻辱，其因不仅在于英国强大，而且在于丹麦的沉睡不醒，其过失在于沉湎于追忆往昔的辉煌，满足于宣扬宗教教义戒规借以拯救灵魂，他还认为格隆特维克的振兴基督教运动固然有助于普及教育，但是同时却鼓吹了安于现状的思想，因而格隆特维克的民主和信仰自由，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而只是一场振兴丹麦教会的神学运动，旨在用非强制的手段来诱使信徒们更狭隘地被禁锢在“使徒信条”的说教范围之内。勃朗兑斯虽然接受了泰纳的史学和文艺观点，但是并不完全同意泰纳的几个主要观点，如泰纳认为文学评论是一门科学，因而企图用“科学”观点建立系统的理论基础。勃朗兑斯对此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文学评论在本质上是一门艺术，因此必须用深刻细腻的分析和富于魅力的艺术手法，在这方面他更倾向于圣伯夫的观点：以深入的分析和生动简洁的文笔勾勒出作家的精辟之处来揭示作家内在世界和精神面貌，而不是按照公式定律去判断一个作家的是非优劣。对于泰纳在《英国文学史》(1863—1869)的《导论》中所提出的文学作品受到三个条件的制约,即 种族、环境与时代,勃朗兑斯提出了质疑和反对,认为这三个原则并不能完整地构成文学理论，而文学天才的形成与出现既非种族性格，也非时代潮流，不过勃朗兑斯到了晚年迷恋于尼采哲学，热衷于英雄超人崇拜，便将自己以往的观点弃之不顾了。

1871 年勃朗兑斯在归途中,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相遇在柏林车站。两人志同道合,相约要掀起一场"精神革命",易卜生期望勃朗兑斯在欧洲掀起一场风暴,而他自己在挪威也要让"那些人"不得安生。这两个文学家果然说到做到，他们掀起的风暴比预料的还要猛烈并且是划时代的。勃朗兑斯从 1871 年起便连续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学术讲演,鼓动变革,整个讲演前后持续了十五年,在 1887 年才结束(不包括流亡德国的五年),所有的讲演稿全都收录在《19 世纪文学主流》这部六卷本的巨著之中，1890 年才正式出版(在此以前已分集出版)。全书六卷本:《流亡者的文学》、《德国浪漫派》、《法国文学的反动》、《英国的自然主义》、《法国的浪漫派》和《青年德意志》。这部巨著十分完整地介绍了 19 世纪的欧洲文学,从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国外的夏布多里昂、拉马丁到雨果、巴尔扎克以及一大批法国写实主义作家。从雪莱到拜伦所领导的英国诗坛自由大震荡，到德国海涅和伯尔纳(1786—1837)的激进主义和革命民主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勃朗兑斯对"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家们都加以热情鼓励支持，尽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只是狂热或者浅薄，而他所推崇的只有海涅,虽然海涅并不是"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但是毕竟在思想倾向上是相通的，并且也因此而上了德国政府的黑名单。

《19 世纪文学主流》无疑是一剂催化剂，勃朗兑斯的"写社会写人生"的号召得到了不少北欧作家的响应,"问题文学"成为当时北欧文学界趋之若鹜的时尚。勃朗兑斯在《导论》中的这一著名片段更是成为北欧文人竞相传诵的战斗纲领和口号：我们时代里一种文学的存在是通过这一事实所显露出来：它要提出问题来争议。因此不妨举例来说,乔治·桑[1]在婚姻问题上提出争议,伏尔泰、拜

①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著有《木工小史》、《康素埃洛》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乔治·桑的妇女问题小说以爱情和婚姻自主作为妇女解放的前提，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而呼号。

伦和费尔巴哈①对宗教提出辩论,而蒲鲁东②则触及了私有财产;年轻的大仲马触及两性关系;埃·奥斯杰③提到了社会关系,因为"一种文学倘若不提出问题来辩论,它就会失去所有意义,形同虚设"。勃朗兑斯要求文学应该成为"人类自由和进步的伟大思想"的喉舌。

勃朗兑斯的主张本身就在丹麦和北欧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辩论。一方面固然有一批丹麦作家聚集在他的周围,如雅可布森、德拉克曼,他们组成了"现代突破派",成为文学运动的主力。但是另一方面迫害和围攻也随之而来,官方当局、大学和教会联手起来向勃朗兑斯施加高压和迫害,他的教授职位被取消,所办的刊物被逼得停刊。在此情况下,勃朗兑斯只得流亡国外。他在柏林侨居五年之后,却意想不到地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这是因为 1882 年他回国时,丹麦的政局起了重大变化。农民党的力量日益强大,政权已经完全掌握在民主主义的左翼手里。勃朗兑斯也由遭受迫害而变为得到承认和支持,事实上从 1880 年起丹麦文坛就已被《19 世纪文学主流》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思想所占领,另外也由于墙内开花墙外香,勃朗兑斯的影响遍及北欧各国,首先是挪威的易卜生和比昂松,随后又有瑞典的斯特林堡起来响应,阵势和成果远大于丹麦国内。勃朗兑斯侨居德国期间也将易卜生等人介绍到德国。因此,"勃朗兑斯主义"一词已被北欧各国和欧洲大陆所承认和接受。

① 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创立人本主义来批判宗教,著有《基督教的本质》等。

② 蒲鲁东(1809—1865),法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贫困的哲学》、《什么是财产?》等著作,并提出"财产即赃物"的口号。学说和政治活动被称为"蒲鲁东主义",对法国工人运动颇有影响,是 19 世纪 40 年代的主要思潮之一。蒲鲁东派的左翼参加了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失败后,代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便失去影响,蒲鲁东派也不复存在。

③ 埃·奥斯杰(1820—1889),法国 19 世纪 50 至 70 年代重要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著有《服装商贩和他的肚子》(1854)等剧本,对比昂松、易卜生有相当影响。

1883 年勃朗兑斯出版了《现代突破运动的人们》一书,书里列举了丹麦“ 现代突破 ” 派的文学家。值得注意的是丹麦有不少享有盛名的作家,如现实主义作家彭托皮丹、散文家维尔海姆 · 迪内森和号称‘ 北欧惟一的世纪末 ’作家赫尔曼 · 邦等,都不曾参与或对‘ 现代突破 ” 运动表示支持。童话大师安徒生和迪内森一样是勃朗兑斯的契友,但是对‘ 现代突破 ’文学运动却不以为然。勃朗兑斯也认为安徒生过于献媚权贵,讨好教会,并对安徒生为了求得贵族头衔而奔走于宫廷表示鄙视和憎厌,曾多次批评过他,而安徒生只说“ 勃朗兑斯像狼一样扑了上来 ”,依然我行我素,以致两人后来终于互不往来。

作为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撰写了不少具有影响的著作,如《丹麦诗人》(1877)、《泰格奈尔传》(1878)、《莎士比亚传》(三卷本,1895—1896)和《易卜生传》(1898)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勃朗兑斯还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如《歌德传》(两卷本,1914—1915)、《伏尔泰传》(两卷本,1916—1917)、《恺撒传》(1918)和《米开朗琪罗传》(1921)等。

作为 19 世纪末期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文学的领袖,他所发动的‘ 精神革命 ’延续了十几年之久,几乎北欧国家所有的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 勃朗兑斯主义 ’的熏陶,并且也使北欧文学在欧洲和世界文坛上走到前列。勃朗兑斯还善于发现并推荐新秀,有几个对欧洲当时文化生活产生重要作用的作家都是他参与推荐和提携的,如保尔 · 布尔热①、法朗士②、纪德③、海泽④ 和罗曼 · 罗

① 保尔 · 布尔热(1832—1935),法国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以《现代心理学》等心理学论集和心理哲学小说著称。

② 阿纳多尔 · 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192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③ 安德烈 ·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194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④ 保 尔 · 海泽(1830—1914),德国作家,191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兰等人，而易卜生、克洛代尔①和尼采这三个人则是他首先发现的。尼采(1844—1910)在发表了《道德的系谱学》(1887)之后便受到勃朗兑斯的关注，1888 年他就尼采的哲学思想在哥本哈根大学作了多次学术讲演,并将讲稿整理成了巨著《贵族激进主义》,这部巨著出版后于 1889 年译成德文，从此尼采便闻名于世。此后两人保持通信达十年之久，而勃朗兑斯晚年不仅不遗余力地吹捧尼采，自己也深信尼采哲学,他的后期著作,如《莎士比亚传》、《歌德传》、《恺撒传》、《伏尔泰传》和《米开朗琪罗传》都贯穿了尼采的哲学精神和思想。

三

由勃朗兑斯发动并领导的丹麦"现代突破"文学运动从兴起到衰落前后不过十来年光景,而且声势并不能算强大,与挪威和瑞典硕果累累、人才辈出的状况是难以相比的。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一、丹麦文坛的浪漫主义势力仍十分强大,不但印象派小说家,如赫尔曼·邦、浪漫主义诗人克劳森、约恩森等在丹麦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反对他，甚至连他的契友迪内森和童话作家安徒生都远离了他。而到了 90 年代以后，浪漫主义流派又重整旗鼓夺回失去的阵地。二、勃朗兑斯十分希望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年轻、有才华的作家,如同左拉身边的梅塘集团一般,但是事与愿违,"现代突破"运动虽然也聚集了一些作家,但是能有成就、享有声誉的却寥寥无几,仅雅可布森和德拉克曼两人。至于吉勒鲁普,只能说受到勃朗兑斯的观点影响,是个同情者,但并不参与"现代突破"运动,他的主要作品如《敏娜》、《磨坊》等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① 保尔·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外交家、作家,曾任法国驻福州领事,驻日本、美国、比利时大使。他师宗法国象征主义大师兰波,是 19 世纪后期象征主义最重要的诗人和戏剧家。

三、勃朗兑斯本人的不足,他同左拉固然无法相比,即便同法国文学评论家泰纳和圣伯夫相比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因而“现代突破”文学运动很早就夭折,但是勃朗兑斯对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界的巨大影响却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

丹麦人通常把延斯·彼得·雅科布森(1847—1885)同挪威的易卜生和瑞典的斯特林堡相提并论，因为雅科布森不仅是北欧文学“现代突破”运动的主力,而且也是这一时期丹麦仅有的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他的作品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之外，受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等地的重视。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诗人里尔克、小说家穆齐尔都深受他的影响,尤其是里尔克对他推崇备至,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对雅科布森的长篇小说《尼尔斯·吕恩》更是爱不释手。即便是在 90 年代以后，勃朗兑斯主义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失势,新浪漫主义兴起之时,雅科布森的着落派仍继续引起公众的重视和好评。他的作品主题鲜明,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起伏,往往以细腻的观察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并且以高超的技巧烘托出气氛,取得震撼人心的效果。

雅科布森出生在丹麦一个名叫梯斯坦德的小镇上，他自幼爱好写诗，喜欢阅读和吟咏波德莱尔的诗。但是在哥本哈根大学求学期间,他一反过去的兴趣爱好,投身到勃朗兑斯的阵营,立志为创造丹麦新文学运动而呐喊冲锋。他发表了不少论文，并且译介了国外有关达尔文学说的文章。

雅科布森在 1872 年发表了小说《莫恩斯》,这是丹麦第一部自然主义作品。小说主人公莫恩斯不顾社会常规习俗，按照直觉本能如醉如痴地爱上了一个女人，然而这个女人却不幸死去。他耽于肉欲,放纵淫乱,在一段时间里,他虽然纵情于享乐主义,然而内心痛苦不已。后来,他翻然悔悟,痛心疾首,要重新做人。这时他邂逅了一个能使他灵与肉的爱情都得到满足的女人,自此之后,他便快乐地生活下去。这部作品刚一问世便引起轰动，不仅因为其

崭新的创作手法和写作技巧，也是因为敢于写出人类身上的人性和兽欲的两重性。整部作品虽然有写实主义色彩，然而所运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乃至情节故事，都具有十分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

雅科布森的第二部作品是 1876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玛利亚·格鲁卜夫人》。这部作品实际上是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的翻版，所不同之处在于雅科布森比福楼拜更富于乐观主义，没有像福楼拜那样让包法利夫人去自尽，而是让女主人公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的故事发生在 17 世纪的上流社会，玛利亚·格鲁卜夫人出身于名门世家，长得端庄美丽，曾有过两次婚姻，其中一个丈夫是国王的私生子，然而两次婚姻都在激烈的争吵后以失败而告终。她忍受了孤独和焦虑，在伤感和惶恐之中步入中年，她摒弃了尔虞我诈的上流社会隐居起来，忽然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侍候她多年的、身份卑微的男仆。于是，她不顾清规戒律和啧啧人言，竟同那个男仆私奔，并且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乐生活。这部作品问世之后曾掀起轩然大波，不少人指责他诽谤社会、败坏道德和有碍风化。

雅科布森第三部重要作品是小说《尼尔斯·吕恩》（1880），主人公吕恩是个从不信上帝，甚至亵渎宗教的无神论者，他经常与人展开辩论，宣扬无神论，反对宗教，主张妇女解放，反对夫权束缚，颂扬真实的艺术，反对浪漫主义梦想，可是他本人却并未因此而感到自己得到了解脱，或者享受到了真正的人生。他曾被许多女人所吸引或诱惑，然而却遭到了她们的抛弃，甚至他妻子在临终前都不肯原谅他对上帝的不敬。当他的独生子病危之际，他在病榻前向上帝祈祷，可是上帝似乎并没有理睬他发出的呼号，病儿悄然死去，而尼尔斯·吕恩本人也在 1864 年德国入侵丹麦的战争中被死神召去。《尼尔斯·吕恩》在结构和人物性格上都同作者以前的作品一脉相承，然而这时的作者已经不再乐观，而是敢于面对严峻的人生和社会，《尼尔斯·吕恩》的思想性更为深刻，也更具有现实主

义特征。

霍尔格·德拉克曼(Holger Drachman,1846—1908)是丹麦另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果说延斯·彼得·雅科布森以他的小说《莫恩斯》为丹麦文学开创了新的一页，那么德拉克曼用他充满激情的《英国社会主义者》(1871)、《莫勃国王》(1871)等诗歌来唤醒人们的社会意识。他的作品除了诗歌外，还有小说和剧本。他出身在医生家庭，曾学过绘画，年轻时在英国结识了一些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到英国的法国人，也看到英国劳苦大众的生活，这使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十分痛恨，对他日后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德拉克曼的小说《命中注定》(1890)写一个正在杂乱无章地扩大着的城市中的形形色色的状况。同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说《红房间》类似,他的这部作品也是着重反映19世纪9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艺术活动的。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一个多余的人》(1876)、诗歌《诗集》(1872)和《海滨之歌》(1877)等。他的作品辛辣地讽刺了资产阶级的堕落和腐朽，热忱地表达了他对'健康'、'自然'的人民的同情。

四

19世纪后期活跃在丹麦文坛上的作家有以下几位：

赫尔曼·邦(1857—1912)是19世纪80年代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牧师家庭,曾在艺术学校就读,在首都哥本哈根和巴黎担任过戏剧导演。

邦在19世纪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评述法国自然主义和叙述自己艺术观的论文,他主张文学应该研究现实,认为现实主义是符合时代风格的一种艺术形式，文学艺术要像演戏一样使读者受到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的感染。这些文章后来均收进论文集《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者》(1879)一书中。

邦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绝望的后代》(1880)、《灰泥》(1887)和

《蒂娜》(1889)等,回忆录《白屋》(1898)和《灰屋》(1901)以及短篇小说集《低沉的乐曲》(1880)、《奇怪的小说》(1885)、《寂静的生活》(1886)和《枷锁下》(1890)等。邦的后期作品着重描述人的孤独,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米盖尔》(1904)和《失去祖国的人》(1906)中的主人公都是艺术家,作品描写他们得不到亲朋的爱和理解,孤独地在天涯流浪的故事。这实际上是他本人经历的写照。邦自己曾以记者、作家等身份在欧洲各国游历旅行,朗诵作品。1912 年,他在美国巡回朗诵时溘然去世。

卡尔·吉勒鲁普(1857—1919)于 191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出生于牧师家庭,自幼深受基督教的影响。1874 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神学。1878 年大学毕业时,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接着又发表了《青年丹麦》(1879)以及描写一个丹麦青年牧师从信奉宗教到背叛宗教的《日耳曼人的门徒》(1882),这些作品明显地表现了他受到勃朗兑斯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1883 年,他到德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和俄国进行考察旅行,对这些国家的文学艺术进行研究,这次考察使他的创作从现实主义转向德国古典主义。他发表了深受席勒影响的剧本,如大型悲剧《布伦黑尔》(1884)。除以上这部悲剧外,还有诗集《我的爱情书》(1889)以及两部长篇小说《敏娜》(1889)和《磨坊》(1896)。这两部小说的结局都很悲惨,《敏娜》描写一个叫敏娜的德国姑娘的爱情悲剧;《磨坊》是写磨坊主把妻子和妻子的情人在磨轮下活活碾死的惨剧。他的后期作品有小说《皮利格里姆·卡马尼塔》(1906)和《金色的树枝》(1917)等,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他受到佛教的影响。

亨里克·彭托皮丹(1857—1943)出身在日德兰半岛的一个牧师家庭,但是他对家庭虔信宗教颇为反感,一心想获得工程师的学位,因此违背父意,到哥本哈根技术学校学习,没有毕业即到一所学校教数学和物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立志当一名作家。他从 80 年代开始写作,90 年代起一直居住在农村,过着专门从事

写作的生活。他的长篇小说《天国》(1891—1895)描写一个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牧师自愿到偏僻的农村当牧师，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劳动去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他的良好愿望和努力没有得到同情和支持,反而遭到反对,受到孤立,他不得不放弃教职,回到哥本哈根,最后被送进疯人院。作品通过对一个宗教幻想者的刻画，反映和抨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幸福的彼尔》(1898—1904)是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带有自传性质,描写一个出身于牧师家庭的年轻人,立志学工,以便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但是他没有成功。后来他离开了喧闹的城市来到乡间，最后他发现他只不过是在具有中世纪神秘色彩和宗教虔诚的荒凉地区中消磨余生而已。长篇小说《死人的王国》(1912—1916)中的主人公厌倦生活,渴望死亡,充满悲观失望情绪。

彭托皮丹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农村景象》(1883)、《农舍》(1887)、《云》(1890)和中篇小说《贵客临门》(1908)等。晚年还著有小说《男人的天堂》(1927)和自传《寻找自己》(1943)等。彭托皮丹是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批判和抨击了社会上的自私、虚伪和罪恶,描绘了贫苦人民受欺凌和被蹂躏的状况,给丹麦文坛输入一股清新之风。由于他的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当代丹麦的生活”,他于 1917 年与吉勒鲁普同获诺贝尔文学奖。

维尔海姆·迪内森(1845—1895)是为数甚少的几个丹麦散文家之一。迪内森是勃朗兑斯的契友,然而并未参与‘现代突破’的文学运动。他家境富有,时常为报刊撰写散文作品,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平静生活,曾参加过战争。1872 年他去美国,在内布拉斯加州和威斯康星州游历,1874 年返回丹麦后写了许多游记和散文，1889年汇编成集出版了《狩猎来鸿》,成为轰动一时、竞相传诵的文学作品。他自己发觉有性病后自杀。

尤汉内斯·约恩森(1866—1956)由于对 90 年代抒情诗的复兴做出贡献而在丹麦文学史上占有显要位置。他曾担任对丹麦文学

有广泛影响的期刊《灯塔》(1893—1894)的主编,并且成为丹麦年青一代文学家的核心人物,同‘现代突破’的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流派作斗争。他在《灯塔》上发表了多篇颂扬象征主义的论文,受到了新浪漫主义青年作家和颓废派诗人的喝彩,被誉为“新世纪曙光的标志”,并且被他的好友作家苏菲斯·克劳森称赞为敢于叛逆自己以往信仰的人。约恩森受到法国象征主义流派影响很深,他的诗作大都刻意仿效法国诗人魏尔兰,虽然富有浪漫情调,却很少有新意,并且宗教色彩很浓郁,因而被人挖苦说他思想十分前卫而诗作却很古板。约恩森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夏天》(1892)、长诗《忏悔》(1894)、诗集《从深渊中来》(1920)和《流淌的井》(1920)等。

约恩森在晚年更虔信天主教,他撰写了几部圣徒传记,如《圣弗朗西斯传》(1907)、《西奈的圣卡塔琳娜传》(1915)等,并写了自传《我一生的传奇》(七卷,1916—1928)。他的作品在欧美流传很广,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苏菲斯·克劳森(1865—1931)是丹麦最有代表性的颓废派诗人,他一直倾向于浪漫主义,崇拜海涅,年轻时即开始写诗,但是他与约恩森颇为不同,他深受法国浪漫诗人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响,却并不模仿抄袭他们的风格,而是毫无拘束地自成一派。他早年曾任报纸记者多年,发表过几篇田园牧歌式的短篇小说,这些散文般的小说大多结构松散,缺少情节,然而都突出描绘了性爱和男女愉悦的场面。他的成名作小说《年轻的一伙》(1894)描述了一个农村青年虽然无所作为,然而多次求爱得手和偶尔的失败却使他享受到了人生的欢乐。克劳森作品的主题大多是表明尽管爱情同人类在玩弄不可预知和不公正的人生游戏,然而这样的游戏还是值得人类用毕生精力去投入。克劳森一生就是本着这样的信条去生活和写作。他生活上追求狂欢和纵欲,在创作上也狂妄不羁,明目张胆地鼓吹性爱至上,甚至说性解放乃是更欢乐地享受人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他的诗篇销路有限,阅读圈子也很小。他的诗

作同瑞典弗勒丁颇有类同之处,都是追求欢乐人生,然而弗勒丁的诗作并不淫荡,不去触及或用隐喻来描写性爱,因而两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

克劳森的主要作品有赤裸裸鼓吹性爱的诗集《自然之子》(1887)、《柳笛》(1899)、《妖魔的法术》(1904)。他的诗篇多半并不受人欢迎。到了中年以后,他在诗作中将性爱的内容减少,这样他的才华反而崭露出来。他追溯往事,回顾人生的诗集《丹麦韵文诗》(1912)、《寓言诗》(1917)和《赫露伊卡》(1925)都很富有幽默感,不时有妙语警句,颇有启示录风范,而另一部以大地母亲的长篇独白贯穿全文的虚无主义长诗《帝国统治》(1912)却受到冷落。

第三节 文坛巨匠斯特林堡新浪漫主义文学在瑞典吹响号角

一

自19世纪60年代起,瑞典的工业化迅速展开,其速度之快、势头之大和门类之全是北欧国家中首屈一指的。虽然1866年、1873年的欧洲经济危机和粮价暴跌曾使瑞典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是终于化险为夷,渡过了难关,并且采取了不少自我保护的措施,如改革保守落后的海关税制等,并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瑞典依仗了拥有优质铁矿、水力和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工业迅速发展,仅半个多世纪就已经可以同英、法等欧洲大国比肩,甚至连德国都比不上它。1897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工业展览会标志着瑞典已步入工业化社会。19世纪初瑞典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全国二百五十万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居住在农村,而到了20世纪初人口增长到五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此外由于饥饿和失业的威胁,在19世纪共有八十五万人移民

到美洲谋生。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进程不仅加快了人口从农村朝城市集中，而且也必然加剧了劳资冲突和斗争，工人运动的兴起，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1889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在亚玛尔·布朗亭(1860—1925)领导下瑞典社会民主党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派改变为伯恩斯坦的进行议会斗争的政党，但是直到 1896 年才赢得第一个议席,1917 年成为瑞典的第一大党。如果同丹麦相比较的话，丹麦社会民主党早在 1871 年就成立,并且在 1884 年就赢得了两个议席。不难看出瑞典工人运动所经历的曲折和困难要比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大得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瑞典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当时站出来在文化上反对政府当局、同情中下层劳动人民、揭露资产阶级和宗教的丑恶面目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如斯特林堡和“青年瑞典派”的作家们,因而瑞典文坛出现了 80、90 年代蓬勃活跃的新气象。

二

正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丹麦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所发动和领导的“现代突破运动”在瑞典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勃朗兑斯提出的“作家必须写社会写人生”“必须发现问题开展辩论”等主张成为瑞典作家们的战斗口号。1879 年斯特林堡出版了长篇小说《红房间》,这是瑞典第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犀利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丑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阅读;“问题文学”成为当时最受欢迎、广为传诵的作品。浪漫主义的诗歌由此黯然失色，但是也深深刺痛了上流社会;“问题文学”作家被列入“具有危险倾向者”的黑名单，遭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迫害。但是也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支持，政府教会才不敢贸然对他下手迫害，而且即便施加罪名，也要尽量做得冠冕堂皇，在舆论上能有所交代。

1882 年以斯特林堡为首的一批瑞典作家组成了激进的“青年瑞典派”,其中有古·耶伊尔斯塔姆、维·贝纳迪克松、吐·赫德贝格等人。这些作家都是受到勃朗兑斯的感召而效法“青年德意志”派所组织起来的。他们程度不同地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围绕在亚玛尔·布朗亭周围,在他主编的《时代杂志》、社会民主党主办的《晚报》和文艺杂志《当代年鉴》,以及自由党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动用文艺探索社会问题和暴露黑暗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撰文著书，写出了不少针砭时弊、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疾苦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因而成为当时瑞典文坛的主流，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青年瑞典派”本来可以更有作为，然而因为缺乏核心和领导，终于在几年之内就分崩离析，逐渐远离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写作上从写实主义转向表现主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信奉叔本华、斯宾塞和尼采哲学，并且也受到丹麦的克尔恺郭尔的基督就在自己心中以及斯维登堡的通灵术和神秘主义玄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斯特林堡并不是一个擅长于团结人的领路人,“青年瑞典派”的失败和分裂,斯特林堡是难辞其咎的,他骄横恣肆,落落寡合,以至于自命为“伟大的孤家寡人”，他的这种容不得别人和听不进他人意见的专横暴戾，后来更发展成癫狂失常，使得周围的人都离他而去，正如勃朗兑斯所说“斯特林堡可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不是一个能为人师表的领袖人物……因为在他身上不是只有一个斯特林堡而是有很多斯特林堡在相互斗争”。几年以后这个进步的文学团体便瓦解了。他们中间有些人仍在瑞典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享有盛誉，但写作风格却从现实主义转向表现主义，由描写现实转向描写晦涩荒诞的心理变态，包括斯特林堡在晚年也是如此。

三

关于斯特林堡，有不少突出之处是难以在北欧其他作家身上

看到的,且举例说明:

其一，斯特林堡的作品发行量之大是当时北欧国家中少有的，每版动辄上万册，而且一版刚发，紧接着另一版开印。他的作品很少有精装本，大多是毛边纸脊平装，而且大量的是不裁边的小开本，因为斯特林堡的读者主要是工人和年轻学生，他们都只能攒钱购买最便宜的版本。当然斯特林堡作品的出版数量与有官方背景的印刷品数量是无法相比的，如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1912 年初发表宣传性著作，呼吁瑞典武装起来并参加三国联盟以抵御俄国迫在眉睫的入侵，其印数竟然高达一百万册。同样，海顿斯坦在 1897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卡尔十二世麾下的军队》也一版再版大量印刷，成为当时右翼政府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和扩军备战的舆论蛊惑。但是北欧其他一些文学家尤其是诗人的作品大多只有几百册,而且往往只出一版,与之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其二，斯特林堡曾多次被卷入争论之中，如 1884 年因《结婚集》中有‘亵渎神灵和宗教’内容而回国受审时,以瑞典《每日新闻》为主掀起了一场暴风雨般的大辩论来为斯特林堡助威造势。不过那场争论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之间进行，尚未涉及整个社会。但从 1905 年开始交锋,并在 20 世纪初进入白热化的那场大辩论却旷日持久，而且席卷全国，把社会各个阶层都吸引过来参与进去，场面之大，斗争之剧烈是瑞典和北欧文学界空前的，因而瑞典大百科全书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直到二次大战前后还自成一个条目“:斯特林堡之争”。这场论争是从斯特林堡 1905 年发表的《历史小故事》开始，他在书中赞扬了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致力于文艺复兴，从而将文明引进俄国，而瑞典对俄国发动的战争是毫无道理的，由此拉开了论争的序幕。 1910 年斯特林堡又发表了《对法老的崇拜》一文,这是对海顿斯坦 189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的分析与批驳，由此“斯特林堡之争”的战争便在正面阵地上打响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两个文人在谈古论今，为卡尔十二世和彼

得一世的功过是非而喋喋不休地争来争去，但是实际上的含意却要深刻得多。1909 年瑞典爆发了这个国家迄今为止的惟一的一次全国性大罢工，参加人数达二十九万人。大罢工虽然被右翼政府动用军警武力镇压下去，但是造成政治上极其动荡不安，瑞典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府为了谋取超额暴利而必须以加强国防和抵御俄国为借口来扩军备战，因此必须借用卡尔十二世来煽起久已存在的对俄国的仇恨。而布朗亭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则坚决反对瑞典的穷兵黩武和对俄国进行报复等。因而这一场争论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争论，早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两个对峙的阵营一方是以女佣之子的斯特林堡为首，另一方则是贵族出身的海顿斯坦、瑞典最后一个册封为贵族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和诗人卡尔费尔德等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 1912 年斯特林堡去世才不了了之。

其三，瑞典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对他的热爱是任何一个欧洲文学家所梦寐以求却又无法追求得到的。在 1909 年斯特林堡六十寿辰时，成千上万的群众主要是工人和学生游行到他的寓所门前祝寿,他们高举火炬,扛着红旗,高呼“人民的斯特林堡”。1911 年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发起为斯特林堡举行全国性募捐来解决“英梯姆”剧院遗留下来的大笔债务。在他六十三岁寿辰时，布朗亭率领上万工人群众唱着《马赛曲》和喊着“人民的斯特林堡”的口号来向他赠送募捐得到的四万五千克朗，而这笔巨款是瑞典全国各地工人一文一文地募捐而来的。斯特林堡则说他永远把自己看成是下层社会的一员，因为他是女佣的儿子，像这样水乳交融的场面是北欧和欧洲文学家们的生平经历中并不多甚至见不到的。与此相反，瑞典王室和官方也不得不对他的贡献表示承认。1909 年瑞典新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亲临话剧院来出席他的《最后一个骑士》首演式，然而斯特林堡却拒不露面。这种傲岸骨气在北欧国家的作家中是很少见的。

其四，像斯特林堡这样杰出的文学巨匠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北欧作家中所罕见的，实际上，也只有易卜生和斯特林堡两个人，而这两个人恰恰正是统治阶级所最忌恨的。如同易卜生在挪威一样，在瑞典要求授奖给斯特林堡的呼声很高，而且一年高过一年，公众已经越来越不耐烦，甚至瑞典学院不少人也认为众望所归不宜再拖。1909 年大家都以为本年度必定授奖给斯特林堡，而他本人也以为如此，然而，当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却不是他，而是拉格洛夫。这就意味着斯特林堡在他的有生之年永远失去了获奖机会。瑞典学院一再表白评奖是公正公道的，但是 1916 年授奖给海顿斯坦，1931 年甚至在卡尔费尔德死后还授奖给他，其公允性由此可见一斑，无怪当时瑞典的工人喊出了“他们不给斯特林堡奖,我们来给他人民的诺贝尔奖”。

四

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后，由瑞典开始掀起了一股对勃朗兑斯的现实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文学主张的逆反潮流。 1889 年海顿斯坦发表论文《论文艺复兴》,提出 现实是丑恶和单调的,因而写实主义无优美可言。他认为文学已经到了渴望欢乐的年纪，因而主张文学必须立即抛弃“修鞋匠的写实主义”，重新回到唯美和想像的道路上去。1890 年，他又和文学评论家莱维尔廷（1862—1906）联名发表论文《彼比塔的婚礼》,批评 80 年代瑞典文坛被写实主义所把持，主张应以新浪漫主义来取而代之。1892 年诗人弗勒丁发表论文《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赞誉法国的左拉伟大之处在于用象征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而照相般的写实主义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瑰宝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呐喊，新浪漫主义便脱颖而出。在瑞典,新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主要有 塞尔玛 ·拉格洛夫、封 ·海顿斯坦、埃 · 卡尔费尔德、古 · 弗勒丁等人。新浪漫主义由瑞典扩散到北欧其他国家，丹麦涌现出了克劳森和约恩森，挪威出了

哈姆生。新浪漫主义在瑞典和北欧一直流行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

五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出身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开过杂货铺，又当过船舶经纪人，但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家道陡然中落，从富裕陷入贫困。斯特林堡的生身之母是他父亲的女仆，由于这宗婚姻的门第不当，而遭到家族的反对和指责，他的母亲受尽欺凌，在斯特林堡十三岁时便病逝。斯特林堡虽然曾有过一段资产阶级家庭的富裕生活，但时间不长，更多的是在家境窘迫、遭受白眼和屈辱的凄惨日子中度过，正如他在自传体小说中写的那样是在担惊受怕中长大成人的，担心哥哥的拳头、女仆揪头发、外祖母的责骂和继母的树枝，还有父亲的鞭子，以致他不得不用怀疑和敌视来反抗欺凌，造成了他满怀着“生存就是冲突”的观念来看待和对付现存的一切,如家庭、学校,乃至日后的婚姻等等。他的不幸童年造成他心理上的畸形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莫大的痛苦，但是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都采取“敌对立场”的童年印象却在他毕生的创作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创作卓有成效。在这一点上，斯特林堡是不同于其他大多数作家的。

斯特林堡曾上大学学医,但一再因财源难继而辍学,又一再复学，终因学费无着落而被迫中断学业。他热衷于戏剧，想当演员，但上过一次台即告失败。二十岁时他创作了反映冰岛神话时期父女两人因宗教信仰而发生冲突的独幕剧《被放逐者》，该剧得到瑞典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赞赏和经济资助。为了谋生，他当过家庭教师和新闻记者。直到 1874 年当上了瑞典皇家图书馆助理员，生活才安定下来并且得到改善。

1879 年出版的社会讽刺小说《红房间》使他一举成名,但是这

部小说击中了社会上层的痛处，给他招来了猛烈的围攻。此后他出版了《瑞典人民》(1881)、《新国家》(1882)和《瑞典的经历和冒险》(1882—1883)等讽刺性小说又招致谩骂和围攻，以至于他无法再在国内存身，只得离开瑞典漂泊到瑞士去定居。1884年他著名的短篇小说集《结婚集》被诬为言词亵渎、触犯宗教而受到控告。斯特林堡返回斯德哥尔摩接受审讯，虽然结果被判无罪，但是他的身心却受到极大的刺激摧残。他在这场官司结束之后，迁居丹麦，后来又侨居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地，过着穷困潦倒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接触欧洲大陆上各种哲学和文艺的思潮、流派和新鲜事物要比瑞典国内的文人更广泛，也更直接及时，并且得以结交更多的各国文学家。这恐怕也是斯特林堡的写作风格不断变化的原因所在。

斯特林堡有过三次婚姻挫折：1887年他同长期苦苦追求的贵族已婚女子后来成了女演员的锡丽·埃森结婚。这宗以离谱的婚外恋开始而以吵架离婚结束的既不相称也不和谐的婚姻成为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的社会花边新闻。1893年后与一个奥地利女子的短暂婚姻。1901年到1904年与青年女演员哈丽特·鲍塞的短暂而温馨的婚姻。后者靠了演斯特林堡的戏剧，在两年之中从默默无闻的女伶一跃而为全国最走红的名角，他们之间的婚姻也就难以为继了。三次婚姻的失败和其他一些复杂而不幸的私生活造成了他对妇女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状态。他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是激进改革派，而在妇女问题上却抱有仇视和敌意。起先他鼓吹妇女应该回到厨房去当贤妻良母，他不但反对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所表达的妇女必须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必须走出家庭自食其力的观点，甚至还写了一篇也以《玩偶之家》为名的短篇小说来挖苦讽刺易卜生。在1886年出版的《结婚集》第二集中他对妇女的带有病态的傲慢、偏见、歧视和敌意已经表露得十分清楚。1888年他用法语写成的小说《一个狂人的辩白》一书中已阐明了他憎恨妇

女的心理背景。也正因为在妇女问题上他的与众不同的观点，最后导致他和国内许多思想激进的友人和支持者分道扬镳。

斯特林堡在 80 年代以后精神曾一度失常，并且由达尔文主义转向接受斯维登堡的神秘主义哲学观念和当时正流行的法国心理学家特乌杜勒·里伯特(1839—1916)的学说,即人的个性由很多不同的或是相互矛盾的特征在起作用，而绝大多数人在神经各方面都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破坏而无法协调，因而他们是很低能的弱者，而不同特征有机和协调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者则可以迫使弱者接受自己的思想而变得正常和健康，也就是所谓的“思想传统学说”。他还过分相信和强调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中自然选择起着最有决定因素的作用的观点，后来他在晚年又转为接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说,即人的心理有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而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也是支配个人命运和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斯特林堡也受到尼采（1844—1900)的深刻影响,如强调进化就是权力意志实现其自身的过程,因而要‘自我肯定’和‘扩张自我”，而超人则是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斯特林堡沉湎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学说之中，不仅思想上出现倒退，由激进的无神论者倒退为相信上帝和宗教，迷信鬼魂和通灵术，而且个人也蒙受极大的不幸。在经历了一度精神失常之后，斯特林堡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所以屡遭不幸和失败，都是因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天意在摆布，而天意又处处同他恶意作对，要通过惩罚和考验，迫使他由昔日的无神论和激进的立场上悔悟屈服。在宗教神秘主义、进化学说和五花八门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影响之下,1894 年他在从德国到巴黎的途中又陷入了一次精神危机，甚至觉得周围的人都要谋杀他，以致他在惊恐中惶然逃避暗杀。

把这场精神危机称为“地狱危机”[1]。在度过了这场‘地狱危机’之后，他在宗教观念和文学创作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写了两部描写自己心理的忏悔录《地狱集》(1897)和《传奇集》(1898)。在忏悔录中他讲述了自己悔过和顿悟的过程，灵魂遭受的苦难和神秘的经历使他打开了智慧之眼，以致他能观察到旁人所无法见到的更高一层的现实，因而他将自己比拟为经受过艰苦考验的圣者约伯和与上帝较量过的义人雅各，并且把自己看成是上帝惩罚邪恶的工具。他的这些观点在他 90 年代的戏剧和小说中都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斯特林堡在度过了灾难性的四十天的‘地狱危机’之后,精神逐渐恢复平静，写作的欲望和灵感也再度旺盛起来。他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尤其在语言和化学方面。在语言学方面，他在皇家图书馆工作时曾抄写过汉语和中国的象形文字，他以自学汉语积累的知识写了《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书。在 1910—1912 年间他还曾出版了《世界语言之源》和《母语的历史》。他还从事过把硫磺变成煤炭、把铁变成黄金的化学研究，但终究因为违反基本物质的理论而失败。在‘地狱危机’之后,他摒弃了荒唐的炼金术,也中断了长期以来的语言研究而埋头写作，进入了多产期，如三卷本剧本《到大马士革去》(1898—1904)和小说《在海边》(1890)等一大批作品。不过风格与以前迥异，不再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而是转变成充满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情调，表现出想摆脱痛苦却又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挣扎和变态心理，描写出梦幻般的扭曲畸形的资本主义病态的社会关系。

斯特林堡一直以他犀利辛辣的笔锋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揭露丑恶，批判社会，他的立场始终鲜明地站在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一边。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但是

①原文为英芬诺（infernal),即但丁所著的《神曲》的第一篇。

同情却明确地在他们一边。1909 年瑞典《社会民主报》为祝贺斯特林堡六十寿辰,出版专刊,斯特林堡撰文致谢并宣称“:我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他们即下层社会的代言人中的一员，因为我是一个女仆的儿子。”

1909 年，斯特林堡在刚刚创刊的《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法老的崇拜》的文章，从而挑起了一场大论战。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文学的争论，斯特林堡反对的是当时新浪漫主义派的领袖人物、著名诗人海顿斯坦(1859—1940)所写的短篇小说集《卡尔十二世的军队》(1897—1898),因为当时涌现出一股怀念和尊崇被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打败的卡尔十二世①。在海顿斯坦之前已有历史学家叶尔纳和诗人泰格奈尔(1782—1842)都在声称瑞典守护着文明的东方边界，使其免遭东边野蛮人的侵犯，而卡尔十二世正是这样的守护神和象征。这场论战十分激烈。斯特林堡在《晚报》和《社会民主报》上发表了上百篇抨击文章，而论战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并不局限于文人或知识分子，而是各个阶层，从工人到资本家都参与辩论。这场论战持续到 1912 年,由于斯特林堡去世而偃旗息鼓。斯特林堡的抨击文章后来都收集在《对瑞典民族的演说》(1910)等论文集里。这场论战也以‘斯特林堡之争’为词条列入了《瑞典大百科全书》。事实上这场论战具有超越文学范畴的深远意义。当时瑞典政局动荡不安，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工人生活的困苦，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909 年瑞典爆发了这个国家最大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全国性大罢工，参加人数达二十九万人，其中斯德哥尔摩五万人。大罢工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工人被迫复工。这场

①卡尔十二世（1682—1718),1697 年至 1718 年为瑞典国王。他十五岁继任，十八岁时统帅瑞典军队击退来自西线的丹麦和东线的俄国的夹攻，他以不足万人的孤军击败了十万人的俄国彼得一世大军，1718 年战死在战场

大罢工显示出工人运动的力量,使得资产阶级惶惶不安,以军火工业家为核心掌权的资产阶级右派政府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力图煽起民族仇恨，甚至不惜发动一场对俄国的战争来缓解国内阶级矛盾。政府以加强国防为名致力于扩军备战和压迫工人运动，而工人运动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政府的好战态度。于是两个敌对阶级营垒分明地对阵起来。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结集在斯特林堡身边,而另一方虽然以诗人海顿斯坦、文学评论家雷维廷和刚刚从中亚和罗布泊探险归来而被封为贵族的斯文·赫定(1865—1952)为首,但是他们背后站着军火制造商、各行业的大资产阶级和各色各样要夺回芬兰以雪国耻的复仇者。正因为如此，这场论战就具有关系国家人民命运的重要性，形成了全国都卷入的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这场论战虽然并不能消除战争歇斯底里和狂热者对俄国的民族仇恨，但是有助于揭露和遏制资产阶级掀起的扩军备战的舆论浪潮(如斯文·赫定 1912 年印发了一百万本书名为《警告的呼声》的书,若有其事地警告说俄国马上就要进攻瑞典,瑞典已危在旦夕,必须立即武装起来,全民动员并参加三国同盟),也正因为如此,瑞典工人热爱斯特林堡,把他看成是工人运动的代言人。

如同斯特林堡的写作风格不断变化一样，世界也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潜艇、飞机、照相机等各种新词都出现在他的作品里。斯德哥尔摩街头也早已不再是车辚辚、马萧萧,而是一派现代工业化的景象。斯特林堡的寓所里也安装了电动升降机，而这在当时是刚刚时兴的新奇东西，以致斯特林堡宁愿继续走楼梯而不敢领教电梯的滋味。然而也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正在不易察觉地进行,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欧洲大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无可挽回地造成了这场人类的浩劫，就在斯特林堡去世不到两年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1912 年 4 月初斯特林堡因患癌症而去世，成千上万的各界人

士赶来参加葬礼，工人群众则高举着红旗守卫在灵车经过的每一处街道。按照斯特林堡生前的遗愿，葬礼没有在殡仪馆或教堂里举行，也不奏乐或唱国歌，他被平静地埋葬在新教的墓地上，坟前竖立了一个黑色的十字架，上面除了姓名和生卒年月外还写了这样一段拉丁文悼词“:呜呼十字架,问候你,我们惟一的希望!”说来也凑巧，就在斯特林堡卧床不起和去世的那个月里，被誉为这个世纪的象征的世界最大的、号称不会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邮船在横渡大西洋时撞到冰山上遇难沉没。据说在轮船下沉时，船上的乐队奏着圣诗《上帝呀，我在向你走近》的曲子。斯特林堡也不顾病体从床上挣扎起来，在钢琴上长时间弹奏那支曲子，似乎在遐想沉入海底的不仅仅是那艘轮船，而且是他自己的一生和梦想。

在世界文坛上,斯特林堡主要以戏剧而享有盛誉,早期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五幕历史剧《奥洛夫老师》（1872)是他在研究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写作技巧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极为成功的现实主义杰作。这部名剧描写了 16 世纪 20 年代教士奥洛夫投身于宗教改革事业，然而却被老谋深算的国王瓦萨一世所利用来巩固他的政权。当奥洛夫发现自己只是国王手中的权术工具而不能造福于民众时，便毅然追随岳父宗教改革激进派格特参加反国王的起义。起义失败后,格特上了火刑台,而口口声声说‘不能拿信念做交易”的奥洛夫却在最后关头变节悔过，并且宣布矢志效忠于国王。奥洛夫被格特斥为‘背教的叛徒”,他终于苟且存活下来,但已经不再是英雄史诗中常见的气壮山河的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沦为悲观失望的偷生者。斯特林堡这个剧本和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道德哲理倾向明确的诗剧《布兰德》(1866)有异曲同工之妙。易卜生笔下的布兰德是一位个性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一切不符合他意志的人和事绝不妥协，最后在快要到达山峰之巅时遭雷击而死。而斯特林堡却按照英国思想家勃特勒（1835—1902）的关于真理受时间限制、真理是相对的这一怀疑主义观点出发，没有把奥洛夫老

师写成在为实现理想的斗争中勇于献身，而是写成在软弱动摇中向对方营垒妥协屈服了，从而暴露了英雄人物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背后，心灵上存在着和常人一样的脆弱和渺小的求生欲念，因而奥洛夫老师比布兰德更有人情味、更有个性和想像力，但是与布兰德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相比是毫不足取的。十分明显的是，剧中人物奥洛夫老师的形象其实就是剧作家本人的化身：容易低沉沮丧，悲观失望，并在紧要关头丧失理想而动摇退让。因而这个剧本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道德倾向而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斯特林堡在这个剧本的创作中处处以莎士比亚为楷模，因而在悲喜剧结合所产生的幻觉和准确、细腻地刻画人物等方面都同莎士比亚的戏剧十分相像。在这部剧本里，斯特林堡摒弃了传统的那种朗诵诗的语言，而是采用了更清新自然的通俗的日常对话，因而从那时起便被称为瑞典的戏剧语言大师。

斯特林堡一生创作了六十二部戏剧，他的剧本与北欧诸国其他作家，诸如挪威的易卜生、比昂松等，从思想意识到写作手段都迥然不同。他的剧本充满着对社会、宗教和家庭虚伪的反抗精神，运用了不同于前人和同代人的新颖的戏剧语言，赋予戏剧以一种独特的苦涩和力量，因而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宗教虚伪的揭露更为尖刻锐利，也更招致统治阶级和旧势力的卫道者们的刻骨仇恨和恶毒谩骂、围攻，非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斯特林堡的戏剧创作在早期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但是除了代表作《奥洛夫老师》之外，其他反映现实和愤世嫉俗为下层阶级鸣不平的作品似乎都不如以后的作品受到重视和享有盛誉。

斯特林堡创作了大量历史剧，如《福尔孔家族萨迦》(1899)、《古斯塔夫·瓦萨》(1899)、《埃里克十四世》(1899)、《克里斯蒂娜女王》(1901)和《古斯塔夫三世》(1902)等。这些历史剧几乎涵盖了瑞典中世纪以来的各个时期和杰出人物，因而被誉为“瑞典戏剧的编年史”。斯特林堡遵循莱辛的文艺和戏剧理论，反对诗歌和戏剧

以法国古典主义和毫无生气、一味仿古的牧歌诗体的艺术情趣，也反对戏剧中以历史题材来宣扬封建、宗教道德意识和理想主义的英雄。斯特林堡支持歌德、席勒所发动的德国在 18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把莎士比亚推崇为仿效的典范，因而斯特林堡的历史剧中有明显的莎士比亚风格和语言特色，而事实上斯特林堡的编年史式的历史剧也正是受到了莎翁的几部历史剧，即《亨利六世》（上、中、下篇）、《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上、下篇）、《理查二世》和《亨利五世》两个四部曲以及《约翰王》等的启迪而创作出的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统治的适应当时时代要求的作品。

80 年代后半期，斯特林堡作为一个戏剧家对欧洲的戏剧改革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因为他首次将表现主义和自然主义运用到戏剧中来，并且成功地创作了悲剧《朱丽小姐》（1888）、《父亲》（1887）和《债主》（1888）。这几部独幕剧，尤其是《朱丽小姐》已被奉为世界戏剧史上自然主义风格的经典之作。自然主义是 19 世纪 50 年代之后，浪漫主义文学进入全面衰退时在法国出现的一种文学流派。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左拉根据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把一切归于自然法则的基本原理，认为人的心理性格、情欲和行为都是由生物学规律所决定的，文学应着重探索和表现人的生理上的奥秘和它对人的影响，因而自然主义反对文学只写巨人不写侏儒，只写典型而不写真实，自然主义文学主张写平庸的小人物和琐碎偶然的日常生活细节，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往往掺杂着许多怪诞和畸形的成分，主人公往往具有神经错乱和色情狂等病态。19 世纪 80 年代自然主义文学在德国和北欧开始萌芽，并且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斯特林堡就是在戏剧创作中采用了左拉为自然主义所下的定义，作为冷静的观察者和客观的描绘者，按照自己性格和所看到的现实的一角来表现。独幕剧《父亲》中的女主人公劳拉出于强烈的嫉妒心，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孩子的真正父亲并不是她的丈

夫而是另有其人，因为她丈夫早已患上了精神病。在这样强烈的“思想传导”术的迷惑逼迫之下，那位好心而意志薄弱的丈夫终于对她产生了怀疑，同她决裂。独幕剧《朱丽小姐》描写了一个伯爵的女儿勇于打破门第和身份贵贱的束缚，在五旬节之夜委身于男仆，那个男仆虽然轻狂张扬，但听到伯爵就要回来的风声，便不敢轻举妄动，顿时失去了与贵族千金私奔的勇气。朱丽小姐看穿了男仆色厉内在、猥琐卑微的心理之后愤然自戕。这两部作品既有自然主义风格，又有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固定结构，甚至严格遵循了“三一律”,因而具有强烈的古典悲剧的感染力,尤其是《朱丽小姐》,在欧洲各国历演不衰。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此剧又被改编为以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为内容的剧本在欧洲国家舞台上演出，朱丽小姐成了种植园的白种女主人，而男仆则是黑奴。这出“黑白恋”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在“地狱危机”之后,斯特林堡戏剧的风格又来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自然主义转向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这两者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来自于印象派绘画，印象主义作品致力于捕捉景色给予人的光感，而不是描绘景物的固有形体的特征，因而作品中的形象往往具有模糊不清的轮廓。表现主义则是对印象主义的进化和悖逆，表现主义更强调心理分析，以夸张和歪曲现实形象的手法来表现心理的真实和自我感受，因而表现主义文学作品着重于揭示事物的内在实质而不是外在表象；描绘人的内在灵魂，而不是其表面的行为；展示永恒的品质或真理，而不是抒写暂时的现象。在康德哲学、柏格森(1859—1941）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主观世界、直觉、下意识和潜意识,用异乎寻常的变形或扭曲手法来表现社会的混乱和罪恶、人性堕落和丑恶等等。表现主义戏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战后经济衰退时期达到高峰，尤其在德国，然而开创表现主义戏剧的先驱者并不是德国文学家，而是斯特林堡。斯特

林堡的《到大马士革去》(三部曲,1897—1904)是欧洲最早出现的表现主义戏剧。

斯特林堡开创的表现主义戏剧具有这样的特征：内容荒诞离奇、结构散乱、情节变化突兀,往往鬼魂和活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以致生与死、梦幻与现实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剧中人物往往类型化,常常无名无姓,也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只是抽象的观念,共性的象征，戏剧中也没有明确和特定的时间地点，也没有戏剧性事件，甚至没有剧情转折和起伏，也没有结局。在语言上往往用简单、快速、高亢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因而大抵是口号式的梦呓或声嘶力竭的呼喊。总之，把古典戏剧中的传统要素，如动作、语言和人物等全都压缩到最小极限，甚至不复存在，既没有具体情节和行动，也没有符合客观现实的人物形象。整个舞台只是突出世界的荒诞性和反理性的象征。表现主义戏剧虽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但是却无法揭示产生这些罪恶的根源，更遑论找出克服矛盾的途径，甚至连现实主义戏剧那样为针砭社会弊病而开出药方的做法也没有，而只是号召精神上的再生和绝望中的奋起。《到大马士革去》以独白的形式描写人和命运、异性、教会以及自我的搏斗，正如瑞典文学史专家马丁·拉姆(1880—1950)所说：“戏剧史上从没有一个作家将灵魂的斗争写得这样具体，可说是赤裸裸地暴露在观众眼前。”《一出梦的戏》(1902)可以被看成是《到大马士革去》的续篇,整个戏剧都笼罩在超自然的气氛中,舞台场面光怪陆离，如同梦境一般。属于这类作品的还有《圣灵降临节》(1901)、《罪上加罪》(1899)、《复活节》(1900)和《大路》等。此外还有四部著名的室内剧,即《风雪天》、《被烧毁的宅院》、《鹈鹕》和《鬼魂奏鸣曲》。这四部作品都是对现实的最简单的象征性描写，是梦境与粗糙现实别具一格的混合。《鬼魂奏鸣曲》更是让死尸、亡魂和活人同时登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倾轧的人际关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这部剧本后来成为表现主义作品的典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表现主义戏剧在德国的布莱希特、美国的奥尼尔(1888—1953)、捷克的恰佩克(1890—1938)和英国的杜肯等一批戏剧家的提倡之下达到了高潮。在此基础上，表现主义进一步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荒诞派戏剧，并且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流行，到了后期不仅在西方舞台上演，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类戏剧没有故事和情节，也没有戏剧结构和冲突；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也没有连贯的语言，更没有机警的对话和发人深思的隽语，而只有荒诞离奇的形式和带有梦幻和噩梦的场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有法国的贝特克（1906—)和尤内斯库、阿根廷的库塞尼(1924—)等。因此，斯特林堡也是荒诞派戏剧的开山鼻祖。

斯特林堡对戏剧的贡献在于不仅用自己的剧本为欧洲戏剧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而且还创建了现代流行的小剧场。小剧院的兴建并非斯特林堡的创举，当时的柏林的自由剧院、伦敦的独立剧院和巴黎的自由剧院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创建，但是那些剧院只是规模上小一些，而经营方式和演出内容则和一般剧院大同小异，因而并没有多少特色，而且大多经营困难，甚至濒于歇业倒闭，而斯特林堡的小剧院'英梯姆'(瑞典语的本意为亲密之意)虽则迟至1907年与人合作才在斯德哥尔摩创建起来，但他的小剧院从场地、舞台到剧本完全不同于正规剧院，它只有一百六十个观众席位，舞台很小而且拥挤，没有什么布景道具和灯光。小剧院主要上演斯特林堡专门为小剧院写的室内剧。斯特林堡给室内剧规定了它的主要特征是题材要小，描写要细腻，人物要少，观点要伟大，想像要自由，但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观察、体验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要简明但也不能为简明而简明，不要大的道具，不要太多的次要人物等等。斯特林堡严格按照这些原则写了四个剧本，即《风雪天》、《被烧毁的宅院》、《鬼魂奏鸣曲》和《鹈鹕》。后来又写了关于以农民为主体的、具有民间迷信色彩的《花冠新娘》、抒情浪漫

故事剧《天鹅白》、描写家庭琐事的《复活节》、描写罪恶必将受到惩罚的《圣灵降临节》和《罪上加罪》,以及描写婚姻问题的《死魂舞》等剧本。这些剧本，尤其是前面四部作品都是最简单的生活现实的象征性描写，是梦境和粗糙的现实的别具一格的结合，而这些形式简单、效果良好的剧作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活跃于小剧院舞台上的现代表现主义戏剧的前奏和先驱。

小剧院成立伊始就很有朝气,然而相当长时间并不卖座,观众寥寥。评论家在报纸上尖酸刻薄地把斯特林堡的室内剧挖苦为“没完没了的空谈和令人莫名其妙的廉价想法的大杂烩”。但是在1908年春《克里斯蒂娜》上演时,观众数量空前。自此以后,小剧院几乎一直处于较为繁荣兴旺的局面。小剧院的传统得以保持下来，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斯特林堡写了六十多部小说，是19世纪80年代瑞典文坛的伟大作家，瑞典现代文学史是以斯特林堡为开端的，而长篇小说《红房间》(1879)又是斯特林堡创作生涯和瑞典文学中第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在此以前，瑞典仍以诗歌为主，虽然已有小说体裁的文学作品，但是大多以短篇为主，往往是书信体并且夹杂着大量的宗教和道德说教。这些作品辞藻华丽，情节曲折离奇，却与中下层民众无缘，也吸引不了他们，只能在上流社会中流通。直到斯特林堡的《红房间》出版才使这种局面有了改观。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第一版被一抢而光，在半年之内连续出了四版。次年又以廉价书形式大量出版，而购买的主要是青年和工人。从出版起，这部小说便遭到了猛烈的围攻，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以卫道士的口吻指责小说‘沉闷而悲观”“恶毒而令人厌恶”“只有黑暗与挖苦、辛酸与痛苦”等等。但是随着小说受到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热烈欢迎，每次出版都高达一万册以上，而且还要一版再版，这在当时全国有四百万人口的瑞典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因为一般的文学作品印数大多是几百册，能有上千册已是十分了不起

的大事了。于是大多数报纸也不得不承认《红房间》的成功之处，是‘讽刺的杰作’。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开始使用‘天才’这一字眼来形容斯特林堡。

《红房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年轻的富商子弟阿维克·法尔克出于理想主义的热情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官场生涯，一心要为社会和贫苦民众做事，用文艺来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和病态，以唤醒民众的觉悟，帮助他们觉醒起来进行斗争，实现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小说围绕着当时斯德哥尔摩文人雅士群集的伯恩斯饭店的红房间餐室为中心地点。法尔克时常与一群年轻的诗人、演员、画家等在这里聚首欢饮,因而《红房间》的副标题是《记艺术家和作家们的生活》，但是这仅仅占小说内容的一小部分，甚至主人公法克尔也不占有主导地位，而仅仅作为一根把整部小说串连起来的主线。法克尔放弃官场生活之后为生活糊口而奔走，历尽艰辛，曾当过保险推销员,也当过作家,为了支援工人运动,也当过《工人旗帜报》的记者。小说通过法尔克的经历和观察来揭露社会不公和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他接触社会愈广愈深，就愈放弃理想主义，被迫朝激进和革命方向发展，并且信誓旦旦地立下诺言，说是要永远忠于被压迫者的事业。但是在冷酷而严峻的现实的巨大压力下，他最后终于屈服，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他的好友，激进分子欧勒·蒙塔努斯在山穷水尽之时投河自尽以死明志，而法克尔却回到自己原来出身的阶级，重返官场，在议会开幕时，头戴饰有羽毛的礼帽、身着礼服站在御座旁边的仪仗队里。他的狂热的双眼虽然仍在冒火，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已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瑞典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其成功之处在于并不拘泥于叙述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和命运，而是着重于揭露和批判社会，因而往往通过法尔克的经历而引出许多别的人物，如被点头哈腰的势利小人所包围的财大气粗的批发商；装腔作势从事慈善事业的贵夫人；貌似正经却又在伯恩斯饭店接客的妓女；自命清高而又为饱餐一顿玩弄手

腕、费尽心计的文艺人；用上帝的名义和圣餐仪式来进行坑蒙拐骗的牧师；为得到演主角的机会而不惜出卖色相的女伶……斯特林堡在小说的二十九个章节里勾画出三教九流的众生相，而且个个都是入木三分，拼凑在一起便成为一幅把当时社会风尚描写得淋漓尽致的浮世绘。

《红房间》是瑞典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也正是小说最能吸引人和激起人共鸣之处，因为它不再是置身在象牙塔中的作品，或者是田园牧歌式的作品，而是触及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揭露了它的阴暗与丑恶面的作品。《红房间》产生的时代背景是 瑞典在 19 世纪 70 年代经历过一个兴旺发达的经济高涨时期，而就在大家以为普遍的繁荣将会持续下去，人人可以发财致富的机会来到之际，70 年代末,一场经济危机席卷整个欧洲,瑞典也深受其害,经济立即坠入谷底，大批企业纷纷倒闭破产，购买股票保险等有价证券的人以及腰缠万贯的富翁一夜之间全部家当化为乌有。其实 19 世纪 70 年代瑞典经济繁荣只是虚假的表面现象，带有极大的投机性。1878 年的经济危机只是打破了 70 年代通常带有非法投机性质的景气局面而已，如果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泡沫经济的破灭。正是在这种经济大倒退之中,1879 年瑞典北部城市松德瓦尔爆发了瑞典历史上第一次大罢工，五千名锯木工人参加了这场罢工斗争。木材工业是 19 世纪瑞典国民经济的主体，从 1850 年至 1872 年瑞典木材出口增长五倍，远远超过铸铁而居于瑞典出口商品的首位。这场罢工虽然由于政府出动军队残酷镇压而失败，但是造成极大的影响，资产阶级更是把罢工看成是巴黎公社式革命的前奏。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斯特林堡这部鞭挞时局，描写瑞典充满尔虞我诈的 70 年代的现实小说就分外受到舆论的重视和关注。

斯特林堡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描写是充满讽刺性的，不少地方甚至过分夸张，但是仍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惟利是图的欺诈腐败已成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风尚，追逐利润、投机取巧不仅在商业领

域到处盛行,而且也扩展到新闻、出版、宗教和慈善事业,尸位素餐和墨守成规则充斥于政府机关和议会。小说中对各个典型机构的讽刺性描写栩栩如生，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因为它们来源于现实，瑞典人只消稍为回味一下，就能悟出这些被讽刺的机构所为何指,例如对‘特利登保险公司’和‘薪俸发放处’都写得十分挖苦和夸张，却又十分有趣，因为前者指的是当时瑞典名气最大的尼普顿保险公司，而后者干脆指的是瑞典政府的财政部。小说的精彩之处还在于所讽刺的情节并非仅仅是空穴来风或是街谈巷议，而是都有事实为依据的，而且还以内行的专业知识点出了不易被一般人所察觉的要害之处。这是因为作者本人不仅曾经在保险业里工作过,还在《瑞典保险事业报》里当过编辑,因而熟知这个行业中的许许多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隐蔽而暧昧的赚钱“猫腻”。保险业是当时新兴的、生财容易的投机生意。在发生危机时往往有政府财政部撑腰，甚至动用公款来赔偿，因而保险公司有恃无恐，敢于从事种种非法勾当，尤其是在当时移民热潮中让不能用的船只出海沉没而赚取保险赔偿。尼普顿保险公司投机失败，触发了 1878 年经济大衰退，其来势凶猛，以致成千上万家企业倒闭，受到牵连而破产的民众不计其数，斯特林堡也因此将贵族妻子带来的财产丧失殆尽，因而他是带着破产的愤怒来揭露这种丑恶的罪行的。正因为具有这样鲜明的批判社会、揭露丑恶的现实主义特点，这部小说才能引起广泛而又强烈的共鸣，从而成为瑞典文学中的开创性的作品，就连小说中描写的用被单包着东西去当铺时半道上被警察抓住以及把金表送进当铺来换顿饱餐等细节也是真实的，这是斯特林堡和他的伙伴们经常用来解决经济困难的真实写照。

这部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也很有特点，它有明显的狄更斯的文风,因为斯特林堡是以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为范本的,描写伯恩斯饭店红房间里的文人聚餐痛饮就和匹克威克俱乐部聚会的高谈阔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中主人公法尔克身上着墨并不算

多，而对其他的文人落笔描写之处也不算少，因而可以说小说的主角是带有一定群体性质的。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和剧本《奥洛夫老师》颇为相似。理想主义者法克尔和宗教改革家奥洛夫老师一样富有正义感，并且热情充沛，然而却受旧势力制约，在反抗和软弱之间动摇不定，而感情和性格上的缺陷最后终于导致他放弃反抗屈服投降，而这两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恰恰都是斯特林堡本人最好的写照，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感情，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衣服脱得精光。小说中的另一个角色欧勒·蒙塔努斯，这个曾干体力劳动，后来当了雕刻家的身强力壮的知识分子显然就是《奥洛夫老师》里的圣书印刷者格特的化身。作为一个激进派他矢志要推翻这个社会，却又力不从心，最后不得不自杀以死明志。正是这个人物使得统治阶级不寒而栗，批评家们说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某种粗野而令人害怕的气质，这大概指的是他们看到了巴黎公社社员虽然失败但不屈服的形象，以及他的自杀所代表的那种在一个虚伪的社会中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所造成的被压迫感，而这种被压迫感迟早是会抒发出来的。小说中大多数次要人物，如出版商和牧师的形象都纯属漫画式的，与其说他们是生活中的人物，还不如说是人物的典型，对他们并没有多少细致的刻画。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手工匠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从语言到行动都过分夸张，脸谱化了，这大概是小说中最不成功的人物描写，也是第一次尝试难以避免的。

这部小说在写作风格上是瑞典第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尤其是运用了印象主义的技巧来描写斯德哥尔摩的风光景物。小说的第一章一开始就描写了主人公法尔克从南城的小公园俯视斯德哥尔摩全城，他脚底下的那座城市既有远大辽阔而朦胧迷茫的景色，又有四周引人注目的细节，如正在枯萎的雪莲花、用含苞欲放的菩提树的蓓蕾的绒毛来筑巢的鸟雀，还有去年在这里打架的狗儿留下的狗毛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田园诗般的风景画。这一段

风景描写得如此脍炙人口，以至于当时不少爱好斯特林堡的读者都能随口吟诵。当时已经名满欧洲的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在他的名著《巴黎圣母院》中也有一段描写从教堂钟楼上眺望晚霞中的巴黎。两者一比较，就不难发现后者虽然文字也很优美，但是景物略显呆涩，不太活泼。在这里斯特林堡运用了印象主义的表现技巧，捕捉住了转瞬即逝的感觉印象，将观察到的景物细节在光影组合中凸现出来，这种未经作家以自身的知识来对即刻的视觉经验进行任何加工，而仅仅记录观察景物是所经验到的直接感性印象在当时还是第一次尝试，给予瑞典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斯特林堡的小说和他的戏剧一样都是在受到丹麦的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思想的感召而写作的，因而勃朗兑斯的文学必须不脱离社会现实，文学必须干预社会现实的主张清晰地体现在斯特林堡的小说和戏剧之中，尤其是早期的作品中，因而他的小说几乎都有鲜明的批判社会的特性，并且带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讽刺笔调。不少作品中不仅流露出疾恶如仇的语气，甚至过分偏激和尖刻，但是却给他的写作风格增添了一种奇特的力量,人们通常把这种风格称之为‘斯特林堡文风”,后来一些瑞典作家还孜孜模仿，但是迄今尚没有一个瑞典作家在反映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方面的技巧能够超过斯特林堡的，说斯特林堡开创了瑞典小说并非言过其实，他是当之无愧的。

斯特林堡的小说题材是多方面的，但大多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多少有一定关系，他的六十余部作品大致可分为这几类：批判社会和揭露现实的、自传体的、以超人为题材的、历史题材的作品等等。批判社会的作品以长篇小说《红房间》为代表作，其他还有小说《新国家》（1882）,这部小说也是一部讽刺作品,其副标题是《对谋杀和宴饮时代的讽刺性描写》，斯特林堡以犀利明快的文笔抓住了所描写的时代特征加以讽刺，如称赞了 1865 年进行的瑞典议会改革，并且声称这场改革引起了人民的新希望，但是到了最后却发

现原来他们只是在过幻想的日子。小说中一些人物在教堂布道和宴会上所发表的冠冕堂皇的讲话其实只是公开的欺骗而已，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读者一看就明白讽刺对象是当时执政掌权的大人物,而对这些特定人物的嘲讽切中要害,骂得解气,无怪乎瑞典文艺理论家马丁·拉姆将这部小说称为"瑞典最卓越的讽刺作品"。自传体小说最主要的作品是四卷本长篇小说《女佣之子》（1886—1887)，这部小说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通过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来抨击社会的欺诈和压迫。《结婚集》(两卷本，1883—1886）和《一个狂人的辩白》（1888）,从性质上来说也是属于自传体的。斯特林堡在这两部书中既对自己的婚姻作了忏悔，又为自己苦苦追求已婚的贵族小姐,最后终于结成了这桩不幸的婚姻的行为进行辩解,书中也对妻子梦想成为演员发泄不满,尤其在《结婚集》第二卷中对妇女的变态心理和仇恨更是暴露无遗，书中不但要求妇女只当贤妻良母，甚至还把妇女描写成在婚姻中利用男人易受迷惑的弱点来谋取不义之财、依赖男人生活的寄生虫。斯特林堡在其他问题上都是激进的,而在妇女问题上却落后于时代,并且以偏概全,把少部分无所事事的上层妇女看成是整个社会的妇女问题，因而顽冥不化地反对妇女解放,以至于当时的"国际妇女联盟"也因此对他进行了抨击。

在历史题材的小说中有短篇小说集《瑞典的经历和冒险》（1882—1883）。这部小说集包括了中世纪和 16 世纪的瑞典故事，因而可以看成是斯特林堡对瑞典文化历史研究的成果，或者看成是风俗文化历史书。但是斯特林堡的历史题材小说与以往的编年史体裁的历史故事大为不同,它并不是单纯地再现历史,而是以古喻今，借历史题材来讽刺抨击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小说集中的第一篇《栽培果树》写的是容克地主和执法吏的种种可笑表现,但是实际上却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主题思想：弱者注定要灭亡的生存竞争的达尔文主义。小说集中的《更高的目标》和《保护人》两篇写

的是中世纪的行会和独身主义等现象，而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社会中的道德标准和强迫手段的。另一篇《波尔和佩尔》写的是 16 世纪市民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但 16 世纪并不存在这类矛盾，而这类矛盾恰恰发生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瑞典社会之中，因而无论情节、人物刻画和环境描写往往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细节，甚至对话也没有古语那种深奥的特征，而这样恰恰就使得斯特林堡的历史题材小说显得格外清新和质朴，没有什么刻意斧凿的痕迹。这类作品还有多卷本《瑞典人民》(1881),这是一部抨击瑞典官方的历史、只描写皇族和文武官员的文化史实著作。

描写超人的小说也被称为“礁石屿丛书”,因为书中所写的环境都是斯德哥尔摩周围海边的礁石岛屿群，其中享有盛誉的有中篇小说《海姆瑟岛上的居民》(1887)、短篇小说集《斯德哥尔摩礁石屿上的生活》(1887)和长篇小说《在遥远的海岛上》(1890)等。《海姆瑟岛上的居民》写的是贫苦渔民卡尔松为摆脱困境和使晚年生活有保障而想娶较为富裕的寡妇罗苔尔，但是他却渴望得到另一个女人。最后他失去了到手的一切东西和物质上的好处。《在遥远的海岛上》写的是岛上的渔民和农夫落后愚昧，新上任的渔业管理官员决意兴利除弊革新一番，却四面受敌，最后这个神经脆弱而又过于自负的知识分子陷入日益遭受仇视的困境，终于自取其咎。如果说斯特林堡在“礁石屿丛书”的前几部中还是从典型的达尔文主义出发，在人物行动中贯穿了生存竞争的原则，那么后来的《在遥远的海岛上》则走得更远，明显地流露出了反民主的倾向：岛上的居民都是道德低下、无知混沌的“群氓”,因而需要有个“超人”来奴役驱使他们，但是那个渔业管理官员在心理上和体魄上还不够健壮，不足以担此重任，终于招致灭亡。这是斯特林堡在接受尼采哲学之后，积极宣扬尼采的世界需要由“超人”管理和轻视“小人物”的理论。只有在《斯德哥尔摩礁石屿上的生活》中还保留着斯特林堡早年所接受并为之呼号战斗的卢梭主义的天赋人权和主权

在民的自由平等思想，不过也已经退色淡漠，但是其中一些对劳动人民抱有同情心的短篇小说,如《裁缝家举行舞会》、《监护人》等，仍是以其清新简朴的笔调而大受当时民众的欢迎。在这几部小说中充分显示了斯特林堡描写大自然的卓越才能，他运用自然主义表现技巧，对自然景色和岛屿居民作了笔触清新、线条鲜明的描写，并且把叙述情节和描写风光顺乎自然地融为一体，而不是生硬地结合，虽然有个别地方略嫌冗繁，如罗列出一长串鸟类、鱼类和捕鱼工具的名字，以及对各种岩礁和动植物的细节描写等。斯特林堡晚年还创作了两部讽刺性小说《黑旗》（1907）和《蓝皮书》(四卷，1908）影射瑞典的文学界和宗教界，但并不十分出色。

斯特林堡作为欧洲表现主义的先驱人物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上也别具一格，不落窠臼，无论在小说的构思或是布局上都饶有新意。他的小说不注重描写外在客观事物和人物的行为，而是着重揭示其内在的灵魂，主人公本身的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主人公揭示人们头脑中的意识。这种当时并不多见的创新手法后来在欧洲文艺作品中使用得很广泛，构成了西方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即‘意识流小说”。斯特林堡的小说在语言上也很有特色，没有晦涩深奥的寓意和隐喻的笔法，也没有花哨华丽的辞藻堆砌，或是冗长的句子，而是运用简朴明了、清新明快甚至是口语式的句子来作客观自然的叙述，因而往往短小精悍，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如微型小说《半张纸》仅用了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篇幅，以两分钟的时间、一个人物和墙上残存的半张纸写出了一段人生经历，揭示了令人嗟叹的人生哲理。又如微型小说《失去本性的朱巴尔》也是用同样的篇幅写出了父子两代人的不同境遇，阐明了富贵荣华如过眼烟云的人生真谛。

以《琼斯皇帝》（1920）和《毛猿》（1921）等经典名剧而著称于世的美国著名戏剧家、表现主义大师尤金·奥尼尔在 1936 年接受诺

贝尔文学奖时,致词称赞斯特林堡是‘现代所有戏剧家中最伟大的天才”然而斯特林堡生前却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是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对于斯特林堡这样深深刺痛瑞典社会的作家,瑞典学院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给奖金的,何况还有一层莫大的忌讳 诺贝尔本人曾生气地写道,斯特林堡把他说成是运送炸药的军火商,因而尽管瑞典举国上下呼声很高，甚至斯特林堡本人也以为是非他莫属了，然而瑞典学院仍按照其一贯的做法将这样一个作家排除在得奖名单之外,而从 90 年代新浪漫主义派中物色人选。 1909 年秋,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瑞典女作家,《骑鹅历险记》(1907)的作者塞尔玛 ·拉格洛夫(1858—1940),这就意味着斯特林堡在这一生中永远失去了获奖的机会。在斯特林堡 1912 年去世之后,瑞典学院即把 1916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在大论战中一直是斯特林堡对立面的、高唱爱国主义诗歌的诗人海顿斯坦(1859—1940)。海顿斯坦被誉为具有斯特林堡的一切才华，而没有斯特林堡的任何缺点的天才。拉格洛夫和海顿斯坦这两位瑞典 90 年代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先后当上了瑞典文学院院士。无独有偶的是,另一位以戏剧著称于世的北欧文学家,挪威的易卜生也落得了和斯特林堡同样的遭遇，也被诺贝尔文学奖拒之门外。据说他和斯特林堡一样都曾是获奖的候选人，但是最终还是被从名单上划掉了。1903 年瑞典学院把奖金授予了另一位挪威作家比昂松,这就意味着易卜生再也无缘问鼎这一奖项了，而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因为触犯了挪威社会当时固有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宗教,如妇女解放等问题。但无论是斯特林堡还是易卜生,他们没有得奖丝毫影响不了他们的文学成果和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只能暴露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公允的实质。

1909 年斯特林堡六十寿辰当晚，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破例出席了话剧院举行的斯特林堡的剧本《最后一个骑士》的首场公

演。斯特林堡事先得到了通知，却不曾露面来享此殊荣。这确实是一份无上的荣誉，因为这是瑞典王室和官方对他的文学成就和贡献的承认，但是斯特林堡却并不领这份情。

在北欧国家里,出身低微、经过自我奋斗成为文学名家而受到王家重视和礼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女佣的儿子斯特林堡，另一个是丹麦的安徒生(1805—1875)，他从洗衣妇的儿子成为童话大师。与斯特林堡不同的是安徒生在成名之后经常出入王宫去为国王或王后朗诵自己的童话作品。安徒生汲汲奔走于宫廷和各种权贵之门，终于获得了“国务参事”的衔位和各种勋章。在他病重之时，王储还亲自到他寓所去问候，而安徒生对这一切是受宠若惊的。他将自己比成一只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并且再三声称“如果我做了点什么好的，荣耀完全归于上帝”。他把自己达到的成就完全看成是上帝的恩赐，因而在他的作品中翻来覆去地絮叨上帝的仁慈，颂扬上帝的万能，甚至有不少虔诚的长篇说教，并且在他的作品中不乏媚悦流俗讨好权贵之处。正因为如此，丹麦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曾三次不留情面地对他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批评，拿安徒生自己的话来说勃朗兑斯虽然是他的好友，但这时却像狼一样凶狠地扑了上来。斯特林堡尽管有这样那样令人几乎无法容忍的缺点，但是勃朗兑斯总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是因为斯特林堡具有狷傲而刚强的骨气，没有丝毫的媚态俗气。对生长在那个时代的安徒生固然不宜也不必过于苛求，然而斯特林堡的耿直之气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维克多利亚·玛利亚·贝内迪克松(1850—1888)是位女作家，笔名恩斯特·阿尔格伦。出身于南部斯考耐的一个农民家庭。她嫁给了比她大近三十岁的邮政局长，由于婚姻的不幸，她一直生活在矛盾中，既想摆脱家庭，又想走上社会，成为公众人物。在折磨和痛苦中，她走上了创作的道路。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来自斯考耐》(1884),描写了家乡普通人的生活,充满同情和幽默。第

一部长篇小说《钱》(1885)是写女主人公塞尔玛从少女到结婚的一段经历，着重描写婚姻的不和谐、金钱的压力和妇女缺乏个人发展的机遇。这部作品实际上是她自身经历的写照。第二部长篇小说《玛利安夫人》发表于 1887 年,写的是一个从小娇生惯养、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姑娘同农民结婚后成为一个劳动妇女的故事。

80 年代的时候，贝内迪克松遇到丹麦著名文艺评论家格奥尔格·勃朗兑斯，并深深地爱上了他。勃朗兑斯对她的第二部小说《玛利安夫人》反应冷淡，甚至在一篇公开的评论文章中称这只是一部多愁善感的“妇女小说”而已，同时她发现勃朗兑斯对她的情感也是转瞬即逝。在事业得不到支持，爱情又遭到失败的双重失望中,她于 1888 年在哥本哈根的旅馆里自杀了。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没有什么巨著，但是她对农村生活朴素而真实的描述以及对人物心理细腻而深入的描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文学评论家们认为,由她的朋友、传记作家阿克塞尔·隆德高德(1861—1930)所发表的她遗留下来的那些书信和日记是 80 年代很有价值的心理学资料。

古斯塔夫·阿·耶伊尔斯塔姆(1858—1909)出身于矿主家庭，曾在乌普萨拉大学就读,毕业后先后在《晚报》、《每日新闻》和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他深受挪威易卜生、丹麦勃朗兑斯和斯特林堡的影响,是 80 年代‘青年瑞典派’作家当中的主要人物。他以短篇小说集《阴冷》(1882)描写生活中的阴冷和凄凉开始,逐渐转向对生活黑暗面的揭露,如故事集《穷苦百姓》(1884—1889)等。晚年还发表了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我的孩子们》(1896)等。

六

几位重要的新浪漫主义派作家：

塞尔玛·拉格洛夫(1858—1940)是瑞典 19 世纪末出现的新浪漫派主义文学的代表。她一生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回

忆录和童话故事。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在瑞典以及在北欧其他国家放映。她的作品也成为画家们创作的源泉。她的代表作《骑鹅历险记》于 1906 年至 1907 年分上下两册出版，至 1940 年她去世，总共发行了三百五十万册。此后，每隔几年总要再版一次，是瑞典文学作品中发行量最大的作品之一。这本书迄今已被译成五十余种文字，也是世界上被译成多种文字的一部瑞典作品。这部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瑞典最近几代人中，上至国王、首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每一个人从小都阅读过这本书，在这个故事的潜移默化之下长大。她在瑞典享有崇高的威望，在瑞典发行的纸币中就有她的头像，正面是她的头像，反面是她的代表作《骑鹅历险记》，可见她在瑞典的崇高威望。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瑞典作家。她于 190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4 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挪威、芬兰、比利时和法国还把本国最高荣誉的勋章授予她。

塞尔玛·拉格洛夫于 1858 年 11 月 20 日出生在瑞典西部韦尔姆兰省的莫尔巴卡庄园。韦尔姆兰省是一个风景秀丽、充满传说故事的地方。她在那里度过了童年、青年和晚年。韦尔姆兰民间传说和故事极大地影响了拉格洛夫的创作生涯，正如她有一次自己所说的那样：“莫尔巴卡庄园有着古老的传统和丰富的传说，在那里居住的人温柔而又友爱，如果我不是在这样的庄园里成长的话，我是决计成不了一个作家的。”

她的父亲是一位陆军中尉，结婚后一直居住在莫尔巴卡庄园，从事农业劳动。他性格开朗，心地善良。他在两方面对拉格洛夫的文学生涯产生很大影响，第一，他能弹奏又善歌唱，最主要的是他十分喜爱文学，在劳动之余一家人常常围坐在一起朗读诗歌和小说；第二，他熟悉和热爱韦尔姆兰家乡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在她的作品中，尤其是描写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作品中，父亲往往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她在世时，每年父亲生日，8 月 17 日，她总是

要邀请庄园里和附近的乡亲们来庄园聚会庆祝。她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的受奖演说中，通过同在天国父亲的对话来表达自己获奖后的激动心情和对父亲的感激之情。

除了父亲以外，祖母和姑妈对拉格洛夫的成长也有很大影响。她们两人心中装着讲不完的韦尔姆兰民间传说和故事，尤其是她的祖母,讲起故事来语调感人,表情丰富,孩子们喜欢围着她,听她讲故事。拉格洛夫出生后不久左脚不幸成了残废，三岁半时，两脚完全麻痹不能行动，从此以后她总是坐在椅子上听祖母、姑妈和其他许多人讲传说和故事。七岁以后开始大量阅读。她的麻痹的双腿经过多次治疗后能像健康人一样行走，但是走起路来脚仍然有一点瘸。

1881 年,拉格洛夫不顾父母反对,在设法筹借到一笔钱后,就只身一人前往斯德哥尔摩求学，次年考入高等女子师范学院。1885 年毕业后，到南部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教学之余伏案刻苦写作。

1891 年,第一部作品《古斯泰·贝林的故事》出版,这是一部以古斯泰·贝林牧师为中心,记述 19 世纪 20 年代寄居在乡间地主庄园里的一群食客的故事。但是这部作品在瑞典国内起初没有受到重视，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是一部“失败之作”。拉格洛夫没有气馁，继续创作，开始写短篇小说，但是处女作的失败毕竟使她受到打击,在写作中,她常常感到疲惫和缺乏勇气。

1893 年 1 月，世界著名的丹麦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朗兑斯在哥本哈根的《政治》报上发表了赞扬《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的评论文章，这不仅使这部作品在丹麦受到欢迎，而且也改变了瑞典国内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以及对拉格洛夫本人的态度。当她的短篇小说集《无形的锁链》在 1894 年出版时一下子卖出了三千五百册，这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瑞典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拉格洛夫的创作热情，她辞掉教员的工作，走上了专心从事写作

的职业作家的道路。

1895 年至 1896 年拉格洛夫同好友苏菲·埃尔康一起到意大利旅行,一年以后发表了长篇小说《假基督的奇迹》(1897),这是一部以意大利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是她惟一的一部不以瑞典和瑞典传统为背景的作品。

1904 年夏天，她开始跋山涉水到瑞典各地考察，为瑞典小学教师协会负责人达林建议她写的一本新的小学教科书收集资料。1906 年至 1907 年这本新的教科书问世了,书名叫做《尼尔斯·豪格尔森周游瑞典的奇妙旅行》,中文译成《骑鹅历险记》,它成了一部世界名著,使她赢得了与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齐名的声誉,她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声望也不断提高。这部作品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她用奖金把童年时代居住过的、19 世纪 80 年代因家道中落而卖掉的莫尔巴卡庄园又买了回来。从 1915 年起到她去世,她一直居住在这座庄园里,跟她父亲一样,一面经营庄园,一面积极创作。

1940 年 2 月，八十二岁的拉格洛夫计划为她的好友苏菲·埃尔康写一本传记小说,可惜只写了两章,她自己不幸于 3 月 8 日患脑溢血,3 月 16 日清晨去世。这位在瑞典享有崇高地位和声誉的女作家一生没有结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文学事业,她逝世时正值芬兰冬战爆发,德国法西斯攻占丹麦和挪威,对她的悼念很快被隆隆的炮声所淹没。

塞尔玛·拉格洛夫的代表作是《骑鹅历险记》,故事描写一个名叫尼尔斯的十四岁的小男孩,家住瑞典南部,父母都是善良、勤劳却十分贫困的农民。他不爱读书学习，调皮捣蛋，好作弄小动物。一个初春,尼尔斯的父母上教堂去了,他在家里因为作弄一个小精灵而被精灵用妖法变成一个拇指一般大的小人儿。正在这时，一群大雁从空中飞过,家中一只雄鹅也想展翅跟随大雁飞行,尼尔斯为了不让雄鹅飞走，紧紧抱住鹅的脖子，不料却被雄鹅带上高空。

从此,他骑在鹅背上,跟随大雁走南闯北,周游各地,从南方一直飞到最北部的拉普兰省，历时八个月才返回家乡。他骑在鹅背上看到了祖国的奇峰异川、旖旎风光，学习了祖国的地理历史，听了许多故事传说，也饱尝了不少风险和苦难。在漫游中，他从旅伴和其他动物身上学到了不少优点，逐渐改正了自己淘气调皮的缺点，培养了勇于舍己、助人为乐的优秀品德。当他重返家乡时，他不仅重新变成了一个高大漂亮的男孩子，而且成了一个温柔、善良、乐于助人、勤劳勇敢的好孩子。

她在《骑鹅历险记》第四十九章《一座小庄园》里写道 她要" 写一本关于瑞典的、适合孩子们在学校阅读的书……一 本有教益、严肃认真和没有一句假话的书 ”。她想通过这本书和这个故事来启发少年儿童从小培养良好的品德，要有刻苦学习知识的渴求，向别人学习，克服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因而这部作品是很富有教育意义的，它使少年儿童的心灵变得更纯洁、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与此同时，少年儿童读者从尼尔斯的漫游中也饱览了瑞典的锦绣河山，学习了它的地理历史知识和文化传统，也熟悉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动物和植物，从而增进了对祖国的热爱，也就是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从拉格洛夫的作品可以看出她有以下几个创作特色：

1. 幻想同真实交织在一起，把现实幻想化而又不完全离开现实,把自然浪漫化而又不完全脱离自然的本质,如《骑鹅历险记》中淘气调皮的小男孩是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但是把他变成拇指大的小人儿却是作者以丰富的幻想创造出来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庄园的故事》(1899)在描写人的感情时，也是经常把幻想和真实交织在一起。

2. 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作者把瑞典南部一块种着不同庄稼的斯康耐大平原比喻成一块大方格子布；把瑞典南部第二大岛厄兰岛比喻为翅膀被暴风雨撕得粉碎而坠入大海的大蝴蝶等等。

3. 作品中穿插大量独立成篇的童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如《斯莫兰的传说》、《美丽的花园》、《乌普兰的故事》等等。在她的第一部作品《古斯泰·贝林的故事》(1891) 中,在记述 19 世纪 20 年代寄居在乡间地主庄园上的一群食客的故事的同时,巧妙地穿插了许多颂善驱恶、颂扬忠贞爱情的民间传说,浪漫色彩极为浓厚。

4. 前呼后应的情节同独立成章的故事相结合:《骑鹅历险记》全书以尼尔斯从人变成拇指大的小人儿,又从小人儿重又变成人为主线,在这个故事中间穿插了许多独立成篇的故事、童话和传说,使得各章既自成一体,又互相连贯。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泰·贝林的故事》也是运用这一手法。

拉格洛夫的创作主题:

1. 爱国爱家是拉格洛夫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综观她的作品,除了一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假基督的奇迹》以外,其余作品都是以自己的祖国瑞典、家乡韦姆兰省,甚至自己的庄园为背景的,正如她在《骑鹅历险记》第四十九章《一座小庄园》中所说的那样":这么多年来,她无论走到哪里,都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她诚然看到其他地方比那里更美也更好,但是她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她在童年时期的故乡所感受到的那种安谧和欢悦。"

2. 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是拉格洛夫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假基督的奇迹》(1897)描写社会主义运动和基督教的冲突;《耶路撒冷》(Jerusalem,1—2,1901—1902)描述宗教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破坏和信徒们迁居到耶路撒冷后由于不习惯那里的气候和耕作条件所遭受的苦难;《骑鹅历险记》中有对鼠疫等社会问题的描述。拉格洛夫在作品中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描述和反映不是'揭露'、'憎恶',而是从唯美主义出发,以'温馨'、'友爱'淡化现实社会中的"悲哀和不幸";对一个本来能使人涕泪交流的辛酸事件,她采用传说和童话手法来描写,使它变成了一个美丽而富有神奇色彩的传奇故事。有的人评论说,如果在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时使人感到

是‘严寒的冬天’的话,那么在阅读拉格洛夫的作品时使人感到的是‘温暖的春天”。这也许为什么是拉格洛夫,而不是斯特林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吧。

拉格洛夫是继斯特林堡之后最早被介绍到我国来的瑞典作家。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她的《圣诞节的客人》和《罗本舅舅》由我国著名作家茅盾翻译成中文。她的《一个庄园的故事》由刘大杰先生于 1933 年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1958 年拉格洛夫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国文艺界给予很大重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报纸和文艺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北京还隆重集会,茅盾和萧三等著名作家在会上讲了话,纪念这位杰出的瑞典女作家。

她的代表作《骑鹅历险记》在我国最早于 1955 年由吴冷西先生翻译了部分内容,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于次年(1956)还翻译出版了原苏联作家改写的《骑鹅历险记》。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我国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的全集,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我国还在出版这部作品。这部名著至今在我国从南方的桂林到东北的沈阳,从东部的上海、南京到北京共有各种节译本、全译本和编译本七八种之多。

魏尔纳·封·海顿斯坦(1859—1940)是 19 世纪 90 年代瑞典新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瑞典文学史家称他为‘瑞典文学新时代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瑞典南部维特恩湖以北的奥尔斯哈马尔的一个贵族家庭。1876 年,海顿斯坦因病中断学业,前往意大利、希腊、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养病游历,十年后,他把这段游历印象写成诗歌，热情赞扬东方文明。他酷爱绘画，一心想当画家,并于 1879 年到意大利、罗马学习绘画。1880 年,他因父亲反对他成为艺术家而同父亲闹翻,带着妻子又一次离开瑞典,到欧洲大陆居住。1884 年至 1887 年他在瑞士居住期间，认识了当时也侨居在瑞士的斯特林堡，两人频繁的交往对海顿斯坦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1887 年他返回瑞典攻读文学,第二年,诗

集《朝圣与漂流的年代》(1888)发表,因其迥然不同于在文坛上流行的自然主义风格而引起广泛注意。

1889 年,海顿斯坦发表了以《文艺复兴》为题的小册子,向自然主义文学发起挑战。他宣称,自然主义已经过时,并把它讥讽为“鞋匠的写实主义”和“灰色气氛”。他还指出,文学作品应该有情感、幻想、美感、个性和生活情趣;他唾弃传统的美学思想,提倡诗歌应该像印象派的绘画那样富有光亮和色彩。他的这本小册子成为瑞典写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分界线。

继第一部诗集后,海顿斯坦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根据希腊神话写成的《恩底弥翁》(1889),另一部是描写一个为寻求“生命灵感”而到处旅行的人的《汉斯·阿里埃诺斯》(1892)。1902 年诗集《人民集》发表,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诗为《瑞典》,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思念家乡的强烈感情:

雪橇铃儿丁当响,
篝火把斧钺金戈映亮。
军旅的业绩必定载入传奇,
然而依靠的终究是,
手拉紧手,万众一心,
你的儿女一如既往,
吼出愿为祖国牺牲的誓言。

1897 年至 1898 年,海顿斯坦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卡尔十二世麾下的军队》,这部小说集写的是卡尔十二世时期的瑞典士兵,目的是通过对英勇士兵的歌颂来激励瑞典人民的爱国热情。长篇小说《圣比尔吉塔朝圣旅行记》(1901)是一部描写中世纪宗教活动家圣比尔吉塔献身宗教事业的历史小说。《福尔孔世家》(1905—1907)描写福尔孔家的老祖宗从一袋金银开始发家,最后

当上瑞典国王的发家史。《新诗集》(1915)是海顿斯坦最后一部诗集,诗风由早期的华丽、高贵转为简洁、宁静。

海顿斯坦 1912 年被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16 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著作涉及的领域很广,有诗歌、散文、政论和长、短篇小说,但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还是在抒情诗方面。

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1864—1931)是瑞典文坛上重要的抒情诗人,90 年代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瑞典达拉那省南部的托夫曼庄园,祖辈均是农民。他在中学时代即展露才华,19 岁时就发表了一些很优美的诗作。1885 年,他赴乌普萨拉大学求学。正当前途似锦的时候,父亲由于经济亏空不得不把庄园拍卖掉。这使得他在大学期间生活十分拮据,但他意志坚强,虽几度辍学,但终于在十几年后取得了两个学位。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不屈不挠地对付逆境,孜孜不倦地写作。

1895 年,他的抒情诗集《荒原和爱情之歌》发表,引起瑞典诗坛轰动。诗集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创作风格朴素严谨。这部作品的发表奠定了他成为瑞典一代伟大诗人的基础。

1898 年,他的第二部诗集《弗里多林之歌》发表。三年后,又一部以弗里多林为主人公的诗集《弗里多林的乐园》(1901)问世。弗里多林和诗人本人一样是达拉那人,受过良好教育,学识渊博,身强力壮,善于劳动,性格豁达,能同周围的农民打成一片,能歌善舞,会唱山歌,又能吟哦优美的诗歌,既文雅又粗犷。总之,这是一个寄托着诗人理想和追求的农民形象。这些诗歌的发表为他赢得空前盛名,受到瑞典各阶层的喜爱。卡尔费尔德于 1904 年被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16 年获瑞典文学大奖。

在两部关于弗里多林的诗集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许多享有盛誉的诗集,如《弗洛拉和波玛拉》(1906)、《弗洛拉和贝洛娜》(1918)和《秋日的号角》(1927)等。

卡尔费尔德的诗绮丽多姿,轻松明快。他用诗的语言来描景

叙情，勾勒出一幅幅色彩夺目的风景画或是风俗画。他的诗大多是描绘大自然的瑰丽景色、农村的田园牧歌生活以及青年男女的爱恋倾慕，诗中蕴含着强烈的热爱人生的情愫。他的诗作宗教色彩浓厚,但是他笔下的使徒们不是苦修殉道的圣贤,而是爱好说笑戏谑、纵情欢乐甚至贪杯如命的活生生的凡人。

卡尔费尔德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同时,在他的诗作中也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如诗集《弗洛拉和贝.洛娜》中的《黑色的圣诞节》以及《秋日的号角》中的《鼠疫的讴歌》等,这些诗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1931 年,卡尔费尔德在斯德哥尔摩去世后,瑞典学院追授他诺贝尔文学奖。

古斯塔夫·弗勒丁(1860—1911)出身于瑞典南部卡尔斯塔德市一个破产的矿业主家庭,母亲是个主教的女儿,很有才华,他的诗歌天赋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得来的,但是他的父母有精神病,把这种病也遗传给了他。他从家乡毕业后于 1880 年考入乌普萨拉大学，因病没有取得文凭。1885 年离校休养。1887 年为《卡尔斯塔德报》写稿,不久成为该报的编辑。1889 年,他的精神病发作，到德国去疗养,在那里大量阅读了德国、英国诗人的作品。自己也写了一些诗,这些诗于 1891 年结集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吉他和手风琴》。诗集受到好评使他对生活充满勇气和自信。他又返回编辑部工作,在此后的三年中,他又努力创作,以《新诗》为题于 1894年发表。在这两部诗集中,有对弱者和不幸的人表示同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有对韦姆兰人民生活的描写，风趣而幽默,给人以愉快和美好的印象。晚期诗作有《点点滴滴》(1896)、《新的和旧的》(1897)和《来自格拉尔的点滴事》等。除了同早期作品中一样有对弱者和不幸的人的同情外，后期作品多了一种幻和梦境。

弗勒丁与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海顿斯坦、拉格洛夫和卡尔费

尔德等人不同的是他没有获得瑞典学院院士称号，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虽于 1892 年曾经得过瑞典学院的一笔奖金，但他把这笔奖金捐赠给了争取普选权运动了。但是弗勒丁创新了瑞典诗歌,他特别注重韵律,追求完美的音节,忽视句法规则,这些因素都是在后来 20 世纪现代主义诗歌中能见到的，因此有的评论家称他“在瑞典语诗歌领域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也有的评论家称他是‘现代主义之前的现代主义者’。

第四节　戏剧大师易卜生
“心理文学”创始人哈姆生

一

挪威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赢得内政自治之后又致力于争取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力。1891 年左翼党赢得胜利，竞选纲领就有设立挪威自己的外交机构的要求。大选后，挪威左翼党政府并没有立即提出外交权力问题，而是从一个并不起眼的程序上着手，即要求设立单独的挪威领事馆。这一要求遭到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否决。经过四年谈判，挪威仍不放弃这一要求，1895 年瑞典在无奈的情况下，以出兵相威胁。当时挪威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就绪，因而不得不退缩妥协。到了 1898 年挪威旧事重提要求修改有关规定，并擅自取消了挪威商船旗上瑞典的国徽标志。瑞典又拒绝单独设领事馆，双方谈判破裂。挪威已经准备充分，并且在边境上堡垒林立,终于在 1905 年挪威单方面宣布挪瑞联盟解体。瑞典自知开战无必胜的把握，只得同意在挪威拆掉边界堡垒的前提下可以退出联盟。至此挪威赢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

挪威之所以敢于向瑞典提出要求，直至公开闹翻，是因为举国上下争取独立的民族情绪不断高涨，经济日趋强劲。从 1900 年起挪威工业飞速增长，这是由于挪威充足的水力得到了开采和利用。

来自瑞典、法国等地的外国资本投资兴建的水电站陆续投产，既解决了电力供应，又带来可观的利润。以电解化工为主的挪威水力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企业。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劳工问题，1887 年挪威工人党成立，1898 年争取到了普选权(妇女普选权直到 1907 年和 1913 年的改革中才得以实现)。应该说，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是挪威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主要是木材业、制造业、水电和电解化工业，造船业和渔业也有很大发展，并且建立起了一支相当庞大的商船队（这支商船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了一半以上，使得挪威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经济发展受阻，停滞不前)。城市急剧扩大，城市总人口从 1801 年的八十八万猛增至 1900 年的二百二十四万。然而挪威毕竟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结构也非常不合理，农业始终处于落后分散的状态，产量低下。粮食是个困扰不已而难于解决的大问题。由于饥馑和农村的贫困，从 1840 年至 1914 年挪威向北美移民达七十五万人。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进程也进一步拉开了贫富悬殊和城乡差别。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丹麦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和“现代突破”文学运动在挪威的传播不啻是一声春雷送来了及时雨，因而受到了挪威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热烈响应，因为这一潮流正好反映了挪威要求更大变革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不满现状的广大中下层人民的要求和呼声。现实主义文学便以‘过问人生干预社会’的‘问题文学’的面貌出现，使挪威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从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起挪威文学的繁荣除了同时期的俄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而易卜生、比昂松的戏剧正是挪威文学繁荣时期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易卜生、比昂松创作的戏剧使挪威文学第一次登堂入室走进了世界文坛的前列，不但当时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并且流传至今。

19 世纪后期的挪威文学大体上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70、

80 年代挪威文学在勃朗兑斯的“现代突破”文学运动的感召之下，写实主义“问题文学”兴起。属于这一潮流的有：戏剧家易卜生和比昂松、小说家基兰德和约纳斯·李。他们四人在挪威影响巨大，并且传播到欧洲和世界文坛，被誉为“挪威文学的四杰”。第二阶段是 9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期。这段时期世界和欧洲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无产阶级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和尖锐化，各国政府当局更强化了对舆论和文化出版的检查控制。针砭时弊、触及“社会问题”的写实主义作家往往被加上“具有危险倾向”的罪名而横遭迫害,因而逃避现实、追求唯美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便乘机卷土重来，挪威在 90 年代在欧洲大陆和瑞典的影响下，也掀起了新浪漫主义潮流，其声势和成果虽然不如瑞典，但对欧洲和世界文坛的影响却超过了瑞典。瑞典新浪漫主义运动固然出了拉格洛夫、海顿斯坦和卡尔费尔德三个杰出的作家和诗人，而且都是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但是在以斯特林堡写实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瑞典却难以形成主流，况且他们各自分散并没有形成一股力量。因此，以哈姆生和金克为代表的挪威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超越了北欧，扩展到欧洲大陆。哈姆生的“心理文学”成为二十五年后才流行起来的“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因而哈姆生也享有了世界声誉。1891 年哈姆生发表了《挪威文学》、《心理文学》和《时尚文学》,指责挪威“文学四杰”笔下的人物性格典型化、言语行动都按照既定模式展开，缺乏个性和情感，因而只是一群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握、言行举止都受到社会或外部力量支配的可怜虫，而作家不应热衷于描述平凡庸碌之辈的日常琐事和生活中的情绪冲动。哈姆生提出“心理文学”才能将现代人的理智和思维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演绎出来，才能把当代生活的荒诞性和非理性表现清楚。哈姆生提出：这种创作手法是将物质化的外部世界延伸到探讨人的意向奥秘、无规律的官能反应和无意识的思维活动。作家应捕捉到这些现象，哪怕是最微小的灵魂

颤动，并且记录成文显示出来。哈姆生又在《思维中的无意识生命》一文中提出 ：作家要写现代人的与众不同的心理特质 ,表现他们的分裂、混乱而又极不和谐的思维 ,要把侵入他们头脑中的稀奇古怪、无法理喻的思维活动还原出来 ,而不是将笔墨浪费在日常琐事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作家捕捉客观事物和深入渗透外部事物的能力，也可表明对现代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哈姆生在长篇小说《饥饿》中就描述了在极度饥饿中所出现的种种幻觉和狂想。哈姆生按照柏格森的心理要领和弗洛伊德关于非理性、无意识的观点 ,肯定了潜意识的存在 ,并且提出文学创作应涉及对人的意识和心理的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哈姆生的从现代心理学对人的观念中派生出来的新要领和手法 ,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被爱尔兰的乔伊斯(1882—1941)、法国的普鲁斯特(1871—1922)、英国的卡尔夫(1882—1941)和美国的福克纳(1887—1962)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

二

挪威文学四杰：

亨里克 ·易卜生(1828—1906) 出身于挪威南部希恩镇一个富裕商人家庭。不久，父亲破产，家庭经济发生剧变，易卜生只受过几年小学教育。1843 年易卜生到一家药材店当学徒，工作余暇，他刻苦自学 ,阅读研究世界文学名著。1848 年他在法国二月革命影响下，热心从事进步活动，并开始创作诗歌和剧本。他的第一个剧本《卡提利那》创作于 1848 年 ,于 1850 年出版。同年他离开药材店去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他的第一个剧本没有上演 ,但他的第二个剧本 ——独幕剧《勇士之墓》 (1850) 获得很大成功。这激发了他的戏剧创作热情，他的才华也赢得了挪威著名小提琴家欧勒 · 布尔的赏识。当布尔在卑尔根创建第一所挪威民族剧院时，邀请易卜生担任剧院的导演和编剧。可以说，易卜生是挪

威民族戏剧的创始人。在此以前，挪威没有自己的剧院和演员，挪威戏剧界一直被丹麦统治着。

1851 年至 1857 年,易卜生在卑尔根剧院积极工作,研究戏剧艺术，选择上演剧目，创作民族戏剧。这一时期的工作为他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尔豪格的宴会》(1856)和《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1857)这两部剧作都是以挪威 16 世纪历史为题材的，其中可以看到当时在挪威十分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易卜生剧作的一个主题也首次出现，那就是提出事业的重要性和“ 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无所有 ”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剧本中得到进一步发挥。此外，从这两部剧本中还能看到受丹麦和法国戏剧影响的痕迹。

1857 年易卜生应聘到新挪威剧院任经理。这个剧院的建立是为了对抗在丹麦文化支配下的剧院。易卜生为了给挪威戏剧开辟一条新道路而同资产阶级政客们展开了艰苦的斗争。

《海尔格伦的维京人》(1858)和《觊觎王位的人》(1863)也是以英雄传说和挪威历史为题材的。前者采用北欧古代萨迦传说风格，但不十分出色，整个剧本比较呆板，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比较粗糙和不够自然。相比之下，《觊觎王位的人》出色得多。这是一部描写 1250 年挪威形成统一封建国家的伟大事件的剧本，深受莎士比亚历史剧和冰岛斯诺里王室萨迦的影响。剧中的主人公是农民出身的霍克恩国王，他主张国家统一，代表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势力。剧中的斯古利伯爵和尼古拉斯主教是封建主和教会的代表，他们反对农民利益，主张维护封建割据局面，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终于以主持正义、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国王霍克恩取得胜利而告终。霍克恩国王对事业的坚定信念可以说正是易卜生自己的心情和追求的表露,因为从 1857 年到 1864 年他的处境极为艰难,为了发展民族戏剧他要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1862 年,新挪威剧院破产，易卜生在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下对社会政治和人生的看

法发生了变化。

1864年，他得到了一笔出国奖学金。此时，普奥联军两次进攻丹麦，而挪威和瑞典都不出兵支援，这使他极为失望，决定出国远行。这一走，他一直在国外侨居了二十七年，其中虽几度回挪威，但都是短暂逗留。头四年，他居住在罗马，发表了《布兰德》（1866）和《彼尔·金特》（1867）。这两部剧本具有内在联系，起着相互对照的作用。布兰德是一个有个性、有理想的人物，对不符合他思想的事和人，包括对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采取不妥协态度，他在往山顶爬的时候被雷电击死，而彼尔·金特则是一个轻易妥协和极端自私的人物，他自甘堕落，结果也以失败告终。易卜生用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表现了“个人精神反叛”的主题，以探索真理，讨论哲学伦理问题。易卜生关于“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无所有”的思想在这两个剧本中有了进一步的表露。易卜生这两部诗剧震动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奠定了他在北欧乃至欧洲文坛上的地位。接着，易卜生发表了诗集《诗》（1871）和描写公元4世纪罗马宗教斗争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国王与加利利人》（1873）。当时的易卜生已年近五十，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浪漫主义戏剧阶段，而是向‘社会问题剧’的方向发展。他的《爱的喜剧》和讽刺喜剧《青年同盟》（1869）都是社会批评性质的戏剧，这两部作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易卜生首次向政治、社会问题发起进攻。

勃朗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流》深受易卜生赞赏，前者提出的作家应该在作品中提出社会问题来进行讨论的论点激励易卜生发表了著名的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2）。

《社会支柱》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支柱，富有、体面、受人尊敬的领事，造船商卡斯腾·博尼克为主人公，通过对他的腐朽丑恶面目的揭露，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剧本采用回顾、倒叙的手法，直到最后一幕才把第一幕的疑团解开。易卜生对这种在希腊悲剧中早

就有的技巧作了精湛的发展。剧本结局是博尼克天良发现，当众认罪。这个软弱无力的结局是剧本的缺点，是易卜生主观愿望的表现。

《玩偶之家》是一部提出妇女在婚姻中地位问题的作品。易卜生用这一问题来提倡他的基本思想，即个人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这个剧本也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医病，曾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当海尔茂这个“社会支柱”了解真相后，一方面认为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又害怕影响到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娜拉。当娜拉认识到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个玩偶时，毅然离家出走。这部妇女独立宣言式的剧作使易卜生同时代人极为震惊，除了引起广泛辩论外，还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愤怒抗议，有些剧院经理在演出这一剧本时对结局进行篡改。

《群鬼》是易卜生对那些对《玩偶之家》感到震惊的人们的反击，也是一部关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社会问题剧。剧中的女主人公阿尔文太太同娜拉相反，按照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恪守妻子的本分，苟安于恶劣的家庭生活，结果成了资产阶级婚姻关系和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她精心培养的儿子也得了遗传病——梅毒。剧本深刻地揭示了这样的道理:不向‘群鬼’们展开无情的斗争,妇女的命运将是十分悲惨的。

《群鬼》的发表使易卜生遭受了比《玩偶之家》更为激烈的抨击，易卜生几乎成了“人民公敌”。易卜生就用这个称呼作为他下一个剧本的剧名。《人民公敌》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最后一部，作品通过对正直、关心群众利益的斯多克芒医生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宣布为人民公敌这一事件，对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进行抨击,并宣称‘世界上最坚强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1884 年易卜生发表《野鸭》,从这部剧作开始,易卜生的创作进入象征主义阶段。作品的重心从社会问题逐渐转向内在的心理

活动和人生问题的探讨。这类剧作还有《罗斯默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加布勒》(1890)、《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等。

易卜生的戏剧对北欧乃至世界戏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各国许多舞台上都上演过他的剧作，不少剧作家，如英国的萧伯纳和高尔斯华绥、德国的豪普特曼、俄国的契诃夫以及美国的奥尼尔等剧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易卜生的影响。易卜生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及剧作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早在 1914 年,我国即把他的《玩偶之家》译成中文并搬上了舞台。

比昂斯藤·比昂松(1832—1910)出身于牧师家庭。担任过报纸文学戏剧评论员、编辑、卑尔根国家剧院编导，主持过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剧院。他积极主张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挪威民族文化。

比昂松是一位多产作家,作品有戏剧、小说和诗歌。小说主要有《孙诺威·苏尔巴根》(1857)、《阿尔纳》(1859)、《一个快乐的孩子》(1859)和《渔家女》(1867)等。

比昂松创作的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他同易卜生一样,创作道路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作品属浪漫主义，有《战役之间》(1857)、《国王斯凡勒》(1861)、《西格尔特恶王》(1862)和《十字军骑士西格尔特》(1872)等。这些剧作都是比昂松根据挪威 12 世纪的历史而创作的。

1873 年至 1876 年,比昂松到国外旅行,接受了达尔文学说和勃朗兑斯激进的文学观，创作了几部重要的现实主义戏剧，主要有《破产》(1874)、《编辑》(1875)、《国王》(1877)、《新制度》(1878)、《黎昂娜达》(1879)和《挑战的手套》(1883)等,其中以《破产》和《挑战的手套》最为著名。《破产》写投机商钱尔德在破产危机中进行挣扎的故事。《挑战的手套》是一部关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剧作，女主人公斯瓦法订婚后发现未婚夫曾与其他女子有染，要求解除

婚约,但受到多方阻挠,最后未婚夫表示悔改,矛盾在‘宽恕’中得到解决。比昂松敏锐地看出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虚伪和贪婪,用其锋利的文笔、现实主义的手法暴露和抨击了资产阶级的欺诈。他对被压迫者寄予极大的同情，对妇女解放运动给予热情的支持。比昂松主张用‘宽恕’和‘爱’使敌对双方化对立为融和,以‘人道精神”使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互相接近。他的这些剧作往往以尖锐的写实手法开始,而以妥协、调和矛盾结束,大多是坏人悔悟,好人得救,充满改良主义色彩。

比昂松第三阶段创作属象征主义戏剧，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是《人力难及》(1883)。

比昂松于 190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阿雷克山德·朗格·基兰德(1849—1906)出身于挪威北部斯塔万格市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1871 年从法律系毕业。二十三岁结婚后曾经营过砖厂。1878 年去巴黎小住,在那里写了几篇小故事，寄回挪威，发表在《日报》上。基兰德除了在哥本哈根(1881—1883)和巴黎(1886—1888)居住过外,一生基本上都住在家乡斯塔万格。1892 年任该市市长。1902 年搬到莫尔德,任地区总监。1906 年在卑尔根去世。

基兰德一生出版过九部小说,三部剧本,还出版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故事集。第一部作品是剧本《在回家的路上》(1878),发表在《新挪威杂志》上。第二部作品是大部分在巴黎写的《故事集》(1879),这些小故事内容风趣,格调优美,很受欢迎。第二年又发表了一部故事集,题名《新故事集》(1880)。

在丹麦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朗兑斯鼓励下,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加尔曼和华斯公司》(1880)。这是一部以他自己家族公司为背景的小说,人物原型里有好几个是他家族的成员,作品反映了在商场上的争斗和两代人之间以及贫富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对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作品的发表引起很大轰动。他在 1884

年 11 月 6 日给格奥尔格·勃朗兑斯的信中谈到自己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意图,信中是这样说的":我想要在中间燃起一堆篝火,去烧那些社会鬼怪和其他人，去用烈火灼烫鬼怪周围的人群。但是火焰却总是仅仅起了照明作用。"

《雪》(1886)和《仲夏节欢庆》是两部描写教会固执和虚伪的长篇小说,前者是反映教会在 1884 年王室和议会斗争中模棱两可的态度，后者则是揭露神职人员的狭隘和专横。他的其他长篇还有《工人》(1881)、《埃尔塞》(1881)、《毒药》(1883)和《命运》(1884)等。他的三部剧本《三对人》(1886)、《贝蒂的保护人》(1887)和《这位教授》(1888)讽刺生活中存在的不良现象。

1889 年基兰德开始主编斯塔万格地方报纸，把它作为宣扬自己左翼政治观点的工具。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雅柯布》(1891)描写农村的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城市后经过奋斗登上财富和权力的高位。

约纳斯·劳日兹·伊德米尔·李(1833—1908)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作家。他出身于挪威北部一职员家庭。在卑尔根上中学，后在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学习法律。1858 年在南部一城市开业当律师。因投机失败而经济破产，他不得不转入写作来维持生计和偿还债务。他曾在巴黎和德国等地侨居二十七年，这对他开阔眼界和创作有极大帮助。他的作品有诗歌、剧本、小说和故事，共三十余部，主要成就是在小说创作方面，挪威文学史家称他是挪威小说的奠基人。

约纳斯·李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吉尔伊一家人》(1883)、《指挥官的女儿》(1886)等都是属于"家庭小说"，着重探讨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妇女如何走向社会的问题。《诺尔兰的梦幻》(1870)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通过主人公霍尔斯特和牧师女儿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北极海港特罗姆瑟的人民生活。他的其他长篇小说还有《引水员和他的妻子》(1874)、《托

玛斯·罗斯》(1878)、《向前走》(1882)和《当太阳下山时》(1895)等。

三

哈姆生、嘉宝和斯克拉姆都是挪威 19 世纪 90 年代的重要作家。

克努特·哈姆生(1859—1952)是挪威 19 世纪末期的重要的作家,出生在挪威中部洛姆地区,祖辈均是农民,父亲除耕种外,还靠做裁缝补贴家用。哈姆生三岁时，全家迁往挪威北部居住，夏天的白夜、浓密的森林和巍巍的群山激发起他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这为他以后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由于家境贫困,哈姆生只上过 252 天的学,很年轻时就外出打工,当过学徒,后来还当过小贩、修路工等。为了生计,他两度去美国,先后在农场做工,在商店当店员,在芝加哥电车上当售票员,在美国和挪威讲学，为报刊写文章等。总之，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饱尝过饥寒交迫的痛楚。

哈姆生十八岁开始写作,尽管也出版了,但只是一些模仿比昂松的关于农村的小故事，没有什么著名的作品。他的成名作《饥饿》是在 1890 年他三十岁时发表的。这是部小品文体裁的作品，最初于 1888 年刊登在丹麦一个定期刊物《新土地》上。它叙述一个住在小城镇里穷困潦倒的年轻文人，靠写文章给报纸投稿生活，但他所写的稿子常常被主编退回，又找不到职业，身无分文，付不出房租，买不起面包。他饿着肚子整天在街上、公园里游荡，经常喝冷水充饥,在露天住宿,偶尔投稿成功,得一点钱应付几天生活。他既卑微又高傲，看见路上乞丐向他求乞，会毅然脱下背心当掉去救济乞丐。哈姆生在这部作品中着重描写了年轻文人在饥饿中产生的各种幻想和狂态,极为细腻、真实和生动。《饥饿》的发表使哈姆生一举成名，成为新浪漫主义派的代表，开创了挪威小说史的新时期，对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文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维克多利亚》(1898)是哈姆生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维克多利亚是个富家之女，她同磨坊主的儿子约翰内斯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由于社会地位悬殊，父亲贪财，她被迫与一位年轻军官订婚。约翰内斯在万分悲痛中写了一部又一部作品，倾诉了他对维克多利亚的爱。不久维克多利亚在抑郁寡欢中凄惨死去，临终前给他写了一封表达自己对他始终不渝的爱情的信。维克多利亚是他写作的源泉，随着她的去世，约翰内斯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写作了。这部爱情小说写得情节曲折，故事生动，感人肺腑，被列入世界爱情小说名著之一，从而使哈姆生在世界文坛上获得了声誉。此外，他还著有小说《神秘》(1892)、《牧羊神》(1894)、《梦想者》(1904)、《时代的儿童》(1913)和《赛格福斯村》(1915)等。

哈姆生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流浪者，实际上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对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诸如财富积累、妇女解放、工会组织等等都持反对态度。哈姆生在将近五十岁时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狂热，而是郁闷沮丧，这在他那时期的小说《在秋天的星空下》(1907)和《最后的欢乐》(1912)中有较为明显的反映。

1920 年,哈姆生由于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土地的生长》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土地的生长》(1917)是三部曲,主人公伊沙克高呼回到大自然中去，回到原始的文化中去。这是一部赞美田园生活,反对工业城市社会,宣扬个人主义的作品。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是哈姆生的名声达到顶峰的年代，他的新作一出版,立即被译成世界上的各种文字出版,如小说《流浪者》(1927)、《奥古斯特》(1930)和《生活在前》(1933).

哈姆生推崇尼采哲学,主张超人统治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表文章支持希特勒，甚至在他自己的祖国挪威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时，他仍站在入侵者一边。1945 年德国战败投降,挪威获得解放,哈姆生名声扫地,以叛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后因病获释。1949 年哈姆生出版了小说《在树阴下的小径上》,企图为其堕落变

节与德国法西斯合作辩解，但是挪威人民和世界舆论并没有因此而同情他。

阿尔内·嘉宝(1851—1924)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诗歌、书信、报道、日记等。曾当过教员和多份报纸的编辑,如《晚报》和《日报》等。他于1875年开始写作,作品主要反映19世纪末期挪威思想和文学上的重大变化。当时挪威文学界曾就如何在作品中涉及性道德问题进行过辩论，他发表了《男人》(1886)以及《和母亲生活在一起》(1890)来阐明他的观点。《男人》通过对一个男子因受性道德观念的束缚和贫穷而丧失爱的能力的描写,发表了他对自由恋爱、妇女问题、贫困和性病等问题的看法，以此来反驳比昂松在《挑战的手套》中的观点。《农民学生》(1883)和《和平》(1892)描写城市和乡村、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官员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的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疲倦的人》(1891)、《丢失的父亲》(1899),剧本《教员》(1896),诗歌《豪格吐萨》(1895)。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

阿玛利厄·斯克拉姆(1846—1905)是位女作家,出身于卑尔根的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由于父亲破产,移居到美国,斯克拉姆不得不在十八岁时嫁给比她大九岁的船长，并跟随他航行到各个国家。她在1882年出版短篇小说《何伊夫人的租赁人》。同年与船长丈夫离婚。1884年同一个丹麦作家埃里克·斯克拉姆结婚，此后,她没有经济顾虑,全心投入写作。第一部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永恒的圆圈》(1885),里面有对性生活的露骨的描写,引起对当前道德状态的辩论。阿尔内·嘉宝支持她,并给她写信说他从没有阅读过那么有震撼力的一本书。接着斯克拉姆发表了好几部有性描写的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小说:《露西厄》(1888)、《伊内斯》(1891)和《背叛》(1892)。她要在这一组小说中说明的是婚姻“绝大多数情况是使他们走向地狱”。四部曲《海勒米尔的人们》(1887—1898)是写一个家族的兴衰史。

第五节　姗姗来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芬兰发展迅速

一

1809 年瑞典战败不得不将芬兰割让给俄国，1917 年末芬兰宣布独立，在这上百年的时间里，芬兰大致可分为两个五十年。前五十年芬兰和它的新宗主国俄国之间可以说是"相安无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睦相处"。而后五十年则愈来愈"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在这两个阶段中语言文化始终是问题的焦点，并且成为导火索之一，因而芬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几乎全都卷入进去。

在俄国统治初期，芬兰享有比在瑞典统治时期远为宽松自由的自治。除了军事外交，俄国不大过问芬兰内部事务，从 1809—1863 年芬兰内政全由芬兰的议会所主持，芬兰的大小官吏全部由芬兰人担任，只有总督是由沙皇任命的俄国人担任。在语言文化方面，芬兰政治家斯内尔曼等人努力创造芬兰民族语言文化受到了俄国的支持，因为对俄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 既有利于消除瑞典在芬兰根深蒂固的影响，又可以笼络拉拢芬兰。俄国的怀柔政策在初期确实羁縻住了芬兰的人心，有些芬兰激进主义文人甚至出自对六百年来瑞典统治的仇恨而把俄国看成是"解放者"。1863 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6—1881 在位）于 1863 年颁布敕令，规定在二十年为期的过渡时期后使芬兰语具有同瑞典语同样的司法与行政地位，到 1901 年以后芬兰语与瑞典语完全平等。1869 年又颁布了芬兰议会的沙皇敕令，规定议会官方文件届时可使用芬兰语。这两个沙皇敕令使得芬兰知识阶层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芬兰知识阶层的幻想注定是要落空的。

从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俄国逐渐摆脱了克里米亚战争以来

的困境，同土耳其的九次俄土战争已大体结束，波兰的武装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于是俄国便可以放手推行以“泛斯拉夫主义”为名的向外扩张，并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争夺。从 1890 年起俄国对芬兰政策来了个大转变，由许愿笼络变为推行全盘“俄罗斯化”，由羁縻软化改为强制镇压。起先是将芬兰的邮政、海关和货币纳入俄国的相关部门，随后又规定芬兰的法律必须按照俄国法律重新立法，并且规定只能使用俄语为官方语言。俄国总督鲍利科夫又宣布取消芬兰原有的国民自卫军，实行征兵制，芬兰兵员直接编入俄国军队。1899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二月宣言》,全面推翻了以前所做出的承诺，要取消芬兰享有独立自主的特权，并且成为永远隶属于宗主国的一个殖民地。《二月宣言》唤醒了芬兰人民的民族意识,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素有“屠夫”、“刽子手”之称的俄国总督鲍利科夫不仅未能镇压住局面，而他自己也在 1904 年芬兰独立运动中被刺杀。俄国打算对芬兰进行武力镇压，芬兰举国上下严阵以待，实行了总罢工，俄国终究未能对芬兰用兵。1905 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过问芬兰事务，直到 1910 年之后俄国才旧事重提,又要推行“泛斯拉夫主义”的全盘俄罗斯化，不过到了这时候俄国已是有此心而无此力了。因而，日俄战争客观上使得芬兰免受战争的浩劫,否则损失将是惨重的,尤其是经济方面。

芬兰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其他北欧国家，直到 18 世纪还在采用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方式，以解决粮食饲料之不足。到了 19 世纪，全国绝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而农村又是地广人稀，1809 年芬兰归属俄国时全国总人口只有近九十万。生产水平低下，经济和交通滞后，再加上宗主国的盘剥掠夺，这些使得芬兰贫穷不堪，芬兰人民十分困苦。此外战乱频仍也是拖累芬兰经济的重要因素。芬兰历来是瑞典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无论瑞典向东扩张或是俄国朝西觊觎都会连累到芬兰，甚至变成双方的主要战场。

因此有人说“斯德哥尔摩王宫里卡尔十二世的雕像一手按剑，一手朝东指向俄罗斯。彼得堡王宫前的彼得一世也一手按剑，一手朝西指向瑞典。双手指向的焦点便是芬兰”。进入 19 世纪以来,战事明显减少，芬兰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复苏好转，芬兰拥有的主要资源木材得以开发。到了 19 世纪中叶芬兰工业化开始起步，伐木工业蓬勃发展，木材大量向俄罗斯也向欧洲出口，伐木业成为重要的经济命脉，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出现了变化。人口迅速增长,到 1908 年全国总人口已达到二百万。 1812 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将芬兰首都从西边的土尔库往东迁移至与彼得堡隔海相望的赫尔辛基。迁都之举本意在于加强控制和防御瑞典，但却带动了芬兰湾一带的经济发展。80 年代起工业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日益壮大。工人阶级也开始形成，劳资纠纷日趋尖锐，社会矛盾也由此更趋激化。

80 年代以来芬兰知识阶层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以斯内尔曼为代表的致力于创造芬兰民族语言文化的老一辈对俄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之后，处于失落和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但是由他们所提倡的芬兰民族语言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的一代却迅速成长壮大。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与他们的前辈大不相同的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已不再拘泥于语言文化问题，传统观念也不能再束缚住他们的思想，他们关注由资本主义出现和兴起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俄国既不抱有幻想也不悲观失望，而是更坚定地批判揭露，以巨大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民觉醒。在这方面芬兰有其得天独厚之处：如同赫尔辛基既有金碧辉煌的希腊式东正教堂，也有规模宏大的哥特式基督教堂一样，芬兰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东西荟萃，兼收并蓄。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哲学思想，丹麦勃朗兑斯的‘现代突破主义’文学主张,易卜生、斯特林堡的现实主义作品纷至沓来，不断开阔和启发芬兰知识界和文学界的眼界和思路。此外，俄国文学大师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

也在芬兰得到广泛的流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芬兰文坛上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芬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主流大约在 1884—1885 年才形成。当时赫尔辛基有个“耶尔内费尔特学校”的文学团体，批判现实主义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一批年轻的芬兰文学家聚集在这里高谈阔论，斥责芬兰封建社会的腐朽无能，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黑暗与弊端。他们痛恨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也鄙视君主和神权，他们同情无产者和低层阶级，同情妇女，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来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和揭露社会弊端。芬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较广泛，大约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敏娜·康特、约翰·阿霍等人。

敏娜·康特(1844—1897)出身于职员家庭,父亲是一家纺织厂的总管。1863 年就读于凡斯秀莱师范学校，两年后与一中学校长结婚而中途辍学。但她坚持自学和写作，经常在丈夫主编的报刊上发表有关禁酒等社会问题的文章。《入室偷窃》(1882)是她第一部主要喜剧，作品在描述农村青年爱情故事的同时，抨击了酗酒和宗教迷信。此后，在北欧现实主义作家如易卜生等人影响下，敏娜·康特发表了不少针砭社会弊端、揭露宗教保守势力、呼吁妇女为自身权利进行斗争以及反映工人运动等问题的作品，成为 80 年代芬兰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剧本《工人的妻子》(1885)猛烈抨击社会现状和由男人控制、妇女受欺凌的不合理的家庭制度。剧本最后一幕，吉卜赛姑娘郝姆桑图说出了全剧的中心主题：“你们的法律,你们的权利——这正是我要击毙的东西!”类似主题的作品还有小说《哈娜》(1886)、《穷人》(1886),剧本《苦命的孩子》(1888)。

敏娜·康特晚年的创作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手法上侧重心理描写，内容上强调个人因素，认为生活贫困固然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陈腐的道德观念造成的，但是每个个人的自身行为也是造成

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这时期较为重要的作品有剧本《牧师之家》(1891)、《瑟尔薇》(1893)和《安娜·丽莎》(1895)。

敏娜·康特是芬兰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剧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她也是最早把工人形象写进文学作品、搬上舞台的北欧作家之一。

约翰·阿霍(1861—1921)原名尤哈内斯·布罗费尔德,出身于牧师家庭。他是芬兰第一位靠写作谋生的专业作家。1880 年进入赫尔辛基大学学习,后曾担任过《日报》、《新画报》等报刊的编辑。处女作短篇小说《当父亲买灯的时候》(1883)描述洋油灯代替旧式提灯的故事。小说《铁路》(1884)描写住在偏远地区的一对老夫妇听说要建铁路，产生想坐火车的愿望。这两部作品真实描绘了芬兰农民对接受现代文明的反应，令人读来轻松，掩卷捧腹，笑定深思。中篇小说《海尔曼老爷》(1886)深刻揭露了地主和地方官吏的丑恶本质和贫困农民的悲惨生活。

小说《牧师的女儿》(1885)和《牧师的妻子》(1893)被誉为芬兰文学中的《包法利夫人》。《牧师的女儿》描写女主人公爱丽在强迫的婚姻中痛苦的生活。《牧师的妻子》写爱丽婚后遇到婚前情人时的复杂内心活动。阿霍在这两部作品中体现出他写作的两个特征：其一是擅长于描写景物，通过描绘周围自然环境的细微变化来表现人物细腻的心理变化。阿霍在运用这一表现手法时得心应手，恰到好处地使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烘托出艺术效果。其二是文笔生动，不落窠臼，既含蓄又幽默。这些特征在后来的作品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1889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去赫尔辛基》描写几个大学生乘船去赫尔辛基，他们一路上尽兴游玩，梦想爱情，却疏忽了等待着他们的学业。1890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孤独》叙述主人公为治疗失恋的心灵创伤而远赴巴黎，却无功而归。这两部小说都涉及到爱情，阿霍的笔触却并不着重于描写男欢女爱的场面，而是侧重于写

出他们面临爱情这一人生问题挑战时的心理活动，以及在做出抉择时面对周围环境和世俗观念的压力而感到的彷徨苦恼和压抑感。这就使作品升华到更深刻体现人生的高度。

1897 年，在围绕卡累利亚地区归属问题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情绪影响下,阿霍发表历史小说《帕奴》,这是阿霍创作中的一个转折。他背离了自己富有特色的现实主义风格，转而迎合世纪末流行的新浪漫主义时尚。这部作品描述 16 世纪卡累利亚的异教徒帕奴为保卫当地宗教而与基督教展开的激烈的斗争，在最后决战中帕奴兵败被杀。这部作品一般被认为是阿霍的一部不成功之作，因为故事情节是老套翻新，写作笔法既脱离现实又不太浪漫，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稀奇古怪、异想天开而又显得颇为幼稚的咒语和法术,以致当时有的文学评论家讥讽说它不像小说,而像一个陈列魔法和咒语的露天博物馆。

1906 年，为纪念民族诗人斯内尔曼诞辰一百周年，阿霍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冬夜和春日》,这部小说反映了 1840 年至 1850 年间芬兰民族觉醒的历史变迁,整个作品铺叙生动､流畅,文风严谨､扎实,获得了好评。

阿霍的代表作是他的长篇小说《尤哈》(1911),小说的情节很简单,线索也较单一,并且基调同《牧师的妻子》大体雷同｡主人公尤哈勤劳憨厚,整日忙于垦荒劳作而不知怜惜疼爱妻子,他美丽的妻子玛丽亚终于忍受不住诱惑而被东卡累利亚的“唐璜”式的人物塞梅卡所勾引,尤哈不敢去复仇,愤而自尽｡这部作品无论在构思和风格上都超越了他过去的作品，尤其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有独到之处,把东卡累利亚人的粗野剽悍､洒脱而未开化的野性展示得十分生动。

阿霍还著有八部散文集,题材广泛,文笔生动,显示出作家学识的广博。

二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还有相当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活跃在芬兰文坛上。在现实主义文学流行时，芬兰诗歌没有多大进展，也没有多少优美的作品出现，值得一提的只有埃尔科等人。

尤哈纳·亨里克·埃尔科(1849—1906)是位诗人、剧作家。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维堡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早年是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随着芬兰工人运动的发展，他站在人民一边，在作品中提出问题进行探讨，成为现实主义作家。他作品的主题涉及领域非常广,有信仰自由、劳动权、普选权、妇女地位以及青年组织和禁酒问题等等。他的剧本有《艾依诺》(1893)、《库勒沃》(1895)和《波赫雅拉的婚礼》(1902)等。后者还是芬兰国家剧院落成典礼上的首演剧目，但是同他的诗歌比起来，这些剧本就逊色不少。他的诗作除了歌颂自由和进步、鼓舞人民斗志的政治诗篇和爱国主义诗篇外，也有对亭亭玉立的少女和雍容华贵的妇女的赞美。有的诗被谱上曲成为学校音乐课的教材，时隔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芬兰人民对他的诗歌仍然津津乐道，仍在背诵歌唱。他的诗作主要有《国民之歌》、《在蔚蓝色的湖边》、《啊,假如你是我的心》等。

阿尔维德·耶尔内费尔特(1861—1932)与阿霍同龄,同时在大学学习，但两人的起点截然不同。耶尔内费尔特出身在一个俄国贵族家庭中,父亲是芬兰人,当过沙俄将军、总督和参议员,回芬兰后积极支持芬兰民族启蒙运动。母亲来自彼得堡艺术世家的德国和俄国家庭,酷爱文学艺术,是文学沙龙‘耶尔内费尔特学校’的召集人。耶尔内费尔特本人掌握多种语言，除芬兰语、瑞典语外，还会德语和法语。在莱比锡读心理学，在赫尔辛基和莫斯科读法律，毕业后在一地区法院任法官，但不久他放弃法官工作，走上自己喜欢的写作道路。

第一部长篇小说《祖国》(1893)一发表,立即引起轰动,这是一

部涉及学生生活和芬兰语教育的小说，同挪威作家嘉宝的《农民学生》一样,是写第一代农民大学生,主人公海科·沃里塔学业完成后何去何从，是去履行义务还是走自己的路成了他必须面对的问题。回家乡耕种田地是自己的义务，但是城市里的吸引力更强大，沃里塔最后选择了放弃农村，到大城市谋发展。一个人应该选择对祖国更有利的工作。

第二部长篇小说《我的觉醒》(1894)是自传体小说,他崇拜托尔斯泰，把托氏的观点运用到写作中。他强调人必须通过体力劳动来求生存，应该唾弃一切奢华，过简单的生活。他描写自己开始在田里劳动，并且学习各种手艺，包括修补鞋子。他继续在写作，但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写作。《我双亲的小说》(1928—1930)是他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上、中、下三册,作品从描述父亲年轻时的经历，以及与母亲相识结婚，共同搬迁到陌生的芬兰小城生活写起，一直写到母亲的文学沙龙的诞生和沙龙里的各种活动为止。小说再现了 19 世纪下半叶芬兰民族运动的历史，以及芬兰一代作家的创作生涯。作品中包括了一封阿霍给他母亲的信，回忆了“耶尔内费尔特学校”对自己创作的重要性并对他的母亲致以衷心的感谢。

耶尔内费尔特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人的命运》(1895),长篇小说《兄弟们》(1900)、《大地母亲的孩子们》(1905)、《格莱塔和她的上帝》(1925)以及剧本《死亡》(1927)等。

第七章　20 世纪二次大战前北欧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由丹麦传入逐渐波及北欧诸国。北欧五国由于历史背景、地理位置不同，发展也十分不同。自 19 世纪 20 年代起至 19 世纪下半叶，丹麦、瑞典和当时仍隶属于瑞典的挪威和隶属于俄国的芬兰先后开始工业革命，由手工业阶段向机器阶段过渡。冰岛的工业发展晚于其他四国，到 20 世纪前十年,冰岛才在制造业、渔业等方面出现较大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动荡，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奥斯陆等大城市迅速膨胀，乡村人口流入城市，有数以百万计的北欧人漂洋过海，移民到北美谋生。到了 20 世纪初叶,北欧五国不同程度地进入工业化时代。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国家的诞生对近在咫尺的北欧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北欧诸国工业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剧烈，工人罢工此起彼伏。 19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唯美派作家虽然仍活跃在文学舞台上，但是唯美主义已经反映不了尖锐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现实主义文学又重新崛起。在欧洲大陆现代派文学思潮影响下，北欧也出现了一些仿效欧洲作家、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来进行创作的作家，如用瑞典语创作的芬兰女诗人埃迪特 ·舍德格朗,瑞典的帕尔 ·拉格克维斯特等,他们

发表了不少突破传统模式、引起文坛轰动的作品。这股现代主义思潮在诗歌领域尤为突出。

此外,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成人学校的普及,一大批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大多是自传体小说，通过描述作家的“自我”或化身为主人公来展示北欧社会的发展变化、阶级关系和工人运动。自传体这种形式之所以被工人作家所广泛采用,是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为找职业而辗转流浪,尝尽艰辛、饥饿和失业的痛苦。他们都干过各种笨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父辈像瑞典雇工派作家伊瓦尔·鲁-约翰逊的长篇小说《文盲》(1951)中所描写的那样都是些目不识丁的庄稼汉、长工或雇工，他们本人也主要是依靠刻苦自学才学到文化和知识，大多是在投身于工人运动之后，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同人民大众息息相通。他们本身的丰富经历就是创作的素材。这些自传体小说有不少已成了北欧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在北欧诸国中，丹麦无产阶级文学早于北欧其他国家，产生于19 世纪末叶,1900 年至 1920 年是它的繁荣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有马丁·尼克索。他被列宁誉为北欧的高尔基。在他的带动下，北欧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声誉的无产阶级作家。瑞典的无产阶级文学虽然晚于丹麦，但是其作家的数量之多，作品之丰富，题材之广泛可属北欧之首。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瑞典的无产阶级文学因其众多的作家和丰富多彩的作品，不但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而且成为主宰瑞典文坛的主要力量。其中不少作家，如伊瓦尔·鲁-约翰逊,埃温德·雍松等都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芬兰的工人文学在 1905 年大罢工后较为繁荣，但是随着工人赤卫队在内战中失败，工人作家被杀或被监禁，工人文学遭到沉重打击，受到严重挫折。

希特勒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北欧五国人民也卷进了战争旋涡。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北欧的爱国作家和诗

人，尤其是饱尝被占领之苦的丹麦和挪威爱国者，站到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列。他们怀着对法西斯的仇恨，创作出大量小说、诗歌、剧本和纪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论从其品位或层次来看均达到一流水平，是这些国家现代文学史上极为光辉灿烂的篇章。

北欧文学史上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大战期间文学’，或称之为‘占领期间文学’。30 年代初期，正当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并且开始战争叫嚣之际，瑞典出现了“战备文学”。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和战争的爆发，作家们或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或是站在捍卫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立场上，声讨德国。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猖獗肆虐的 1933 年，瑞典的拉格克维斯特发表了长篇小说《绞刑吏》，倾诉了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抗议。挪威作家诺达尔·格里格，在美国黑人运动员詹姆斯·欧文斯 1936 年在德国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上夺得多项赛跑冠军后，发表了一首只有十二行的政治讽刺短诗《短跑手》，淋漓尽致地挖苦希特勒和他对犹太人的迫害，丹麦剧作家卡伊·蒙克在 1938 年发表剧本《他坐在熔化炉上》，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恶行径。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不少北欧进步作家和共产党人创作了大量充满国际主义激情的诗歌、散文、戏剧和纪实文学作品。不少北欧人参加了国际纵队，有的北欧人还为正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0 年 4 月，随着纳粹德国对丹麦、挪威的进攻和占领，北欧的反法西斯文学进入新的阶段。从 1940 年直到 1945 年战争结束，北欧文学无论从数量和内容上都有比较大的变化。被占领的丹麦、挪威的爱国作家，不分信仰和派别，除极少数站在德国入侵者一边(如挪威的哈姆生)外，都投入到保卫祖国、抗击法西斯统治的洪流中，不少作家参加到地下抵抗组织中直接进行战斗；处在中立国的瑞典，作家也纷纷站到支援兄弟国家的反法西斯的行列中来。这一阶段的北欧文学在号召、动员和激励人民向法西斯展开

斗争中起了直接作用。

借古喻今是北欧作家们在这一时期创作中的一个特点，通过历史故事来揭露敌人、鼓励人民，如瑞典作家维尔海姆·莫贝里的历史小说《今宵驰骋》(1941)等。

以象征主义手法进行创作是这一时期北欧文学中的又一个特色，这类作品尤以德国占领的丹麦、挪威为最多，如挪威作家塔尔耶·韦索斯一改以往现实主义表现手法，采用象征主义，以巧妙的隐喻和寓意表达他对法西斯的憎恶和对抵抗运动的支持，如他的长篇小说《萌芽》(1940)和《黑暗中的房子》(1945)等。

芬兰共产党作家虽然自己身处险境，随时都会遭到逮捕、杀戮，但是他们凭着自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片赤胆忠心，记录了芬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二次大战期间的丰功伟绩，塑造了他们的英雄形象，为北欧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从战后直到现在，北欧不时仍有一些反法西斯作品出现，作者大都是二次大战的目击者、亲身参加者。他们之中有的是地下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有的坐过牢，有的在集中营里服过苦役。他们的作品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和构思，更为成熟，其深度和广度比起战争期间出版的作品来也更进了一步。

从北欧作家们所创作的反法西斯作品看北欧作家，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进步人士、共产党员，他们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向往社会主义，如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挪威作家诺达尔·格里格，丹麦作家、共产党员马丁·尼尔森等。他们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而且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后极富感染力。另一类作家有一定的进步倾向，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迫害犹太人，发动侵略战争，但这类作家在反对希特勒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这些思想也深深地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

第二节　工人作家在丹麦登上文坛

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丹麦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一批出身于无产阶级、描写自身疾苦和觉醒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丹麦的无产阶级文学比其他北欧国家出现得早，产生于 19 世纪末叶，1900 年至 1920 年是它的繁荣时期，主要作家有约翰·舍尔德堡(1861—1936)、耶普·阿克耶尔(1866—1930)、马丁·安德逊·尼克索和汉斯·基尔克等。约翰·舍尔德堡的短篇故事、长篇小说、诗歌和戏剧着重描写雇农和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和艰苦劳动。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一个战士》(1896)，描写一个叫舍伦·勃朗德尔的贫苦农民为争取生存而含辛茹苦的一生。耶普·阿克耶尔的作品主要描写贫苦农民，批判地主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对小土地拥有者和农业工人的欺压和掠夺。他的《愤怒的孩子，一个雇农的故事》(1904)描述雇农彼尔从苦难走向更加悲惨的苦难，最后走投无路，只得漂洋过海到北美去谋生。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充满对非正义社会的控诉。

20 世纪前半叶丹麦除了一批优秀的工人作家外，还有以达尔文主义为思想基础、信仰技术进步的著名作家约翰内斯·维尔海姆·延森等。

随着德国法西斯日益猖獗，丹麦作家也日益觉醒。他们抛弃和平主义幻想，纷纷发表小说、戏剧和诗歌，抗击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占领丹麦期间，诗歌创作较多，发挥了动员人民、宣传爱国主义的作用。这一时期主要有剧作家卡伊·蒙克、谢尔·阿伯尔和青年作家马丁·尼尔森(1922—1944)等。马丁·尼尔森是丹麦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德国占领丹麦后，他被丹麦当局逮捕并被送到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服苦役。1944 年牺牲，年仅二十二岁。他发表过不少爱国主义诗篇。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纪实文学

《大消灭—— 来自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报告》,发表于 1947 年。这部作品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凶暴地虐待和残酷地杀戮犹太人的罪行。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1869—1954)是丹麦无产阶级文学创始人，也是北欧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作品对北欧无产阶级作家产生重大的影响。

尼克索出身于哥本哈根一个工人家庭。十岁时就给人放牛，后又当过雇工、鞋匠、泥瓦匠等。1891 年至 1893 年,尼克索在两所成人学校学习，以后曾一度担任过成人学校的教师。他于 1893 年开始文学创作，同彭托皮丹一样，早期的作品具有乡土色彩和社会批判的内容，但是，尼克索同彭托皮丹不一样的是他对阶级压迫深为愤慨，主张社会革命，作品以描写被压迫阶级为主，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 1894 年至 1896 年他到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旅行后，更坚定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要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劳苦大众写作的信念。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鼓舞和教育下，尼克索彻底同丹麦社会民主党决裂，成为丹麦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二次大战期间，尼克索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1940 年，丹麦被德国占领，七十岁高龄的尼克索因抗击德国法西斯而被捕入狱,但他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不久,他越狱到瑞典。二次大战以后，尼克索回到丹麦，由于反动分子的诋毁，他不得不于 1951 年再度流亡国外，侨居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54 年,在德累斯顿逝世。

尼克索最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三部曲：《征服者贝莱》(1906—1910)、《蒂特——人的孩子》(1917—1921)、《红色的莫尔顿》(1945—1948)。 《征服者贝莱》以丹麦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背景，描述了贝莱从一个农村的贫苦少年成长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及最后走上改良主义道路的过程。《蒂特——人的孩子》通过对一个被遗弃的私生女、孤苦的农村姑娘蒂特遭受欺侮、受尽

压迫的悲惨命运的描写，对资本主义提出了严正的抗议。《红色的莫尔顿》是《征服者贝莱》的续篇,主人公莫尔顿反对贝莱的改良主义路线，主张进行不屈的斗争。这部长篇巨著是有关丹麦工人运动的史诗般的作品，贝莱是一个从革命者蜕化为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人物，莫尔顿则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形象。

尼克索还著有短篇小说《阴影》(1989)、《朝向光明》(1938) 中篇小说《生命的代价》(1899)、《母亲》(1900),以及长篇小说《铁器时代》(1929) 和四卷回忆录《一个可怜虫》 (1932)、《在露天里》(1935)、《旅途的终点》(1939) 等。

约翰内斯·维尔海姆·延森(1873—1950) 出身在丹麦日德兰半岛的希默兰镇的一个兽医家庭，父亲对动物学和植物学有很渊博的知识，并且也很有文学修养。延森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对丹麦和北欧的各种动植物细腻入微的描写，尤其是对植物性毒药的描写，可以说主要得益于他父亲的教诲和帮助。延森的母亲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妇女，既要照料家庭和养育十个子女，又要忙于农田活计和饲养奶牛。她对延森讲了不少希默兰一带的逸事趣闻，这些都成为延森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绝佳素材，而她自己也成为延森笔下描写的丹麦农村妇女的原型。

1893 年，延森念完了教会学校后就到哥本哈根去学医。由于家庭清贫，无力供他上大学，他只得白天上课，晚上为报纸创作连载小说以赚取菲薄的稿酬。1895 年初,延森以惊险小说《卡茜娅的宝物》步入文坛,接着又发表了《亚利桑娜的血祭》(1896)等有关谋杀案的作品。他的这类小说虽然脍炙人口，颇受杂志编辑和一般市民读者的欢迎，但却受到了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的批评，他指出延森的作品庸俗肤浅，希望他能以其才华写出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格调高雅的作品。延森虚心地接受了批评，并于 1896 年发表了第一部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小说《丹麦人》。此后的十多年是他创

作精力最充沛的多产时期。他以日德兰半岛北部故乡的风光和人物为背景，写出了许多描写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收在三卷本《希默兰的故事》（1898—1910）之中。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他热情讴歌希默兰的农民，赞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朴而健康的生活，同时也描写了当地剽悍粗野的民俗乡风，其中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安恩和母牛》已经成为丹麦学校的语文教材，并且不时在广播中朗诵。《希默兰的故事》的出现一扫当时流行的无病呻吟、追求华丽辞藻的时尚，为丹麦文坛输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在延森弃医改而从事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之后，他曾被报馆派赴美国、西班牙和法国进行采访，并且来到亚洲，访问了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美国之行使他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器的广泛运用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景，因而他出版了赞扬美国进步的书籍，如文集《哥特式的文艺复兴》（1901）、《新世界》（1907）等。

1900—1901 年，延森出版了历史小说《国王的失落》三部曲，其中包括《早春夭折》、《伟大的夏日》和《隆冬》。这部小说通过平民大学生米歇尔的悲欢离合，以及他同年轻贵族奥托之间的恩仇冲突，反映了当时丹麦社会的阶级矛盾，同时也展示了暴君的昏庸无能以及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肆杀戮的凶残面目。这部小说将丹麦军队和穷乡僻壤的剽悍风俗描绘得淋漓尽致，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其中的复仇心理和凶杀场面是丹麦文学作品中写得最精彩的，可与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相媲美。

《德奥拉夫人》（1904）及其姊妹篇《车轮》（1905）表面看来是推理小说，实质是深刻描写社会问题的作品，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作品的出版引起丹麦文坛极大的轰动。这两部作品是延森的所有作品中最为人所熟知和广泛阅读的。

从 1906 年起，延森写了不少神话和短篇小说，其中主要的有《北欧神话》，从 1906 年起陆续发表至 1944 年，共收录成九册，约

一百五十篇。

延森的代表作是大型系列历史小说《漫长的旅行》(1908—1922),这部巨著共包括六部小说:《冰河》(1908)、《船》(1912)、《诺尔纳·盖斯特》(1919)、《失去的天国》(1919)、《奇姆利人的远征》(1922)和《克利斯托弗·哥伦布》(1922)。这部巨著是叙述人类进化过程和表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小说,从混沌初开的史前时代描写起,一直写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作品由许多自成一体的短篇散文体故事串连在一起。1923 年,延森又写了《美学与进化》,这篇散文是《漫长的旅行》的后记。为了进一步阐明《漫长的旅行》的基本思想,他又写了不少哲学性很强的散文集,如《进化与伦理》(1925)、《动物的蜕变》(1927)、《精神的目标》(1928)、《我们的起源》(1941)。延森因《漫长的旅行》这部巨著而于 1944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具有雄浑而丰富的诗意想像力,他运用的这种想像力,使渊博的智慧探求同大胆、新奇的独创风格结合起来"。

延森还出版过许多诗集、游记和论文集。他最后一部作品是在临终前一年出版的游记《非洲》(1949)。他中晚期作品大多采用表现主义和印象主义手法。丹麦一些著名作家深受他的影响。

汉斯·基尔克(1898—1962)出身在一个乡村医生家庭中,父亲为人正派,责任心强,有正义感,对社会上的等级差别和不平等甚为反感。基尔克继承父亲的优良品质,同情劳苦大众,一生为被压迫阶级的生存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1922 年,基尔克获得法学学位,不久即成为丹麦进步刊物《火炬》和共产党报纸的记者、左翼文艺评论家。他运用马克思的学说,撰写文章,发表关于文学任务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评论文章。

长篇小说《渔夫》(1928)是基尔克的处女作,描写一群笃信宗教的渔夫的艰难生活。《雇工》(1936)和《新时代》(1939)是两部描写农村工业化后小土地拥有者成为产业工人的长篇小说,描绘了

工人们遭受资本家剥削、组织工会、举行罢工和忍受失业痛苦的经历。二次大战期间,基尔克因为抗德亲苏,于 1941 年被捕入狱。大战后,基尔克又发表了不少长篇小说。《奴隶》是基尔克于大战期间在监狱的恶劣环境中创作的历史小说，发表于 1948 年,内容是描述西班牙奴隶起义，以此来鼓舞丹麦人民的斗争。《愤怒的儿子》(1950)也是一部历史小说。《魔鬼的金钱》(1951)是描写丹麦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后，地下抗德英雄们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向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展开英勇斗争的悲壮故事。

卡伊·蒙克(1898—1944)是剧作家和诗人。二次大战期间，蒙克由于抗德和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一度曾是抵抗运动的发言人而遭敌人逮捕,并于 1944 年被纳粹杀害。

蒙克一生著有六十余部剧本，几十篇政论文和诗歌。他的作品自成一体，不属于任何流派，他出身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中。家庭的影响使他后来到哥本哈根学习神学，获神学学位后于 1924 年被任命为牧师，一直在西日德兰贫瘠的凡德尔斯厄当牧师，直到他被杀害。

蒙克最初崇拜"强人",赞赏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剧本《胜利》(1936)是以意大利 1936 年入侵埃塞俄比亚为素材的作品，但是蒙克很快改变了观点和立场，谴责和抨击法西斯，并发表了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罪恶行径的剧本《他坐在熔化炉上》(1938)以及描写 14 世纪丹麦人抗击异族入侵斗争的历史剧《尼尔斯·埃伯森》(1942)等。他的其他剧作还有《一个理想主义者》(1928)等。

谢尔·阿伯尔(1901—1961)出身于教师家庭。1927 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获政治学学位，但他没有成为文职人员，而是于同年赴巴黎和伦敦学习现代戏剧，他在巴黎从事过舞台布景设计和艺术指导。1930 年阿伯尔返回哥本哈根，在皇家剧院担任舞台设计。1941 年至 1949 年，他担任哥本哈根著名的大型游乐场梯沃利的

经理。

他的处女作,剧本《消失了的乐曲》(1935),滑稽而幽默地反映了一个普通小职员枯燥、烦闷的生活,使他一举成名。剧本《安娜·苏菲娅·赫兹维》(1939)描写一个善良、胆怯的女教师在女校长残忍的压迫下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最后杀死了这个女校长。阿伯尔通过剧本要提醒人们，由于资产阶级采取消极态度，德国纳粹的势力正在不断扩大，威胁着欧洲的安全。在德国占领丹麦期间，阿伯尔写了两个以隐喻手法呼吁抗击敌人的剧本《尤蒂丝》(1940)和《女王又在巡视》(1943)。1944 年 1 月，当阿伯尔获悉卡伊·蒙克被纳粹谋害，他立即终止皇家剧院正在进行的演出，向观众宣布这一噩耗，自己也不得不转入地下。大战以后，阿伯尔发表了剧作《锡尔克堡》(1946)，严厉谴责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绥靖政策和勾结敌人的行径。此外，他还发表过剧本《在云上的日子里》(1947)、《蓝色的狮子狗》(1954)和《尖叫》(1961)等。

除了剧本外，阿伯尔还著有长篇小说《来自密奈科伊的三个人》(1957)和不少戏剧论文。

阿伯尔是一个激进的剧作家,他主张社会改革,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在政治上他反对资产阶级，在戏剧舞台上，他也反对陈规陋习，主张进行舞台布景改革，他创作的每一部戏剧在艺术指导和舞台设计方面都标新立异，独具风格。

克努特·贝克尔(1891—1974)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拥有一小片土地，由于经营不善，后来只好在北日德兰半岛的汉林镇的小集市上当一个出售农业工具的小商人。由于事业不顺，父亲的心情不好,脾气十分暴躁,克努特·贝克尔在这样严厉、刻板、得不到理解的环境中成长,使他养成反叛性格,从小调皮捣蛋,难以管教,他被送到教养院呆了好几年。他尝试过许多职业，但是没有一种职业使他感兴趣。1924 年父亲去世，他继承了父亲做小买卖的生意，同时开始写诗,第一部作品《诗集》发表于 1926 年,接着又发表了

三部以《轮廓像》为篇名的诗集,但是都没有引起诗坛注意,不过,他的这些充满活力、严厉谴责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诗篇受到年轻工人们的赞赏。 1932 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每日的面包》，立即引起文坛注目，使他一举成名。这部小说是他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社会现实中种种黑暗的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作品，第二部《世界期待着我们》(1934)攻击当时的教育制度，引起更大轰动,其他几部是《不安的春天》(1938—1939)、《当火车出发的时候》(1944)和《玛丽安娜》(1956)。这部系列小说描写主人公卡伊·尤斯从幼年到二十岁的生活和经历，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实际上是他自己经历的写照。贝克尔试图通过小说向读者说明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和成长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莱克·费舍(1904—1956)出身于哥本哈根一个商人家庭,曾在银行和出版社工作。十二岁开始写作，1930 年成为职业作家。他和克努特·贝克尔一样以诗歌步入文坛,处女作是诗集《在今天的路上》(1923)。20 世纪 20 年代,费舍发表了六部情节连贯却又独立成篇的长篇小说,如《一半》(1927)、《台奥杜拉》(1928)、《幸运的莱伊夫》(1928)和《一年中的一天》(1929)等。这六部小说通过对两个孤苦的青年人埃里克和莱伊夫为争取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描写，反映了一次大战以前丹麦乡间小镇的面貌以及战争年代中的首都人民的生活。40 年代,费舍又发表了七部情节有连贯性的长篇小说,如《上尉》(1941)、《生涯》(1942)、《最后的夏天》(1943)、《年轻人的笑》(1947)和《发嚎的国家》(1950)等。作品描述了丹麦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各种人的心态。费舍还是一个剧作家，著有剧本《孩子》(1936)、《红屋》(1936)、《红山楂》(1944)和《生活是美好的》(1947)等。其中以《孩子》最为著名,它描写一对夫妇出于自私和怕麻烦，结婚后没有要孩子，结果老来备受孤独之苦。

卡伦·布利克森(1885—1962)原姓迪内森,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1903 年至 1906 年布利克森在丹麦艺术学院就读,后又赴巴

黎和罗马学习绘画。1914 年,她同布利克森-芬内克男爵结婚。婚后至 1931 年，她居住在非洲。在肯尼亚经营咖啡农场。农场破产后，布利克森返回丹麦居住，并开始其创作生涯。贵族生活和东非经历为她的写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长期的艺术熏陶又使她观察敏锐,笔触细腻,描写生动,生活情趣盎然。

布利克森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七个神奇的故事》(1934)以伊萨克·迪内森的笔名用英文首先在英国和美国发表，次年用丹麦文出版。它着重探讨了人在生活中的作用，提出对生活和世界的精辟和总结性的看法，使她一举成名。此后，她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冬天的故事》(1942)、《最后的故事》(1957)、《命运的逸事》(1958)和《草坪上的影子》(1960)，以及描写强盗浪漫生活史的长篇小说《报复的道路》(1944)等。

《非洲农场》(1937)(又译《走出非洲》)是布利克森的代表作，由五十四篇既独立又连贯的散文组成，描述她在非洲经营咖啡农场时的所见所闻，有非洲的风俗习惯，那里男女老少的命运，外来移民的生活等等,把自传、人类学、诗歌和论文融为一体。

布利克森去世后,她的长篇小说《埃伦加德》(1963),《论文集》(1963)和短篇小说集《狂欢》(1977)又相继被整理出版。

布利克森于 1960 年被选为丹麦学院院士。1955 年获安徒生奖,1959 年获彭托皮丹奖。

第三节　现代主义大步走进瑞典文坛

20 世纪初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一时期瑞典文学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存的时期。现实主义于世纪初重新兴起。到了 30 和 40 年代涌现出一批工人出身的作家，他们写出了社会影响很大的作品,使瑞典文学面目为之一新。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以来,法国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相继传入瑞

典,尤其是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对瑞典文学影响很深,到 40 年代，瑞典的现代主义初具雏形，不再是一味模仿法国和德国文学，本民族的特色更为浓厚，在诗歌方面尤其显著。

瑞典的工业化使社会财富增加，但也引起社会结构剧烈变化。资产阶级狂热地进行原始积累，而小农庄不断凋零破产，陷于赤贫的农民急剧增加，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上百万人漂洋到北美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及芬兰的工人起义等也引起了瑞典社会的动荡，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运动声势日益浩大，瑞典共产党也成立起来了。在动荡的社会现实中，现实主义又逐渐重振旗鼓，出现了一批广泛反映瑞典社会问题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出生在 19 世纪 80 年代,1905 年前后发表作品，他们当中不少人当过一段或长或短时间的记者，对现实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同 90 年代钟情于古老庄园文化的唯美主义作家不一样，对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持积极态度，他们面向社会现实，密切注视瑞典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作品中的主人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有商人、企业家、妇女和军人等。他们创作的主要特点是沿袭了斯特林堡的风格，揭露上流社会的拜金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贪婪、自私，并且开始描写下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对他们寄予同情。在思想上，这一批作家受尼采和叔本华影响较深。他们成熟和形成自己风格大约是在 1910 年左右,因而又称‘ 20 世纪 10 年代派 ”。代表作家有擅长写短篇小说的路德维格 ·诺德斯特罗姆(1882—1942) ,作品有短篇小说《渔民》(1907) 和故事集《彼得 ·斯文斯克的故事》(1923—1927)等 ;古斯塔夫 · 赫尔斯特罗姆(1882—1953)长期担任《每日新闻》驻国外记者。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制带者赖克霍尔姆的心意》 (1927) ,描写一个出身卑微名叫赖克霍尔姆的人千方百计想让他的儿子受教育，从而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故事 女作家爱林 ·维格奈尔(1882—1949) 著有描写当时女权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理论基础、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的小

说《笔杆》(1910) 痔格弗里德 痔维兹(1882—1970) ,其最著名的小说《下游》(1920)通过一个家庭五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私自利、残酷无情的寄生虫们的贪得无厌的本性 雅马尔 · 贝里曼(1883—1931) 是这一派作家中较为重要的作家,他多才多艺,一生共写小说、剧本和故事集等共三十余部,他是继斯特林堡之后的瑞典重要的戏剧家,作品幽默、想像丰富。他的两部关于瓦德巧平的长篇小说《瓦德巧平的马尔库列尔》(1919)和《祖母和上帝》(1920)最为著名,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品,它们都是描述性格好强的人发现自己幻想破灭时的痛苦心情，前者的主人公马尔库列尔发现自己喜爱的儿子竟不是亲生子时幻想破灭了，后者则是写女主人公意识到谁也不需要她的关怀，连改邪归正的浪子都不需要她的爱护关怀时，幻想也破灭了。这两部小说后来都改编成剧本上演,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瑞典虽然没有卷入大战，但是有一部分作家对大战感到不安和苦闷，认为传统的创作手法对摇摆不定的残酷现实来说已经不够用了，人们应当寻求创作的新途径。在欧洲大陆早已出现的一些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很自然地受到瑞典作家的青睐，他们运用这些新流派观察事物的方法和它们的表现手法来创作。一大批相当出色的小说家和诗人,如比耶尔 · 谢贝里(1885—1929) 、尼尔斯 · 弗林(1898—1961) 、卡琳 · 鲍耶(1900—1941) 、郭纳尔 埃盖洛夫(1907—1968)等荟萃于一时,其中擅长于描写瑞典南部斯考耐风景的诗人维尔海姆 · 埃克隆德(1880—1949)模仿法国的波德莱尔,成为瑞典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郭纳尔 · 埃盖洛夫师从于法国的安德烈 · 勃勒东成为瑞典的超现实主义派代表人物。

在这一段时期里,出类拔萃的是帕尔 · 拉格克维斯特(1891—1974) 他是继斯特林堡之后的瑞典表现主义大师，不但在瑞典，

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拉格克维斯特生于瑞典南部的伐克舍,父亲是铁路职工,全家都是虔诚的信徒。但拉格克维斯特青年时代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感染下，逐渐摆脱了宗教的偏见和束缚，他和当时的青年学生一样，热情关注和倾听斯特林堡对教会和社会的抨击，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并且组织了激进的社团。拉格克维斯特主张文学作品必须反映时代的精神。他的作品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和消沉情绪，宿命论气息颇浓。他将视觉形象的艺术手段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作品的主题往往是倾吐对生活缺乏信念的苦闷，对黑暗和死亡的恐惧。作品情节简单，主题鲜明，往往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和连续性。主人公往往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些形象化、人格化的抽象概念。他用强烈的虚拟对比手法来表现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物质和精神、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转换与斗争,而象征丑恶、死亡、黑暗的代表人物虽往往占上风,但是又心存苦闷，精神上受到莫大的折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格克维斯特发表了短篇小说集《铁和人》(1915)他用五篇小说集中描写了战争。他用柔软的、鲜红的血肉象征善良的人类，用冷酷的、灰色的枪炮象征战争机器，表现人类爱与恨之间的较量。1916 年发表诗集《苦闷》,这是他的代表作，以阴暗而令人震惊的画面、用绝望和困惑的语言描绘了人类的处境。诗集阐明了理想中的和谐、美好的生活和现实中的恐怖、令人厌恶的生活之间的矛盾：

苦闷,苦闷是我的继承物，
是我喉咙的伤口，
是我的心在世界上尖叫，

一切都是那么严峻，

那么僵硬、黑暗和寂静。
我在这朦胧的房间中四处摸索，
我的手指感到了岩石锋利的边缘，
我向上伸开的双手撕裂，
鲜血滴入寒冷的残云中。
……

《苦闷》的主题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缺乏信念、感到前途没有希望的情绪，宿命论色彩较为浓厚。诗中的‘我’象征所有活着的人。

20 年代后，拉格克维斯特诗作的主题是对童年时代安宁环境的向往和对善与恶的关注。对生活的信念较之 20 世纪前十年的作品明显地得到增强。他收在《幸福之路》(1921)中的诗作《一封来信》是较为典型的一首，写他老母亲日日夜夜忙碌，总是没有休息。她用颤抖的手，“在那花园的香气中，／在薰衣草和晚祷歌的气息中，／在星期日的一片宁静里，她写信给我”。

30 年代，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一向很少过问政治的拉格克维斯特，这时也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写出了不少具有反法西斯内容和社会价值的进步作品，主题大多是探讨人生的奥秘，寻求找到一种合理的答案，作品的语言简洁清新。小说《绞刑吏》(1933)用一个绞刑吏来象征人类的邪恶内心和黑暗力量，上帝创造了绞刑吏以为有能力控制役使他，但是事实相反，邪恶力量一旦得势，便抛弃了上帝而为所欲为，奴役人类。绞刑吏端坐在小酒馆里吃喝，颐指气使四周的一切人，而人类却堕落到甘心听从吩咐，对邪恶力量迷信膜拜。绞刑吏身边还有一个美女，用以象征人类善良的天性毕竟还没有完全泯灭殆尽。该小说出版的当年又改成剧本上演。当时正值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猖獗肆虐之际，这一作品的出现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和社会价值。

《侏儒》(1944)可以说是《绞刑吏》的姊妹篇。侏儒象征永恒存

在的邪恶势力，他对毫无人性、惟利是图、以战争毁灭生存的雇佣军康道梯里百般崇拜，象征人类善良本性的贝那道是侏儒不共戴天的敌人。侏儒的主人莱纳王子是善良与丑恶的混合物，他象征着人类，但是随着时光推移，在侏儒潜移默化之下，他的丑恶本性占了上风。

1950 年,拉格克维斯特的代表作《巴拉巴斯》问世,这部著作使他在 195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书中的主人公是象征黑暗的强盗巴拉巴斯，他被判死刑，但是被上帝的化身基督所拯救释放，基督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要他改恶从善，而他却顽固不化，拒不接受人类可以相爱的哲理，最后基督在众人的热爱中离开人世，巴拉巴斯也孤独一人在充满仇恨的心理中悄然死去，作品表现了丑恶与善良冰炭不相容。

1956 年,拉格克维斯特完成了长篇小说《女巫》,女巫是一个可以在人与神之间沟通精神的人，虽十分富有，内心却和巴拉巴斯一样苦闷。

表现主义在拉格克维斯特的最后一部作品《玛丽阿奈》(1967)中更为明显。代表人类邪恶的男人赫鲁德生性暴戾，代表人类善良的女郎玛丽阿奈性情像天使般温柔，他们相爱后，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也变得顺和起来，然而玛丽阿奈始终无法突破他的自私与孤独，最后悻悻死去，而赫鲁德也沉湎于对她的怀念之中，忧郁苦恼不已。善与恶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在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俄国作家高尔基和丹麦作家尼克索的影响下，一大批人数颇多的工人作家也在瑞典涌现出来。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村中的雇工家庭,因贫困没上过几年学,从小当过工人、雇农,过着痛苦的生活，尝到过饥饿的痛楚和社会的冷遇。他们靠自学成才，作品大多采用自叙体裁，描写自己切身的悲惨遭遇，对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和压榨写得既具体细腻，又深刻生动。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下层人

民的疾苦和他们的觉醒。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有些无产阶级作家就已登上文坛,如马丁·考克(1882—1940),他虽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但初中毕业后曾学过四年油漆匠,是瑞典第一个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家,主要作品有描写劳资矛盾和反映1909年大罢工的长篇小说《工人》(1912),以及描写木材工人罢工斗争的小说《木材谷》(1913)等;马丽亚·萨恩德尔(1870—1927)是瑞典第一个女工人作家,处女作长篇小说《在饥饿线上》发表于1909年。《旋涡》(1913)也是一部长篇小说,描写斯德哥尔摩一家巧克力工厂女工们在大罢工年代的生活及斗争;丹·安德松(1888—1920)既写小说也创作诗歌,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个无家可归的人》(1918)、《大卫拉姆的遗产》(1919)以及诗集《烧炭工之歌》(1915)、《黑色民谣》(1917)等。这几位工人作家是瑞典第一代无产阶级作家,到了30年代,工人作家的作品更多更出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学潮流。

维尔海姆·莫贝里(1898—1973)生于瑞典南部斯莫兰省一个土地贫瘠的小村里,自幼在农田里劳动,十一岁到玻璃工厂做工。他的作品格调浑厚,笔力遒劲,语言朴实纯正,能运用自如地使用各地方言,使得书中人物栩栩如生。主要作品是移民四部曲:《外迁者》(1949)叙述19世纪40年代斯莫兰省尤德教区佃农奥斯卡夫妇在女儿惨遭洪水溺毙后为生活所迫决定移民美国;《迁入者》(1954)叙述来自瑞典尤德教区的农民终于来到了新大陆,在明尼苏达定居下来;《开拓者》(1956)叙述瑞典尤德教区来的农民三年后建设起一个繁荣的小城镇,盖起了教堂、学校,生活日益富裕起来,奥斯卡一家也家道小康,日子过得很好;《寄给瑞典的最后一封信》(1959)是叙述美国南北战争和明尼苏达印第安人起义冲击了这个安乐的小城镇,奥斯卡的妻子产后死去,奥斯卡在战火中丧失了大部分家产,又被一棵倒下的橡树砸伤而成了残疾,他十分思念故乡尤德,可是无法回去,终于郁郁寡欢而死去。儿女们打算发讣

告到瑞典去告知亲友，然而他们都已太美国化了，没有一个人能用瑞典语写出这封讣告信。莫贝里的这部杰作发表后在北欧和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已于 1970 年拍成电影。

伊瓦尔·鲁 – 约翰逊(1901—1990) 出身在瑞典中部舍尔姆兰的一个雇工家庭，父母都给地主扛活，每年从地主那儿得到微薄的实物报酬，生活十分困苦，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只上了一二年学就去给地主干活，以帮助父母养家糊口。

十五岁时,他离家独立生活,用外祖母给他的一点零花钱买了针线等小商品，当上了小货郎，骑着自行车沿途兜售商品。他气质浪漫,加上年轻没经验,生意做得一团糟,寻找‘ 诗和女人 ’的梦想没有实现，不过他看到了绚丽的大自然的美、人民的性格，自己也经受了磨炼。后来，他把这一段经历写入了他的第二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货郎》(1953)。

1925 年他因长期失业,只得背井离乡去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打短工，童年的苦难生活，青年时期的流浪生涯，使他饱尝了痛苦，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9 年,伊瓦尔·鲁回到瑞典,专心从事有关雇工生活的文学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晚安吧,大地》(1933)通过一个雇工孩子米格尔十七岁之前的生活遭遇，描述了整个雇工阶层的苦难和经历,写作风格十分近似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国王街》(1935)描写自耕农之子阿特里亚和雇工女儿玛塔怀着美好梦想来到首都斯德哥尔摩，以为首都财富俯拾皆是，但事与愿违，玛塔堕落成了暗娼，阿特里亚虽然当了建筑工人，但是只能勉强度日。《只有一个母亲》(1939)使他赢得了巨大的文学声誉,小说描述雇工女儿累亚十八岁赤身在河里洗澡，引起非议。后来雇工亨里克娶了她，对她十分粗暴，动辄揍她，累亚由于痛苦婚姻以及困苦生活的折磨，过早离开了人世。瑞典文坛以往一直由“ 大人先生们 ” 占领，作品主人公不外乎是地主、贵族、商人、官员、牧师、小城市的居民或学生

等。而伊瓦尔·鲁以经济和社会地位均在最底层的雇工为主人公的一系列作品使“小人物”登上了瑞典文学舞台,打破了“大人先生”一统文坛的局面。伊瓦尔·鲁把雇工世世代代所受的苦难和凌辱朴实而有力地展现出来，不但擦亮了雇工的眼睛，也赢得了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同情和支持。1945 年,瑞典政府正式宣布取消“雇工制度”,伊瓦尔·鲁的创作变成改造现实社会的力量，为瑞典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1945 年以后,伊瓦尔·鲁的创作进入第二阶段，即自传体小说创作。他逆当时流行在北欧文坛上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传体文学潮流，尝试用“我”这一滴露珠去反映整个社会。他一共发表了八部自传体小说,包括《文盲》(1951)、《货郎》(1953)、《斯德哥尔摩人》(1954)、《记者》(1956)、《作家》(1957)、《社会主义者》(1958)、《士兵》(1959)和《无产阶级作家》(1960)。这些自传体小说，不只是对个人和生活的描述，而且是对社会现象的揭示，作品的主人公不只是“我”,而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他在《斯德哥尔摩人》中,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缩影,用幽默的笔调,对 20 年代瑞典社会中各色人物,工人、店员、学者、诗人、政府官员、议员、社会活动家乃至外国侨民都作了生动的描述，绝妙地讽刺和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上种种恶习和弊病，它出色地再现了 20 年代瑞典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气氛。

从 1968 年到 1972 年,伊瓦尔·鲁先后发表了包括《受难者》(1968)和《撒谎集》(1971)在内的七部短篇小说集，在写作技巧上，他一反以往的真实叙述，而使用浪漫或类似黑色幽默的手法，他的这些短篇独树一帜，打破了长期以来瑞典短篇小说暗淡的局面。1976 年以后，他又出版了四部回忆录。

伊瓦尔·鲁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共出版了六十余部作品,除小说外,还有游记、论文集等。他的作品意境深邃,爱憎分明。

埃温德·雍松(1900—1976)原名乌洛夫·厄尔纳尔,出身在北

部铁路工人家庭,他幼年时,父亲已经积劳成疾,久病不起。因贫穷雍松不得不去依靠叔婶过日子。 1914 年,十四岁的雍松外出流浪,在铁路沿线寻找各种苦活,当过流放木材的工人、锯木工人、机车上的火夫等,饱尝了底层人民的痛苦。在积极参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以后,他开始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火焰》和《我们的新时代》写诗,逐渐成为一个工人作家。

雍松的早期创作是富有时代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和市侩的卑鄙龌龊,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工人群众政治上的觉醒,如描写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尖锐冲突与斗争的《提曼斯和正义》(1925)、描写北部小城市教员生活的《黑暗中的城市》(1927)、写无名作家清贫生活的《回忆》(1928)和讽刺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的《离开哈姆雷特》(1930)等。

从 20 年代末期起,雍松开始吸取和模仿乔伊斯的意识流表现手法和纪德的'生活的横切面'的写作手法,如《对巨星堕落的评论》(1929)、《黎明中的雨》(1933)、《生活长久》(1964)和《走向沉寂的几步》(1973)等。他在这些作品中偏爱用主人公内心独白的方式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但独白又支离破碎,互不连贯,流于晦涩。作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卑劣、虚伪腐朽和残酷无情揭露得淋漓尽致,但又找不到解决社会危机的出路。

雍松的代表作是自传体长篇小说四部曲《乌洛夫的故事》。第一部《现在是 1914 年》(1934)描写他离开父母去依附叔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童年时即去当烧窑工,干笨重的劳动。第二部《这里有你的生活》(1935)描写他丧父之后成为锯木厂工人,并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第三部《切莫回头》(1936)写他在电影院里找到工作后,同名叫玛丽的姑娘恋爱的经过。第四部《青年时代的最后一局》(1937)描写他积极参加工会活动并开始走上创作道路。他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插进不少独立故事,内容上与自传体的本身毫无联系,这种在长篇小说中穿插许多短篇故事的写法曾一度在瑞典

文坛上引起广泛的争论,不少作家竞相仿效。

《夜间演习》(1938)、《士兵归来》(1940)和《克里隆三部曲》(1941—1943)都是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作品。其他还有历史小说《堤岸》(1946)、《玫瑰与火之梦》(1949)和《殿下的时代》(1960)等。

雍松一生共著书二十余部,他的作品结构严谨,描写细腻,语言凝炼,修辞清雅,在创作方法上不断探索和开辟新途径,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1974 年,雍松同另一位瑞典作家哈里·马丁松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

扬·弗里德高尔德(1897—1968)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雇工派"作家,出身于雇工家庭,放过牛,当过兵,做过小买卖,作品有长、短篇小说和诗歌,最重要的作品是自传体小说《拉斯·霍尔德》(1935)三部曲。莫阿·马丁松(1890—1964)是 20 世纪 30 年代工人女作家,幼年丧父,母亲是工人,从小饱受贫困和虐待之苦,1929 年她和当时尚未成名的哈里·马丁松(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结婚,从此走上写作生涯。主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母亲结婚了》(1936)、《教堂婚礼》(1938)和《国王的玫瑰》(1939),这些作品描写她悲惨的童年和瑞典工人阶级的苦难。

阿格内斯·封·克吕森谢娜(1894—1940)是瑞典 20 和 30 年代重要的女作家。她出身于瑞典极有声望和富有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个军官，她从小聪明好学、观察敏锐。这位名门闺秀不顾门第悬殊，热恋文学和戏剧评论家戴维·斯帕雷昂尔,他出身于既不富裕又无社会地位的小工场主家庭，比她大十四岁。两人于 1921 年结婚。为此，克吕森谢娜和家庭闹翻。她痛恨贵族上层社会的腐朽没落，而同丈夫及其周围人的交往又使她深刻了解平民阶层的处境，这对她的生活及创作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汤尼书》(三卷本,1922—1926)、《冯·帕伦小姐们》(七卷本,1930—1935)和《贫困的贵族》(四卷本,1935—1938)是克吕森谢娜

最重要的三部长篇小说。这三部巨著描写了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瑞典工业化进程中的没落和颓废，以及这个没落阶层中的妇女的命运：她们有的被强制婚姻逼得精神失常而死去，有的则为争取自主婚姻和自身权利而进行积极斗争。作者着重揭露和鞭挞贵族的堕落、腐朽和精神的空虚颓废，对上流社会的虚伪丑恶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嘲讽，而对贫苦的下层人民则寄予深切同情。克吕森谢娜擅长塑造女性形象，尤其是贵族小姐和女佣形象，她们个性突出,真实感人,这在瑞典文学作品中极为罕见。

克吕森谢娜的早期作品笔锋犀利辛辣，因刺痛了上层名流而引起轩然大波，她一再受到围攻，她中年迁居欧洲大陆后，她的作品从争取妇女婚姻自主转向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探索两性关系，注重描写性觉醒和性挫折。

克吕森谢娜在短短的一生中共著有十五部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巨著外,还有长篇小说《海莱娜的第一次爱情》(1918)和《埃斯特夫人的供膳寄宿小旅馆》(1927),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佣的笔记》(1923)、《路上的事件》(1929)和《嗓音甜蜜的姑娘维维》(1936),诗集《女修道院》(1937)等。

20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是瑞典诗歌高潮迭起的时期。诗歌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主义。

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有哈里·马丁松、阿图尔·隆德克维斯特，女诗人卡琳·鲍耶(1900—1941)和贡纳尔·埃盖洛夫(1907—1968)等。

哈里·马丁松(1904—1978)是瑞典知识分子进步社团‘火炬社’于 1929 年组织的一个命名为“五个年轻人”诗社中的重要成员。

马丁松六岁丧父,母亲遗弃了他到美国去谋生,他由瑞典公共福利机关交给收取最低报酬的农家来领养，他在养父母家得干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还挨打受饿，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剥削和虐待，常

常离‘家’出走,他渴望得到家庭温暖,幻想着能飞向大自然,飞向大海。这一切在他的著名自叙体长篇小说《荨麻开花》(1935)和《出路》(1936)中都有极为详细和生动的描述。

1919年，十五岁的马丁松离开瑞典在外国轮船上当司炉工、水手,在德国、法国漫游,乃至漂洋过海,到印度和南美洲等许多地方流浪漂泊,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却在各国的‘社会大学’中学习锻炼。长期的流浪，苦难的经历，再加上异国情调和海洋风光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散文《无目标的旅行》(1932)和诗集《再见吧,好望角》(1933)对他这一段的经历作了叙述。

长篇小说《通向钟国之路》(1948)中的主人公鲍里是一个用手工做卷烟的工人，他不喜欢机器，喜欢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是一个漂泊不定而又与世无争的流浪汉。他在瑞典各地流浪，帮人用手工做卷烟，有时也帮人干农活，饱尝了辛酸和痛苦，但是也欣赏到了夏季农村瑰丽的景色。这位具有哲学气质的流浪汉鲍里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这部作品使他在国内的声誉和地位大为提高，而且使他成为北欧乃至整个欧洲的重要作家。1949年，马丁松作为第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被选为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十八院士之一。

马丁松是一位才思敏捷又多产的诗人,诗作浩繁,他在诗歌创作中成就卓著，他的诗作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对童年和以往经历的回忆,如他的第二部诗集《诺尔美》(1931)中的《回忆的列车的摘录》和《倾听者》等;二是对海洋、大自然景色的感情抒发,如第一部诗集《鬼胎》(1929);三是从科学和哲理的角度去探讨人生,如1956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阿尼阿拉》,它描述了由于人类的愚蠢招致地球的毁灭，而侥幸有八千个难民逃上了阿尼阿拉号宇宙飞船，想乘着飞船逃到一片能够活下去的礁石上，但是飞船上导航仪器失灵，难民全部死亡，飞船载着尸骸向天琴星座方向翱翔飞驶。1959年这首长诗被改编成歌剧，至今仍屡演不衰，成为当代瑞典

的经典作品。

马丁松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作品有诗集、长篇小说、随笔、游记、剧本和广播剧等,1974 年"因他的作品通过一滴露珠反映出整个世界"而同瑞典另一位作家埃温德·雍松分享诺贝尔文学奖。

贡纳尔·埃盖洛夫(1907—1968)的父亲是证券经纪人。他早年在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波斯语和梵文,后来兴趣转向音乐。他是 20 世纪瑞典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处女作《迟在人间》(1932)是瑞典第一部超现实主义诗集,发表后引起文坛轰动,使他一举成名。60 年代出版的狄文三部曲:《狄文胜过埃姆冈的爵爷》(1965)、《法托梅的故事》(1966)和《去冥间的指路牌》(1967)旨在探讨生与死、人与现实的关系。其他诗作有:《悲伤与星星》(1936)、《摆渡歌》(1941)、《关于秋天》(1951)和《一个声音》等。

卡琳·鲍耶(1900—1941)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上学期间,她参加了激进青年组织"火炬社",并为它的刊物撰稿。鲍耶由于对前途悲观失望,于 1941 年自杀身亡。她的作品反映出她向往美好生活而又难以实现的矛盾心理,是瑞典现代文学中一位重要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作家。她的作品有诗集《云》(1922)、《隐地》(1924)、《炉边集》(1927)、《为了这棵树而作》(1935),长篇小说《危机》(1934)、《太少了》(1936)、《卡洛卡恩》(1940)和短篇小说《清算》(1934)等。

阿图尔·隆德克维斯特(1906—1991)出身于瑞典南部农民家庭,靠自学成才。他长期在瑞典各大报纸,如《斯德哥尔摩日报》、《每日新闻》等任文化版编辑,他又是瑞典最重要的文学杂志《波尼尔文学杂志》的文学评论员。1968 年他被授予斯德哥尔摩大学名誉博士,同年又被选为瑞典学院院士,曾荣获过许多文学奖,如瑞典文学大奖(1963)以及两次获取贝尔曼诗歌奖(1964、1982)等。

隆德克维斯特是瑞典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作家。20 年代起就从事诗歌创作,共出版了二十余部诗集,他受法国超现实主义

和美国文学影响较深，十分推崇加缪、乔伊斯和劳伦斯。他把大量英、美、法等国现代派作品译成瑞典文，把瑞典的现代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他主张诗要给人们以‘生活的崭新旋律’。他的作品描写的大多是喧闹繁杂的现代化城市生活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工业化速度。诗集《黑色的城市》(1930)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还主张诗要给予情欲的欢乐和享受，因此关于情欲和性爱的诗也占有一定篇幅。他的主要诗集有:《灼烬》(1928)、《夜之桥》(1936)、《动物和神之间的诗》(1944)、《生命如小草》(1954)、《风逆火》(1955)和《眼睛中的生活》(1974)等。

40 年代起，隆德克维斯特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转为悲观主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较多地从事游记和小说的创作。他酷爱旅行,除欧洲诸国外,还曾到过拉丁美洲、苏联、澳大利亚、古巴和中国等地。游记作品有《黑人国家》(1949)、《变化着的龙》(1955)和《古巴是这样生活的》(1965)。论文集有《大西洋的风》(1932)、《美国的新作家》(1940)和《阅读成果》(1973)等。此外他还编著了《欧洲文学史 1918—1939》(1946)、《美国伟大小说家》(1962)和《拉丁美洲的叙事艺术》(1964)。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开展和战争的爆发,瑞典时兴一种类似中国 30 年代国防文学的‘战备文学’。作家们或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或是站在捍卫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立场上，义愤填膺地声讨德国法西斯，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家们的民族感情、爱国主义精神和锄恶除暴的正义感跃然于纸上，有些作家,如埃温德·雍松还抨击瑞典政府的亲德中立，要求政府挺身而出参战反抗。“战备文学”不失为瑞典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在‘战备文学’中,不少是出自大师之手的名作,如拉格克维斯特的《侏儒》、《绞刑吏》以及《没有灵魂的人》(1936)雍松的《克里隆三部曲》、《夜间演习》和《士兵归来》伊瓦尔·鲁的《晚安吧,大

地》(1933),马丁松的《现实死亡了》(1940)等。

莫贝里的历史小说《今宵驰骋》(1941)可以说是一部十分出色的战备文学作品。书中写了1650年克里斯蒂娜女王时代,德国贵族并吞了瑞典的土地，勃兰德布尔村沦为德国的采邑。村民们被德国地主奴役得走投无路，拉格纳·斯维吉(瑞典的谐音)率众奋起反抗，但是被人暗算出卖。斯维吉虽然被捕，在火刑柱上当众壮烈牺牲，但是反抗德国贵族的地下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第四节　杰出的女作家温塞特

1905年,瑞、挪联盟解体,挪威五百年来在政治经济上先是臣属丹麦，后又从属于瑞典的状态彻底结束了，成了一个独立的君主国家。独立后的挪威，随着水力资源的开发、铁路的兴建，工业飞速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文学上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同丹麦和瑞典一样，挪威也涌现出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以及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如诺达尔·格里格、奥斯卡·勃拉登(1881—1939)、鲁道尔夫·尼尔森(1901—1929)、克里斯托夫·乌普达尔(1878—1961)以及约翰·法尔克贝格等。勃拉登是挪威第一个描写奥斯陆工人区东恩德的贫苦人民生活的作家。作品有描写女工生活的长篇小说《工厂周围》(1910)、《闺房》(1917)、《狼窝》(1919)和《玛蒂尔达》(1920);短篇小说集《奥斯陆的故事》(1935)剧本《这个孩子》(1911)。尼尔森以写诗为主,内容以友谊、团结、革命为主,主要诗集有《在多石的土地上》(1925)、《再会》(1926)和《平常日子》(1929)。乌普达尔的小说《工头》(1914)和《教堂建筑者》(1921)通过对一个工会领导人的描写,叙述了自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的工人运动和矿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小说创作方面,这一时期分为两大派 乡土文学派和心理文

学派。随着工业发展和小农经济的解体，作家们怀念田园生活，乡土文学随之兴起，主要作家有乌拉夫·杜恩等。心理文学派是在现代心理学派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一派的创作特点是以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为主，代表作家有女作家温塞特等。

1940 年，德国法西斯出兵进攻挪威，挪威人民奋起抗战，在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攻击下，挪威战败，被德国纳粹占领，国王和政府官员逃到英国，组成流亡政府，继续抗德。挪威人民在法西斯统治下没有屈服，拿起武器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挪威爱国作家和诗人们用他们的笔揭露法西斯的惨无人道，反映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讴歌人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这些用血和泪凝聚而成的作品成为抗击法西斯、动员人民、保卫祖国的有力武器，主要作家有诺达尔·格里格、贡纳尔·雷斯－安德森(1896—1964)和韦索斯等。

约翰·彼得·法尔克贝格(1879—1967)出生在挪威特洛德拉格南部的洛鲁斯矿区。这是一个自 18 世纪中期以来就进行开采的矿区，矿区内有不少来自瑞典和德国的矿工，因此在这个矿区里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法尔克贝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父亲虽是一个矿工，但酷爱文学。当他还在孩提时，父亲常为他朗读左拉的作品。他从十一岁起就当矿工，一直到二十五岁才离开矿井，从事写作。几百年来，法尔克贝格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一地区，因此，他喜欢自称为"山里人"。他的作品大多以山区的风土人情为题材，真实地反映了山区民众的艰苦生活和文化习俗。长篇小说《第四次守夜》(1923)、《克里斯蒂安努斯·塞克斯图斯》(三卷 1927—1935)和《晚上的面包》(四卷本，1940—1959)通过对一个矿的发展历史的描述，详细而生动地反映了矿工的生活和斗争。此外，他还著有长篇小说《黑黝黝的群山》(1907)、《终年积雪》(1908)、《雅思凡尔德的里斯贝特》(1930)等。

西格里德·温塞特(1882—1949)的母亲是丹麦人，父亲长期担任博物馆馆长，是挪威考古学界的知名人士。她十一岁时，父亲亡

故，家道骤然中落。温塞特只得放弃原先学绘画的打算去当一个小职员以谋求生计。长期单调乏味的小职员生活使她备感孤寂、沉闷。她开始接近宗教，从正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来探索人生的意义,剖析人和社会的关系。在这十多年里,温塞特利用公余闲暇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有本国的,也有英国、德国的诗歌和中世纪作品,以及民间的传说等。

她在 1907 年发表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玛塔·奥莉夫人》。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品,如长篇小说《幸福的年龄》(1908)、《珍妮》(1911)、《春天》(1914)和《镜中人》(1917)等。这些富有伦理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大多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人公，写她们或是婚姻不如意或是另有所恋而深感苦闷和不满现实。她们想冲破社会习惯势力的束缚和道德观念的羁绊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结局不是受骗被弃就是失败灰心，最后都没有得到幸福。温塞特认为妇女必须以家庭为归宿，日常生活琐事中无不包含着幸福。她主张妇女只有留在家庭中，使家庭和睦、子女成长才是幸福。由于这一成见,温塞特早期的作品虽然构思细腻入微,文笔流畅秀美,但社会影响不大。

温塞特之所以一举成名,享有世界声誉,是因为她写出了几部十分优美的、反映古代北欧人民生活的小说。《屠夫约特和维格蒂丝》(1909)探幽入微地刻画了维京时代也即北欧海盗时代北欧男子的凶悍恣睢、无法无天、动辄以命相搏的野蛮性格,同时也写出了当时的女子在横遭强暴之后不甘忍气吞声、誓死报复的飒爽气概。

温塞特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克丽斯汀·拉芙朗斯多蒂》(1920—1922)三部曲,该书共分《花环》、《主妇》、《十字架》三个部分,用白描的遒劲笔法,朴实无华地叙述了 14 世纪北欧人民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她成功地刻画出克丽斯汀这个中世纪妇女的形象。她热烈追求爱情，力求摆脱社会习惯势力的束缚。这部作

品一直被视为挪威和世界文学中的珍品之一，至今仍为北欧和世界读者所喜爱。

此后，温塞特皈依了天主教，致力于写作宣扬宗教的论文和哲理小说，如长篇小说《赫斯特岬湾的乌拉夫·安德逊》(1925)、《乌拉夫·安德逊和他的孩子们》(1927)、《燃烧的灌木丛》(1930)、《伊达·伊丽莎白》(1932)、《忠诚的妻子》(1936)以及长篇历史小说《桃乐赛夫人》(1939)等。在这些作品里她进一步提出对人类有能力在地球上建立善良的社会的怀疑，并声称，人性已经腐化堕落至极，只有积极信仰上帝方可洗清罪恶。这些作品对当时的风尚习俗、迷信思想、饮食男女，甚至对子女的抚养教育都写得十分周全，情节动人，但读来也不乏道德说教之感。

温塞特是位正直的作家，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憎恶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40 年纳粹德国入侵挪威之后，她同其他一些爱国作家一起，毅然亡命。她先到瑞典，后经苏联、日本，漂洋到美国。她用笔为武器动员人民抗击入侵者。她写出了爱国主义色彩浓郁的随感集《回到未来》(1942)、《在挪威的愉快日子》(1942)。这些书吐露出她眷恋可爱的故乡的情愫、对国破家亡的忧愤，情绪之惆怅抑郁，读来令人心酸。她还写过一本自传体小说《十一年》(1934)，这部小说以明快的笔调描叙了她父亲对她的培养熏陶，是一本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1928 年温塞特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因为她对中世纪北欧生活的强有力的描绘”。

考拉·萨恩德尔(1880—1974)原名萨拉·法勃立西厄斯。父亲曾在法国海军当过中尉，后来是挪威海军军官。母亲是农村穷牧师的女儿，由于生活所迫，才嫁给了比她大十八岁的父亲。父母不如人意的婚姻生活，自幼在萨恩德尔的心灵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萨恩德尔出生于克里斯蒂尼亚城(今奥斯陆)，但是在她十二岁时，父亲陷入经济困境，债台高筑，不得不举家由首都迁至北部偏僻的

小城市居住。萨恩德尔二十五岁时只身前往巴黎学习美术。为了赚取生活费用，她为挪威《晨报》撰写旅行通讯。此后她一直为挪威的报纸杂志写文章，以赚取微薄的稿费资助家用。她在巴黎居住十五年，1939 年后一直定居在瑞典，在挪威居住的时间并不长。

妇女的婚姻问题是萨恩德尔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她的作品主要描写婚后男人对妇女的专横霸道，而女子即使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得不到谅解，结局往往是女主人公郁郁寡欢悲伤地死去，但也有愤而挺身争取自由的。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多半性格温柔，胆小怕事，在出嫁前听从父命，婚后则服从丈夫。萨恩德尔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了《阿尔蓓蒂》三部曲，作品描写了女主人公幸福的初恋如何横遭干涉而演变成痛心的悲剧，以及没有爱情的不和谐的婚姻所带来的精神痛楚。《阿尔蓓蒂和雅可布》（1926）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在她四十六岁那年发表，主要描述阿尔蓓蒂在北极圈小城市里的童年生活 第二部《阿尔蓓蒂和自由》（1931）描写阿尔蓓蒂在巴黎当模特儿，爱上了一个男子，但她却同另一男子结了婚 第三部《只有阿尔蓓蒂》（1939）描述阿尔蓓蒂当艺术家的经历，在贫困逼迫下，她只好回到挪威开始创作小说。

萨恩德尔的其他长篇小说还有《克朗家的点心铺》（1946）、《不要买唐迪》（1958）等。此外，她还发表了大量描写妇女生活、呼吁男女平等和反对大男子主义的短篇小说，如《蓝沙发》（1927）、《多谢啦，医生》（1935）、《暗处人影》（1949）、《我们烦恼的生活》（1960）和《热爱道路的孩子》（1973）等。

塔尔耶·韦索斯（1897—1970）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受教育不多，曾上过成人学校。1929 年他购置了一个小农庄，以务农为生。他自幼酷爱文学，劳动余暇便从事创作。1923 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后，连续写出了不少取材于本地山水和人物、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短篇小说和诗歌。1928 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黑马》。这部描写一个拥有四匹快马的驭手的小说，虽然在揭露社会问题和人

物心理方面的功力远不及他后来的作品深厚,但已初露锋芒,成为当年畅销书，深受好评。以挪威北部农家孩子克拉斯·德尔高特一生经历为主线的四部曲奠定了韦索斯在挪威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四部曲包括《父亲的旅行》(1930)、《西格里特·斯塔尔布鲁克》(1931)、《不知名的人》(1932)和《心倾听着乡音》(1938),描述克拉斯一生所经受的坎坷磨难以及家庭纠纷，然而他没有气馁沮丧，毅然担负起艰苦重任，并同家庭成员和睦相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韦索斯不得不放弃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转而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巧妙的隐喻和寓意表达他对法西斯的憎恶和对抵抗运动的支持。 1940 年他发表长篇小说《萌芽》,象征性地展示邪恶势力煽起人类间的仇恨,而人类的天职则在于抗拒野蛮和暴虐，迎接未来的解放。长篇小说《黑暗中的房子》(1945)把挪威喻为一幢处在黑暗和暴风雨冲击下的旧屋。风雨虽然冲击得旧屋嘎嘎作响、摇摇欲坠，然而始终未能将它摧毁，屋里的居民尽管担惊受怕却仍能处变不惊、顽强抗衡。作者此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晒布场》(1946)、《塔》(1948)、《信号》(1950)等作品,题材有所不同,描述人类之间的正邪两股势力的冲突较量，最后正义战胜邪恶。然而韦索斯笔下的善良、正直的人们并非都是无畏无惧、所向披靡的英雄。面对非人的野蛮，人们手足无措，恐惧害怕，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抗。小说以人物的心理变化描写见长。

战后,韦索斯的作品题材更为拓展,还写有一些爱情小说,如《春夜》(1954)、《鸟》(1957)和《火》(1961)等。韦索斯是战后享有国际声誉的挪威作家，被公认为是挪威当代文学的象征。他的有些作品曾获意大利国际文学奖及北欧理事会文学奖。韦索斯也是挪威现代新诗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出版过多部诗集。

诺达尔·格里格(1902—1943)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其兄是挪威著名的出版商。诺达尔·格里格本人当过记者。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他由于德国法西斯侵占挪威而投笔从戎,在 1943 年 2 月 2 日乘坐英军飞机参与轰炸柏林,在空战中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格里格是挪威近代文学史上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对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深切同情。第一部诗作《在好望角的周围》(1922)和长篇小说《船在航行中》(1924)都描写水手们惨痛的命运。《溪流中的石头》(1925)和《挪威在我们心中》(1929)是两部充满爱国热情的诗集，热情地歌颂挪威雄伟的大好河山和为挪威的繁荣做出贡献的劳动群众——水手、渔民和邮递员等。

1927 年格里格作为记者来到中国,发表了《在中国的日子里》(1927),其中有一篇《梅兰芳》,记述了他第一次看我国京剧的体会,文中可以看到他对我国戏剧的喜爱,对我国戏剧大师梅兰芳的尊敬。从这一年开始,他的创作转向戏剧,发表了《一位青年男子的爱》(1927)、《巴拉巴》(1927)和《大西洋》(1932)等剧作。前两部剧作获得较大成功,但《大西洋》一剧不太成功。1932 年至 1934 年他侨居在苏联。这一段生活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不久他写出了三个极为成功的剧本：以谴责挪威商人为获取暴利对劳动群众进行残酷剥削为内容的《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荣誉》(1935)、《但是,明天……》(1936)和《失败》(1937),批评了西方的和平主义,而以巴黎公社为背景的《失败》是最受欢迎的作品。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1937 年 6 月他应邀出席马德里作家代表大会。大会以后,整个夏天他就待在炮火连天的西班牙,深入到前沿阵地，在硝烟弥漫中采访了国际纵队和在其中战斗的北欧人,并发表了《西班牙之夏》(1937)这是一篇纪实文学,记载了他的印象和经历。1940 年 4 月 9 日德国法西斯军队不宣而战,以闪电战术突然对挪威首都奥斯陆和其他两个港口重镇发动偷袭，挪威军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终因德国兵力和武器占有绝对优势而失败。就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诺达尔·格里格一方面率

领士兵抗击敌人，一方面用他的诗歌和电台讲话来激励挪威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战。这一时期的诗作有《1940 年 5 月 17 日》、《挪威的好年景》、《国王》和《希望》等。他在《希望》一诗中吼出了"希望必将赢得胜利！"这些作品如同他初期的作品一样充满对挪威的无限热爱，但语言更为激昂、奔放，富有战斗性。

格里格的其他作品还有评论英国诗歌的论文集《青年之死》（1932）和长篇小说《但愿世界年轻》（1938）等。

西古尔德·胡尔（1890—1960）在大学时曾攻读自然科学和法律，当过教员、文学评论员和出版社编辑等。他的作品以青年人为主人公，以爱情为题材，讽刺资产阶级婚姻关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夏日阳光下的罪人》（1927）、《没有东西》（1929）、《十月的一天》（1931）、《通向世界顶端之路》（1933）、《夜霜之前的十四天》（1935）。在二次大战中纳粹占领挪威，他发表了抨击法西斯的历史小说《世袭钢》（1941），引起纳粹分子极大不满，胡尔不得不于1943年逃到瑞典，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继续活动。战后他还创作了《我爱上了另一个人》（1951）、《回顾被遗忘的岁月》（1954）和《通天塔脚下》（1956）等。此外，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玻璃山上的公主》（1939）以及论文集。

阿诺尔夫·厄弗兰德（1889—1968）的父亲是技师，他本人在大学时攻读人文学，当过记者。第一部诗集《孤寂的节日》（1911）和第二部《一百把小提琴》（1912）写青年人的孤独感。《我对你念咒》（1934）、《红色阵线》（1937）和《告诫挪威人民》（1940）是抗击希特勒的诗篇，引起纳粹不满，因此他于 1941 年被捕并于次年被关进集中营。他不顾生命危险，继续创作热爱祖国和讴歌生活的诗作，战后收集在《我们已经幸存》（1945）中。其他诗集有《回到生活》（1946）、《渔夫和他的灵魂》（1950）、《门后之剑》（1956）和《生命的瞬间》（1965）等。此外，厄弗兰德还著有短篇小说集、剧本和论文集等。

海尔吉·克罗格(1889—1962)的父亲是一个官吏,母亲是挪威第一个女大学生。他在大学时攻读社会经济学，曾任记者、文艺评论家。他的创作深受萧伯纳的影响，也继承本国剧作家易卜生和海贝格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和心理分析的传统，作品多是讽刺戏剧。剧本《伟大的我们》(1917)反映不平等的工资制。《雅尔的房屋》(1923)是部社会问题剧，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罢工工人和顾主之间的斗争。克罗格在挪威工人运动激进主义领袖欧林·法尔克的影响下，使他同诗人厄弗兰德、小说家胡尔一起成为挪威文坛的“激进三巨头”，发表了一些着重探讨妇女在性和男人社会中的地位的剧作。代表作《决裂》(1936)描写女主人公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毅然抛弃了欺骗她的丈夫。《贝壳》(1929)和《在路上》(1931)都是以妇女和男人社会之间争端为主题的剧作。

1929年至1949年间,克罗格还出版过几部以《意见》为题的论文集,就文学、宗教和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如:《关于书籍和作家的意见》(1929)、《关于许多事物的意见》(1933)和《意见文学、基督教、政治》(1947)等。其他论文集还有《肺腑之言》(1954)和《说实话》(1956)等。

英厄·哈格鲁普(1905—1985)是一位以写反法西斯诗作和情诗闻名的女诗人,她的《他们烧掉了我们的家园》等诗,在二次大战期间，不但揭露了法西斯的残暴，而且激励北欧人民去更坚强地战斗。直到今天，当有人问起北欧人在二次大战中有什么反法西斯诗歌时，有的北欧人便会朗诵起英厄·哈格鲁普的这些诗篇来。她的反法西斯诗集《更远》于1944年在瑞典出版。她的情诗主要有《我迷失在森林中》(1939)、《逃到美国去》(1942)、《第七夜》(1947)、《你愿意这样要我》(1949)、《梦之书》(1955)、《随风而去的诗》(1958)和《心灵的弹坑》(1964)等。此外,她还著有儿歌、广播剧和三卷本的自传体小说等。

尼尔斯·约翰·鲁德是挪威小说家。1908年出生于挪威东部

林萨克尔,父亲是个售货员,但他早年丧父,十五岁外出工作,当过工人、记者等。1932 年起担任《工人周刊》(后改为《人人周刊》)的编辑，一直担任了近五十年之久，为很多有才华的作家提供帮助和发表作品的机会。在德国占领挪威期间，他一度被捕入狱坐牢。

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我们要一个孩子》(1933)描述小职员在经济危机中的穷困生活，把爱情看做一个社会道德问题来写。他的长篇小说《我不是一个无产者》(1935)是挪威写工人的最佳小说之一。长篇小说《狩猎和妇女》(1939)、《人,鼓起勇气吧》(1940)和《推动着的边界》(1941)歌颂热情、淳朴和酷爱大自然的妇女,谴责自私自利、缺乏忠诚和感情的男人。三部曲《自由之子》(1947)、《降临节中的妇女》(1948)和《我们是土地的爱好者》(1949)是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混合的作品，以农村为背景，描写战争和自然、爱情和人际间的矛盾。

他还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能手,主题同长篇小说类似,但技巧更为娴熟。他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都收集在《短篇选集》(1972)中。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家中，他是既写成人作品又写儿童作品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儿童作品有《在惊险的森林中》(1955)等。

他的其他长篇小说还有《寻找了你十八年》(1958)、《向着你梦想的地方去》(1978)和《古老农村庭院中的回声》(1982)等。

他的前期作品属批判现实主义，后期转入象征主义。

第五节　冰岛文学开始走向世界

20 世纪头十年冰岛在制造业、渔业和贸易方面出现飞速发展,从而使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以商人和船商为主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1900 年,城市人口只有九千人,而到 1915 年城市人口猛增到两万

人。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他们主要在渔业加工厂工作。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影响日益加强，农民们为了保持同资产阶级的抗衡力量，也成立了合作协会，工人们也于 1916 年成立了工会，同年组织了海员大罢工。

20 世纪初的冰岛以传统诗和新浪漫派诗以及戏剧为主，内容从鼓动民族独立转向描写国内社会问题和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冲突。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有女诗人霍尔达，笔名厄诺尔·贝纳迪克斯多蒂·比尔克林德（1881—1946），其诗作音乐感强，主要作品有《诗集》（1909）等。这一时期的剧作家有约翰·西古尔永松和古德蒙德尔·卡姆班。

随着社会发展，工业增长，1920 年以后冰岛的诗歌出现转折，从新浪漫派转向现实主义。著名诗人有霍伊塔达尔的斯坦芬·西古德松（1887—1933）和达维德·斯坦芬松（1895—1964）。前者的诗作有《流浪者之歌》（1918）和《神圣的教堂》（1924），后者最重要的诗作有《黑色的羽毛》（1919）以及《诗集》（1922）、《敬意》（1924）和《新诗集》（1947）等。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冰岛出现了四位小说家贡纳尔·贡纳尔松、克里斯特曼·古德蒙德松、索尔贝尔古·索尔查松和哈多尔·拉克斯内斯。他们的作品使冰岛的现代文学享有世界声誉。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期，冰岛出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新文学的文学社团“语言和文化”，索尔查松和拉克斯内斯都是这个文学社的成员。

约翰·西古尔永松（1880—1919）是 20 世纪初期重要的剧作家，他用冰岛文和丹麦文创作，但他的剧作都在丹麦发表。他最著名的剧作《山里的埃温德和他的妻子》（1911）根据冰岛民间传说写成，叙述女主人公哈拉宁愿放弃农庄、丢弃孩子，跟着一个自己钟爱的男人——一个贼，一起生活而成为一个逃犯。最后当哈拉感到自己的爱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她就走向狂风暴雪之中，让自己

死去。这个剧作获得巨大成功，不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演出,而且还在英国和美国上演。《愿望》(1915)是一出‘浮士德’式的作品，描写一个名叫洛夫特的学生希望自己能驾驭一切邪恶势力。他的其他剧作还有《龙格大夫》(1905)和《说谎者》(1917)等。

古德蒙德尔·卡姆班(1888—1945)曾在哥本哈根学习哲学、文学和戏剧。他是仅次于西古尔永松的重要剧作家，同西古尔永松一样，用丹麦语和冰岛语进行创作。最初两部剧本《哈达·帕达》(1914)和《国王的争斗》(1915)属新浪漫派戏剧,以爱情为题材。1915 年至 1917 年他在纽约居住，此后他的创作转向现实主义。他对社会问题,尤其对犯罪心理和惩治手段的效果感兴趣,发表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和谴责资本主义垄断的剧本和长篇小说，如剧本《大理石》(1918)和《我们这些谋杀者》(1920)以及小说《拉格纳尔·芬松》(1922)等。其他还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斯卡尔霍尔特》(1930—1934)和描写发现格陵兰和美洲大陆的长篇小说《我看到了一个伟大而美丽的国家》(1938)等。

贡纳尔·贡纳尔松(1889—1975)出身于佃农家庭。1897 年至 1939年他居住在丹麦，在此期间，他用丹麦语创作了四十余部作品,每部作品的内容都涉及冰岛。在当代冰岛文学中,除 195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克斯内斯外，贡纳尔松是最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一般是多部曲长篇巨著，内容大多是对往昔事件的回顾或是历史题材的小说。

贡纳尔松第一部小说《鲍里家族史话》(1912—1915)是四部曲,描写冰岛岛内的工业化和陈旧的农民观念之间的冲突,深刻揭露了丹麦对冰岛在经济上的残酷压榨以及冰岛人民渴求摆脱丹麦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他的第二部六卷本长篇巨著《山上的教堂》(1923—1928)描写一个名叫乌吉·格雷帕松的农家子弟成为作家的生活道路,这实际上是作者本人的经历,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而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

1929 年,贡纳尔松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黑鸟》,展示 19 世纪初暴力与情欲、命运与罪孽交织的画面。他还发表了大量历史题材的小说,如《登陆》描写 870 年挪威海盗首先在冰岛登陆定居的故事,全书计划出十二卷,从 1918 年至 1952 年出版了七卷小说。

1939 年贡纳尔松回到冰岛居住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荒野的悲哀》(1940) 和《安魂弥撒》(1952) ,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贫苦农民在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中的困难和问题。《海边奏鸣曲》 (1954)是一部描写人与自然、土地关系的长篇小说。

贡纳尔松还著有诗集、论文和九部短篇小说,其中最有名的短篇小说集是《基督降临节》(1937) ,在美国极为畅销。

贡纳尔松的作品以分量重和题材广见称,在创作艺术上,他沿袭冰岛古代埃达和萨迦的英雄史诗的传统,采用平铺直叙的白描手法。

克里斯特曼·古德蒙德松生于 1902 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冰岛的爱情》(1926)是用挪威语创作的,作品发表后使他一举成名。接着他又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有描写爱情的《第一个春天》(1933)、自传体小说《白色的夜晚》(1934)、《新娘的礼服》(1927)和《生命之晨》(1929) 等。此外,他还发表过一部诗集《克里斯特曼诗集》(1955)和三部历史小说:《圣山》(1932)、《女神与公牛》(1937)和《红雾》(1950—1952)。《红雾》叙述了冰岛古代埃达中的序曲诗。

古德蒙德松的作品是冰岛作家中被译成外国文字最多的作家之一,共被译成三十六种文字。他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的作品较为肤浅,属消遣性作品。

索尔贝尔古·索尔查松(1889—1974)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己务过农,捕过鱼。他的论文集《致劳拉的信》(1924)是一本社会、哲学著作,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教会。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两部

自传体小说:《冰岛贵族》(1938)和《怪人》(1940—1941),这虽是两部写实主义的作品,但内容充满想像和奇人怪事。

哈多尔·奇里扬·拉克斯内斯(1902—1998)是冰岛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原名哈多尔·古兹永松,出身于首都雷克雅未克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后来务农,在首都附近经营拉克斯内斯农场。他三岁时,父母把他带到农场,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那里的一草一木、朴实勤劳的农民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便以农场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

由于家庭清贫,拉克斯内斯很小就辍学。十七岁时用冰岛文发表第一部小说《自然之子》(1919)开始步入文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到欧洲大陆旅游、侨居,接受德国表现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于 1923 年在卢森堡皈依天主教。《来自克什米尔的织工》(1927)是他的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他这一段时间的内心苦恼和骚乱,是部自传体小说。1927 年至 1930 年,他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旅居,目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尤其看到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工人中迅速传播,受到极大震撼,思想上产生变化,最终抛弃宗教,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

1930 年,拉克斯内斯回到冰岛,居住在首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此后十年间,他接连发表了三部多卷本长篇小说,这三部杰作不但确立了他在冰岛文学中的地位,也是对世界文学"红色的三十年代"的重要贡献。这三部作品是:《莎尔卡·瓦尔卡》(1931—1932),它通过对渔家女莎尔卡·瓦尔卡面对渔村的贫困与黑暗,坚忍不拔,勇敢奋斗的性格的描述,深刻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工人的觉醒;《独立的人们》(1934—1935),这是拉克斯内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在抛弃宗教、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时期创作的两卷本长篇小说,它描写贫苦农民比亚图尔坎坷悲壮的一生和为自身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真实而又深刻地揭露了资本

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和残酷性;《世界之光》（1937—1940）,它描写19世纪冰岛一个穷苦的民间诗人在腐败的社会中悲凄地度过一生的惨痛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占领了冰岛,拉克斯内斯对此极为反感，发表了几部以冰岛人民遭受异族统治时期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歌颂自由和民族独立,歌颂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作品为总称《冰岛之钟》（1943—1946)的三部曲,其中包括《冰岛之钟》（1943)、《聪明的姑娘》（1944)和《哥本哈根的火光》（1946)。小说借17世纪冰岛人民反抗丹麦统治的事迹,鼓舞冰岛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48年,拉克斯内斯发表了一部以现代政治为题材的小说《原子站》,它通过对一个大企业家、国会议员家中孩子们酗酒、偷盗和淫乱的描写,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生活方式对冰岛青年的毒害,抨击了美国文化对冰岛传统文化的侵蚀,猛烈地反对冰岛上层人士出卖祖国利益、把冰岛变为美国原子站的叛卖行径。1954年他又用同样的题材发表了剧作《银色的月亮》。长篇小说《布雷克科特村编年史》(1957)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汉松,他有音乐才能,决心将来献身艺术事业,他经常把自己对人生的理想和音乐的热爱向著名歌唱家霍尔姆倾诉,但是,不久他明白了霍尔姆的世界性声誉完全是靠诡计和广告巧妙的吹嘘赢得的。此外，拉克斯内斯还发表了具有反战意向的《歌颂英雄的萨迦》(1952)和追求幸福和人生价值的《重新赢得的天堂》(1960)的长篇小说，以及回忆自己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三岁期间的重要经历和评述世界各地生活、文学、艺术和政治概况的自传体小说《诗人的时光》(1963)等。

拉克斯内斯是位多产作家,作品除长篇小说外,还有随笔、论文集、戏剧、短篇小说和诗歌等。他在艺术上勇于创新,批判地继承了冰岛古代史诗的艺术传统,善于通过渲染、烘托、暗示、嘲讽和独白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品抒情、幽默,创造了现代冰岛文

学独特的风格。冰岛许多作家大都用挪威语和丹麦语进行创作，而拉克斯内斯一直坚持用本民族语言——冰岛语来描写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为冰岛新一代作家树立了榜样。1955 年"因为他在作品中所流露的生动的、史诗般的力量，使冰岛原已十分优秀的叙事文学技巧更加瑰丽多姿"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1998 年 2 月，拉克斯内斯去世，冰岛政府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国葬。

第六节　多种流派在芬兰竞相争艳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是芬兰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城市人口增加，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劳资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沙皇俄国加紧对芬兰控制，并于 1899 年发表旨在取消芬兰独立自主的"二月宣言"，这一举动激起芬兰人民的强烈不满，导致了 1905 年的全国大罢工。在大罢工期间，芬兰形成两股敌对武装势力，一股为红色赤卫队，得到俄国革命力量的支持，另一股是白色近卫军，受到德国的帮助。

芬兰自 1809 年起一直在俄国控制之下。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成立苏维埃政权，12 月，芬兰立即宣布独立，得到苏维埃政权的承认。芬兰无产阶级为了建立革命政权于 1918 年 1 月 27 日在首都起义，革命迅速扩展到南部广大地区。资产阶级的白色近卫军在德国支持下向首都进攻，战争进行了三个月，红色赤卫队战败，大批赤卫队员被杀或被监禁。

20 年代，芬兰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颁布了教育法、信仰自由法和禁酒法等，经济出现较快增长。但是到了 30 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芬兰经济也出现萧条。二次大战期间，芬兰同苏联发生了战争。芬兰国内法西斯势力抬头，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但是一些进步作家仍支持反法西斯斗争，组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思想的文学社团——“基拉社”,它的中坚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是20年代成立的“火炬社”成员。这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在文学中都得到反映。

这一时期,即20世纪初至40年代,有三种文学流派活跃在芬兰文坛上:一是从19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新浪漫派，它由一些爱国青年作家组成，代表作家是诗人雷诺。二是1909年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它的特点是继承芬兰文学中接近大自然的传统，主人公是普通人，往往是穷苦的小人物；主人公的人生价值由其血统和社会关系来决定；不管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是个人的,非社会的,甚至是反英雄的;对人民生活的描写既现实又幽默。这一派的代表作家有西伦佩等。三是现代主义文学,又称“新的一代”,它是在欧洲现代派影响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主要流行在用瑞典语创作的芬兰瑞典语文学中，这种现代主义文学在芬兰出现的时间早于任何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作品以诗歌为主，特点是主题内容广泛，无韵无律，运用新隐喻和新的语序。代表作家是女诗人舍德格朗。

除了以上三种流派作家外，在芬兰文坛上还有一批工人作家。芬兰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一批工人作家脱颖而出。他们发表富有战斗性的诗篇，创作描述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小说，上演社会道德问题的剧本，翻译外国进步著作。在芬兰文学史中，创作关于工人题材的作品的作家，即使有的出身于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也归纳到工人作家之中，但是在这些工人作家中，绝大部分，即三分之二的人出身于工人家庭，由于贫穷没有上过几年学，主要靠自己刻苦努力，自学成才。在大罢工斗争中，工人作家经过磨炼，因而大罢工后工人文学相当繁荣。他们的作品生动活泼，不拘泥于形式，充满激情。但是芬兰的工人文学没有形成一股潮流,1918年国内战争后，由于赤卫队失败遭到镇压，工人作家有的被杀或被逮捕，长期受监禁，有的则流落到国外，工人文

学遭到严重挫折。

埃依诺·雷诺(1878—1926)是芬兰文学史上最享有盛名的诗人之一，素有当代芬兰诗歌的奠基人之称。雷诺出身于职员家庭，父亲是地质勘测员，母亲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哥哥是19世纪现实主义诗人,这对雷诺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雷诺十七岁时考入赫尔辛基大学,第二年发表第一部诗集《三月之歌》(1896)。大学毕业后在《日报》和《赫尔辛基新闻》任戏剧和文学评论员。雷诺一生著有小说、戏剧、评论、散文和诗歌,《埃依诺·雷诺全集》共有十六卷,诗歌只占五卷,但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当首推诗歌。

雷诺早期的诗歌热情奔放，充满对美好理想生活的追求，如《三月之耿》、《夜纺女工》(1897)和《一百零一首歌》(1898)等。1905年芬兰爆发全国大罢工，他发表了一百余篇诗歌和评论文章,讴歌芬兰工人斗争,热情支持俄国十月革命。1905年以后,雷诺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妻子突然离异,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创作的诗歌格调低沉,充满忧伤 晚年作品主题大多是死亡,反映了哀伤失望的情绪,如《盛开的丁香花》(1920)等。代表作为叙事诗《降灵节的圣歌》(1903),是一幅反映芬兰民族气质的图画。

雷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芬兰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他的诗歌节奏感强,语言精练优美,想像丰富。

弗朗斯·埃米尔·西伦佩(1888—1964)出身于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于1908年考入赫尔辛基大学攻读数学和生物学。由于经济困难,中途被迫辍学,以文学创作谋生。他的作品以反映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为主,对他们的疾苦怀有深厚的同情。他擅长人物的心理刻画,自然景色的描绘,使人物和景物水乳交融,富有艺术感染力。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大多以悲剧结束，成为命运的牺牲品。

长篇小说《赤贫》(1919)描写一个名叫尤哈的佃农,生活困苦,被卷进战争旋涡,最后惨遭杀害。《少女西丽娅》(1931)描写一个贵族出身的少女,因家庭破产,父母双亡,只得外出帮工,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这两部长篇小说是西伦佩最重要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生命和太阳》(1916)是西伦佩的处女作,是一部描写青年人爱情生活的长篇小说。他创作的其他长篇小说还有《赤贫》的续篇《海尔杜和拉纳尔》(1923),小说描述尤哈的女儿海尔杜给人帮工，被少爷诱奸后投水自尽。另外还有《一个人的道路》(1932)、《夏夜的人们》(1934)和《八月》(1941)等。

此外,西伦佩还著有短篇小说集《河底》(1933)和《第十五》(1936)以及回忆录《年轻的岁月》(1953)等。

1939 年，西伦佩“因他对其国家农民的深刻了解和他刻画农民生活、农民与大自然关系时所运用的精湛技巧”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沃尔特·基尔皮(1874—1939)在 20 世纪初发表了三部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长篇小说:《巴塞巴》(1900)、《帕西弗尔》(1902)和《安蒂奴斯》(1903)以及一部散文集《人和生活》(1902)。这三部长篇小说成为学校里教授新浪漫主义文学的教材，而他的散文集则是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书。此后三十年,他默默无闻,专心致志地在奥堡的芬兰大学图书馆工作。 1933 年他重返文坛发表了一部描写家乡库斯塔夫塔岛上农民和海员生活的两卷本长篇小说《在阿拉斯塔洛的大厅里》,洋洋九百页描写了 1860 年芬兰西海岸农民聚集在一起讨论购置一艘新船的故事，整个故事发生在六小时之内,作者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运用内心独白和倒叙等手法进行创作,描写细腻生动。不久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村子里的小人物们》(1934)和长篇小说《到教堂去》(1937)等。

米卡·瓦尔塔里(1908—1979)出身于赫尔辛基一个教师家庭,自幼酷爱文学,少年丧父后即常向各种周报投稿,以菲薄的稿酬资

助家用。十八岁考入赫尔辛基大学文学系，二十岁出版长篇小说《伟大的空想》（1928），引起芬兰文坛注意，被誉为“天才作家”。《伟大的空想》写一个青年在悲观失望中奋发图强，逐渐成熟。他的前期作品大多反映青年人的爱情生活，充满浪漫色彩。

1929年瓦尔塔里获文学硕士学位，后任报纸和芬兰电台记者、文学评论员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芬苏两次战争使他由理想主义转向悲观主义，作品基调比较低沉，在创作上多以历史题材为主，借古喻今。他发表过多部杰出的历史小说，并以历史小说家蜚声文坛，主要有《从父亲到儿子》三部曲，它包括《一个男人和一场梦》（1933）、《灵魂和火焰》（1934）和《燃烧的青年时期》（1935）。另外有《陌生人来到农场》（1937）、《埃及人西奴海》（1945）、《米卡尔·路登福特》（1948）和《米卡尔·哈凯姆》（1948）及《约翰·安克洛斯》（1952）和《永存的土尔穆斯》（1955）等。《埃及人西奴海》是他的代表作，描写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以及对外发动战争、内部权力纷争。这部作品使他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赢得众多读者。

瓦尔塔里是芬兰当代全面而多产的作家，作品除长篇小说外，还有描写30年代妓女悲惨命运的中篇小说《金发女郎》（1946）。还有以一对青年人悲欢离合为内容，实际反映战争时期青年人的消极、悲观和绝望情绪的中篇小说《月球景色》（1953）以及推理小说《谁谋杀了克鲁尔》（1939）。此外，他还发表了许多剧本、电影脚本和诗歌等。

瓦尔塔里于1957年被芬兰总统任命为芬兰科学院院士，1970年成为土尔库大学名誉博士，1930年至1945年当选为芬兰作家联盟理事，1938年至1940年任该联盟主席。

本蒂·韩培（1905—1955）出身于贫困农民家庭，曾当过放木排工人和农业工人，是位靠自学成才的作家。1925年开始创作，一生共有著作二十余部，作品主人公大都是农民、工人和流浪汉，内

容以揭露劳资矛盾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主，作品富有讽刺和幽默感。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操场和兵营》（1928）、《当代》（1942）和《原子研究者》（1950）以及长篇小说《荒原战争》（1940）、《九个士兵的皮靴》（1945）和《面包》（1949）等。

托依沃·帕卡宁（1902—1957）同本蒂·韩培一样是芬兰30至40年代的重要作家。他们两人都没有上过多少正规学校，更没有在高等学府深造过，两人都是靠自己的勤奋与好学而成为作家，两人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两人的创作都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寻找素材。他们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当时的芬兰社会，对社会中存在的非正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他们的作品给予劳苦大众以深切的同情，对社会弊端和资本主义剥削本质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抨击。在创作风格上两人不尽相同，韩培以讽刺著称，而帕卡宁则是一个沉思者，对一切事物总要透过现象去探索其深层的社会因素。同韩培一样，帕卡宁也是1925年开始创作的，但是起初并未引起文坛注意，直到1932年帕卡宁发表了根据自己部分经历创作的、描述青年工人成长的长篇小说《工厂的阴影》这才一举成名，成为芬兰重要的工人作家之一。《祖国的海岸》（1937）是一部描写20世纪20年代末期港口城市大罢工的长篇小说。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黑色的狂喜》（1939）、剧本《恶魔》（1939）、短篇小说集《这个男人和红胡子的先生们》（1950）等。

晚年，帕卡宁计划出版描写他出生城市科特加的命运和历史的长篇系列小说，从1948年至1952年，他完成了《晨曦》、《同志们》和《胜利者和被战胜者》。由于脑溢血，他无法继续写作，只得搁笔。1953年，他战胜病魔，又创作了一部诗集和一部自传体作品《我的童年》。

帕卡宁和韩培这两位作家，在创作技巧上也许逊于老一辈的西伦佩和基维等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开阔了读者的眼界，为芬兰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

埃尔维·西内尔沃(1912—1986)是芬兰女小说家,但她也写诗和剧本。她出身于赫尔辛基一个木匠的家庭，是芬兰左派文化团体“基拉社”的成员。二次大战期间，她由于从事芬苏和平友好协会工作而被监禁。1945 年，西内尔沃加入芬兰共产党，50 年代末期脱党，此后，她陷入极度的悲观之中，一直居住在远离首都的偏僻地区。

长期的铁窗生活使西内尔沃深感‘做人十分艰难”这一思想也贯穿在她绝大部分的作品中。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巴拉瓦村的铁匠》(1939)描写了一个普通劳动者一生的艰难经历。她的代表作《换来儿瘸腿威廉》(1946)是部长篇小说,深受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影响，描写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最后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之后，西内尔沃还发表了小说、剧本和诗歌。中篇小说《同志,不要叛变》(1947)描述了她在狱中的生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芬兰共产党人在二次大战期间的艰难处境和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剧本《世界尚年轻》(1952)反映芬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艰苦英勇地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埃迪特·舍德格朗(1892—1923)是瑞典和芬兰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作家，对两国现代主义文学均有很大影响。

舍德格朗出生于彼得堡,并在那里的德国学校上学,父亲是个商人。1968 年她因得肺病到瑞士和芬兰疗养。在彼得堡上学和在瑞士疗养期间，她大量接触法国、德国和俄国文学，深受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她用瑞典语创作。处女作《诗集》(1916)着重感情描写,不拘格式,语言生动,引起文坛轰动。其他诗集有《九月的七弦琴》(1918)、《玫瑰祭坛》(1919)、《未来的阴影》(1920)等。诗集《不存在的国土》(1925)和《埃迪特书信集》(1955)是在她去世以后发表的。她在最后几年创作的作品中放弃尼采主义而转向探讨宗教问题。

哈加尔·乌尔松(1893—1978)是芬兰女小说家、戏剧家和文艺评论家。乌尔松出身于牧师家庭，曾就读于赫尔辛基瑞典高等商业学院。1922 年至 1974 年任北欧第一份现代主义文学杂志《极端》主编。她是芬兰瑞典语文学中重要的表现主义作家之一，处女作长篇小说《拉斯·托尔曼和死亡》(1916)充满悲观厌世情绪,而长篇小说《木刻家和死亡》(1940)开始对人类产生希望。《中国游》(1949)是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描述人类有能力利用自己的经验创造美好的生活。剧本《心舞》(1927)、《紧急信号》(1929)和《蓝色的奇迹》(1931)赞扬人类反抗社会现实、打破生活中的清规戒律的能力。剧本《强盗和处女》(1944)歌颂新老两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以及善与恶之间的斗争。

乌尔松其他的作品还有论文集《夜间的工人》(1933)和《我活着》(1948)等。她的作品生动紧凑，寓意深刻，对芬兰现代文学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曾获赫尔辛基市荣誉奖(1964)、雷诺奖(1965)和瑞典学院大奖(1966)。1969 年被授予赫尔辛基大学荣誉博士。

贡纳尔·比林(1887—1960)是用瑞典语创作的诗人。他曾在军事学校就读，涉足文坛较晚，三十五岁时发表第一部诗集《休息的日子》(1922)。他是一位注重实验的作家,试图摆脱传统语言规范，对瑞典语语法和词汇组合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创作风格受达达主义和德国表现主义影响，作品较为晦涩难懂。他的其他诗集有《十字架和诺言》(1925)、《太阳绿》(1933)、《我知道那是你》(1938)、《没有颠倒的面孔》(1939)、《不可救药》(1943)、《啊,有一天》(1944)、《事务》(1949)、《在你的眼中》(1954)和《你说的这些话》(1955)等。

卡特里·瓦拉(1901—1944)是位女诗人，参加芬兰左翼文学家组织，并且长期担任左派政治杂志的会计。她收入很菲薄，忙于写诗，年纪较轻时就染上了肺结核,1944 年当战争进行到最艰苦阶

段时，她终于因为经济拮据和肺结核的加重，在贫病交加中悲惨地客死在瑞典。

瓦拉是二次大战期间芬兰最著名的诗人，也是芬兰自由体裁诗的先驱者，因而在芬兰诗坛上曾经独步一时，并且对战后芬兰诗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她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伦佩等一起组成了左翼文学团体“火炬社”(或称为‘失望的浪漫主义’)。由于她曾经学过花卉描绘，因而她的诗作往往色彩鲜艳，充满鸟语花香，有时还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早期作品有诗集《远方的花园》(1924)、《蓝色的大门》(1926)和《渡口》(1930)。在她身染重病时还出版了两本诗集《回归》(1943)和《橡树在燃烧》(1942)。

第八章 20世纪二次大战后北欧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希特勒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偏隅欧洲北部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也卷进战争旋涡。但是在战争期间，这五个国家的遭遇和处境非常不同。挪威和丹麦经历了德国法西斯的占领、践踏和蹂躏；瑞典一直处于中立状态,没有遭受被占领之苦 芬兰同苏联进行了两次战争,即 1939 年 11 月的‘ 冬战 ’和 1941 年 6 月开始的‘ 续战 ”,芬兰均告失败 地处北隅的冰岛则先由英国出兵占领，后由美军代替英军进驻冰岛。

二次大战之后,随着冷战和扩军备战加剧,以爵士音乐和可口可乐为象征的美国文化像潮水一般涌入北欧各国，冲击着他们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一些知识分子感到悲观、害怕、惶惶不安,产生悲观情绪。有没有摆脱恐惧和苦恼的办法？人有没有出路？这些成为作家们探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欧美一些文学思潮的影响，存在主义便成了许多作家的信仰，现代主义成为北欧文坛上的时髦及主流，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也运用了不少现代主义表现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北欧出版的现代主义作品很多,佳作也不少,如瑞典哈里 · 马丁松的充满悲观色彩的诗剧《阿尼阿拉》(1956) 描写核战争造成世界毁灭，曾是世界文坛上引人瞩目的作品。

除了现代主义文学外,北欧战后不时仍有一些揭露法西斯、歌颂抵抗运动和反映战争残酷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出现，其作者大都是二次大战的目击者或参加者。他们之中有的是地下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有的坐过牢，有的在集中营里服过苦役。他们的作品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和构思，比起战争期间出版的作品来更为成熟，其深度和广度也更进一步。挪威作家约翰·博尔根的《在格里民监狱的日子》(1945)、达格·苏尔斯塔的战争三部曲（1977—1980)和丹麦作家汉斯·基尔克的《魔鬼的金钱》(1951)是北欧战后较为典型的反法西斯作品，它们揭露了法西斯的残暴，对被占领的挪威和丹麦的普通工人、家庭妇女、资本家、政府官员和挪奸、丹奸等各色人的心理状态和表现做了深入的揭示和刻画，对共产党人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领导本国人民向法西斯分子展开多种形式，包括武装抵抗在内的斗争做了细致详尽的描写。这些作品是挪威和丹麦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历史总结，是对法西斯主义罪恶的清算。芬兰现实主义作家万伊诺·林纳 1954 年发表的小说《无名战士》细腻而具体地描绘了 1941 年至 1944 年苏芬战争期间一个芬兰小分队的经历，作品一方面描述了士兵对战争的痛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对导致战争的祸根——战争狂人的批判。

20 世纪 60 年代北欧诸国经济发展较快，增长速度较高，以丹麦为例，由于政府实施工业改革和提高机械化程度的“合理化”政策,丹麦于 60 年代成为一个工业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工业为主，1963 年工业产品的出口在丹麦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产品的出口。从 1963 年至 1974 年生产每年平均增长 5%。随着经济发展北欧诸国于 60 和 70 年代先后进入“福利社会”。国际上,在中国的政治形势、越南战争以及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和法国大学生示威等影响下，北欧一些知识分子中出现左倾。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作品便大行其道，非虚构性的纪实文学和政治诗受到极大欢迎。

出身工人阶级的作家描写工人生活和劳动的作品在北欧文坛上又一次涌现，芬兰、丹麦和瑞典尤为突出，如芬兰的汉·萨拉玛(1937—1984)和丹麦的奥盖·汉森(1913—)等。但这批工人作家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以及对文坛的影响方面比起30和40年代的工人作家均逊色不少。

20世纪80和90年代以来,各种文学流派,如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奇幻文学等都活跃在北欧文坛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局面。但是与20世纪60和70年代不同的是,目前的各种流派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和借鉴,也就是说，目前一位文坛上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在创作时，他也会运用不少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丹麦女作家凯什婷·索若普就是这样一位十分典型的作家。

第二节　现实主义和奇幻文学并存的时代

自20世纪初至80和90年代期间,丹麦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学思潮，即现实主义文学和奇幻文学，这两种文学流派不时交替成为主流，有时两者同时主宰文坛。

自20世纪初期至今，现实主义三次成为丹麦文坛的主流，第一次产生于1900年左右,以约翰·舍尔德堡和耶普·阿克耶尔为代表。第二次高潮则以尼克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20和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福利社会”的出现,丹麦于60年代中期产生了第三次现实主义高潮，又称“新现实主义”运动,其代表作家为安德斯·博迪尔森和克里斯蒂安·坎普曼(1939—1988)。到了70年代，这一文学运动分为两股力量，一股是以工人作家奥盖·汉森(1913—)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工业高度发达、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给工人们带来的恶果；另一股力量是女作家们描述二次大战后

丹麦社会巨大变化中妇女实际面临的问题的妇女文学，如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离婚率上升、新家庭组成以及两性关系等等，最主要的代表作家有蒂阿·莫克和耶特·德鲁生(1943—)等。到了80年代，这些作家的作品受奇幻文学的影响较大，从维塔·安德生(1944—)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从80年代至今的丹麦文坛，奇幻文学占主导地位，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也十分活跃，这是一个各种倾向、传统和流派互相混杂的时代，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局面。关于奇幻文学，丹麦文学理论家认为，奇幻文学是一种打破形式束缚、因果关系不受理性拘束的文学。奇幻文学中的"奇幻"一词丹麦文为fantastisk，这是一种打破形式束缚、因果关系不受拘束的文学，虽然在丹麦词典上只有"现实主义"一词，而无"奇幻文学"的词条，但是在丹麦文学史上，这种文学是有其传统的，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作品。19世纪末期的雅科布森和后来的延森都有这类作品。20世纪30年代，女作家卡伦·布利克森用《七个神奇的故事》(1934)为题发表作品。《七个神奇的故事》的丹麦文为Syv Fantastiske Fortellinger，直接用了fantastisk一词。二次大战以后，有一批作家积极推崇布利克森，最重要的有马丁·汉森，他从民间故事中吸取营养，创作了虚幻想像性的作品，如《尤纳坦的旅行》(1941)和《幸运的克里斯托弗》(1945)等。50和60年代，随着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入丹麦，丹麦出现了更多的奇幻文学作品，主要作家有继承安徒生传统写童话故事、又深受卡夫卡影响的维列·舍伦森和斯文·霍尔姆(1940—)等。80年代的主要作家是斯文德森和伊勃·米凯尔(1945—)等。

现实主义作家中除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索若普、玛塔·克里斯登森等。存在主义作家有亨里克·斯坦格若普(1937—)。诗歌方面的主要作家有里夫贝里、英格尔·克里斯登森(1935—)、亨里克·诺德布朗特(1945—)和玛丽安娜·拉尔森(1951—)等。

卡尔·埃里克·索亚(1896—1983)是丹麦现代文坛上一位重要作家、戏剧家。他高中毕业后开始创作。处女作散文集《波斯的妇女》发表于 1923 年。此后不断问世的作品有舞台剧、广播剧、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散文等。他是位十分全面而又多产的作家。

散文《一位不速客》(1941)写一条大虫子厚着脸皮住在一个丹麦家庭中吃白食。他以这一虚构故事来影射德国法西斯对丹麦的占领,为此被纳粹逮捕,关押了两个月。

长篇小说《我的祖母的屋子》(1943)是半自传体小说,描写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及犯罪案件。主人公是个五岁的小男孩,作品内容充满幻想。《十七岁》(1953—1954)是索亚另一部重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描述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变幻莫测的社会中的各种心理和精神状态。

索亚最大的成就在戏剧方面,他创作了二十余部大型戏剧,是丹麦上演率最高的作家。他的剧本在北欧各国历演不衰,“自由意志还是命中注定”是索亚剧作中所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剧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现实主义作品,以传统的写实手法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问题。这类作品以喜剧为主,大都是讽刺喜剧。最主要的作品有《寄生虫》(1929),该剧描写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庸俗无聊和尔虞我诈;《查斯》(1938),揭露体育界将运动员当做商品买卖的丑闻。第二类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实验派戏剧,以非传统和非理性的眼光来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寻求自我和超越自我,如十四场喜剧《我是谁?》(1932)、《尼尔逊伯爵抛弃遮羞布》(1934)和《穿紧身衣的狮子》(1950)等。第三类是新现实主义戏剧,完全以与易卜生戏剧相悖的手法写作,描写一切事物的偶然性。这类代表作是由 1940 年至 1948 年上演的三部悲剧和一部讽刺剧组成的四部曲:《模式中的几个部分》(1940)、《两条线》(1943)、《三十年缓刑》(1944)和《自由选择》(1948)。

索亚后期的作品有电视剧《被遗弃的底层人物》(1965)和《一

封信》(1966)等。

索亚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大都描述丹麦小资产阶级生活,富于哲理,着重精神分析,语言幽默,被丹麦文艺评论界称为“好心肠的讽刺作家”。

汉斯·克里斯蒂安·布兰诺(1903—1966)出身于教师之家。他自小酷爱文学、戏剧。年轻时，他梦想当演员，曾跟随巡回演出队在丹麦各省演出，因失败不得不放弃演员生活。1923 年至 1932 年，布兰诺在哥本哈根一家书店担任书库主任，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为报纸写短篇小说，为电台写广播剧。

1936 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具》问世，引起公众的注意，在这部描写一家玩具厂的兴衰史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以象征主义手法隐晦而又尖锐地抨击了正在德国和意大利开始得势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以及独裁者把人当做玩具的变态心理。

布兰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海岸上玩耍的孩子》(1937)对人类的心理作了深刻剖析。长篇小说《梦想一个女人》(1941)使用了当时丹麦文学作品中还很少见到的长篇内心独白的形式，描写不同阶层的人所经历的四种生活经历，除了个人日常生活的危机之外，书中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共同危机，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兰诺写了大量短篇小说,出版过不少有名的短篇小说集，如《不久我们就要离去》(1939)、《瞬间集》(1941)和《二分钟静默》(1944)等。

长篇小说《骑士》(1949)的发表给布兰诺带来声誉，使他成为丹麦公众最喜爱的文学家之一。此后，他相隔多年才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如《没有人知道夜晚》(1955)等。

除小说外,布兰诺还写有剧本《兄弟姐妹》(1952)和论文集《沿着河边漫步》(1956)等。

布兰诺的作品主题大多是描写行动软弱无力的人类同充满强暴的大自然之间的冲突，以及人类遭致失败后陷入痛苦和失望的

心理。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一般多是男性，男性光凭阳刚之勇难以对付大自然的瞬间万变，并且不时坠入陷阱，因而需要女性的温柔、智慧和爱情来补充和支持。

马丁·阿尔弗莱德。汉森(1909—1955)出身于农民家庭,一直在农田里劳动到十八岁。 1931 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教员。1945 年在哥本哈根教育局任职并开始文学创作。 1949 年至 1951 年担任丹麦著名杂志《海莱蒂尔》编辑。

长篇小说《现在他放弃了》(1935)和《殖民地》(1937) 以其青年时代的生活为背景，描述农村中生产改革问题。第一部讲述一个反对改革的保守农民；第二部写改革后的农业生产情况。汉森在这两部作品里不仅描述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而且就人们应以什么思想来对待新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占领丹麦,汉森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是丹麦地下报刊的领导人。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两部作品《尤纳坦的旅行》(1941)和《幸运的克里斯托弗》(1945),他用隐晦、暗讽的手法抨击德国对丹麦的占领。《尤纳坦的旅行》是童话故事，叙述一个技术高超的铁匠把一个魔鬼关进一只瓶子后不知如何处置他。《幸运的克里斯托弗》是历史小说,描述 16 世纪上半叶一个年轻人濒临毁灭之际对生和死的探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毁灭的一代’的成员,汉森在作品中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二次大战后，他由于经受过锻炼，作品思想大为改变，以探讨生活中的善与恶为主，主要有《荆棘丛》(1946)、《鹧鸪》(1947)和《说谎的人》(1950)等。在《蛇和公牛》(1952) 中可以看到他赞美原始的北欧神话精神。

吐凡·蒂特兰夫森(1918—1976) 出身于工人家庭,由于家境清贫，她上学不多，主要依靠勤奋自学成才。她在哥本哈根一家公司担任职员并业余从事诗歌创作。 1937 年,她的散文诗《散文与诗歌》和长诗《写给我夭折的孩子》在《野火》文学杂志上发表,引起公

众的注意，使她名噪丹麦诗坛。她积极参加丹麦青年文学家俱乐部活动并且和《野火》杂志主编作家维·默勒结婚，自此以后，她和文坛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业余作家变为专业作家。

蒂特兰夫森不仅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而且是以擅长描写妇女问题著称的作家。她的诗作、长篇和短篇小说多半以妇女生活为题材，主人公也是妇女。她对女性的心理状态和感情变化洞察入微，她以特有的细腻而流畅简洁的笔法将之描绘得淋漓尽致。她在诗集方面的作品有《女孩子的心》（1939）、《小小的世界》（1942）、《闪烁的灯光》（1947）和《妇女的心》（1955）等。

1941 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人使一个小孩受害》引起丹麦社会的轰动。女作家以异常明快和大胆的笔法揭露了丹麦的一个隐秘而又严重的社会问题，即成年人对幼女的性侵犯。书中的女主人公童年遭人施暴凌辱的回忆像鬼魅般追踪着她，毁坏了她的正常生活，直到她在成年之后辨认出当初的施暴者并将他绳之以法，她才得以过正常的女人生活。

对不幸的童年的回忆也是蒂特兰夫森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她在作品中如实地反映了本世纪 20 和 30 年代哥本哈根贫民区的生活、悬殊的贫富差别，生活在最底层的城市无产者和贫民百姓，他们生性善良，正直而又乐观豁达，为糊口谋生而辛劳终日，这些作品有《童年的街道》（1943）和《保护儿童》（1946）等。

长篇小说《两个互相爱恋的人》（1961）被拍成电影 描写妇女不幸婚姻的自传体小说《结婚》（1971）和《维尔海姆的房间》（1975）在北欧获得极大的好评。

除了诗集和长篇小说外，蒂特兰夫森还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如《完全自由》（1944）、《法官》（1948）和《雨伞》（1952）等。

汉斯·谢尔菲格（1905—1979）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家私营企业的经理。1924 年中学毕业后，他在大学就读了几年后即从事绘画、创作和记者生涯。20 世纪 30 年代，在汉斯·

基尔克的影响下,谢尔菲格对政治十分感兴趣,并从 30 年代起为丹麦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撰稿。他的小说和论文以讽刺手法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弊。他最重要的作品是长篇纪实小说《弗林登霍姆堡》(1962)，这部小说尖锐而又深刻地揭露了二次大战期间丹麦被德国占领时丹麦不少机构和组织勾结纳粹,为非作歹的种种劣迹。《失踪的局长》(1938)和《被窃走的春天》(1940)是他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前者描述一位局长企图假装已经自杀来逃避公务和妻子以获得一种真正的自由生活，但结果没有成功，重又返回现实社会。后者叙述学生们在不合理的教育制度逼迫下，不得不死记硬背那些对他们将来工作丝毫没有用处的东西，以致使他们白白浪费青春和生命，作品把学生们受煎熬的感受描绘得既生动又深刻幽默。《理想主义者》(1945)和《蝎子》(1953)描写了在这种糟糕透顶的教育制度下必然会出现病态的、容易接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

哈尔夫坦·拉斯莫森生于 1915 年,同吐凡·蒂特兰夫森一样出身于工人家庭。十四岁失学，经受过长期失业的痛苦。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丹麦期间为地下出版物撰稿，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的诗篇，是二战期间在丹麦发表“地下”诗篇最多的一位作家。他的第一部诗集《士兵或人》(1941)描写他失业期间的苦闷。《占领期间的诗》(1945)和《短小的阴影》(1946)是描述丹麦抵抗运动和抗击法西斯的战斗诗篇。《为生活而屈膝》(1948)描述了在恐惧、犹疑和死亡阴影下的脆弱生活。《傍晚的乡村》(1950)描述了对一次新的战争的恐惧。《森林》(1954)是一部描述自然的诗集。《蠢话》(1969)是一部充满幽默的废话诗和童谣，深受读者的欢迎。他的其他诗集还有《看见九月的人》(1949)、《成年人的圣诞日程表》(1965)、《这曾经是这样的》(1975)等。此外,他还发表了关于希腊、格陵兰、越南的诗篇以及儿童读物等。

莱夫·潘杜鲁(1923—1977)是丹麦文坛上现代主义文学的代

表人物,作品以心理分析为主,着重对心灵受到创伤、精神处于崩溃的人进行刻画和分析。

潘杜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抗击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地下运动。1947 年至 1965 年在丹麦和瑞典任牙科医生。1965 年以后,弃医从文,作品有小说、舞台剧、广播剧和电视剧。第一部长篇小说《哎哟,我的金牙齿》(1957)描写小城市里的一个牙科医生。第二部长篇小说《走进传统》(1958)描写一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的心态,他逃离学校,逃离自己生活的城市,把自己关进一所疯人院里,拒绝过正常人的生活。《丹麦的蕨类植物》(1963)描写一个患有健忘症的四十岁的成年男子,为了尊严,拒绝接受别人为他安排的生活。《谬误》(1964)的主人公名叫马利乌斯,是一个患有疑病症的人,怀疑自己有病,他的不幸的遭遇引起人们的同情。《疯人》(1965)的主人公是个名叫莫尔纳尔的银行经理,他没有病,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由于他过分依赖外界的安全措施,又不能控制自己,却成了心理崩溃的牺牲品。《达尼尔的另一个世界》(1970)和《业余工作者》(1972)描写由中年人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与年轻人主张进行必要改革以建立起一种具有新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之间的差距和对比。他的其他长篇小说还有《窗口》(1971)、《这个粗心大意的情人》(1973)和《花粉热》(1975)等。除小说外,潘杜鲁还创作了不少剧本,主要有《再见吧,汤姆斯》(1968)、《贝拉》(1970)、《环绕塞尔玛发生的事》(1971)、《在阿达姆的世界里》(1973)和《露易丝的屋子》(1977)等。

彼得·西伯格生于 1925 年,出身于教师家庭。曾在哥本哈根大学攻读考古和历史,并于 1950 年获文学史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考古工作。自 1960 年以来出任维堡市博物馆馆长。1981 年到 1984 年出任丹麦作家协会主席。

西伯格说他只写出过一本真正言之有物的书,还说不想多占用读者的时间,但求读者念他的书时能偶尔点头嘉许,这就会使他

欣喜不已。抱着这样少而求精、宁缺毋滥的原则，他在创作中不断探索试验，发表了一些深受丹麦和北欧读者欢迎的作品。

长篇小说《低人一等的人》(1956)通过一名丹麦苦役犯的实地观察，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外国战俘在法西斯德国柏林电影厂充当苦役的情景。作品细腻地叙述了他们难以忍受的繁重劳役和恶劣的待遇，以及成为电影厂不准与外界接触的活道具、活牲畜的遭遇。这种遭遇造成了他们的绝望心理和低人一等的自卑感。长篇小说《鸟食》(1957)是一部充满象征主义的作品，探讨有意识的逃避主义。这部小说描写一位富翁捐赠给作家汤姆一笔巨额奖金，条件是作家能够真实地写出周围人的内心想法和他们的隐私。结果汤姆完全失败，因为人们大都言行不一，表里相悖。作品里有许多寓意深远但十分隐晦的比喻和象征，如作家的名字汤姆,丹麦语原意为‘空洞’。1962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探求》收集了十七个短篇，主题都是阐述关于不能从外界而必须从人类的特性中去探索纯正和统一、真理和现实等问题，表现手法也极抽象和荒诞。1970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牧羊人》讲述人人都对自己的问题束手无策但可以相互帮助来克服困难这一做人的哲理。短篇小说集《恐龙的午后》(1974)论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认为打破现行的社会结构的企图不利于社会进化。《缓期执行的争辩》(1976)以大量寓言、神话以及民间故事和真实文献串联，描写人的虚弱和渺小，但通过相互怜悯和容忍，有可能克服生活中的荒诞。长篇小说《在海边》(1978)是西伯格最轻松的作品，通过描写人们夏季周末在丹麦海岛上的度假生活，提出了人们在享受假日欢乐之时，是否真正自由自在的问题。

长篇小说《十四天之后》(1981)是一部由许多既独立又联贯的故事和散文组成的作品,它以 1927 年 11 月丹麦日德兰半岛上的一个车站小村为中心，追溯到一百年和一千年以前的社会情况。这部作品确立了西伯格在北欧文学中的地位，并于 1983 年由于这

部作品而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

维列·舍伦森生于 1929 年,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1947 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攻读哲学和心理学。 1959 年至 1963 年任《风中玫瑰》诗刊编辑。1965 年被遴选为丹麦学院院士,1962 年获丹麦学院文学奖;1974 年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1986 年获瑞典学院颁发的北欧特别文学奖。

舍伦森是丹麦战后最杰出的作家，也是影响最大的文学评论家。他二十四岁登上丹麦文坛，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奇怪的故事》(1953)。这一作品打破了当时丹麦文坛上抒情诗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拓展了散文体裁。作品问世后立即被译成英语，介绍到欧洲大陆和英国，对一位北欧作家来说，作品发表后立即被译成英文较为罕见。此后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无害的故事》(1955)和《监护者的故事》(1964)等。这些短篇包括童话、传说、神话、圣经故事和其他小故事。在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和安徒生童话启迪下，他的这些作品叙事巧妙，其中不少故事采用北欧传统的萨迦形式，即以讲故事的口头文学形式来叙述，笔调幽默、诙谐，深入浅出地对社会上不良倾向进行抨击和嘲讽。

舍伦森的论文集主要有《诗与魔鬼》(1959)、《过去和未来之间》(1969)、《没有目标— 有目标》(1973)和《来自中心的反叛》(1978)等,对文学、哲学以及社会、教育和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哲学上，舍伦森信奉尼采学说，却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他的作品既反映出激进的政治观点，也搀杂着尼采的一些哲学观点。

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学术著作《论尼采》(1963)和故事集《众神的毁灭》(1982)、《阿波罗的叛逆 不朽人的故事》(1989)等。

克拉斯·里夫贝里(1931—)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员。他在哥本哈根大学毕业后曾任《信息与政策》杂志的新闻记者和《风中玫瑰》诗刊的编辑。

里夫贝里是一位多产而又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不仅写抒情诗,也写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和文学评论。从 1956 年发表处女作到 90 年代初，他已出版了一百余部作品，平均每年发表两三部作品。他同时也是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文学评论家。

他以现代主义诗歌在丹麦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1956 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我行我素集》问世，讴歌人生需享受醇酒和美女的乐趣。1957 年第二本诗集《战后集》写出了战后年青一代焦躁紧张的心理和对异性的性欲追求,然而在《冲突集》（1960）中他不再沉湎于声色，唾弃了放浪形骸的生活，开始顺应时代的情感，愤怒地斥责了当代的物质享受主义，并且认真严肃地探索当今时代的发展方向。在《伪装集》（1961)中,里夫贝里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歌颂生的喜悦，此后他又出版了诗集《沃利埃莱》（1962）和《肖像集》(1963 等。

他还是个杰出的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安娜,我安娜》（1969）于 1970 年荣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其他长篇小说还有《恒久的童贞》（1958）、《歌剧爱好者》（1966）和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一张背转过去的脸》（1977）以及短篇小说集《其他的故事》（1964）等。

里夫贝里的戏剧《我们为什么活 》（1963）、《发展》（1965)和电影《周末》（1962）等曾在北欧国家演出和放映。

安德斯 ·博迪尔森(1937—)是 20 世纪 60 年代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通过对刑事案件的描述，以讽刺手法对社会时弊进行揭露和抨击。

博迪尔森出身于教授家庭。 1956 年高中毕业后在大学攻读经济和文学。1959 年起，他为哥本哈根一些大报当自由撰稿人。处女作长篇小说《在明亮夜晚的时刻》（1959）记述了他当学生和记者的经历。长篇小说《请想一个数字》（1968）和《意外事故》（1968）都是描写小资产阶级中的罪犯。其他长篇小说还有《别墅的夕阳》（1964）、《金钱和生活》（1976）、两部曲《美好的时刻——一年又一

年》(1977—1979)和《多米诺骨牌》(1984)以及短篇小说集《拉玛·萨玛》(1967)。此外,他还写过科学幻想小说《冰点》(1970)。

凯什婷·索若普(1942—)是丹麦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代表。1942年出生于丹麦中部菲英岛的一个小村庄里，家境比较贫寒，其父亲靠出售书报为生。她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做过各种零星工作，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和困境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生活的磨炼铸造了她坚强和执著的个性，为她日后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索若普的处女作是诗集《内部——外部》,发表于 1967 年,这部作品深受女诗人英格尔·克里斯登森的影响。第二年索若普发表了短篇小说集《今天的原因》(1968),这两部作品为现代主义的文 学 。

诗集《来自特里雅斯特的爱》(1969)和《今天是第一流的》(1971)以及长篇小说《宝贝儿》(1973)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作品。《宝贝儿》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着重探讨性和金钱的关系,其意图是向人们显示‘暴力行动是邪恶社会的症状”。索若普由于这部作品于 1979 年获国际佩加萨斯奖。

从 70 年代末期起,索若普的创作手法转向写实主义,其作品比过去更直接地批评社会,长篇小说《小约娜》(1977)和《长夏》(1979),通过对乡村姑娘约娜从十岁到二十岁生活经历的描述,反映了丹麦 50 和 60 年代农村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年轻人为摆脱乡村狭隘生活小圈子寻找自己生活道路、努力奋发的坚强性格。这两部作品是 70 年代丹麦文坛上典型的纪实性作品。80 年代她又发表了两部以约娜为中心的续篇:《天堂与地狱》(1982)和《最大限度》(1987)。这四部系列小说是索若普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

索若普的创作道路从抽象到具体,从实验到写实,但是无论她的创作手法如何变化,她所描述的主题都是一个,那就是广泛而深刻地描述妇女日常的、变化多端的生活以及她们的反抗企图。她以准确而细腻的手法表达了普通人的各种感情的会合与转换，她

继承丹麦优秀工人作家尼克索的传统，但是技巧更为精巧，更为大胆。

哈内·马丽亚·斯文德森(1933—)出生于丹麦北部风景优美的渔村斯卡根。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图书馆馆员。她于1958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文学系，此后曾在那里执教五年。1960年起在丹麦国家广播公司戏剧文学部工作，后又担任该部的副主任。

斯文德森是丹麦当代奇幻文学的代表，她继承了安徒生大众化的‘说故事人’的文学传统。以她最著名的小说《金球》(1985)为例，该作品写环境污染将毁灭世界，主人公是一位寻根问祖的讲故事的妇女，通过她同颈上挂着一只魔球的曾曾曾祖母的谈话，描写了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丹麦小岛上的居民四百年的历史。斯文德森在这部小说中不仅继承丹麦文学中源远流长的、突破时空界限的、民间故事的奇幻文学传统，而且深受当前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在《金球》之前，斯文德森发表过三部长篇小说：《玛蒂尔达的梦想之书》(1977)、《雾月下的舞蹈》(1979)和《狗鱼》(1980)以及一部短篇小说集《同上帝和魔鬼的曾祖母的谈话》(1982)。1985年以后，斯文德森还发表了长篇小说《火堆上的卡伊拉》(1987)和《太阳底下》(1991)以及短篇小说集《凯什婷的事以及鬼怪幽灵的故事》(1992)。此外，她还出版过儿童读物《这块红石头》(1990)、有关文学技巧的论文集和剧本等。

斯文·霍尔姆(1940—)是当代丹麦现代主义流派作家，出生于首都哥本哈根。他深受维列·舍伦森的影响，强烈地意识到西方存在着危机和矛盾。这种观点明显地反映在他的第一、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大敌》(1961)和《倒塌》(1963)里，它们描写一个坐落在悬崖上的教堂慢慢塌人大海的故事。散文集《我所心爱的人——一部样板小说》(1968)和《七情六欲》(1971)以人类的痛苦为主题，

为西方生活方式面临灭亡和心理上的崩溃提出解决办法。长篇小说《私生活》(1974)和《这座城市在遥远的地方同我的声音交谈》(1976)描写生活在哥本哈根的家庭和他们的私生活，而他们是崩溃瓦解的社会的受害者。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婚姻游戏》(1977)、《他自己的》(1979)、《啊,多美好啊》(1980)和描写 18 世纪西班牙历史的小说《阳光要代价吗 '》(1981)以及短篇小说集《在鲜血底下》(1988)等。

玛塔 · 克里斯登森(1926—)是一个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个教育家。她在辛勤创作、笔耕之余,还积极从事幼教事业。这使她有机会能广泛地经常接触各种类型的孩子和孩子的家长，这又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长篇小说《我们的伊雷娜》(1976)是一部描写妇女受压迫的现实主义小说。伊雷娜的父母是两个软弱无力、无所作为的人,但他们却迫使自己已成年的女儿去做不光彩的事情。他们像吸血鬼那样,把她的一切活力和自尊吮吸干净,把她当一个摇钱树去骗人钱财,敲人竹杠,而她却无力去摆脱父母的控制。《拉森夫人的一个星期五》(1977)也是一部揭示妇女苦难生活的长篇小说，女主人公拉森夫人同伊雷挪一样受到家庭的压迫。她妄图有自己的尊严，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但她的处境使她不得不成为强者手中的一个工具。和这两部作品有类似内容的长篇小说还有《市长正在睡觉》(1979)等。

她自 1962 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请善待雷梦德》至 80 年代，共发表十二部长篇小说，但均未受到公众太多关注。1987 年她的长篇小说《同里吉兹跳舞》使她获得' 书商金月桂树 '奖,成为丹麦国内家喻户晓的女作家。她的这部作品通过对处于艰难环境中的儿童、危机中的家庭的描述，反映了她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她是当代丹麦现实主义作家,善于运用倒述手法进行创作,她

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都是一些平民百姓，他们大多是平庸无能和软弱无力的人,如残疾人、孤单的人和受欺凌的人,她对妇女的苦难和受压迫的描写尤为深刻。她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和描写、对人物的刻画和对他们心理的细腻分析使她的作品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亨里克·诺德布朗特(1945—)曾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东方语言并经常居住在土耳其和希腊，曾从事土耳其诗歌和传说的翻译，著有游记《来自一位土耳其人的信》(1978)。

诺德布朗特是20世纪70年代脱颖而出的丹麦诗坛新秀，他的诗作不但发扬了丹麦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而且还有了进一步的创新。从1966年的处女作《诗集》到1989年,他一共发表了十六部诗集,主题以爱情、衰退和死亡为主,如《睡鼠》(1969)、《离开与到达》(1974)、《墨鱼的命运与其他爱情诗》(1975)、《玻璃》(1976)、《冰川纪》(1977)、《八十四首诗》(1984)、《我的手在十一月中颤抖》(1986)和《在陵墓底下》(1987)等。从他的《微笑》一诗中能见其诗风：

当我在梦中看到你
你转向我
一根手指贴在嘴唇上
扬起眉毛
微笑,然后你继续
轻盈漫步
穿过那被忽视了的
月照的房间
我忽然明白了

这即代表我的生活①

玛丽安娜·拉尔森(1951—)出身于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文学系，一面学习，一面创作。1971年她二十岁时发表处女作诗集《浓缩》,即引起注意。此后至1987年共发表了二十五部诗集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她的作品题材广泛，有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孤独和压抑，有的描述经济、政治和历史事件，内容既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又有对现实社会的批评、真切的描绘，语言简洁而富于变化。她以抒情诗见长，在同时代诗人中独具特色。主要诗作有《集中》(1971)、《插图说明》(1974)、《普通语言》(1975)、《行动》(1976)、《谁是敌人》(1977)、《每个人的力量》(1980)、《我头脑中的一个希望》(1981)和《直接》(1984)等。从她《黄昏》一诗中可略见她的诗风：

那个黄昏彻悟了一件事
薄暮的压抑何堪忍受
我记起湛蓝的白天
只在灯光耀眼的窗前
它才望而却步
黑刺李茶的清香熏人
我记起如鲫的路人
进出市廛店铺忙
他们下班回到家
肯定劳累得脸色发青
他们手拎购物提兜
弯腰曲背身体佝偻

①见《世界文学》1985年第3期,石默译。

倘若他们再弯得更低一点
岂非将会就此呜呼
我有了这个想法
不免毛骨悚然

拉尔森热爱中国文化，学过三年汉语，并把鲁迅的《狂人日记》、《野草》等作品译成丹麦文。

约翰·内姆(1934—)是丹麦 20 世纪 70 年代重要的工人作家。他同许多工人作家一样上学不多，做过童仆、长工、仓库保管员等各种活计，但他同别的工人作家不一样的是他很快脱离体力劳动成为专业作家。在自传体小说《寻找停泊地》(1976)和《神经分支》(1977)中对自己的经历做了详尽的描述。长篇小说《人从一扇大门走进》(1975)和《烟囱在哪儿冒烟》(1978)生动地描写了他所做过的各种活计。诗集《在中间的人》(1977)揭示了劳资矛盾。他还著有描写哥本哈根工人区各种家庭和工人业余生活的长篇小说《在靠阳光的一面》(1977)等。

第三节　报道文学在瑞典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由于保持中立,没有直接遭受战争苦难。瑞典人民也没有经历国破家亡的悲剧，但是战争中空前的残酷和破坏使得瑞典作家们惊愕不已。他们对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消灭、数不胜数的物质文明和财富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然而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却又无能为力，开始感觉自己渺小。二次大战以后，作家们看到东西方冷战对峙，二次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一场新的大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人们头上，他们感到失望、害怕，陷入了比 19 世纪末更深的疑惧和苦闷之中。他们不再致力于反映民族、宗教和人的价值问题,而转向对存在问题的探讨。

20 世纪 40 年代瑞典文坛以现代主义为主，作品大多有悲观厌世情绪。主要作家有拉斯· 阿林、斯蒂格 ·达格曼、卡尔 ·凡恩贝里(1910—1995)和威纳尔 ·阿斯本斯特罗姆(1918—)等。50 年代,诗歌十分繁荣,现代主义大师帕尔 ·拉格克维斯特于 1953 年发表了诗集《黄昏的土地》,哈里 ·马丁松的名诗——叙事长诗《阿尼阿拉》出现在 1957 年。此外涌现出了一批很有才华的新诗人。老一辈现实主义作家也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如维尔海姆 ·莫贝里的代表作移民四部曲中的三部和伊瓦尔 ·鲁 - 约翰逊的八部自传体小说都发表在 50 年 代 。

进入 60 年代后,瑞典的政治状况趋于平静,没有出现重大动荡。在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以垄断资本为主体的' 混合经济 '体制有了发展。超级大国依然对峙争夺,但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于是瑞典作家们松了一口气。60 年代中期，瑞典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文学— 报道文学。相当一批作家到亚非拉国家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一批真实反映这些地区状况的报道文学作品。这批从事报道文学的作家大都是 50 和 60 年代在文坛上有建树的人物。国际笔会中心主席彼尔 · 魏斯特贝的小说《在黑名单上》(1960)、女作家萨拉· 李德曼(1923—)的小说《我和我的儿子》(1961)等都揭露了南非种族主义统治，谴责种族隔离政策。中国的崛起也使瑞典作家受到鼓舞。扬 ·米尔达尔的《来自中国农村的报道》(1963)等长篇报道文学、剧作家吐尔 ·柴特霍尔姆(1915—2001)描写中国妇女翻身的剧本《上海的妇女》(1967)都成为国际上有名的佳作。中国的古老文化也成为瑞典作家发掘题材的一个领域。哈里 ·马丁松 1964 年写出了关于我国唐朝的历史剧《魏朝三刀》,斯文 · 林德克维斯特的《吴道子的故事》(1967）则是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60 年代末期，在欧洲群众运动浪潮的影响下，瑞典作家们深入到工厂、学校去体验生活,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一批' 非虚构性 '的报道或小说,例如萨拉 ·李德曼的《矿山》(1968) 真实地记录了矿工们

对自己的生活和问题的看法。彼尔·乌洛夫·恩奎斯特(1934—)用了四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写出了反映瑞典和苏联政府之间战后在遣返波罗的海国家国籍的雇佣士兵问题上的往返交涉和这些士兵到达瑞典后头八个月生活状况的《军团成员》(1968)。彼尔·乌洛夫·松德曼(1922—)的《安德烈工程师的空中之行》(1967)记载了三个瑞典人1897年首次乘热气球飞往北极之行。瑞典作家们还发表了不少以反对官僚主义为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往往从真人真事的大量素材摘录成篇,作家只是书中露面或者不露面的叙述者,彼·克·耶舍尔德发表的《我们相见在湄公河上》(1970)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品。

1970年前后,一部分瑞典作家对历史题材发生浓厚兴趣,他们认为必须了解历史方能更好地分析现状,准备未来。斯文·台尔勃朗克(Sven Delblanc,1931—1992)的《赫德比村小说》(1970—1976)和凯什婷·埃克曼(Kerstin Ekman,1933—)发表的《巫婆舞圈》(1974)等四部曲都是著名的历史小说。自60年代初以来一直关注国际政治事件、以撰写报道文学为主的女作家萨拉·李德曼(Sara Lidman,1923—)自70年代末期起再次把作品的主题转向自己的出生地瑞典北部诺尔兰省,发表了描述家乡历史的五卷本系列小说。另一部分瑞典作家着重发表揭露官僚主义、批评瑞典政府政策的作品,如彼·克·耶舍尔德(Per Christian Jersild,1935—)的《巴贝尔的房子》(1978)和拉斯·古斯塔夫松(Lars Gustafsson,1936—)的《墙上的裂缝》(1971—1978)等。

20世纪70年代,瑞典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也涌现出一批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工人作家,他们同30年代工人作家一样,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上一代的穷困农村、工业化进程、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产生及壮大,他们也描写当今社会中的产业工人、水手、载重卡车司机和退休工人的生活状况,如贡纳尔·阿道尔夫松(Gunnar Adolfsson,1906—1983)的《出生在我们的峡谷里》(1970)

和《鲍夫尔师傅的玻璃作坊》(1974)、卡尔·鲁内·诺德克维斯特(Karl Rune Nordkvist,1920—)的《夜路》(1970)、埃里克·约翰松(Erik Johansson,1914—)的《在工厂围墙背后》(1978)以及扬·福格尔贝克(Jan Fogelback,1943—)的《公交公司》(1977)等。

70 年代的瑞典诗歌以后现代主义为主，但并不繁荣，主要诗人有拉斯·诺林(Lars Noren,1944—)、尤让·苏内维(Goran Sonnevi,1939—)和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1930—)等。

70 年代后期"愤怒派""抗议派"的报道文学盛极一时,其主题大抵是揭露瑞典国内的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或者报道第三世界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等。到了 70 年代末,这类作品影响衰落，大有一蹶不振之势。纯文学仍然是方兴未艾，深受欢迎。享有盛誉的伊瓦尔·鲁-约翰逊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青春期》(1978)、《沥青》(1979)。

80 年代以来的瑞典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的局面，以现代主义为主，但现实主义等其他流派也十分繁荣。在 80 年代,瑞典文坛上还出现了一股撰写自传体小说潮流，如扬·米尔达尔(Jan Myrdal,1927—)关于自己童年的三部小说《童年》(1982)、《另一个世界》(1984)、《十二之后是十三》(1989)以及斯文·林德克维斯特(Sven Lindqvist,1932—)的《一个爱人的日记》(1981)和《一个结过婚的男人的日记》(1982)等。

此外,新秀辈起,出现了不少清新隽永的佳作。

拉斯·阿林生于 1915 年,是 40 年代步入文坛的重要作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同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他出身贫寒，亲戚中又有不少人在 30 年代经济危机中失业，在各地流浪寻找活计谋生。这些人物都成了阿林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身上带着宣言的托伯》(1943)是根据自己 30 年代失业时的经历写成的。作品描写的是 30 年代的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流浪汉托伯，因为找不到职业而

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到处流浪,按照《宣言》所说,工人必须做工才能表明他的存在,而托伯虽然尽力为就业奋斗,却仍然不能表明他的存在,因而极其苦闷,后来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淡薄下来，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阿林还写有长篇小说《我的死是我的》(1945)、《如果》(1946)、《市场帐篷之夜》(1957)、《树皮和树叶》等,短篇小说集《没有人理睬我》(1944)、《囚犯的欢乐》(1947)和《房屋没有附属建筑》(1949)等。1961 年发表《树皮和树叶》后阿林沉默了二十年,1982 年才同其夫人合作发表了文学界普遍认为是他最杰出的长篇《胜利者汉尼巴》。此后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第六个口》(1985)、《看守人之火》(1986)和《你生活的果实》(1987)等。

埃里克·林德格伦(1910—1968)是瑞典 20 世纪 40 年代诗坛的重要代表。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1930 年他高中毕业后就读于斯德哥尔摩高等学校,常为《波尼尔文学》杂志、《每日新闻》等撰写文学评论。1948 年至 1950 年任帕里斯马出版社主编。1962 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他曾荣获过多项文学奖，如小诺贝尔文学奖(1954)和瑞典文学大奖等。

林德格伦的第一部诗集发表于 1935 年,但并未引起公众注意。之后,由于他同阿图尔·隆德克维斯特和芬兰瑞典语文学中现代派诗人相识,他也开始创作现代派诗歌。1942 年他自费出版了一部诗集《无路的人》,内容充满失望和苦闷。这部诗集共有四十首没有韵律的诗篇，几乎每一行诗句都充满形象化的描述和比喻。他在诗集的前言中写道，诗歌现在的特殊任务是感受和表达这个时代的深层内涵。这部作品使他成为一个开拓者，作品被誉为瑞典 40 年代最杰出的佳篇,它对年轻诗人影响较大,波尼尔出版社于 1945 年重又出版了这部诗集。他的其他诗集还有《后效》(1947)和《冬祭》(1954)等。《冬祭》中第一首诗是写希腊神伊卡洛斯,表示人类正在远离现实的道路上。

卡尔·凡恩贝里(1910—1995)的诗作直接描绘当代世界，尤

其是知识分子生活中的问题,被称为"时代的诗人"。他出身农民,当过报纸撰稿人和文化版编辑等。1962 年当选瑞典全国文学"九人评奖委员会"委员。曾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1974)等多项文学奖。他同埃里克·林德格伦一样,先采用传统形式,后改为现代派手法创作。他的诗集《稻草火炬》(1944)没有引起注意,但是诗集《年表》(1945)却引起极大轰动。战争宣传使他对很多思想意识问题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因此在诗中他对所有信念和如何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均持怀疑态度,他以一系列讽刺和藐视的诗句向读者强调一切解决和挽救目前存在问题的方法和学说只不过是自私自利的表白。接下来的一部诗集《捕鱼旅行》(1949)类似田园诗,基调热烈,心境轻松。20 世纪 50 年代,凡恩贝里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极为关注,是一位站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持"第三者"立场的人,自那时候起,他的诗作更多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为主,如诗集《献词》(1960)、《地铁里的七个字》(1971)、《通向斯旁加区中心的道路》(1976)和《让你的脸面向太阳》(1978)等。他的其他诗集还有《十字路口》(1952)、《视野》(1954)和《在红树旁》(1955)等。

吐尔·柴特霍尔姆(1915—2002)是位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父亲是工程师。曾任瑞典报刊和电台记者、撰稿人。1957 年至 1972 年任瑞典戏剧家协会主席。1940 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大蚱蜢巷和天国》。前期作品主要描述爱情、宗教和道德。他的第一部剧本《魔术师西蒙》(1950)是揭露宗教虚伪性的。60 年代中期第一次访问中国后,作品转入以政治题材为主。剧本《上海的女人》(1967)是叙述某国医药公司派一位名叫达恩的瑞典人到亚洲兜售药品,达恩来到中国后在翻译陪同下参观了上海第五棉纺厂、幼儿园,还同十四位不同年龄,有辛酸、坷坎经历的妇女座谈,一个个妇女悲惨的命运深深震撼了他,使他良心发现,主动揭露外国资本家让他来中国兜售有害人体的针剂药品的阴谋。《SOS》(1968)抨击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进入 70 年代后,

柴特霍尔姆的创作转向历史题材。《洋鬼子》(1976)是叙述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小说。《红色的佛》(1983)是一部以西藏解放前后巨大变迁为主题的长篇小说。

柴特霍尔姆同许多其他瑞典作家一样喜欢到各地旅行，著有不少报道文学作品,如《中国,人类的梦幻》(1977)、《佛和马克思之间的西藏》(1981)和《到我们的起源地去旅行》(1982)等。

他的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666》(1970)、《传道士——雷娜》(1974),剧本《老虎哈里》(1951)、《燃烧着的矛》(1960)、《跳蚤市场》(1962)、《调解人》(1972)等,论文集《中国的挑战》(1969)。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广播剧等。

拉斯·尤伦斯坦(1921—)是一位继承20世纪40年代文学传统并将之进一步发展的作家。他早年学医,1953年获医学博士。1955年任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主任、教授。1966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77年至1986年任学院常任秘书。他是瑞典50年代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充满哲理,旨在探讨人类基本生存条件。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部诗集,以扬·维克多的笔名与一位医学同事一起署名发表。他自己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现代神话》(1949)，充满哲学格言和警句，书中的主人公是个名叫鲍斯的画家,他创造了许多神话故事。《蓝船》(1950)是他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讲述婚姻毁灭和一个人破产的故事,作品向读者表明在呆板僵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生活的。

尤伦斯坦的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苏格拉底之死》(1960)、《该隐①的传略》(1963)、《公园里的宫殿》(1970)、《头盖书》(1981)、《纯粹和简单》(1983)等,论文集《来自我的公开部分》(1971)和《人、动物、自然》(1971)。

斯蒂格·达格曼(1923—1954)在写作上受卡夫卡影响较深,是

①亚当和夏娃的儿子。

40 年代瑞典文坛上的象征主义作家的代表。

达格曼出生于瑞典文化古城乌普萨拉以北的一个村子里。母亲在他出生后几个星期离开了他，他在祖父母的农庄里长大。这一段童年生活记述在他以后的几个短篇小说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婚姻的烦恼》(1949)里。

30 年代初，达格曼离开家乡到首都斯德哥尔摩同父亲一起居住,他们住在南城贫穷的工人区,长篇小说《烧伤的孩子》(1948)就描绘他这一时期的生活。

1943 年达格曼应召服兵役，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他的处女作《蛇》(1945)描述了他在部队服役时的生活。《蛇》是瑞典 40 年代文坛上的代表作,它共分上、下两册,上册叫《伊蕾娜》,下册为《我们睡不了觉》。作品描述伊蕾娜的男朋友比尔抓到了一条蛇，藏在背包里，这使伊蕾娜感到心惊肉跳，后来这条蛇又在兵营里逃掉，这件事不仅引起士兵们而且引起市民们的恐惧。达格曼用“蛇”象征社会,着重描述人们在恐惧、烦恼和不安中生活着。《蛇》的发表使达格曼一举成名，确立了他在瑞典文学史上的地位。此作品于 1966 年拍成电影。

达格曼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囚徒之岛》(1946)和短篇小说集《夜间的游戏》(1947)以及剧本《被判死刑者》(1947)、《乌特的影子》(1947)和《末日》(1952)等。

1954 年达格曼去世后，由别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他的广播剧《一个音乐家的帽子》(1955)和诗集《我们需要安慰》(1955)。

萨拉·李德曼(1923—)是瑞典当代重要的女作家。她出身在瑞典北部诺尔兰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人口稀少,景色荒凉,居民与世隔绝,很少到省内其他城市去,贫困的农民为生存艰苦地进行着奋斗，这一切日后都成了她写作的素材。

李德曼早年学过戏剧，曾获乌普萨拉大学哲学学士。处女作《烧炭人的峡谷》(1953)和《云梅地》(1955)都是以瑞典北部居民生

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60 年代初李德曼去南非居住,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南非当局驱逐。回国后，她发表了两部以南非种族压迫和非洲下层人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我和我的儿子》(1961)和《带五颗钻石的戒指》(1964)。1965 年,李德曼访问了正在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次年她发表了谴责美国侵越的报道文学《在河内的对话》(1966)，作品以有力的事实向世人证明越南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正义的。 1968 年,她又出版了报道文学《矿》,作品揭露瑞典北部矿工恶劣的劳动条件,引起较大社会反 响 。

自 60 年代初起,李德曼一直关注国际政治事件,作品也以报道文学为主。70 年代末期,李德曼又重新开始创作有关北部诺尔兰家乡的小说,她的五卷系列小说《你的仆人在倾听》(1977)、《愤怒的孩子》(1979)、《纳包斯的石头》(1981)、《这个杰出的男人》(1983)和《铁冠》(1985),通过对 19 世纪末期在这一与世隔绝的边缘地区修筑铁路的描述，追溯了这一地区更遥远的年代的历史和事 件 。

李德曼的其他作品还有剧本《钟表匠约勃的女儿》(1954) 以及描写母女感情不和的《艾伊娜》(1956)等。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社会地位低下、受人冷遇的小人物,如贫苦农民、农妇、矿工和旅馆中的侍者等。她作品中的对话夹进不少方言土语，极富感染力。

福尔盖 · 伊萨克松(1927—)是 50 年代脱颖而出的优秀诗人。父亲是传教士。他在乌普萨拉大学毕业后，曾任《快报》(1950—1951)、《晨报》(1951—1958)和《每日新闻》(1959—1965)的文学评论家。他热爱大自然，无论是瑞典城市或乡村中的野花野草，他不但能知其名，而且还能知道它们的特性，一听到空中的鸟叫声，他立刻能辨别出是什么鸟。他的第一部诗集《冬天的旅行》发表于 1951 年,同其他瑞典 50 年代的诗人一样，诗中有悲观主义情绪。但他擅长从大自然中吸取养分，代之以天真的生活乐趣。诗集《绿

色的年》(1954)和《蓝色和黑色》(1957)以娴熟的技巧描绘了充满田园风光的画面。60 年代和 70 年代，伊萨克松同许多瑞典作家一样，热中于出国旅行，他多次到过中国、印度、南美等地，以简洁的笔法真实报道了那里的人民的生活，他的报道文学作品有《华沙》(1964)、《印度有机会吗？》(1969)、《在工场的地板上》(1971)和《人在死前是不会老的》(1973)等。到了 80 年代，伊萨克松又开始发表诗作，如《信号和奇妙》(1981)和《从黑暗到光明》(1983)等。此外，他还著有论文集《政治和电影》(1968)、《在巴黎的七十二天》(1971)以及有关诗歌的评论集等。

拉斯·福塞尔(1928—)是一位诗人和剧作家。他的作品政治色彩浓厚，卓别林、列宁等人都成为他作品中的人物。他的父亲是位档案员，他自己 1948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1952 年获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哲学学位。二十一岁发表处女作诗集《骑士》(1949)，诗集《小丑》(1952)描写生活在原子战争阴影下的渺小无能的人，表现了幻想破灭、无家可归的悲观情调，作品充满伤感情绪，是 50 年代许多瑞典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写照。这部诗集的发表使他成为瑞典 50 年代的重要诗人。到了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他的诗作，如诗集《投票》(1964)、《十月诗》(1971)、《企图》(1972)等，政治色彩愈来愈浓。从《瑞典之夏》一诗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他的诗作的特色：

你知道有一个大炮像花朵遍野
　　怒放的国家吗？
它把花粉撒遍整个世界
它使战争受孕，使结好的
　　痂疤突然绽开，
淌血的花萼送往整个世界，
罂粟花可像手榴弹？

……

夏天的风从布福斯①
把毁灭吹遍整个世界……
这个小国的福利建立在
　　别人毁灭上，
也建立在黄色胶状花粉上，
　　使整个世界
在日落之后到处闪眨刺目的
　　红色火光。

……

她名字叫瑞典,坐落在
　　布福斯旁
她娇嫩的躯体在晒太阳时
瑞典的钢铁却在国外咬人
留下子弹一排排牙痕
在别人的肌肤上……

福塞尔其他的主要诗集有《电报》(1957)、《一首爱情诗》(1960)、《可能》(1974)和《歌曲》(1986)等。

福塞尔在创作诗歌的同时也开始创作剧本，作有根据希腊悲剧《阿尔克提斯》写的《加冕礼》(1956)、关于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尔夫的《疯狂的前额》(1964)、叙述瑞典女王退位前后并离宫出走的《克里斯蒂娜·亚历山德拉》(1968)以及政治剧《玛丽·鲁》(1962)、《资产阶级和马克思》(1970)、《野兔和秃鹫》(1977)等。《爆破者和他的女儿艾沃尔》(1989)是部半自传体的剧本,剧中的对话真实而朴素,故事发生的地点是20世纪30年代的斯德哥尔摩,这是部叙

①布福斯是瑞典有名的军工厂。

述当时难以弥合的阶级差别和好心难以减轻痛苦的“自然主义悲剧”。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也是瑞典诗坛上象征主义代表,50 年代起开始写诗生涯，在创作风格上受纪德影响很深。他的诗作主题多样,音韵铿锵,比喻生动优美。早期作品注重精神与内心的分析,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把自己作为第三者客观地去观察和探索,如诗集《十七首诗》(1954)、《路上的秘密》(1958)、《半完成的天空》(1962)、《看见黑暗》(1970)和《波罗的海》(1974)等。近期作品则较多反映生活、社会和政治现实,如《真实障碍》(1980)、《乱哄哄的市场》(1983)和《为了生者和死者》(1989)。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卷数不多,但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因此他在国际上，尤其在美国知名度较高。他曾荣获贝尔曼诗歌奖(1966)、瑞典文学大奖(1979)和文学促进大奖(1982)等。

扬·米尔达尔(1927—) 出身于斯德哥尔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经济学家,曾担任瑞典政府贸易大臣,母亲曾出任驻美国、印度等国大使和裁军大臣等职务。

米尔达尔从青年时代起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积极投身于瑞典的进步事业和人民运动。50 年代初期,担任过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瑞典代表。后来，当过一段时间的报纸记者。1968 年被选为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以后又改任名誉主席。

米尔达尔是一位才思敏捷的多产作家,自 1955 年投入文学创作以来,发表的作品有小说、杂文、游记和剧本等。他的杂文题材广泛,内容深刻,笔锋犀利,从揭露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国际重大政治问题到探讨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观的文学研究问题无不谈及。他的游记也蜚声文坛。他曾经去过几十个国家，从欧洲到美洲,从中亚草原到吴哥石窟,都留下他的足迹。他以生动流畅的笔调描述了这些地方的优美风光、社会状况和政治动向。

1963 年米尔达尔的名著《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问世,这本长

达四百多页的调查报告，以它的材料详尽、内容真实、记载细腻而风靡一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多次出版，成为许多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参考材料。米尔达尔本人也以一种新兴的文学—— 报道文学的创始人活跃于瑞典文坛。这种文学的特点是通过实地采访和详尽的调查研究，以尽量切合客观事物的手法进行报道。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瑞典人民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了解。他的报道和游记作品还有关于柬埔寨古城吴哥的《石脸》(1968)、《阿尔巴尼亚的挑战》(1976)、《丝绸之路》(1977)、《印度在期待》(1980)和《二十年后的中国农村》(1984)。

他的主要长篇小说有《回家》(1954)、《欢悦的春天》(1955)、《变化和存在》(1956)、《洗澡间的水龙头》(1957)、《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的自白》(1964)、《童年》(1982)、《另一个世界》(1984)和《十二之后是十三》(1989)等。

斯文·林德克维斯特(1932—)从 50 年代末起开始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现实政治问题极为关注，同米尔达尔、魏斯特贝和女作家李德曼等人一起于 60 年代开创了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报道文学。他的报道文学有《从内部看中国》(1963)、《亚洲的经验》(1964)、《阴影 拉丁美洲面对 70 年代》(1972)和《南美洲的土地和权力》(1973—1974)以及报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象的足》(1985)等。文化教育文集有《广告有生命危险》(1957)、《吴道子的故事》(1967)和《在你站着的地方挖掘》(1978)等。描写自己的小说有《一个爱人的日记》(1981)、《一个已婚男人的日记》(1982)和《长凳的压力》(1988)等。

彼尔·魏斯特贝(1933—)出生在斯德哥尔摩,父亲博学多才，长期依靠笔耕为生，母亲是一个很有文学素养的知识分子。在家庭熏陶下，他的聪颖才智远比一般青少年早熟，十四岁起就走上了文学道路,被誉为瑞典文坛上的“神童”。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吹肥皂泡的男孩》(1949)以优美洒脱的文笔描写了各种男孩子的性格，

引起瑞典文坛的轰动。

魏斯特贝早期作品充满浪漫色彩，作品以追求生活中的美和人与人之间的爱为主题，力求给人以美感、欢乐、精神上的享受，如追忆自己梦境般欢乐童年的中篇小说《前尘影事》（1952），从不同侧面描写一个男孩发育成长时的性格变化的短篇小说集《个人私事》（1952）、描述一对青年几经悲欢离合和曲折波澜终成眷属的长篇小说《半个王国》（1955），以及叙述一青年将巨额遗产救济受尽苦难的战争幸存者的长篇小说《遗产继承者》（1958）等。

1959 年他到罗得西亚和南非进行长时间的采访，严峻冷酷的现实生活使魏斯特贝改变了风格，写出了不少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揭露种族压迫和赞颂民族解放运动的优秀报道文学，如《禁区》（1960）和《在黑名单上》（1960）等。

魏斯特贝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三部曲《水宫》（1968）、《飞行指挥塔》（1969）和《土壤》（1972）。小说通过斯德哥尔摩阿兰达国际机场的飞行调度员扬·伯克曼同他的表妹以及另一个女科学家之间的恋爱纠葛，揭露了瑞典中、上层人物奢侈颓废的生活、精神上的空虚和性苦闷。这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作品被瑞典文学评论界誉为社会问题文学的代表作。

此外，他还发表了描述一名瑞典外交官在喀麦隆活动的长篇小说《火影》（1986）和《山泉》（1987）。他还出版了赞颂大自然的美、赞颂斯德哥尔摩旖旎动人风光的作品，如《东玛尔姆区》（1962）、《夏天的岛屿》（1973）、《光之心》（1991）和《风之火焰》（1993）等。他还写过不少诗歌，大多抒发情思乡愁，或是追忆童年。

斯文·台尔勃朗克（1931—1992）是 70 年代瑞典文坛上擅长创作历史小说的重要作家之一。《赫德比村小说》包括《记忆》（1970）、《石鸟》（1973）、《冬骑》（1974）和《城门》（1976）。这四部作品是描写瑞典中小城镇赫德比从 1937 年至 1945 年之间的变化，

由不同家庭的遭遇组成了一幅幅瑞典农业社会解体、宗教和封建主义衰亡到工业化兴起发展的色彩缤纷的画面。80 年代他又发表了以自己家庭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沙米尔之书》(1981)、《沙米尔之女》(1982)和《孤单的玛利亚》(1985)。此外他还著有长篇小说《传教士的外衣》(1963)、《笨人难过的桥》(1969)、《生命之落穗》(1991)以及他去世后发表的《谷壳》(1993)等。

彼·克·耶舍尔德(1935—)早年当过医生。50 年代后期开始创作。作品以描述现实社会问题为主，是当代瑞典文学攻击官僚主义制度的代表。他认为在官僚主义严重泛滥、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的本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灭，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压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无情，人的存在只是一种梦魇的幻觉。

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猎猪》(1968)、《儿童岛》(1976)、《河流之后》(1982)、《豪尔格森一家》(1991)和《一个开放的市场》(1992)等。

耶舍尔德的作品有好几部被改编成电视剧、话剧和电影，受到瑞典各方的好评。

阿斯特里德·林格伦(1907—2002)是瑞典当代最著名的儿童文学女作家。曾当过秘书、教员等。1946 年至 1970 年担任斯德哥尔摩拉本和舍格伦出版社儿童读物编辑。多次获得各种国内和国际文学奖，如瑞典日报文学奖(1945)、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1958)、“金船奖”(1970)和瑞典学院大奖(1971)等。生前曾是瑞典文学奖九人颁发委员会成员。

林格伦的第一部重要作品《长袜子皮皮》(1945)描述一个名叫长袜子皮皮的九岁小姑娘，她独自生活，到处漫游，力气很大，心地善良，治过坏人，但十分顽皮淘气。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广泛争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曾担心皮皮的恶作剧会影响孩子们。但由于皮皮这个童话人物是少年儿童被压抑着的最狂野的幻想的化

身,她受到广大小读者的欢迎,很快也被成人所理解、喜爱。至今,这本书已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并被改编成剧本在欧洲和美国等地上演。

《米奥,我的儿子》(1954)是林格伦另一部重要作品，它把社会中孤儿不幸遭遇的现实同童话的大胆幻想结合起来，是部教育性和趣味性都很强的作品。林格伦在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不久，就把它改写成剧本,受到小观众,甚至成人的欢迎。剧本《米奥,我的儿子》在瑞典各地屡演不衰,是儿童剧团的保留节目。

林格伦一生创作了八十种左右的作品，有童话、儿童侦探小说、图画故事、描写城市和农村儿童生活的小说,很多作品已经搬上舞台和银幕,有的还拍成电视连续剧。她的主要作品还有《大侦探布罗姆克维斯特》(1946)、《我们比莱尔村的孩子们》(1947)、《卡尔松三部曲》(1955—1968)、《玛迪琴》(1960)、《狮心兄弟》(1973)和《强盗的女儿——朗妮娅》(1981)等。

凯什婷·埃克曼(1933—)是当代重要的女作家、文学评论家。当过成人学校教员,50 年代末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生涯，创作了几部引人注目的侦探小说,如《三十公尺谋杀》(1959)、《燃烧着的火炉》(1962)和《死钟》(1963)等。1967 年以后转入传统小说创作,第一部作品为《鼓角》(1967)。

埃克曼的成名作为《巫婆舞圈》(1974)。这是她的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三部为《源泉》(1976)、《天使之屋》(1979)和《一座光明的城市》(1983)。作品描述 20 世纪初一个瑞典小镇的变迁,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以托拉为中心的一批妇女，因而被瑞典文学评论界称为瑞典文学中的一部妇女史诗。四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一座光明的城市》真实地反映了瑞典社会的面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是瑞典当代小说中的一部佳作。其他小说有《黑暗和越橘树枝》(1972)、《斯科拉林中的强盗》(1988)、《狗》(1986)、《水边事件》(1993)、《使我起死回生》(1996)和以《狼

皮》(1999,2002,2003)为篇名的三部曲等。

埃克曼于 1978 年被选为瑞典学院院士。她以卓越的文学创作确立了其在瑞典文坛中的地位，被誉为瑞典 70 年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拉斯·古斯塔夫松(1936—)是一位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出身于商人家庭。大学时专修哲学，1961 年获哲学硕士。1962 年至 1972 年任波尼尔文学杂志主编。

古斯塔夫松著有小说、诗歌、评论和戏剧,他的作品很多都被译成外文,被译成德文的最多。80 年代初，他被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聘任为客座教授，定居美国。即使他远离家乡，他的作品在瑞典国内仍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是瑞典现代派文学中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品的基调是自我中心主义。他善于以无韵的对话形式的哲理诗来表现意识的流动。他认为由于世界上不存在人的永恒不变的形象，因此必须设法将瞬息即逝的印象保存下来。他主张凡是属于个人的、私有的或者是受到灭绝威胁的事物都必须加以保护，诗必须将自己在仔细观察现存环境后所获得的梦幻的视觉表达出来。他的诗集有《乘气球者》(1962)、《在瑞典的一个上午》(1963)、《地球中心之行与其他诗》(1966)和《暖房和寒冷》(1972)等,但由于哲学的沉思和跳跃的象征，大多令人费解。

古斯塔夫松最重要的小说是以《墙上的裂缝》为题的五部有关联的长篇小说:《古斯塔夫松先生自己》(1971)、《毛料》(1973)、《家庭聚会》(1975)、《西格斯梦德》(1976)和《一个养蜂者之死》(1978)。每篇小说的故事都是独立的，但是主人公的名字都叫拉斯，前三部作品都是批评当时瑞典的官僚主义和政府的虚伪，他对瑞典社会的看法是悲观的。第一部《古斯塔夫松先生自己》是部自传体小说，以一位作家和编辑的眼光回顾 60 年代的文学倾向 第二部是描述一位在边缘省份教数学的教员的遭遇，由于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他和学生的才能无法充分发挥，从而导致一个具有天才

的学生和他自己的死亡；《家庭聚会》描述主人公公开揭露政府卷入一场污染环境的事件中，但他没有能力去制止这场灾难。

尤让·帕尔姆(1931—)瑞典诗人、文学评论家,当过成人高中教员、文学杂志编辑，为波尼尔文学杂志、快报和工人周报等撰写文学评论。他的第一部诗集《狗的访问》(1961）里有以下的诗句：

你没有东西可写吗，那就写它吧。
你不信任诗吗？这将成为最杰出的诗。
谁在像写一部剧本似的叫喊？
　　放低嗓门！
请记住诗是静默的近亲。
你要‘运用’抒情,你是这样说的吧？
一直等待到诗来用你,此后
　　你会知道得更好
你的诗太公开。用讽刺和画堵塞住。
你是不讽刺的？设法用恶魔或
　　十四行诗。
复杂是不必要的，别相信它。
很多地方的简单是同样的好。
像神秘诗。

帕尔姆用这样的诗句来讽刺过去。他主张诗的内容应当政治化,格调应该通俗化。

他是60年代诗歌‘新简单化’派的创建者,他认为在现代,诗人已不需要将支离破碎的、毫不调和的语言形式拼凑在一起方能显示自己是个实验者。大多数人如今都在这么做，而不是一小批先驱的离经叛道的叛逆者。要是诗人想成为实验者，他尽可以尝试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周围现象，这必将使他有更多的收益。

他在 60 年代初还提出了“诗是灵魂的军士”的口号,这一口号至今仍有巨大影响，感召着一批年轻的诗人投入当前的现实斗争。他还认为诗是人的心声，因而必须反映出社会批评者的声音和良心。

政治文集《一个非正义的见解》(1966)指出从第三世界角度看，西方的富裕和进步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在《瑞典思想灌输》(1968)里他再一次提出同样的观点。《人们可以做什么》(1969)鼓动读者去反对现状。报道文学《在爱立信公司的一年》(1972)和《来自爱立信公司的最后报告》(1974)通过实地采访提出重新改变目前工作状况的激进办法。

1984 年，帕尔姆发表了两卷本无韵诗《瑞典，一个冬天的传说》，第一卷中就瑞典的不平等、缺少自由以及当局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第二卷中就威胁着瑞典乃至全球的生态问题表示忧虑和担心。这部作品以其流畅和生动的语言赢得众多的读者。

贡纳尔·阿道尔夫松(1906—1983)是瑞典 60 和 70 年代重要的工人作家,在投身文学创作之前曾当过工人、记者、共产党议员。他的四部曲《木鞋之国》(1964)、《穷人的外套》(1965)、《挂着红圈圈的旗杆》(1966)和《夜晚拉提琴的人》(1969)讲的是 20 世纪第十年里瑞典南部斯莫兰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飞速变化的故事。《出生在我们的峡谷里》(1970)是写到美国去移民的故事。《包维尔师傅的玻璃作坊》(1974)是部历史小说,描写 17 世纪初期第一个吹玻璃的工人抵达斯莫兰省的情况。他还发表了几部回忆录：《宽广的道路》(1971)、《通人性的花束》(1981)、《旋风》(1982)和《沙漏中的沙》(1983)等，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他参加政治活动和劳工运动的经历。

卡尔·鲁内·诺德克维斯特(1920—)出生在瑞典北方诺尔兰省,并在那里长大,他继承 30 年代工人作家的创作传统,是 70 年

代现实主义工人作家，他同阿道尔夫松一样，受教育不多，干过各种体力活。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工人队伍中的中年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竞争中只是一个失败者，因此他们最终的结局往往是走向死亡。《夜间的路》（1970)中的主人公由于他的政治信念而被流放后走上自尽的路。《十月中的一天》（1972)中的主人公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离开了人间。《漫长的秋天》（1977)通过对当今福利国家的描述，以具体事实，批评社会民主党没有实行他们所允诺的经济保障和社会平等。此外他还著有自传体小说《太阳之子》（1982)、《屠夫的屋子》（1985)和《九月之光》（1987)等。

第四节　活跃的挪威文坛

1940 年至 1945 年挪威被德国占领，在此期间占领者对挪威在经济上采用掠夺手段,在文化上则实行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使得大多数作家都不敢写作。大战以后,挪威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处于恢复阶段。战后的挪威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反映二战和被占领期间挪威人民的苦难和地下斗争的作品。战后出版的四种文学刊物,有 1947 年创刊的、以介绍外国文学和本国当代最新作品为主的、代表激进思想的《窗口》,代表保守观点的《光谱》（1946—1954），反映社会主义者思想的《接触》(1947—1954)和由尼尔斯·约翰·鲁德(1908—)主编的《工人杂志》（1927—1970）。

进入 50 年代以后,作家们经过长期搁笔后开始积极创作,诗歌的主题以世界、死亡、爱情为主,小说有反映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对核战争的恐惧,对挪威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的看法,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等。5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局势趋于平稳，国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写作的主题开始转向个人和心理分析,长篇小说和系列小说较为流行。

6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挪威国内和国际事件的影响，挪威知识和文化界出现左倾变化。就国内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挪威在工党政府执政下，经济有所发展，70 年代起，挪威用平台在北海开采石油，在第二大城市卑尔根等地兴建三座炼油厂，年炼油能力达一千四百万吨。石油出口为挪威带来巨额利润，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人民在希望贫困能真正成为过去的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建筑在集中化、都市化、使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枯竭基础之上的现代进步将使人民付出昂贵的代价。有的作家就此发表作品，批评这种消费社会。国际方面，挪威于1959年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自 60 年代起，关于是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成为挪威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形成赞成和反对两大派别，并曾几次导致内阁危机或倒台。60 年代中期的越南战争使不少挪威人认识到贪婪的资本主义为了保护其特权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不惜采取战争手段，一部分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中去寻找答案，有人提出要通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式的太平盛世。1972 年 9 月 25 日，挪威就加入共同市场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有 53% 的人反对加入，这一投票结果鼓舞了挪威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反映在不少作家，如埃斯本·哈瓦尔兹霍尔姆(1945—)和达格·苏尔斯塔(1941—)的创作中。

70 年代现实主义报道文学甚为流行。进入 80 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挪威出现，主要作家有克雅坦·弗列格斯塔德(1944—)、扬·克雅尔斯塔德(1953—)和荣·福塞(1959—)等。

此外，自 1964 年以来，挪威议会每年都指令挪威文化委员会为各地图书馆购买一千册每一个挪威作家当年出版的新书，这一政策鼓励了作家们积极创作，为挪威文学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约翰·博尔根(1902—1979)出身于首都奥斯陆的一个律师家庭。他长期担任奥斯陆《日报》记者，在该报文化版以‘ 嘟囔的鹅

蛋'为笔名撰写文艺漫谈,并于 1936 年出版了《嘟囔的鹅蛋随感录》,在此期间他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

1925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走向黑暗》。1934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归根结底》,讽刺资产阶级的虚伪庸俗,呼吁冲破扼制个性的陈规旧俗。他还以同样的主题发表了剧本《办公室主任赖伊先生》(1936)、《我们在等候》(1938)和《安德森一家》(1940)等。

德国法西斯占领挪威以后,博尔根利用《日报》的文艺漫笔专栏，隐蔽而巧妙地鼓吹反法西斯主义，为抵抗运动进行宣传。1941 年秋他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入狱。 1943 年被保释出狱后潜逃至瑞典。在瑞典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没有夏天》(1944),描写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徘徊不定的彷徨者，在得知祖国被占领后立即明确了自己所要选择的道路。《在格里民监狱的日子》(1945)记录了他在狱中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曾于 1945 年出任挪威驻丹麦大使馆新闻专员。他对战后挪威社会问题严重、贫富悬殊、旧势力回潮等现状非常不满和失望，便投身于共产党的新闻与出版事业。在这段时期里他发表了长篇小说《爱情之路》(1946)和短篇小说集《吃面包的日子》(1948)、《爱情短篇小说集》(1952)和《新短篇集》(1965)等。这些作品使博尔根在挪威文坛获得很大声誉。

他的代表作是三部曲《小贵族》(1955)、《阴暗的泉水》(1956)和《我们抓住他》(1957)。这部巨著描述了出身于上层阶级的维尔弗莱德·萨根自幼被溺爱宠坏,成为骄恣蛮横的肇事青年。在成为纳粹分子后更是无恶不作，最后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部小说在挪威取得巨大成功，深受读者欢迎。此后，博尔根着重写回忆录和自传体小说,如《我》(1959)、《蓝山》(1964)、《红雾》(1967)和《例子》(1974)等。

苏尔维格·克里斯托弗(1918—1984)原名苏尔维格·弗莱德列

克森，出生于挪威北部小城。克里斯托弗以不同风格进行创作试验，使她在挪威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1949 年她发表了描写奥斯陆下层社会的小说《死胡同里鲜花怒放》,未能引起反响。两年后,她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来去之路》（1951）,作品富有新意，小说描写挪威在摆脱法西斯占领、取得解放的年代里的社会动荡。1952 年象征主义长篇小说《托尔苏》的发表引起挪威文学界的很大兴趣。这部讽喻小说描绘一个与世隔绝的洞穴居民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自此以后，她交替使用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描写挪威人民的日常生活。长篇小说《冬月之下》（1954)描写挪威北部地区人民在法西斯占领期间的悲欢离合。而《大坝》（1957)用象征手法，通过当地政府糜费大量财力人力兴建一座毫无必要的大坝这件事，揭示了人类盲目追求功利所带来的灾祸。

然而,克里斯托弗最擅长的还是描写妇女问题。长篇小说《七个昼夜》（1955）出色地描写了女主人公为了摆脱婚姻桎梏而甘冒风险。她短暂地放纵情欲，然而在接踵而来的社会风波和家庭报复面前，她反躬自问，这样的个性解放是否值得。《林莽中的岔路口》（1959）是克里斯托弗的成功佳作。书中的女主人公不断地剖析自己和总结教训。她在所爱的恋人和感情淡薄的丈夫之间踌躇徘徊,难以做出抉择。长篇小说《情人归来》（1961)描写一个男人离开故乡二十年后归来，发现他过去曾短暂钟情而后又抛弃的那些女性竟是如此可爱，而妇女们则已看透了薄情郎，不再甘受他玩弄摆布。

克里斯托弗还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猎人和野兽》（1962)和剧本《在红色的小路上》（1958)等。

阿克塞尔·桑内莫塞（1899—1965）在作品中有这样一句话：“民族不只是你在哪儿出生就算哪儿人，应该看你出生的地方是否感到是自己的家。”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正说明了这一点。他出生在丹麦日德兰半岛北部的小城尼克宾，父亲是个铁匠，丹麦人，母亲

是挪威人。但他从小不喜欢家乡小城，却向往母亲的祖国挪威。十五岁时,桑内莫塞离家当海员,自谋生计,他也在北美等地干过各种活计。二十四岁时，他突然想当一名作家，开始用丹麦语写作,发表了短篇小说《来自拉勃拉杜的故事》(1923)和长篇小说《来自大西洋的人》(1924)等,但并未在丹麦文坛引起注意,相反,在挪威却受到欢迎，这更增加了他对母亲祖国挪威的兴趣。1927年和1928年他在丹麦发表了一部描写海上生活的小说以及另一部描述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长篇小说后，于1929年去挪威定居,并于 1931年发表了用挪威语写成的小说《一个海员登岸记》，从此成了挪威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一个海员登岸记》同《一个难民跨越足迹》(1933)和《海中有条长凳》(1937)一样是描述年轻海员的艰难和痛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桑内莫塞作为难民居住在瑞典,用瑞典文发表了长篇小说《往事如梦》(1946)。它同桑内莫塞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弗里西阿斯的婚礼》(1962)一样，旨在探讨爱情和责任的关系以及描述强制自己为不爱的人去负责任的痛苦感觉。《艾丽丝·阿特金松和她的情人》(1949)主题是描述仇恨和爱情之间的冲突。《狼人》(1958)是一部探讨权力，尤其是被滥用的权力问题的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发表了《到舍尔盖维克去旅行》(1954)和《围着耶里库的城墙》(1960)等自传体小说。

贝里尤特·霍贝克·哈夫(1925—)是挪威以写妇女孩子为主的女作家,她用犀利的笔锋,通过对众多妇女形象及其生活的真实描写,触及到妇女的命运、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遭受的不平等的待遇。

处女作《崩塌》(1956)中的女主人公是个艺术家,她热情、豪爽、才气横溢，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不苟言笑且又庸庸碌碌的人，哈夫以这一对不相称的夫妇来说明妇女强于男子。

《婊子之书》(1965)描写一个年老而体态臃肿的妓女，她心地

善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给予懦弱男子以安慰，使别人的生活充实而又有意义。哈夫笔下的这个妓女的自我牺牲是社会整个妇女形象的象征，以此来说明妇女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她的其他长篇小说还有《黑色大衣》(1969)、《儿子》(1971)、《老女巫》(1974)、《教母》(1977)和《神圣的悲剧》(1989)等。

阿格纳·米克莱(1915—1994)曾在商业学院学习,后改学人文科学和戏剧。

《绳梯》(1948)是部短篇小说集，描写期望和实际之间的矛盾，表达了青年的苦恼和踌躇。米克莱在50年代创作的作品中,男青年成为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尽管他们职业各异，生活方式却雷同。他们热中于追求女性,生活放荡不羁,但求知欲强,想像丰富,阅历宽广,可是对前途没有信心,动摇、彷徨。属于这类长篇小说的有《小偷,你应该叫小偷》(1951)和《围着吕娜夫人转的拉赛》(1954)以及短篇小说集《男孩说我也很高兴》(1952)。

1956年米克莱发表了长篇小说《红宝石之歌》,作品描写一个生活在狭隘的资产阶级环境中的名叫阿斯克的青年，他追求性欲自由和个人发展，对清教主义进行激烈攻击。米克莱本人和出版社因这部作品违反挪威习俗而于1957年受到指控。这一指控在北欧各国引起广泛注意，并就如何对待各项文化政策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挪威高等法院最后宣布米克莱无罪，而米克莱的名声也因此大振,而《红宝石之歌》在北欧诸国也成为畅销书。此后米克莱还发表过长篇小说《罗宾康》(1965)等。自1967年以来，米克莱没有发表作品。

耶斯·比尔内布(1920—1976)是挪威战后以政治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常常引起社会注意和辩论。他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挪威奥斯陆美术学院学习，当过教员。他以诗歌步入文坛,主要诗作有《诗》(1951)、《阿里阿内》(1953)、《大都市》(1958)等。

比尔内布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雄鸡啼叫之前》发表于 1952 年，描写纳粹在二次大战期间对集中营囚犯所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实验。这部作品引起社会广泛注意。另一部长篇小说《尤纳斯》(1955) 就挪威的教育法、学校中的行政管理和教师的讲课方式提出批评,引起社会更大轰动。《在更严峻的天空下》(1957) 攻击挪威战后的法律制度,着重抨击对战犯的惩处条例。《罪恶的羊倌》(1960) 是针对牢狱制度而写的长篇小说，指责法庭和监狱在对待青年罪犯时的不妥做法。

比尔内布的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三部曲《自由时刻》(1966)、《火药塔》(1969) 和《静寂》(1973) ,作品叙述欧洲小国里的一个执法人主动记录西方文明中的罪恶和非正义以及对平民百姓所施加的暴力行为,作品旨在探讨压迫、丑恶和残暴的永恒性,挪威文学史称这三部曲是"兽性的历史"。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描述航海的《鲨鱼》(1974)。

在戏剧创作方面，比尔内布受布莱希特影响较深。他的第一个剧本《欢乐重又返回》(1965) 同他的小说《罪恶的羊倌》一样是攻击牢狱制度的。《爱鸟者》(1966) 是他较优秀的剧作,剧中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一个村庄里，一群爱鸟的德国人创办的一家公司准备建立一个鸟收容所,而这群德国人的领头人却是一个战犯,当地老百姓认出了他,并要为自己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磨难讨回公道,但结果却无济于事,还是德国人占了上风,因为他们有钱,剧本向观众指明钱就是权的道理。《赛梅尔魏斯》(1968) 是一部探索权力概念的剧作,主人公赛梅尔魏斯是一个匈牙利医生,他第一个发现分娩时发烧的病因,面对同事们的压力,他最终只得屈服。他的其他剧本还有《截肢》(1971)和《粗布工作服》(1975)等。

玛格雷特·约翰森(1923—)曾当过速记员、报刊通讯员等,也常为电台和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和教育节目写文章。

约翰森步入文坛较晚，四十八岁时才发表第一部作品。长篇

小说《你不能一走了之》(1981)是部描写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不到应有教育、找不到职业、备受歧视的作品。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不平等的地位，引起挪威文坛轰动,并被改编成话剧和电视剧,成为 1984 年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短篇小说集《星期一的孩子》(1985)生动地揭露了儿童表面幸福愉快，实际受虐待、遭摧残的事实。

约翰森的作品主题以妇女和青少年为主，她擅长透过简单的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揭示妇女和儿童受歧视、受虐待的实质，并且用讽刺、幽默的手法，淋漓尽致地将他们的遭遇暴露在读者面前。她的作品不仅在挪威受到好评，而且被译成俄、英、德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托尔堡格·奈德利奥斯(1906—1987)出生于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父亲是高级职员。她曾在卑尔根音乐学院就读，曾任音乐教员。

她涉足文坛是从给周报写通俗小故事开始的。这些小故事后来收进《在响第三遍铃前》(1945)故事集中。短篇小说集《柜子后面有把斧子》(1945)是她创作的第一部严肃文学作品，反映了挪威被德国占领期间人民的生活和年轻姑娘对德国占领者的态度。长篇小说《月光下什么也不会生长》(1947)描写一个年轻妇女的痛苦经历以及男人对妇女在性和情感上的欺压。《神奇的棱柱镜》(1950)是由一组以赫尔迪丝为主人公的故事组成的作品。赫尔迪丝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姑娘，作品通过她同出身于手工业和工人家庭的小伙伴之间既友好又嫉妒的交往的描述，生动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挪威社会的状况。长篇小说《公共汽车站》(1953)、《蓝井曲》(1960)和《在下次新月时》(1971)都是以赫尔迪丝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通过对她从幼儿成长到少女，接受知识家庭经济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描述，展示了一个儿童面对大千世界的心理和二次大战前夕挪威城市经济和社会状况，作品

被译成多种文字。《一双热烈的手》（1952)是一部反对挪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具有政治性内容的小说。《最后一支波尔卡舞曲》(1965)是部描写妇女和儿童的短篇小说集。

贡纳尔·布尔·贡德尔森(1929— ）出身于挪威东南海滨城市的一个海员家庭，高中毕业后即进入航海学校，曾任海员报刊文化编辑、远洋船长等。由于他曾长期当过海员，对海上生活和劳动十分熟悉，因而他的作品都以航海和海员生活为背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他是挪威当代最擅长写海洋和海员生活的作家。

长篇小说《马丁》(1959)描写海员马丁几经颠沛流离，来到他所梦想的天堂般的一个岛屿。然而命运仅安排他在当地妓院弹钢琴糊口。在落魄多年之后，他终于可以返回本国，然而在旅途中丧生。作品通过一个海员的生活经历勾勒出西方世界里海员远离故乡亲人、生活孤寂单调的情景，并且显示出海员们精神空虚和心理压抑所造成的种种问题。

在写作风格上,贡德尔森以意境深邃、文笔凝练著称,他的早期作品采用现实主义手法,60 年代以后在使用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也逐渐受到表现主义的影响，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幻觉和梦魇。

长篇小说《尤迪斯》(1963)描写一个船长受到魔鬼派来的神秘幽灵的控制，他企图摆脱其束缚，但终于同归于尽。他的其他长篇小说还有《亲爱的埃马纽埃尔》（1965)、《他想画大海》（1968)、《我到埃及的旅行》(1970)和《无家可归的人们》(1977)等。

爱娃·西伯格(1931— ）生于奥斯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十八岁发表小品文集《惊讶》（1949)轰动挪威文学界。1961 年以来一直定居在瑞典，同时用挪威语和瑞典语创作,1952 年,二十一岁的西伯格发表了长篇小说《他在我身边》获得更大成功，这部小说被译成好几国文字，并被改编拍成了电影。接着她又发表了《再也不孤独了》（1953)、《多情年代》(1966)、《又得到了》(1985)和《我看不见你》(1986)。这几部长篇小说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妇女的深刻

描述，反映了当代妇女问题。

在两次访问中国西藏后，西伯格发表了几部宣扬佛教思想的作品,如《她没有死》(1972)和《是的》(1973)等。

西伯格在 80 年代创作出好几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其中包括《死之后的三天》(1981)、《再来一遍》(1985)、《我看不见你》(1986)和《奇迹的时代》(1989)等。这些作品在挪威和北欧文坛上引起不小的轰动。《死之后的三天》叙述一个中年妇女突然猝死，灵魂离开身躯后停留在屋里，她的灵魂看到和听到至爱亲朋如何在她死后议论和算计她，她的魂魄悠悠无所适从，最后却复活了，于是她彻悟昨非今是。这部作品有浓厚的卡夫卡色调。西伯格在 1990 年出版了小说《旅行可以开始》，这部小说可以说同她以往小说的风格迥异，情节曲折，悬念性强，通过一个女理发师到墨西哥旅游所遇到的麻烦和一段恋情，点出人类即将面临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大自然将给人类严厉的惩罚。此外，西伯格还著有短篇小说集《爱情的蓝色之花》(1983)等。

西伯格注重从平凡琐事中探讨妇女的人生,描写细腻生动,富有生活情趣。曾多次荣获挪威和瑞典文学奖。

挪威诗坛在 60 年代出现了一种新诗体,即“新简单诗”。这种诗的特点是具体、简单,主题集中于生活中最基本的方面,如爱情、悲伤以及每天生活中的具体细节。这种“新简单诗”不仅存在于挪威，也同样存在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种诗体一出现，就受到舆论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扬·埃里克·沃尔德(1939—)就是挪威这种新诗体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出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他热爱这座城市。他的诗歌和文章深深植根于故乡城市。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诗人中是最为突出的。他深受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影响，诗作摒弃传统形式，实验新抒情诗体。他的第一部诗集是《在镜子与镜子之间》(1965),作品开始描写的是一个只有画和影子的世界，后来镜框被打破，主人公接触到实际社会，走到

自己心爱的人身旁，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最后主人公走过这个世界，又单独一人，处身在一个简单而现实的世界中。他创作的其他诗集有《闪光》（1966）、《攫取》（1966）、《从房间到房间》（1967）、《好心妈妈的说法，是的》（1968）、《第八本书：生活》（1973）、《S》（1978）和《圆圈，圆圈》（1979）等。1987 年，沃尔德在周游世界之后又出版了诗集《悲伤、歌曲、道路》以及《一个名叫阿贝尔·艾克的人》（1988）、《麋鹿》（1989）等。

达格·苏尔斯塔（1941— ）是当今挪威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多才多艺，作品有长、短篇小说、散文、戏剧和论文。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受卡夫卡影响的短篇小说集《螺旋》（1965），描写人的孤独和与世隔绝。长篇小说《九月广场二十五周年》（1974）描述工党领袖抛弃社会主义同美国资本家合作，背叛了工人阶级。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苏尔斯塔发表了战争三部曲：《叛卖，战前的年代》（1977）、《战争 1940 年》（1978）和《面包和武器》（1980），作品旨在说明挪威国内的纳粹分子、德国占领者和挪威资产阶级之间有着共同利益，它以奥斯陆东郊一个小镇为背景揭露挪威资产阶级政府在战前年代对希特勒德国的屈从，以吉斯林为首的挪奸开门揖盗，出卖民族利益。作品还真实地描写了在德国军队长驱直入时，挪威的工人阶级和军民奋起抵抗的经过，也描写了挪威人民在战后所经历的困苦和迷惘。他的其他作品还有散文集《旋转的椅子》（1967）和《旋转的椅子和其他文本》（1994），长篇小说《对不可测知的事物的描述》（1984）、《1987 年小说》（1987）、《无缝的一边》（1990）、《安德森教授的晚上》（1996）和《1941 年 7 月 16 日》（2002）等。

扬·克雅尔斯塔德（1935— ）是文学杂志《窗口》的主编，这本杂志刊登了大量后现代主义流派作家的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行星静静地旋转着》（1980），以幽默的手法反映了他对首都奥斯陆的热爱，对当今事件的观点。短篇中的主人公大多是

作家，如最后一篇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 J 的作家,由于他写出了不道德的文学作品被讲新挪威语的上帝送到了地狱。他最著名的作品《霍姆·法尔索斯抑或完美的谋杀者》(1984)是一部较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长篇小说，描写一位年轻的电影女演员诱惑几个有权势的男人,这些人在同她发生性关系时总会神秘地消失,该作品反映了当代生活和艺术中存在的问题。他的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镜子:20 世纪系列读物》(1982)和《伟大的冒险》(1987)等。

克雅坦·弗列格斯塔德(1944—)是一位用新挪威语创作的作家。60年代末期发表的两部现代主义诗集《朝圣》(1968)和《典礼》(1969),描写个人对大自然景色和城市环境的感受。接着发表了论叙兼有的散文集《暗中狂喜》(1970)。短篇小说集《系艇绳》(1972)描写自己在商船上当水手和在工厂当工人时的经历。他把工人们和海上的日常生活描绘得十分真实和生动。《波特兰山谷》(1978),英译《金元道路》(1989),是他尝试以后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发表后大获成功,并于 1978 年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幻想交织在一起的作品，描写挪威西部小镇一家人的生活历程。《火和火焰》(1980)、《U_3》(1983)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长篇小说。《U_3》以冷战时期 U_2 飞机事件为背景,通过对挪威空军军官阿尔夫·海洛特经历的描述，向挪威读者展示了挪威战后国防史。主人公是一个忠于挪威人民的军官，他告诫人民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同美国合作将会给挪威带来十分危险的后果。故事在 U_2 间谍飞机被击落的消息发布和海洛特结束自己生命后结束。《第七种气候》(1986)是一部描写一个名叫萨林·默罕莫德的亚洲移民到挪威后成为一名作家和语言学家的长篇小说。此外,他还著有长篇小说《拉斯莫斯》(1974)和多部论文集。

福劳德·格吕顿(1960—)是挪威当代著名作家,居住在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用新挪威语创作。他除了创作外还在报社当记者。他多次荣获挪威重要文学奖和文学提名奖，如巴拉格奖和

图书馆奖等。

格吕顿于 1983 年以诗歌步入文坛，此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像一只夏天小鸟那样跳舞,像一只蜜蜂那样叮蜇》(1986)、《鸟国以东 80 度》(1993)和《更多的雨水》(1995)等。但是这些著作并未引起文坛注意。使他一举成名的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蜂巢之歌》。小说发表于 1999 年，一发表立即得到文学评论家的一致好评,成为 2000 年'今日书籍'的最佳作品。《蜂巢之歌》使他获得了巴拉格奖(1999)、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提名奖和电视二台听众奖提名奖等。此外,他还发表过短篇小说集《流行歌手》(2001)等。

《蜂巢之歌》叙述在一个名叫奥达的工业小城里有一座工人住宅，里面住着工人、快餐店职员和流行歌手等。他们整天来去匆匆，忙忙碌碌，这些人虽然有着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命运，但是这座砖瓦大楼却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品通过对爱情、母子情谊、政治、流行音乐、盗窃、绑架和悲欢离合等等的描述,反映了他们的命运各异，变化莫测。例如楼里住着一对母子，儿子是一个流行歌手,找不到工作,也没有结婚,母亲病人膏肓,奄奄一息,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愿住在医院里，回到砖瓦大楼里的家，等待着死神的到来。儿子虽然十分体贴，为她盖被送水，却无济于事，母亲还是撒手人寰，抛下儿子走向天国。作品是对当今挪威社会各色人的命运的写照，这座工人住宅也是整个挪威社会的缩影，住在里面的人有欢乐也有悲哀，有艰辛的现实故事，也有对未来难以预卜的无奈，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做一个人是十分艰难的。

荣·福塞(1959—)是挪威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也是近两年来剧本在欧洲上演最多的挪威剧作家。 2002 年欧洲上演了二百多场他的剧作。在欧洲德语地区，半年内上演了五十场他的剧作。在全世界已经有四十个国家的一百八十个剧场上演了他的剧本。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四种不同的语言。他荣获过挪威国内和国际重要文学奖、戏剧奖共二十余项，其中包括他的小说

《早晨和夜晚》(2000)获 2001 年北欧理事会文学奖,2002 年获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奖,2003 年获挪威文化委员会荣誉奖，奖金为二十五万挪威克朗，这是挪威最重要和最高奖项之一。

荣·福塞自 1983 年二十三岁时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红,黑》以来，至今共发表了四十余部作品，其中有剧作二十余部，此外还有长、短篇小说、诗歌、论文以及儿童文学作品等。他的作品的主题以生活、死亡、爱情和家庭关系为主。

他的小说虽也十分出色，曾获得过有小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北欧理事会文学奖，但是文学评论家们普遍认为他的成就主要在戏剧上。

他的戏剧的特点是 场景简单,角色少,一般在两人至八人之间,人物名字都是男孩子、女孩子、儿子、母亲、朋友等,以此代表整个群体。在挪威，他被誉为当代易卜生，但是他同易卜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现代主义作家，他的创作更接近爱尔兰戏剧家贝克特的风格。他的剧作，对话有韵，语言音乐感强，内容常常是将日常生活和梦幻交织在一起，给导演留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也给观众留有想像的空间，看后使观众回味无穷。

他的有些剧作,如《夜晚唱着歌曲》(1998)已由德国著名导演拍成电影,挪威也把荣·福塞的创作和生活拍成五十分钟的记录片同观众见面。

他的剧作在世界各地上演最多的是《有人找上门来》(1996),剧中只有三个人，他、她和那个男人。作品描写他和她买下了一栋房子后一同前来看房。这栋房子年久失修，颓败破旧，油漆剥落，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块突出在陡峭的斜坡上的岩石上，但是他们十分满意、高兴,因为这栋房子远离其他房子,也远离其他人,他们两人终于可以单独地、不受干扰地待在一起了。不过，她却一直有预感，有人会找上门来，她感到十分恐惧。后来他和她都听到了脚步声、敲门声,两人感到紧张、恐惧。她看见有一个男人走来,这个男

人是这栋老房子房主的后代，就是这个男人把房子卖给他们的。这个男人对这栋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一切都十分熟悉，在屋里指手画脚，并且说以后会常来这里。这个男人还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她，约她相会。他认为这是她和这个男人事先约好的，因而产生了猜疑和矛盾。剧本最后以两人和解落下帷幕。

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剧本《名字》(1995)、《秋梦》(1999)、《死亡的转换》(2002)、《沙发中的女孩》(2003)以及长篇小说《早晨和夜晚》(2000),诗集《1986—2001 年诗》(2001)以及儿童读物《潮湿和黑暗》(1994)、《姐妹》(2000)等。

第五节　冰岛文学跟随世界文学潮流前进

20 世纪 40 年代是冰岛历史上的重要时期。1940 年冰岛被英国占领,一年后,由美国派兵接管。1944 年冰岛议会宣布脱离同丹麦的联盟,并于同年 6 月 17 日建立冰岛共和国。美军占领冰岛一方面给冰岛带来就业机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使冰岛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45 年二战结束，美国军队撤走，但是还保留了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东南的凯夫拉维克空军基地。1951 年美国和冰岛签订了一项关于美国军队负责冰岛防务的协定。这一协定引起国内严重的政治分歧和矛盾。1946 年冰岛成为联合国成员国。1949 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1952 年成为北欧理事会成员。冰岛从一个附属国变成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出现了较大变化。这些事件和变化在文学中都有较为明显的反映。

战后的冰岛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0 年左右出现的现代主义和 1970 年左右出现的用通俗叙事体创作的新现实主义。

二次大战后,世界上许多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作家的作品纷纷在冰岛出版，这为冰岛文学输入一股清新思潮，冰岛作

家不再与世隔绝，开始跟随世界文学的潮流前进，这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一种新型的、较晦涩的、不易懂的现代派诗歌有取代冰岛传统诗歌的趋势。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这种变革比较缓慢，因为几百年来，传统诗歌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他们喜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不少诗人在创作时采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手法，用传统形式来表现当代内容。奥拉夫·约翰·西古尔德松(1918—)虽然是小说家,但是在1972年至1974年发表了题名为《你记得一口井》的抒情诗集。这部诗集是用传统古典诗的形式描述当代城市生活和对农村生活的回忆。斯诺里·雅尔塔尔松(1906—1986)于1981年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他原本居住在挪威，是位画家。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用挪威语创作、在挪威发表的小说。1936年他回到冰岛，从那时到1979年他虽然总共只发表过四部诗集，但是由于他的诗作以优美、精练的语言表达了对祖国、人民和大自然的热爱，深受冰岛人民的喜爱。

冰岛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是斯坦恩·斯坦纳尔（1908—1958）他积极推动冰岛诗歌改革，提倡现代主义，他的诗歌对50年代的“原子诗人”产生很大影响。

从1946年至1953年有五位诗人发表处女诗作，他们是斯坦芬·霍尔德尔·格里姆松(1919—)、哈内斯·西格福松(1922—)、埃纳尔·勃拉格(1921—)、西格福斯·达达松(1928—)和永·奥斯卡尔(1921—),这五个人被称为“原子诗人”,因为他们是在原子时代出现的诗人，他们的诗作除了反映过去严酷的生活外，还描述当代沉闷的生活、原子时代人的前途等。60年代初期没有出现重要诗人,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又出现一批新诗人。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派潮流对冰岛诗歌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一些青年冰岛诗人为适应新的环境，在继承斯坦纳尔等人的现代主义诗风的同时更趋向于后现代主义，题材和表现手法更为自由，但语言上也很受外来影响。保卫冰

岛民族文化和维护民族语言的纯洁又成为众所瞩目的问题。80年代以来，反传统文化的美学观点的超现实主义派活跃于冰岛诗坛上,曾以长篇小说《会走的松鼠》(1987)闻名的诗人尤尔迪尔·埃里阿松(1961—)出版了几部超越时空范畴,将童年、青春期、成年糅合成既有现实又充满幻想的诗集。

二次大战以来诗的主题同冰岛以往诗的主题一样，大多描述生与死、爱与恨、生长与衰退、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对比等。自1951年冰岛同美国签约让其军事力量长久驻扎在国内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作家,不管是诗人还是小说家都感到痛心疾首,抒发对这一不幸事实的感受也成为作家们持久不变的创作主题。

冰岛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的小说以现实主义的萨迦风格为主。具有世界声誉的、冰岛当代最重要的作家拉克斯内斯仍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重要作品,有抨击冰岛上层出卖冰岛把它变成美国原子站的小说《原子站》(1948),以及其他现实主义小说《鱼会歌唱》(1957)、《冰川旁的基督教徒》(1969)、《一个农村的编年史》(1970)等。1975年以后,拉克斯内斯致力于撰写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录。

现代主义流派在长篇小说方面的重大突破始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其题材也由农村的田园牧歌改变为以都市现代生活为主。吐尔·维尔雅姆松(1925—)的长篇小说《小鸟说赶快呀赶快呀》(1968)、《甲壳虫的呼号》(1970)和《新月》(1976)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典范。古德贝古尔·贝里松(1932—)的长篇小说《畅销书作家托玛斯·荣松》(1966)更为离经叛道,运用了幻想谵语、心灵感应等手法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女作家斯瓦瓦·雅科布斯多蒂尔(1930— ）是冰岛当代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家，著有社会讽刺小说《十二个女人》(1965)、《石墙下的聚会》(1967)和《房客》(1969)等。女作家雅可比娜·西古达多蒂尔(1918—1994)的长篇小说《圈套》(1968)、《活水》(1974）都反映了都市化变迁中的矛盾和人生波折。

随着"福利国家"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冰岛于 70 年代初产生了新现实主义文学。第一个发表这类作品的是凡斯坦恩·柳德维克松(1944—)。他的小说《贡纳尔和克雅坦》(1971—1972)和《第二种思想》(1975)都把焦点指向当前社会问题。前者描写阶级社会的苦难和资本主义的腐败，后者写一位有五个孩子的离婚母亲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在 1978 年中,不少作品,如古德劳古尔·阿拉松(1950—)的《厨房中的妓女》,乌拉富尔·霍库尔·西蒙纳松(1948—)的《伺候魔鬼》和奥萨·苏尔维格(1945—)的《斯坦芬尼娅的私生活》等都集中反映了主人公所面临的社会和个人的"实际"问题。

70 年代自传体小说在冰岛也较为繁荣。特里克维·埃米尔松(1902—1993)的三部曲:《穷苦的人民》(1976)、《为生活而奋斗》(1977)和《去南方》(1979)描写自己辛勤劳动、参加阶级斗争的一生坷坎经历。西古尔德·阿·马格努松(1928—)发表了描写自己早年生活的五部小说,在第一、二部作品中通过对自己童年和少年经历的描述,生动地反映了 20 世纪中叶的雷克雅未克的状况。冰岛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拉克斯内斯也在 1975 年至 1980 年发表了四部描写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录。

进入 80 年代,随着新现实主义的涌现,"问题文学"和非虚构性小说不断问世,如古德贝古尔·贝里松的《天鹅》(1991),吐尔·维尔雅姆松的《正义完蛋了》(1986)等。在 80 至 90 年代,一大批作家致力于把外国名著翻译介绍到冰岛。赫尔吉·哈夫达纳松(1911—)除了把莎士比亚的所有剧作和希腊悲剧译成冰岛文外，还翻译了多部诗集，他是把西方古典文学介绍到冰岛的一位卓越的翻译家。古德贝古尔·贝里松翻译了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和其他许多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斯凡里尔·霍尔马尔松(1942—)于 1991 年翻译了英国作家艾略特的《荒原》,西古尔德·阿·马格努松于 1992 至 1993 年出版了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

斯》。这些作品对 80 至 90 年代冰岛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们的作品也具有新的‘世界主义’特征，如克里斯钦·卡尔松（1922— ）的《纽约》（1983）、女作家阿尔夫鲁恩·贡劳格斯多蒂尔（1938— ）的《围着圆圈转》（1987）和《面对面交谈》（1993）等。

斯坦恩·斯坦纳尔（1908—1958）原名阿德尔斯坦恩·克里斯特蒙德松，出生于冰岛西北部的伊萨菲尔德，上学不多，又因他的一只手有残疾，难以找到工作，长期遭受失业痛苦。他靠自学成才，孜孜不倦地创作，不断探索，成为冰岛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创始人，在冰岛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他的第一部诗集《红色火焰在燃烧》（1934）展示了一幅幅冰岛 30 年代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的画面 失业、贫穷、饥饿、住房紧张，并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革命。他的第二部作品《诗集》（1937）和第三部作品《沙中足迹》（1940）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拯救，而相信虚无主义，认为生活是空的，生活是沙漠，但在他的第四部诗集《旅行的目标》（1942）中又对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的这些诗作是从传统的抒情诗向现代派诗歌的过渡，在韵律形式上是传统的，但在结构上和语义学上都是新型的，是冰岛人所不熟悉的。他最后一部诗集，也是他最著名的一部诗集《时间和水》（1948），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他的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到更为成熟的阶段。自 19 世纪初期以来，冰岛的诗歌一直是以乐观的浪漫派和爱国主义诗歌为传统，而斯坦纳尔却与当时流行的传统，尤其是对生活的看法背道而驰，在他的不少诗篇中勾勒出人的空虚和孤独的一生，并激励读者去重新思考目前盛行的思想意识，使许多读者甚为惊愕。从他的《保罗致科林斯人的第三封信》中可见一斑：

我，将死的人，
与那上帝赐予了

永生的你们
　　居住在一起。
上帝赐予每一个人
　　永 生 。
然而并没有永生，
　　哎 呀 。[1]

奥拉夫·约翰·西古尔德松(1918—)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出身农民。1943 年至 1944 年在纽约攻读文学。十六岁开始发表作品，在创作同时担任校对和编辑。

第一部长篇小说《农场的影子》(1936)描述自己饥寒交迫以及参加激进组织的经历，长篇小说《登高与梦想》(1944)记述家乡人民的甘苦和祸福。1955 年，西古尔德松发表了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时钟发条》，小说描写 20 世纪 40 年代首都雷克亚未克的生活。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人，他在祖母僻远的农村里长大，到了城市后，目睹城里人懒散的生活，他不知所措，变成一个消极被动、没有生气的人。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是《咒语和鬼火》(1977)和《龙和麻雀》(1983)。诗集《你记得一口井》(1972—1974)于 1976 年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他是冰岛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作家。他的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这条路通得到那里吗？》(1940)、《鸟巢》(1972)短篇小说集《骰子》(1945)、《在十字路口》(1955)以及诗集《关于天气和其他的几句诗》(1952)等。

西古尔德松的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他们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幻想，但总是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

荣·乌尔·沃尔(1917—)同斯坦恩·斯坦纳尔一样是冰岛当代现代主义诗人。他出身于冰岛西北部贫苦农民家庭。为了谋生从

[1] 《时间与水 战后冰岛诗选》，董继平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 年。

事过多种职业,如记者、书商等。后多年担任首都附近考帕沃格市图书馆馆长。他至今一共出版过九部诗集。最初两部诗集《我敲门》(1937)和《战争之间的一分钟》(1942)没有引起文坛关注。第三部作品《渔村》(1946)获得巨大成功,这是一部打破传统韵律诗形式的自由体诗歌集,也是冰岛第一部没有韵律的诗集,作品以其自己童年为背景,在描写贫困海边渔村的同时,也揭露了牧师、商人和其他有权人物的冷酷和对人民的欺诈。他的其他诗作还有《头韵》(1951)和《有弓无箭》(1951)等。

吐尔·维尔雅姆松(1925—)是冰岛战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任杂志编辑。他酷爱旅行,以各种方式到处游历、居住。曾在格陵兰拖网渔船上捕鱼当渔民,在地中海各地当导游,到世界各地参加国际作家会议。

冰岛大部分作家虽然居住在国外,但是仍以冰岛社会为背景、以冰岛生活为主题进行写作,而维尔雅姆松则多以外国的背景和事件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他较长时间住在巴黎,深受法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他在二十五岁时发表了小说《人总是孤独的》(1950)之后,1957 年又发表了小说《映在一滴水珠之中》,描述原子弹阴影下的爱情、难民以及对人类安全的新的威胁,但是作品对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没有说明。他的其他小说还有《小鸟说赶快呀赶快呀》(1968)和《大槌捶打声》(1970)等。

古德贝古尔·贝里松(1932—)早年立志当教员,就读于师范学校,但是不久即改变志向,从事文学创作。他曾在西班牙的港口城市巴塞罗那学习艺术和文学史,并长期在西班牙居住。贝里松不但擅长写长篇小说,而且他的诗歌和散文也极为出色。长篇小说《偷偷摸摸行动的老鼠》(1961)是他的处女作,同年还发表了诗集《重复的话》。小说《畅销书作家托玛斯·荣松》发表于 1966 年,引起冰岛文坛轰动,使他一举成名,这部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

斯诺里·雅尔塔尔松(1906—1986)原是一位画家,居住在挪

威。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用挪威语创作的长篇小说《高高翱翔的渡鸦》(1934)，描写一位艺术家在爱情和事业上的困境。1936 年他回到冰岛,在首都市立图书馆工作。1943 年出任图书馆馆长。他总共发表过四部诗集。第一部《诗》(1944)在继承冰岛文化和韵律诗传统的同时,试图寻求诗歌表达的新方式,因而是具有韵律传统的现代主义诗歌，成为许多诗人学习的楷模。他的诗作文体严谨，音律和谐甜美,诗格精练简洁,比喻恰当深刻。他继承 19 世纪冰岛诗歌赞美自然、歌颂祖国的传统，以优美的语言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和大自然的热爱，深受冰岛人民的喜爱。但他诗作中的大自然具有梦幻和神秘色彩。从他的短诗《黑暗和雨》中可以看到他的风格：

黑暗和雨
窗户玻璃凝结着
沉重的长长的雨点
光芒从餐桌上刺穿它们
把它们变成星星，
裂成白色的煤屑。
远处是夜晚
漆黑和光秃的地面。①

50 年代，雅尔塔尔松同许多冰岛作家一样，反对冰岛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反对 1951 年冰岛和美国签订的防务协定，担心这将威胁冰岛的独立和国家的自主权，但是他没有用政治说教来提出批评，而是用对历史和大自然形象化的描述和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在他 1952 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在格尼塔海兹》中可以

① 《时间与水 战后冰岛诗选》,董继平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 年。

明显地看出来。第三部诗集是《叶子和星星》(1966),最后一部诗集《秋天的黑暗笼罩着我》于 1981 年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

雅科比娜·西古达多蒂尔(1918—1994)生于冰岛西部偏僻的乡村,在家乡只上过两年小学,迁到首都雷克雅未克后上过一年夜校和半年师范学校。她同北欧许多作家一样，是靠自学成为作家的。

1949 年她同一位农民结婚,成为农家主妇,并开始学习创作。作品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诗歌。处女作《贫农斯纳培特·爱尔斯多蒂和凯蒂尔里德的故事》(1959)描述冰岛农民和外国军事基地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这在冰岛文坛上是一部较早揭露外国军事基地给冰岛人民带来灾难的作品。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打错地方的句点》(1961)、长篇小说《活着的水》(1976)等。

斯瓦瓦·雅科布斯多蒂尔(1930—)出生于冰岛东部,五岁时跟随父母移居加拿大。1940 年回国上学。1949 年中学毕业后到美国麻省学习文学。1952 年获学位后又去英国牛津和瑞典的乌普萨拉攻读研究生学位。1971 年至 1979 年任冰岛议会议员。

雅科布斯多蒂尔以短篇小说步入文坛,《十二个女人》(1965)和《石墙下的聚会》(1967)是两部以描述妇女为主的短篇，作品把现代社会中妇女操劳、辛苦和困难处境描绘得极其真实。她在其中一个短篇《一个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中用象征手法写母亲对子女的爱，对子女有求必应、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子女们想观察一下人脑是什么样的，她也心甘情愿地把脑子献出来，可是等到子女长大以后，对她一点也不在乎。雅科布斯多蒂尔是冰岛第一位有意识地以当代妇女作为作品中心人物的作家。

长篇小说《寄宿者》(1969)是她最著名的作品,除被译成北欧其他几国语言外，还译成了英、德等文。这部作品用象征手法揭露了美国在冰岛凯夫拉维克建立军事基地给冰岛带来的危害。作品发表后，在冰岛国内引起了一场如何对待美国军事基地的大辩论。

约翰内斯·赫尔吉(1926—)自 50 年代在冰岛文坛上崭露头角以来,一直被视为擅长细致描写海洋和渔民生活的作家。

1957 年赫尔吉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殷切期望》被誉为描写当代冰岛渔民生活的最佳作品。

1963 年出版长篇小说《黑色的弥撒》，该书以一个海岛为背景，抨击了岛上掌权者的巧取豪夺和腐败无能，描写了岛上人民经过曲折的道路，终于团结起来，为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过程。这部小说实际上剖析了当代冰岛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受到读者的好评和欢迎，这部小说曾在冰岛和挪威电台中连续广播，并已被改编成电视剧上映。

埃纳尔·卡拉松(1955— ）是冰岛当代最受国内外欢迎的作家。1988 年至 1992 年任冰岛作协主席。他的三部曲（1983—1989)《在魔鬼岛屿出现的地方》、《金岛》和《希望之乡》以 50 年代雷克雅未克一个家庭为中心，通过对农民和渔民文化同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描写，生动而又幽默地反映了冰岛的巨大变化。其他作品还有《傻子的智慧》(1992)和《水银》(1994)等。

埃纳尔·马尔·古德蒙德松(1954—)是冰岛当代最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和诗人。他的三部曲《旋转楼梯上的骑士》(1982)、《房顶上有翅膀在拍击》(1983)和《雨点的尾声》(1986)记述了雷克雅未克从一个小村发展成一座大城市，一代新人在城市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民间传说和魅力的世界，一个充满欢笑和悲哀的世界。长篇小说《宇宙天使》(1993)描写精神病人所经受的痛苦。全书充满悲剧气氛。该小说于 1995 年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他的诗作打破传统形象化的比喻，为冰岛诗坛输入一股清新之风,深受冰岛人民好评。主要诗作有《访问》(1981)以及《投递男童的孤独》和《海洋中的一块岩石》等。

第六节　繁荣的芬兰文学走向世界

芬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苏联进行过两次战争，均遭失利，损失惨重，除伤亡近十五万人外，还失去了卡累利亚省，居住在该省的占总人口 12% 的四十二万人被迫迁到其他地方，此外还要负担五亿多美元的战争赔款。二次大战后的芬兰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芬兰一面积极发展工业，一面努力扩大对外贸易，经过艰苦努力，芬兰终于渐渐走出低谷。到了 60 和 70 年代，芬兰已经建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到了 80 年代，芬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十三个国家之一。

从文学上看，战后的芬兰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40 年代末期。文学处于犹豫彷徨但积极探索时期，主要作家有用瑞典语创作的优秀儿童文学女作家吐凡·扬森。

第二时期：50 年代。在英国、法国诗人，尤其是 40 年代瑞典诗人凡恩贝里等人影响下，芬兰诗歌开始出现摆脱传统格式和韵律、没有标点题目、内容晦涩的现代主义诗歌，女诗人较多，如海尔维·尤沃宁(1919—1959)、爱娃-莉莎·玛内尔等。小说方面有坚持战前传统写作的作家，也有采取心理分析、新旧手法相结合创作的作家，小说主题大多描述战争，主要作家有万伊诺·林纳和爱娃·约恩彼尔托等。

第三时期：60 年代前期到 70 年代。随着人们逐渐对和平环境的适应以及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世界各地的信息通过电视迅速传到芬兰各地，芬兰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国家不是孤立的荒原，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同时芬兰新一代人开始步入社会，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但是在国际局势的影响下，对政治十分感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参与文学”在芬兰产生。同 50 年代相似，这种“参与文学”首先表现在诗歌上，1962 年本蒂·萨里科斯基

(1937—1983)发表了诗集《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放弃了 50 年代精雕细镂和形象比喻的语言，而改为直接用日常口语、报纸标题、街头对话写政治诗。1966 年,阿尔沃·萨洛斯(1932—)发表了以 30 年代反暴力为主题的音乐剧《春天的冬天》。在他的影响下,芬兰文坛经常出现政治诗、政治剧。小说也出现了纪实和报道文学。一大批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作家在芬兰涌现出来。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自身的经历，他们作品中的人物不是某个人，而是代表一群人,他们运用的语言也是日常对话、土话、方言,甚至还有一些粗话。作品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和斗争为主，所描述的事件的发生时间十分清楚，事件的背景同芬兰社会危机和社会变迁，如往瑞典移民等，以及当时的世界大事，如越南战争、卫星上天等紧密相联。主要作家有汉努·萨拉玛(1936—)和阿尔波·鲁特(1943—)等。

第四时期：70 和 80 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家们摆脱“政治参与”,从自然和文化遗产中吸取养分,致力于更为自由化、个人化和国际化的创作。作品从日常琐事中反映人间关系。这股新倾向首先在女作家的作品中反映出来，如埃伊拉·彭纳宁(1916—)的诗集《感谢幻觉》(1979)、海莱娜·安哈娃(1925—)的诗集《一个伤心人在听你说话时，你应该慢慢地讲》(1971)和爱娃·基尔比(1928—)的《爱情之歌》(1972)等。在海莱娜·安哈娃的诗《回答》中有这样的诗句：

在坐满乘客的电车上一位孕妇站起身来
为了给一位怀抱婴孩的母亲让坐。
三排位置上坐着的青年学生看着。

读者们对这种体裁自由、非政治化的诗歌甚为欢迎。新诗的第二个倾向是注重抒发对大自然景色和男女爱恋的情感。这从里

斯图·拉萨(1954—)的诗集《林中小路只是一扇绿色的大门》(1971)和卡依·魏斯特贝里(1946—)的诗集《你的声音》(1974)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在工人文学兴起的同时,芬兰还出现一种称之为"中产阶级文学",其代表作家为女作家埃伊拉·彭纳宁和埃娃·基尔比等人。这类作品主要描写中产阶级"危机",反映一批受过教育的中产人士,他们正处于十字路口,以往的社会地位已经失去,控制社会发展的能力和影响也已消失。离婚使家庭破裂;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大;宗教教义不再成为道德标准;民族发展和爱国主义思想不能激发起人的豪情。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教员、艺术家、家庭妇女、小企业主和学生等,他们往往已经脱离农村,但又尚未适应城市生活。凯尔图-卡里纳·苏萨尔米斯(1921—)的《富裕的人》(1969)是这类小说中颇为典型的作品。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芬兰文学还有一些新特点,诗歌不明显,小说方面较为显著,主要表现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出生的年青一代的作家中,他们喜欢运用当时年轻人中流行的日常俚语来撰写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他们对政治、对大众面临的问题不感兴趣,而只热中于个人问题,他们以赞赏的态度突出人际关系中的自私和懒散。

战后的芬兰文学发展迅速。广播电视的出现并没有影响芬兰人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书籍仍十分畅销。芬兰全国各地图书馆不断增多,1939 年全国有近两千个图书馆,1950 年增至二千三百个,到了 1960 年猛增至三千四百个。二战以后,芬兰的剧院和剧团由国家和地方当局经营,70 年代中期全国共有四十个国家的和地方的固定和巡回剧团,此外,还有不少临时的业余剧团。国家为了繁荣文学,采取各种促进措施,改善创作条件。1948 年国家为作家设立奖学金制度,并于 1970 年扩大发放范围。国家文学委员会每年向约一百位作家发放为期十五年、五年、三年或一年的奖学

金,为作家创作提供经济资助,此外还设有项目奖学金、图书馆补助,另外,不少私人基金会还为作家提供各种资助。过去,绝大部分作家集中在赫尔辛基、坦佩雷和奥堡三个地方,60 年代兴起了一场反对文学“赫尔辛基中心论”的辩论,各地纷纷建立本地区作家团体和小型出版社,其结果是到了 70 年代,描写农村和大自然题材的作品十分繁多。

吐凡·扬森(1914—)出身在一个艺术家家庭,父亲是雕刻家,母亲是美术设计师。她自己曾在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和巴黎学过艺术1943 年后曾多次举办画展。1945 年开始发表小说,头两部小说《小矮子精和大洪水》(1945)和《彗星搜索》(1946)并未引起注意,第三部《魔法师的帽子》(1948)引起轰动。扬森在作品中创造了童话人物“木明一家人”,家中有木明爸爸、木明妈妈,还有他们的孩子小木明。她用这些童话人物,制造出一个童话世界,创作出一本又一本童话故事:《木明爸爸的牛皮》(1950)、《后来怎样了?》(1952)、《危险的仲夏》(1954)、《魔幻的冬天》(1957)、《谁来解开心结》(1960)、《看不见的孩子》(1962)、《爸爸和海洋》(1965)、《深秋十二月》(1970)和《危险的旅行》(1977)等。木明一家人都是人身兽头,有点像直立的微型小河马。他们坎坷的命运和冒险经历是社会现实的写照,这是一部将童话和现实融为一体的作品。扬森亲自为作品配上许多精美、有趣的插图,使作品更富有趣味性。

60 年代后期起,扬森的创作以成人读物为主,有反映成人与儿童关系的长篇小说《雕刻师的女儿》(1968)、《夏之书》(1972)和《太阳城》(1974)等。短篇小说集《娃娃柜》(1978)和长篇小说《诚实的骗子》(1982)则反映了人类要求自由的愿望。

爱娃-莉莎·玛内尔(1921—)出身于赫尔辛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出版社编辑。她受过六年中等教育,当过保险公司职员和出版社编辑。1946 年成了职业作家。她的作品有诗歌、小说和

剧本。她的诗集以简洁、清丽的文字写出了人类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玛内尔的处女作诗集《黑与红》(1944)和第二部诗集《似风或云》(1949)都十分出色,但并未引起文坛重视。50 年代中期,正当芬兰文坛就现代主义文学进行热烈辩论时,玛内尔出版了第三部诗集《这次旅行》(1956)。这部诗集冲破了芬兰传统诗歌形式,概念上也是非逻辑的,但是由于她写得十分优美,富有音乐感,作品获得极大成功。

60 年代,玛内尔对国际上出现的把核物理先进科技同外交政策相结合的强权政治感到不满,发表了诗集《俄耳甫斯之歌》(1960)。1968 年又发表了不满苏军出兵捷克的诗集《假如悲伤消散》。

《新年之夜》(1965)和《五月雪》(1967)是两部以人在文明社会中悲惨命运为主题的剧本。长篇小说《马伊纳盖的狗》(1972)描写了政治生活中的暴行。她的其他作品还有诗集《可怕的猫》(1976)和《死水》(1977),长篇小说《当心胜利者》(1972)和具有中国道家哲学色彩的散文集《小河马的路边音乐》(1957)等。

万伊诺·林纳(1920—)是芬兰当代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佃农、屠夫。他自幼在田里劳动,在林场和锯木场当小工。1938 年进入纺织厂当梳棉工。他当过兵,上过成人学校,靠自学成才,1955 年成为专业作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林纳回到纺织厂并开始写作。处女作长篇小说《目标》(1947)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描写佃农的独生子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终于成为一名作家。第二部长篇小说《黑色的爱情》(1948)是部爱情悲剧,在人物描写上比第一部小说有很大进步。1954 年林纳出版了描写 1941 年至 1944 年战争的小说《无名战士》,作品对军官和领导层进行了谴责,并以幽默的笔法描绘了普通士兵。这部作品获得极大成功,成为北欧的畅销书,被拍成

电影,又被搬上舞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北极星下》(1959—1962)是由三部长篇小说组成的作品。第一部描写 1880 年至 1910 年之间芬兰北部农村中佃农在艰苦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的痛苦生活;第二部是写 1918 年的国内战争,他以大量的历史材料和无可争辩的事实向读者展示,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赤卫队员们举行起义是社会的必然,但结果是赤卫队员战败,白卫军获得胜利。他以愤怒的笔触描写了白卫军对被俘的赤卫队员的残酷报复,作品的发表引起芬兰国内广泛的争论,原因是他对赤卫队员的描写相悖于多年来资产阶级的观点;第三部是写内战和二次大战之间芬兰国内政治冲突、外交政策以及二战期间芬兰同苏联的两次战争。这部作品通过对佃农科斯基拉父子两代人的经历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50 年代间芬兰社会的变革、村民的命运和各阶层人民对变革的不同态度。父亲尤西·科斯基拉本是牧师家的长工,为了过上好日子,租种了牧师家的一片荒芜的沼泽地,他梦想有朝一日能把自己辛苦耕作的沼泽地买下来,但未能如愿。儿子阿克赛里勤劳、坚毅,具有反抗精神,积极参加反佃主斗争,后来在国内战争中成为赤卫队指挥员。这部史诗般的宏伟巨著出版后获得巨大成功。林纳在国内外的声誉也进一步提高,1962 年第三部作品出版时,林纳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

爱娃·约恩彼尔托(1921—)原名爱娃·赫勒曼,出身于商人家庭,当过记者,并在芬兰广告部门工作。1950 年成为专业作家。1977年任芬兰国家文学委员会委员。1980 年出任艺术教授。多次荣获芬兰国家文学奖。

描写农村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长篇小说《少女在水上走》(1957)使她一举成名。接着她又发表了《鸟在那里歌唱》(1958)和《闪烁的年月》(1961),这两部小说着重描写对美和幸福的追求。她最重要的作品是 1974 年至 1980 年发表的长篇系列小

说《家奴和敌人》(1974)、《撞击中的播种》(1976)、《似大海中的沙》(1978)和《一切都有时间》(1980)。作品通过商人海尼宁一家勾勒出芬兰从 1918 年至 1930 年之间不同阶层的兴旺和衰落的变迁历史,详尽描述了 20 年代经济和文化高潮、政治分裂、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尖锐斗争。作品描写细腻生动，被文学评论家誉为“新地省的叙事诗”。

约恩彼尔托的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只有约翰内斯》(1952)和《格拉德夫人,与生活联姻》(1982)等。她的作品一般突出两代人之间和两性之间的矛盾，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生气勃勃、有理想又能干的强者，而男人往往都是意志薄弱而又不切实际的无能之辈。

汉努·萨拉玛(1936—)是当代芬兰工人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他以顽强反对社会的陈规陋习和豪放不羁的写作风格著称。他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是个电器装配工。他自己也当过电工和农业工人。1961 年成为专业作家。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1961)描述一个农村姑娘在城市里得了精神病的悲惨遭遇。他以大胆辛辣的笔调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深深地触及了一些使公众愤慨的社会问题。几年后他又发表了《仲夏舞会》(1964)。这部小说以农村仲夏之夜的舞会为背景，形象地描写了在狂欢高潮时，那些平日道貌岸然、以卫道者自居的显贵们也口出污言秽语，丑态百出。作品最后是一场车祸使许多人丧生的悲剧。这部小说出版后在芬兰引起轩然大波。芬兰大主教出面抗议，芬兰司法部长出来干预,议会就此事进行了咨询、辩论。萨拉玛以‘亵渎上帝罪’被起诉。最后法庭宣布他因犯有“预谋的亵渎罪”而被判监禁，在总统的干预下他免于坐牢。

萨拉玛尽管遭受了种种非难，但仍继续写作。他于 1972 年又发表了《哪里有犯罪,哪里就有证人》,小说通过萨尔米宁一家的遭

遇，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共产党在坦佩雷工人区比斯帕拉地区的抵抗运动和恐怖主义者的活动。作品发表后引起一些共产党员的批评，认为书中没有塑造出真正勇敢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但芬兰文学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是芬兰 70 年代的最佳作品。1976 年至 1983 年,萨拉玛又发表了六卷本系列小说《芬兰底亚》，小说描述了一个充满罪恶、暴力和腐败的社会。

萨拉玛除了长篇小说外，还著有短篇小说和诗歌。自 1962 年至 1988 年,他共发表了五部短篇小说集,四部篇名为《短篇故事》，一部为《假期》。他于 1975 年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

阿尔波 ·鲁特(1943—)是 20 世纪 60 年代芬兰著名的工人作家。他出身于首都赫尔辛基一个鞋匠家庭。只上过中学。当过汽车修理工、鞋匠、勤杂工、售货员和仓库保管员等。1968 年开始成为专业作家。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路线和写作方法，忠实地反映芬兰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他的作品深受广大劳动者的欢迎。他曾于 1969 年和 1975 年两次获芬兰国家文学奖。

长篇小说《青少年之家》(1969)使他一举成名。作品描述 20 世纪 50 年代末生活在工人区的十个青年，他们租用旧的汽车修理厂作为临时住所，没有学习和就业的机会，整日东游西逛，到处流浪,靠偷盗等不正当手段混日子。《最后一个秋天》(1979)是《青少年之家》的姊妹篇,描述《青少年之家》中的十个主人公经过奋斗，十年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小业主。《下士尤林》(1971)是他惟一的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故事发生在 1941 年 6 月至 1944 年的“续战”中，它通过对在炮兵部队服役的下士尤林和其因政治观点不同而被监禁的兄弟的描写，反映了芬兰工人运动中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两种不同的路线。《祖国》(1974)描写一对年轻的工人夫妇,面临失业威胁,被迫移民瑞典。《经济繁荣期》(1977)描写工会干部和工人报刊编辑梅盖莱在所谓经济繁荣时期中的不幸生活和最后被

送入精神病院的遭遇，同时也揭露了工会运动中不同路线之间的权力争夺和斗争。以上两部作品的篇名极具匠心。《祖国》里的主人公移民到瑞典,没有自己的国家;《经济繁荣期》中的主人公的遭遇却是萧条期工人经历的写照。

鲁特以描写赫尔辛基工人和他们面临的问题为主，作品富有幽默感和讽刺性。他善于把当今国际大事和芬兰社会日常现象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这反映出他视野宽广,思想深邃。他的作品语言简短精练，且通俗易懂。他的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结婚》（1962）和《木板房》（1969）以及短篇小说集《妇女的岁月》（1975）等。

埃伊拉·彭纳宁(1916—1994)是芬兰"中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出身于芬兰中部工业城市坦佩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工厂主。1940 年获文学硕士。曾担任过档案管理员、广告编辑、报刊编辑和评论员等。1968 年至 1970 年任赫尔辛基作家协会主席，1974 年至 1976 年任芬兰国家文学委员会主席。她一生共七次获芬兰国家文学奖。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和评论等。她还是一位翻译家，翻译了不少外国作品。她的创作受到英国作家劳伦斯等人的影响。

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战前仍年轻》发表于 1942 年，描写她这一代年轻大学生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和遭遇。20 世纪 50 年代她发表了两部宗教历史小说，一部是描写中世纪瑞典圣女的《圣比尔吉塔》（1954）,另一部是描写基督教贵格会的《灵光之儿童》（1958）。她的代表作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创作的三部曲:《希姆的爱》（1971）、《为了炫耀》（1972）和《玫瑰花冠》（1973）,小说以一个坦佩累妇女的目光来观察 20 世纪初期芬兰的社会变革和重大事件,人物有作家、空想主义者、出版商等，内容丰富,构思巧妙。

她的短篇小说题材广泛,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幽默而讽刺。自 1952 年至 1980 年她总共发表了五部短篇小说集,如《塔院》(1952)、《初恋》(1969)等。她的论文集涉猎广泛,既有对外国作家的评论,也有对芬兰本国现、当代及古典作品的论述。这些论文大部分收进论文集《探索》(1965)、《这位作家和她的丈夫》(1982)以及《阅读,接近》(1990)中。

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

Blankner, Frederika: The History of the Scandinavian Literatures, New York 1938.

Rossel, Sven H.: A History of Scandinavian Literature 1870—1980 Minneapolis 1982.

Bra Böckers lexikon Sverige 1978.

Hroarsson, Björn (Editor in Chief): The Nordic Book Nordic Book (HK) Ltd Hong Kong 1997.

Mitchell, P. M.: A History of Danish Literature, Copenhagen 1957.

Kaspersen, Søren with 46 other writers: Dansk litteratur historie (1—9) Copenhagen 1990.

Hansen, Ib Fischer mfl. (red.): Litteraturhåndbogen Denmark 1987.

Jansen, F. J. Billeskov and . M. Mitchell (red.): Anthology of Danish Literature.

London and Amsterdam 1971.

Bredsdorff, Elias: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London 1975.

Bredsdorff, Elias: H. C. Andersen og Georg Brandes Denmark 1994.

Rossel, Sven H (red.): A History of Danish Literature Nebraska 1992.

Algulin, Ingermar and Bernt Olsson: Litteraturens historia i Sverige Stockholm 1995.

Warme, Lars G. (red.): A History of Swedish Literature Nebraska 1996.

Sallös, Hilding, Staffan Björck and Gunnar Jörn: Svensk litteratur (1—2) Stockholm 1973.

Lindström, Göran mfl.: Svensk lyrik Lund 1980.

Lagercrantz, Olof: August Strindberg Stockholm 1979.

Naess, Harald S. (red.): A History of Norwegian Literature Nebraska 1993.

Andersen, Per Thomas: Norsk Litteraturhistorie Oslo 2003.

Hemmer, Bjørn: Ibsen Kunstnerens vei Norge 2003.

Magnusson, Siguröur A. (red.): Icelandic Writing Today Iceland 1982.

Arnason, Kristjarn: The Rythms of Drottkvött and the Old Icelandic Metres Reykjavik 1991.

Nordal, Johannes and Valdimar Kristinsson (red.): Iceland The Republic, Reykjavik 1996.

Tarkiainen, V.: Finsk litteratur historia Helsingfors 1950.

Hulden, Lars, Jarl Gallen, Olof Enckell and Erik Ekelund: Finlands svenska litteratur(12) Helsingfors 1969.

Laitinen, Kai: Finlands litteratur Borga 1988.

Schoolfield, George C. (red.): A History of Finland's Literature Nebraska 1998.

附录二

主要作家中外文译名对照表

丹麦作家

Kjeld Abell	谢尔·阿伯尔
Jeppe Aakjær	耶普·阿克耶尔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Anders Arrebo	安德斯·阿勒勃
Knuth Becker	克努特·贝克尔
Steen Steensen Blicher	斯泰恩·斯泰恩森·布利高
Karen Blixen	卡伦·布利克森
Anders Bodelsen	安德斯·博迪尔森
Hans Christian Branner	汉斯·克里斯蒂安·布兰诺
Marie Bregendahl	玛丽亚·勃莱根达尔
Hans Brorson	汉斯·布鲁森
Martha Christensen	玛塔·克里斯登森
Sophus Claussen	苏菲斯·克劳森
Tove Ditlevsen	吐凡·蒂特兰夫森
Johannes Ewald	约翰内斯·埃瓦尔德
Leck Fischer	莱克·费舍
Meir Aron Goldschmidt	梅尔·阿隆·戈尔施米特
Saxo Grammaticus	萨克索·格拉玛蒂乌斯
Nicolai Frederik Grundtvig	尼古拉·弗列德立克·格隆德维克

Martin A. Hansen	马丁·阿·汉森
Johannes Carsten Hauch	约翰内斯·卡斯顿·豪克
Johan Ludvig Heiberg	约翰·鲁德维格·海贝格
Ludvig Holberg	路德维格·霍尔堡
Sven Holm	斯文·霍尔姆
Bernhard Severin Ingemann	本哈德·赛文林·英厄曼
Jens Peter Jacobsen	延斯·彼得·雅科布森
Johannes Vilhelm Jensen	约翰内斯·维·延森
Søren Kierkegaard	索伦·克尔恺郭尔
Thomas Kingo	托马斯·金果
Hans Kirk	汉斯·基尔克
Marianne Larsen	玛丽安娜·拉尔森
Kaj Munk	卡伊·蒙克
John Nehm	约翰·内姆
Martin Andersen Nexø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
Morten Nielsen	马丁·尼尔森
Henrik Nordbrandt	亨里克·诺德布朗特
Adam Ochlenschläger	阿达姆·欧伦施莱厄
Frederik Paludan-Muller	弗雷德里克·帕卢丹一谬勒
Leif Panduro	莱夫·潘杜鲁
Henrik Pontoppidan	亨里克·彭托皮丹
Halfdan Rasmussen	哈尔夫坦·拉斯莫森
Klaus Rifbjerg	克拉斯·里夫贝里
Hans Scherfig	汉斯·谢尔菲格
Peter Seeberg	彼得·西伯格
Johan Skjoldborg	约翰·舍尔德堡
Villy Sørensen	维列·舍伦森
Carl-Erik Soya	卡尔·埃里克·索亚

Schack von Staffeldt	萨克·封·斯坦菲尔德
Henrich Steffens	亨里克·斯坦芬斯
Peter Suhm	彼得·苏姆
Hanne Marie Svendsen	哈内·马丽亚·斯文德森
Kirsten Thorup	凯什婷·索若普

瑞典作家

Gunnar Adolfsson	贡纳尔·阿道尔夫松
Lars Ahlin	拉斯·阿林
Carl Jonas Love Almqvist	卡尔·约纳斯·洛凡·阿尔姆克维斯特
Dan Andersson	丹·安德松
Per Daniel Amadeus Atterbom	彼尔·达尼尔·阿玛德乌斯·阿特博姆
Carl Michael Bellman	卡尔·米凯尔·贝尔曼
Victoria Maria Benedictsson	维克多利亚·玛利亚·贝内迪克松
Hjalmar Bergman	雅马尔·贝里曼
Saint Birgitta	圣比尔吉塔
Karin Boye	卡琳·鲍耶
Fredrika Bremer	弗雷德里卡·布雷默尔
Gustaf Creutz	古斯塔夫·克留茨
Stig Dagerman	斯蒂格·达格曼
Olof von Dalin	奥洛夫·封·达林
Sven Delblanc	斯文·台尔勃朗克
Gunnar Ekelöf	贡纳尔·埃盖洛夫
Kerstin Ekman	凯什婷·埃克曼
Lars Fossell	拉斯·福塞尔

Frans Michael Franzen	法朗斯·米凯尔·弗朗森
Jan Fridegård	扬·弗里德高尔德
Gustaf Fröding	古斯塔夫·弗勒丁
Erik Gustaf Geijer	埃里克·古斯塔夫·耶伊尔
Gustaf af Geijerstam	古斯塔夫·阿·耶伊尔斯塔姆
Lars Gustafsson	拉斯·古斯塔夫松
Gustaf Gyllenborg	古斯塔夫·尤伦堡格
Lars Gyllensten	拉斯·尤伦斯坦
Verner von Heidenstam	魏尔纳·封·海顿斯坦
Gustaf Hellström	古斯塔夫·赫尔斯特罗姆
Folke Isaksson	福尔盖·伊萨克松
Per Christian Jersild	彼·克·耶舍尔德
Eyvind Johnson	埃温德·雍松
Erik Axel Karlfeldt	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
Johan Henrik Kellgren	约翰·亨里克·谢尔格伦
Martin Koch	马丁·考克
Agnes von Krusenstjerna	阿格内斯·封·克吕森谢娜
Pär Lagerkvist	帕尔·拉格克维斯特
Selma Lagerlöf	塞尔玛·拉格洛夫
Anna Maria Lenngren	安娜·玛利亚·伦格伦
Carl Gustaf Leopold	卡尔·古斯塔夫·莱奥波尔德
Oscar Levertin	奥斯卡·莱维尔廷
Sara Lidman	萨拉·李德曼
Bengt Lidner	本特·李德奈尔
Erik Lindegren	埃里克·林德格伦
Astrid Lindgren	阿斯特里德·林格伦
Sven Lindqvist	斯文·林德克维斯特
Carl von Linne	卡尔·封·林奈

Ivar Lo-Johansson	伊瓦尔·鲁–约翰逊
Artur Lundkvist	阿图尔·隆德克维斯特
Harry Martinson	哈里·马丁松
Moa Martinson	莫阿·马丁松
Vilhelm Moberg	维尔海姆·莫贝里
Jan Myrdal	扬·米尔达尔
Hedwig Nordenflycht	海德维·诺登弗里克特
Karl Rune Nordkvist	卡尔·鲁内·诺德克维斯特
Ludvig Nordström	路德维格·诺德斯特罗姆
Johan Oxenstierna	约翰·奥克塞恩谢纳
Göran Palm	尤让·帕尔姆
Olof Rudbeck	奥洛夫·鲁德贝克
Viktor Rydberg	维克托·里德贝里
Maria Sandel	马丽亚·萨恩德尔
Malla Silfverstolpe	玛拉·西尔弗斯托普
Sigfrid Siwertz	西格弗里德·西维兹
Carl Snoilsky	卡尔·斯诺伊尔斯基
Erik Johan Stagnelius	埃里克·约翰·斯塔格奈利乌斯
Georg Stiernhielm	耶奥尔格·希恩海尔姆
Johan August Strindberg	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Emanuel Swdenborg	埃曼纽尔·斯维登堡
Esaias Tegner	埃沙伊阿斯·泰格奈尔
Thomas Thorild	托马斯·托里尔德
Tomas Tranströmer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Karl Vennberg	卡尔·凡恩贝里
Johan Olof Wallin	约翰·奥洛夫·瓦林
Lars Wivalius	拉斯·维瓦利乌斯
Elin Wägner	爱林·维格奈尔

Per Wästberg	彼尔·魏斯特贝
Tore Zetterholm	吐尔·柴特霍尔姆

挪威作家

Ivar Aasen	伊凡·奥森
Peter Christen Asbjørnsen	彼得·克里斯滕·阿斯比恩森
Jens Bjørneboe	耶斯·比尔内布
Bjørnstjerne Bjørnson	比昂斯藤·比昂松
Johan Borgen	约翰·博尔根
Oskar Braaten	奥斯卡·勃拉登
Niels Krog Bredal	尼尔斯·克鲁格·布雷达尔
Johan Nordahl Brun	约翰·诺达尔·布鲁恩
Hans Bull	汉斯·布尔
Solveig Christov	苏尔维格·克里斯托弗
Camilla Collett	卡米拉·科莱特
Petter Dass	彼德·达斯
Olav Duun	乌拉夫·杜恩
Dorothe Engelbretsdatter	多萝西娅·恩格尔布莱特斯多蒂尔
Johan Falkberget	约翰·法尔克贝格
Claus Fasting	克劳斯·法斯丁
Kjartan Fløgstad	克雅坦·弗列格斯塔德
Jon Fosse	荣·福塞
Arne Garborg	阿尔内·嘉宝
Nordahl Grieg	诺达尔·格里格
Frode Grytten	福劳德·格吕顿
Gunnar Bull Gundersen	贡纳尔·布尔·贡德尔森

Bergljot Hobaek Haff	贝里尤特·霍贝克·哈夫
Inger Hagerup	英厄·哈格鲁普
Knut Hamsun	克努特·哈姆生
Sigurd Hoel	西古尔德·胡尔
Henrik Ibsen	亨里克·易卜生
Margaret Johansen	玛格雷特·约翰森
Hans Jæger	汉斯·耶格尔
Alexander Kielland	阿雷克山德·基兰德
Hans Kinck	汉斯·金克
Jan Kjaerstad	扬·克雅尔斯塔德
Helge Krog	海尔吉·克罗格
Jonas Lie	约纳斯·李
Peter Andreas Munch	彼得·安德雷斯·蒙克
Agnar Mykle	阿格纳·米克莱
Torborg Nedreaas	托尔堡格·奈德利奥斯
Rudolf Nilsen	鲁道尔夫·尼尔森
Arnulf Øverland	阿诺尔夫·厄弗兰德
Christen Pram	克里斯钦·普朗姆
Nils Johan Rud	尼尔斯·约翰·鲁德
Cora Sandel	考拉·萨恩德尔
Aksel Sandemose	阿克塞尔·桑内莫塞
Gerhard Schøning	杰哈德·舍宁
Eva Seeberg	爱娃·西伯格
Amalie Skram	阿玛利厄·斯克拉姆
Dag Solstad	达格·苏尔斯塔
Thomas Stockfleth	托马斯·斯托克弗莱
Christian Tullin	克里斯钦·图林
Sigrid Undset	西格里德·温塞特

Kristofer Uppdal	克里斯托夫·乌普达尔
Tarjei Vesaas	塔尔耶·韦索斯
Aasmund Vinje	阿斯蒙德·维内
Jan Erik Vold	扬·埃里克·沃尔德
Johan Sebastian Welhaven	约翰·赛巴斯梯恩·韦尔哈文
Henrik Wergeland	亨里克·韦格朗
Nicolai Wergeland	尼古莱·韦格朗
Johan Herman Wessel	约翰·赫尔曼·维塞尔

冰岛作家

Gudbergur Bergsson	古德贝古尔·贝里松
Einar Bragi	埃纳尔·勃拉格
Sigurdur Breidfjörd	西古尔德·勃雷德弗尔德
Sigfus Dadason	西格福斯·达达松
Hannes Finnsson	哈内斯·芬恩松
Saemund Frode	塞梦恩德·弗鲁德
Steffan Hördur Grimsson	斯坦芬·霍尔德尔·格里姆松
Benedikt Gröndal	贝尼迪克·格伦达尔
Einar Mar Gudmundsson	埃纳尔·马尔·古德蒙德松
Kristmann Gudmundsson	克里斯特曼·古德蒙德松
Gunnar Gunnarsson	贡纳尔·贡纳尔松
Jonas Hallgrimsson	尤纳斯·哈尔格里姆松
Johannes Helgi	约翰内斯·赫尔吉
Snorri Hjartarson	斯诺里·雅尔塔尔松
Torfhildur Holm	索尔富西尔德·霍尔姆
Svava Jakobsdottir	斯瓦瓦·雅科布斯多蒂尔
Hjalmar Jonsson	谢尔玛尔·荣松

Gudmundur Kamban 古德蒙德尔·卡姆班

Einar Karason 埃纳尔·卡拉松

Halldor Laxness 哈多尔·拉克斯内斯

Eggert Olafsson 埃盖尔特·奥拉夫松

Jon Oskar 永·奥斯卡尔

Toivo Pekkanen 托依沃·帕卡宁

Eila Pennanen 埃伊拉·彭纳宁

Sigurdur Petursson 西古德尔·彼得松

Alpo Ruuth 阿尔波·鲁特

Hannu Salama 汉努·萨拉玛

Hannes Sigfusson 哈内斯·西格福松

Jakobina Sigurdardottir 雅科比娜·西古达多蒂尔

Olafur Johann Sigurdsson 奥拉夫·约翰·西古尔德松

Johann Sigurjonsson 约翰·西古尔永松

Stefan Sigurdsson 斯坦芬·西古德松

David Stefansson 达维德·斯坦芬松

Steinn Steinarr 斯坦恩·斯坦纳尔

Jon Steingrimsson 荣·斯坦恩格里姆松

Magnus Stephensen 马格努斯·斯坦芬森

Snorri Sturluson 斯诺里·斯图鲁松

Thorbergur Thordarson 索尔贝尔古·索尔查松

Bjarni Thorarensen 比尔尼·索拉伦森

Jon Thorlaksson 荣·索尔劳克松

Jon Thoroddsen 荣·托罗德森

Thor Viljalmsson 吐尔·维尔雅姆松

Jon ur Vör 荣·乌尔·沃尔

芬兰作家

Mikael Agricola	米歇尔·阿格里科拉
Juhani Aho	约翰·阿霍
Adolf I. Arwidsson	阿道尔夫·伊·阿尔维德逊
Gunnar Björling	贡纳尔·比林
Minna Canth	敏娜·康特
Jakob Chronander	雅可布·克鲁纳恩德尔
Ericus Erici	埃里柯斯·埃里西
Sigfrid A. Forsius	西格夫里德·阿·福西乌斯
Jacob Frese	雅可布·弗里斯
Karl Gottlund	卡尔·科伦德
Pentti Haanpää	本蒂·韩培
Tove Jansson	吐凡·扬森
Eeva Joenpelto	爱娃·约恩彼尔托
Daniel Juslenius	达尼尔·尤斯莱尼乌斯
Jakob Juteini	亚科·尤太尼
Helvi Juvonen	海尔维·尤沃宁
Volter Kilpi	沃尔特·基尔皮
Aleksis Kivi	阿列克西斯·基维
Julius Krohn	尤里乌斯·克伦
Eino Leino	埃依诺·雷诺
Väinö Linna	万伊诺·林纳
Elias Lönnrot	埃利阿斯·伦洛特
Eeva-Lisa Manner	爱娃一莉莎·玛内尔
A. Oksanen	阿·奥克萨宁
Hagar Olsson	哈加尔·乌尔松
Henrik G. Porthan	亨里克·加·鲍坦恩
Torsten Ruden	吐斯顿·鲁顿

Johan Ludvig Runeberg	约翰·柳德维格·鲁内贝格
Pentti Saarikoski	本蒂·萨里科斯基
Arvo Salos	阿尔沃·萨洛斯
Frans Eemil Sillanpää	弗朗斯·埃米尔·西伦佩
Elvi Sinervo	埃尔维·西内尔沃
Johan Vilhelm Snellman	约翰·维尔海姆·斯内尔曼
Edith Södergran	埃迪特·舍德格朗
Jacob Tengström	雅可布·滕斯特罗姆
Katri Vala	卡特里·瓦拉
Mika Waltari	米卡·瓦尔塔里